

赫鲁晓夫回忆录



全译本

赫鲁晓夫回忆录

赵绍棣等译

上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赫鲁晓夫回忆录

赵绍棣等译

下

1122/02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责任编辑 谢默依

封面设计 汪国华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赫魯曉夫回忆录

(上下卷)

赵绍棣 等译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5印张 505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 000册

ISBN7—5043—0168—X/D·34

定价: 7.80元

内 容 提 要

赫鲁晓夫是前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经历了苏联从十月革命到60年代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从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成长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他最先提出了苏联体制改革的主张，并首先批评了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20多年后的今天，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重新肯定了赫鲁晓夫的历史功绩。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赫鲁晓夫也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

他的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展示了苏联的历史画面，特别是揭开了苏联最高领导阶层过去封闭的、鲜为人知的内幕，对于了解苏联内政、外交各个方面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书中某些章节中有攻击毛泽东同志的内容，读者可以在分析批判中了解赫鲁晓夫当时对中国的某些观点的政策，得知中苏关系破裂的某些状况。本书还全文收录了多年来一直传闻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

原出版者的话

这本书是根据来源于不同渠道、时间和场合的材料汇编而成的。出版者确信无疑，并已尽力证实，它是尼基塔·赫鲁晓夫谈话的真实纪录。作者是否有意或者期望他的谈话有朝一日能在他自己的国家或西方付印，那只能是一种猜测。出版者对赫鲁晓夫在书中所被表达出来的那种方式承担全部责任。况且，出版者对此也具有信心，因为回忆录的真实性和重要性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

——塔尔伯特

引 言

爱德华·克兰克肖

当我得知有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时，首先想到的是，它可能是假的。在此之前曾经有过一些类似的文件，而实际上则是出于政府或商业方面的原因在西方编造的。

但是，我用不着读得太多就感到有把握它是货真价实的，而在全部读完时，则是完全信服了。这就是赫鲁晓夫本人，毫无疑问地是一个过着拘禁生活的人的声音，并且是那样的活灵活现。任何一个在赫鲁晓夫执政时听过他的演说或看过他的俄文讲稿的人，都会明白无误地发现那种真实的语调。我是自20年代后期以来出版的赫鲁晓夫的著作几乎每个字都读过的。有好几次我还面对面地见过他，在苏联内外听过他公开的或私下的谈话。整整15年，从他1949年冬被斯大林从基辅召回到莫斯科直到他1964年10月下台，我一直都在研究他，试图摸透他的性格和动机。如同人们相信某些无法科学地加以证实的事物一样，我相信在书中谈话的正是我了解他的全部公开生活和大部份是掩盖着的他夺取和维持政权的过程的那个人（可惜从这部回忆录来看，这些仍然掩盖着）。他现在老了，疲惫了，因疾病而衰弱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地充满活力。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却正因为如此而更加容易自我暴露。

所以，我们所掌握的是一部独特而又非同异常的个人历史。尽管存在着种种的局限、避讳、隐瞒、欺骗和遗漏，（有些是故意的，有些则明显地是因为年老而忘记了），它毕竟是斯大林及

其以后时代的苏联领导人中第一个这样的回忆录。它把我们直接地带进了迄今为止仍然禁锢着的思想领域。我对这本书的最大兴趣，并认为它的价值所在，就是它无意中暴露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看法：即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臆断、无知和偏见。这些人在斯大林的手下变得纯熟并为他所赏识，因为他们能够把完全的冷酷无情和几乎绝对的俯首听命可怕地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惊人的文件是怎样以及为什么汇编起来的呢？我立即可以作出的回答是不知道。我自己据以判断其真实性的证据只是一张俄文打字稿，别无其他。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形，在我却并不感到陌生（虽然也是够奇怪的）；但对那些在开放社会里工作及与开放社会打交道的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没有经验，不知道在苏联，除了人类的某些最基本的活动外，一切都处于控制和阴谋活动之中。过去我经常仅仅依靠自己的判断和经验来辨别一份俄文文件的真伪。与此相反，有时候我处理或出版这类文件时，虽然知道来源，但却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其出处。因此，我对自己的问题得不到答案并不感到震惊。

虽然如此，我还得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那些把这个材料传到西方来的人是否以此作为一件政治斗争的武器？特别是他们是否要让作者最终地身败名裂？初步的想法是，克里姆林宫内外的某个派别可能热衷于毁坏赫鲁晓夫的名誉，或者要搞掉苏联现领导中的某些个人或一帮人。但仔细通读全书后这些想法就不能成立了。赫鲁晓夫在书中的形象并非很好，可是以苏联政府的标准来看却也并非很坏。书中多处自我粉饰，真正有损形象的内容也是无意中招供的，何况还有遗漏和回避。更主要的是没有直接攻击任何一个现仍活跃在职的人。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斯大林，其次是贝利亚，而后才是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这些人要么死了，

要么已经退休了。我估计，把回忆录传出西方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主要目的——看来也是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对抗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企图。

至于这本书本身，那是一个要为自己辩护的老人的经过精心筛选的想法和回忆。材料总的来说杂乱无章、重复唠叨，有时自相矛盾，有时并不准确，带倾向性的叙述又往往毫无次序，而且充满漏洞。塔尔伯特先生把这些支离破碎的记录大致按时间顺序整理成连贯的叙述文。

现在谈一下这本书涉及到的和没有涉及到的内容。读者主要分两类：一般的读者关于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俄国的情况，听得很多但读得很少，更没有机会去深入了解；另一类读者是专家，他们熟悉整个情况，但需要核实、订正，尤其是扩大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对一般的读者来说，我认为许多事件，甚至整个调子都将是暴露性的。正是为了这部份读者，我在每个章节前面都写了一个简短的引言，加上注释，将分散的部份合并起来，指出遗漏和隐瞒之处，纠正了明显的谎言和虚假的含义等等，目的是点明某某是何许人物。总之，就是要使这个回忆录符合实际。

另一方面，对专家读者来说，这本书不会使他们感到格外惊奇。他们熟悉整个情况，不需要我或其他人来介绍故事并逐点评论。但是他们会发现，许多以往存在疑问和推测出来的事件得到了有价值的证实；无数来自实际生活的新的细节和生活画面，将会使已有的图景更加丰富而清晰；最重要的是，书中再现了斯大林的宫殿里的那种情绪和气氛。人们从德热拉斯的杰作《同斯大林的谈话》及斯维特拉娜·阿里露耶娃的《致友人的十二封信》中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形象，在这本书里得到了证实和放大。斯大林的这个形象同大约30年来，从他攫取政权到死后的几年在舞台上出现的那个传统形象大不相同。因此，这本书是不可多得

的。

赫鲁晓夫对自己也作了透视。他使我们能够看到他从早年到斯大林去世期间从一个普通人到党魁之间的发展轨迹。从1955年他登上最高领导岗位到1964年下台，他向我们提供了他作为一名世界政治家的思想和活动的详细内幕。避而不谈的是导致他胜利和垮台的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权力斗争。书中关于斯大林死后三个月逮捕贝利亚的描述是令人发指的。但是接下来，除了对1956年春举行的二十大和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起因作了完全个人的说明外，就没有涉及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国内事情，无论是影响工业、农业和政府结构的大规模政策冲突，还是赫鲁晓夫深深地卷入并玩得如此高超的权力游戏。有必要在一开始就把这点说清楚。一般读者对苏联共产党高层斗争的详情细节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因此没有这些，丝毫也不会受到影响。专家读者则也和我一样，只能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些会得到填补。

不过，本书毕竟提供了大量情况，我们应该感到满足。书中的叙述有两个主题：一个从最卑微的农民爬上了世界两大强国之一的主宰位置的杰出人物的自我表白，揭露斯大林，以加强并充实那个著名的秘密报告（全文见附录4）。赫鲁晓夫对这几年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企图，深表关注，并尽其所能使之难以实现。

从斯大林的实际罪恶来看，赫鲁晓夫在此并没有比那个秘密报告讲得更多，而且在某些部份，那个报告更为详尽。需要明瞭的是，秘密报告在苏联国内没有公开出版过，只在全国的党的书记中间传阅，并在党的基层会议上部份或全部地宣读。这就只好是能记住多少算多少了。苏联人民一直都没有亲自读过这篇报告，现在赫鲁晓夫谈出了这个报告的产生过程（仍是有疑问的），这就等于事实上第一次公开承认，他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报告。鉴于这样，回忆录首次提供了早已为外部世界所熟悉的情况也就不

足为奇了。如同多年来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关于斯大林罪行的详情细节，西方也知道得比俄国人自己还多。

但是重点还不在于斯大林的罪行（尽管有些也谈得很多），而是斯大林在他那个小圈子里的总的态度和行为，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他与直接部下的关系，当然，还有他们对他的关系。

正是在这点上，赫鲁晓夫感到了为难，因为谴责了斯大林也等于谴责了他自己。在秘密报告中他多少还能绕过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他关注的不是本身生活，而是暴露经过精心挑选的斯大林的罪行。但在这里的叙述中，他就如履薄冰了。赫鲁晓夫极力掩饰或混淆自己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的活动。譬如：他曾是在斯大林的大清洗和1936至1937年间叛国审判案高潮中的狂热而又声嘶力竭的支持者，他自己1938年在乌克兰也搞过清洗。不过他说出来的内容，这种最有损形象自我招供也已足以构成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他是斯大林的同谋共犯，而这个时期正是斯大林最作恶多端的时期。赫鲁晓夫对此当然是明白的，因此，即使是在不无麻烦的安静中回忆残暴毒辣的过去时，仍然让人看起来似乎他对自己以及其他同事在斯大林的手下，为保住官位而堕入腐败的深渊的事，基本上并不知情。

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自然牵连到赫鲁晓夫本人，同时也谴责了使斯大林成为可能的全部政府制度。它一点也没有提到斯大林从三十年代中期起就把这个制度搞坏了。无论哪一个外国的共产党员，最突出的是意大利共产党书记陶里亚蒂，他曾指出，任何容忍斯大林那样做的制度应当彻底改革，结果被不予置理。这是可以理解的。赫鲁晓夫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了这种制度，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东西。他也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制度。但是现在他老了，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点点滴滴地有些新的想法。与此有关，最有意思的就是关于农业集体化那一小节了。他令人吃惊但却完全正确地指出，“斯大林牌号的集体化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灾难而

已”。他指的是那个人为的可怕灾难。它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死亡，使苏联的农业产量整整减少了一半，比任何一件事都更厉害地使苏联人民陷于被奴役的境地，使经济失去了平衡以至今天仍威胁着苏联的领导。天哪，如果赫鲁晓夫在当权时能取得这样的认识，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啊！在整个回忆录中，还有一些零散的看法比这更具爆炸性。

应当说，我并不觉得这是可取的，就是对那些我不同意的赫鲁晓夫的想法、声明和论点提出诘难或非议。我自己对赫鲁晓夫成败的看法是有案可查的。这是他在这里自我表白。在我的评论中只是指出叙述中的遗漏之处，指出他提出的事实与西方的一般看法之间严重脱节的地方。

这里也不是重述赫鲁晓夫生平的地方。在附录 1 中有赫鲁晓夫生平主要经历的详细记录，其中许多事他自己根本没有涉及。每个部份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和澄清，指出主要内容和避而不谈之处。这种澄清在注脚中更为详尽。注脚中还对内容里提到的主要人物作了介绍，除了少数的国际知名人士外。塔尔伯特先生在附录 3 中并为赫鲁晓夫的一些地位最显要、共事最长久的同事写了较详细的传记。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在叙述中没有正确地评价自己这个事实仍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显然隐瞒了许多自己过去的事情，同时对他在斯大林手下飞黄腾达的过程却极力美化，甚至有点离谱。他没有或许也不可能在他怎样从斯大林的一个最忠实的心腹变成国际人物方面提供线索。在事业的后期，他显示出了充满偏见并易于冲动，尽管也具有一个优秀人物的智慧。

当然，直到最后他也还是自己历史的一个囚徒。在某些方面，他是超越了这个造就了他而他又反过来帮助创造的制度。但他永远也不能逃避它，而且到头来还被它所摧毁。他的成就同样也是非同寻常的。他在事业的后期显示出来的品质并非突如其来，

肯定一直潜藏着。虽然从表面上看，作为一个极具野心的职业党徒，他对上司阿谀奉承，对下属恃强凌弱，以农民的深刻狡诈在对手中间周旋，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恶棍中间的恶棍。他与别人的明显区别在于具有某种生动的想象能力、热心肠、强烈的自信，不时地还有一个天生的赌棍的鲁莽。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个紧随斯大林的人，我想大概很就有着貌合神离的品质。他比迄今为止的任何苏联领导人都更能与各色人等混在一起。不象我所知道的苏联党官（或者任何一个苏联工厂或集体农庄的经理也罢），他不怕自己的靴子上沾上泥土。他很早就乐于制订法律，告诉人们干什么、怎么干以及错在哪里。即使在他处于权力的顶峰时期，他也要站在泥地中间向那些持有异议的听众讲解应当如何正确地栽种土豆。但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听众，直到事业的终点仍善于学习。我就见过他屏息静气地听一批工厂经理发言，似乎要把他们的长处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贮藏起来并化为自己的能量。尤其是我看见他早期出国旅行时，接连不断地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但是同样的错误却决不重犯。只要他不是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他就会有时粗鲁，有时则叔父般仁慈地在讲话中插进一些《圣经》上的成语和引喻。这些肯定是从他的童年时代就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的。这时，他那双愤怒的小眼便凝视着远方，像似一个人看见了显圣。他也真的看见了显圣。

赫鲁晓夫虽然权欲熏心，但却梦想苏联人民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人的叙述中，令人费解的是他竟然赏识某些最卑鄙无耻之徒。他们的名字在书中反复出现。他看来喜欢警察头子雅格达以及更令人厌恶的叶若夫。他认为他们走上邪路以前还是“正直的人”。因此，在他看来他自己手下的警察头子伊凡·谢洛夫也一样，在他没有把整个民族都遣送到西伯利亚或处以死刑的时候，他对孩子们很好，对朋友也很亲切。答案我认为是，赫鲁晓夫本人就是一个生性残暴的人（这种本性在他成为国际政

治家时仍有所表露)，何况那个时代的气氛就充满残暴。他和他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地要迫使苏联人民去建设一个新俄国，而这样的事不流眼泪是办不成的。任何人，实际上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抵制这种变革，其结果必然要受到强制，而强制的手段又是残酷无情的。不过，他后来反对的是没有在他看来是正当的理由就逮捕人。最主要的是他反对斯大林摧毁“正直的共产党人”。他在这里的重点，正如1956年的秘密报告一样，是在于斯大林反对党的罪行。因此，他对斯大林反对普通人民的罪行保持缄默，那也就合乎逻辑了。他实际上认为党高人一等。

还有一点，赫鲁晓夫很崇尚自己的能力，认为别人没用。他们最多只不过是与他一起完成伟大使命中有点用处的同事或下属。他们像小孩一样，是欺侮、逼迫、逗乐、奖赏、惩罚的对象。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在他事业的初期就已把眼睛盯住最高位置。他虽然野心勃勃，但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例如：他对自己缺乏正规教育这点就很敏感。可能在三十年代初，他接触到斯大林的圈子的边缘时，脑子里并没有想到他会很快地成为这个圈子里的人。他是这么一种人：他在一个大的团体内开始上升，并且继续往上爬，因为他不得不凌驾于别人之上，然后再往上看。在他升迁的每一个阶段，他可能惊奇地发现自己比那些不久前还高居于他上面的那些人都干得更好。循着这个途径，他在1926年时还只是尤索夫卡省党组织的一个低级官员，整整十年后却变成了全莫斯科的党的头目。这时他当然已经感到有把握了，自己可以比他认识的任何人都干得更出色，可以制服对手。这是他千方百计地要加以隐瞒的。

即使如此，他继续升迁的仕途却受阻于一批高官。他们并不是原来的反对派，而是斯大林的亲信。反对派因为种种实用目的，即使还没有被枪毙也已经是完蛋了。而这些人却支持过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布哈林。他

们现在占据着莫斯科和全苏联的党内最高位置。他们本是有功之臣，斯大林却在一段时间对其中的大多数投以猜忌的月光。1935年，在赫鲁晓夫看来，他的迅速迁升被一大群等待提拔的人可能无限期地阻挡了。但是突然地，在这以后的三年里，由于阻碍他进入权力核心的这些人受到了大规模的清选（至少700万人），他的道路又扫清了。到了1938年，他已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翌年成为正式成员。

在外界看来，这个政治局（1952年后改称主席团）是一个由一批铁面无私的人组成的拥有一切权力的委员会。他们在大清洗中干得出色，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总要长时间地深思熟虑。但是一段时期来，通过德然拉斯和斯维特拉娜·阿里露耶娃的回忆录人们可以看到，事情并非如此。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作决定，然后吩咐他的心腹去干。赫鲁晓夫是可以描绘出一幅斯大林的更加真实的形象的，如果他能深入到斯大林在思想和胆量方面的品质。正是这些品质使这个阴险狡诈的人先是爬上了他的话就是法律的高位，而后又对邱吉尔固执已见，迷惑了罗斯福，并挑起了这两人之间的矛盾（他们当然用不着害怕镣铐入狱或被枪毙）。关于书中大量描绘的关于斯大林晚年的那种令人触目惊心的处理事情的方式，那是千真万确的。回忆录中没有涉及正式的会议。斯大林也还有深刻的洞察能力并保持冷静的头脑的一面，能反映这种性格的是他决定不介入北朝鲜。但是他管理这么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土，在大部份的情况下还是随心所欲的。他一边狂饮一边看着一些无聊的电影直到半夜，因孤独而感到恐惧，还把那些伺候他的人的生活也搅得难以忍受。他用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随意地向一帮子俯首听命的人发出指示或威胁（他的所有指示都是威胁）。这些伺候他的人也因为酗酒并缺乏睡眠而更加痛苦。他的话一出口，这帮人立即行动，开动了必不可少的机器，去逮捕一个他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名字的人；去围赶并强行放逐整个民族

（如高加索的彻岑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去枪决一个他们最亲密的同事，去改写苏联共产党的全部历史；或者指示实行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致使整个西欧那么大的一片土地颗粒无收。

拯救了赫鲁晓夫的是斯大林1938年提拔他去当乌克兰的总管。他有十二年不在莫斯科，从而避开了在斯大林的阴影下的那每天争权位、授阴谋、奉承拍马和背后说坏话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即使像马林科夫那么能干的人也对付不了。战前的三年，以及1944年以后的五年里，他都是四千万生灵，即被称为小俄罗斯人的主宰。他们比占统治地位的莫斯科公国里的大俄罗斯人更加顽强、现实并刻苦。他们居住在边疆，这里曾是苏联的粮食和主要的工业基地。赫鲁晓夫在这里独当一面，得以发展他的秉赋和性格，达到了在斯大林的统治下的最大限度；不然的话，必定会被败坏得不可挽回。他起初统治那个地方就像是最坏的殖民总督一样，目空一切，傲慢凌人。而后，战争来了。他穿上了军装，作为一些最能干的将军的政治顾问。他第一次进入了一个远离克里姆林宫封闭圈的世界。他发现自己同军人站在一起反对党棍同僚。他也第一亲身体验到在战争的初期普通的乌克兰人表现出来的对他所属的那个政权的深刻仇恨。最后他还第一次亲自看到人们响应号召而忍受的可怕苦难。这些人起初把德国人当作救星，而后则响应号召去反对他们，并与之作殊死搏斗。在这中间斯大林被神化了，而这个神化了的斯大林却又不值得这些人信赖。除了库兹涅佐夫以外，没有一个党的头目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俄国的生活现实有着这么长时间而又如此活生生的体会。库兹涅佐夫经历了列宁格勒战役，但此后不久就被斯大林枪毙了。我认为这些使赫鲁晓夫发生了改变。我还认为，他在作为乌克兰的首脑时发展起来的自力更生精神，以及他在与斯大林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发展起来的耐心等待的狡黠，这些在他1949年

被重新召回莫斯科时很有用处。因此，1953年斯大林一死，他马上就看到爬上最高位置的时机来了。

起初，他是小心翼翼的。当他与同事一起把贝利亚杀死后，就参加了集体领导的闹剧。他对贝利亚被捕的解释，虽然没有说出导致那种结果的过程，但看来要成为定案了。但是，他一直想要并努力要搞掉的还是他的最强大和能干的对马林科夫。后者企图把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新一代的管理型的技术官僚上，而不是在反动的党的机构上。赫鲁晓夫起先对马林科夫提出的各种国内改革和国际合作的方案袖手旁观。然后，他乞灵于列宁的名义聚集力量出动反击，终于把他的对手拉下马。之后，又把那些改革和共处的思想纹丝不改地接过来当作是自己的东西。在这以后的攫取权力的斗争中，他本来是能够与斯大林主义决裂的，但却承袭了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手段。

这真是一番绝妙的表演，在1956年党的二十大和非斯大林化中达到了高峰。尽管赫鲁晓夫行动迅速，非斯大林化还是直接导致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并且使苏联人士气低落至今尚未恢复。他设法顶住了，拒绝了党的主席团通过投票多数人提出的要他辞职的决议。他的要求是，这事应按照党章由全体中央委员会通过，这点过了多少年也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于是，他在中央委员会里的支持者，由朱可夫元帅安排从全国各地被令人眼花缭乱地紧急空运到莫斯科来，投票结果他赢了。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被解除了职务，送到边远的省份去忍辱含垢。只不过他们没有被关闭或枪毙罢了。

1957年，赫鲁晓夫六十三岁时，已站在通向政治家的道路上。但是他的人格仍然是很分裂的。他可以做美妙的梦，他可以真诚地寻求苏联的和平与繁荣，使之成为和平世界的一部份；但是一旦受挫，他也会立即回复到暴力和诡诈。他看到了苏联和美国之间永久地缓和关系的必要性，即使只是为了防止一场原子大

屠杀也罢。但是他又认为搞垮资本主义世界是合理的，同时则又期望那个世界对待苏联帝国采取中立态度。正如他永远不能避开斯大林主义的过去一样，他也永远不能超越他那幼儿园里的马克思主义的令人窒息的片面真理。这种不断增长的权力和对世界的经验不仅扩大了他善于思考的脑子和深刻但却不连贯不规则的洞察现实的能力，而且天哪，也使他的任性和好大喜功更加厉害，以及他的各种想要系统地诊治这个病态社会的改革方案更为蹩脚。所有这些方面，也许赫鲁晓夫与在我们这边活动的许多西方政客没有多大区别，除了他天生的爱好暴力和无法无天以外。这个除外当然是很重要的。可悲的是，在他的梳妆打扮中，他竟然有这么许多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特点。另一方面让人吃惊的是，在斯大林以后的俄国，这些特点竟然能全都表现出来。

虽然他很少谈及他的国内政策、他为夺取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他的下台，但是在本书的最后一部份，尽管有时敷衍塞责，有时又有迷人的细节，由于他与苏联以外的世界有了联系，还是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他成熟了的看法和总的思想状况。我们看到了长达四十年之久，连续不断而又未能解决的思想 and 行为。我们窥见了四十多年来的思维习惯与行动之间连续不断而又无法解决的冲突，以及从新认识到的现实中得到的教训。由于这些矛盾，很难说他的人格是分裂的，事实上，他的人格是拼凑的。在我看来，最能暴露他的这种矛盾人格的是关于与中国争吵的那一章，他陷入了令人刺耳的沙文主义；另一章是关于纳塞尔和埃及的，他那溢于言表的热烈同情与为自己和本国谋取利益的盘算之间显得很不调和。

就整个叙述而言，读者必须在自我欺骗和蓄意歪曲之间自己做出斟酌。这两方面都是大量的。在那些关于苏联攫取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章节中，这个问题更形尖锐。当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把现在称做是西乌克兰的全部中间阶级和中下阶级的人

加以逮捕、监禁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他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意识到这一切？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他真的相信，即令他对苏联以外的世界上的生活一无所知，他在赠给这些异国社会的劳苦大众以恩惠？由于赫鲁晓夫时而把这种罪行称做是解放行动，时而又斥之为吞并，人们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就更加不易。更何况在早年，如同千千万万的其他人一样，他十分明显地相信，围绕在斯大林的周围就是在支持把旧俄国改造成比地球上任何社会都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社会这个光荣的事业，即使这意味着艰难困苦也罢。当然，不久他就变得为获得权力而获得权力了，并且抓住不放。但是，这些往日的旧梦还留下多少？以及对他对苏联先是在东欧，然后在其他地方的使命的看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这些问题显然并无肯定的答案。但它们却又是重要的。因此，在考虑这些问题的同时应记住，我们自己的观点也有可能被这些自我欺骗、偏见和无知打上不可磨灭的印记。尽管赫鲁晓夫断断续续地发出战争叫嚣、威胁、欺骗、炫耀武力，他毕竟打破了斯大林主义的模式，从而有可能使西方世界产生希望，一种比赫鲁晓夫准备接受的更加彻底的共处程度有朝一日能够实现。这是赫鲁晓夫最伟大的成绩之一。

英译和原编辑者的话

我在此试图把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变成一篇虽非正式但却是连贯的叙述。我当初得到的原始材料是非常杂乱无章的。为了使它能够成为一本可读的英文书藉，我就不能不对结构有所调整。我已尽力来表达赫鲁晓夫的原意，即使是把一些互相抵触的片段汇集在章节里写也是如此。除了偶然的意译之处和临时加入的转折句子外，书中的每件事都是赫鲁晓夫自己说的。我并尽力跨越语言障碍，无论是在赫鲁晓夫所表达的内容或方式方面，都在文字和精神上保持原貌。

赫鲁晓夫讲话的特点是小心地，但更经常的是故意地交替使用含沙射影、大胆揭露、信口开河、装聋作哑、粗俗不堪、拐弯抹角这些手法。他时而听起来像是一个刻板的政客，令人厌烦地讲述他最得意的时期的故事；时而听起来像是一个厚脸皮的鼓动家，滔滔不绝地宣传党的路线；时而听起来又像一个乡下佬，津津有味而又大肆渲染地叙述酒吧间里的争吵。但他更多地还是听起来像是一个对现代历史的最敏感的内幕人士。本书所据以汇编的语言材料充满幽默的方言、通俗的短语、马克思主义的华丽词藻和戏剧性的激情，以及与此不协调的来自《圣经》的古语。这也正是赫鲁晓夫处在党的领导岗位时期显著的演说风格。

这些材料是一个老人的回忆。他记得很多事情，并且表面上看来有着睿智和华章的无穷源泉，具有铁腕手段和本能的人性。这些构成了一份历史性的文体，特别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历史性的揭发批判。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使非斯大林化事件具有最大的压倒性和权威性。这些回忆之所以最具说服力，是因为它出自一

位忠诚的苏联公民和虔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口。但是这本书也是一份主要的个人文件，是生动的自我写照，这个人从斯大林的阴影下冒出来，却向斯大林的鬼魂提出了挑战。我认为，这本书可以被看作是为了给自己恢复名誉而经过深思熟虑的和揭露性的行动；一个聪明的由农民转成的机械工，一个从顿涅茨盆地的煤矿来的人变成了拥有世界上最大权力的人物之一的人的最后遗嘱。

——斯特罗勃·塔尔伯特

自序

我现在像一个隐士似的住在莫斯科郊区。我实际上已与别的人没有了交往，而只能与那些把我与别人隔绝起来的人交往——他们当然也不让别人与我接触。我认为他们的大部份时间都用于警戒不让别人与我接触。^①

回顾往昔的岁月时，我侧重点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那些破坏了苏联社会组织的最触目惊心的事件。没有必要再涉及斯大林领导下的积极面，因为这一面已经在政府的会议上，在报纸上，在文学作品里被夸大了。甚至可以说斯大林的形象经过了乔装打扮。实际上，即使把任何积极的一面去掉百分之八十，剩下来的也还足以歌颂1000个伟大人物。此外，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以及我们共产党的胜利本身就是我们的美德和成就的充足明证。如果回首一下5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是从哪里出发的，已经走了多远的路程。这是敌人也感到震惊的。

但就是在今天仍然有人认为，所有这些进步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甚至在二十大^②上斯大林的大量罪行得到揭露，他的罪恶得到了无可辩论的证明之后，仍然有人在斯大林的肮脏内衣面前发

^①赫鲁晓夫看来夸大了他目前受到隔离的状况。事实上他与家属联系密切，也经常有朋友去拜访，包括来自许多国家的外国人，甚至美国人。尽管是“有陪同的”他还是能偶尔地到莫斯科去，那里有他的一套公寓房间。

^②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所做的关于斯大林时期的罪行的秘密报告，是在1956年2月24至25日的夜里。美国国务院随后公布的译文没有受到严重的怀疑。这个报告第二年出版时题为《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鬼魂》，并附有伯德兰·华尔夫的全面分析和评论。

抖，向它顶礼膜拜，毫无疑问地认为所有斯大林所造成的死亡都是历史性地不可避免的并且与我们的领袖、“苏维埃人民的慈父”、天才和主宰的伟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还有一些人把那些按照斯大林的话去做的人称做是“斯大林主义者”，而且还认为这是一种好的品质。但我却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坏的品质。

斯大林究竟有多大的天才呢？他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慈父”呢？对于我们国家造成的流血，斯大林个人倒底要负多大的责任？应当揭开捂着这些以及其他问题的答案的盖子。应当让斯大林赤裸裸地呈现在苏联人民面前，以便让他站在历史的适当位置上。

当然斯大林是有功绩的，并且很大。但是我们的全面胜利主要地还是人民的胜利，其力量来自列宁的思想。列宁是我们党的缔造者和我们这个制度的创造者。我们的国家就是根据列宁所发展的理论来建设的。他的思想形成了伴随着我们一切的基本原则。更主要的是，列宁曾明确地警告我们要提防斯大林。早在斯大林的权力开始上升的当初，列宁就告诫过我们他的毛病。随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了列宁是多么正确。只要正确地应用列宁的思想，我们就能取得积极的成果。尽管斯大林滥用了列宁的立场和指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仍然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学说。它丰富、加强并武装了我们的人民，从而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取得业已取得的成就。

大家都知道斯大林的革命精神和另外一些品质，因为这些被党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了。他有理由在我们的历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具有卓越的才能和智慧的人。他确实超过周围的所有的人。虽然我毫不留情地谴责他的工作方法和滥用职权，但是我一直认识到并且也承认他的魄力。不过斯大林的魄力是需要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来评价的。当这种魄力用于巩固革命成果时是一回事。而当这种魄力在捍卫

党、反对党的敌人这种激动人心的口号的掩盖下，实际上则是反对革命时，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斯大林在向私敌报仇时声称他们是党的敌人，这给我们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气量狭小，伟大的列宁曾经告诫过我们这一点，使数以千计真心实意地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人横遭杀害。

斯大林的有一点我是赞赏的：他并非简单地用宝剑来征服我们的心身。他在摆布人民并使他们服从时显示出了超人一等的手段——这是一个伟大领袖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斯大林的个性中有令人钦佩、正确的一面，同时也有野蛮的一面。不能孤立地看待任何一点，而必须结合他那非常复杂的个性来考察。

然而，如果他今天还活着并且要举行投票的话，我就要投票赞成审判并处罚他，因为他有罪行。

经常有人这样问我：“斯大林怎么啦？像他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做出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来？”我也经常这样地问自己。我认为列宁有答案。早在1923年在写他的遗嘱时，列宁就洞察到了，如果斯大林保持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他将会把党引向何方。列宁在斯大林独裁地开始施行处决和其他罪行以前很久，就已经明瞭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所在。他写道，虽然斯大林具有当领袖的条件，但他本质上是残忍的，并且离不开滥用职权。他建议把斯大林调离，提拔另外的人来代替他。这个人要比较温和、谨慎，在与同志们的关系中较能容忍，确实不会滥用自己所处的高位^③ 可惜中央委员会把列宁的话当成了耳旁风，结果整个党都

^③通常提到的列宁的遗嘱那个文件，是列宁1923年写的几封信之一。他当时试图防止在他去世之后党内的分裂。有关的段落是这样的：“斯大林同志成了总书记后手中集中了巨大的权力；他是否能总是足够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了。这个毛病在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上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就成为不能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设法使斯大林离开这个位置，让另一个人来担任。这个人只要在一点上胜过斯大林就会跟他完全不同，即更容忍、更忠诚、更温和、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受到了惩罚。

毫无疑问，斯大林身上有令人作呕的东西。我认为现今仍有类似这种令人作呕的情形。这是应当指出来的。我经常在电视上看有关中国的影片，因此在我看来毛泽东正在照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的一些口号甚至听起来也一样。如果你闭上眼睛来听听中国人怎么谈论毛泽东，并且把“斯大林同志”换成“毛同志”，那么你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像什么就会有所了解。当年在莫斯科组织的巨大场面，今天他们在北京也以同样的方式去组织。我习惯地以为这种美化自己的欲望是斯大林独特的弱点。但是像斯大林和毛这样的人在这一点上显然十分相似：留恋权力，认为这对于抬高他们的权威是须臾不可离的，不仅要使人民服从他们，而且还要使人民畏惧他们。

我之所以强调斯大林年代里的消极面，是为了表明如果斯大林不曾这么触目惊心地上滥用职权，我们就可以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我列举他的罪行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重演他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全体苏联劳动人民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造成的破坏。

不幸的是许多事情仍小心翼翼地密不可宣。许多事情仍不为人所知或未曾披露，其中有的已被严严实实地压下去了。但是时候总会到来的。最终都将真相大白。即使保守的最好的秘密也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也许我的其他同志们，他们曾与我一起在斯大林手下工作过，也会留下回忆录的。如果真的如此，我希望他们要客观，不必害怕把他们知道的斯大林的错误告诉给历史。他们目睹的事实与我经历的一样。我很少单独地与斯大林在一起，通常有五个人，有时多到10人，我与斯大林在一起时总有别人在场。

任何要在党内重建列宁主义准则的人，都必须竭尽全力地揭露斯大林，谴责斯大林主义的方法。为了不让那些年代的鬼魂从

坟墓中爬出来缠住我们，我们别无抉择，只能让全部斯大林的受害者恢复名誉。他的许多受害者已被二十大回复到了他们在历史上应有的位置上，但是更多的，还在等待恢复名誉，他们的死因至今还隐藏着。这是可耻的，完全是奇耻大辱！可是现在他们正在把这个犯有所有这些谋杀罪的人掩盖起来。我知道这是无济于事的，但它毕竟是事实。

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少数有影响的军事领导人，他们在演讲和回忆录里试图粉饰斯大林，重新把他作为人民之父来颂扬。他们试图证明，如果不是斯大林，我们就不可能赢得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就会陷于法西斯主义的枷锁。这种声称背后的理由是愚蠢的。这是奴隶思想的反映。难道就因为斯大林不在我们身边了，我们就会屈从于德国、英国、或美国的影响了吗？当然不会的。苏联人民总是能够造就领导人并捍卫国家反对入侵者，正如我们过去捍卫过自己一样。

我希望自己甚至没有必要去指出那些军事领导人的荒谬之处，他们试图让斯大林和他的受害者同时恢复名誉。有一次，我在保加利亚的演说中引用了普希金的诗剧《莫扎特和散拉里》中的一句话。这一段的情节是，莫扎特并不怀疑散拉里企图毒死他，于是他说：“天才和罪恶是格格不入的。”^④这句话对斯大林也用得着。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天才又是杀人犯。无论动机如何，斯大林处死了数以千计的人毕竟是犯了可怕的罪行。有人争辩说，斯大林的动机是关心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这真是怪极了。在关心人民利益的同时，他却消灭了人民的最优秀的儿女！这是很基本的逻辑问题。因此，要为一个大规模的杀人犯开脱罪责事情就复杂了。

^④普希金的诗剧是根据一个传说写出来的，就是时髦的作曲家散拉里出于嫉妒而毒死莫扎特。

到现在有时人们还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也许你不应该把斯大林的事全都讲出来。”说这种话的人并非一定就是斯大林生前作恶的同伙。他们只是一些头脑简单的老人，习惯于崇拜斯大林，也不能放弃斯大林主义时期的旧观念。要他们转向真理是很困难的。他们是缺陷的产物，斯大林活着时就是这样地训练和培养党员的。斯大林采用各种思想灌输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要求的是不加思索的服从和毫不怀疑的忠诚。这种即使面临死亡也不能在头脑中想一下为什么的做法，在战争年代当然是对的，不过这枚硬币还有另外一面：当一个人发现他的信赖被背叛了时。绝对的忠诚就会变成极度的仇恨。这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只是设想：人民会闭上眼睛并且永远也不会认识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身居要职的人的这种想法的后果，是人民对党和政府失去了信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在党、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人民面前坚持实事求是——现在更加如此。只有实事求是，我们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真实向来是党的力量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今后也必须如此。

也许还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要谈论那些给党造成了可怕的损害的事件？为什么我要挖掘斯大林做那些事情的动机？那些事情使千万个我们的最优秀的儿女、我们党的最优秀的儿女，也是我们国家的最优秀的儿女献出了生命。答案是：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助于我们党的自我纯洁，尽管这些揭露也许是很不愉快的。党扪心自问并仔细检查自己的历史，这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何况当人们认识到斯大林统治下的滥用职权不是党干的，而是强加在党的身上的，就会有更多的人站到党的一边来。

党已经开始了纠正它的错误，并且确保在斯大林统治下所发生的事情今后永远不再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并不害怕和盘托出。我不得已而说出来的不是诽谤，不是恶意的流言。其用意是要

在我们党的自我纯洁中起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我是作为一个终生与苏联人民密切接触，同时在党的领导和国家事务中又很多年都站在斯大林一边这样的人来说话的。作为一个那些年月里的见证人，向未来的子孙后代说话，希望他们将会避免过去的错误。

目 录

原出版者的话	(1)
爱德华·克兰克肖的引言	(2)
英译和编辑者的话	(15)
自序	(17)

第一部 从煤矿到克里姆林宫

第一章 早期经历	(3)
第一节 艰苦岁月	(3)
第二节 在党内步步高升	(9)
第二章 在莫斯科从事党务工作	(24)
第一节 从工学院进政治局	(24)
第二节 莫斯科的父母官	(40)
第三章 恐怖笼罩的年代	(53)
第一节 农村集体化	(53)
第二节 大清洗运动	(57)
第三节 贝利亚青云直上	(74)
第四章 重回乌克兰	(88)
第一节 重整旗鼓	(88)
第二节 帕顿院士	(100)
第三节 摆脱轮胎工业中的困扰	(104)
第五章 大战前奏曲	(110)
第一节 苏德关系	(110)
第二节 向波兰挺进	(120)
第三节 在西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	(129)

第四节	冬季出征芬兰	(136)
第五节	大战前夕的红军	(144)
第六章	伟大的卫国战争	(152)
第一节	最黑暗的时刻	(152)
第二节	哈尔科夫灾难	(167)
第三节	斯大林格勒战役	(175)
第四节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	(186)
第五节	乌布利希来苏联	(191)
第六节	库尔斯克坦克大战	(194)
第七节	胜利	(198)
第八节	斯大林和盟友	(204)
第七章	乌克兰闹饥荒	(213)
第八章	斯大林的晚年	(231)
第一节	列宁格勒案件	(231)
第二节	斯大林的反犹太主义的斗争	(242)
第三节	斯大林的理论著作	(252)
第四节	苏共十九大	(259)
第五节	医生的阴谋	(265)
第六节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卡	(271)
第七节	跟斯大林一起欢宴度假	(279)
第八节	核心圈子里的内幕	(290)
第九节	斯大林逝世	(299)
第九章	为争当接班人勾心斗角	(305)
第一节	策划打倒贝利亚	(305)
第二节	苏共二十大	(330)

第二部 在国外的活动

第十章	出访兄弟国家	(347)
-----	--------	---------

第十一章	苏联和朝鲜战争·····	(358)
第十二章	跟铁托握手言和·····	(364)
第十三章	出席日内瓦首脑会议·····	(383)
第十四章	访问伦敦·····	(392)
第十五章	帮匈牙利恢复秩序·····	(407)
第十六章	纳赛尔、苏伊士运河和阿斯旺水坝·····	(423)
第十七章	柏林危机·····	(447)
第十八章	毛泽东和中苏分裂·····	(456)
第十九章	胡志明和越南战争·····	(473)
第二十章	<u>卡斯特罗和加勒比危机</u> ·····	(480)
第二十一章	保卫社会主义天堂·····	(497)
附录一	赫鲁晓夫生平年表·····	(514)
附录二	秘密报告·····	(523)

第一部

从煤矿到克里姆林宫

第一章 早期经历

第一节 艰苦岁月

1918年，24岁的赫鲁晓夫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那时十月革命才过了几个月。在这以前，他在农村度过了童年，接着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尤素夫卡（后改名为斯大林诺，现称顿涅茨克）矿区小镇当一名机械工。鉴于机械工这一行是属于后备役行业，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免服兵役。但是，1919年初，他参加了红军并在国内战争中发挥了作用。直到1922年，他才回到尤素夫卡镇，当时已成了一名经受过考验的党的积极分子，并为恢复处于饥馑、荒凉地带的矿山的生产贡献了力量。在这一章里，他深刻描绘了艰苦岁月的情景。当时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和工人，仅仅因为他们忠于布尔什维克的事业，被分配到领导岗位。就在这个时期，即从1921年起，列宁被迫从社会主义退却，执行新经济政策，即鼓励私营企业，给资产阶级大小商人和各种专家特权，以此作为恢复遭到破坏了的经济的唯一途径。当然，新经济政策使忠于党的人感到痛心。这项政策一直执行到1926年，即列宁逝世两年后，斯大林把它终止了。

不太久以前，许多老同志在苏军建军节的日子裡，邀请我去参加庆祝活动，互表祝贺。这是个盛况空前的日子，欢庆的日子，并利用这个机会向我们的武装部队表示敬意。我军在列宁亲

自创建和领导下，在革命后的头几年里，在跟阶级敌人白卫军作战中，取得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胜利。后来，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我们击退了法西斯分子一心想反对我们马列主义生活方式所发动的进攻。这要归功于我们的军队，我们才奋起抗击了希特勒对苏维埃国家和俄罗斯人民的威胁，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我们的武装部队一贯高举斗争的旗帜，即工人阶级的红旗，鲜红的旗帜上浸透了苏维埃人民与阶级敌人战斗中流下的热血。

我们武装部队经历过的道路是漫长的，非常漫长的。我十分自豪地说，在我们年轻苏维埃共和国最初和最危险的日子里，我在光荣的部队里服役，那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从1919年1月直到国内战争结束，我在红军部队里经历了千辛万苦。我碰巧在第九步兵师服役。我们先被迫从奥廖尔后退到姆岑斯克，然后发起反攻，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前推进，1919年圣诞节前夕抵达塔甘罗格。当时，我们的步兵师隶属于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指挥的骑兵第一军。^①我们一直追赶溃退的白匪军，1920年4月完成了到达黑海的长途行军。我们占领了阿纳伯，把白卫军匪徒赶下了海。体整了五、六天后，我们便向塔曼半岛推进。我记得在塔曼我们欢庆了无产阶级的伟大节日——五一劳动节。

1922年初，我从前线到了顿巴斯，当时艰苦的时期已经到来。列宁利用国内战争结束的间隙，恢复工业，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凭着对列宁思想的坚定信念，我们在短短几年里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事业。我们不得不勒紧了裤腰带，经受了饥寒交迫和艰难困苦的生活。我们不惜作出种种牺

^①赫鲁晓夫在部队里是级别很低的政委。布琼尼当过沙皇骑兵上士，后来成了斯大林的知交。他指挥部队对邓尼金将军的军队作战，邓尼金的军队一度严重威胁了布尔什维克新政权。就是这个邓尼金今天成了元帅。他对现代战争却一无所知1941年希特勒入侵时，在乌克兰他领导的军队遭到灭顶之灾。

牲，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重工业，进一步加强了军队。这样，敌人再也不敢来侵犯我们的国土。

1922年，顿巴斯矿区发生了饥荒，甚至在个别地方有吃人肉的现象。农村比矿区的情况更为严重。我的第一个妻子加琳娜就死于1921年的饥荒。她的死使我悲痛万分，她留下了两个孩子要我去照顾，即儿子列昂尼德和女儿朱丽娅。1924年，我又和尼娜·彼得罗夫娜结婚。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是斗争、忍受艰苦和自我牺牲的年代。但是，人民仍然信任党，甚至多数目不识丁的公民理解党的口号和团结一致的号召。人民懂得这些艰苦的生活是资产阶级强加给我们的，他们有国内的和国外的，其中国外的正在策划反革命事件并对我们进行干涉。我们总是这样自我宽慰：不论生活多么艰苦，那总比革命前的旧社会好多了。

实际上，对每个人来说不完全如此。就拿我工作的顿巴斯矿区来说，在矿井工作的最熟练的技术工人革命前的生活比革命后不久的日子里的那好多了。就我自己的物质条件来说，革命后我担任矿的副经理，还不如革命前当一名普通的金属加工工人的生活。

我们多数人原作出自我牺牲，因为认识到为了早日实现国家工业化，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每一滴资源。如要生存下去，我们必须赶上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时必须牺牲道德原则和物质享受。但是总的来说，为了党的事业，人民乐于经受这些痛苦。在短短的几年里，我们建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的社会。

在那些日子里，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人们并不指望在作出某些牺牲之后得到些什么。而今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当然，在党内仍有原则性较强的人，但也有许多及没有原则的人和溜须拍马的家伙，卑鄙无耻的野心家也不乏其人。今天，一张党票常常满足了持有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找到舒适生活的夙愿。如今，那些机灵鬼设法从社会捞取比他们的贡献要多得多的东西。他们的

态度是违背这样一个原则，即一个公民应根据他在建设共产主义中所付出的劳动质和量来取得报酬。上述的情况令人十分悲痛，但这确是事实，同时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灾难。

我并不是说，在革命的最初岁月里，那些将要加入党的人中间不存在机会主义者。的确存在，但决不会像今天这么多。我记得在内战时期，当攻克了马洛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的时候，有位认识不清的教师问我，假如他参加了共产党，将会捞个什么职位。这么一问使我感到十分恼火，但还是控制了一下感情说，“你将得到最负责和最受人尊敬的职位。”

“那是个什么样的职位？”

“你将获得一支步枪，并被派遣到前线跟白卫军作战。你将有机会在决定苏维埃政权能否在我国取得全面胜利的斗争中贡献你自己的力量。难道还有比这更重大的使命吗？”

“要是我不加入党的组织，那又怎么办呢？”

“那就随你便吧！没有你，党的组织会更健全些！”

就在内战时期以及战后的艰苦岁月中，斯大林博得了“扼杀专家的刽子手”的美称。所谓“扼杀专家刽子手”就是指此人不信任列宁招募来帮助建设红军的资产阶级专家。^②在这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是国防人民委员。很自然，他遵照列宁的指示，从曾在沙皇军事院校受过训练的资产阶级军官中选拔人才作为红军的指挥官。后来，斯大林常常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谈起，他怎样拒绝与托洛茨基派

^②托洛茨基作为列宁的国防的人民委员（或部长），当然是红军的缔造者。令人感兴趣的，在他被全盘否定40年之后，赫鲁晓夫却在这一点上称赞了他。就在察里津（后称斯大林格勒，现叫伏尔加格勒），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争吵，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后果。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在红军中任用年轻的沙俄青年军官去进行作战。斯大林支持他们的立场。

到察里津的资产阶级军官打交道，这些人后来又都怎样变成了卖国贼。

必须承认，就在这个时期，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不信任那是有道理的。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年代里，多数知识分子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有的革命一开始就移居国外，有的对时态发展持观望态度，有的想干破坏革命的勾当，还有的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和组织武装抵抗活动。因此，在人民中间强烈的反专家或“扼杀专家的刽子手”的情绪很普遍。党组织遵照列宁的指示竭力控制和遏止这一情绪的发展。

除了对专家不信任之外，人们对他们享受特殊照顾，抵触情绪也很大。鉴于我们社会不可避免的却又令人伤脑筋的发展，人民对列宁招聘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加仇视。国家遭受破坏，许多工人生活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过得更糟。他们在挨饿。虽然工人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增强国力，甘心情愿作出巨大的牺牲，他们认识到，随着革命的胜利，他们的物质生活会得到改善。但是，看到资产阶级专家并没有像别人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们深感不满。如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话，他们物质条件上也应该是一样的。党一直教导我们，一旦开始建设共产主义，消费资料必须在劳动者之间平均分配。然而，资产阶级专家们单独享受特权、拿高工资，而工人却比在革命前的旧社会里所得还少得多。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专家们有设备齐全的私人住宅，而工人一无所有。对工人来说，“公共服务设施”只不过是离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很远的水井和自来水管。工人常常通过泥泞的马路去市场，而专家却骑着马往返。人民对专家，特别对他们的妻子及佣人，深怀敌意。

尽管出现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公平的现象，列宁和党却认为在建设事业中聘用资产阶级专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科技专长，要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建设我们的社会是不可能的。

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具备广泛而渊博的科学知识。列宁和党还了解到，要使这些专家在事业中发挥作用，唯一的方法是让他们在物质利益方面感到满足。换句话说，必须让他们享受一些特权，至少让他们享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已得到的部分特权。必须给他们住还过得去的公寓房和用适当的交通工具。总工程师得备2匹马和一名马夫，普通工程师得有一匹马和一名马夫。当然，这本来算不了奢侈，而工人们确实这么认为。

为了在红军里聘用资产阶级军官，列宁认为必须给他们自由作出决定的权利。政委只对他们进行监督，而不是去干涉他们的事务。请想一想，一个过去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军官突然被授权指挥红军！在国内战争中，我亲眼看到在军官和监督他们的政委之间发生了种种误会。正如斯大林后来经常提醒我们一样，在资产阶级军官中发生了许多起叛国事件，而有的叛国事件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这些人都是在旧的资本主义统治下长大的，有的倒向我们一边完全是出于恐惧，有的被好奇心理所驱使，还有的为了养家糊口，无路可走。有的投奔革命本来就不怀好心。

但是，党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把许多专家们争取过来参加我们的事业。这就是列宁天才的体现，在关键时刻，他善于向资本家学习，利用他们的经验和专长。

而斯大林在他一生中始终是个“扼杀专家的刽子手”的形象。

列宁采取的另一项引起争论的措施就是新经济政策。这是他采取的勇敢、关键又很危险但却十分必要的步骤。这再次体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智慧和远见。新经济政策其核心就是恢复私有财产，复兴包括富农在内的中产阶级。商业界的人士在我们社会里坚定地站了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自然是思想战线方面的倒退，但却有助于我们去医治内战带来的创伤。新经济政策付诸实施，混乱局面开始平息，饥荒也逐渐减轻，城市生活重新出

现了生气，农产品开始重新上了市场的摊头，物价也下跌了。

当时党提出的口号是：“学会做买卖”。我们想要不通过行政手段而是商业途径去击败私商和新经济政策的商人。我们设法接管商业，由国家进行管理，尽力与新经济政策的商人比高低，也提供优质商品和优秀的服务。但是，我们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从事商业的私人资本家善于把商品陈列得更引人注目，对顾客服务更周到，私营商店特别吸引家庭主妇，她们喜欢上街转转，到商店里挑挑拣拣，仔细地检查每件要购买的商品。

我记得，在尤素夫卡居住和工作的时候，我差不多天天到市场去转一转。我总是到工人合作商店去。一进店门，该店主任、我的老朋友伊凡·科斯文斯基总这样对我说，“啊！我想你无事不登三宝殿，又是来训斥我的吧！对吗？我们正在尽一切力量跟新经济政策的商人们竞争，但私商看来仍然比我对顾客有更大吸引力。”

在矿区的边上，尤素夫卡工业区的西南角，有许多饲养牲畜的希腊族的居民，他们私下出卖的肉便宜。到了1925年秋天，蔬菜、西瓜和家禽大量上市，肉也只要15个戈比一磅。我们已回复到战前的水平了。幸运的是，当时政治形势也十分有利。工人们理解党的方针政策，且十分拥护。然而，要我们自己去适应新经济政策仍然感到十分困难，甚至很痛苦。

第二节 在党内步步高升

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地位升得很快。虽然在这一节里和整个回忆录中，他一再强调不愿意被提拔，然而事实十分清楚，他回到尤素夫卡后不久，就决定要在脱产做党的工作方

面有所作为，而对搞工业管理工作却无多大兴趣。虽然他开始不怎么理解斯大林恶毒而有效地攻击托洛茨基的真实意义。十分亲近斯大林的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对他的个人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忠实执行斯大林主义的尤索夫卡的党委书记克·维·莫伊谢因科的影响也更为直接。这一节及以后的章节清楚表明，赫鲁晓夫对党内各种对立集团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明确见解，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相当幼稚的教条或可叫作口号式的马克思主义，或叫欢呼万岁的马克思主义。任何人对斯大林表示怀疑就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就是敌人。从性格上来说，赫鲁晓夫站在斯大林及其恶棍暴徒一边，这一伙都是无情地不惜一切代价干事的实干家。他反对知识分子，主要是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是犹太人，多年流亡国外的人。斯大林很快就把他们消灭了。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负责人、列宁格勒的党魁）、加米涅夫（莫斯科党组织的头目）联合起来击败了托洛茨基。在1925年12月举行的第14次党代表会上，他们欢庆了这一胜利，赫鲁晓夫作为地方代表参加了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在一国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口号。也在这次大会上，党内自由辩论的作法最终被压制下去了。然后斯大林联合李可夫和布哈林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搞下了台。1927年正当赫鲁晓夫在尤素夫卡支持斯大林的时刻，托洛茨基被开除出了党组织。1929年当赫鲁晓夫到达莫斯科的时候，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开始执行，而苏联正处在由于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而发生恐怖事件的前夕。

我想你们会说，童年时期在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加里诺夫卡，我就接受了政治教育。学校教员是个名叫莉季娅·谢夫钦科的妇女。她参加了革命，是无神论者。在她的启蒙下，我有了萌

芽的政治觉悟，开始抵制从小所受的根深蒂固宗教影响。我的妈妈和外祖父一样，都是虔诚的教徒。外祖父是个农奴，曾被征入沙皇军队，服役25年。回忆童年时代，我家小木屋墙上的圣像都历历在目，它们的脸被油灯的烟熏黑了。记得在教堂里，跟大人一起跪在圣像前作祷告。开始识字时，我们念的就是圣经。但是，莉季娅·谢夫钦科使我走上摆脱这一切影响的道路。

早在革命前，我热心阅读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1915年《真理报》开始定期出版，我就阅读它，那时我在尤索夫卡附近的帕斯图霍夫矿的发电厂做机械装配工。1912年因参加罢工斗争，被开除了，此后我换过许多工作，在帕斯图霍夫矿上的工作就是其中之一。1915年，我在矿井首次与工友们进行严肃的政治谈话。当时，在那里工作的，许多是奥匈军队的战俘，多数是奥地利人，也有捷克人。我跟捷克人关系不错。他们常对我们俄罗斯人说，我们都是斯拉夫人，是兄弟。他们说宁愿跟我们打仗，只想过和平友好的生活。我特别不能忘记两个捷克人。我常请他们来住处喝茶、吃果酱。作为报答，他们教我绘机械制图，这对我的业务是很有用的。捷克人还告诉我有关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情况，还说我们斯拉夫血统的民族应团结起来等等，我深受感动。这些捷克人跟我谈起所谓斯拉夫主义的血统关系，我简直入迷了，这表明我对马列主义有关阶级团结的认识是多么肤浅。

当阅读米尔·左拉的《萌芽》时，我认为他写的不是法国，而是有关我和父亲曾工作过的矿区。不论在法国还是在俄国，工人命运都是一样的。后来，我听了政治经济学讲座，讲课老师谈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制度以及工人怎样受剥削等等，我觉得卡尔·马克思好像到过我父亲和我劳动过的矿区。他好像作为工人来观察过我们的生活，从而总结出一系列法则，科学地证明工人为什么一定要以及如何才能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自己，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革命后，我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的一员，不久，作为政治宣传工作者参加了红军。内战一结束，我就从前线回来，尤素夫卡党组织让我担任鲁钦科夫矿区的副经理。我曾在这个矿上工作了10年，当时该矿是隶属于一家法国公司。1922年担任该矿经理是我的好友叶戈尔·特罗菲莫维奇·阿巴库莫夫。这个阿巴库莫夫后来当上了煤炭工业部长，而不是在斯大林门下当内务部长的那个阿巴库莫夫。

我被任命去领导帕斯图霍夫矿区，然而我却请求组织解脱我的党内职务，这样我可以去尤素夫卡工人专科学校学习。经过我多次坚决请求，地方党委书记阿布拉姆·帕夫洛维奇·扎维尼亚金终于同意送我去学校学习。

在这以后，我在尤素夫卡党组织里担任了各种职务。1925年，我当选为出席莫斯科的第14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时尤素夫卡党组织的负责人叫科斯强·莫伊谢因科，医科学生出身，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很浓，与那些执行新经济政策者相比好不了多少的人来往。后来，我们不得不免除了他在地方党的书记处的职务，引起了一场骚动，一直闹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派了一个专案组来调查莫伊谢因科的免职问题。结果，专案组支持了我们的行动。但是，莫伊谢因科口才好，组织能力强，我们无法改变他的形象。在第14次党代表大会期间，他仍然对我们这地区的党员的思想影响很深，远远超过当地党组织其他积极分子。^①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中，4人是有表决权的，4人只有发言权。我是只有发言权的代表。我们代表是采用民主方式、按各选区党组织人数推选出来的。我当时负责彼得罗夫斯科——马林斯

^① 在第14次党代表大会上，莫伊谢因科大叫大嚷反对斯大林，表现非常突出。第二年，他被降职，当时有许多地方党委书记因贪污而被清洗，他就是其中之一。

基区，按党员人数来说，在尤素夫卡区，它只居第六或第七位。因此我当选为只有发言权的代表，而不是有表决权的代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有机会亲眼观光一下莫斯科并参加全国的代表大会，感到特别高兴。我们住在加雷特尼大街3号苏维埃大厦里，居住条件很简朴，又十分拥挤，睡的是木板床，活像大方木一块块排在一起。我记得哈尔科夫党组织的书记波斯蒂谢夫跟他的妻子也常和我们睡在一起。^①在这样的住宿条件下，有人就跟波斯蒂谢夫开玩笑，但是十分善意的。我们都很年轻，而他在党内也很受尊敬。到莫斯科后的头一天早上，我打算乘有轨电车去克里姆林宫，但不知道坐哪一路车，结果迷了路。从此以后，我就早早起来步行去克里姆林宫。这比坐车要多花费一些时间，但至少我可以熟悉一下路。我甚至不吃早点，以便按时到会场，找个好座位。

每个代表团都有指定的居住区，在一个区内则先到先坐。我总要找对讲台的位置坐下。代表大会就在今天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的大厅举行。当时，大厅还未改建，仍叫弗拉基米尔大厅。乌克兰代表团坐在大厅的正中间，而尤素夫卡的代表们坐在中间的第一排。顿巴斯的无产阶级组织在乌克兰党组织中居重要战略地位，因而享有坐最好座位的荣誉。

乌克兰组织的负责人是拉扎尔·莫伊塞耶维奇·卡冈诺维奇，他领导的政治局有彼得罗夫斯基、丘巴尔、希赫捷克和斯克里普尼克。卡冈诺维奇是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丘巴尔是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②

^① 这个帕维尔·波斯蒂谢夫是斯大林的虔诚信徒，后来在乌克兰当了第一把手，在清洗中被捕入狱并遭处决。

^② 除卡冈诺维奇以外，这里提到的重要人物有维·伊·丘巴尔和思·斯克里普尼克。丘巴尔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克里普尼克任教育人民委员。斯克里普尼克在勇敢地反对波斯蒂谢夫镇压乌克兰民族情绪的第一次大清洗后，于1933自杀了。这些人物和其他一些人的命运将在第三章里详细叙述。

第14次党代表大会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坐的位置离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么近，只不过几尺远。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斯大林。他给我印象很深刻，我想只要列举一件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件，就能说明当时的情景。

一次，我们地区党组织负责人莫伊谢因科同志请求斯大林同志与我们代表团一起合影留念。我们得到通知，斯大林同意跟我们一起合影，至于合影时间等他有空再告诉我们。我们一等再等，最后终于接到通知，在休会期间，到卡德琳娜大厅集合。斯大林来到大厅，坐了下来，我们就团团围着他。摄影师彼得罗夫走到摄影机旁，开始安排我们拍照。彼得罗夫在摄影方面是个受个尊敬的行家，在克里姆林宫已工作多年了，并在党的工作者中颇有点名气。他开始指点他们朝哪个方向看，把头转动一点等等。突然，斯大林用在场人人都可听到的声音说，“彼得罗夫同志爱给人下命令，可在这里是不允许的。谁也不准命令别人干这干那。”虽然，他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我们当他是真的，并对他的民主精神感到欢欣鼓舞。

几年后，发生了又一起类似的事件，当时我的朋友列夫·阿布拉莫维奇·里姆斯基带领一群学生到莫斯科去观光。里姆斯基决定打听一下斯大林是否愿意接见这些学生的代表团。列夫·阿布拉莫维奇告诉我，“我打电话到克里姆林宫，并一直接通到斯大林那里。多么平易近人！他同意接见我们。当我们来到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是从曾经叫尤素夫卡而今用您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来的，这个城叫斯大林诺。因此，我们想请您给斯大林诺的工人写一封慰问信带回去’。”对这一请求，斯大林作了下面的回答：“你们认为我是什么人？大地主？工厂工人并不是我农庄的农奴。要我给他们写一封慰问信，那是对工人的侮辱，是十分不恰当的。我自己决不这样做，也不喜欢别人做类似的事情。”列夫·阿布拉莫维奇惊喜异常。一到家乡，他就把这

件事传开了，来表明斯大林的民主精神、平易近人的风度以及对自己所处地位的正确认识。

在早期，我所看到或听到关于斯大林的事，极大部分都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在20年代，政治局会议纪要在全国党组织内广为散发，供党的积极分子阅读和学习。我记得曾看到一份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之间的一次争论的纪要，里面有一句斯大林的话深深印在我脑海里。他说了类似这样的话：“我要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团结，巩固我们组织坚如磐石的团结。难道你不明白你在干什么吗？上帝啊^⑥！老兄，难道你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吗？但是，上帝保佑你吧！上帝保佑！”斯大林即使曾在学院上过学，但他决不是个宗教信徒。这样的话并不能代表他的性格。我认为他说“上帝保佑你”的意思是“我再也无能为力了，我不希望你中邪，愿上帝保佑你，或上帝能帮你认识错误！”当然我也不是教徒，也从来没有对任何宗教有什么信仰，但我很高兴看到斯大林能如此容忍反对他的人。

1925年，在群众中，尚未流传党内激烈斗争的风声。斯大林在列宁还未去世和托洛茨基仍积极从事活动的时候就当上了总书记。然而，多年以后，党内人士才慢慢地了解斯大林所起的特殊作用。一般群众更不必说了。

1927年，我再次以尤素夫卡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党的第15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摆开架势打击了季诺维也夫分子，当时有人叫他们为“列宁格勒的反对派”。我记得我们常说甚至小鸟也在街头唧唧叫嚷，党内已形成了一个宗派。

我们代表仍然住在加雷特尼大街3号苏维埃大厦里。抵达莫斯科不久，我们就接到通知说，雅科夫·阿尔卡季也维奇·雅科

^⑥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准则，因此赫鲁晓夫作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把上帝头一个字母G大写。

夫列夫要来跟我们谈关于党内的一些情况，并提醒我们注意这次大会上可能出现的形势。①我想雅科夫列夫是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的代表。②我们知道雅科夫列夫一定是为了宗派活动来看我们的，因为事先通知我们，除了乌克兰代表团成员外任何人不得参加这次会见。③我们也认识到雅科夫列夫是来传达机密消息和直接来自斯大林的指示。雅科夫列夫向我们说明了与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分歧所在，以及我们该怎么办。换句话说，他让我们做好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的准备。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主席，即掌握世界革命事业大方向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主席。作为国际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季诺维也夫享有很大权力和威望。雅科夫列夫解释说，季诺维也夫将跟斯大林一起在大会上发言。（列宁逝世后，他曾作过总报告，在1925年上次代表大会上，跟斯大林一起发言。）雅科夫列夫还说，参加十五大的列宁格勒代表团向大会主席团写了一封信，根据党章规定，再次让季诺维也夫跟斯大林用同样长的时间在大会上发言。

代表大会开始时，我们发现再次坐在大厅正中间的座位上。在我们左边的是列宁格勒的代表们，右边是莫斯科代表团。我们

①雅科夫列夫，曾担任过农业人民委员，与农业集体化的过火做法关系很大，斯大林多次把他看作是自己可靠的强有力的人物，然而这并不能使他在1938年免于被指责为右翼反对派，甚至后来被枪决。令人感到极大的讽刺是那些真正“右”的反对派是反对农业集体化的人。

②“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都是格鲁吉亚人，多年来与斯大林交往很亲密。

③把出席第15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这样分隔开来，令人感到特别有意思。这告诉我们，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不允许来自各共和国的党代表团相互对话。从此，就开创了在党内长期存在的传统。在1960年的全世界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上，外国代表们对苏联同志（以赫鲁晓夫本人为首的）不让他们在一起相互会见和交谈极为不满。

跟莫斯科的党务工作者有交往，相互协调行动，一起反对列宁格勒反对派。不论在大组还是小组里，在大会上还是休会期间，在圣乔治大厅里还是会场外的走廊上，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讨论或争辩处处可见。

发现我的老同志阿布拉姆逊在敌对阵营里，我感十分苦恼。1922年我从军队回尤素夫卡时，他曾担任过该地区《劳工专政报》的主编。现在，他是列宁格勒某区区委书记。他是位优秀党员，但跟其他的列宁格勒人一样，他是季诺维也夫分子。他们的代表团里除季诺维也夫分子外，还有巴达也夫和尼古拉耶娃^①，这样反对派就可能对代表大会施加了较大的压力。这些人都是党的优秀积极分子，可现在都早离开人世了。

斯大林、李可夫和布哈林都发言支持党中央的路线，即斯大林的路线。在会上，一边是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而另一边就是反对派，在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言。

谈一点有关布哈林的事。他受人尊敬，众望所归。1919年，当时我还在红军里工作的时候，就见过他，听他讲过话。作为部队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我曾应邀参加库尔斯克州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布哈林作了报告。参加会议的人都为他高兴，我简直被他迷住了。他有感人的个性和强烈的民主精神。后来，我碰到过一些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他们都是莫斯科的简朴而进步的党员，政治水平与我不相上下。他们告诉我，布哈林跟他们在同一宿舍居住，在餐厅里同桌用餐的情景。这些都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布哈林也担任过《真理报》的总编辑，是党的主要理论家。列宁常常亲切地谈起他来称他为“我们的布哈尔奇克”。遵

^①除了列宁的夫人娜杰达·克鲁斯卡娅以外，尼克拉耶娃是在大清洗前的中央委员中唯一的女中委。虽然她确实支持季诺维也夫，但却免遭清洗，直到恐怖平息时，她的地位仍未变。

照列宁的指示，他撰写了《共产主义ABC》一书，每个参加党组织的人学习马列主义科学，都阅读布哈林的这一著作。总之，布哈林在党内是深受爱戴的。

在第15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有个代表团献给大会主席团一把铁扫帚。主席团主席李可夫发表讲话，“我特此向斯大林同志献上一把铁扫帚，他就可以把敌人一扫而光”。会场上爆发了表示赞赏的鼓掌和欢笑。李可夫说罢，自己先微微一笑，接着哈哈大笑起来。显然，他相信斯大林为了党的利益，明智地利用这把扫帚去对付反党分子和反对总路线的人。李可夫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也会被1927年亲手交给斯大林的铁扫帚扫掉。^①

在第15次党代表大会时期，我们思想上根本没有怀疑过，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是正确的，而反对派错了。而今我仍然认为斯大林的思想立场是基本上正确的。我们认识到跟反对派作无情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用伐木工人的一句术语来证明当时发生的一切是正确的：砍倒大树，木屑飞扬。归根到底，斯大林走上党的领导岗位决非偶然，党支持他反对象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流如此强大的对手，后来又支持他反对西尔佐夫和洛米纳泽^②“左和右”的集团，也不是偶然的。斯大林是个强有力的人

^①李可夫继列宁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布哈林是党的伟大知识分子，列宁所敬爱的朋友。他们都帮助斯大林击败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久，他们自己被戴上了右倾反对派的帽子。他们在1938年最著名的第三次大叛国案中受审讯、遭到指责，以至被枪决。

^②西尔佐夫（政治局候补委员、俄罗斯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和洛米纳（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协助斯大林先反对托洛茨基，后又反对布哈林。30年代初，他们积极反对斯大林，公开要求撤掉他党总书记的职务。他们被捕入狱，被指控为在审理布哈林案件中参与了阴谋活动。他们的真正结局也从未透露过。赫鲁晓夫古怪地称他们为“左和右”的集团，显然受1938年审讯布哈林案件的影响，因为官方把这桩案子定为“右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反苏集团案”。

物，在动员全党建设我们的工农业和加强我们的军队等方面，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不应该忽略这样的事实，即在革命早期，斯大林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的，而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取得了很大成就，并把党和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

1928年，卡冈诺维奇叫我去哈尔科夫（当时的乌克兰的首府），让我担任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据卡冈诺维奇说，当时设在哈科夫的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出身的委员寥寥无几，他要我从斯大林诺（尤素夫卡）去那里，以便在党组织里增加工人的成分。我不愿接受这一调动。我与哈尔科夫的组织有过多联系，了解到该组织里有些人是不可靠的。完全可以想像到，如我接受了这一任务，那会招来不少麻烦。哈尔科夫人对尤素夫卡组织怀有妒忌心里，决非平白无故：我们都是矿工和金属加工工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和党的基石。因此，我告诉卡冈诺维奇说，“我认为你要在中央委员会里增加工人成份，完全正确，但我不想离开斯大林诺，我很熟悉那里的一切，我了解斯大林诺组织的工作方法和人士关系。在哈尔科夫，我感到很生疏，担心我能否适应中央委员会组织部的工作。

卡冈诺维奇说，“好吧！如你这样认为，我想中央委员会没有你也行。如你坚决反对的话，就没有必要把你从斯大林诺调来。”

回家后，我又重新考虑卡冈诺维奇的建议。我反复思考了我与卡冈诺维奇过去的关系以及跟他共事的前景。他非常喜欢我。在二月革命初期，我们在尤素夫卡一次会议上见面，当时我代表鲁钦科夫矿区的工人参加了那次会议。一、两个星期后，我们再次见面。在那些日子里，我不知道他叫卡冈诺维奇，只知道他叫曰罗维奇。我百分之百地信任他、尊敬他。我深知他在哈尔科夫需要得到各方面的帮助。他算不了是个出色的行政管理人员，更谈不上是个真正的领袖。他在乌克兰集体领导中的地位很不稳

固，和其他中央委员的关系相当复杂。集体领导中那些老家伙想方设法要削弱他的威望。彼得罗夫斯基不做他的后盾，丘尔巴也不例外。总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来的一伙反对他，因此，卡冈诺维奇竭力依靠顿巴斯地区，特别是尤素夫卡组织对他的支持。

还有些事促使我认真考虑去哈尔科夫的问题。人们开始对尤素夫卡党委书记斯特罗加诺夫不怎么信任了，有事找我而不去找他。或多或少是因为我从小就生长在尤素夫卡。我父亲在尤素夫卡南边4俄里（相当于2~~3~~英里）的乌斯品斯克矿井里工作过，而我就在鲍谢工厂学机械装配的手艺，有一大批从小就认识的朋友。当人们不去找斯特罗加诺夫而来找我时，我与他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因为名义上我是他的副手。顺便提一句，后来他死了（真可怜，他实在不应被枪决）。不论怎样，为了避免与斯特罗加诺夫发生冲突，我想在关系进一步恶化以前，我还是离开尤素夫卡为好。

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以后，我决定还是接受卡冈诺维奇的建议。我告诉卡冈诺维奇已改变了主意，同意被调到哈尔科夫，但附带一个条件，只要一有机会，就派我到别处工作，只要是工业地区，哪里都行。在种田方面，我毫无经验，如去农业区，那就成了外行。

我到了哈尔科夫，被任命在尼古拉·涅斯捷罗维奇·杰姆钦科^①手下担任组织部副部长。他是个好人，优秀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总路线、对党中央、对斯大林，他都忠心耿耿，但后来也死在斯大林的手中。

正如我预料的，我在哈尔科夫的工作很不顺心，除了文牍工

^①彼得罗夫斯基、斯特罗加诺夫、杰姆钦科，这3人和其他西方世界不知道的无数党的工作者一样，都“死在斯大林的手中”。

作没有别的可干。我是个大老粗，好动的人，矿工出身，习惯干金属加工、化工，我的素质不宜做文牍工作，对它我毫无缘分。我讨厌通过阅读一大堆报表和档案来了解现实世界。我在哈尔科夫工作没有发展前途，因此感到十分苦闷，好像上了圈套。我一再找卡冈诺维奇，重提他过去对我的允诺：一有机会就让我离开哈尔科夫。

后来，有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我在基辅给你找了一个工作。杰姆钦科已去那里担任区党委书记，他要求派你去基辅领导组织部。如你同意，自己去买张车票，今天就可以动身。”

我不加思索就接受了。那天正是星期日。当晚，我坐上火车，第二天早上就抵达基辅。我从来没有到过基辅。我家乡尤素夫卡跟基辅一比就成了一个小小的乡村了。一到基辅，我就直奔第聂伯河岸边，两眼死死盯着这条举世闻名的大河，手里连皮箱都没有放下。

基辅的组织被人看作是党的可靠前哨阵地。实际上，这个地区是以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桥头堡臭名远扬。这当然也是罪有应得。当地的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而不稳定，以乌克兰科学院为中心的知识阶层是在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彼得卢拉^①的追随者格鲁茨基的领导下。同时，在这地区，托洛茨基的队伍也相当庞大。我深深懂得，基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一定把我看作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俄国佬”（这是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嘲弄的称呼）。

我早预感到凶多吉少，但必须承认，在基辅的一年，我感到很满足。回忆这时期，我觉得很愉快。我工作得心应手，大家似乎都喜欢我，信任我。甚至可以说，大家都尊敬我。

当然，我并不是说工作一点困难也没有，远非如此。孟什维

^①彼得卢拉是最出名的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这些人致力于创造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竭力反对加入新苏维埃联盟。

克分子、社会革命党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都千方百计想利用我们在基辅面临的困难。许多人失业，还常常上街扛着红旗游行示威。我们曾在基辅城老苏维埃大厦里举行过大会讨论这些问题。我对与会者说，“我知道有地方需要大批工人，并且可轻而易举地在那里为你们找到工作。”

他们表示很高兴，便问道：“哪儿？”

“在顿巴斯地区。”

“我们宁愿在这里失业，也不去顿巴斯找工作，”他们异口同声回答。

这使我感到十分恼火，因为我的根深深扎在顿巴斯，我十分怀念跟我一起成长的矿工们。对这些基辅人来说，顿巴斯是个落后地区。此外，那是矿区，对那里的工作，他们都是门外汉。①

1929年我已满35岁了。我认识到这是我认真考虑去高等学府学习最后一次机会。除了上过尤素夫卡工人专科学校外，我没有进一步深造过，而时间对我来说是十分紧迫的。我决定试一试，请假去完成学业。最初，我碰到了来自顶头上司的阻力。当时，卡冈诺维奇已调到莫斯科党中央，科西奥尔同志被派遣来接替他的职务。②许多人都认为我同卡冈诺维奇非常接近，这倒是事实，我跟他关系非常亲密。但是，人们也认为我要去上学的真正理由是我不愿跟科西奥尔共事，实际并非如此。我不很了解科西奥尔，但十分尊敬他。他态度和霭、性格开朗、处事明智。我认为他比卡冈诺维奇，在待人接物方面要高出一筹，但在组织能力方面，却不及卡冈诺维奇。卡冈诺维奇办事能力强。假如中央委

①在这里及以后章节里，赫鲁晓夫一直是举棋不定：是承认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真正实力，还是装模作样地认为这是无足轻重的。

②科西奥尔是斯大林的政治局委员，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一直到1938年，被撤职，接着被捕，赫鲁晓夫接替了他在乌克兰的工作。

员会给他一把斧子，他连暴风也能砍掉。不幸的是他常常在砍坏树时，把好树也一起砍掉了。但是，木屑确实到处飞扬，这一点你无法从他身上抹去。

不管怎样，我去找哈尔科夫，向他当面解释我的处境，“你瞧，我已35岁了，打算去完成学业。可否给我开封介绍信？我申请到莫斯科工业学院去学习，希望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支持，我要成为一个冶金专家。”

科西奥尔十分理解我，听完我的陈述后就表同意。然而，杰姆钦科却很不乐意，竭力劝我留下来工作，虽然他也理解一个人想要继续学习的心情。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是否批准我的假期。有些人认为我想离开杰姆钦科，并暗示说，如果这就是我要离开哈尔科夫的理由，他们就同意。我不得不使他们相信，我请求离职与我与杰姆钦科的个人关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只不过是想完成我的学业。经过几次讨论，政治局终于作出决定，解除我在乌克兰党内的职务，以便让我进工业学院学习。不久，我就动身去莫斯科。

第二章 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

第一节 从工学院进政治局

从以后发生的事件看来，这位来自乌克兰、年仅35岁的党务干部被送到莫斯科工业学院，可能是主要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想要趁机显示一下他在政治工作方面的实力，把学院建设成为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堡垒。因为在1929年和1930年，这个培育共产主义新苗的温床实际成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中心。尽管如此，赫鲁晓夫很快就控制了这里的党基层组织，并采用粗暴和不正当的手段，打败了对手。鉴于他功劳卓著，两年后就离开学院，紧跟卡冈诺维奇，大振宏图，不久就成了全莫斯科的党魁。本章主要背景是以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的迅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早期的狂热运动，在下面章节里，赫鲁晓夫谈到了有关情况。

在工业学院头一年，我碰上了一些困难。有人对我说，因我在行政管理上缺乏经验，没有资格进校学习。同志们说，“这是一所培养经理和厂长的学校，到这里来学习，你尚未具备条件。也许你该转到党中央的马列主义学习班去学习。”最后，我只好去求助于卡冈诺维奇。拉扎尔·莫伊塞耶维奇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在他的支持下，我终于在学院里留了下来。学院里的人各式各样。同学们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程度差别很大。许多人仅仅上过

乡村小学，除了加减乘除以外什么也不懂。也有上过中学的人。我毕业于尤素夫卡的工人专业学校，因此属于后一类。

学院的教学大楼坐落在新巴斯曼那亚，离开我所住的宿舍波克罗夫卡40号不远。我自己单独住一间，安排得很理想。我每天步行去学院，从不乘车。

学院的督学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古比雪夫同志^①，谁能比他更好呢？他是位受人尊敬和有影响的人物，他全力支持学院的工作。我们的院长是卡明斯基，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和好同志。^②我记得在1930年，我们要他去问问斯大林是否接见一下首届毕业生代表。我们正准备在圆柱大厅^③举行毕业典礼，还想请斯大林在盛会上作临别赠言，但接到通知，斯大林将接见六、七人组成的代表团。我虽然不属于毕业班的学员，但因我是学院党组织的书记，也就包括在代表团里了。会见时，斯大林在下列几方面给了我们指示：他叫我们精通专业，成为各行的专家，当然应在当管理方面的多面手的同时，也应是专家。这个意见很好，虽则我们过去也听过这类意见。在尤素夫卡工人专科学校，我也听到过这样的话。斯大林讲话时，我也在想：“此人懂得怎样调动我们的思想和精力去实现国家工业化和保证祖国边疆不受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犯，人民的美好生活显然掌握在强有力的手里！”

斯大林作完指示后说，“今晚你们的庆祝会，我怕参加不了

^①瓦·费·古比雪夫，老布尔什维克，国家计委主任，早年与斯大林志同道合，但性格较温和。1935年1月，他猝然死去，可能是斯大林下令处死的。在1938年对布哈林等人的审讯中，曾经被指控杀害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等人的两名医生（列文和普列特涅夫），也被控告谋害了古比雪夫。

^②格·姆·卡明斯基，曾任卫生人民委员，签署过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的死亡证。第三章里叙述了他的命运。

^③这是莫斯科的沙俄时代贵族俱乐部里装饰很华丽的大厅。

了，但加里宁同志是会去的。”我跟斯大林的会见比预计的要长得多，我们不得不跑步去圆柱大厅。我们到达大厅时，卡明斯基已经讲完了话，但是我们还是听到了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的讲话。我们十分尊敬他，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

我该说一说我是怎样当选为学院党组织书记的。这也说来话长，但值得说一说。

当我1929年刚到莫斯科时，学院的学生组织里仅是一些不可靠不良分子。许多人因种种原因，脱离了党或工会，放弃了行政上的职务，安身于安乐窝里，终日游手好闲。在一星期里，我们两天休息，星期日和另一天用来“消化”一周内所学的东西。我常常看到这些无用之辈一清早离开宿舍，直到半夜才回来。我不知道他们整天在忙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并没有去“消化”所学的东西。多数人根本不是来学院学习，来这里仅仅因为这里是躲避将要来临的风暴的避风港。他们在学院里为自己筑了小小的窝，以躲避政治活动。这样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中央委员会里的政敌几乎成了国内唯一能利用我们高等学府的人。我记得莫洛托夫曾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读书的时间多吗？”

“很多”，我回答说。

“我也如此，我总干不完工作，真想坐下来，好好地读一本书。尽管我认识到应该这样做，但从来得不到机会。

我懂得他的意思。自1922年从军队退伍回乡后，我一直忙得没有时间读书。我是一名党员积极分子，因此把全部时间用来为实现中央委员会的总路线而战斗。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的。如果有人确有时间去欣赏文学，那他就会因逃避公民和党员的职责而遭指责。我记得有一次斯大林说得好：“事情竟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活动竟得到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报酬。中央委员会对他们不信任，因此撤掉了他们党内的职务，

他们就直奔我们的科技机构。然而，另一方面，坚定支持总路线的人、从事党的日常工作的人却从来没有机会深造，接受专业培训。”

鉴于这种形势，工业学院里充满了右派分子，他们控制了党的基层组织。当我1929年到学院时，党组织的书记是哈哈列夫。他是个影响很大的人物，大约在1906年即革命前就开始做党的工作。他周围有我们叫“老战士”的人，他们支持右派分子李可夫、布哈林和乌克兰诺夫^①，反对斯大林和党的总路线。学院里的“老战士”有老布尔什维克、前工厂厂长和工会领导人。总之是一伙表面上去学院重温技术专业知识、受人尊敬的人。

在学院里，有我们一伙人，坚决支持总路线、反对像李可夫、布哈林、乌克兰诺夫的右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以及西尔佐夫和洛米纳泽“左和右”的集团。我甚至记不清，以布哈林、李可夫为一方与西尔佐夫和洛米纳泽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所在。右派分子、反对派、“左右倾”分子、机会主义者，这些人的政治方向是基本上一致的，我们一伙人反对他们。我们都来自南方——顿巴斯、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等地，都是革命后加入党的。在开会时，谁被提名担任学院党组织的候选人，谁就必须上台说明从哪里来、什么时候加入党的组织。这使党基层组织的“老战士”便于识别，以便不选举可能反对他们的人。^②

^① 思·埃·乌克兰诺夫是莫斯科党委员会第一书记，分管工业学院。1928年他被清洗后，先由克·叶·鲍曼接替，但时间不长，后由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接替，接着就是赫鲁晓夫他自己接替。

^② 赫鲁晓夫在这里谈了一点十分有意思的情况，即党的知识分子、温和派多数是老布尔什维克，与斯大林及其一伙对抗。他们是一伙无情的蛮汉，特别是来自乌克兰工业部门的赫鲁晓夫的同事们，他们在党内都资历较浅。

我被选进学院主席团也曾碰到了二、三次的反对，甚至没有人推荐我当第16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然而，尽管在莫斯科我还是一个新人，但我的名字已开始出现在支持总路线的党的积极分子的行列之中，因此中央委员会发给我一张参加代表大会的永久特邀代表。这样，我才能听到斯大林的总报告。我并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各次会议。虽然我的证件是不准转让的，但让一些同志用了我的证件，以便有机会进入大会会场。幸运的是我这样做，没有被发现，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处分的。

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在工学院我们跟右派的斗争形势开始起了变化，我占据了领导地位，把学院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堡垒。我在支持党的路线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决不是无足轻重的。不客气地说，我起了领导作用。学院党组织的核心明白这一点，设法想把我赶出城去，以便使我无法干涉他们要推选一个右派代表团去参加1930年的鲍曼区党代表会议的计划。于是我被选派去农村视察学院党组织主办的一个集体农庄。

当我回到莫斯科时，鲍曼会议正处于高潮之中，出席会议的学院代表多数是右派分子。塔巴科夫同志前来告诉我在离开莫斯科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他是犹太人，是我在学院里的坚决支持者之一，是位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同志，一位最出色的共产党员。后来，他被枪决了。塔巴科夫告诉我，党的基层组织公布了一份10至13名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其中包括斯大林、李可夫、布哈林，我想还有乌格兰诺夫。这是右派分子策划的阴谋，即如不支持李可夫、布哈林作为代表候选人，那就无法支持斯大林。

那天晚上，我忽然收到了一个电话。在莫斯科，我熟人不多，想不起谁会给我打电话。我拿起话筒，听对方说：“我是《真理报》总编辑麦赫利斯。①你能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我派车来接你。我有件急事要与你商量。”

几分钟后，他的车就停在我住的宿舍前面。上车后，我就去

《真理报》编辑部办公室。我从来没有见过麦赫利斯。他给我念了一封从学院寄来的信，指控有人采取政治手段和非法的行为选派了一个右派代表团参加鲍曼区的会议。

“你同意这封信里所叙述的内容吗？”麦赫利斯问我。

“当然，完全同意。它确切地反映了我们面临的局势。”

“你愿意在这封信上签名吗？”

“那怎么行呢？我并没有参与过这封信的起草工作。谁起草这封信，我一无所知。”

“那无关紧要。你的名字和起草者的名字在这件事里不会出现。我要你签名，因为我信任你。关于你和你所起的作用，我早已听说了不少。你的签名使我更确信，这封信如实反映了学院里所发生的一切。”

“好吧！我就签。”签名后，我马上坐了麦赫利斯的车回到宿舍。

第二天，《真理报》在读者来信专栏里刊登了这封信。^②这真象是一声晴天霹雳。学院立即陷入一片混乱。课也停了下来，党的干部举行会议，除了斯大林外，参加鲍曼会议的学院代表全部被召回。可能我们接到过上级的命令，不把布哈林召回来，但已记不清了。总之，李可夫、乌格兰诺夫和学院的其他右派代表全都被召回了，又选派了新的代表。我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参加

①勒·茨·麦赫利斯，是位天生的秘密警察。为了斯大林的安全，把他安置负责《真理报》。后来，他成了一个特别令人讨厌和十分狡猾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将军。他是在红军里大清洗之后才获得了高级军衔，但他作战无能，使国家蒙遭很大损失。后来，他担任了国家监察部部长，据报道，1953年他病死。

②这封信在1930年5月30日发表。这封信的幕后关键人物是赫鲁晓夫，这是早就暴露无遗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本人承认了这一点，即使如此，他叙述的过程可能是过于简单了。

了新的代表团^①。

变化发生得太快了，甚至连印制新的代表证的时间都没有，因此，我们就用了原来代表的证件。对此，会上有些人很不理解。一次，我接受到盘问，因为我的证件上写着别人的名字。我解释说，“我知道，这些证件本来是发给上面具名的那个人，而今都属于我的了”。我说这些，其他多数代表似乎都能理解。

我们代表团决定由我向大会作报告，阐明我们的立场。我刚开始讲话，就有人不满地叫喊：“你和你的工业学院，我们全知道了！”学校作为右派分子的温床而臭名远扬，因此我的第一项任务是要证明我们的立场与过去的代表是截然不同的。我表明坚决支持党路线的立场后，其他与会代表才开始相信我们。

我当了学院党组织的书记以后，我们开始对那些把学院作为党内政治斗争避风港的游手好闲者和无能之辈采取措施。我们提醒学员们，你们不是到莫斯科来观光的，你们是来学习的，用理论和实践知识武装自己，以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更多的贡献。不久，学院开始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起了带头作用。我们历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常常第二天就在《真理报》上发表，成了其他党组织的指导方针。

我在莫斯科党内的活动就是这样起步的。由于我在学院组织内的领导地位，在莫斯科党组织和中央委员会，我的名声就大起来。在那些年代里，每半年或一年举行一次区党代表会议。1931年1月，再次举行鲍曼区的党代会，我当选了区党委书记，取代了希林——仅在一年前，他反对我当选为第16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希林在政治上不够成熟。我确信1930年他投我反对票时，完全出于他个人的目的，但一切都过去了，也就算了。当时，作为

^①事情要比这复杂得多，布哈林分子几乎拼命地反攻，然而他们却十分孤立。

一名党的工作者，我的前途似乎十分光明。①

起初，我认为在莫斯科党组织里的晋升，应归功于卡冈诺维奇的帮助，但不久我开始认识到我的步步晋升倒不是卡冈诺维奇而是斯大林自己在起作用。显然，斯大林通过他的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也夫娜·阿里露也娃，一直在注视着我的行动。她在斯大林面前夸耀我。于是他叫卡冈诺维奇帮助我。

阿里露也娃和我是工业学院的同学。她在纺织系学化学，专业是人造纤维。她是党组织的一名干部。作为党组织的书记，我定期和她见面。②我必须给她指示，同时也知道她回家后会跟斯大林谈起我的工作。我感到就象文钦科故事里的英雄平亚一样。③

然而，阿里露也娃小心翼翼，从不跟人随便提起她和斯大林的关系，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她是斯大林的妻子。她只不过是阿里露也娃，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学院里还有一个叫阿里露也夫，是远东来的采矿工程师，在党组织办公室担任工作。阿里露也娃有意让人去猜测，他是他的妻子或妹妹。她从不利用她作为斯大林妻子的特权。从学院到克里姆林宫，她从不坐小汽

①事实上，这就是赫鲁晓夫的突破时刻，也是布哈林分子在工业学院完蛋之时，希林垮了，赫鲁晓夫接替了他的位置，这是赫鲁晓夫步步晋升迈出的第一步。

②娜杰日达·谢尔盖也夫娜·阿里露也娃是斯大林的不幸的第二个妻子，是斯维特兰娜·斯大林的母亲。当然，她在工学院跟赫鲁晓夫混得很熟，说来也怪，这位十分敏感的人物竟会喜欢上赫鲁晓夫，那时他只不过是个粗鲁、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而已。

③赫鲁晓夫不止一次把自己比作文钦科故事里的英雄。平亚是一个矮小的犹太人。一批粗暴的犯人瞧不起他，故意推举他当头头。当考验时刻到来时，即在一次监狱暴动中，他象天生富于牺牲精神的领袖一样挺身而出，使得大家感到万分惭愧。

车，而是乘电车往返。在学员群众里，她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不表现出自己与斯大林亲近的关系，这是十分机灵之举。因为在政治领域里，无论是她的朋友还是仇敌，都把斯大林看作是个大人物。

在那些日子里，我称她娜佳。后来，我们开始称她为娜杰日达·谢尔盖也夫娜。直到我担任了莫斯科市委书记并开始经常去斯大林家里吃饭，我才认识到娜佳怎样详细地把我在工业学院为维护总路线而斗争的情况一一告诉了斯大林。有时，斯大林还提醒连我自己也早忘掉的一些细节。

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居然活了下来，而大多数和我同辈的人物，学院里的同班同学，以及在党组织里一起工作过的朋友，都被当作人民的公敌而掉了脑袋。我常扪心自问，我究竟是怎样幸免于难的？我对党一向忠心耿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也是忠于党的，也为维护斯大林总路线的斗争作出了贡献。那么为什么我逃脱了他们的那种厄运呢？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娜佳的报告影响了斯大林决定对我采取的态度。我把这叫做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谢尔盖也夫娜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了一张中彩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得过我。在往后的年代里，他有时对我进行攻击和侮辱，有时对我作些鲁莽的评语，但总是说了就算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喜欢我的。如果说此人爱某人，那是十分愚蠢的或自作多情，但是他很尊敬我，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斯大林并不尊敬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术娅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妻子和妹妹）。他常说，他认为她们谁也没有在为党争取胜利的斗争中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斯大林死后，我们在一个保密柜子里找到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列宁的亲笔字条。列宁指责斯大林对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

芙娜进行了侮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斯大林向她道歉，否则列宁就不再把斯大林作同志看待了。我为这张字条居然还这样保存下来而感到惊奇。或许斯大林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①

当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还在世时，看着斯大林对她如此不恭敬，那总是令人十分难受的。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她反对斯大林。在1930年鲍曼区的党代会上，她发言为布哈林和李可夫辩护。结果，她遭到了多数与会代表的攻击，后来又不公开地向党的各基层组织通报了她的检查。至于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人人都知道她是布哈林的好友，布哈林在《真理报》任总编辑时，她当过秘书。

至于我只有十月革命后的斗争经验，总是把列宁看作我们的伟大领袖，因此对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也是十分尊敬的。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不可分割的伴侣。在鲍曼区的会议上，看到她受到大家的攻击和反对，我心头感到异常痛苦。我记得她象一个心碎的老太婆，人们把她当作瘟疫那样避着她。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她受人严密监督，因为她脱离了党的路线。

今天当我分析那个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时，我觉得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说这些好

^① 这张字条的内容是由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第一次透露出来的。列宁数次受疾病袭击，竭尽全力提醒他的同事们警惕斯大林不可一世的野心。已故的有名学者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认为，斯大林是故意侮辱克鲁斯卡娅的，明知列宁必定会知道，这样把他搞得心烦意乱，从而加速他的死亡。列宁给斯大林的字条（有副本给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内容如下：“亲爱的斯大林同志，你竟敢通过电话传呼我的妻子，对她进行粗鲁的指责……我决不会轻易地忘掉针对我的行为，在此我也无须强调，针对我妻子的行为也就是对着我来的。因此，我要你认真权衡一下，你同意收回所说的话并表示歉意，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列宁启（1923年3月5日）。”

象是做事后诸葛亮。当时，一切都乱成一团，人人都在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身上泼污水。

后来，当我在莫斯科市委工作时，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负责处理市民的申诉。任何人遭到莫斯科市苏维埃不公正的对待都向她倾诉衷情。毫无疑问，莫斯科市苏维埃的工作方法存在许多缺点。对工人、机关工作人员、知识分子来说，条件十分困难。每当有人在官僚主义面前碰壁时，他最后总要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求援。她受解决问题的权限的约束，往往力不从心，常常把它们转交到莫斯科市委我的办公室。可惜，尽管我职位较高，但也无能为力。莫斯科普遍缺乏公寓住宅。整个住房问题十分严重。我们正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到处建设新工厂，然而并没有考虑莫斯科工人队伍的扩大，建造少量的新住房，还不足以补偿为建厂房而拆掉的旧房子。

每当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把上诉的人转给我时，我总尽力而为。我常常向她通报，做了些什么，哪些办不到。我有时候也跟她见面。她能正确理解我的立场，并认识到我是紧跟党的路线的，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她也就根据现实跟我相处。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克鲁普斯卡娅是绝对的正确：对于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我是百分之百地忠诚的。我深信斯大林以党的名义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出于天才，我只需把它应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

不过，当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在党内处于逆境时，我心情感到十分矛盾。我对她怀有一种基本的人类同情心。

斯大林常常对他核心圈子里的人说，有人怀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是否真正是列宁的遗孀，他还说如果她这种情况再长期继续下去，我们就要在群众面前公布这个疑问。他又说，如有必要的话，我们会公布另一个女人是列宁的遗孀，他有根有据提到一个受人尊敬的党员的姓名。这个人至今还活在人间，我不

打算对这些事妄加评论。^①

我认为斯大林对待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只不过是列宁不尊敬的另一例证。对斯大林来说，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即使是列宁的盛名也是如此。斯大林自己从来不在群众面前流露一句反对克鲁普斯卡娅的话语，但是在他的核心圈子里，他却说了各种关于她粗鲁的话。他也并不随意散布一些小道消息。他要从心理上对我们施加影响，以削弱我们对列宁的无限热爱，抬高他自己作为我们时代无可争议的领袖和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为此，他小心翼翼地但却是深思熟虑地向他身旁的人们的头脑里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他在私下里对列宁的看法与在公众向前所承认的是不一样的。

在这方面，我不得不提及一下卡冈诺维奇。他的行为使我觉得很反感，对别人也是如此。他不过是只走狗而已。斯大林只要抓一下卡冈诺维奇的耳朵根，他就会向党狂吠。

卡冈诺维奇总是把椅子往后一推，站得笔直，便大声吼叫：

“同志们，现在是我们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的时候了。党内人人都在不断谈论着列宁和列宁主义。我们必须对自己忠诚老实。列宁在1924年逝世了。他在党内工作了多少年？在他的领导下有什么成就？跟斯大林领导下所完成的比一比，把“列宁主义万岁”的口号换成“斯大林主义万岁！”的口号的时候到了！”

每当他夸夸其谈的时候，我们总是保持沉默，两眼往下看。斯大林总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出来与卡冈诺维奇争辩一番。

^①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是个投靠西方的内务部高级官员。据他说，代替她的遗孀一定是叶琳娜·斯塔索娃。她在劳改营生活了多年，斯大林逝世后才恢复了名誉。在莫斯科至今还流传一个谣言，把：“正统遗孀”候选人指名为罗·萨·泽姆利亚奇卡，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也是库恩·贝洛一度在克里米亚的同事。

“你在说什么？”他会这样问，“你怎么敢这么说？”但从斯大林的语气中，你可以听出他希望有人表示异议。这种手法在农村是常见的。母亲要随同别人去另一个村子走走，并想把她的小孩带去，她便会大声骂道，“你留在这里吧！你胆敢跟着我去吗？小家伙！”还用手指点着孩子。然后，来接她的人不注意的时候，母亲就向孩子暗示，轻声地说，“来，跟我走！”这样，小孩就跟在后面跑起来。我自己常常碰到过这种场面。斯大林也正是采用这种方法骂卡冈诺维奇的。

斯大林喜欢用下面这样的对比方式来反驳卡冈诺维奇：“列宁是什么？列宁是一座高塔！而斯大林是什么？斯大林是个小手指头！”有时，当他说这些话时，还用另一个比拟来取代，不过我们不拟在这里写下来。卡冈诺维奇倒更来劲了，坚持要重复他推崇斯大林的话。卡冈诺维奇善于觉察善于领会斯大林装模作样的发火。

卡冈诺维奇和斯大林之间的这种“争论”越来越习以为常了，一直持续到斯大林离开人世。从来没有人插咀，往往是斯大林最后讲一句话，才算了结。

这种老一套的做法对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来说，都是典型的。谁也没有像卡冈诺维奇那样凶狠毒辣，斯大林常把他树立为“有坚定的阶级觉悟”和“对阶级敌人毫不心慈手软”的楷模。后来，我们完全弄明白卡冈诺维奇确实是个既坚定又毫不心慈手软的家伙。他是那种不肯为自己兄弟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说一句话的人。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被指控为希特勒安插的德国间谍，以便在德国人占领莫斯科后建立一个俄国傀儡政府。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吗？希特勒计划把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一个犹太人，安插在一个法西斯的俄国政府里？从纳粹的立场来看，这简直是犯罪！然而，这确实成了强加给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的罪状。当他感到走投无路时，就自杀了。事后，我从来没有听到

任何人提起这一事件，连拉扎尔·莫伊塞耶维奇本人也似乎不把他自己兄弟的悲剧放在眼里。在他看来，一切都很简单：曾经有一个人叫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担任过航空工业人民委员，后来他这个人就不再存在了，或许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人。与此同时，拉扎尔·莫伊塞耶维奇从来没有停止过卑躬屈膝地奉承巴结斯大林。①

我讲得有点偏离话题了……

当了6个月的鲍曼区党委书记后，1931年担任了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党委书记。这当然是在党内的地位又向上爬了一级。从红色普列斯尼亚在1905年起义中的历史意义来说，它比鲍曼区在政治上显得更为重要。实际上，它是莫斯科的最重要的区党委。又过了6个月，在市级党组织会议上，我当选了莫斯科市党委的第二书记。尽管我颇为注重职位的晋升所带来的荣誉和责任，但我仍然因未能完成工学院的学业而感到遗憾。在莫斯科市党委任职意味着我永远放弃在高等学府结业的希望。不仅如此，正如我跟卡冈诺维奇私下谈及的那样，我担心在市委机关里一定会碰到不少困难。我还是经受了挑战。一年后，我成了莫斯科地区党委的第二书记。

1934年在党的第17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我觉得选举程序十分民主。具体做法是：候选人提名后，把他们的名字印在选票上，然后发给全体代表。必须承认，代表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因为选票上的候选人的数目正好是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总数，其中包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监察委员会委员。然而，每位代表都有机会表达他对候选人的意

①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对他兄弟的蒙受耻辱和自杀不动声色。在整篇叙述中，赫鲁晓夫如何描写一个曾支持和保护过他的人，感到不少困难。这个人曾给了他不少好处。他终于在1957年把这个人消灭了。

见，或把候选人名字留在选票上，或者把它划掉。斯大林让代表们分组收集选票，自己却看着代表们，以示他不看选票（后来，我才发现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同意，任何人的名字都写不到选票上去）。接着，点票并向大家宣布对每个候选人的赞成和反对票数。

我记得，在第17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并没有全票当选，有6人投了反对票。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当公布我的名字——“赫鲁晓夫”——我也是6人反对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别的候选人当选常常有20人或30人，甚至100人投了反对票。当选的中央委员必须获多数票。

1935年，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运输人民委员，免去了在莫斯科党组织的职务。我被提升接替了他的工作，成为莫斯科地区兼市委第一书记。^①

就在我提升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感到既高兴又荣幸，但是我也为随之而来的重任而胆战心惊。这时我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专业党务工作者，但我还是保留着的我老本行用的工具——卡钳、千分尺、直角尺、量筒。我不愿与老本行断绝联系。依我看来，党内职务是选举的，如果我落选了，我随时都有可能回到机械装配工的老本行。

我开始经常参加政治局的会议。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遵循着列宁主义的传统。碰巧正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只要静静地坐在会场而不妨碍工作，均可以出席政治局会议。从这些会议上，我学到了不少关于党领导如何作出决定的方法。

能够与政治局委员们坐在一起，与党的领导人并肩工作，生

^① 这说明了在斯大林的下面，赫鲁晓夫完全控制了莫斯科市及其周围地区。

活在斯大林的身边，这一切都是我发展道路上碰到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多少年来，我一心一意忠于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自从我第一次到莫斯科，聆听斯大林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我一直敬佩他清晰的思路和简明阐述。我同样为他在较小范围内简洁而有条理的讲话所打动，那是在1932年一次工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内部会议上，他概括了“六大条件”。现在，我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经常有机会从很近的距离观察斯大林的一举一动。我对他的敬仰与日俱增。在三十年代中期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对别人表现出的忍耐和同情，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

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加以说明，这里仅举一个。这是一件不寻常的案件，牵涉到随同我们贸易代表团去拉美国家的一个年轻外交人员，他上了当地报界的圈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被带进来作证，显然他感到很窘，又十分心烦意乱。斯大林就开始了这场讨论。

“请把全部经过告诉我，一点也不要隐瞒。”

这位年轻的外交人员解释道，刚抵达拉美国家，他去饭馆就餐。“我被领到一张桌子，点了菜。有一人走来坐在我的桌旁，他问我是不是从俄国来。我答道是从俄国来的。接着，他开始问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我是来买什么的？在军队里服过役没有？会打枪吗？我告诉他我在骑兵里呆过，枪法不错，等等——然后，我大吃一惊，第二天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全是胡说八道，说什么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高加索牧童，神枪手，关于我来的目的、要买些什么，愿出多少价钱，等等，编了一大堆谎言。不久，大使馆告诉我，最好回国向您汇报。这就是整个经过。我只请求您考虑，我犯这样的大错是因为缺乏经验，并没有什么邪念。”

我为这个年轻人感到很难过。他显然做了自己天真无知的牺牲品。与会者都踌躇不安，彼此交头接耳。我们都在等会议进一

步开下去。

斯大林突然说道，“依我看来，这是一个可信的人被一伙坏家伙利用了。除了刚才叙述的，还有什么吗？”

“没有了。”

“那么，这案子就这样了结了。”斯大林望着年轻外交人员的眼睛说道，“今后你一定得多当心点。”那个可怜人呆坐在那里，咀张得大大的，而会议就散了。他为自己碰上了好运气而吃惊，甚至连动也动不了了。然后，他抓起公文包，就匆匆地走了。

斯大林简朴而又富有同情心地处理了这件案子，我深受感动，人人都有同感。

第二节 莫斯科的父母官

赫鲁晓夫从1932年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在卡冈诺维奇的领导下），到1938年被任命为乌克兰第一书记为止，在这期间，他主要关心莫斯科的行政工作。1935年，他完全控制了莫斯科地区和市的党组织。就在这几年里，他以严厉和无情的领导而出名，与身居高位的俄国人所不同的是，他不怕别人对他毁谤。他最突出的成就是修建了莫斯科的地下铁道，用大理石装饰的金碧辉煌的地下大厅成了苏维埃政权著名的橱窗，成了世界上的一大奇迹。地下铁路以卡冈诺维奇的名字命名，因这项工程是由他发起的，赫鲁晓夫则是他的助手。但是，赫鲁晓夫很快就全部承担了这一任务，并胜利建成了这项工程。赫鲁晓夫给我们详细描绘了那些狂热日子的情景。他确实孜孜不倦地工作。在他的手下，不但有成

批热情的青年共产主义志愿者，而且还有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雅格达的支配下的一支规模很大的强迫劳动的队伍。从1936年起，赫鲁晓夫还担负着另一项重任，即在恐怖的大清洗年代里，协助确保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安全。赫鲁晓夫在群众大会上，颂扬斯大林的调子都比他的同事高，并要求处决叛国案里的犯罪者，虽然他未提及这些，但他的确因此而出名了。

我刚开始参加莫斯科党组织活动时，就感到在短期内有许多任务要完成。三十年代早期和中期，在管理和建设我们苏维埃首都的工作中，我起了主导作用。我和同志们热情而忘我地工作，工作变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内容，我们不知道休息是怎么一回事。假日里，我们常常召开群众大会，或研究工作。我们工作时间很长，常常直到深夜。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的工作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我们大家都想活着看到列宁的话变为现实，即苏维埃政权建立10年后，将无敌于天下。不幸的是，而今许多这种理想和自我牺牲精神已从党内消逝了，今天极为流行的生活沾染了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东西。早在我协助管理莫斯科的时候，没有人敢想要一座乡间别墅，甚至连一闪念都是不允许的。我们毕竟都是共产党员，不论到哪里，都穿着便服，从来没有人衣冠楚楚。我们的制服不是一件敞领的军用衬衣，就是一件白色农民罩衫。在这方面，斯大林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卡冈诺维奇在担任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地区第一书记的同时，又是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这使他成了斯大林的副手。因此，他不得不把极大部分时间花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而莫斯科工作的大部分责任就落在我的肩上。因为我是市和地区党委的第二书记，这是需要我兢兢业业、发奋图强以及全神贯注地工

作，以勤奋来弥补经验不足。在莫斯科的党组织里，我和同志们相处融洽。显然，从区一级的干部提拔到莫斯科以后，我的工作表现充分证明，并没有辜负对我的信委和重托。

当然，也碰到了困难时刻。我记得发生在1932年的一件事。莫斯科人在挨饿。作为第二书记，我把大部分精力去想办法让市民——我们当时通常称为“工人阶级”吃饱。^①斯大林建议养兔子作食品，我完全支持他的计划，并热情地去执行他的指示。几乎所有大小工厂、车间都开始养兔子，以解决厨房急需的食物。后来，我们开始实行莫斯科周围的地下室和沟渠里种植蘑菇的计划。有些部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每个群众运动总会出现一些败类，有些工厂厂长不支持这一事业。当开始发放定量供应卡时，我们碰到了更多的麻烦。供应卡总是不够，一些诈骗事件就难免发生。供应卡的短缺诱惑了一些人，特别是那不坚定分子去钻法律的空子或者干脆去偷窃。劳动者与不劳动者的供应卡是有区别的，而即使在劳动者中间，供应的东西也不相同，这种规定也导致了种种混乱、营私舞弊甚至行窃等现象。

一天，卡冈诺维奇叫我去他那里，对我说：“你最好向政治局打个报告，汇报一下你们在杜绝非法获得供应卡方面采取了些什么措施。”

这一任务使我感到发愁。可以说，吓得有点发呆，因为要向享有最崇高威望的组织汇报工作，斯大林又在场，他将要作出对汇报的评价。

实际上，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自己从来不主持政治局会议，他常把这任务让给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最年长的

^① 当时莫斯科正经受着由集体化所造成的饥荒的后果。虽然最高政治领导人和军队强迫农民把农产品供应给城市工人，但仍供不应求。当时农民的状况在下一章描述。

朋友。他们早在革命前做地下工作时就相互认识了。莫洛托夫总作为斯大林最忠诚、最坚定的战友而得到提拔。据说，在1930年末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上，他被推荐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时，自己也作过这样的表示。我担任莫斯科地区 and 市党委书记以后，常去斯大林的办公室，几乎每次都看到莫洛托夫跟斯大林在一起。他们也经常一起去度假，在斯大林跟反对派进行斗争时，莫洛托夫成了他的得力助手。难怪，反对派称他为斯大林的一根大棒。斯大林利用莫洛托夫去打击政治局里任何反对他的成员。但在当时，莫洛托夫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意志坚定、善于独立思考的人。^①

我出席了政治局会议并作了汇报，列举了供应卡制度后所产生的种种弊端以及我们为消除这些现象而采取的全部措施，并宣称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斯大林说，“赫鲁晓夫同志，别自吹自擂了，还有许多小偷，许许多多，不要认为你们把他们抓得一干二净了！”

斯大林用慈父般的口吻说话，我并没有感到不安。他讲得很对，过去我自认为我们已经把供应卡的诈骗犯全抓起来了，而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斯大林深居克里姆林宫，连大门也不出，但一切都了如指掌，他或许知道尚有多少小偷没有服法。这一切使斯大林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更加高大了。

过了一些时候，我打听到列宁格勒来了一个代表团向政治局也汇报有关供应卡的问题，我很想听听列宁格勒人是怎样做的，因为我们之间在各方面开展竞赛，尤其是保密的项目。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是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第一书记，他把汇报供应卡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个书记，这个人有个拉脱维亚的名字。依我看，列宁格勒人的报告还是不错的，在经济建设方面他们取得

^① 见莫洛托夫自传

了进展，因此，他们才有可能减少了一些定量供应的项目。

列宁格勒人汇报结束后就休会，大家走出大厅来到隔壁的休息室，这里供应一些点心。当时全国在闹饥荒，像我这样身居高层的人生活也很简朴，适当地说，我们在家也常常吃不饱。因此，在克里姆林宫开会中间休息时，我们总饱餐一顿，有三明治、香肠、酸奶和甜茶。当其他人都涌向隔壁小餐厅时，我稍停了一会儿，等大厅后边的人都走光了再起身。无意中，我亲耳听到斯大林和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进行的激烈对话。基洛夫为代表团作的汇报说了一些好话，而斯大林却进行了反驳，并对作报告的那位书记讲了一些带侮辱性的话。^①我感到十分吃惊。在那些日子里，我把党风理想化了。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们党的领袖斯大林对一个党员竟采取如此不尊重的态度。在我看来，凡持有党证就是真正共产党人，他就是我的兄弟，实际上比兄弟还亲，因为，在崇高斗争中的共同信念像看不见的线一样，把我们紧紧地拴在一起。建设共产主义对我来说几乎是十分神圣的事业。假如用宗教信徒的话来说，每个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就是一个传道者，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随时准备贡献自己的一切。^②

我无意中听到的斯大林同基洛夫的对话，使我觉得斯大林同他平常行为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我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后，在非正式场合见到斯大林的机会就开始多起来了。我同布尔加宁时常被请到斯大林家里去吃便饭。布尔加宁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实际上就是市长）。斯

① 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基洛夫是很接近斯大林的，这里，我可以看到他独立思考的最早迹象，从而导致他被谋杀和清洗。

② 这话是有点在唱高调，尽管他们那样残酷无情，赫鲁晓夫之流当时确实认为他们在缔造一个新世界。

大林和娜杰日达·谢尔盖也芙娜总是我们的男女主人。娜杰日达的父母、阿里露夫妇也经常在大林家里，还有娜杰日达的兄弟夫妇、妹妹安娜和妹夫列坚斯都在场。列坚斯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地区办事处的负责人。斯大林总是让我和布尔加宁挨着他坐，吃饭时对我们照顾十分周到。他喜欢说，“唉，情况怎么样，父母官大人们？”

开始，对斯大林在饭桌上这样轻松的谈话，都有点奇怪。鉴于我对他十分崇拜，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跟他相处，总感到不习惯。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个非凡人物，却像我们一样有说有笑。不久，我开始不仅把他作为出众的政治领袖，而且完全作为了普通人而敬佩他。

有时，斯大林要同我们讨论有关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就派人把我和布尔加宁召到剧院同他会见。我们总是专心一致地听他说，然后尽一切办法贯彻执行他的指示。

一次，大约在党第17次代表大会前夕，我得到通知要我回个电话，从电话号码看，我立即认出这是斯大林家中的电话。斯大林亲自接了我的电话。

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听到一些传闻说莫斯科的公共厕所情况很糟，而你却顺其发展。显然，人们拚命找大小便的地方，但却哪儿也找不着。这种情况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让市民们生活很不舒服。有关这事，你跟布尔加宁谈一下，采取措施改善这种状况。”

斯大林提醒我们注意这件小事，似乎有点多此一举，然而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同布尔加宁就竭尽全力去工作，亲自到大楼和院子去检查。我们还让国民军（即穿制服的警察）一起行动起来协助我们。后来，斯大林又命令我们建造清洁、现代化的收费厕所，我们也照办了。我记得，有一次和各地区来的同志一起开会，新西伯利亚党的书记埃伊赫怀着典型的拉脱维亚人的

质朴感情问我，“赫鲁晓夫同志，难道人们在传说的是真的吗？你们莫斯科真的在忙着盖厕所吗？这真的是斯大林所指示的吗？”^①

我回答说，“是的，事情完全真实。我认为这表明我们对公民的关心。像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没有足够像样的厕所是不行的。”

这件事情看起来似乎是十分细小，却向世人说明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斯大林并非因太忙了，而自己不去过问像公共厕所那样重要的城市生活的事情。

1934年，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我一起从事建设莫斯科的工作，监督许多新大楼的建筑工程。我记得，一次，我们站在一起，视察在莫斯科苏维埃周围的建筑群。卡冈诺维奇指着马恩学院说，“那座奇形怪状的建筑是谁设计的？”

跟我们在一起的建筑师们紧张地向四周看了看，市总建筑师切尔内晓夫显得更加尴尬，他说，“那座建筑是我设计的。”卡冈诺维奇笑了笑，表示歉意，也改变了他的看法。事实上，马恩学院是一座既单调又低矮的灰色混凝土建筑物，看起来确实有点阴森森的。

这段时期内干得热火朝天，在短短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00项重要工程似乎在瞬间从平地拔起：轴承厂的建造，杜克斯第一航空工业厂的扩建，炼油、煤气和电力厂的设备安装，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开挖，莫斯科河上的桥梁的建造等等，以上仅举少数几个例子。总管这些巨大工程的责任全落在我的肩

^① 埃伊赫，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详细谈了关于埃伊赫在清洗运动中的遭遇。1933年4月，他被捕时，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严刑拷打下，他被迫在口供上签了名。但他否认了这份口供，向斯大林申诉，要求中央委员会对他的案件进行调查。1940年2月，他被枪决。

上，因为卡冈诺维奇成天忙着莫斯科市委之外的工作。

除了新建大楼以外，实现大城市最基本的公用设施现代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莫斯科的下水道系统早已陈旧不堪，城里根本没有自来水管干线。大部分街道是鹅卵石铺的，有的根本没有铺设过。城市运输大部分靠马拉车。回忆起这些情景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当时确实那么原始落后。

在建设莫斯科的过程中，我荣幸地建造了苏联第一条无轨电车路。我花费了很大力气去说服人们，使他们相信无轨电车是件好的交通工具。很多人反对采用这种交通工具。例如，我的已故朋友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利哈乔夫喜欢以内燃机作为动力的车子，竭力反对架设无轨电车线路。我甚至还遭到了斯大林本人的反对。等我们架设好电线准备试车时，我接到卡冈诺维奇的电话说，我们必须放弃这项工程。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央电报大楼前的斜坡上电车会翻车。但是，要放弃试车已为时太晚了。幸好，试车十分顺利。我们向斯大林报告说，因为无轨电车是以电作为动力的，它既噪音小又不污染空气。总之，这是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无轨电车无疑会把城市向前推进。斯大林支持了我的见解。但是，后来我们弄来了双层无轨电车，斯大林坚决反对使用，这也确是事实。他害怕这种车会翻车，我们也无法说服他去改变这种想法。但总的来说，斯大林支持了各种现代化的设施和先进技术。

当我们开始建造莫斯科地下铁道时，对这项工程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心里是十分模糊的。我们的知识太浅薄了。我们认为在地下造一条铁路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我想今天考虑进行宇宙飞行，比三十年代早期去设想建造莫斯科地下铁道或许要容易得多。

大家推荐，这项工程由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罗捷尔负责。他以莫斯科最优秀的建筑师而出名。他是德国血统的俄国人，曾

负责领导建造一项国家最雄伟的工程，即在哈尔科夫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建造政府大厦。

起初，我并没有去顾问地下铁道的事。后来，过了一些时间，卡冈诺维奇说，“工程进展得不怎么妙，鉴于你有在矿上工作的经验，还是你去管一下地下铁道的建设工程。我建议你放下市党委的工作，亲自下坑道去了解一下情况，布尔加宁跟你一块去。”卡冈诺维奇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当时，我仍然很尊重拉扎尔·莫伊塞耶维奇，他忠于党、忠于事业，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如通常所说的，做工作总难免会遭到一些批评，他从不松劲。但他固执己见是和他对党忠心耿耿是没有两样的。

我在坑道里呆了些时间后，对地铁工程的情况有了较清楚的了解。我认识到，建造地铁的工作跟我年轻时在矿井里的情景差不多。至于布尔加宁，他在工作中得了坐骨神经痛，长期卧床不起。因此，地铁工程的指挥全落在我的肩上。我开始定期向卡冈诺维奇汇报工程进展情况，强调技术人员不够，无法迅速、保质地去推进工程的建设。在我的竭力主张下，开始物色有经验的采矿工程师来负责坑道的建设工程。

就在同一时期，顿巴斯煤矿生产不景气。我们不能及时开采出足够的煤供全国不断增长的需要。莫洛托夫被派遣到顿巴斯去了解情况。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对矿业一窍不通。叶戈尔·特罗菲莫维奇·阿巴库莫夫是顿巴斯煤矿的负责人，早在1912年，我们在同一矿井工作过，是好友。国内战争后，我当了他的副手。他是个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公认为有丰富经验的煤矿工作者。莫洛托夫向政治局打了一个报告，建议解除阿巴库莫夫在顿巴斯的职务。卡冈诺维奇把我叫去，并通报了这一情况。

“你认识这个阿巴库莫夫吗？”

“是的，我很了解他。”

“如果让阿巴库在罗捷尔手下担任地铁工程的副总指挥，你

看怎么样？”

我说，“我们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了？他甚至可以担任出色的总指挥。”

卡冈诺维奇打断了我的话说：“我不问你这个，我已有罗捷尔任总指挥了。”

这样，阿巴库莫夫就调到我们这里。他的抵达使我工作轻松多了。我们既相互了解，又相互信任。我们立即着手招聘了一些有经验的采矿工程师。

一天，卡冈诺维奇问我，“假如任命你总管地铁工程建设，你的意见如何？”

“我不想干。”

“为什么不呢？你已显示出有建设地铁的能力和经验。坦率地说，我们早已把你当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总管了，假如我们正式公布一下，让你来抓这里的工作，对你来说，还不是一码事吗？”

我说，“假如这是你们的决定，那么我将尽一切去做，不会辜负对我的信任。我只请求解除市委书记的职务，我无法同时身兼两个职务。”

“噢，不，那样可不行。”

后来，我才了解，让我去总管地铁工程是斯大林的主意。虽然，卡冈诺维奇自己从来没有提及此事，但显然是斯大林指示他来试探我能否在莫斯科市委的工作以外，再把地铁的建设重担挑起来，鉴于我说无法身兼双职，这项建议也就不了了之。

实际上，虽在形式上我仍担任市委的工作，但我把80%的时间用在地铁工程上。我在莫斯科市委办公，来去都经过地下坑道。早上，在我住所附近下坑道，然后从靠近市委大楼的坑道口上来，连我自己也无法描述，一天下来，我简直是精疲力尽了。我尽量少睡一会儿，以便把全部时间投入事业。

一天，在工程计划处工作的一位年轻工程师来找我，提出了地铁建设的建议。他的名字叫马科夫斯基，我立刻就喜欢他。他思想敏锐、外表英俊，是我们社会主义时代新的一代专家。下面就是他所说的话：“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正采用所谓德国方法或叫开沟作业法来建造地铁，但这种方法不适合城市，我建议改用英国方法，也叫隧道作业法。我们必须把地铁往深一点建造，这样费用会大一些。但考虑到战争可能爆发，用钢筋水泥的框架和有支撑壁的隧道，就成了最好的防空洞。英国方法还有一条优点，我们用不着沿着主要交通干线去挖，可以在建筑物下面挖隧道。另一个问题是怎样使地铁乘客从坑道进出。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罗捷尔已指示我们安装升降电梯，这也是德国方法，我建议采用“自动扶梯”。坦白地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自动扶梯”这个字眼。我问他“自动扶梯”是什么玩艺儿，他解释给我听，我也尽力去理解他所说的，但听起来异常复杂。马科夫斯基在结束谈话时对我说，“请您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如你要的话，我可以写个报告，确切说明我的想法。然而，请不要告诉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已来看过您，因他妒忌心很重，又十分严厉。我未经他的允许前来向您提建议。要是我先向他提出，那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他非常固执己见，还未等我讲完建议，他早就全盘否定了。”

我说，“好吧！我同卡冈诺维奇谈一谈，然后再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你。”

我向卡冈诺维奇作了汇报，他三言两语作了回答：“你为什么不让马科夫斯基更详细谈谈他的自动扶梯？然后你会了解我们必须安装升降电梯而不装自动扶梯。自动扶梯我们得到英国或德国去订购，但即使是为了建造地铁，我们也舍不得把黄金储备到国外去花掉。”

我决定召开一次由马科夫斯基和罗捷尔一起参加的会议。我

打算把整个问题加以彻底解决。同时，还请了其他一些人参加。可以想像当时的场面，马科夫斯基年轻英俊，文质彬彬，而罗捷尔老态臃肿，紧锁双眉，双目怒视马科夫斯基，好像一条鳄鱼死盯一只小白兔。马科夫斯基显得十分紧张，但却十分沉着。他用充分论据说明，我们采用的方法已过时了，他建议用先进方法来取代。他例举英国说，皮卡得利车站是英国最好的车站，建在伦敦最繁华的地段，那个站建得很深，但没有采用升降电梯，而用的是自动扶梯。罗捷尔不断用蔑视的口吻来讽刺马科夫斯基，称他为不负责任、自高自大的青年人。但马科夫斯基讲得很讲道理。当我们向中央委员会汇报情况时，我支持了他的意见。罗捷尔非常顽固，执意要维护自己的观点。卡冈诺维奇也支持马科夫斯基，但对僵持局面感到为难，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把分歧意见向政治局汇报。罗捷尔会反对我们，或许斯大林会支持他。然而，我们只好这样做。

罗捷尔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汇报，接着就轮到我们发言，一场争论就此展开了。罗捷尔抓住一点说，“你们建议的方案花费太大了……”

但斯大林立即打断了他的话说，“罗捷尔同志，钱花多花少的问题，可由政府来决定。你的职责是让我们了解什么是技术上可行的，而不是财政上是否办得到。现在请告诉我们，这位年轻工程师马科夫斯基的建议在技术上是否可行？”

“是可行的，但花费太大了。”

“我刚对你说，罗捷尔同志，那由政府来决定。我们就干下去吧！采纳马科夫斯基同志深挖隧道的计划。”

我很高兴。斯大林显得很明智和勇敢。他考虑了民间防空这个长远的因素，因此他认为即使建造了隧道要多花费些钱，但也值得。的确如此，战争第一阶段，市指挥部就设在米亚斯尼茨基地铁车站，而隧道就成了防空洞。

1935年，莫斯科居民欢庆地铁第一期工程完工。许多人获得了政府的嘉奖，我被授予列宁勋章。这是我第一次得到这样高的荣誉。布尔加宁得了红星勋章。地铁以卡冈诺维奇的名字命名。在政治局委员中间，早就开展了一场“命名”竞赛，看以谁的名字命名的工厂、集体农庄和城市等等最多。在斯大林领导下，出现了这类令人悔恨的作法，而卡冈诺维奇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

第三章 恐怖笼罩的年代

第一节 农村集体化

众所周知的大恐怖不是1935年才开始的。使用恐怖原则来粉碎反政府势力，自1918年列宁正式采用以来，一直是布尔什维克统治的一个特征。集体化（1928—1933）就是把恐怖手段全面运用于农村。在这场混乱行动中究竟死了几百万人，无人知晓，也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许多年后，斯大林本人在与温斯顿丘吉尔的一次谈话中，把这一行动描绘成苏联所经历的危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里任何一次危机都大。1933年这场行动结束了，苏联的农业产量和牲畜总头数减少了一半以上。1941年德国入侵前夕，还没有恢复到1928年集体化前的水平。这节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赫鲁晓夫第一次承认“斯大林式的集体化给我们带来的除苦难外没有别的。”在近40年的漫长岁月里，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在内的苏联领导一直假惺惺地说，当时遭到布哈林等人激烈反对的集体化是必要的，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事实上，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其后果严重，长期来损害了苏联经济。

在我调到乌克兰的前一年，集体化就开始了，但是直到我在莫斯科工作以后，才开始怀疑集体化对农村居民所产生的真实影响，很多年以后，我才全面了解伴随斯大林所领导的集体化而来的饥荒和镇压的规模和声势。

我第一次隐约看到真实情况是在1930年，当时工业学院的基层党组织为了排挤我，派我去集体农庄出差。学院在萨马拉地区（后改称古比雪夫地区）办了一个斯大林集体农庄，我的任务就是把筹集来购买农具的钱送给农庄。学院的另一名学员萨沙（亚历山大）·斯多勃诺夫和我同行。他是来自乌拉尔的一个好同志。后来，他被投进了1937年的绞肉机。

我们在农庄只住了几天，看到那里的情景。我们简直是吓呆了。农庄庄员在活活饿死。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把带来的钱交给他们。农庄的职工多数是从楚瓦什族居民中抽调来的，我们只好通过翻译跟他们谈话。我们告诉他们这笔钱是专门用来买农具的。他们对我们说，对农具他们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要的是面包。可以说，他们向我们乞求给点食物。斯多勃诺夫和我被安置在一个老寡妇的茅草屋里。这个妇女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招待我们。她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出差带来的食品。

我从来没有想过，情况会那么糟。在工业学院，我们一直生活在《真理报》所大吹大擂的幻觉中，即所谓“集体化运动顺利开展，农村形势一片大好”。

接着，斯大林事先也不提醒一下就发表了有名的《胜利冲昏头脑》的讲话，把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都归咎于地方党组织里的党员积极分子。^①正是这些人曾以鲁莽和残忍的狂热去推行集体化运动，突然发现他们遭到了《真理报》的痛斥。当时，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讲话是一篇杰作，是党的领导对那些应对过火行为负责的人的迎头一击。^②但我记得，曾经也这样想

^① 这篇讲话发表在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坚持说，讲得十分清楚的指示被误解了。这是主子对佣人的指责，因为他们执行了他的命令。

^② “当时，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讲话是一篇杰作……”，但“我们”是谁呢？斯大林发表讲话，事先不给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打个招呼。事实上，中央委员会曾壮着胆表示抗议，反对有人要它充当斯大林的替罪羊。

过，假如像斯大林一向告诉我们的那样，集体农庄一切都很顺当，那末突然发表一篇《胜利冲昏头脑》的讲话，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对集体化问题的争论，引起了莫斯科党组织领导层的迅速调动，反对集体化运动的乌格兰诺夫被撤换，接替他的是鲍曼^①接着，鲍曼犯了过火行为的错误而被解职，由莫洛托夫接替，后莫洛托夫由卡冈诺维奇替换。就是在卡冈诺维奇负责领导莫斯科党组织的时候，有消息透露说集体农庄出了事，但我从未想到所说的事竟是指农民闹事，从莫斯科派人去把他们镇压下去。

我记得1932年我还在莫斯科市委工作的时候，卡冈诺维奇突然宣布，他得去克拉斯诺达尔出差一次。他离开莫斯科大约有一、两个星期，当时他并没有对我们讲明，到后来才明白，他是去平息库班哥萨克人的一次罢工——当时叫“破坏活动”——，这些人拒绝种地。卡冈诺维奇此行的结果是把整个哥萨克居民区集中起来，然后强行迁移到西伯利亚。

我的一位朋友叫维克利舍夫，担任莫斯科军区的政治部（即武装部队的“保安队”）主任。他告诉我在乌克兰到处发生罢工和破坏活动，不得不动员红军战士去甜菜地里除草。我听大吃一惊，我凭自己的农业经验心里很明白，甜菜是很娇嫩的，必须按时除草，且要十分细心。决不能指望红军战士去干这活，他们多数人从未见过甜菜，即使有人曾看见过，干起来也不在乎，怎么能把活干好呢？必然，当年甜菜一无所获。

后来，乌克兰发生了饥荒的消息就传开了。我简直无法相

^① 反对集体化运动，是“右派分子”，特别是布哈林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斗争。有讽刺意味的是，托洛茨基和“左派分子”曾首先主张集体化，并遭到了斯大林的反。1928年到1930年，莫斯科党组织的头目是莫洛托夫。到这时候，他升任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信。3年前，即1929我离开乌克兰，当时的生活已回升到战前水平，食品供应充足又便宜。而今听说那里人们在挨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直到许多年以后，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告诉我下面一件事，我才弄清楚三十年代初乌克兰的情况糟到怎样的地步。米高扬告诉我，当时的基辅地区党委第一书记杰姆钦科有一次到莫斯科来找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斯大林或政治局的任何一位成员知道不知道时下乌克兰在发生的情况？如果还不知道，我可以给提供一些。最近有一列火车开进基辅，满满装着饿死者的尸体，这列火车一直从波尔塔瓦开到基辅，沿线就收集了一车尸体。我想，最好有人把上述情况跟斯大林说一说。”

从上述事情中，你可以看到，党内已发展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象杰姆钦科这样的人，身为乌克兰党政治局委员，也不敢自己去见斯大林。我们已进入这样的时代，即一个人把持集体领导，别的人在他面前都会发抖。杰姆钦科决定把乌克兰的情况告诉米高扬，因为他知道米高扬是接近斯大林的，也许可以想一些办法。那时期，党的积极分子常把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米高扬三人称为高加索集团。我一向十分尊重米高扬。我们大家都会犯错误，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也有他的过失，但他是位诚实、明智、且十分能干的同志，对党和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肖洛霍夫在他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描写了集体化运动时的情景。肖洛霍夫撰写这本小说时，斯大林还活着，他只好按照斯大林式的解释来描写集体化运动。当集体化失败的事实公布于众的时候，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即应当把所发生的一切归咎于富农、右派、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等所策划的阴谋诡计。总有这样一个方便的答案，即都是反革命干的破坏活动。

现在，斯大林滥用职权既昭然若揭，就可以对集体化进行一番更彻底、更客观的分析，以便弄明白当时的真相。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直接死于集体化的人究竟有多少？或间接地因斯大林把集体化失败归罪于他们而去世的究竟有多少？但是，有两点是肯定的，其一，斯大林式的集体化给我们带来的只不过是苦难和暴行；其二，当时，斯大林在我国的领导阶层中是起决定作用的。李可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已被解除职务，托洛茨基已流亡国外。所以，如果我们要追究谁应负主要责任，我们完全可以把罪责放在斯大林本人的肩上。

但这一切都是事后诸葛亮。当时，我们不了解真实情况，仍然相信斯大林，并对他寄予信任。

第二节 大清洗运动

下面是苏联历史上一段最恐怖时期的有选择和被歪曲的纪实。跟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不一样，赫鲁晓夫并没有积极参与清洗的过火行动，只在1938年被派往乌克兰以后，做了该地区的大清洗的收尾工作，并重建了被破坏的党组织。但是，他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了解不少，他直接从残害年长一辈的同事的行动中得益不少。从他的叙述（如关于雅罗斯拉夫斯基事件）中可以看出，他同当时其他党的高级干部一样，自己也参加了这些卑鄙的活动，甚至在他到基辅前就这样干了。这一节应与秘密报告的一些段落作对照，那个报告讲到了一些无辜者被逮捕、拷问和处决，从被控罪行来看，这些人是完全无辜的，虽然在其他方面也多少有些问题。这段骇人听闻的叙述在西方人们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直到

“秘密报告”抛出后，这些可怕的事情才得到苏联官方的证实。但要记住，赫鲁晓夫并没有讲清楚屠杀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同时，他仅仅揭发了斯大林对党对军队所犯下的罪行，他却只字不提恐怖对成百万普通党员和不带政治色彩的平民老百姓所产生的影响。据最通常的估计，近百万党员被逮捕，非党居民被捕的人数至少是党员数的7倍。值得提一下的是，1937年前一直有明文规定禁止在审讯中对犯人进行严刑逼供（不同于一般无意的拳打脚踢和其他类似动作）。1937年初或1936年末，下了一道秘密指示，即可以使用刑讯。1939年这一作法最后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批准。（罗伯特·康奎斯特所著的《大恐怖》，是关于这些清洗的全过程作了无可比拟的、最好、最全面的研究，如要正确了解大清洗所及的范围，很需要读一下。叶夫格尼亚·斯·金兹布尔格写的《到旋风里面去》也许是最有暴露性的描述，说明在清洗中受害党员的具体情况。）

在客观而集中分析斯大林的消极面时，我必须讲一讲斯大林所开创的一种做法：无情地把一些党员戴上人民的敌人的帽子，然后经过审讯，并把他们消灭掉。我们的党至今仍留着清洗所造成的伤痕。斯大林反复给许多党员灌输的心理状态使许多人在意识上留下一种僵硬的习惯势力，特别是对思想迟钝、见识短浅的人更是如此。甚至在今天，你可以找到一些人，他们认为斯大林的方法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方法，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国家才能有所作为。我个人认为，说人们不会好好工作除非经常在他们头上挥舞鞭子，这只不过反映一种十分原始的、奴性十足的心理状态。如果你相信奴隶社会的心理学，即必须用强制手段才使人规规矩矩，否则他们就会反抗，那末你也许会同意这伙

人的想法，认为斯大林对苏联人民的压制是历史的必然。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更重要的，它违背了我们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即是人民创造了历史，而不是某一个强有力的个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们响应列宁令人信服并合理的领导而取得的，而不是在他鞭子的驱赶下取得的。人民紧跟列宁，因为他们信任他，而不是因为害怕他。列宁把人民的愿望集中统一起来，并加以提高。斯大林却用威吓手段强迫人民和党服从他。

整个事情是在1934年的一个傍晚开始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是卡冈诺维奇打来的电话。他说，“我在政治局里给你打电话，马上到这里来，事情十分紧急。”

我直奔克里姆林宫，卡冈诺维奇迎着我。他脸上表情惊恐万分。我立即警惕起来，准备应付不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这样思索着。

他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悲剧。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谋杀。详细情况我以后再对你说，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这件事。我们正在组织一个到列宁格勒去的代表团，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再加上从莫斯科党组织和莫斯科工人阶级中选派出60个人组成一个代表团，你将率领这个代表团，去那里参加守灵，然后护送基洛夫的遗体回莫斯科。”

“很好！”

我直接赶到莫斯科市委，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当晚就动身去列宁格勒。我并没有见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他们是另坐专列去的。我觉得列宁格勒全城都浸沉在哀悼的气氛中，虽然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感觉来描绘别人的心里状态。

对已经发生的一切，我们却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谋杀基洛夫的凶手是一个叫尼古拉耶夫的人。他因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这暗示托洛茨基分子是幕后的策划者。我们都真诚

地感到气愤和愤慨。①

我记不得我们在列宁格勒呆了多久，我想是两、三天。我们轮流站在灵柩旁守灵，列宁格勒人陆续到灵前同谢尔盖依·米罗诺维奇的遗体告别。我能看出卡冈诺维奇精神上震动很大，甚至有点魂不附体。至于其他领导人对基洛夫的死的感受如何，我也说不清。在斯大林守灵时，我曾作过仔细的观察。他有着极大的自我控制能力，他的表情绝对不会被人发觉。我甚至根本没有想过，除基洛夫的去世外，他的心里还在想些什么。

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我的一部分工作是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办事处的活动。这一办事处的负责人是列坚斯同志。②

①谢·米·基洛夫，在第二章已提到过，长期来是斯大林的忠诚的支持者。他接替季诺维也夫后成了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从而建立了他强有力的地位。在协助斯大林击败了反对派以后，他对执行报复性的迫害政策的必要性和可取性表示了异议，他尤其反对执行这项政策时需要涉及到杀人。在接近斯大林的人中间，只有他具有可以直率地讲出自己看法的足够力量，跟他有类似想法的人把他看作是斯大林以外的另一个领袖。他于1934年12月1日在列宁格勒办公室里被枪打死。凶手是个心怀不满的前布尔什维克党人，名叫尼古拉耶夫。他早被开除出党，不是因为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他是托洛茨基分子，而是因为他跟党的官僚机构发生了争吵。基洛夫受到了国葬的待遇，尊荣备至，斯大林也显得很伤感。但是，有许多人相信，这一谋杀案的幕后主使人就是斯大林本人，尼古拉耶夫肯定不是受反对派的指使而行事的。后来，在1938年，对被革了职的警察头子雅格达审讯时，他的一条罪状是因他给作案者方便。赫鲁晓夫自己在“秘密报告”中和随后的谈话中，曾暗示这一谋杀案可能是斯大林授意的，并允诺要为此进行充分的司法调查。即使做过这样的调查，但也从未听到过这方面的报告。正是基洛夫的被害，触发了那场大清洗，从列宁格勒开始，在历任的警察头子的主持下，一直扩大到了全国，把整个国家窒息在恐怖之中，使幸存者陷于恐怖、战栗的麻木状态。

②列坚斯是维持拉娜·阿里露也娃的姨夫。他在大清洗的年代里十分活跃，但1939年贝利亚主管内务人民委员部后，突然不见了。

他是斯大林的连襟，波兰族人。他是个好同志，1914年就加入了党。后来斯大林把他枪决了。我从列坚斯那里了解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在基洛夫被害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谋杀案发生前，“契卡”对人民很少采用行政手段。我这里所说的行政手段就是指逮捕和审讯。这种手段只在处理公开反苏性质的活动的案件时才采用。^①例如，我们在处理莫斯科的怠工或罢工事件时，总是到宿舍或工厂，向工人作解释，为了在生产上赶上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提高生产定额。那些从乡下招来的工人生活条件极差，肮脏不堪，臭虫、蟑螂到处都是，劣质的食物，缺衣少穿等等。当他们的集体合同的生产定额需要作有利于国家的整时，不免加深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向他们作解释，让他们了解有时要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一般情况下，工人是能够理解的，乐于继续工作下去，即使生产定额提高10%或15%，他们的工资仍然不动。如有几个人拒绝遵守必要的条件，就会公开受到党的指责。但是，我们几乎总是避免对他们采用行政手段。

基洛夫事件后，这一切突然全变了。列坚斯告诉我，他已接到“清洗”莫斯科的指示。毫无疑问，莫斯科需要一剂净化剂。这个城市充斥着许多要不得的人——游手好闲者、寄生者、投机倒把者——，都没有及时清除过。于是开列了一张应该赶出这个城市的人的名单。我不知道他们被遣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从

^①在基洛夫被害以前，早有许多人被捕，有的交付审讯，“反苏”活动涵义很广，然而党的统一团结曾是一个神圣的概念；一个党员仅仅因为同斯大林的正统主义有分歧或有过分歧，甚至只是很微小的分歧，就被认为犯了大罪，这种做法只在基洛夫被杀害后才在党内广为推行。

内务人民委员部是1934年7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1921年列宁建立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前身就是“契卡”（即肃反委员会），也是列宁设立的。

来不过问这件事。我们总是遵守这样的—个规定，如某件事你没有被告知，那就意味着与你无关。这是有关国家的事，你知道得越少越好。不管怎样，把犯罪分子从莫斯科赶出去，是基洛夫事件后开始镇压行动的第一阶段。^①

不久，政治恐怖就开始了，我只在偶尔意外情况下，看到—星半点的内幕活动情况。

在列宁格勒反对派分子进行审讯的时候，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离莫斯科去外地，总由卡冈诺维奇和谢尔·奥尔忠尼启则留下来代理。—次，我路过中央委员会办公处，去见卡冈诺维奇，谈谈有关市政方面的一些事。当卡冈诺维奇得知我等在外边，他立即叫我到他房间去。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和捷米扬·别德内依也在他房间里。他们在商讨关于反对派分子审讯和怎样报道这一审讯问题。为了实际上早已决定了的严厉判决制造舆论，—系列谴责反对派分子的文章正陆续发表。

当时情景，我记得十分清楚。谢尔哥和卡冈诺奇问捷米扬·别德内依，“捷米扬同志，你写好我们可用的诗歌了吗？”

“写好了，”捷米扬回答说，接着就把这首诗背诵—遍。

他背诵完后，房间里令人尴尬地沉寂了片刻。卡冈诺维奇首先发表意见，他说，“这同我们设想的不怎么相符，捷米扬同志。”心情急躁的谢尔哥不再转弯抹角地说了，他热情地激励捷米扬进一步努力。捷米扬·别德内依是个胖子，头顶全秃了。他的脑袋活象—口大铜锅。他用和善的眼光看看他们两人说道，

“我恐怕再也写不出更好的了。我已作了最大努力，我所能挤出来的就是这么—些。对这些反对派，我就是下不了手。我干不

^①事实上，基洛夫事件后开始的第一阶段镇压行动是发生于列宁格勒当地的一阵政治性的逮捕。赫鲁晓夫这里所说的莫斯科市内的“犯罪分子”实际上与此事并不相干。

了。对他们，我无能为力。”实际上，他用了更赤裸裸的、更带有男子汉气概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我不知道捷米扬写的作品是否已发表过。显然，他并不完全相信，那些反对派分子都有罪，正因为如此，他无法在诗歌里集中灵感和党性，来撕下他们的画皮。他就是肯定不了他们都是敌人。顺便提一句我的态度，很自然，我是跟卡冈诺维奇站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站在斯大林的一边。所以，那时我用不赞同的眼光看看捷米扬。而现在，我理解了捷米扬为什么持怀疑态度。^①

在卡冈诺维奇办公室亲眼目睹了上述情景后不久，一场野蛮地把党的精华践踏以尽的暴烈行动发生了。我们党和国家许多原来的领导人被消灭了。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李可夫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等这些人还在什么地方呢？列宁逝世时当权的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被清洗光了。就拿作为反对派领袖而被清除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例。在革命时期，他们犯过一些错误，这是众所共知的。但大家也知道另外一些情况。在他们认识错误以后，列宁亲自把他们吸收到领导层从事工作。在列宁的身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党曾作过有价值的指导。政府从列宁格勒迁到莫斯科以后，季诺维也夫留在列宁格勒工作。他接受了重托，管理我们的原首都、最革命的城市，它高举着十月革命暴动的旗帜。莫斯科曾托付给加米涅夫。而今，这些人却当作罪犯被带上了被告席，很快就以人民敌人的罪名而被消灭掉。

斯大林的党内清洗，从1936年的以反对派分子为目标，到19

^①捷米扬·别德依内是个蹩脚的雇佣诗人，当时也许产生过疑虑，但很快就改变过来了，写了一系列令人厌恶的“诗歌”来糟蹋那些被告者，（包括后来红军遭清洗时的一些主要受害者）并要求采用野蛮手段惩处这些人。

38年以右派分子为目标，当时，李可夫、布哈林以及党和人民其他的领袖接受审讯。这些人被称为领袖，是完全够格的。以李可夫为例，列宁逝世后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党的心目中，他是个有丰功伟绩的人，是苏维埃政权可尊敬的代表人物。然而，他却被枪决了。至于布哈林，列宁曾称他为“我们的布哈尔奇克”，他的《共产主义ABC》是整个老一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入门书。他也被审讯和处决了。①

①这里把事态发展列一下大事记：

1935年，正当清洗势头逐渐加强的时候，斯大林准备第一次公审，即赫鲁晓夫在这里提到的对列宁格勒反对派分子的审讯。他的工具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目G·G·雅格达，他最早建立了苏联强迫劳动的制度。这次公审是在1936年8月举行的，正式称为“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集团核心分子的审讯”，结果是列宁的亲密同事G·E·季诺维也夫和L·B加米涅夫连同其他14人被枪决了。

紧急着，雅格达因干劲不足而被撤职，由叶若夫接替。叶若夫是个病态的人物，矮个儿，曾和赫鲁晓夫一起在莫斯科市委工作过。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清洗无节制地开展起来，遍及了全国。第二次公审由叶若夫筹备，于1937年1月举行，叫做对托洛茨基反苏集团的审讯，赫鲁晓夫几乎没有提及这次审讯。主要受害者有：G·L皮达可夫，一个由列宁提拔培植起来的人，在前不久对季诺维也夫判死刑时，就受了压力；G·索科里尼科夫，列宁的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K·拉迪克，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其他14人。

第三次叛逆案的审讯，也是场面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38年3月，也是由叶若夫准备的。这次叫做右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反苏集团案。这次被指控的共21人，为首的有布哈林本人，曾继列宁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叶若夫之前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雅格达。

在这些审讯中，被告都被指控为阴谋杀害斯大林。是外国情报机关的特务，还有其他一些罪名。

1937年夏季，即在1937年和1938年两次公审之间，红军高级将领中的

一些杰出人物，其中为首的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都遭到秘密审讯和处决，这一行动导致了全部军官阶层中约一半被悄悄地清洗掉了。

清洗疯狂地持续到1938年底，这时轮到叶若夫自己被清洗了。接替他的是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他原是格鲁吉亚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接任后第一项任务是清洗那些原来的清洗者（顺便可以报一下私仇）。大批受害者，包括许多身居高位的、最热心的斯大林分子，曾积极参加了早期的清洗活动，遭到了逮捕、严刑拷打，既不受审讯也不公开，就被枪决了，他们只是突然不见踪影。在整个血淋淋的清洗时期，赫鲁晓夫一直担任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人，到1938年1月，他才离开莫斯科去统治乌克兰，他是叶若夫最得势的时候当选为政治局成员的。

在这段时期里，党组织开始失去了它的威信，屈从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我记得在1937年莫斯科党代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提名为莫斯科市委和地区委员会的候选人都必须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和“认可”。不论是中央委员会或整个党都无权提拔自己的成员。评价任何党员的工作，决定他是否能当选为党的高级职务，都只有内务人民委员部说了算。我们已习惯于这样的信念，这种作法有助于地方党组织揭露钻进党内的敌人。我特别记得在1937年莫斯科党代会上发生的一件事。有一个从伏龙芝军事科学院来的委员，莫斯科党委认为他是个好党员和好同志。当提名把他列入候选人名单时，与会代表都热烈鼓掌表示赞同。他们以雷鸣般的掌声来欢呼对他的提名。突然，我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到一封公函说：“竭尽全力把那个人从候选人名单中拉下来。他是不能信任的。他与人民的敌人有牵连，将被逮捕”。我们服从了，并撤掉了他的提名，但对所有代表来说，心情都很沉痛。就在第二天晚上，那个委员就遭逮捕了。

叶麦尔扬·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情况也极相似。^①他是个老布

^①叶·雅罗斯拉夫斯基曾任“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的领导人·臭名远扬。这个同盟是布尔什维克用来攻击宗教的一个先锋组织。

尔什维克党员，在党内十分受人尊敬。他是中央监督委员会的党委书记，从党内立场看他无可非议的，他被提名为莫斯科地区党委委员的候选人。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要求把雅罗斯拉夫斯基从候选人名单中除掉，这项命令对我个人来说感到十分为难，但我只好服从。我传话给地区党委的其他几位书记，以便在代表中掀起一个反对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宣传运动，同时又不要让他本人知道，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尽管我们进行了积极活动，他还是以微弱多数当选，大约是仅多一票。大会以后，我所十分敬重的泽姆利亚奇卡同志甚至为此写了一封信给中央委员会，指责我身为莫斯科市委书记，不该在大会期间对雅罗斯拉夫斯基表现得如此不尊重。当然，那时候，我也无法向她讲明我这是奉命行事。自然，她的信也就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这些事情都说明一点，鉴于党在人事上的提升或调动都必须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令行事，党就失去了它的领导作用。多么可耻啊！①

我同政治恐怖中许多受害者都有过个人交往。有的我早在顿巴斯的时候就认识了。以伊凡·达拉索维奇·基里尔金为例，他在1925年到1926年任鲁钦科夫矿的经理，后任马卡也夫金属制品厂厂长，工作得很出色。还有一个叫瓦西里·巴祖林，他领导尤素夫卡附近的一家工厂，很有成绩。这两人在1937年都丧命了，从地面消失了，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谁也无法告诉我，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有多少工厂厂长和工程师象这样地死去。在那些日子里，要除掉一个你所不喜欢的人那是轻而易举的。你只需打一个报告，指责这人是人民的敌人，地方党组织浏

①为了实际需要，到了1937年，原来的布尔什维克党早已被彻底破坏了，剩下的就只有斯大林、他的现任警察头子以及他最亲密的同事，其中也包括赫鲁晓夫本人。

览一下你的报告，义愤填膺地捶一下胸脯，就把此人干掉了。

我还认识特列瓦斯。^① 在二十年代，他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杰出人物而出名，他聪明、能干，也很正派。我是通过莫斯科党组织认识他的，特列瓦斯和我一起在鲍曼区工作了6个月。有一次，卡冈诺维奇把我拉到一边并提醒我说，特列瓦斯政治历史上有污点。显然，他曾是所谓“青年团93人”中的一员，这93人曾签署过支持托洛茨基的声明。他的结局很悲惨。当斯大林建议地区党委书记应到“契卡”的监狱里去巡视一番。在巡视中，我看到了特列瓦斯在牢房里。1937年大屠杀开始时，他也没有逃脱被杀的厄运。

有时，你在无线电广播中听到洛莫夫的名字，说列宁怎样指示洛莫夫去做某一件事。这个洛莫夫到哪里去了呢？我很了解他。国内战争结束后，当我在顿巴斯工作的时候，我常常见到他。那时，他负责管理乌克兰的煤炭生产，我常常到他哈尔科夫的办公室里去找他。他从事党的工作早在革命前处于地下时就开始了，因此在党内十分受到尊敬。但你仍想了解，这个洛莫夫现在在哪里呢？回答是：已被枪决，莫洛夫再也不存在了。^②

在那阵到处疯狂抓人的动乱中，甚至连最亲近斯大林的人也难免不遭波及。就拿奥尔忠尼启则的厄运来说吧！^③ 谢尔哥同志，我们常这样称呼他，是群众中威望很高的人，在全党深受尊

①基里尔金、巴楚林和特列瓦斯都是些不重要的人物，他们同成千上万象他们那样的人一起遭到了被害的厄运。

②G·I·洛莫夫（真名叫波奥科夫）是苏联人民委员会的监察委员会的成员，他是根据莫洛托夫的命令被逮捕和枪决的。

③“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一直很接近斯大林，不同意斯大林的过火行为，因而与他的主子发生争吵。紧接着，他就死去，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死去的，至今仍是一个迷。他不是正式被处决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说，他是被迫自杀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敬。多年来，这3个高加索人——斯大林、米高扬、谢尔哥——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即使斯大林和谢尔哥都是格鲁吉亚人，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却完全不同。尽管他心情暴躁，谢尔哥是一个具有豪侠性格的人，特别平易近人、仁慈、富有正义感，因而深受人们的敬重。谢尔哥并不赞同当时在党内进行的残杀。例如，我记得，他对洛米纳泽寄予很大的尊敬和同情。^①一次，他甚至打电话到莫斯科党委来找我，带着很重的格鲁吉亚口音问我可否给洛米纳泽说个情。我告诉他，鉴于洛米纳泽是个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党有充分理由对他进行谴责，因此我对他提出的要求无能为力。谢尔哥要我尽一切可能设法让洛米纳泽平安无事。然而，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也都无济于事，洛米纳泽还是继续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而遭逮捕。最后，谢尔哥实在忍受不了了。1937年初，他开枪自杀。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得知他死的真相。斯大林很巧妙地把事情掩盖起来了。我从阿别尔·索弗列努启则那里第一次听到关于谢尔哥去世的消息。那天，我休息，诺维奇·叶叶努启则打电话给我说，“赫鲁晓夫同志，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急事。”^②

我直奔克里姆林宫，便问道，“阿别尔·索弗列努启则，发生了什么事了？”

“谢尔哥死了。”

“什么？我刚才还看到过他。”

^①V·V·洛米纳泽是斯大林的一个早期拥护者，比其他多数人具有更多的独立见解。在第一次和第三次公开审讯中，他都被戴上了“共谋者”的帽子。

^②A、S叶努启则也是格鲁吉亚人和斯大林的拥护者，跟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一样，也反对斯大林愈演愈烈的残暴行为。在1935年，他就被撤职，并剥夺了公民权利，因此很难设想会发生赫鲁晓夫在这里提到的关于谢尔哥之死的一段对话。

“他死得很突然。你还不知道他有病。政府已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来料理后事，你已被指名参加这个委员会。”

举行了一个合乎他身分的庄重的国葬，一切都很顺利。在列宁墓前举行的仪式上，我代表莫斯科委员会致了悼词。我真诚对谢尔哥表示哀悼。他一向对我十分友好。我从他慈父般的保护中得益不少。

直到在这次战争中我才发现他原来是自杀的。那是在一次晚餐席上，我同斯大林以及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刚巧话题转到谢尔哥身上，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谢尔哥，是个真正的人材。他死得那样年轻，真可惜。多大的损失啊！”

接着，一片令人尴尬的寂静。我觉察到我一定说错了。饭后，在离去的时候，我问马林科夫，“刚才我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话？”

“你难道不知道？”

“不知道。”

“难道你认为谢尔哥是普普通通地病死的吗？你不知道他是用枪把自己打死的？斯大林不会宽恕他的行为。你瞧，当你提到谢尔哥的时候，场面多尴尬。你真大意。”

当然，当谢尔哥死的时候，马林科夫也并不知道是自杀。他还没有像我那样接近斯大林。他只是间接地得到关于这件事情的内幕。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同谢尔哥是十分亲密的。在斯大林死后，他告诉我，他就在谢尔哥自杀的前一天晚上同他谈过一次话。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们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周围散步。谢尔哥告诉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说，他活不下去了。他说不能容忍斯大林对党的所作所为，他也没有力量跟这种现象作斗争了。第二天，即星期日，他开枪把自己打死了。谢尔哥同志真是一个非常可敬的人。

谢尔哥去世不久，斯大林就开始打击红军中的老前辈。我无法一一列举被害的将领，但在这里略提几个。

图哈切夫斯基的被捕犹如晴天霹雳。他是我们杰出的副国防人民委员。他26岁就在国内战争中负责指挥西线。列宁把喀琅斯塔特战斗以及抗击安东诺夫和高尔察克战斗都托付给他。当图哈切夫斯基被处决时，在国内战争中同他有过关系的某些人中间流传不少流言蜚语，这些人还够不上他的膝盖，更不要说望其项背了。他们开始在死人身上发泄私愤，把国内战争他们自己的失败都归罪于他。然而，专家们认为，那些失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图哈切夫斯基在司令部里的职位还不够高。而事实仍然是，列宁曾把国家存亡有关的许多关键性的战斗托付给了他。

我对图哈切夫斯基有一点了解。我任莫斯科市委和地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时，常跟他见面。我们在电话里交谈，在会议上也经常碰面。他间或带我到野外去，给我看一些新式武器或新的工程设施。对军事上的各种创新，他不仅很内行，而且予以十分重视。我完全相信，如果他没有被处决，当希特勒进攻时，我们的军队的训练和装备，都会要好得多。

还有加马尔尼克。他是红军政治部主任。因此他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又是一名优秀军人。在创建红军的过程中，他起了显著的作用。有人会说加马尔尼克并不是被处决的。不错，他是自己用枪打死的。他预感到将要被逮捕了，所以当他们来敲房门时，他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刽子手已来到，准备把他拉赴刑场，但他决定还是用自己的手来结束生命为好。加马尔尼是位很可敬的人。

受害者当中还有叶戈罗夫^①和雅基尔。^②叶戈罗夫是我们最

^①A·叶戈罗夫元帅被逮捕和处决是在红军清洗的后期，他接替图哈切夫斯基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时间很短。

^②雅基尔将军是基辅军区司令，历史学家彼得·雅基尔的父亲，彼得是今天持不同政见的苏联知识分子领袖。

伟大的军事领袖之一，在国内战争中他是我们的南线司令。雅基尔将军比较年轻，没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他的军事生涯是国内战争中开始的，当时他参加一支新编的队伍。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只能用手头搞到的一点武器来武装自己。但是，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我们对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恨和对新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献身精神，为此我们进行着国内战争。雅基尔的队伍发展成了一个师，他担任了师长。他和他的队伍在南方与红军被割断了联系，但他设法冲出了包围，带着他的师一直冲破白卫军的防线，重新与主力部队会合。国内战争后，雅基尔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指挥部队。突然，他遭到逮捕，并被处决。埃杰曼也遭同样命运。埃杰曼既是军人又是诗人，是我们杰出的军事领袖之一。^①

现在谈一谈勃柳赫尔^②。报纸上经常提到勃柳赫尔：勃柳赫尔荣获一级红旗勋章，勃柳赫尔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勃柳赫尔，勃柳赫尔，勃柳赫尔。他是无产阶级，工人，管道工出身。他自学成才，成了军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取得了最初的经验，后来在国内战争中，他已指挥兵团了。后来，他被派到中国任蒋介石的顾问。他还担任过还东军区的司令。我们信任他，不仅把他看作军事领袖，同时也看作一个政治人物。因此，当我们在抗击希特勒的战争中真正需要他的时候，勃柳赫尔到哪里去了？他早已死了。但是怎样死的呢？是一般地病死的吗？不，他是被处决的。他是作为人民的敌人被逮捕和处决的。

现在，他们正为勃柳赫尔树立纪念碑，这是应该的。但纪念

①R、p·埃杰曼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任军司令员，他被逮捕和处决时，任民防组织的负责人。

②勃柳赫尔元帅是远东部队的司令员，在红军将领中，他是最有才华的一个。1938年8月，他被逮捕，由贝利亚亲自审讯，而贝利亚那时刚接替叶若夫的职务。

碑应该把关于他的真实情况都说出来。那些不愿把真相讲出来的人应该感到羞愧。为勃柳赫尔建造纪念碑都应让人民知道，夺去他的生命使得我们对德作战中失去了他的天才，而且他的死不是一般的病死。不，勃柳赫尔是死在列宁曾说过“此人不该信”的人的手里。

近年来，我多次看了影片《铁流》，每次都深受感动。《铁流》也是一本书。这是我所谈过的第一本关于国内战争的书。它的作者是我们的天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现在，它已搬上了银幕。每当我看这部影片时，我总是这样想：“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塔曼军的将军？在电影里和书中，他叫科茹赫，但他的真名是科夫丘赫。^①正是他，在冲破白卫分子的包围，带领塔曼军穿过敌军阵线时，表现出这样的有才华、技巧和勇敢。凡是看到过这位将军作战的人都不能不表示钦佩。你也许会这样问：“这个科茹赫—科夫丘赫现在哪里？他的遭遇如何？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他干什么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科夫丘赫早不在人世了。他已跟人民的敌人一起，遭到逮捕和被枪决了。”

我本人同伊凡·纳乌莫维奇·杜鲍沃伊是很亲近的。^②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顿河边上的一个矿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军官学校毕业。当国内战争爆发时，他被任命为那尔斯为师长的那个师里的副师长。后来，在乌克兰共产党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常见到杜鲍沃伊。1928—29年期间，我跟他特别亲密，当时我主管基辅地区党委组织部的工作。杜鲍沃伊负责指挥基辅军区。我常常跟他出去视察军队。我为红军里有像他那样的指挥官而感到高兴，他们都完全彻底忠于革命、忠于苏维埃

^①科夫丘赫将军是军团司令员，1938年7月，被枪决。

^②伊·纳·杜鲍沃伊是另一个军的司令员，1938年7月被枪决。

政权、忠于社会主义。

当人民敌人被揭露时，斯大林把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及其他人的罪证材料在政治局内分发。在这些材料中有一份是伊凡·纳乌莫维奇·杜鲍沃伊亲笔供词。他写道，在国内战争中，他杀害了他的指挥官邵尔斯。下面就是他在供词里所写的：

“邵尔斯和我卧在地上注视着战斗。突然，敌人的一个机枪手向我们开火，子弹散落在我们的周围。邵尔斯就在我前面。他转过头来说，‘瓦尼亚，瓦尼亚，白卫分子倒有一个好机枪手。你看他向我们打得多准啊！’过了一会儿，他又转过来，并说了一些别的事情。就在当时当地，我把他杀了，以便取代他，当个师长。”

你们可以想像，当第一次谈这份供词的时候，我感到多么的厌恶。我一向敬重杜鲍沃伊，突然发现他竟干过那样卑鄙的勾当。我责备自己：我怎么这样糊涂？为什么早不发现杜鲍沃伊是谋杀邵尔斯的凶手呢？

但在1956年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时，我们翻开档案，对那些被宣判为人民敌人而遭枪决或绞刑的人的案卷进行审查，我发现杜鲍沃伊的供词是捏造的，我第二次受了骗。第一次受骗是，我曾以为杜鲍沃伊是个诚实的人而尊敬他，后来他承认谋杀邵尔斯的供词把我对他的信任全破灭了。这次再次受骗，骗我的正是谋杀杜鲍沃伊的凶手，斯大林本人。

在三十年代末，希特勒正准备进攻，千方百计来削弱我们的军事领导。我们却把自己的行政管理人员、党的领导和科技知识界的精华加以破坏，从而帮了希特勒的大忙。这场流血清洗在1937年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1937年是我们头一年没有完成工业计划，这决非偶然。在客观分析大战的最初阶段的情况时，这一切因素都应考虑进去。但是，许多年来，没有人揭开掩盖这些事实的盖子。军队里老的一辈被消灭，长期来被认为是一项功绩，而

不是其负责人应受惩处的罪行。谁为这一罪行付出了代价？是军队，是人民，是国家，为它付出了代价。

只要把第一批遭斯大林杀害的军、党、政和外交等方面的重要领导人开列一个名单，也用不着再加入别的内容，就可以汇编成一本书。这些人都是列宁培育的，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然而，当斯大林把他的专断统治强加于党的时候，这些人就是首先被干掉了。

死在斯大林手里的大部分将军的冤案都已昭雪。他们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被恢复了名誉。但是，最近一个时期内，有关他们的许多事情不讲了。所有被害的人不但冤案应该昭雪，而且应该作为烈士向人民介绍，他们是在斯大林借口反对人民公敌而实施的恐怖下牺牲的烈士。

为什么斯大林犯了这些罪行呢？他受骗了吗？如果他是受骗上当，那受了谁的骗？为了这一骗局，我们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人的性命的代价？

第三节 贝利亚青云直上

在这一节里，赫鲁晓夫从1938年初，即他调任到乌克兰的早期讲起，回头讲一些大清洗时期莫斯科的情况，然后又接着去讲基辅。赫鲁晓夫被任命为乌克兰第一书记时，或许认为乌克兰的清洗早已结束。很自然，赫鲁晓夫自己也喜欢在回忆中这样看问题。但实际上，他在基辅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他自己主持的一次清洗。到1938年夏季，一年前86个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只剩下33个幸存者。赫鲁晓夫按照自己的心意建立起一个新的党的机器，一个新政府。在1938年5

月，他公开宣称：“我保证尽一切努力把乌克兰土地上所有法西斯特务、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所有可鄙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统统抓起来，加以消灭之。”同年季夏，乌克兰党组织通过了下一段颂词：“只有在联共中央派了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到乌克兰来领导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之后，才开始行动起来，无情地彻底铲除了人民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其他一切特务垃圾等。”这是十分夸大的说法。但在那时候，这也正是赫鲁晓夫所乐于接受的。必须记住，他对斯大林的严厉责难的时候，特别提到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的晋升时对斯大林的责难，贝利亚是格鲁吉亚臭名远扬的警察头子，在斯大林身边玩弄权术多年。

1938年初斯大林让我任职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说，科西奥工作干得不好。我前往基辅，并接替了科西奥。^①他被调回莫斯科，在莫洛托夫手下，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大约一年以后，提出了要我当莫洛托夫的副手的问题。莫洛托夫自己首先向我谈到了这一可能性，然后一次我去莫斯科商讨问题，斯大林把我拉到一边说，“莫洛托夫坚持要你当他的副手。我想应

^①S·V·科西奥自1928年以来，一直担任乌克兰党的第一书记，是个斯大林主义者，同其他许多乌克兰的领导人一样，没有不沾染上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对莫斯科的绝对统治感到气愤并试图抵抗，其中一次想把大清洗搞得稍缓和一些的图谋也因失败而告终。1937年，跟他持相同观点的第二书记波斯图舍夫被逮捕。1938年初，他自己被解除第一书记的职务，调回莫斯科，成了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的第一助理。但不久，他就被捕入狱，遭到了严刑拷打（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是这样说的），1939年2月，他被判处绝刑枪决。

照他的意见办。你看怎么样？”我强烈反对，因为我刚在基辅安顿了下来。那里人民已接受了我，我正着手建立起坚强的乌克兰党组织。十分重要的是，显然战争正在临近，如在这么晚的时间里，调一名新手来乌克兰，一旦战争爆发，他会出乱子的。我说服了斯大林，让他相信我刚在那里站住了脚又从基辅调出来，这样对事业不利。在莫斯科要找一个人当莫洛托夫的副手，那是很容易的事。斯大林表示同意说：“这件事就讨论到此，赫鲁晓夫留在乌克兰”。^①

有时，如果你坚持表示反对斯大林的意见，又如果他被说服，承认你是对的，他会收回他的想法而接受你的。当然，这种灵活性和合理性是一个人的美德。但是，不幸的是，他表现出的这类美德是少得屈指可数的。多数情况下是正相反，假如斯大林决定你该做什么，那怕是明智的或愚蠢的，有利的或有害的，他一定要你照办，于是你只好遵命。

不管怎样，那就是我得以在乌克兰呆下去的一段经历。

但是，在叙述我在乌克兰任党第一书记的那些年月的情况以前，我该讲一下莫斯科的一些重要事态的发展，那是从我调到基辅以前就开始，到我调离以后还在继续发展。我特别要说一说拉甫连季·贝利亚在党内权势扩张的过程。

为了分析贝利亚是怎样和为什么窃据在党内有这样权势的地位，我必须追溯到大清洗的大屠杀正处在高潮的那个时期。图哈切夫斯基集团被揭露前6个月，斯大林就已宣称内务人民委员雅格达不称职，应该予以撤换。当时，我们仍然对斯大林抱有绝对信任。我们责备自己看不到在我们周围的敌人，认为我们缺乏像斯大林那样对政治斗争的深刻理解，因此不能像他那样去辨别混在我们中间的敌人。

^①关于要赫鲁晓夫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说法是新的、

斯大林任命叶若夫去接替雅格达。^①叶若夫原负责中央委员会人事方面的工作。马林科夫原是他的副手。叶若夫调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后，他接替了中央委员会的职务。但是，叶若夫仍是马林科夫的上级。这说明了党中央的人事管理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制约。

我一向喜欢雅格达。我个人看不出他的行为中有反党的成份。我不理解斯大林为要撤换雅格达所公开提出的理由，更不明白他的内在动机。另一方面，我肯定对叶若夫也无反对的意见。^②他勤奋可靠。我知道他在彼得格勒当过工人，1918年就入党了，这在他资历上增加了有利因素。我当选为工业学院党组织的书记以后，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因为学院是属于中央委员会人事部管辖的。人事部常指示我动员学员去从事某项工程或某一政治运动。我经常向叶若夫汇报工作的进展情况和现状。

1936年叶若夫主持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以后，镇压行动就更为厉害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大屠杀开始了，成批的人被输入了“绞肉机”。

过了一些时候，斯大林说叶若夫需要有人协助，应派给他一名副手。他问叶若夫谁比较合适，叶若夫建议马林科夫，因为马林科夫以前一直是他在党中央人事部时的副手。我相信进行了这

^①这里指的是1936年9月25日的那份出名的电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在黑海边的索契度假，联名打电报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政治局其他委员”，指示他们撤换雅格达，由叶若夫接替，因为秘密警察“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工作“落后了4年”。这标志着恐怖将进一步加剧。

^②挺有意思的是，赫鲁晓夫似乎认为，相继充当警察头子的每一个人都是友善和诚实的。雅格达之所以出名，除了他负责经办第一次叛国案的大公审（审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人）以外，他首创了组织强迫劳动制度，并用于白海运河的工程。

样的谈话有好几次，但问题一直未最终决定。直到一天斯大林说，“不，还是这样办比较好，我们不把马林科夫派给你，让他继续留在党中央书记处。”^①

最后，斯大林向叶若夫建议，派贝利亚当他的副手。这时候，斯大林对叶若夫的不满已十分明显了。在游行队伍中抬着画有装甲手套的牌子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斯大林不再把叶若夫称为“我们的装甲拳头”和“我们的黑莓”（叶若夫名字的双关语）了。

当斯大林任命贝利亚为叶若夫的副手时，叶若夫就要被撤职的形势已十分明朗。叶若夫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快完蛋了。他的事业已经了结，也许他甚至意识到他的末日正在临近。他对斯大林说，“贝利亚同志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可敬重的人。事实上，他不仅能当一个副职，也许可能担任正职的人民委员。”

“我不信这一点”，他说，“但他可当一名优秀的副手。”

就这样，贝利亚被正式确定为叶若夫的副职。^②我跟贝利亚的关系不错，散会后，我去见他，半正经半开玩笑地祝贺他接任新职。

“我不接受你的祝贺，”他说。

“为什么不接受？”

“你不同意去担任莫洛托夫的副手，因此他们派我去当叶若夫的副手，为什么我该感到高兴呢？我还不如留在格鲁吉亚好一些。”

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贝利亚可能是真心的。不论怎

^①把马林科夫和叶若夫联在一起是有意的，目的在于丑化马林科夫。事实上，这两人关系十分亲密。在中央委员会人事部的马林科夫把他的一些党员同志交给叶若夫，然后加以清算掉。

^②贝利亚被任命为叶若夫的副职，是在1938年7月。

样，他还是从格鲁吉亚调到了莫斯科的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起初，他的活动看来十分出色。当我赴莫斯科时，贝利亚常对我说，“这里发生了什麼啦？我们正在四处抓人和关押人，甚至包括一些地区党委书记。整个运动发展得过头了，我们必须及早加以制止，免得无法挽救。”

在此同时，叶若夫的地位也越来越不稳定了。有关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乌斯品斯基事件的发生，预示着叶若夫的下台。^①一天，斯大林打长途电话到基辅找我，他说，有确凿证据说明乌斯品斯基是有罪的。你们能不能想法把他逮捕起来？”

当然行嘞，如果这就是你的指示。”

“那么就把他逮捕。”起初，在电话里听起来斯大林说的是乌森科，不是乌斯品斯基。在基辅，有个叫乌森科的，是共青团的一名工作人员，碰巧也有控告他的罪行的证据。但当斯大林开始读及案情的细节时，我就发现他读的是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乌斯品斯基。我挂上电话不久，斯大林又来电话说，“我刚才跟你讲的关于乌斯品斯基的事，就把它忘了吧！现在没有要你做的事了。我们自己来处理。我们将把他召回莫斯科，在路上把他逮起来。”

我原已打算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走一趟。在乌斯品斯基被召回莫斯科前，我就离开基辅了。我预感到，他不会真的去莫

^①A·I·乌斯品斯基是叶若夫的人，当时是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目，在赫鲁晓夫亲自主持下执行乌克兰境内的清洗工作。1938年6月乌斯品斯基宣称：“我把自己当作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的学生。”他还说，“只有在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到达乌克兰以后，粉碎人民公敌的工作才实实在在地展开了。”讲这番话之后不到几个星期，乌斯品斯基就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因此，赫鲁晓夫关于乌斯品斯基的叙述是一条新闻。1938年12月，贝利亚最终接受了叶若夫的职务。

斯科。他一定已猜到为什么要叫他回去，并意识到有被捕的危险。因此，当我离开基辅时，我告诉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科罗特钦科，^①“我不在时，要对乌斯品斯基多加小心。”

第二天早上，当抵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时，我接到贝利亚打来的电话——不是叶若夫，而是贝利亚！——他说，“你在乡村旅行时乌斯品斯基溜掉了。”

“什么？”

“是啊！他逃掉了。”

我立即赶回基辅。确实如此，乌斯品斯基不见了。他留下了一张便条，说他去第聂伯河投江自杀了。我们用渔网和潜水员在河里搜寻他，但不见任何迹象，他似乎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后来他们在某地——我想是沃龙涅什——把他抓住，便枪决了。

此事发生不久后我到莫斯科，斯大林告诉我，看来是叶若夫给乌斯品斯基通报了消息，斯大林说，“叶若夫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他本应命令乌斯品斯基来莫斯科，但他不但不这样做，反而暗示他，来莫斯科的路上可能被捕。”

所以，斯大林已得出结论，叶若夫是人民的敌人，是不可信的。不久，他就被捕，贝利亚接替了他。贝利亚当即着手巩固他的势力。现在把乌斯品斯基干掉了，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的位置空缺，贝利亚就派了卡布洛夫去基辅。此人的哥哥是贝利亚的副手，曾在格鲁吉亚与贝利亚一起共事过。^②

^①D·S·科罗特钦科根本不是乌克兰人，他出生时叫科罗特钦科夫，曾在赫鲁晓夫主持下的莫斯科党委工作过，在大清洗高峰时期，被派往白俄罗斯的特罗茨基，在那里他以极端严酷的手段出了名。赫鲁晓夫于1938年把他带到乌克兰，从此跟着新的主子他步步高升，经过一定程序，成了中乎委员会书记处的成员。

^②卡布洛夫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并不长，有关他的事情无人知晓，不久，I·A·谢罗夫接替了他的职位，这个谢罗夫后来却声名狼藉。（参见第四章）

叶若夫被捕后，他的所有副手及与他有牵连的人统统被逮捕了。这朵乌云也在马林科夫的头上盘旋，因为叶若夫曾请求让马林科夫当他的第一副职。而且，人人都知道马林科夫是叶若夫的密友。多年来，我也是马林科夫的朋友，我们一起在莫斯科党委工作过。经过下面一段插曲之后，我从对马林科夫的猜疑中提出了自己的结论。

一天，我从基辅到莫斯科，贝利亚邀请我去他的别墅。“到我那里去”，他说，“我只有一个人，那里没有别人。我们可以一起散散步，你可以在那里过夜。”

“这对我也挺好”，我说，“我也是一个人。”
我们坐车到了他的别墅，在树林里散步。贝利亚先打开话题说，“听着，你对马林科夫有何想法？”

“我该怎么想呢？”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已把叶若夫抓起来了。”

“即使说马林科夫和叶若夫是朋友，那有什么关系呢？你曾是马林科夫的朋友，我也是。我认为马林科夫是诚实的，无可责备的。”

“问题不在这里。你同马林科夫仍是朋友。听着，再仔细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就这样，我仔细思索了一番。我得不出什么特别的结论。我继续与马林科夫保持着友好往来。回到莫斯科时，我在休息日同他一起住在他的别墅里。我想也许斯大林通过贝利亚向我提出警告，对马林科夫要当心。但是，马林科夫终于摆脱了这一灾难，后来同贝利亚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1939年初。在2月里，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一项决议草案，谴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过火行为和滥用职权。过去3年里一直盛行的恐怖活动得以有所缓和，一般认为这是贝利亚的结果。人们得出结论，认为贝利亚接任人民委员以后，对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作了调查，然后说服了斯大林，使一系列建议得到了批准。但是，1939年的二月全会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恐怖并未结束，只不过是变得更微妙、更区别对待了。

这次二月全会是一次厉行自我批评的会议。每人都对别人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只有我赫鲁晓夫自己一人没有受到批评。后来，雅科夫列夫（他的真名叫雅科夫·阿尔卡杰维奇·爱泼斯坦）突然对我提出了非同寻常的、实际上是指责的意见。他的批评是，在莫斯科党组织里人人都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来称呼我。就是这么一点。我上台发言作了答复说，同志们确是用教名和父名来称呼我。我暗示他自己的名字根本不是雅科夫列夫，而是爱泼斯坦。会后，当时仍在主持《真理报》的麦赫利斯把我拉到一边。他对雅科夫的发言感到十分气愤。尽管麦赫利斯自己也是犹太人，他说，“雅科夫列夫是犹太人，他不懂得俄罗斯的习惯，相互称呼用教名和父名。”^①

后来，在全会的整天会议后，大家散会去用餐。我晚走了一步。当我刚要动身前往的时候，斯大林突然喊我：“赫鲁晓夫，你去哪里？”

“我去就餐。”

“跟我来，我们一起吃饭去。”

我自感纳闷，“他为什么请我跟他一起去吃饭？”当我们正要离开会场。雅科夫·阿尔卡杰维奇·雅科夫列夫一直在周围徘徊，未经邀请也跟着斯大林来到他的住处。我们三人一起进餐，主要是斯大林讲话，爱泼斯坦·雅科夫列夫显得有点坐立不安，

^①Y·A雅科夫列夫曾担任过农业人民委员（见第二章）。这是一个绝妙的例子（后面还会看到其他一些例子），说明赫鲁晓夫虽声称对反犹太主义深恶痛绝，但对具体的一些犹太人，似乎控制不住恶意诋毁的情感。俄籍犹太人同俄罗斯人一样，也用教名和父名来相互称呼。雅科夫列夫的发言或许是指责赫鲁晓夫的自我颂扬。

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十分混乱。他担心他将遭逮捕，他的预感并没有错。在那次餐桌上与斯大林友好闲谈后不久，雅科夫列夫就被捕了，并被干掉了。我讲这段故事是想要说明，即使像雅科夫列夫那样接近斯大林，也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雅科夫列夫是中央委员会农业部的负责人，在跟反对派的斗争中他是斯大林最信得过的支持者之一。这一事件也是一个表明斯大林的奸诈本质的典型实例。

在这次“二月全会”上发生的另一件事表明，虽然在贝利亚倡议下，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滥用职权和过火行为进行调查，但他自己干阴险勾当也很精通。在全会期间，格利沙（格利高里）·卡明斯基作了一次发言。他是俄罗斯联盟的卫生人民委员，有革命前党内工作的经验，是位十分令人尊敬的同志。我最初认识他是在刚开始在莫斯科党组织工作的时候。他十分正直、诚恳、老实。我敢说他的党性是完美无缺的。下面就是他对中央委员会一次发言：

“同志们，人人都在发言，说出他所知道的关于某人的情况。我也有一些事要讲，以供党组织了解。当我在巴库工作时，听谣传说，巴库被英国军队占领期间，贝利亚曾为木沙瓦特政府的反谍报机构工作过。木沙瓦特的反谍报机构是受英国人控制的，因此，人们说贝利亚一定是一个通过木沙瓦特分子从事活动的英国间谍。”^①

卡明斯基讲完后就坐下，没有人出来对他进行反驳或澄清事实，贝利亚本人也不加评论。全会后不久，卡明斯基就立即被捕，并就此失踪。我一直为他这件事感到苦恼，因为我完全信赖他。我知道他不会编造那样的事情。他一贯是讲真话的。^②

^①木沙瓦特派是外高加索的民族主义分子（穆斯林），在英国干涉时期，曾同布尔什维克在巴库作战。

^②G·M·卡明斯基是卫生人民委员，在此，不久前，他同一些人一起在谢尔哥的死亡证明书上签字，证明他是病死的。

我记得马林科夫也讲了话。他批评了中亚局书记和贝利亚的自我标榜。他说，有的登山运动员征服了中亚细亚的高峰，就用这个党的书记的名字来命名。此人后来被逮捕了。贝利亚也被指责他进行自我吹嘘。在这方面，有充足理由可以对他进行批评。

全会闭幕时，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过失行为。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党内流行的专横统治就可以终止了。3年多来，人人为自己担心，今天不知明天是死还是活。这种恐惧和渺茫莫测的心情大大损害了党性。“二月全会”后，清洗有所减缓，但镇压并未完全停止，继续有人失踪。正象冰层突然裂开，站在上面的人一下子被吞没了。

贝利亚和我在斯大林的住处开始经常见面。^①起初，我喜欢他。我们友好地闲聊，甚至开过不少玩笑，但逐渐他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了。他那阴险毒辣、耍两面派、伪善姿态使我感到实在震惊。他调来莫斯科以后不久，集体领导和斯大林周围的核心圈子里的气氛跟这以前的状况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情况大大恶化了。斯大林自己也向我吐露他对贝利亚的影响感到很不愉快。“贝利亚来到前，餐桌上的会议总开得很轻松，并富有成果。而今，他常常向别人挑战，比赛干杯，到处是喝得醉醺醺的人。”^②

即使我完全同意斯大林的说法，但我知道在回答他时，得特

^①上面已经指出，1938年7月贝利亚才到莫斯科就任叶若夫的副职，那时赫鲁晓夫已离开莫斯科去乌克兰。但是，这两人在这以前经常见面，因贝利亚常常去莫斯科作客。后来，赫鲁晓夫从基辅来莫斯科逗留时，他们继续经常见面。

^②在这里和以后的章节里，赫鲁晓夫总是用不以为然的语气谈他的一些同僚的酗酒恶习，特别在谈到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的时候，更是如此。事实上，不但在斯大林的核心圈子里，而且在军队的高级将领中，最厉害的酩酊大醉都是司空见惯的。赫鲁晓夫本人就是一口大酒缸，经常在大庭广众醉倒，至少在1956年是如此。当然，苏联人对酗酒的态度仍然像150年前的英国人一样。我可以为赫鲁晓夫说句公道话，贝利亚喝醉的次数比其他人都多得多。我曾见到过他几次，每次都醉得像烂泥一样。

别小心。斯大林喜欢一种惯用的手法，即引诱你发表意见——或者甚至只对某一句话表示同意——从而流露出你对别人的真实感情。我完全明白，斯大林和贝利亚关系很密切。他们之间的友谊究竟真诚到什么程度，我可说不准，但我知道，斯大林特地选中贝利亚接替叶若夫，决不是偶然的。贝利亚不但掌管一个有实力的人民委员部的大权，而且在整个集体领导中也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谁要确保斯大林对他的欢心，他就不能不同时讨好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特别擅长以阿谀奉承而取胜。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莫洛托夫有低三下四巴结别人的表现。我自己也从不自向贝利亚磕头，为此，我不得不常常与反对我的贝利亚发生争执。鉴于我在党和政府机构中担任好几个重要职务，我有许多机会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我通常得到斯大林的支持，当不能得到他支持时，几乎总是因为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对斯大林施加了影响。我相信，他们所以反对我，主要是出于嫉妒心理。

特别是贝利亚，十分注意维护他在集体领导里的权势和对斯大林的影响，下面一件事情说明了他是多么能耐！

斯大林的连襟列坚斯，曾作为贝利亚的副手任格鲁吉亚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①贝利亚本人调莫斯科以前，他决定要把列坚斯从格鲁吉亚轰出去。那是为什么呢？这样在格鲁吉亚除了贝利亚自己外，再也不会向斯大林告密的人了。贝利亚对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也总是心怀敌意，也是由于同样的理由。那么贝利亚是怎样把列坚斯轰出去的呢？他指使他的手下引诱列坚斯到一家咖啡馆里，利用他好酒的弱点，把他灌醉，然后把他拉出去掷进路旁阴沟里。警察巡逻时，发现他很不光彩地躺在那里。贝利亚想办法让斯大林了解列坚斯的丑闻。这就是列坚斯

^①列坚斯是斯维特拉娜·阿里露也娃的姨夫，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二十封信》中曾经多次提到过他。

为什么在格鲁吉亚被革职，并调到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地区办事处的原因。你瞧，贝利亚是这么一个拨弄是非的能手！许多年以后，即贝利亚下台后，中央委员会收到格鲁吉亚人寄来的一封信，此人曾被判过罪，信上列举了所有在格鲁吉亚遭贝利亚用类似手法挑拨陷害的受害者。

贝利亚爱好讲故事，大谈他如何在别人有难时给予帮助。即使这些故事，大部分是瞎编的，也都是有阴险的用心。我记得，一次他告诉我，麦列茨科夫元帅曾怎样一度处于绝境，被迫在认罪书上签名，承认他是英国特务和人民的敌人，等等。^①我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份供词，斯大林也没有把它分发。这事发生在大战期间。那时，斯大林是这个国土上的唯一法庭里的独一无二的法官。他完全自己决定谁被处决，无需别人的支持。不论怎样，按贝利亚的说法，麦列茨科夫得以释放并重返前线作战，应归功于他。

“我去见斯大林说，‘麦列茨科夫被作为英国间谍，关押在狱中，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怎么成了英国间谍呢？他为人老实，现在正打着仗，我们需要他去前线，可以让他当一名野战军司令。’

“斯大林回答道，‘你也许是正确的，去跟他谈谈’。这样，我就把麦列茨科夫叫来并对他说，‘你在供词上写的都是胡说八道。你不是间谍。你诚实可靠，是个善良的俄罗斯人。怎么成了英国间谍呢？’

^①在曾被捕的红军高级将领中，有几个奇迹般地幸免于难，活着出狱，并被派遣到前线对希特勒作战，麦列茨科夫将军仅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将领中，最著名的一个是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还有戈尔巴托夫将军，后来成了柏林的苏联驻军司令，写了一本书《我一生中的几年》出版，描述了他在狱中的经历。

“麦列茨科夫几乎是无望地看着我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有一份我亲笔写的供词。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还要再审讯我。’

“‘我并没有在审讯你，麦列茨科夫同志。我只不过要告诉你，我认为你不是间谍。回到牢房去再好好想一想，睡觉时也想。明天我同你再谈一次。’他们就把他带走了。第二天，我又召见他，并问道，‘怎么样，想过了吗？’

“他开始哭泣起来，一边感谢我，一边说‘我怎么能是间谍呢？我是个好俄罗斯人，热爱我的人民，相信人民’。这样就把他释放了，穿上了将军服，他去前线担任了司令员。”

我对此十分清楚，事情经过并没有那么简单。被捕前，麦列茨科夫是个魁梧的年轻将军，即健壮又十分威武。释放后，他简直成了他过去的影子，体重减轻了很多，讲话也有气无力。贝利亚所叙述的经过也有些令人费解。我有一点不明白，首先是谁下令把他逮捕的。贝利亚把此归咎于V·S·阿巴库莫夫。谁是阿巴库莫夫？他是贝利亚自己的部下。任何情况，阿巴库莫夫得先向贝利亚报告，甚至先于斯大林。自然，没有贝利亚的命令，阿巴库莫夫不可能逮捕麦列茨科夫。^①

正当贝利亚告诉我他释放麦列茨科夫出狱的前后经过时，他经常喜欢挂在口边的一句话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你听着，把他交给我一个晚上，准保他供认是英国国王。”这是他在谈起嫌疑犯时常说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认真对待这句话，但我并不怀疑，贝利亚很懂得去获得他所需的口供。随着他的权势日益膨胀，他的傲慢和奸诈也成正比地不断增长。

^①V·S·阿巴库莫夫是个臭名远扬的契卡工作人员，1946年任国家安全部部长，1951年被解职，1954年被枪决，表面上的罪名是制造1949的“列宁格勒案件”。在亚厉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圈》中，他被作为一个特写人物描述。

第四章 重回乌克兰

第一节 重整旗鼓

1938年，赫鲁晓夫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第一项任务就是实际上从无到有，建立起一部全新的党机器，以便取代从1929年起到清洗中遭破坏，一向由科西奥尔主管的那个原有组织。但是，甚至当赫鲁晓夫正重整旗鼓的时候，清洗仍在继续着。这一节让我们对这个过程的性质有所了解。赫鲁晓夫没有提及的是他的第二项任务是使乌克兰俄罗斯化，即把所有可能被怀疑为地方爱国主义（即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乌克兰人从有权有势和机要的岗位上清除掉，不鼓励学校和其他地方采用乌克兰语。在斯大林看他，这一行动是颇为重要的。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异常强烈，这里既是苏联的粮仓，又是最强大的工业基地。这项政策是采用十分残暴的手段加以贯彻执行的。正如赫鲁晓夫自己在1938年夏天所说的那样，执行这一政策的官方理由是为了消灭这样一些人，“他们盼着德国法西斯分子、地主、资产阶级都进来，让乌克兰工人、农民成为法西斯的奴隶，把乌克兰变成波德法西斯的殖民地”。

“我们要派你去乌克兰领导那里的党组织。科西奥尔看来干

不了了。我们将他调到莫斯科来担任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主任。”

1938年在斯大林让我担任乌克兰的最高职位时，我是不愿接受的，原因有3点：其一，我喜欢科西奥尔，接替他的职务于心不善。1929年我就认识他，当时他接替卡冈诺维奇，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同年，我申请去工业学院学习，是科西奥尔批准的。其二，我担心我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资历去继任科西奥尔的职位，我认为乌克兰第一书记的帽子戴在我的头上实在太大了。其三，即最后一点，我还是满脑子的民族问题。这也是事实，我曾在乌克兰工作过，不论乌克兰共产党员还是非党人士，我一直与他们都合得来。然而，我是俄罗斯人，置身在乌克兰人中间，总感别扭。即使我会乌克兰语，但还没有达到能用它来发表讲话的水平。我把这些困难向斯大林摆了一下，还对他说，我担心乌克兰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可能会对我表示冷淡。我告诉他，“我觉得派我一个俄罗斯人去乌克兰意思不大。”

“科西奥尔不是俄罗斯人，是吗？他是波兰人。为什么俄罗斯人跟乌克兰人，比跟波兰人日子更不好过呢？”

“科西奥尔或许是波兰人”，我承认说，“但能用乌克兰语发表演说，况且科西奥尔比我经验丰富。”

“不准再辩白了，你就去乌克兰。”

“好吧，我将尽一切力量去完成任务，把乌克兰党重建起来，决不辜负你对我的信任。”我心里仍在嘀咕，担心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但我也否认，中央委员会把这样高的职位托付给我，感到有点沾沾自喜。

我知道，乌克兰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遭沉重打击。科西奥尔的撤职就是表明这次打击多么沉重。我也简要回顾了一下前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丘巴尔的遭遇。在20年代的乌克兰党代表大会

上和矿工会议上，我时常碰到他。^①有一个时期，我负责管理顿巴斯的矿业生产。他的品行被公认是优良的。后来有一天，我正坐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接到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同一人讲了一会了，然后把电话挂了。斯大林说，丘巴尔刚才流着泪打电话给他，竭力想证明他是诚实的。斯大林的语气看来是同情他的。至少，他好像理解丘巴尔为什么心情这样不好。就在第二天，丘巴尔就被逮捕，并被干掉了。

由于波兰和西乌克兰的大清洗，乌克兰共产党部分遭到了破坏。要消灭波兰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来说是十分容易的，因为他们多数住在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②贝鲁特和哥穆尔卡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们当时在党内不那么出名。西乌克兰共产党里都是不可靠分子，甚至是颠覆分子，凡是能抓到的，都被当作煽动分子、叛徒、毕苏斯基的代理人而清除掉。鉴于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具体负责领导西乌克兰党，许多我在20年代认识的乌克兰党的领导人在清洗中被消灭了，其中有杰姆钦科同志，1928—1929年，我在基辅地区党委组织部任部长时，他就是地区党委第一书记。^③

当斯大林派我去基辅时，他告诉我，除了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外，我还兼任基辅地区党委和市委的第一书记。我告诉

①V.丘巴尔是赫鲁晓夫早期在乌克兰的同事。1923年，他被任命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5年跟米高扬一起参加了政治局，取代了被谋杀的基洛夫。他1938年夏失踪，1939年2月被处决。

②从1937年到1939年，斯大林有计划地摧毁了波兰共产党，在这里却蛮横地一举带过。正如赫鲁晓夫说的那样，清洗轻而易举，因绝大多数波共要人都从波兰独裁者毕苏斯基元帅那里逃到莫斯科避难。许多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德国的、西班牙的，以及其他外国共产党员都在这时期被处决。

③赫鲁晓夫所指的西乌克兰当时是波兰的一部分，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它才被苏联侵占（参看第五章）。

他，我无法马上同时兼任那么多职务，但是，他仍坚持了他的意见。

你是能干好的，”他说，“只要到那里后，挑选几个你看中的人帮帮忙。”

我请马林科夫指派几个乌克兰人去协助我。马林科夫任命他的一个副手布尔米斯坚科当我的第二书记。我一见布尔米斯坚科就喜欢上了他。我们本质都一样。^①我叫他从莫斯科组织和中央委员会机构里挑选十来个人。

当我们抵达乌克兰时，科西奥尔同志简要向我们介绍他们所碰到的问题，一一介绍了几个在清洗后尚活着的党的领导人。在一次中央全会特别会议上，他正式向乌克兰党将我们作了介绍。党已清洗得一干二净，似乎连地区党委或执行委会的书记、人民委员会委员或副主席都一个没留下。党的领导机构全破坏了。我们必须一切从头开始将重建党组织。^②

我请求斯大林答应，让我把卢卡绍夫从莫斯科带来。他还活着，但早退休了。他曾负责过为莫斯科工人合作社采购蔬菜和水果的工作。我喜欢他，因他工作效率高，又埋头苦干。我告诉斯大林，我要任命卢卡绍夫担任乌克兰国内贸易人民委员，斯大林

^①M·O·布尔米斯坚科表现突出，仅17岁时就参加了“契卡”，因而为人所知。他以残酷手段摧毁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抵抗力量而臭名远扬。作为马林科夫在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总部”的副职，在清洗中他起了积极和险恶的作用。他被任命为赫鲁晓夫在基辅的副手，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人头将要滚滚落地。

^②至少在1938年，从赫鲁晓夫到乌克兰所发生的一切来看，更不必说在他的领导上所发生的，他对于斯大林正在创造的大破坏心里明白得一清二楚。在这一回忆录的许多叙述过程中，他一再强调在斯大林去世之前，并不了解斯大林的行为是在犯罪。但在这里和前一节中，他所谈到的一些细节就足以说明，他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

表示同意。

后来，卢卡绍夫突然被捕了。^①这使我感到很不愉快，首先，我本人是喜欢他的；其次我曾请求要任命他担任一个重要职务。我明白，卢卡绍夫以人民敌人名义被捕，这对我将产生不利影响。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卢卡绍夫被释放了。他回到乌克兰时精神不振，遍体鳞伤，看上去十分疲惫的样子。他告诉我，他受了刑并硬要他谴责我是阴谋集团的成员。事情是前不久发生的，我在莫斯科工作的时候，曾指示把卢卡绍夫派到波兰和立陶宛去采购洋葱种子和蔬菜。当时他被捕了，强迫他招认他去波兰的贸易任务实际上是执行一项与国外的反苏组织建立联系的秘密政治任务。他拒绝了，并且被释放了，这是少有的事情。我告诉斯大林这件事的经过。

“是的”，他说，“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是有这类颠倒是非的事，他们也正在收集反对我的证据。”

在下面那件事发生后，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我开始感到更加忐忑不安了。我到乌克兰时，内务人民委员是乌斯品斯基。我对他稍有了解，并喜欢他。虽然他用波兰人的名字，但是个俄罗斯人。他先是雅格达的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后来成了莫斯科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接着当了克里姆林宫的队长。他是从克里姆林宫直接派往乌克兰的。显然，中央委员会对他信任的。根据我刚到乌克兰的情况判断，这种信任是有充分依据的，但很快，我就开始产生了一些疑虑。

基辅市委第二书记是一个叫科斯坚科的人担任。我不怎么了解他，但看来他工作勤奋、又信得过。他忠诚老实、十分简朴。我记不得他是工人还是农民出身。突然，他被人怀疑而遭逮捕。

^①这里提到的一些人，只不过是并非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的遭遇跟千千万万的人一样。

我收到一份关于他与人民的敌人有牵连的冗长的交代。我茫然不知所措。

我告诉乌斯品斯基，“我要跟这个你们逮捕的科斯坚科谈话。”

“可以安排，赫鲁晓夫同志。”

我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接着把科斯坚科带了进来。他证实他在交代中他所说的全是事实。

他告诉我，“是的，这些事全是我干的。我是阴谋集团的成员。就我所知的事和人，我都坦白了，一点也没有隐瞒。”

我并未感到满意。科斯坚科的坦白反而引起更多的疑虑，使我十分不安。当快离开内务人民委员部办公室时，我提醒乌斯品斯基说，“乌斯品斯基同志，如你们把他作为人民的敌人判处死刑，他可能最后要供出一些人来。如情况这样发生，我劝你等把他的指控核实后再把他处决。我们必须做到确保他没有诬告任何人。”

过了一些时间，乌斯品斯基交给我一份文件，上面写道：在科斯坚科被枪决前，指控他在基辅地区委员会的继任者切列平犯有同样的罪行。我喜欢切列平，他是从波尔塔瓦来的农民，很纯朴，又很聪明。我敢担保他十分诚实。当听到科斯坚科企图把他卷入同案，我勃然大怒。

“你怎么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呢，乌斯品斯基同志？我清清楚楚告诉你，在执行枪决前，一定要弄清他提出的对别人的任何指控。”

我立刻给中央委员会马林科夫挂电话，因为他负责人事工作，或许可以想些办法。我把事情经过对他说了一遍。

“你信任切列平吗？”马林科夫问道。

“是的。”

“那么，让他留在原来工作岗位上。”

我稍松了一口气。然而，那次通话后不久，马林科夫又给我打电话说：“现在，看来你还是不要把切列平留在书记处为好。我知道你信任他，但对他怀疑有重要证据。”

“什么证据？你是不是指科斯坚科的指控？那不是证据，是诬告！”

但马林科夫并不肯让步。我尽量在党内恢复他的名誉。我们已委任他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我不断向中央委员会建议让他担任党务工作。对他，我良心上很过不去。我坚持认为他是无可指责的，对他的控告是不公正的。最后，马林科夫让了步，切列平被提升为苏梅斯基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大战开始后，我推荐他到海防军军事委员会任职。他在德军入侵时牺牲了。这样，他为祖国、为人民、为苏联、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斯大林派我去乌克兰时，他说，“我知道你偏爱城市管理和工业生产，但是还是提醒你一下为好，不要放弃对农业的领导，而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工业生产和城市管理上。要特别注意，不要把所有时间都花在顿巴斯。你会发现在工业上所碰到的问题没有在农业方面那么多。记住，乌克兰的农业对苏联是十分重要的，设法采取些措施，把我们在那里的农业，组织得效率更高一些。”

虽然总不是那么容易来制约我的第一爱好，即矿业和工业的诱惑，但我还是把他的提醒切记在心头。我不断被工厂、车间和矿井所吸引。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多学些农业知识。我用了很长时间到乌克兰各地转一转，访问集体农庄和农民家庭，跟农技师、经理谈话。

1939年1月或者是2月，我跟布尔米斯坚科一起到达乌克兰，正当赶上准备春播的时刻。我们立刻碰到了十分危急的问题。在乌克兰西部沿着波兰边境，农庄里的马在不断地死亡。没有人能说得出致病的原因。在访问文尼突地区一个集体农庄

时，我询问了一个养马的饲养员，马死得那么多，他有何看法。他告诉我，马都是给毒死的。

“我看到一个人给马放毒”，他说，“因此我们把他抓住并关押了起来。你知道他是什么人？是个兽医！”

听来似乎讲得很有道理。我们觉得，正准备向我们开战的德国人可能要设法破坏我们的军事实力。你瞧，马当时不仅仅是牲畜，它们是今天的坦克、飞机和吉普车。^①

我决定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乌斯品斯基，“在监狱里你们是否还关着一些当场被抓住放毒的人？”

“是的，还有”。

“那是些什么人？”

他说了一个哈尔科夫兽医学院的教授，是犹太人，还有一个是哈尔科夫畜牧学院院长，是乌克兰人。

“我要跟他们谈一谈，但我不打算到监狱里去谈，把他们叫到你的办公室，好吗？”

“这有什么用？他们已向内务人民委员部作了交代，承认他们进行了破坏，并且是德国人的代理人。他们只不过向你重复一遍他们的供词。”

“可能会这样，但是我的脑子仍有些事感到费解。他们在交代中自称所用毒药的化学方程式，我要叫我们的科学家取点样品，做一次试验。我们把用这种配方的药喂马，但马没有死。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自称用的毒药不灵了呢？这就是我要找犯人谈话的原因。”

“好吧！我将去安排你跟他们会面。”

我去内务人民委员部，这位犹太教授，白发苍苍，已50岁开

^①这听来十分奇特，但是真的。例如，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成千辆美国卡车经过波斯通道来到前，苏联军队的运输还几乎全靠马拉。

外，被带了进来。

“唉，你自己有什么好说的？”

“我已经交了两份坦白书，我只能证实我所说的一切。是的，我们是德国人的代理，接受了毒死马的任务。”

“你所说的用的那些化学药品，马吃了连病都没有得，这你又作何解释呢？”

“是呀！那是可能的。你瞧，我们直接从德国人那里接到准备好的配料，然后又掺到我们自己的混合物里。我们不知道德国人的配料是什么。”

我仍然感到十分不满意。依我看来，他的供词仍然证据不足，因此案子并未了结。我给了他充分的机会来说明他是无辜的，然而，他还是坚持原来的说法。我还有些事仍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犹太人会甘心情愿地为其死敌、反犹太的德国法西斯效劳？这实在令人费解，当然，你也可以从阶级斗争之类的观点来解释，但我仍然无法解开疑团。

我又把第二个医生，即哈尔科夫畜牧学院院长叫了进来。他重复了他的交代。被指控进行破坏活动那不是好玩的，或许他们希望，要是他们悔过自新、彻底坦白，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但是仍然……

我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马神秘死去的原因。这里我又碰到了一个问题，因为已经建立过好几个这类委员会，但马继续死亡，委员会也就解散，委员会的成员被捕并被处决。因此，普遍认为被指派到委员会工作的，就等于交上了厄运。

我把乌克兰科学院院长鲍戈莫列茨同志召了来。他是个非党人士，但我认为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我从来不对一个善良的苏联公民和一位进步人士表示歧视。

我说，“鲍戈莫列茨同志，你知道我们农庄里的马仍在不断死去。我们得想点办法。”

“那有什么好想呢？”

“我不信，在这里科学是毫无用处的。假如我们集中力量一起努力，马死亡的原因一定能找出并彻底查明。我想我们该要建立一个委员会去从事调查工作。我知道，鉴于过去委员会的成员均遭逮捕，你的同行们害怕被指名参加委员会。但是，你科学院院长任主任委员，我相信其他专家们都会乐于参加。我向你保证，我亲自出席每次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听取你们专家的汇报。内务人民委员乌斯品斯基同志也一道出席会议，以便帮助委员会避免遭到任何指控。我建议采取另一项预防措施，即我们将建立两个相互并行的委员会，这样可以增加取得结论的机会。”

实际上，我之所建议设立两个并行的委员会的理由是，我并不排除遭到破坏的可能性，我希望，万一破球分子参加了一个委员会，那另一个委员会就可能都是老实人了。

鲍戈莫列茨表示同意，但热情不高。

两个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得到了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批准。为了绝对保险起见，我增加了以维尔京斯基教授为首的、由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家组成的第三个委员会。这3组人马都去受灾的农庄，开始他们的工作。

稍后一些时候，多勃罗特科教授的那个乌克兰委员会得出了结论，马是因湿草中生长的一种菌类致病而死的。

多勃罗特科同志告诉我，“当我认为这一定是有某种原因造成的时候，我甚至用这种菌来使自己感染，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现在得的病跟把马弄死的那种病相似。”

维尔京斯基教授不愿接受多勃罗特科的结论，维尔京斯基是莫斯科人，多勃罗特科是乌克兰人。当时，地区间的隔阂仍然十分突出。为了避免他们之间的冲突，我建议调查再深入一步，以便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有绝对的把握。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维尔京斯基最后告诉我，他同意多勃罗

特科的发现。现场研究工作就此结束，在基辅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作了报告。根绝这种疾病的方法很简单，即把草保持干燥。

斯大林密切注视着这一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当初他听说乌克兰的马正在被毒死，心情十分苦恼。当我回莫斯科并汇报了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时，我建议给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授奖。多勃罗特科教授得了劳动红旗勋章。我认为他该授予列宁勋章。我建议维尔京斯基得荣誉勋章，虽然他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只起了与催化剂近似的作用。

我们所取得的胜利不仅仅是农业上的，同时也是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但是，在与我参与这项工作并负责进行处理以前，不知有多少个集体农庄主席、饲养员、农艺师、畜牧专家以及其他专家因所谓从事破坏活动而掉了脑袋？

在乌克兰，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步消除了不信任和相互猜疑的气氛。我常常碰到清洗时期盛行的那种风气的残余。我们乌克兰有一名医生，他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名字叫麦德维德，（一个常见的姓，俄文意即“狗熊”）。几年后，他作为乌克兰代表团成员去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的创立活动。他使得敌人感到十分恼火。他们经常说，“乌克兰熊又在咆哮了！”他确实有熊那样的嗓门，同时他脾气也很大。我在乌克兰时，那里流传过一个关于这个麦德维德的故事，这说明正当清洗处于高潮时，那疯狂的情景，简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麦德维德在基辅或哈尔科夫担任地区卫生副局长的时候，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一个妇女站起来手指着他说，“我不认识那边的那个男人，但看他眼睛的表情，我敢断定他是人民的敌人。”^①你能想象竟能发生这种情景吗？

^①这种恶意或歇斯底里的指控曾使成百万人致于死地或进了劳改集中营，这里例举的实例是很典型的。

还好麦德维德并没有失去对自己的控制。他立即进行了反驳，他说：“我并不认识刚在指责我的这位妇女，但从她的眼神看，我敢说她是妓女。”他只不过用了意义更深的语言。麦德维德立即进行反击或许救了他的命。假如他把自己置于防卫的地位，必将引起更多的猜疑。指控他的这位妇女将会得到更大的鼓励去进一步控告他，因为她心里明白，用不着对产生的后果负什么责任。

我到乌克兰作了安顿后，即乌斯品斯基解除了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后，上述这类事情也就慢慢减少了。

我得说几句关于乌斯品斯基继任者谢罗夫的事情。在我当政期间，他受到了处分。我认为他工作粗枝大叶，虽然他犯了错误但还是诚实、廉洁、可靠的。我对他是信任和尊敬他的。他头脑简单，简单得有点失真。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很年轻，缺乏经验，刚毕业于炮兵学校。当我们开始招募军人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时，他是被动员来的。很自然，他对安全工作没有经验，这对他来说既是个有利条件，也是不利条件。谢罗夫被委派做安全工作以前，人们在这方面工作的经验被证实不仅对国家、对党有害，而且对他们自己也是有害的。他们已习惯于编造事端，逮捕无辜，采用逼供信的手段。谢罗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几个前任不一定是残忍者，但是他们已成了机械工作的人。只有一种思想指导着他们的行动：“要是我不对别人这样做，别人也就这样对我的，还是先下手为强。”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时代，献身于党的共产党员不是以良心或理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而是像禽兽一样担心自身安全，这是多么耸人听闻啊！为了保护他们自身的性命，他们夺取了无辜者的生命。幸运的是，谢罗夫不是那个时代，也不是那种思想常识的产物。^①

^①I.S. 谢罗夫是名红军军官，1938年从伏龙芝军事学院调内务人民委员部

工作。他提升很快，1939年被调任去接替乌斯品斯基，不久当了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与赫鲁晓夫工作在一起。关于他在乌克兰活动状况，请参看下一章。他并不热衷于杀人，主要是个组织工作者，出色的行政管理人员。他处世超然、玩世不恭、冷酷无情，必要时杀人也不眨一下眼，组织大规模的流放是家常便饭。然后从办公室回家。在社交活动中，又以和蔼可亲、善良、讨人喜欢的伙伴出现。斯大林死后，国家安全部改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时，赫鲁晓夫任命他为该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当时，他的职务要他比较温和行事，在这以前，他是十分冷酷无情的。但是，每当形势需要时，如1956年在匈牙利，他跟往常一样抓人、杀人，效率不减当年。1958年，他被解除职务，但原因不明。

在他的协助下，我才能把乌克兰整顿好。工业开始完成指标，农业生产开始稳定。镇压少了，党的队伍和行政管理工作人员也得到了补充，情况也恢复正常了。

第二节 帕顿院士

让我们在这里来考察一下赫鲁晓夫这个实干家。他议论硬让工作忙的人去参加无休止思想教育会议，认为是浪费时间，这是非常正确的。然而，今天这种会议还在继续。当赫鲁晓夫愤怒地拒绝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基辅的一座彩桥时，或许他已忘记在他统治乌克兰的年月里，他鼓励掀起对他个人的崇拜。这些行动使得生活在莫斯科比他更靠近斯大林的一些同辈感到不安。

我乌克兰到任后不久，一个名叫叶夫根尼·奥斯科罗维奇·帕顿、负有盛名的机械工程师来办公室要求见我。当他走进办公室时，我发现他身材结实、头发花白，是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他

面像狮子，目光锐利而明亮。相互问候后，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块金属，摆在我面前的桌上。

“请看这个，赫鲁晓夫同志，看我们研究所做的东西！这是一块10毫米厚的铁条，看我们把它焊接得多好啊！”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我自己是个冶金工人，曾多次检查过焊接的接缝。这个接痕十分光滑，看起来好似铁条是整块铸出来的。

“这是熔解焊接的样品”，帕顿院士说。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焊接方法的名称。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已有许多发明的帕顿解释说，他设计了一种新的、经过改进的焊接工艺。他给我画了一张草图，说明我们可以怎样制造适用于船上和桥上操作的便于携带的熔解焊接机。帕顿院士简直把我完全迷住了。在一生里，我一直对金属加工感兴趣。我父亲要我成为一个鞋匠，但我不干，愿当一个机械工人的徒工。有一次，还在童年时代，我曾用一堆废铁装了一辆机械自行车。从我们见面的那时刻起，我知道帕顿院士和我心心相印。我当场就决定尽我一切力量，确保他的发明受到应有的重视。

这以后我去莫斯科时，我向斯大林谈到了帕顿。斯大林很感动，便问我如让帕顿担任人民委员会的一个专员，有何意见，“假如我们赋予他无限权力在工厂和建筑工地推广他的新焊接法，他能对付得了那些官员并使他们听他的话吗？”

“斯大林同志，从我与帕顿接触情况看，官员是反对不了他的。”

过样，授予了帕顿在我们工业领域里推行熔解焊接法的权力。一天，我向他提出了一种设想，即在制造坦克的装配线上采用熔解焊接法。

“请告诉我，帕顿同志，你认为你的技术是否可以应用到坦克钢上？”

“我得把问题研究一下。装甲有多少厚？”

“大约一百毫米。”

“那就比较困难，但我们可以试一试。我认为我们是办得到的。”

我派帕顿去哈尔科夫坦克工厂，并叫那里的党的组织干事叶皮谢夫同志（现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把他介绍给设计师和行政管理人员。这是帕顿院士的事业中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大战中，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鉴于他在我们坦克生产中进行了一系列革新，坦克开始像煎饼出锅那样从装配线上一台一台地开出来。在战争初期，当我们不得不把工业从哈尔科夫撤走时，他随同装甲工厂撤到乌拉尔。

1943年，当斯大林从前线把我召回来商讨问题，帕顿正好也在莫斯科。帕顿要求见我，并带给我一封他事先写好的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下面就是他在信上写的：

“1917年，我没有认真对待革命。我父亲是沙俄驻意大利的领事，我是旧制度的产物。我所受教育是沙皇时代的旧教育。我并不同情十月革命，但同时我也没有参与任何反苏活动。但随着年月的消逝，我对苏维埃政权越来越信任了。过去，我从不认为我应得到党的特别信任和表扬。但我跟苏维埃政权站在一起已多年了。我认为通过坦克的生产，我已为祖国的战时防卫工作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因此，我觉得自己赢得了向党申请加入组织的权利。今附上我的入党申请报告，请求中央委员会批准。”

不必多言，对这封信，我不仅高兴，而且很感动。我告诉他，我相信他是会被接受入党的。我立即带着这封信去见斯大林。显然，斯大林也很感动，尽管他很少暴露自己的感情。他简单地说，“那么，帕顿已决定要入党。我想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参加。我建议，我们发一道特别命令，接受帕顿为正式党员，免除他通常的预备期”。在那时候，对于来自资产阶级或知识界的

入党申请人，都必须要有一个为期两年的预备期或“候补期”。而帕顿是个例外。

战后，帕顿回到了他自己的工作岗位，在乌克兰科学院当一名研究员。后来，他成了科学院副院长。不久，极大的不幸降临到乌克兰，特别是乌克兰科学家。科学院院长鲍戈列茨同志去世了。许多人知道我赫鲁晓夫对帕顿院士特别器重，认为他一定是鲍戈列茨的继任人。

我应说明一下，帕顿在科学院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人们对他的看法有分歧。我记得，有一次，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跟我谈起对他的意见。他说帕顿不尊重中央委员会，一次应邀参加的党的会议上，他中途退出会场。

我问：“那次会议准备讨论什么问题？”

“有关思想工作的各种问题。”

“怪不得他退出了会场。帕顿同志不能把他的时间浪费在这类会议上。他可能认为，他该回去做他的科学工作。”这件事是帕顿的典型事例。往往有许多蠢人装模作样的围坐在一起，没完没了地、空洞无物地进行讨论，来卖弄自己的学问，对这样的讨论，帕顿是不能容忍的。在这些人眼里，帕顿好像在威胁他们。

假如施加一些影响，我们可以让他当上科学院院长。但我们决定不这样做。此外，帕顿也不想当院长。他的科研工作和他所主管的研究所已够他忙的了。

当帕顿死的时候，基辅在第聂伯河上刚建起了一座横跨两岸的新桥，这是基辅市最大的桥梁。它完全是焊接的，没有用一个铆钉。乌克兰人正考虑以我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新桥。我感到十分惊奇，因为我已通过了一项指令，禁止用至今还健在的党员或政府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工厂、公共设施、集体农庄和其他企业。我们甚至还改换了认为不合适的已命名的单位和建筑。总之，我们彻底摧毁了从斯大林就开始的这种不健康的竞赛，在这些竞赛

里，看谁能用自己名字命名工厂、城镇、集体农庄最多。

我告诉乌克兰人，“如果你们用我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桥，那是直接违背党中央的指令。我比别人更反对这种想法，因为我是这项指令的倡议人。你们必须认识到，你们会使我处于何种境地。为什么不用帕顿院士的名字来命名这座桥呢？”

后来，他们照办了。今天，正如他们说的那样，这座桥完好无损，人们跨过这座桥时，以敬重和感激的心情，缅怀这位建桥有功之臣，苏联工业焊接之父叶夫根尼·奥斯科罗维奇·帕顿院士。

第三节 摆脱轮胎工业中的困扰

下面这一段泛泛的叙述表明，赫鲁晓夫是喜欢当一名实干的工业家；在车间帮个忙，发号一下施令；对工厂经理进行他们本职的业务教育。这既说明苏联在不顾质量为“超额完成计划”而进行的斗争所造成的浪费，也告诉人们在头两个五年计划之后的1939年，苏联工业极端不协调的状况，在这期间，把国家所有最好资源集中起来用来建立重工业。它还说明了引人注目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工作方法：为了区区小事，斯大林动用他最得力助手来修补他发现的漏洞。当时，赫鲁晓夫已进入政治局成了正式委员，又是总管乌克兰4000万人的总督，但仍被调离工作岗位，派往雅罗斯拉夫调查轮胎厂的问题。在那些日子里，斯大林这样的不相信别人，而在生产现场合格的管理人员真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战前有一个时期，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都禁止坐飞机。这

是在米高扬叫飞行员在白俄罗斯坐飞机寻欢作乐后作出的这项规定。报纸上报道了这一事件。当斯大林谈到这份材料时说，他的一个部下坐飞机作航空表演，他对米高扬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并立即作出规定，中央委员以及各共和国的第一书记都不准坐飞机。我对此颇为失望，因我爱坐飞机。有一段时间里，我只好坐火车来往于基辅和莫斯科之间，否则坐汽车。

亚力山大·格奥尔吉那维奇·茹拉夫列夫当我的司机已快33年了。我的孩子们总是叫他萨沙叔叔。他工作干得不错，也喜欢这项工作。我尊敬和信任他。

1939年，一次从基辅去莫斯科的路上，亚力山大·格奥尔吉那维奇告诉我，发给我们汽车轮胎坏得太快了。实际上，它们还是新的时候，就从两边裂开。当抵达莫斯科后，我告诉这一生产中的毛病给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

斯大林从来不喜欢听到有人批评苏联制造的产品。他听了我的意见，表情很不愉快。然后，他怒气冲冲地指令我去解决这一问题，并找出造成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他说，“这样，你也在批评我们的轮胎工业了，对吗？人人都在批评。我们将指派你亲自去处理这一问题。你去调查一下，并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必要措施，以保证我们工厂供给优质的轮胎。”

我回答说，“斯大林同志，我很高兴接受这项任务，但我对橡胶工业和轮胎制造很不熟悉。我曾干过一些有关煤炭、冶金、建筑方面的事务，但对轮胎工业非常生疏。”

“那么自己去把它熟悉起来，马上行动起来。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你就不得回乌克兰。”

于是，作出建立一个委员会的决议，由我任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真有点担心，我不知道究竟要多少时间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也不知道我是否有能力来解决。我主持了委员会的会议，并从雅罗斯拉夫尔轮胎厂、从列宁格勒、从莫斯科以及从政府各

部，召来了专家。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协助下，我把凡是懂一点轮胎生产的人都召集来了。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里，开始了我们讨论。我记得，雅罗斯拉夫尔工厂的厂长从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第一轮讨论结束后，我把每人说的都向斯大林作了汇报，然后提供了我的一些想法。斯大林说，“我建议你去雅罗斯拉夫尔，并在现场解决问题。雅罗斯拉夫尔轮胎厂是我们最好的一家工厂。”

这样，我就去了雅罗斯拉夫尔，并从莫斯科带走了几位专家。地区党委书记是帕托利切夫同志，很多年后，他当了对外贸易部部长。地区执委会主任是个年轻的亚美尼亚人，他跟帕托利切夫一样，都是冶金工程师。我对他们的印象都不错。我一到那里，就对他们说明，为什么到雅罗斯拉夫尔来，并请他们协助开展工作。

首先，我要看看轮胎的橡胶外层的制造过程。我告诉厂长，“现在不要对我描绘整个过程。这是浪费时间，就带我去装配线，我要从头看起。”我视察了整个装配线，这边停停，那边站站，注意看看生产中引起我兴趣的工人。我没有时间去看硫化过程，因此靠专家向我汇报来弥补。

我对工人在轮胎上放帘子线的技术特别有兴趣，我看着他们工作很久。他们干得很熟练和敏捷，甚至工作时连手也不看。他们手的动作很像音乐家的手。我对他们十分钦佩，后来问他们的生产计划完成情况。他们告诉我要用多少层钢丝以及用帘子线的目的。在我所听到的情况基础上，我发现了弱点。我看到过工人们安装帘子线时是多么快，我也知道这种帘子线必须安放好并拉得很均匀，这样每层的绳股就会象合成一股那样结实。如帘子线安放得均匀，它们的耐久性能就会与绳股多数成正比而成倍增加，从而成了整层的抵抗损坏的力量。但是，要是有一层没有安放均匀，每股绳就孤立地抵抗磨损，结果钢丝就会一根接着一根

地断裂。这就是轮胎破裂的原因。当然，尚有别的问题，而这是其中最主要的。

我把厂长叫了来。我说，“米特罗欣同志，请让我看一看你们生产轮胎的操作规程。我想了解一下生产过程中作了哪些规定。因为这厂的设备是从美国采购来的，美国人一定向我们介绍使用的具体方法。”

“是的，这些规程我们都有明确条文。”

“然后把这些规程跟现在的操作情况对比一下，并确切汇报一下究竟作了哪些更改。”

根据米特罗欣的报告，有些操作方法违反了美国公司所介绍的明文规定。钢丝减少了一、二层，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耐久程度足够了。有人还告诉我，在边上用作加固的钢丝总数减少了。有一、二圈被减去了。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为的是使整个生产过程更节约。我马上就明白，问题的要害找到了。

我问道：“这些更改是什么时候作出的？”

“卡冈诺维奇曾来此视察，研究了我们的生产方法。他建议作上述这些更改。”这正发生在卡冈诺维奇还是任运输人民委员的时候。看来，他是带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一同来雅罗斯拉夫的。

“好吧！”我说，“请给我你们跟卡冈诺维奇的正式谈话记录，这样我可以向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作汇报。从现在起，你们应按照美国人采用的工艺规程开始生产。”在我巡视工厂的时候，我看到这厂跟别的工厂一样，都有挂着生产能手或他们叫“突击手”的照片的光荣榜。我就问工厂经理，“你们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同轮胎上放帘子线的美国工人相比，情况如何？”我被告知，“我们已前进了一大步，超过了美国工人。”

根据了解的情况，我们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我便回到莫斯科。在向斯大林汇报时，我强调我们之所以生产劣质轮胎是因为

为了实现节约，我们违反了工艺规程，而这是卖给我们设备的那家公司所推荐的。我们已“纠正”了美国制造商，“改进”了生产程序，但结果是他们的一个轮胎寿命，比我们长10倍，这肯定是你所要节约的！

然后，我告诉斯大林，我认为这是想把生产率和产量定额提高得太快所产生的错误。我们应该避免在牺牲质量的基础上去厉行节约和提高生产率。轮胎工人可能是超过了定额，但却做过头了。他们在缠轮胎的钢丝时，应提醒多注意质量。为了这样做，我们需要降低产量定额。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假如你提高生产水平，而剥夺了工人去注意质量的时间，产品就会被损坏。事实上，工厂光荣榜上的所有突击手毁了他们自己的产品，降低了我们司机的生产率，使我们无法去充分利用我们的总运输能力。

斯大林认真听着，我可以看到，听了我的话，他非常恼火。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任何关心国家福利的人——特别是身处国家领导岗位的人——听到这样的消息，理应感到坐卧不安。斯大林说，“我同意你的汇报，请提出你的建议，我们会批准的。”

在我的报告中，我提出建议：产量定额应降低，工人工资应提高；还有工厂、科研机构和人民委员会的专家们提出的一系列措施。

然后，斯大林说，“我们必须通过一项决议，禁止轮胎厂张贴光荣榜，不鼓励工人开展只顾产量不顾质量的过多的生产竞赛。”

作为总的原则，我是反对这样做的。列宁主义的基本论点是，竞赛是对提高生产率有益的，而劳动生产率是工业发展的基础。然而，在这个特定情况下，我赞同斯大林的主张。

在专家们的协助下，我成功地找到了轮胎生产中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对此，我感到十分愉快。当时，我们觉得战争快临近

了，在战时，军队的机动性依赖于运输业的质量。我深感喜悦的是，生产中问题一解决，正常的生产方式得到了恢复，耐久、优质的轮胎就马上开始出厂了。我们在各家工厂里作了试验，看轮胎不加修理究竟能用多久。如试验结果好的，工厂将获得奖金，这是工人集体所得，因为这是他们为了国家利益而作出的贡献。

不久，雅罗斯拉夫尔轮胎厂厂长米特罗欣升任化学工业人民委员。斯大林没有忘记我对他的推荐，并任命他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我感到很高兴。

从我们整个制造业的规模来看，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一件区区小事，但对我来说，有其特殊意义。我讲这一节为的是想说明斯大林有时能诚心诚意、像政治家那样去处理问题。他是这个国家的唯恐大权旁落的君主和主人。他反对官僚主义、贪污腐化以及营私舞弊等等。他是个伟人，伟大的组织者，他是一位领袖，但也是一个暴君。他常常采用严厉的方法反对至今仍妨碍我们工业的落后现象。他希望改善这个国家的福利事业，无情地消除被他发现的种种弊病。但是，也不能忘记，作为一个暴君，他也做了有害的事情，特别在对待党和军队领导人方面。这是由于他对别人的不正常的猜疑所造成的。

在生产率和生产方面，我们还有不少问题。你或许也看到过不只一次，男男女女在用铁锹铲去路面上的冰雪的情景。这是非生产性的劳动。这种景象令人感到十分难受。在我们国家里，已把许多复杂的生产过程实现了机械化，来减轻劳动强度，第一批人造卫星也制造出来了，然而，我们还来不及把铁锹和铁铲由机器来取代。对这类事情，我们太不关心了，都认为是小事，但这些难道都是无关紧要吗？不，正是这类“区区小事”却占去了许多人的劳动。

第五章 大战前奏曲

第一节 苏德关系

很明显，在危机四伏的战前岁月里，赫鲁晓夫很少留心外交工作；他把全部注意力先是倾注于莫斯科，继而乌克兰的事业上。斯大林也很少把苏联与外部世界的交往通报给他。因此，他没有言及到希特勒的崛起和李维诺夫的“共同安全”运动。他是从那个使欧洲陷入混乱、给希特勒入侵波兰大开绿灯的1939年8月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开始的。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英国、法国9月3日对德宣战。红军于9月17日进入波兰东部。赫鲁晓夫就苏联、德国、英国和法国在这次事件的动机和行为的评论，反映了苏联政府的路线。

战争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希特勒和我们的敌人实际上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准备进攻我们。甚至从法西斯在德国掌权那时起，我们就知道他们或迟或早要对我们发动战争。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此书如此令人作呕，以至我从来没有读完它——已清楚地说出了他对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以及促使他与世为敌的哲学。他发誓要把摧毁共产主义和攻占它的堡垒——苏联作为己任。他上台后，立即开始整顿军队。这不是秘密。整个德国到处都是威胁苏联的大吵大嚷的军事检阅和充满火药味的讲话。

《我的奋斗》只字未提与我们怎样和平共处，而是讲如何把我们砸得粉碎。1939年8月23日，他派遣里宾特洛甫到莫斯科，决不是他立地成佛。不，希特勒还是希特勒，他把自己看成一个决心把俄国人民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下解放出来的武士和征服者。

我是在里宾特洛甫到达的前一天才第一次听说他要来访。那天是周末，我在斯大林的别墅，他告诉我里宾特洛甫第二天将启程前来。斯大林笑着紧盯着我，看我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何反应。开始我惊讶得发呆，凝视着他，心想他在开玩笑。随后我说：“里宾特洛甫为何要来见我们？他是叛逃到我们这边来的还是有其他意图？”

“不”斯大林说，“希特勒给我们拍来个电报，说：‘斯大林先生，我请求你接待我的部长里宾特洛甫，他携带着某些具体建议’。我们同意与他明天见面。”

我告诉斯大林我和布尔加宁、马林科夫约定第二天到伏罗希洛夫的保护区去打猎。斯大林说：“那就去吧，反正明天这儿你也插不上手。莫洛托夫和我将会见里宾特洛甫，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当你打猎回来后，我将让你知道希特勒在想什么以及我们和里宾特洛甫的会谈结果。”

那天晚上，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我前往扎维多瓦猎场。到猎场后，我们才发现伏罗希洛夫早已到了，这样他未能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道会见里宾特洛甫。^①猎场上还有一些元帅和将军，我们聚在一起打猎。这天真痛快，天气暖融融的，打猎收获

^①当里宾特洛甫飞抵莫斯科时，在英法代表团的想象中，为了使英法政府能和俄国政府结盟，他们仍在与俄国人谈判，虽然这种谈判看来迟了点并且不是真心实意地。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罗夫元帅是俄国与英法谈判的主要发言人。使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在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订条约决定命运的那一天，伏罗希罗夫竟去打野鸭子了。与此同时那些英国人和法国人对此也全然不知，搁在一边空等。

不小——特别对我来说，请别误解我在夸耀自己的打猎技术，那天我确实比伏罗希洛夫多打到一只野鸭子。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仅仅是因为报界已经开始把伏罗希洛夫作为我们的神枪手，加以报道。

打完猎后我们直接返回斯大林的别墅，我得知斯大林将邀我们共进晚餐，便带去打来的野鸭，以便能与其他政治局成员分享。我把打猎的情况告诉了斯大林，用玩笑的口吻自夸着我们在猎场上的成就。当时他情绪极佳，还说了不少笑话。斯大林对打猎的态度通常取决于他当天的心情。如果他的心情特别好，或许他想亲自去打一场。但有几次他呆在家里，毫不客气地抱怨那些外出的猎手。斯大林反对打猎，并不是他的思想建立在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这一基础上——绝对不是这样——他仅是认为，打猎浪费时间。当然，就打发时光来说，我不认为还有那位当政而又比较负责的领导人象斯大林那样围在餐桌旁吃呀唱呀浪费的时间更多的了。

无论如何，1939年8月间那个星期天，我们在斯大林别墅相聚吃晚饭。当猎物正当烧制之时，斯大林告诉我们，里宾特洛甫带来一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草稿，我们已在这个条约上签字。斯大林对此似乎非常得意。他说当那些仍在莫斯科的英国人法国人次日发现这个条约后，将会立即打道回府。来与伏罗希罗夫谈判的英法代表压根儿就没想过与我们联合对付德国。我们与他们的讨论也是对牛弹琴。我们知道他们并不真想与我们结盟。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借此激怒希特勒来反对我们。我们巴不得他们早点离开。

那就是西方称之为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如何签订的情景。我们完全懂得希特勒企图用此条约来愚弄我们。我亲耳听斯大林说过，“当然，这纯粹是场赌博，就看谁能捉弄谁了。我知道希特勒在打什么算盘，他想他能瞒过我，但实际上是我在捉弄

他！”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贝利亚和我以及政治局其他一些成员这么说。由于签署了这个条约，战争不可能很快落在我们头上了。①我们能够维持中立，保存实力，静观局势变化。

诚然，也有人认为，希特勒既然想与我们谈判，他必定是害怕，不敢进攻我们。这样解释条约，我们听起来也很顺耳。许多苏联人完全相信了条约并自我庆幸。但是，我们这些政府领导人心里是明白的，我们不自欺欺人。我们知道最终将被卷入战争，我认为斯大林是希望由英国法国把希特勒拖得精疲力尽，使他先征服西方再挥师东进的计划受挫。斯大林的这一希望必定是我们同意签订条约这个战略的一部分。

我认为1939年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历史的必然。说到底，它还是有利于苏联的。就象下棋，丢车保帅，以求大胜一样，如果不这样干，战争就会提前爆发，这对我们太不利了。而这样，我们获得了喘息时间。我想党内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签约在战略上对我们是明智之举，虽然没有敢如此公开说。甚至在党的会议上我们也不能讨论这个条约。要我们用报纸宣传的说法来解释签约的理由那是令人作呕的，更有甚者，没人相信我们。要我们接受与德国结盟的观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反法西斯分子，与法西斯分子的哲学和政治观点格格不入。要我们接受这种荒谬绝伦的事已经够困难的了，要我们到街头向群众作解释，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已与希特勒达成了和平共处的协定。一般来说，与德国人共处是完全可能的，但不是与希特勒的法西斯匪徒共处。

对他们来说，德国人也在利用条约作为赢得时间的一个策略。他们的观点，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联合反德的国家分而治

①赫鲁晓夫这儿提到的战争自然是指苏德之间的“伟大的卫国战争”，这场战争直到1941年6月才开始。

之，因为这些国家有可能再次联合起来反对德国。希特勒想在一个时期吃掉一个对手。他认为，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其原因就是她企图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与我们签订条约是他企图把未来的战争限制在一条战线上的手段。

英国、法国和所有的资产阶级报纸始终在鼓动希特勒转向苏联，他们鼓吹“俄国不足为奇，仅是一个泥足巨人而已！”英国和法国的如意算盘是，他们宁愿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看着德苏互相厮杀，拼得鱼死网破。当英国和法国看到希特勒急得发狂以后，去吸我们的鲜血，掠夺我们的土地和财物，他们却躲在暗处，看到这种状况时，一定高兴得直搓手。如果把战争当作一场赌博，你可能会如此打算：赌博时尽可能以条约为挡箭牌躲在暗处，避开飞来的炮火——这样就可避免西方列强希望横祸落在我们头上的厄运。如果有这样的结局，那么我认为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再合适不过了。

希特勒首先通过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向我们提出他的条约建议。正如历史表明的那样，舒伦堡是真心诚意赞成加强德苏和平关系的。^①他反对希特勒发动对我们作战的计划也是毫无疑问的。当莫洛托夫召见他讨论条约中的某些问题时，他满面春风地说：“上帝自己给我们帮忙来了！”当时我们认为他那是故作姿态，但后来我们认识到他对签订条约的高兴是诚心诚意的。他懂得在和平友好、互不侵犯共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德苏关系是必要的。他必定把他的观点中某些方面汇报给希特勒，只是希特勒没有理睬罢了。舒伦堡参与了1944反对希特勒的密谋。密谋失败后，他跟其他一些人都被处死刑。

在条约签订后的那个时期，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履行了——至

^①维尔纳·冯·舒伦堡伯爵为保持德苏间的和平，确实使出了浑身解数。

少表面上履行了——条约给双方规定的义务。双方交换详细的情报。据我的回忆，莫洛托夫经常向斯大林报告说，“舒伦堡说……舒伦堡传来……”等等。当然，舒伦堡从我们这儿取走情报的兴趣远比他来送情报的兴趣高。记得有一次我在斯大林处，莫洛托夫讲了这样一件事：他把舒伦堡叫到他办公室，舒伦堡注意到一些速记员正在作无线电广播记录，就说：“你们怎么还要作速记……”他嘎然而止，但莫洛托夫却把他脱口而出的话默记在心。他从舒伦堡显然说漏嘴了的话中推测出，德国想必有某种记录无线电广播的机械装置，因此不再需要速记员了。直到战后，我们才发现他们有磁带录音机。这就可以解释清楚德国的谍报人员为何在监听无线广播方面比我们强多了。密码电报传递迅速，一个速记员把它完全记下那是不可能的，更有甚者，那是密码，磁带录音机可以录下来，再慢慢地放，然后就可以破译。这样，舒伦堡无意中向莫洛托夫说出的一句话，首次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德国人已经发明了磁带录音机。

根据条约，我们向德国提供一定数量的小麦、食油和其它产品。我们一切按期交货。希特勒则给我们一艘战列巡洋舰作为补偿。他甚至派出专家帮助我们对巡洋舰进行装配。德国一位海军高级官员到达列宁格勒帮助领导整个装配工作。我们给他安排适当的膳宿供应和工作条件。然而出了一件丑闻。好象是我们的谍报机构在他下榻的地方安装了各种窃听和摄影装置。实际上这个海军将军是个爱慕异性的人，于是我们的谍报机构用一个年青多情的女人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企图拍下他和这位女郎在一起的下流姿势，这个工作连续了数夜，直到这位将军听到有一阵呼呼作响的声音，他开始满屋子搜寻，又把挂在墙上的一幅大画取下，画面上钻有一个小孔。小孔后面，他发现了一个照相机，他立即提出控告。我们的契卡人员认为可以与他在不声张的情况下了结此事，再把他列入我们的情报机构的名单上。但德国将军的上级

对他玩弄女性压跟儿就没当一回事。①

希特勒还就发生的这件事亲自掀起一阵骚乱。我记得斯大林知道契卡人员怎样处理整个事情的过程后，对贝利亚非常生气。我就是通过这事才知道有这么一艘巡洋舰的。后来，当战争结束后，未装好的巡洋舰仍然躺在列宁格勒。有人认为，希特勒之所以给我们一艘巡洋舰，是他准备与我们共同分享其军事技术。实际上，希特勒相信，在巡洋舰完工前，他已经摧毁了苏联，而巡洋舰仍将属于他。

我记得另外一个有关希特勒是如何在外表上装着他是忠实履行不侵犯条约的例子。我们与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叫做斯科达的军工厂订有一个合同，规定给我们提供一些高射炮，这些正在制造的高性能的88毫米高射炮，是与我们以前从斯科达工厂买回的样品一样的。合同还规定我们可以买到一些205毫米的加农炮。当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斯科达中止了合同，希特勒亲自干预此事，命令斯科达继续供我们的定货。斯科达服从命令，交付了一批205重型加农炮，但数量太少，起的作用有限。然而88毫米的高射炮，我们自己的工厂能仿造了，战争中用作高射炮和反坦克炮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时期，德国人一直在估量我们技术上的熟练程度，特别是我们的机械化设备的质量。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弱点，这也使他们受到鼓舞。然而，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他们太低估了我们。

从1940年起，我们与希特勒的关系中出现了许多争端。我们内部经过长期协商，决定莫洛托夫应该去柏林。我于1940年10月11日返回莫斯科，莫洛托夫已从柏林返回。他说他的专列从苏联

①通过这段插曲，可以看到一点苏联秘密警察行事的特点，他们现在仍和以前一样。赫鲁晓夫所批评的，仅是参与干这事的一些人，把自己暴露了。

边境开往柏林途中采取了严格的完安措施，还提到谈判期间由于英国的空袭，^①迫使希特勒和他的侍从人员躲进防空洞。莫洛托夫说，可以讲使用防空洞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莫洛托夫自己的性格就是少言寡语，这次他竟绘声绘色地说希特勒是个不善言语、滴酒不沾的人，在一次官方宴会上，希特勒甚至连酒杯都未摸过，席间只喝点茶。

从莫洛托夫对斯大林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中，我得出结论，他的柏林之行增强了我们关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已迫在眉睫了的总的信念。斯大林的脸色和举止都表明他内心的焦虑，但他很少让我们分担他的忧愁，甚至也没有就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我记得当赫斯飞到英国时，德国散布谣言说他是逃跑的。我对斯大林说，“德国人肯定隐藏了某些东西，我不相信赫斯飞到英国真是逃离德国，我想他必定是在执行希特勒的秘密使命，与英国谈判突然中止西部战争，以便希特勒腾出手来东进。”^②

斯大林听完我的意见后说，“是的，情况是这样，你分析得很对。”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进一步说出他的想法，仅仅是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在长期相处中知道，如果他不告诉你什么，你也别问，这已成为惯例。和普通工作人员打交道，这或许是个很好的方法。但对政府官员，这可不怎么合适了。用这种方式对待

^①1940年11月13日晚上，正当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就“势力范围”和其他的谈判进入关键时刻，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作了一次友好访问，正如斯大林后来在德黑兰告诉丘吉尔的那样，空袭时德国人仍坚持认为英国人已完啦。莫洛托尔反唇相讥：“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为何要躲到此地，谁正在向我们扔炸弹呢？”对希特勒来说，邀请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是最后一张挡箭牌。一个月以后他签署了题为“巴巴罗沙”的第二十一号命令，指示他的将军们作好准备，在对英战争结束前打垮苏俄。

^②时至今日，许多俄国人仍相信英国人与赫斯搞了某些阴谋活动。

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的成员，那就违背了一个真正民主的党所必须遵守的准则。那就是在30年代、40年代在我们党内发生的事，这是列宁的党。递送给政治局成员的情报，先要经过斯大林仔细地筛选、删节、掂量。根据党章，他无权这样做。他随心所欲地这样干。这一事实正是他独断专横地统治的另一表现。而这种独断专横在斯大林时期也就是法律。

这年冬天我再次到莫斯科，不是1940年底就是1941年初。我刚到就接到通知，说斯大林在近郊别墅（斯大林别墅的专有名字）等着见我。当我到那儿时，斯大林正躺在床上看书。他告诉我他有点儿不舒服。然后开始对我谈起军事问题。我们两人单独谈论军事问题，这可是唯一的一次。显然他正需要人聊聊，而不管他是谁。当他独自呆着时，常常闷闷不乐，好象受到某种压力。我想我们关于未来战争的谈话，仅是他留我在那儿陪伴的借口。我仅能作出这样的解释，因为他通常觉得与他人交换意见没有必要，他自己的能力和意见，远比其他任何人的更应该受到重视。

在1940—1941年冬季时节，斯大林开始抱怨未能参加正在进行的军事会议。当我和他在一起时，他给铁木辛哥^①打电话，气冲冲地与他争论，强调大炮的重要性，并批评已经作出的只有利于其它种类武器的某些决定。斯大林对我们的防务状况明显地表示担心，外部表现出来的惊恐不安，是合情合理的反应。我们国家正面临着乌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

当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法军停止了抵抗，德国人进了巴黎的消息时，我们都聚集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听到法国陷落后，神经受到极大打击，他咒骂英、法政府，失望地问道：“他们就不

^①谢苗·铁木辛哥元帅在1940年对芬战争以后取代了伏罗希洛夫担任国防人民委员。芬兰战争前他在乌克兰任基辅军区司令。

能作任何抗衡吗？当时莫洛托夫和我与他在一起，贝利亚和日丹诺夫也可能在场。

希特勒对欧洲的征服完全成功后，便迅速调动军队直扑苏联边境。波兰陷落后，希特勒的军队与苏联之间，仅隔一条临时边界。德意日都是很难对付的国家，他们又结盟反对我们。苏联面对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压力和致命的威胁。美国对我们是逆水救不了近渴，此外，如果苏联遭到攻击，当时美国将作何种反应，很难捉摸。英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并且无人知道，如果希特勒跨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他们是否能守得住。

希特勒明白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危险，尽量要我们蒙羞受辱。我记得斯大林有次告诉我，希特勒通过秘密渠道送信要求帮个忙。希特勒要斯大林——这个在共产党世界具有最高权威和声望的人，去说服法国共产党不要领导反对德国占领法国的抵抗斗争。斯大林对此感到愤慨。他做出何种回答，那是不言而喻的。希特勒已经下流堕落到如此地步了。他怎能指望斯大林去干这样卑鄙的事呢？他怎能指望斯大林与法西斯匪徒携手合作反对法国共产党呢？①

我还记得希特勒厚颜无耻的另一例子。他们把占领但泽一事，拍成了一部电影。他们事先架好了电影摄影机，从海上陆地把战争场面拍下来。希特勒想把此片在世界各国发行，夸耀一下军威，吓唬吓唬他未来的对手。他要全世界看到法西斯军队给予的打击是怎样不可抗拒的，怎样使人胆颤心惊。希特勒向斯大林提议，在我们电影院里放映这个片子。斯大林同意，只提一个条件：“我们放映你们的片子，但你们也放我们的片子。”我们自己也有一些给人印象深刻地表现我们军队演习和检阅的片

①愤怒的赫鲁晓夫并未提到斯大林早些时候在希特勒面前出卖德国共产党的事。或许他对此全然不知。

子。不用说，正如斯大林所预料到的，希特勒不会同意这种交换。那就是斯大林如何抵制希特勒破坏我们意志的情况。无论如何，希特勒的电影还是送给了我们，我们与斯大林一道在克里姆林宫观看了它。大家心情沉重，我们都明白，我们国家将是希特勒调转矛头准备攻击的下一个目标了。

当时，我们一些剧院正在上演题为《通往柏林的钥匙》的剧本。这是我们为对付未来的战争在心理上有所准备的运动的一部分。德国人正在吹嘘说他们是无可匹敌的，他们很快就要用武力征服世界上所有国家。我们这个剧本使人缅怀起往事，它告诉人们在历史上，俄国军队曾打垮过德国军队，占领过柏林城，因而获得了通往德国首都柏林的钥匙。很不幸，实际情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没有获得去柏林的钥匙，而我们本应该有这个权利的。

第二节 向波兰挺进

本章和下一章，赫鲁晓夫谈到了苏联历史上更隐蔽更恐怖的一些情节：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中的秘密条款，苏联占领了波兰东部即波属乌克兰。当主力放在西部的波兰军队在遭到德国人第一次闪电战打击溃退时，红军却悄悄地狠狠地在波军后面插了一刀，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推进到新的边界，与纳粹分子同流合污，实现了第四次瓜分波兰。

作为苏联乌克兰头目的赫鲁晓夫，负责建立起一个以利沃夫为首都的政府，实际上就是在吞并来的土地上实现苏维埃化。这也是一项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所进行的工作。铁木辛

哥领导的红军的任务则是围歼整师整军的波兰军队，安排把他们转运到苏联内地的监狱和劳动营。15000名波兰军官失踪了，后来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开亭森林的万人坑发现4000多具尸骨。他们是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枪杀的。有20多万波兰男女囚犯被遣送到集中营，其中许多就死在那里。其他一些人，在德国入侵苏联后，根据斯大林—西科尔斯基签订的协定获得释放，遣送到南方，有许多又死在途中。幸存者最后在英国的保护地波斯和中东的避难所里栖身。原来的士兵在那里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他们与盟国军队在卡西诺和其他地方进行了英勇战斗。

在除掉军队和资产阶级的同时，赫鲁晓夫用苏维埃方式操纵了选举，建立了傀儡政府，并由该政府请求把被占领土与苏联合并。要让人知道赫鲁晓夫是否完全了解这次大规模暴行是不可能的。他兴致勃勃地谈论着那些逮捕并坚持说这些逮捕是必要的。但是作为4000万人民的最高统治者，不可能知道以他的名义所干的全部事情的细节。他周围尽是一批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及背信弃义的人，当然也有一批热情忠于俄国的人（虽然波兰共产党已经被斯大林搞垮）。他对仔细审查后才让举行的群众大会，对群众“发自心底”的欢呼场面，他总是喜笑颜开的。由于对苏联以外任何地方的生活都一无所知，又对列宁主义坚信不移，他就自信他是给被压迫者带来了幸福和光明。那些卑鄙事都是乌克兰内务人员委员主席伊凡·谢罗夫干的。

在波属乌克兰的确有大量的被压迫者。贝克上校的政府中的右翼就是非常专横傲慢的。更有甚者，乌克兰的历史上就是战祸不断（乌克兰这个词就是“交界地区”的意思）。第一个俄罗斯国家就建在基辅。13世纪鞑靼人入侵以后，莫斯科取得了支配地位，到15世纪末鞑靼人被驱逐后，莫斯科

的大俄罗斯人与乌克兰的小俄罗斯人在许多方面已有不同，那时乌克兰是个有争议的地区，时而波兰人开来，时而又属立陶宛人统治。到17世纪，基辅和东乌克兰又回到莫斯科沙皇的统治之下。西乌克兰仍属波兰的一部分。到1772年波兰第一次被瓜分时，西乌克兰的一部分给了俄国，另一部分被奥地利占了。利沃夫当时称伦贝格。乌克兰人早已形成自己的民族特征和民族语言——与俄语相近似的一种语言。虽然他们的国土被大国所瓜分，但他们仍保留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并在1918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好景不长，乌克兰再次被瓜分，这次是苏俄和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干的，到了1939年，铁木辛哥率领的红军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维埃政府强行抢占西乌克兰，波兰再次亡国，不再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占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不放，而把新成立的共产党波兰政府的边界推向德国腹地——奥得·尼斯线——并把那儿的德国居民赶走。这一章的确有趣，有参考价值，它里面暴露出来的克里姆林官对东欧的态度与我们的如此格格不入

从我在乌克兰的位置出发，如何看待德—苏条约呢？

象所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忠实信徒一样，德国人认为，既然苏联是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只要用刺刀轻轻一捅，它就会土崩瓦解。他们希望出现民族骚乱，从而使人民团结的中心受到毁坏。这种幻想，也是对世界上对苏联幸灾乐祸的人，是一种宽慰，同时也鼓励了德国人集中对乌克兰施加压力。①

波兰完全陷落后，希特勒把他的军队直达我们边界，枪口指

①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德国人也是对的。当他们1941年入侵后，大批乌克兰人在幻想破灭前，都把她们当作解放者来接待。

向东方。既然我们与德国人签订了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希特勒还不遗余力地在边界筑碉堡设防线，看来是大可值得怀疑的。我把正在发生的这一切都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必定已意识到这种威胁，但为了减轻我们的恐惧，他对我们的报告不是装聋作哑，就批评我们对德国人的估价是小题大作。

有一件事在我头脑里印象极深。当我们在西乌克兰开始改造我们的铁路，把欧洲的窄轨改成我们的宽轨铁路。我们与德国人来往密切，德国人在许多场合出来劝说我们不要进行这种换轨工作。我知道他们在打什么主意，并立即向斯大林报告说，德国人一定是想在未来不久利用我们现在的窄轨线为他们的自己的火车服务。这次斯大林不得不同意我的看法。他生气地诅骂道：“你们继续干，下命令尽快把其余的窄轨改换过来。”我们把铁路改建完了，但并没有给德国人造成多大的困难，因为他们入侵后，随着部队的推进，仅简单地又把它改成窄轨道就是了。建筑工作队紧随法西斯军队之后，把道钉拔出，把两条铁轨挪近一些，再钉上新道钉就了事。

波兰陷落以后，尽管德国人对我们出言不逊，傲慢骄横，在他们大规模入侵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前，还是小心避免与我们发生军事冲突的。我有机会在瞭望所里密切注视他们，作为基辅地区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经常与司令员铁木辛哥共同外出，视察我们驻守在边境的军队。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后，波兰政府和波兰战争机器彻底崩溃一事，使我们吃惊不小。波兰人曾经骄傲自大、趾高气扬，当面驳回我们关于与他们军队联合起来的建议。现在他们的军队却得了个一败涂地的可耻下场。①

①波兰拒绝考虑与苏联、英国、法国达成任何有关在与德国交战时允许苏联军队过境参战的协定，这确实是自讨苦吃。他们当时的确骄横、目中无人，在德国人的闪电战打击下很快溃不成军。但是赫鲁晓夫也应该记得，在讲别人“一败涂地的可耻下场”前，别忘了过不了多久，红军自己在芬兰人面前得了个“一败涂地的可耻下场”，1941年6月，又在打败波兰人的德国人面前一败涂地。

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在波兰与苏维埃乌克兰之间划了一条新的疆界。我们越过原来的边界向西推进，实际上没有遇到抵抗。我们先把军队开到捷尔诺波尔，再穿过主要是乌克兰人居住的波兰村庄。进军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们已经接近利沃夫，刚好抢在德国人前面一点点到达那里。我们希望避免与欲进入利沃夫的德国人发生冲突，于是我们决定派遣雅科夫列夫——他现在是炮兵元帅——到德国阵地上谈判。^①他懂得点德语。如果德军为所欲为的话，他们就会抢先进入利沃夫，洗劫该城。但既然我们的部队在戈利科夫^②指挥下抢先他们一步到达那里，德国人就谨慎地没有向我们表示任何敌意。他们履行条约上的规定，在交涉中对戈利科夫说“请吧，我们的客人！你们优先！”希特勒正在下更大的赌注，他不想为一个小零头就开始向我们动武。他要我们相信他是个守信用的人。于是德国军队撤到根据条约规定的边界上。

我们自己的军队和当地居民都为西部乌克兰并入了苏维埃乌克兰而欢欣鼓舞。乌克兰人祖祖辈辈就住在这块土地上，只有大城市是个例外，利沃夫的波兰人就比乌克兰人多。但这个多数是人为的。不让乌克兰人在城里找工作，甚至扫马路也不行。为了确保波兰人在城里占统治地位，这种种族歧视是作为一项政策来贯彻执行的。

假如你把苏联获得西部乌克兰仅是为了得到领土的观点来看的话，你会发现除了我们应得的那些领土外，我们实际上毫无所得——因为这些土地是1920年由毕苏斯基占去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①V·F 雅科夫中将后来出任列宁格勒前线苏军第四军司令。

②P·I·戈利科夫后来升到元帅，担任过利沃夫军区司令。

兰的土地，①当然，有些乌克兰人，出于民族主义的原则，对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不太高兴。他们认为在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仅是临时的，他们宁愿以寇松线为界，这条线比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划定的边界更向西。

从1939年签订条约到1941年战争爆发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给我们制造的麻烦比任何人都多。落入我们手中确实属于他们的文件证明，他们在接受德国的指令并得到财经援助。这一情报成了希特勒正在准备进攻我们的铁证。希特勒是利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作为他的第五纵队，当德国人入侵后，那帮民族主义分子多次帮助德国情报机构在当地进行工作。②

在希特勒入侵前，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巴不得即将来临的战争早点爆发，那是因为戈培尔的欺骗宣传使他们相信希特勒会把那些“莫斯科”人驱逐出乌克兰，然后把乌克兰的独立作为礼品赠送给他们。这些民族主义分子真是睁眼睛，他们竟不明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在世界上最先进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将会给人类贡献些什么。

当我们进入利沃夫市后，把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头目斯捷潘·班杰拉从监狱中放出来，真是个错误。斯捷潘·班杰拉何许人也？多数人至今仍全然不知，有些人甚至把他与伊尔夫和彼得

①在革命前，这些土地是帝俄版图的一部分。1863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之后，波兰就不再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存在了。1918年11月，一个独立的波兰宣告成立。1919年初，毕苏斯基将军出任总统，巴德烈夫斯基，一个钢琴家出任总理。布尔什维克企图重新取得俄国的支配地位，由图哈思夫斯基率领的一支军队就向华沙进军。毕苏斯基击退了他们，根据1921年3月签订的里加条约，肯定了波兰拥有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一部分领土。

②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赫鲁夫很难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作出合适的评价，是贬低他们的力量呢还是抬高呢？事实上它的力量是很弱的。

罗夫小说里的主人翁奥斯泰甫·宾杰尔混在一起。跟他父亲一样，斯捷潘·班杰拉也是斯坦尼斯拉夫地区的一个牧师，曾一度在利沃夫工艺学院学习。由于认为他与暗杀波兰内务部长一事有牵连，他被捕入狱。对反动的波兰政府里的一个部长的死去，我们才不会悲伤呢。然而，当我们在释放象班杰拉这种囚犯时，事先没有很好地审查，这的确表明我们缺乏正确的判断。班杰拉作为波兰政府的反对者的活动记录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象班杰拉这种人同样也是苏联的敌人。他们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因而对苏维埃政权有一种病态般的敌意。班杰拉本人就是德国法西斯的一个彻头彻尾的代理人，后来他给我们带来一系列麻烦。诚然，当班杰拉看到希特勒分子不打算遵守允许乌克兰独立的诺言时，他曾调转矛头反对过希特勒，这也是事实。但甚至那时他也没有停止仇视苏联。战争后期，他既与我们作战，也同德国人作战。战后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与苏联军队曾发生过一次激烈的战斗，我们损失了好几千人。^①

我还想就另一悲剧事件说几句，这次悲剧刚好是在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签订不久发生在乌克兰的。我无暇亲自处理这些事。此外，由于我是政治局委员和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书记，要我亲自去料理这种事也是不得体的。这些事是由乌克兰的内务人民委员谢罗夫同志报告给我的。

谢罗夫的工作需要他与盖世太保进行接触。一位盖世太保的

^①战后多年直到斯捷潘·班杰拉被杀，他一直是苏联当局感到头疼的问题。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他的活动从未报道过，但为了粉碎他领导的叛军，苏联当局采取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和警察行动，动用了坦克、飞机、重炮等武器。班杰拉的叛军是由具有献身精神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苏军的逃兵、以前的战俘、各种各样的难民和一些其它民族的人组成的。所有这些人联合在一起都是出于对莫斯科的恐惧和仇恨。

代表因公务经常到利沃夫来。我不知道盖世太保在乌克兰有何种情报网，只知道它是十分广泛的。这个情报网是靠一项交换协定组成的。根据这项协定，德占区的人，如果想回到被苏军占领的以前属波兰领土的家乡来，我们允许他们迁回；任何一个苏维埃土地上的乌克兰人，如果想偷偷移居到德国占领的波兰，我们也会放他走的。

谢罗夫给我描述了这样一个情景：“要求允许去波兰的人在登记处外边摆了长蛇阵。”我走近一看，使我感到吃惊的是队伍中多数人是犹太人，他们正在贿赂盖世太保的代理人，以便尽快返回他们的老家。

盖世太保的代理人正迫不及待地接受贿赂，都发横财了。他们再把这些犹太人直接运到毒气房。我们无力阻止他们。他们要回家，或许他们在波兰有亲戚，或许仅是想回他们的出生地。他们应该知道德国人正在如何处置犹太人。当然，等待这些波兰犹太人的绝不会有好的结果，这是他们命中注定的，本来在苏维埃领土上，却偏偏要跑回现在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地方去。

西乌克兰的波兰知识分子对红军的到达有各种各样的反应，许多仍然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曾被迫服从强加在波兰头上的法西斯状态。他们目睹了波兰政府的垮台。华沙已是废墟一片，其他城市也遭到巨大破坏，用以资产阶级理论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文化培养出来的波兰人感到正在失去他们的民族特征。由于他们既不懂也不接受马列主义学说。他们想象不到随着他们的土地并入苏联，他们的文化将更丰富多彩。换言之，当西乌克兰的乌克兰人觉得红军解救了他们时，而波兰人则感到受压制。

苏占区多数波兰人是反对苏维埃制度的。但要他们在希特勒对波兰其他地区的残暴统治与苏维埃之间作出抉择的话，他们就在两害之中取其轻，选择了苏维埃。不幸的是有些波兰知识分子逃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死在盖世太保的活动毒气室和焚尸炉

里。①

我记得有件事把我搞得狼狈不堪，又使我十分痛心。当我们开进利沃夫后，知道那儿有个名叫万达·班德罗斯卡的著名波兰歌剧演员。我叫我们负责文化事务的人与她谈判，给她提供机会到基辅、哈尔科夫、敖得萨歌剧院演出，我想如此诱人的机会一定会吸引她留下，我不想让她这样颇有名气的歌唱家返回到已被法西斯占领的波兰领土上去。让她到波兰去唱，这对波兰人民和苏联人民都是一种侮辱。但班德罗夫斯卡欺骗我们，她假装对我们提供的机会非常感兴趣，同时却瞒着我们与法西斯谈判。她被德国人诱拐到了德占区。一天谢罗夫告诉我，“班德罗夫斯卡走了，去了克拉科夫，并在那儿的剧院露面，为德国军官们演唱。”

尽管受到这样的挫折，我们仍然相信西乌克兰的波兰知识分子也和波兰的工农大众一样，将会正确认识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的必要性，接受苏维埃的统治。签订条约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不明智的波兰政府——即专门仇苏和以本国工农大众为敌的愚昧无知的毕苏斯基分子政府的过错。他们担心与我们的任何接触可能会鼓励他们自己社会中那些热爱自由的人。他们认为波兰共产党最可怕，不愿做任何可能使波兰共产党增强力量的事。毕苏斯基知道，如果他们与我们联合对德，他们的命运就将服从波兰人民的意志，于是拒绝我们的援助。其结果是波兰大部陷入希特勒之手，而西乌克兰与东乌克兰联为一体，它的人民有机会成为苏联公民。

①当然，在1939年时还没有毒气室。希特勒作出杀绝欧洲犹太人的决定后，在1941年才在奥斯威辛·特烈勒林卡等集中营建造起毒气室的。1939年，犹太人在德国正遭受大规模残暴地迫害，但对波兰犹太人来说，特别是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逃离可能认为花买路钱通过德国进入西欧的机会要比从苏联劳改营逃走的机会多一点。

第三节 在西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

赫鲁晓夫在本节继续讲述关于把波属乌克兰合并到苏联的故事，还谈到了一些1940年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事。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推行苏维埃化——逮捕、流放、所有这一切——同在乌克兰贯彻执行的一样，但不同的是：这些小国家的人民决不是俄罗斯人，而且他们保持的生活水平远比苏联人要高得多，对他们苏维埃化就是把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苏联人的水平上。

在我的领导下，我们在从波兰合并过来的土地上继续从事着建立苏维埃政权和促使形势正常化的工作。在谢罗夫同志协助下，我在西乌克兰倾注全力建立地方党组织。地区委员会主要由苏维埃乌克兰（东乌克兰）去的人组成。基层的委员会则大量地使用地方党组织中的活跃分子。在波兰知识分子中间，尽管有强大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影响和反抗，但多数人还是承认苏维埃这一现实。即使西乌克兰的共产党在1936—1937年大清洗中被解散了，在这个地区仍有许多同情我们的共产党员。

西乌克兰某些地方党的工作人员心眼很好，但过于天真，我记得有一件事情特别有趣。一次我访问利沃夫革命委员会，想了解一下那儿的主席是如何工作的。他的办公室挤满了人，他们都是前来要求他解决与城市管理有关的各种问题——有轨电车的线路情况、道路需要修整和最重要的是城市水电的供应。在过去，负责这些工作的都是波兰人，他们现在跑到委员会来是要新政府承认他们并得到指示。革委会主席坐在这些人中间，他个子魁梧，

脚穿高腰毡毛鞋，羊皮茄克外还穿了一件宽大的外衣。当时正值深秋，天气开始转冷。两支左轮枪露在外套外边，十分醒目。如果不是太重，想必还要在肩上扛着大炮。人们围绕他坐着，等他发话，显然是有点怕他。他下班后，我告诉他，看到革命委员会的主席那样工作我实在感到吃惊。“听着，”我对他说，“决不能这样了，你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恐怖的印象，这将败坏你自己和党的名声。如果真有一个恐怖分子冲进来要杀你，你能怎么办？他只要你自己携带的一支手枪就能杀你！从现在起，你如果想携带左轮手枪，一定做到不要让枪柄那样翘在外边。”

在西乌克兰的利沃夫和其他一些城市还有一些让我惊讶的事，那就是当地犹太人的态度问题。在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都有为数不少的犹太人。他们中的某些人参与了这样或那样的反苏活动。有些犹太人与乌克兰人一起，属于一个反波的民族主义者组织，自称是保卫乌克兰的共产党。^①我记得有次我们邀请一些乌克兰人、犹太人和波兰人——多数是工人，但有些知识分子——在利沃夫的歌剧院举行会议。与会的犹太人发言时，自称他们是“意第人”，这使我大为惊奇。他们在说什么事时总是说：“我们意第人在这儿宣布，我们赞成什么什么。”会后在过道上我留住他们中的几位问道：“你们竟敢使用‘意第’这个词？你们不知道它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称呼，是对犹太民族的侮辱吗？”

他们解释说：“在西乌克兰这儿恰恰相反，我们自称意第人，并认为‘犹太’一词才是侮辱。”

显然他们说得也对，如果翻翻乌克兰文学作品——以果戈理为例——你会发现‘意第’一词并不是来嘲弄或侮辱别人的。但是，即使他们把这个习惯用法给我们作了解释，一听到这个词还

^①该组织的俄文缩写字母正好与西乌克兰产党相同。

是起鸡皮疙瘩，直到后来我们才习以为常。①

当我们企图谋求得到西乌克兰知识分子的支持时，我听说有位名叫旺达·利沃夫娜·华西列夫斯卡的作家，她在波兰知识界中间很有号召力，后来我们成了莫逆之交。她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机警而且很诚实。后来她成了一无限光荣、无限忠诚的共产党员，是少数几个能敢与斯大林顶嘴，但仍能得到他的恩宠的人中的一个。她是从华沙徒步逃到我们军队占领区，到达时跟普通农民一样打扮，穿着一件羊皮上衣和一双黑便靴。她出身于波兰一家有名望的家庭，其父是波兰毕苏斯基政府中一个部长。甚至谣传她是毕苏斯基的教女。然而我从未向她打听过这是否属实。重要的是，她对在波兰土地上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她帮助我们做通了西乌克兰的许多波兰人的思想工作，这些波兰人始终抱着陈腐观念，认为我们与德国人谈判签订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是牺牲了他们的利益。②后来，我还结识了旺达·勒沃夫娜的（即华西列夫斯卡，译者注）女儿叶娃，她住在苏联，在莫斯科一个大图书馆里工作。

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起代表西乌克兰人民的组织机构，让他们有机会自己表示：他们是否愿意加入苏维埃国家？为了决定这个问题，选出的代表在利沃夫举行了一次会议。当会议开始时，我坐在一个专设的席位上，观看大会如何进行。这是一次鼓舞人

①在我们的语言中，贬义词“意第”（yid）与俄语中一词意义近似。西乌克兰的犹太人实际上自称作“意第泽”（俄文zuidze），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任何到过那儿的乌克兰人或大俄罗斯人都知道这一称呼，不会大惊小怪。看来这是赫鲁晓夫讽刺挖苦犹太人的又一例证，虽然他们假装完全没有一点反犹主义的行为。

②华西列夫斯卡为她成为苏联公民很高兴，后来她与一个比她还有政治头脑的作家考涅楚克结了婚。多数波兰作家都把她看成一个女叛徒。苏联人为酬谢她协助消灭了自己的波兰同行，任命她为乌克兰的副总理。

心的大会。大会主席团由西乌克兰人组成。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因为这些人已在公众集会和报刊公开亮过相。虽然我们非常了解这些人，但他们决不是我们的傀儡和我们扶植起来的代理人。他们是有信仰的共产党人。

会议进行了好几天，与会者欢欣鼓舞政治气氛很高。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在发言中对在西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表示了点怀疑。代表们激动地、兴高采烈地一个接一个发言。他们表示，参加到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可喜的是，我看到了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开始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他们的未来建立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这，就是列宁的理论的力量。尽管波兰前统治者竭尽全力歪曲我们列宁的学说，恫吓人民，但列宁的理论在西乌克兰生机盎然，繁荣兴旺。

同时，我们仍继续抓人。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些逮捕是为了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力量，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扫清道路。①但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就逮捕一事提出他们的解释。他们企图以此让我们在波兰名声扫地。尽管这个诽谤运动很厉害，西乌克兰人民还是夹道欢迎红军，犹如劳动

①这类逮捕的确是为了巩固苏维埃国家（谁能否认这一点？）苏维埃国家先认为（直到现在也如此，它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允许在监狱或劳改营外边存在着对这个政权提出疑问的人。在苏联占领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被逮捕的人，总数达数十万之多。有本匿名出版的，由T·S·埃利奥特作序、专门描写被放逐者们恐怖经历的书《月亮的黑暗面》，就对被赫鲁晓夫手下的谢罗夫逮捕的那些人所经历的遭遇、作了非常动人的描述。如要知晓人们如何煞费苦心寻找被俄国人俘去的1.5万名波兰军官的下落一事，可读由约瑟夫·格扎普斯基所著的、由莫里斯·哈勒维和爱德华·克兰克有作序的《不人道的土地》一书。关于如何在斯摩梭斯克附近开亭森林发现被秘密处死的4000多名军官的尸体的故事，请读约瑟夫·麦克基丝所著的《开亭森林中的谋杀》一书。

人民欢迎他们的解放者一样。

在利沃夫举行的代表会议开得很成功，代表们发言时热泪盈眶。他们说终于活着看到了乌克兰统一的一天，看到了与他们乌克兰兄弟联合起来的日子，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愿望得以实现。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的边界得到巩固，我们的边界向西推了，乌克兰人民在历史上被人侵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乌克兰人民从前未统一成一个单一乌克兰国家。仅是现在，在苏维埃时代，这个梦寐以求的理想才成为现实。①

但是，利沃夫大会反映的仅仅是从波兰政府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民的感情。而乌克兰的统一和前波兰领土与苏联正式合并一事还没有完成法律程序。但也仅是个手续问题。没人认为东乌克兰地区的人会反对把西乌克兰并入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利沃夫代表大会，或者说这次奠基会议后，我们把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转移到了基辅，代表们在那儿先是向乌克兰政府、继而向苏联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苏维埃乌克兰接受西乌克兰作为它的一部分。然后，他们向在基辅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一次特别会议提出申请，要求把他们并入苏联。会议气氛热烈欢乐，出席这些会议给我带来极大的乐趣和骄傲。因为从最初开始，西乌克兰的苏维埃化就是在我的组织和监督下进行的。

确实，在喀尔巴阡山脉的那一边仍住着一些乌克兰人。在捷克斯洛伐克亡国后，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并到匈牙利。有些乌克兰人常常说：“行呀，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暂时还不是我们乌克兰共和国的一部分，但他们与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刻迟早要到来的。”战后，这种情况确实出现了。希特勒被打垮后，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加入到苏维埃乌克兰，所有乌克兰人终于统一为一个共和国了。

①但乌克兰多数人有另外的说法。

与此同时，苏维埃化在白俄罗斯也在进行。象乌克兰人一样，白俄罗斯人也高兴地庆祝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庆祝所有白俄罗斯人完成了一个白俄罗斯苏维埃国家的历史性统一。

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并入苏联发生在稍后一点。当时墨索里尼正武装入侵希腊，希特勒进击南斯拉夫并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整个挪威。当德军向我们北部边境摩尔曼斯克附近运动时，我们开始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进行谈判①我们要求他们保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得攻击我们。不言而喻，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都被更换了。当我从基辅返回莫斯科和斯大林谈论时，才认识到在那些地方发生的情况。对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再次成为苏联的一部分，我们都非常高兴，意味着我们扩大了领土，增加了人口，巩固了边疆，还在波罗的海沿岸获得了一大片海疆。②

波罗的海诸国的并入也使我们进一步考虑就这些地区人民的前进目标。象不与俄罗斯有牢固的民族联系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波罗的海诸国人民属于另一个种的民族。诚然，我们似给机会让他们与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农民、劳动知识子在同等条件下生活。我们绝对相信，并入领土对波罗的海地区人民和苏联都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波罗的海地区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懂得，在俄罗斯已消灭了剥削阶级，这一工作在他们之中也要开展，在所有要求参加苏联的人中间开展。

①挪威是1940年3月被占，墨索里尼是1940年10月进攻希腊，希特勒进攻南斯拉夫是1941年4月。但俄国人是1940年6月抢占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

②这是赫鲁晓夫对苏维埃奉行的“强权即公理”的信条极为坦率的承认。这3个国家在饱经沧桑后，分别在18世纪不同时期成为帝俄一部分1918年他们各自宣布独立。与乌克兰人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的居民不是斯拉夫人，他们的农业和经济发达，他们的总的文化水平都比俄国人高。对他们苏维埃化，农民和工人将失掉一切，一无所获。

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当时面临着一个问题，他们的领导人跟着资产阶级逃跑了。我们让那些来不及逃跑的人在新政府里供职，但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另寻新人。①我们在这些地区推行苏维埃化时，比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更稳扎稳打，第一步是建立非常倾向于苏联的政府，给地方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其次让进步力量在群众中促进与苏联的友谊。过了一些日子，波罗的海的人民产生了要成为苏联一部分的愿望。苏维埃统治是用民主方法和履行一定的法律手续后才建立起来的。②

苏联人民用欢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苏联合并的同样热情，来欢迎波罗的海加入苏联。这些合并是超越民族之间差别的成就。

我们都坚信这是斯大林英明领导的结果。我们颂扬他为保卫祖国安全的那种高瞻远瞩。我们相信他有能力确保我们的边防坚不可摧。把苏维埃乌克兰的边界向西推进了，同时又获得了一条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对我们这可不是小事一桩。在这之前，我们仅有一条通往芬兰湾的狭窄的出海口，现在我们有了一条广阔海岸线了。我们所注意的是，如果爆发大规模战争，如果英法或者德国企图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我们有可能利用立陶宛、拉脱

①许多人确实逃走了。没走的可不那么幸运。据估计，在苏联吞并及德国入侵期间，有17万多人遭逮捕，这些人被装进闷罐子车流放到西伯利亚。被放逐的人，原则上除了体力劳动者农民和共产党正式党员外，其余所有人都包括在内。那些人应流放一事在苏联占领这些地区前7个月就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T·A·谢罗夫拟定好了，他在1939年10月11日签署这个臭名昭著的第001223号命令时，把它更具体了。但谢罗夫几乎是在签署这一命令后立即派到乌克兰，他与赫鲁晓夫一起在乌克兰更大范围内实施这个逮捕流放的计划。

②有种与此截然不同的说法，莫斯科给由苏维埃霸主(安德烈·日丹诺夫被派到波罗的海诸国，赫鲁晓夫被派到波属乌克兰)建立起来的傀儡政府下达指示，要他们申请把他们的国家并入苏联——他们就照办不误。

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土地作为战争场所。因此，对波罗的海诸国的合并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国防，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和工业都很弱，又处在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阵营的敌对势力——比我们强大的势力——的包围之中。

第四节 冬季出征芬兰

赫鲁晓夫对1939—40年那场臭名昭著的冬季战争的记述与已知的事实非常相近。维诺·坦纳自己所著的《冬季的战争》一书已就斯大林为了列宁格勒的安全利益，企图劝说芬兰人割让卡累利亚的一部分给苏联一事，作了最好最充分的描述。虽然坦纳是苏维埃扩张的死对头，他直言不讳地说，斯大林压根儿就不愿使用武力，但当芬兰人对他提出的要求寸土不让时，使他大为惊奇。他希望一旦使用武力，又指望芬兰人马上投降，准备让芬兰的老布尔什维克库西宁接管被占领土上的政府——库西宁事实上是芬兰的吉斯林（即卖国贼，译者注）。众所周知这一如意算盘没有实现。曼纳尔海姆元帅及芬兰人的英勇抵抗，使骄横的红军大失面子。直到铁木辛哥元帅接替伏罗希洛夫，又投入庞大的红军力量，芬兰最后才投降。这对俄国人来说，的确是个惨痛的教训。1941年6月，纳粹入侵苏联，芬兰完全屈服于希特勒的要求，在战争中就站在德国一边。的确，希特勒被打败以后，斯大林是能够占据整个芬兰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关于在这问题上的议论是公平的。除了卡累利亚这一部分外，苏联没有必要占据整个芬兰。更有甚者，与那些很难驾驭的芬兰国民在一起，俄国人自己也会觉得不舒服。芬兰已孤立无援了，欧洲如果再发生大规模

的战争，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把它拿下。

正当我们日益关注如何才能抵挡来自北方的攻击时，芬兰问题冒出来了。我们必须保证列宁格勒的安全，它处在从芬兰边界上的炮火射程之内，很容易受到来自芬兰领土上的攻击。并且，芬兰政府奉行敌视苏联的政策，公然向希特勒德国献媚、芬兰的总司令卡尔·曼纳尔海姆是前沙皇的将军，是苏联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①维诺·坦纳是个老社会民主党徒，但直到他死去时仍是一个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势不两立的敌人。②因为芬兰的土地可能被更强大的政府所利用，芬兰就必然对我们形成一种真正的威胁。苏维埃国家为保卫列宁格勒而采取步骤，这确实是合理的，也是至关重要的。

为与芬兰达成某种外交协定，我们先与他们开始谈判。谈判期间我在乌克兰。我们要芬兰让出一块土地，以便我们把靠近列宁格勒的边界向外移一移。这就满足了我们的保卫列宁格勒安全的需要，芬兰拒绝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别无选择，只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每次我从基辅回到莫斯科，斯大林几乎总是要召见我。有几次我去见他时，他独自一人在那儿。我俩单独在一起时，总是较容易和他坦率地交换意见。但这样的情况不多。我去见他时，莫

①（C·G·E·曼纳尔海姆元帅是芬兰受到战争威胁时的国防委员会主席。在他指挥下，筑修了纵深都是堡垒的著名的曼纳尔海姆防线，使俄国进攻不下。）

②维诺·坦纳在1926年到1927年期间曾任芬兰总理。被迫与俄国人谈判的正是他。1939年秋，为了努力谋求与斯大林达成一项和解协议，他连续三次访问莫斯科。他在战时政府中任外交部长，后来是芬兰政界中的元老。苏维埃领导讨厌他，不仅恨他是个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对各种各样社会主义分子的憎恨和害怕远比对保守主义者的憎恨和害怕更甚），而且因为他了解他们的内幕、他们的实力和弱点。

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常与斯大林在一起，有时日丹诺夫也在场。日丹诺夫是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米高扬和贝利亚也常在场。一天当我返回莫斯科时，斯大林邀请我到他的住处吃晚饭。他告诉我说莫洛托夫和库西宁也要来。库西宁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

当我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住处时，知道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库西宁正谈着他们早就开始了的关于芬兰问题的谈话。他们显然已决定给芬兰发出最后通牒。并同意由库西宁出任新成立的卡累利亚—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领。那时，卡累利亚还只是属于俄罗斯联盟的一个自治共和国。而现在，卡累利亚将成为一个加盟共和国了。他们一致同意再次给芬兰人一个要他们接受我们提出的关于领土要求的机会。虽然他们在已破裂的谈判中拒绝了 this 要求。他们如果不屈从我们的最后通牒，我们就采取军事行动。这是斯大林的意见。我当然不反对他。此外，我认为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只要我们把嗓门稍微提高点，芬兰人就可能屈服。如他们还不让步，我们再放他一枪，芬兰人就一定会举手投降。我们的想法大致如此。当我到达斯大林住处时，他正在说，“让我们今天开始吧。”

我们围着坐了很久，最后通牒的时间已定好了。这个时间一过，马上就把炮兵元帅库利克派到芬兰边界指挥炮击的事，^①我们等着看会出现什么情况。斯大林信心十足，我们当中也没人想到会发生战争。我们认为芬兰人会接受我们的要求，不会迫使我们进行战争。我重申：我们唯一要求就是为了确保北方安全。与我们自己广阔的疆土和自然资源相比，芬兰在土地和森林资源上

^①库利克元帅是内务人民部一位臭名昭著的将军，他以愚蠢、残忍、无能和腐败而出名。正如赫鲁晓夫后来说的那样，斯大林对他的信任使苏联在德国入侵初期，损失极为惨重。

几乎没有什么可向我们提供的。我们唯一的考虑的是安全——列宁格勒处在危险之中。

突然，电话响了。我们大炮开火了。芬兰人用他们自己的炮火作了回答。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说是芬兰人开的第一枪，我们是被迫还击的。当有战争时，人们总是这样说的；他们说，“你先开的火，”或者“你先打我一掌，我仅是回敬。”有时在剧院，你可以看到这种表演：某人向另一人扔下一只手套，向他表示挑战，如果手套被拾起来，就意味着挑战被接受了。或许那只是古代的一种做法，但在我们的时代，谁挑起一场战争。就不总是那么清楚了。

我们是否在法律上或道义上有权采取反对芬兰的行动，这是经常有人提出的问题。当然，我们是没有法律权利的。但就道德而言，从我们立场出发，我们渴望保护自己就足以说明我们的行动是正当的。

战争开始后几天，我离开莫斯科去乌克兰。正如所有人想象的那样，我认为对芬战争，那简直是牛刀宰鸡，与他们的争执很快就会解决，不会出现很多伤亡。我们这么想，也希望如此，但那次冲突的历史可不是这样。

战争相持不下，芬兰人证明是善战武士。他们在卡累利亚地峡沿着“曼纳尔海姆防线”组织的防务非常出色，挫败了我们想从这个战略通道向前推进的企图。我们很快认识到我们遇到了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对方是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碉堡和配合得相当好的大炮阵地。“曼纳尔海姆防线”是坚不可摧的。我们的伤亡数字使人吃惊。到了冬天，我们决定绕过卡累利亚地峡，越过拉多加湖袭击没有设防的北边。但是当我们试图从后背偷袭时，发现我们自己的处境比以前更难了。芬兰人是个北方民族，又爱好体育运动，他们学会走路前已经学会滑雪了。我们军队遇到了用自动步枪武装起来的机动性很强的滑雪部队。我们也企图让自己的

军队套上滑雪板，但要普通的未经训练的红军战士滑雪作战，并非易事。我们开始全力征募职业运动员，周围地区这种人可不多。除列宁格勒外，我们不得不把莫斯科和乌克兰地区的们也召来。我们隆重地为他们送行，人人都相信我们的运动员人会凯旋归来。他们兴高采烈地出发了。可怜的年青人，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我不知道他他有几个活着回来了。

这是个可怕的时期——不仅遭受的损失可怕，就其广阔前景来说更为可怕，德国人看到我们在芬兰人面前一败涂地，毫不掩饰他们的欢欣。

我们的海军与芬兰舰队交上火，真没有想到芬兰人在海上也取得优势，而我们的海军一事无成。记得在莫斯科从斯大林那儿听说，我们的一艘潜艇竟不能把误认是芬兰船只的一艘瑞典商船打沉。德国人目击了这事后说，要给我们提供援助，以此来戏弄我们。“办事就那么窝囊？你们甚至还打不沉一艘民用船只？或许是要我们提供点帮助？”你可以想象对我们这是多么痛心呀！希特勒让我们知道，他已了解到我们的无能，看到这一切，还喝倒采。

我记得斯大林是如此痛苦而又忧郁地谈到正在进行的战争情况：“雪很深，我们的部队在雪地里前进。部队中有许多乌克兰人，起初我们还精神饱满，说‘那些芬兰人哪里去了，让我们消灭他们？’突然机枪扫射过来，我们的人倒在地上。”

芬兰人在森林里还运用这样的战术，即他们爬到冷杉树上对我们的巡逻队近距离射击。他们藏在树枝下，披着白斗篷，伪装隐蔽得很好。乌克兰部队把芬兰人称之为“布谷鸟”，因为他们在树丛里栖身。为对付这些“布谷鸟，我们发动了一场特殊的战斗。这不仅费了很长时间，还付出了血的代价。

斯大林对军方，对伏罗希洛夫十分恼火——我看这是应该的。伏罗希洛夫占据国防人民委员会高位多年，他被吹捧为我们

最好的神枪手，为的是哄骗人民，以为我们国家防务是由能人掌握的。对芬兰的这场战争发展到这样地步，首先伏罗希洛夫要负责任，但他也不是唯一有罪者。他指责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失误，才造成战争部署失当。

我记得有次在莫斯科斯大林近郊别墅里，斯大林气得暴跳如雷，痛骂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也气得发疯，满脸通红，当面把斯大林的咒骂顶回去，“所有这一切都应怪你自己。”伏罗希洛夫吼道，“红军老战士就是你消灭的，你把我们最优秀的将军都杀害了！”斯大林断然拒绝他的指责。这时，伏罗希洛夫拿起一只盛着烤乳猪的盘子，在桌子上摔得粉碎。目睹如此大吵大闹，在我一生中仅此一次。结果是伏罗希洛夫被免去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在随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是个替罪羊。^①

基辅军区司令铁木辛哥元帅一天在基辅来看我时说，“我被召回莫斯科，几乎可以肯定要去芬兰前线。^②他被委任指挥我们在卡累利亚地峡的部队，他接替了麦列茨科夫。我们军队已吸取了教训，决定不再用迂回战术从后面打击敌人，而是从正面强攻，摧毁芬兰在卡累利亚地峡的碉堡群。你们能感到迷惑不解，为何这个从正面强攻的战斗方案不早一点提出来。无论如何，为了准备打击他们，我们集中了必要的炮兵、空军和步兵。芬兰人的碉堡群被扫除了，在我们的炮火面前芬兰军队已荡然无存。

我们空军在这次攻击中也出了力。我记得斯大林有次总结性地概括说：“我们的空军奉命出动，给它的任务是破坏芬兰通往前线的补给线，切断铁路运输线，轰炸桥梁，打击机动运输力量。许多桥梁被摧毁，许多火车被炸趴了窝。芬兰人只剩下滑雪

^①请看伏罗希洛夫生平附录。烤乳猪事件在这里是首次披露。

^②谢苗·铁木辛哥元帅在摧毁芬兰的防线赢得战争后，再次重返基辅。他在战时及和平时期与赫鲁晓夫保持密切的关系。

鞋了，他们可不能没有滑雪鞋，对滑雪鞋的供应没有短缺过。”

芬兰人求和，谈判开始了，我们共商和平的条件，签订了和平条约。芬兰人从列宁格勒后撤约15公里，在汉科角半岛给我们一个基地。

对芬兰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开始寻找战备如此糟糕的原因，以及这场战争为何使我们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我可以这样说，我们损失了上百万人。铁木辛哥告诉我，不能完全把此归咎于情报错误。事实上，据说我们的情报机关对芬兰沿线防务情况一直是了如指掌的。甚至在战前，我们情报图上就标上了“曼纳尔海姆防线”上的碉堡群和炮火阵地。麻烦就出在当我们准备第一次攻击时，没有指挥员询问过情报官员。我简直想象不出为何容许这种蠢事发生。毕竟，按通常规律，在采取一个军事行动前，应该对作战区仔细研究，战略家与情报人员紧密合作。如果我们对芬作战时部署军队是按照连小孩也能指着地图想象得出的方法来作事，那么，苏联和芬兰双方在战争中获得的结果就很不相同。

我们估计芬兰政府不会就此罢休，而把他们的领土送给敌人使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甚至在希特勒侵略苏联前，我们就发现德国在芬兰结集了军队。芬兰人让他如此干，也可认为是因为他们对我们不满，想夺回他们在1940年—41年战争中失去的东西。即使如此，事实仍然是列宁格勒仍处于危险之中，我们除了用军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了。

如果认为斯大林发动战争是企图占据芬兰，那就错了。你或许会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芬兰军队事实上被全歼后，我们为何不占据芬兰？斯大林在这里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他知道芬兰领土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需要关系不大。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与芬兰仅签订了一个结束战争的条约，这样做比我们直接占据它更有利。与芬兰停止敌对状态为希特勒其他卫星国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我们也给芬兰人民留下一个良好

的印象。①

与芬兰的冬季战争，暴露了我们非常严重的弱点。这些弱点也暴露给了希特勒。不难想象希特勒在观察了我们的对芬兰战争后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苏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对付的国家，我们只要几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如果用我们最精良的装备、训练有素、组织完善的大兵团攻击他们，俄国人还能剩下什么？”总而言之，我们在对芬战争中的拙劣表现鼓励了希特勒对我们实施闪电战的计划，即他的“巴巴罗沙”行动。

在对芬作战中，我们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在数量也占绝对优势，我们有充分时间在大范围内准备行动。然而即使在这种最有利的条件下，在经历了超乎寻常的困难和遭到了巨大损失之后，我们才最终赢得胜利。花了如此代价才换来的胜利，实际上是精神上的失败。

当然，我们的人民决不知道我们遭受了一次精神上的失败，因为始终没人把真实情况告知过他们。恰恰相反，当芬兰战争结束后，只是告诉我们的人民：“让我们吹起胜利的号角！”②

但是怀疑的种子从此播下了。和芬兰的战争对我们军队来说是个黑暗的时刻，而我们军队的神圣口号是，“假若明天爆发战争，我们今天就准备出发！”

①但俄国人还是迫使芬兰人付了一笔他们自己也认为是多了点的赔款，芬兰人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勒紧裤带坚持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还清赔款。在赔款期间，虽然作出了很大的自我牺牲，却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工业生产能力，尤其是造船业。

②这个揭露，一语道破了苏联领导和向人民封锁事实真相的本领。

第五节 大战前夕的红军

在提及红军对战争准备不足的问题时，赫鲁晓夫尽力坚持：虽然他是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中的一员，但也别指望他知道那支自吹自擂的红军原来是支指挥无能、装备不足的军队，尽管十多年来苏联的整个重工业都集中为它服务。按照斯大林管理政府的方式，这又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赫鲁晓夫把他全部注意力放在管理乌克兰事务上。他靠自己的前线司令来保护乌克兰的安全，他确信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国防部长）会从总体考虑，适当地组织军队和武器军需供应。很明显，没有一种定期的内阁会议让赫鲁晓夫去诘问国防部长，即使他有权这样做，但实际上他并不够格。在军队身上浪费了大量钱财，然而军事演习和检阅倒非常动人。赫鲁晓夫是知道军队中大部分高级军官已在1937年被斯大林和叶若夫枪毙了，但他可能不了解还有4万名级别低的军官也遭到清洗。他必定为对芬作战中红军的一败涂地感到震惊。要是在基辅与他同级的军事人员——先是铁木辛哥，继而是朱可夫——从未把军队中严重缺陷告诉过他，这简直也是不可思议的。确实，铁木辛哥本人在1938年被宣布是人民的敌人，差点被处决，仅仅由于赫鲁晓夫出面说情才幸免一死。

我们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都感觉到对芬战争的胜利中有一种失败。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失败，因为它助长了我们的敌人把苏联看成是泥足巨人的信念。但是仅仅承认我们的失败，自我批评一下对芬战争中指挥失误那是不够的，仅仅解除伏罗希

洛夫的职务、任命一位新的国防人民委员也还不够。我们必须从过去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为即将爆发的战争作些准备。我们必须从对芬战争的准备走上邪路一事，吸取更深刻更广泛的教训，必须找出和解决在我们组织机构中导致失败的痼疾；必须提高苏维埃红军的战斗潜力。所有这些中最重要，是提高我们高级军事人员的领导素质。

我不明白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原因使我们的军队被削弱——军事装备不够还是指挥人员不足？这两种因素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我们的军事检阅和演习在鼓励人民士气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这种活动掩盖了我们军队的缺陷，哄骗大家误认为我们国家还很安全，这又是只搞检阅的消极作用。芬兰战争后，我们应该重新检查我们的军队，特别是机械化部队。我们应该更早一点把工业转到战时体制的需要。我们都不知道在敌人进攻前还剩多少时间？直到战争爆发那一天，我们仍然剩下许多事情没有做好。这是不可原谅的，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土地和鲜血。备战远比制定战略计划要具体复杂得多。军事准备的基础是军火生产。总而言之，就是需要击退敌人和粉碎敌人所具有的一切手段，能生产出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步枪、机械设备、化学和细菌武器。

问题之一是斯大林企图亲自监管我们所有的军火制造和机械化装备的生产情况。其后果是：没有任何其他人真正了解我们兵工厂的生产情况。例如，我记得是1941年，斯大林指示我去调查一下，是否可以在飞机上装上柴油机引擎。他的想法是，因为柴油机引擎所需的燃料少，飞机就能增加航程。他还告诉我，柴油机引擎已在哈尔科夫机车厂生产了。实际上我知道这个工厂，但该厂生产柴油机引擎一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进入该厂必须有特许证。斯大林规定，除与生产项目直接有关人员外，任何人不得擅自去干预该厂的事。甚至是我，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

记，对在哈尔科夫工厂生产这些高效率的柴油机引擎一事都被蒙在鼓里。我也没有足够时间调查这种引擎是否可以装在飞机上，但把它们装在我们的T—34型坦克上，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不幸的是，战争爆发时，我们组装的这种坦克并不多。

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我们各种武器严重短缺。我是政治局委员，也是斯大林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但我仍然无法得知我们的步枪、机枪严重缺乏的情况，更不用说坦克和重炮的短缺了。我简直不能想象，如此基本的物质都没有准备好。即使是沙皇在1914年对德作战时，提供的步枪也要比希特勒入侵后我们能提供的多得多。而我们的经济潜力与沙皇政府相比那是高得无法相比的。因此，我们的确不能原谅自己。

我主要责备伏罗希洛夫。直到芬兰战争中他被免去职务为止。他对我们军队弄成这种状况负有主要责任。我们为军队投入巨大的财力，我从未听到过斯大林拒绝他们申请基金的要求。他的失职是有罪的。他的下级必定向他报告过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但这些报告对他来说就是水过鸭背，从未记在心里，他忘记了他应负的责任，仅是对着摄影记者微笑，在电影摄影机前装模作样。有人说伏罗希洛夫在格拉西莫夫画室花费的时间比他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尽职的时间还多。①他还把大量光阴花在剧院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有名的歌剧鉴定家和评论家。记得有一次我在场，有人提到某些歌剧演员的名字，伏罗希洛夫的妻子眼睛朝下看着说，“克利缅特·叶弗列莫维奇（即伏罗希洛夫，译者注）对她印象可不怎么样。”伏罗希洛夫常自诩是个很不错的歌手，甚至在他听力严重衰退时还这样认为。在我看来他是唱得不错

①格拉西莫夫是苏维埃艺术学院院长，实际上是斯大林的宫廷画家。作为一个国家公务人员，在艺术上他无学无术，还对一切有发展前途的苏维埃画家都制造麻烦。

的，正象斯大林也在教堂唱诗班唱歌一样。

总之，伏罗希洛夫在公开庆祝场合上表现动人的军事气派的兴趣，远比由他负责给军队配备装备和部署部队的兴趣大。当马尔尼克、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老一辈的仍在时，也就是在1937年他们被清洗掉以前，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行政和政治工作，在没有伏罗希洛夫的情况下运转得很好。①

至于斯大林，他完全过高估计了我们军队的准备工作。象许多其它人一样，他被电影里军事检阅和演习时的情景迷住了。他并不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他很少离开莫斯科，实际上除了去他在郊外的别墅和到索契休假，他很少离开克里姆林宫。他知道的所有军队的情报都来自伏罗希洛夫。而伏罗希洛夫本人就是个完全脱离实际的人。

军事指挥能力薄弱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最好的指挥员被当成人民的敌人消灭了。就这一点来衡量他们的罪过，我认为斯大林比伏罗希洛夫更应该受到责备。伏罗希洛夫有时也为受到指控的将军们辩护并与斯大林争辩，但有时他又故意唆使斯大林去干。至于政治局其他成员，没有更多的好说了，在做出什么决策时，莫洛托夫总是与斯大林紧密地站在一起。即使是不属莫洛托夫管理的军事指挥问题，他也不时对斯大林反对老一辈将领的狂热大扇阴风。然而，莫洛托夫在武器供应问题上，是没有责任的。

毫无疑问，如果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们都还在，击败法西斯的侵略就容易了。他们都有专业知识，经验丰富，许多是从军事院校毕业，又经过国内战争，他们都是些准备为国尽职的军人。他们绝没有这样机会了。他们遭清洗后，我们不得不任命新的军

①这是公平的评论，伏罗希洛夫理应受到赫鲁晓夫提出的各种责难的。

官，军事人员在领导岗位上连升两级、3级甚至4级的。原来担任中级领导职务的人，在那些高级军官被处决后就提升上去了。

多数被提升的人都忠厚诚实，但他们缺乏经验，只得在与希特勒德国作战时去获得。他们的实战经验使我们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使国家遭到可怕的蹂躏。

在1940年，当铁木辛哥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时，朱可夫接任他担任了基辅军区司令。^①朱可夫是接替铁木辛哥的最好人选。他是个天才组织者，坚强的领导人。他的气质在战争中得到证实。尽管我们后来分道扬镳，我对他作为一个指挥员，仍然怀有敬意。后来他未能正确理解他作为国防部长的作用。为了防止他执行由他策划的阴谋计划，我们不得不对他采取行动。但就在那时，我对他作为军人仍给他极高的评价。时至今日我也没有对他高度评价上后退一步。战后他在斯大林面前失宠时，我也没有掩饰对他的敬仰。

朱可夫同志在1940年底或1941年初从基辅调到莫斯科，在总部作战部工作。他在基辅的工作由基尔波诺斯接替。基尔波诺斯是个典型的好心人，是属于为了填补红军高级将领被清洗后留下的空缺，而提升上来的经验不足的指挥官。他出任基辅军区司令，仅因为没有更合适的人可派。芬兰战争时他还只是个师长，在那儿很出名，赢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但要他挑起基辅军区司

^①事实上，朱可夫在远东对日作战时取得辉煌战绩后，就被任命为铁木辛哥的参谋长。在对芬战争前，铁木辛哥是基辅军区的司令。当铁木辛哥应召前去担任摧毁芬兰的司令时，朱可夫作为参谋长随同前往。战争结束后，他返回基辅继铁木辛哥任军区司令。1940年6月朱可夫提升为大将，1941年2月，也就是德国人入侵前4个月时，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

令的重担，他还是嫩了点。^①

基辅军区是希特勒入侵的必经之路。对机械化部队来说这儿的地形是最理想不过了。道路质量好，几乎没有任何沼泽。为了鼓励希特勒进攻我们，外国资产阶级报纸曾说，波兰和基辅之间是名符其实的“坦克战场”。希特勒可以在那儿让他的坦克大出风头，向全世界表明他能干些什么。

斯大林看到基尔波诺斯的忠厚诚实，认为他担任基辅军区司令是合适的。斯大林这样做是对的。但基尔波诺斯缺乏指挥这种大兵团作战的必要经验。更有甚者，我们国家的防务准备不足，在基辅军区的反映就相当明显。此军区被认为是保卫着我们边界上最容易遭到危险的地段。

据我自己作的不很全面的观察，国防委员会的工作机能自铁木辛哥元帅主持后有所改善。我曾和铁木辛哥在基辅军区共同工作过，他是军区司令，我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从那以来，我一直很尊重他。他是个有教养的人，是个真正的军人。在1940年，我们在解放罗马尼亚占领的比萨拉比亚期间，我更了解他了。^②我积极参加了这一战斗。我们的行动是根据与德国签订的条约而采取的，是为了重新恢复我们在十月革命后被罗马尼亚独裁政权破坏了的历史权利。在这时，铁木辛哥已经是国防人民委员，我有

^①M·P基尔波诺斯上将是个出色的师长，由于大清洗的结果，他被超越其能力而提升。朱可夫到国防部工作后，他接任基辅军区司令，4个月后，他发现他那儿是德国进军的必经之道。鲁鲁晓夫的评价是公正的。基尔波诺斯作战非常勇敢，事实上这条防线的供应和装备都比其他防线要好一些。

^②俄国人根据1878年的柏林会议获得比萨拉比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属于罗马尼亚，当时曾一度宣布过独立并请求罗马尼亚帮助反对布尔什维克。根据与希特勒签订的条约，斯大林1940年将其收回，并把它苏维埃化了。

次陪同他乘飞机越过罗马尼亚防线直到比萨拉比亚，到他长大的福尔曼卡村去看望他的亲属。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他应召入伍后，就从未回去过。我们在福尔曼卡附近一块平地上降落，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对铁木辛哥就象款待凯旋而归的英雄一样。我在他兄弟房子附近的棚子里过夜，铁木辛哥与他的兄弟、姐妹及朋友通宵痛饮，畅谈往事。铁木辛哥取代伏罗希洛夫出任国防人民委员，当然是个进步。

很不幸，象铁木辛哥和朱可夫这种人太少了。在一批老战士被消灭掉以后，国防人民委员部里来了一些象麦赫利斯、夏坚科库利克之流，那里简直象个疯狗窝。^①一次铁木辛哥拉着我的袖子，领我去国防委员会一个会议室。他要我看看他是如何与那些互相倾轧的人一起工作的。而麦赫利斯是最坏的一个，^②他对斯大林有特别大的影响。他行事常常越出他作为红军政治部主任的职权范围。自从斯大林任命他接替布哈林《真理报》主编以来，麦赫利斯就成了斯大林的得力助手。我一度曾和他很合得来。在1929—1930年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我们曾共同努力过，我们的友情就建立在此基础上。我在工业学院任党组织书记时，他给我许多帮助。随后几年，我们逐渐疏远了。到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时，我看他仅是个小人。象他这种人竟得到斯大林无限信任真使我心寒。麦赫利斯常就军事问题提些建议，斯大林也听他的。麦赫利斯的影响对军队和国家一点好处也没有。他的影

^①夏坚科和库利克是伏罗希洛夫任命的非常无能专搞倾轧的“政治”将军。他俩在1937年红军大清洗期间都非常活跃。库利克在1940年提升为元帅，他在列宁格勒的所作所为，就是差点造成该城的失守。正在危难之际，朱可夫恰好赶来接替了他。

^②L·Z·麦赫利斯是得宠于斯大林的另一“政治”将领，现在无法判明他在大清洗年代及随后的岁月里，由于他精心策划的阴谋给苏联人带来的死亡和痛苦多，还是在战争中由于他的草包造成的死亡和痛苦多。

响，也是造成我国战前防务不可原谅的落后状态的原因。

我们在战争初期的灾难中幸存下来，最终又赢得了胜利，这是我们人民和军队的功劳。我们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终于把敌人驱逐出境，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把他们打得粉碎。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多大啊！当然，即使斯大林没有把我们最优秀的将军们杀掉，战争仍会来临。但付出的代价一定不会比在“我们亲爱的父亲，伟大的天才”领导下付出的代价这样大“

第六章 伟大的卫国战争

第一节 最黑暗的时刻

赫鲁晓夫在说到战争年代时，虽然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并近距离地观察了指挥作战的最高统帅部，但实际上还是印象派的。很明显，他关心的首要问题是揭露斯大林的失败，而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深入前线、与野战军司令们并肩战斗的人，把他的同僚说成是坐在莫斯科听任“政治家们”让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军们遭受挫折、对他们设置障碍、策划阴谋、甚至供应短缺而让他们挨饿、当然，赫鲁晓夫本人就是一个“政客”，只是由于他具有实用主义的天性和实干热情，他似乎很快就发现与那些职业军人在一起，远比与他在莫斯科同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们及自己同行的政治顾问们相处更感到自由自在——并且他已和这些军人一起反对克里姆林宫。确实，战时绝大部分时间，除了列宁格勒的日丹诺夫外，赫鲁晓夫比其他政治局成员更亲临前线。当德军挺进到乌克兰时，赫鲁晓夫一夜之间就从仅在斯大林一人之下、这块辽阔、富饶、苏联的粮仓和主要工业基地的万众之主变成了政治局在前线司令部的代表。前线很快又土崩瓦解。他痛苦地目睹了这个伟大的加盟国受到德国人铁蹄的蹂躏。主要是由于伏罗希洛夫的密友、布琼尼元帅的惨败，这个几乎不可信任的内战时期的蠢遗老，统率的

百万大兵遭到完全不必要的惨败，丢掉了基辅和哈尔科夫。当时德军在大包围圈内正整军整师地围歼苏军，挥师直扑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蹂躏着整个乌克兰。斯大林的精神也已崩溃。赫鲁晓夫叙述的这些鲜为人知的趣事和评论，对战争初期的混乱、耻辱和英雄主义提供了生动的资料。

当我在政府中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高级职务时，我常告诫我们的军人在撰写战争回忆录时要非常小心。我经常发现你还不能仅从某些战斗的直接参加者那里获得的资料，就认为已作出了客观分析。然而我作为战时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政治局在前线的代表，我想我能就几次主要战役中发生的事作些说明。

让我以个人的眼光来解释战争初期出现的情况，评论一下我曾经与他们打交道的某些将军和政府官员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

战争爆发前我正好在莫斯科。我被羁留在那儿很长一段时间坐冷板凳，整天无所事事。斯大林再三对我说：“瞧，为何如此急着回乌克兰？给在基辅的同志一个机会，试试你不在时他们的工作怎样。还没有到需要你去的时候。”我看不出留在莫斯科不走有何意义，我完全没有从斯大林那儿学到什么新的东西，只是一顿接一顿的没完没了的晚宴。我已开始讨厌这些宴会了。但给了我一个近距离观察斯大林的机会，我不喜欢我所见到的。他对我们军队制止战争的能力明显地丧失了信心，当希特勒征服法国，占领巴黎后，他也陷入了绝望，好象准备甩手不管。正如我曾说的，当我们听到法国投降的消息时，我正好同他在一起。他用俄语中一些污语咒骂，说现在希特勒必定要来打我们脑袋了。①

①这也证实了其他一些关于斯大林在战争前夕的行为举止的报道。特别是可以参考E·哈里逊·索尔兹伯里写的《列宁格勒之围》一书。

这类谈话对我百害无益。我一直企图让他允许我回基辅，最后我直截了当地问：“斯大林同志，战争可能随时爆发，如果战争爆发了我还留在莫斯科或正在返回的路上，那就糟了。我最好是即刻动身前往基辅。”

“是的，我想那也对，你还是回去的好。”“他的回答证实了我的怀疑：他自己根本没想好为何要把我留在莫斯科，他知道最适合我工作的地方是基辅。他留下我仅是因为他要人作伴。特别是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受不了孤独。”

第二天早晨我返回基辅，直奔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看看有没有最新消息。当晚我回到家。晚上10点或11点时，司令部来电话叫我返回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去看刚从莫斯科发来的急件。文件的附件写着乌克兰党的第一书记亲启等字。我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发现从莫斯科传来的急件的确使人相当担心。它警告我们应该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作好战争准备工作。

然后，后接到从捷尔诺波尔指挥部^①打来的电话，通知说一个德国兵刚从对方前线逃跑过来，他声称德国将在明早3点进攻苏联。这一情报证明了我们从莫斯科发来的急件上所说的。我们详细地审问了德国士兵，他说的似乎有道理。当问到他是如何知道德国人将在明天发起攻击时，他说他和其他部队已发了3天口粮。又问为何攻击将在明天3点钟开始？他解释说德国的攻击通常是在清早进行的。他说，他叛逃过来因为他是个共产党员，一个反法西斯分子，一个希特勒军事冒险主义的反对者。我们倾向于相信他。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一直等到3点钟，看会发生什么事。的确，黎明前夕，我们得到消息说德国的大炮向我们开火了。当

^①捷尔诺波尔在利沃夫东面，是苏联吞并波兰东部时得到的一个地方。

敌人向我们发动首次攻击时，我们接到莫斯科的命令说不要回击。我们的领导发出这样奇怪的命令，是因为他们想这些炮火可能是某些德军野战司令的一种挑衅行为，并非希特勒的整个行动。换言之，斯大林是如此害怕战争，以至于当德国企图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攻击我们，消灭我们的抵抗时，斯大林仍自己欺骗自己，认为希特勒会遵守诺言不会真的进攻我们。^①

但在几个小时后，我们的部队与德国入侵者发生遭遇战，并击退了他们第一次攻击。到天亮时，我们从军区司令部得到消息说，德国飞机正在接近基辅，很快就飞临城上空，轰炸了机场。机库着火了，幸运的是当时那儿没有飞机，我们所有的飞机都盖着伪装网部署在沿边界一带。我们的飞机、坦克、大炮和弹药库在敌人第一次打击中，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局势急转直下，主要是因为从莫斯科得到的援助太少。战争开始后不久，当德军向基辅推进时，人民的爱国主义极大地激发起来了“列宁锻炼厂”和基辅周围其它工厂的工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中央委员会，请求发给武器，以便能与入侵者作斗争。我给莫斯科打电话，要求安排运些武器来，以便武装这些要求上前线支援红军的工人。我唯一能找到的是马林科夫。

“告诉我，”我说，“哪儿能弄到步枪？我们这儿聚集了许多要求参加红军队伍与德国人作战的工厂工人，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去武装他们。”

“你最好放弃从我们这儿得到步枪的想法。这儿民防组织的步枪都被送到列宁格勒去了。”

那我们靠什么去战斗呢？”

“我不知道——长矛、剑、土制武器、你们工厂制造的任何东西都成。”

^①在战争爆发后，最初几个星期里，斯大林的确是茫然不知所措。

“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用长矛来对付坦克？”

“你必须尽其所能，你可以在瓶子里装满汽油或煤油作为燃烧，投到他们坦克上。”

你可以想象，当听到马林科夫这样对我说时，我是何等沮丧和愤怒。我们的处境竟糟到这样地步，要设法阻止敌人，可没有步枪、机枪，更不要提大炮和自动化武器了！我不敢把马林科夫对我说的告诉任何人，天晓得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我当然也不能把局势糟到何等地步告诉人民。但他们自己也能估计得出我们的装备缺乏到何等地步。为什么我们的装备如此差呢？因为国防人民委员部大员们的骄傲自满和领导阶层的沮丧混乱及失败主义。这些因素阻碍了我们的军事工业的发展和巩固边防的建设。而现在要弥补也太晚了。

德军很快向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联邦推进。他们占领乌克兰、夺去了我们矿业和农业的心脏地带。我们丢失了苏联工作最集中的欧洲部分的领土。当德军推进到莫斯科周围工业基地时，我们大部分油车生产设备落入了敌人之手。莫斯科、列宁格勒是我们政治、军事和技术的神经中枢，而列宁格勒在1941年被围。我们还丢了罗斯托夫、沃罗涅日、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北部。

我们被迫疏散我们的工业。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那些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承担着把面临危险的机械装备搬走的繁重任务，这样我们就能继续生产坦克、大炮、机械化、步枪、机枪、地雷等等。这工作需要超人的努力和全面合作，我们的工业搬迁终于结束了，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有可能把敌人驱逐出国土。

战争期间，我不得不数次与斯大林争论。虽然他对我冷嘲热讽，我还是顽强地企图用我的观点来说服他。有时我成功了。我发现，如果我老纠缠着他，他可能转而同意我看问题的方法。然而，与他争论是十分困难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莫斯科近郊的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们西南方面军也参加了这一战役——我被召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商。我发现我正面对着一个新人。他的精神状态比战争初期有了很大改变，他已振作起来了，与他人齐心协力，象个真正的战士一样。他也开始把自己看成是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而这样要与他辩论就更加困难，他显示出了一个英雄领导人所具有的那种坚强意志的决心。但我心里明白他是哪种英雄，我曾看见他因害怕希特勒而惊慌失措，犹如巨蟒面前的一只兔子。所以，在此期间我对他的看法也没有改变。战争初期，形势越来越严峻时，我曾留心注意到，斯大林的名字从来没有在任何文件或命令上出现过。只用“最高司令部”、“总参谋部”或其他名义，从未用自己的名字。甚至我们在莫斯科外郊粉碎了德国的攻击，斯大林也振作起来了，但这种作法仍未改变，不断从他那儿发出没有他签名的指令。有时他的头衔“最高统帅”，但绝不用他的名字。这绝非偶然。斯大林做什么事都不会出于偶然。他的每个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计划的。他所走的每步棋，不管是好还是坏，都仔细权衡过。

这儿有另一个可说明斯大林不想对前线出现的情况负直接责任的例子。我们有许多将军在德国进攻时被俘，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他们被宣布为叛徒，其家属被送往西伯利亚。我记得他们对待穆兹钦科和波涅杰林及他们的家属就采用这种方式。对波塔波夫也是这样。直到斯大林死后这些人才允许返回。穆兹钦科、波涅杰林和波塔波夫从监狱中放出来后，恢复了他们在苏军中的职务和名誉。总之，斯大林是毫不留情地虐待他手下的将军的。①

①这儿提及的三位将军都是机械化部队的指挥官：M·I·波塔波夫少将（坦克部队）、I·N·穆兹钦科中将和P·G·波涅杰林少将，他们率领的部队，首当其冲地受到德国克莱斯特与赖歇瑙坦克兵团的猛攻，他们进行了有效的还击，但在基尔波诺斯主持多次无意义的反攻中，反而把兵力损失殆尽。斯大林对待这些被俘将军们的家属的作法是别出心裁的。

对待普通战士和下级军官也好不了多少。我记得我们有位指挥员叫戈尔多夫，人们都普遍称赞他的才干，精力和勇气。他身材矮小，但这并不妨碍他经常殴打下级军官和士兵。后来，我发现一个名叫安德烈·伊凡诺维奇·叶廖缅科的人一次竟动手打一位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一位指挥员用拳头教训下级，这种行为不仅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习以为常了。^①当一位指挥员向斯大林报告说某人如何无能或有什么错误，斯大林总是问，“为什么不揍他的鼻子？如果他下次再那样干，就揍他鼻子好了！”

另一件使我苦恼的事是斯大林依靠“契卡”去获取军事情报。总的说来，斯大林信任的契卡完全是一伙卑鄙的人。以谢尔坚科为例，他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央国家保安部门工作，他是个足智多谋的人。据我的处世经验看，他也是不诚实不可靠的人。事情是这样：战争初期，我们的处境越来越严峻时，司令员和我别无他择，只好把司令部从基辅迁到勃罗瓦雷。我突然接到斯大林拍来的一个电报，他不公平地指责我是懦夫，并且威胁说要对我采取行动。他指责我想放弃基辅。这是个肮脏的谎言。我敢肯定，除了谢尔坚科这个恶棍把这个意思印到斯大林脑子里外，别无他人。我知道，斯大林认为“契卡”是无可指责的，他相信他们向他报告的任何事。当时，谢尔坚科在德军后方，当德军包围基辅时，他仍在敌后，后来装扮成一个农民才偷偷地溜出敌人包围圈。

此事发生后，我总把谢尔坚科看成不可信任之徒。我知道只

^① 苏军高级军官对犯有过失的下属使用暴力那是司空见惯的，有的人甚至被当场枪决，特别是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心腹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等还占据高位时，这种情况特别严重。就是朱可夫也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后来清洗过的红军恢复了元气，其指挥员渐渐由一些有能力的、经过战争考验的人担任，这才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较为文明的传统。

要能使他成为一个英雄，他什么谣言也编造得出来，而不管别人受到什么样的损害。^①但历史已把谢尔坚科说我们要放弃基辅的诽谤洗清。我们使德军遭到重大损失，挫败了他们的正面强攻。基辅的陷落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守卫部队放弃了它，而是因为德军从戈梅利和克烈缅楚格地区分别从南北两路包抄，形成钳形夹击的结果。

战争期间，斯大林身边最卑鄙的人之一就算谢尔巴科夫。^②他是条毒蛇，我曾听说高尔基担任作家联合会主席时，谢尔巴科夫是他秘书，负责处理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以便高尔基能致力于业务工作。高尔基可不是谢尔巴科夫能捉弄得得了的那种人。在高尔基的要求下，他最终被调走了。

有件事特别能说明谢尔巴科夫和斯大林的特性，这事发生在1943年，有位名叫亚历山大·彼得诺维奇·多夫仁科的人——是位颇有名气的电影导演和杰出的新闻记者——写了一本《乌克兰在燃烧》的电影剧本。里面一些情节就是根据他曾经写的暴露红军缺点的文章改写的。头脑敏捷、笔锋犀利的多夫仁科对战前使我们军队准备不足应负责任的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批评。他把

^① 关于这个谢尔坚科，是鲜为人知的。他似乎是个比麦赫利斯还要次的人，即是个最下流的人。当时，国家安全局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部门，贝利亚是内务人民委员兼任这个部门的头目。赫鲁晓夫在这儿描写的是军队中所有的警察将军和政治委员们都具有的特征。

^② A·S·谢尔巴科夫，政治局成员，莫斯科党的首脑兼武装部队总政治部主任（即总政委），肥胖，特别臃肿，为人奸诈，嗜酒如命，他是斯大林的心腹。战争期间，许多俄国人认为他很可能是斯大林的继承者，但从他身上看不到什么特殊才干。他1945年死去。按照1953年被捏造的医生谋杀案的话说，谢尔巴科夫就是被克里姆林宫的医生毒死的人之一。他可能被人毒死，但绝不是被维诺格拉多夫医生及其同事们所为。

剧本交到中央委员会。马林科夫和其他一些同志读过它。一次我

出差到莫斯科，斯大林问我是否读过它。我回答说，是的，我读过。事实上我没有真正坐下来读它，多夫仁科在1943年7月德军进攻期间曾读给我听过。我当然把3/4的注意力放在敌人的进攻上面，不可能集中精力去听多夫仁科的著作。我向斯大林这样做了解释，他说我是对所发生的事推卸我应负的责任。他开始刻薄地指责多夫仁科，把他说得一无事处，指责他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并扣上其他各种罪名。在当时指控乌克兰人为民族主义分子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样做也不管是否有证据。这种做法是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任职期间就已经开始了。他喜欢说每个乌克兰人都是个潜在的民族主义分子——他当然是胡说八道。

不管如何，斯大林还是召集了一次讨论多夫仁科电影剧本的会议。谢尔巴科夫发言说应对这一事件起诉，他竭尽全力激起斯大林对多夫仁科的愤怒，不厌其烦地指责这个电影剧本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马林科夫在整个讨论期间一言不发，虽然他曾赞扬过这个剧本。

斯大林并不让剧本问题就此罢休，他叫我召集一次乌克兰党和政府领导人的会议，其中包括负责宣传的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他要我们就乌克兰意识形态战线上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提出自我批评。然后他召去多夫仁科责骂一通。多夫仁科在艺术界作为一个活跃分子，从此被打入冷宫，长期没有露面。

这一恶作剧主要是谢尔巴科夫干的，他已慢慢地取得了斯大林的欢心，他的所作所为就是想给别人带来痛苦。可能认为，我说过这些是因为我对谢尔巴科夫怀有特别的仇恨。那不符合实际。我说的只是谢尔巴科夫应得的评价，他得到的评价应该是最糟的。但罪魁祸首是斯大林，是他才使得象谢尔巴科夫之流为所欲为，祸国殃民。

现在我要谈一点我在战争中了解到的几位指挥官的事。我和

许多将军们长期相处间，与他们多数都交往甚深。当然，我们之间偶尔也有磕磕碰碰的。战时，相互之间有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人少不了要犯错误或发脾气；毕竟，人无完人，我自己也不是圣贤。总的来说，虽然我被在不同战线上与我共过事的人所感动，我们几乎都能找到共同语言，分歧只是偶然现象，这儿我不讲分歧。战争早就结束了，敌人已被击溃。谈论中的许多指挥员已授勋并光荣引退，没有必要在这儿散布他们的缺点错误。

然而，在我讲到那些在战争中屡建战功的指挥员时，我要先说一下帕夫洛夫，他被指责在战争初期对白俄罗斯防线的崩溃负有责任。^①我对帕夫洛夫总是怀疑的，即使在任命为白俄军区的司令前就如此。我记得在1940年曾观察过他，当时他是坦克部队的一名指挥官，在哈尔科夫试验我们的新研制的T—34型坦克。虽然与他只进行一次短暂的谈话，我认定他是个能力有限的人。即使他是西班牙战争中的英雄，我感到要他担此重任对他也是出乎意料的。我决心把对帕夫洛夫能力的怀疑转告给斯大林，我小心翼翼地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你很了解帕夫洛夫同志吗？”

“是的，非常了解。”

“我仅跟他交谈了几分钟，坦率地说，他给我印象不佳。他的能力似乎有限，他知道怎样操纵一辆坦克，那是毫无疑问的，

^① D·G·帕夫洛夫将军在战争前夕被看成是苏联最好的坦克专家，但是他对坦克的使用也犯了许多英国将军们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他不相信坦克能象德国人很快证明了的那样，可以组成战斗编队穿插到敌人阵地作战（德国人是从利德尔·哈特上尉那儿学来的），他想，坦克只是用来掩护步兵。因此在战争初期，苏联装甲部队毫无意义地损失掉了。帕夫洛夫指挥的白俄罗斯方面军，由于兵员不足、补给短缺，造成土崩瓦解这一灾难性后果。

但我认为他不适合于担任指挥员。”

斯大林显然有些不高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你甚至还不认识他。”

“我已经承认对他了解不多。”

“好啦，我知道他，在西班牙他已证明是个使我满意的坦克指挥官。”

“对，我仅是想让你知道，他没有给我一个好印象。我也想把我对库利克元帅的某些疑点告诉你。他负责我们的全部炮兵。战争迫在眉睫了，我认为他不能担此重任。”

斯大林这时很恼火，“你先是抱怨帕夫洛夫，现在又指责库利克。你甚至还不认识库利克，我从内战时期就认识他，当时他指挥察里津（斯大林格勒）的炮兵，他懂得炮兵。”

“斯大林同志，我并不怀疑库利克在察里津是个很好的炮兵官员，但当时在那儿有多少门加农炮？两三门，而现在他指挥我们全国的炮兵。”

斯大林对我大发雷霆，他叫我闭嘴，不要多管闲事。这正是我担心出现的事。斯大林认为红军是他的小宝贝，不允许其他人对此评头论足。但事实证明，关于帕夫洛夫和库利克，斯大林错了，我是对的。

斯大林任命帕夫洛夫为白俄罗斯军区司令，我甚至没有见到这个任命通知，直到成了既成事实我才知道——这也是斯大林的典型作法，他甚至简单到与政治局其他成员磋商一下都不干。就这样，一个军区就托付给了帕夫洛夫，而这一地区正扼西方入侵之敌必经之道。面对希特勒的入侵，但没有让其军队作任何准备。战争最初几天，帕夫洛夫领导的军队就溃退了，空军还在跑道上就被摧毁。斯大林把帕夫洛夫、他的参谋长及军事委员会的地方官员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并叫枪毙他们。斯大林必定认识到，任命帕夫洛夫为白俄罗斯司令是犯了多大一个错误，但这已为时

太晚，前线土崩瓦解，德国人长驱直入了。

至于库利克，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他被证明是最无能的。我记得在1943年，瓦图京和我听了库利克向负责沃罗涅日前线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谢皮洛夫的一次汇报，那是一曲十足的滑稽戏。最后，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斯大林作了让步，把库利克从元帅降到少将。战后，库利克被逮捕并处决。

过了多年，斯大林滥用职权的事才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得到揭露，决定给帕夫洛夫和其他受军事法庭审判并被处决的将军们恢复名誉，然而我个人对此还是有所保留的，我知道，把帕夫洛夫和其他人送上军事法庭是有其法律根据。但我也知道斯大林才是真正的罪人，因为他首先把指挥权交给象帕夫洛夫这样的人。但我没有用我的影响去阻止为他们恢复名誉。

战争初期我曾见过朱可夫几次，当他飞到基辅接替基尔诺波斯的指挥权，我很高兴。一次，他与大家呆了才两三天，就接到斯大林的电话，叫他搁下手中工作即刻返回莫斯科。“是啊，我看你们这儿的司令员的能力相当差，”朱可夫说。“怎么办呢？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支持基尔波诺斯，希望有最好的结果。”他说得对，我们只能这样做。我非常坦率地告诉朱可夫，对他的离去我感到非常难过。

战争初期从莫斯科到前线来的人并不都象朱可夫那样对我们有所帮助和受我们欢迎的。例如，当德军逼近基辅郊区，莫斯科派来布琼尼元帅。^①有次我参加一次会议，作战部长巴格拉米

^① S·M·布琼尼是前沙皇的骑兵中士，后来成了斯大林的朋友，红军一种滑稽帽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这种帽后来不用了）。他精力充沛，作战勇敢，但嗜酒如命，对现代化战争一无所知。他不仅丢了基辅，而且把战局弄得如此糟糕，使被德军围歼的苏军，其数量之多，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

扬^①上校就总的局势向布琼尼作了汇报，当时形势确实严重。我记不清他说了些什么——整个讨论中都是军事术语——但我记得谈话是如何结束的。布琼尼声嘶力竭地对巴格拉米扬说，“我听了你刚才所说的，我理解你好象连你的部队都控制不了了，我看我们最好把你毙了。”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巴格拉米扬说，“为何要枪毙我，如果我不能胜任作战部长一职，那么让我去指挥一个师看看。把我枪毙了能解决什么问题？”

布琼尼对有关调动或降职的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顽固地坚持要巴格拉米扬同意他应该被枪毙。巴格拉米扬自然不准备同意任何这类事情。

应该记住，这次“友好”的谈话，是在一次盛大的晚宴和喝了许多白兰地后发生的。尽管酒后胡言情有可原，但仍使我震惊不已。布琼尼作为最高统帅部一位代表竟敢如此对待象巴格拉米扬这样出色的军人，这简直是不可容忍的。他对解决我们面临的严重困境肯定没有任何帮助。布琼尼来后我们的处境仍旧如故，他离去后局势也没有就此恶化。

值得幸运的是，布琼尼的威胁没有引起后果，伊凡·赫里斯托弗罗维奇·巴格拉米扬仍然活得很好——祝他再活千年！他始终是个正派人，也是个出色的军人。在后来我们驱逐希特勒侵略者的努力中，前线许多关键性地段都交给他指挥。

我想在这儿说一下与弗拉索夫的关系，他后来当了叛徒，背叛了祖国。战前他指挥过英雄的99师，该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被第一个授予红旗勋章而留名青史。弗拉索夫曾被普遍地看作是

^① I. K. 巴格拉米扬，在沙皇军队里以一个军官候补生开始其军旅生涯。内战时期参加红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一度出任铁木辛哥的参谋长，后来成为一位出色的兵团司令，最后晋升为元帅。

个好人，是个才华出众的指挥官。当基尔波诺斯和我正在为保卫基辅而新组建的第37军物色一位军长，军区的人事部门建议我们任命弗拉索夫。我决定从莫斯科查看一下他的情况。当时我们仍生活在怀疑到处都有人民的敌人的状况下——这种怀疑在军队最为突出。我想搞清楚的是，我们能否把37军的指挥权和保护基辅的重任交托给弗拉索夫。

我叫通了马林科夫，他在中央委员会分管人事工作。我当然也指望他个人知道一些弗拉索夫的情况，或希望他叫手下人去查查档案，看看能否给我一份可以评价弗拉索夫的材料。电话终于接通了，我向马林科夫，“你能就弗拉索夫给我提供点什么资料吗？”

马林科夫说：“你可能想象不出我这儿乱成怎么个样了，我们所有活动全停了。我手下抽不出任何可以帮助你的人。你只得自己掂掂看怎么做合适，并对你的决定负全部责任。”这样，除了接受其他人员的推荐外，我别无他择。基尔波诺斯和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只得任命了弗拉索夫为37军的军长。他果断有效地开始指挥工作，把从前线撤回的部队和从德军包围圈逃脱出来的溃兵汇编在一起，组成一个军。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让他当军长是个明智的选择。在保卫基辅时，在敌人炮火下他表现出冷静、坚强，机智的领导才干。他尽到职责，使德军从正面攻取基辅的企图落空。基辅最后陷落，那是由于敌人重兵合围，特别是在城东集中了大量部队进攻的结果，并不是弗拉索夫未尽守土之责。

弗拉索夫突破敌人的包围，徒步回到我们阵地上，斯大林命令他飞到莫斯科。我猜想可能总部掌握了弗拉索夫的某种罪证，故把他召去审问。后来我才知道他被召到莫斯科授勋。斯大林亲自赞扬他，还把在莫斯科郊外反击德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他。弗拉索夫这次再立新功。斯大林随后又把守卫属于我们方面军的凡尔代

地段的要职给了他。弗拉索夫再次陷入包围，但他又一次奇迹般地返回到我们阵地。斯大林曾一度考虑让他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任指挥。记得这是斯大林当着许多人的面对我这么说的：如果不是弗拉索夫已有合适的职务，宁愿任命他去斯大林格勒担任指挥，而不是让叶廖缅科去了。

在弗拉索夫叛变以后，斯大林把我叫去，用威胁的口吻提醒我说，我是提升弗拉索夫为37军军长的人之一。在回答我坦率地提醒他，是他让弗拉索夫负责莫斯科反击战，他甚至还建议提升弗拉索夫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司令。斯大林不说这件事了，以后也未提及过。

当然，弗拉索夫的事对我和斯大林都是不得不忍受的屈辱。一个表现得如此有献身精神、勇敢机警的人，一个赢得别人如此尊重的人竟背叛了祖国，那真是不可思议。他必定是个见风使舵的人，所以才被德国人收买成了特务。他还自称是个共产党员，但他头脑里根本没有真正的思想体系。入伍前他是个教员，表面上看他不是个坏人。战争的第一年他似乎肯定忠于苏维埃政权。当然，成为军人后，他很可能心怀着谋取个人私利的动机。或许他希望将来会在党内混个一官半职，求个舒服的位置。很不幸，在过去，我们之中不乏此类个人野心家。我看现在比以前更多。当然，弗拉索夫有着比此类野心家更大的罪行。他犯有叛国罪，是与普通犯罪性质完全不同的一种罪行。

弗拉索夫是罪有应得，最后被处绞刑。^①

^① A·A弗拉索夫上将是苏联新一代最优秀最果断的指挥员之一。在战争的头一年中表现出色。由于他上司和同僚的无能，使他数次陷入德军的包围之中，他全凭勇气，只身逃出包围圈。他是个传奇式人物，也是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军人。他聪明过人、身材魁梧。他对斯大林及其周围一伙人的腐败、蛮横和无能，感到厌倦和嫌恶。1942年春，由于在一次没有慎重考虑和充分准备的反攻中，他再次陷入德军包围之中，这次他没有逃

跑，当了德军俘虏。当时他觉得，俄国的唯一希望在于德国的胜利和对俄国政权的摧毁。他向德国人提出把大批俄国战俘组编入伍，由他率领站在德国一边参加战斗。但希特勒没有抓住这一机会，弗拉索夫的队伍也就没有拉起来。这时的弗拉索夫是个怨气冲天、饱受挫折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懂得在德国人手中的俄国是不可能这样解决问题的，等明白过来，为时太晚。他并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个人野心家，也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个弄潮儿式人物。当德国人被打垮后，他被作为叛徒处死，那真是在劫难逃。

第二节 哈尔科夫灾难

1942年春，向列宁格勒推进的德军被阻在郊外，莫斯科正面的德军在最后关头终于被击退；这时，俄国人决定在乌克兰发动一个三叉型攻击。中间的一股由铁木辛哥领导主攻哈尔科夫。对红军来说，这次攻击的结果是彻头彻尾的灾难。在铁木辛哥司令部工作的赫鲁晓夫，完全参与了这个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反攻失败对他来说是个惨痛的教训。他后来在“秘密报告”中也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为自己开脱，把全部责任推给斯大林。这儿他仅是再次旧话重提。赫鲁晓夫倒台后出版的朱可夫回忆录（朱可夫元帅指挥的几次最大的战役）也说那次招致不幸的反攻确实是斯大林的主意，而他朱可夫提出了充分的理由反对实施。这几乎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朱可夫接着说斯大林的主意是受到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强烈支持的。这也许不是空穴来风。然后朱可夫又暗示（但这儿提到的资料顺序排列是颠三倒四的，或许是朱可夫故意这样），就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而言，在大灾难来临之前，他们没有取消这次反攻的企图。灾难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德国已调集重兵准备发动一次攻击，吃掉俄国阵线上的突出部，

而铁木辛哥反而源源不断把兵力投入这一地区，这无疑等于飞蛾投火。

在我们撤退期间，斯大林对我的不满达到了顶点，认为我们将丢掉整个乌克兰。他身为最高统帅，可不愿对失败负责任。他开始寻找替罪羊。既然我是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又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那就是明显的候选人了。

1942年对哈尔科夫进行灾难性反攻期间，或许是我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反攻开始时进展顺利，我们轻而易举地撕破了敌人的防线——真有点太容易了。我们发现敌人没有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好象前面是条平坦的大道，可以长驱直入。这是大可怀疑的。它意味着我们钻进了敌人的口袋。经过侦察，果然发现敌人集中在南线的阿尔瓦扬斯克地带。很明显，敌人企图打击我们左翼，占领我们冬季战役中建立起来的凸出阵地。我们认识到，向西穿插越深，侧翼暴露得愈长，德国人就更加容易分割包围我们。我们察觉出敌人的阴谋时，马上采取防范措施尚为时未晚。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要求允许取消反攻，把部队安全撤回。^①

我忘记了是谁最先倡议组织哈尔科夫战役的，后来斯大林指控说是我命令组织了这次进攻。我不否认这里面有我的一份账，但是我问斯大林，“关于铁木辛哥司令员又怎么说呢？”

“不”，斯大林说。“是你的主意，铁木辛哥仅是听从了你。”

“那是不可能的”，我回答。“你可能不太了解铁木辛哥，

^① 铁木辛哥的攻击开始于5月12日。起初几天进展得太顺利，直到5月17日，苏联部队很危险地散开后，双方阵势才露出真情。铁木辛哥他们到了17日午夜才给斯大林打电话，可在18日拂晓，德国人就发起了反攻，随即对苏军形成致命的包围圈。进了口袋的俄国人失去了控制，只能在绝望中挣扎。

他是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除非他认为这次行动是个好主意，否则他绝不会赞成随便发动一次战役。”

实际上，是巴格拉米扬同志制订出反攻哈尔科夫的作战计划，我们西南方面军总部同意，这个计划，总司令部也同意了。我们都参与了最后的决策行动，现在我不得不劝说总参谋部取消这次行动，我知道这并非易事。

当我们一发觉攻击哈尔科夫存在危险时，就命令停止攻击，采取步骤建筑防御工事，并把大炮、装甲部队和反坦克部队调来掩护我们暴露的左翼。当下达完所有必须下达的命令，使我们从有效的进攻转变成有效的防御后，我到军营准备歇歇脚。当时是早晨3点钟，天开始放亮。我刚卸完装想躺下，巴格拉米扬突然闯进来，神态失常地说，“对不起，打扰了你，赫鲁晓夫同志，我想你应该知道莫斯科已经取消了暂停进攻的命令。”

“什么？怎么能这样？谁作的决定？”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继续进攻，我们将走向灾难。我们凸出阵地上的部队有可能被吃掉。我恳求你亲自去找斯大林讲讲，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你能说服他改变决定，撤消给我们的命令。”

我以前从未见到巴格拉米扬同志处于这种状态。他是个有理性的、不偏不倚的人。我喜欢他。我甚至可以说是偏爱他。我始终佩服他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坚强的党性、渊博的军事知识，廉洁正派、忠诚直率。现在我完全同意他关于需要我与斯大林谈谈的建议。我必须试图改变斯大林的意见，虽然我估计其结果未必会好。

当我叫通总部时，巴格拉米扬同志与我在一起，接电话的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①他已经知道出了什

^①A·M·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这时接替去世的沙波什尼科元帅担任总参谋长。

么事。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我说，“作为一个研究过地图，懂得敌人战略的军人，你了解的情况要比斯大林同志了解的详细得多。请你带着地图向斯大林同志解释一下，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攻击将会出现什么后果。”华西列夫斯基懂得我的意图是什么。我们都亲自目睹过斯大林是如何用手指在地球仪上描绘部队位置和前线来作出战役计划的情景。

“斯大林现在去近郊别墅了。”华西列夫斯基说。

“到那儿找他谈去，你知道他会随时见你的。毕竟这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拿张地图给他看看，给我们说明一下为何我们决定取消攻击是唯一的选择。”

“不，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同志已下定决心了，他已经发出命令。”

凡是与华西列夫斯基打过交道的人都能想象得出他在回答我时用的那种枯燥而泛味的男低音。我跟他很要好，因此在挂了电话后，决定再次给他打电话试试。这回我急切地请他给予帮助，但他仍然拒绝：“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斯大林同志已经下了决心，所有的事就这样定了。”要是朱可夫而不是华西列夫斯基在总部就好了，我敢保证他会驱车前往斯大林别墅，代替我们去力争的。

不管怎样，我在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只得亲自给斯大林同志打电话了。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冒险的。我知道斯大林此刻已自认为是个无与伦比的军事战略家。我叫通了斯大林别墅，马林科夫接的电话，互致问候后问道：“我可以请斯大林同志讲话吗？”斯大林肯定是在那儿，我对别墅的摆设非常清楚。我甚至能准确地知道谁坐在什么地方，斯大林走多少步就能接电话。我曾多次看见过他接电话。我可以听到马林科夫说是我来的电话，并请斯大林与我谈话。马林科夫返回后告诉我，“斯大林同志说

你有什么事请跟我说，我可以给你转达。”这是已出现麻烦的明显信号。

我坚持说，“我想亲自跟斯大林同志讲话，我必须把前线的情况报告给他。”

马林科夫把我的意思转告给斯大林，然后回来对我说，“斯大林同志还是说你应该把你的意见先告诉我。”

于是我不得不告诉马林科夫说，如果我们继续进攻，那正中敌人下怀。我们阵线拉得过长，阵线防御已经削弱，我们的侧翼暴露给了德国人。当马林科夫向斯大林转述这些时，我再次暂停下来。马林科夫回来后说，“斯大林同志知道，你们在没有得到方面军司令的批准的情况下，你就擅自决定停止进攻。他也知道是你取消这次战役，仅是你个人的决定，因此他反对这样做。”我到现在还不相信铁木辛哥告诉斯大林，是我强迫他同意这个决定。我想斯大林大概是试图把我搞得六神无主，从而中断我们的争论。

“马林科夫同志，你是非常了解铁木辛哥的特点的。除非他也相信必须取消这次战役，否则他绝不会接受那个决定。”

“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了，斯大林同志说进攻必须继续。”

“好吧！”我说，“命令就是命令，继续进攻并不难，因为我们前方没有敌人。那正是我们最担心的。”

马林科夫挂断了电话。巴格拉米扬和我在一起，听到了这个谈话。他神经受到了打击，失声痛哭起来。他预见将会出现什么后果，他在为我们的军队痛哭。①

①这次电话谈话的故事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讲述的基本相符，但有个新的奇特的细节除外：那就是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指责赫鲁晓夫撇开铁木辛哥单独行动。铁木辛哥和他的参谋长巴格拉米扬都极度渴望允许停止进攻，把他们尚可挽救的部队撤出来。

不出我们所料，几天后灾难来临了。我们对此束手无策。许多将军、校官、低级军官和士兵们被打死，57军全军覆灭，几乎无一幸免。我们的部队已完全深入敌占区，被包围后，部队甚至没有足够的燃料逃跑。徒步撤回又太远。许多人战死，更多的做了俘虏。古罗夫将军不知怎样弄了辆坦克逃出包围，有人反说他是临阵脱逃，应送军事法庭审判，但我对他们说，“我们损失的将军已不少了，你们还要失去没法逃离虎口的几位将军吗？你们是发疯了怎么的？！”

斯大林自然不会承认他的过错。灾难发生几天后我接到从莫斯科打来的电话，他们没有传唤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返回莫斯科，而是把我叫去。你可以想象，我心情是如何压抑，我几乎描绘不出当时的心情是何等沮丧。我们损失了数万人，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那个赖以生存的希望，失去了我们能够在1942年扭转乾坤把侵略者赶出去的希望。哈尔科夫反击战遭到失败已够难过的了。而更难过的是，好象要我个人为此承担一切责任。我知道尽管我曾试图力争取消这次进攻，避免这次大灾难，但这些对我现在面临的处境并没有什么帮助。对斯大林来说，要他同意我们停止进攻是对的这一观点，不就意味着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那样高尚的品德他不具备。为了避免承担做错了的某些事的责任，他是不择手段的。

在飞往莫斯科途中，我十分清楚自己的悲惨处境。一切听天由命。我做好了各种准备，包括被逮捕。

起初，斯大林一点不露声色，不知他想迁怒于我还是同情我。他是个出色的演员。他那张脸是个深不可测的面具。他后来说，“德国人宣称，他们俘虏了20多万人，他们撒谎吗？”

“没有，斯大林同志，他们没撒谎，他们说的基本对。我们部队人员大约是那么多或许还多点。我们必须想到，他们中一些

阵亡了，其余的做了俘虏。”^①

斯大林没有再说什么，但我现在看得出他的内心受着痛苦的熬煎。我不知道这个沸腾的水壶何时会爆炸，爆炸时会祸及谁，但他自我克制住了。一时无言以答。

后来我们开始讨论其他事情。现在我们怎么办？为了防止敌人渡过顿涅茨河，我们沿河建立防御工事的机会在那里？如何以我们有限的力量，阻止德国人前进？讨论结束后，我们共进晚餐。

我在莫斯科停留了好几天。等着接受处理，等的时间越长，感到越厌烦越痛苦。我非常怀疑斯大林会原谅这次失败。他们需要找个替罪羊。当人民的利益处于危险时，他要奉行严厉的惩罚原则。这也是显示他对谁都不会宽容的铁面无私的一次好机会。我完全知道斯大林将如何搞报复。他是干这类事的大师。

我到莫斯科后不几天，我们在斯大林那儿吃晚饭。他开始用平静的、略带评论的口吻对我说话，“你知道，”他紧盯着我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我们的军队在东普鲁斯陷入德国人的包围，指挥部队的将军被沙皇送上军事法庭，他被定罪并处绞刑。”

“斯大林同志，”我回答说，“这一事件我记得很清楚，沙皇那样做是对的，米亚斯尼科夫是个叛徒，他是德国的代理人。”

斯大林没有说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想也没有进一步发挥，但他把我当时处于何种境地已完全说穿了。你可以设身处地想想我的心情如何。我明白他是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军队在东普鲁斯陷入包围，与我们现在军队在哈尔科夫东部被包围作了

^①苏联官方公布的是5千人阵亡，7万人失踪，300辆坦克被摧毁。而德国人说他们俘虏了20万人。

类比。他在提醒为哈尔科夫成败负有责任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处罚战败者这类事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已开创纪录：战争开始后不几天，德军在没受什么惩罚就占领了白俄罗斯，对此有责任的帕夫洛夫将军、他的参谋长以及当地的军事委员会成员，就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后处死。

斯大林是让我在心理上有所准备，要我懂得，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平息公众舆论，他可能严厉惩罚那些对哈尔科夫灾难负有责任的人。

这就是我面临的处境，等着瞧将会遭到什么厄运。

唯一使斯大林把哈尔科夫灾难的责任归咎于我的困难是，正是我曾顽强地劝说他取消那次进攻——我劝说的情况是人所共知的。我曾通过马林科夫把我的意见和建议转给他，我敢肯定，当我从前线打回电话时，贝利亚、米高扬、莫洛托夫或许还有伏罗希洛夫都与斯大林呆在别墅。尽管所有这些人都是非常接近斯大林，他们总不该对我竭力反对继续攻击一事充耳不闻。如果这次攻击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他们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讨厌的证人，而现在，他们就是不利于斯大林的证人了。

最终，斯大林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我可以返回前线了。我如释重负。但我认识到仍未脱险。我知道有好多次，斯大林让一些人消除疑虑，带着好消息离开他办公室，然后把这人抓起来，送到一个他们所料不及的地方。我在离开他办公室的那天晚上没有出什么事，第二天我就飞回前线了。①

我返回前线后发现局势很糟。铁木辛哥元帅告诉我说，军队被敌人彻底打垮了，收集散兵的唯一方法是建立流动厨房。指望

①赫鲁晓夫的确有理由为其性命担忧。但他省略没提的是，他虽然被允许轻轻松松离开了，可铁木辛哥却因哈尔科夫大灾难被降了职。朱可夫接替他继任斯大林之下的最高副统帅。

士兵们在饥饿时能返回寻食。他是在应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建立了战地厨房，慢慢地但是稳当地建立起我们的防线。

事过多年，我仍经常回顾哈尔科夫事件，既把它看成我们祖国蒙受苦难的时刻，也把它看成我一生中的一个里程碑。

第三节 斯大林格勒战役

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是赫鲁晓夫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直到朱可夫发起反击前，他一直是负责死守斯大林格勒的叶廖缅科元帅的政治顾问。因而是这场战役自始至终的目击者。虽然德国人摧毁了该城，双方在废墟上鏖战，叶廖缅科的指挥部也被迫转移到了河的对岸。他讲叙的有关这次战役的发展情况，提供了使人胆战心惊的激战场面的第一手材料。这次战役以全歼德军保卢斯的第六军而告终，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

当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时，我们的武装部队仍然缺乏战斗力。我们的重炮、机枪、防空炮、反坦克武器等严重不足。敌人仍紧逼我们。但我们的军队已经能够进行顽强的抵抗，没有战争初期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的混乱现象。我们的军队现在英勇地战斗着，只有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才秩序井然地从一个阵地撤退到另一个阵地，绝不会让敌人有机可乘。

虽然我们受到的挫折比以前少，但仍然让人非常痛心。在这次战役中，我收到报告说鲁文·伊巴露丽战死了。战争初期，鲁文·伊巴露丽同我自己的儿子列昂尼德曾在古比雪夫同一病房里

养过伤。列昂尼德是个飞行员，后来在战争中牺牲。我还得知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的儿子，同样是个飞行员，也牺牲了。我非常熟悉他们。这是战争，有战争必有牺牲，许多好人阵亡了。由于红军准备不足，装备不够，她所受的损失比应受的要多得多。①

我对在城南靠近诺里曼深谷地区战区看到的那幅惨景记忆犹新。我们的一些战斗轰炸机当时正好飞越上空，直奔前线。突然窜出德军的梅塞米特战斗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轰炸机一架接一架被击中起火，我们的飞行员跳伞逃命。从外表上看，我们的飞机与梅塞米特飞机相似。我们地面部队认为被打下的飞机是德国的，就向徐徐下降的驾驶员开枪。我记得一个飞行员在降落时大声喊道，“我是你们中的一个！我是你们中的一个！”然而一阵枪声过后，什么都完了。

我们的空军是由赫柳金指挥的，这个青年人因参加在中国与蒋介石一起共同对日本的战争有功曾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②

德军抵达伏尔加河，对我们形成半圆圈包围。切断了我们与北方的铁路联系和伏尔加河上的所有航运。我接到斯大林打来的一个电话，他用威胁口吻问我：“是什么原因使你们从该市撤退？”

“斯大林同志，谁说我们要从该市撤退？谁向你报告的？我们甚至连想都未想过这个问题。我不明白你是如何得到这种消息

①他是西班牙共产党著名党员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儿子。人们常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为“拉·帕西奥娜里娅。”她仍住在莫斯科。

②T·T·赫柳金指挥的是空军第八军。这儿提到的是1939年夏在蒙古与日本进行的一场不宣而战的、规模不大但却是很残酷的战争。在这儿，朱可夫首次名声大振。他及时赶到哈勒欣河，使局势转危为安，挫败了日本人。人们似乎忘了，当时俄国人把蒋介石作为同盟者，并支持他反对过毛泽东。毛是从来未忘记这点的。

的，它绝不是真的。”

他挂了电话。我开始纳闷是谁编造了这一可耻的谣言。矛头显然是对着我个人。我决定打电话给马利谢夫，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会干这种卑鄙勾当。^①我把斯大林来电话一事告诉了他，他说，“是的，我也刚接到一个电话，斯大林发脾气了。他跟我说的同跟你说的一模一样。我不清楚谁能制造这种谣言。”

然后，我想或许是丘亚诺夫，但丘亚诺夫几乎肯定不会干这种卑鄙勾当。我也打电话给他，他说他也接到斯大林打来的使人很不愉快的电话。

斯大林再也未提撤退一事。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关于撤退的谣言正是斯大林自己编造的。这就是他称之为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任何一个提议撤退的人，都将招致某种非常不愉快的后果，因此，斯大林就自己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仅仅是让我们明白，谁要是提出撤退，他的反应将如何。这是斯大林指挥战争的典型作法。他要由莫斯科控制所有的一切。把中央集权路线发展到了这种极端措施，斯大林从没有让在前线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放开手脚、解放思想。

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作战指挥部设在察里查河边的一条沟壑里，这是条多年雨水和融雪冲刷而成的山谷。当我们初到斯大林格勒，使我们吃惊的是在这个沟壑的山坡里竟发现有个挖好了的指挥部。它是早在这次战争前很久就准备好了的并筑有防守工事，在入口处备有遮护物，可以防止炸弹爆炸引起的冲击波，门上装有厚钢板，以防从外攻入。使人有点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在察里河边的地下钢骨水泥掩体里每一件东西，我看起来都非常眼

^①V·A·马利谢夫，当时任军事工业人民委员，后来成为马林科夫手下技术官僚小集团中的一权贵，并成了扩大了的共产党主席团的成员。

熟，有似曾相识之感，内部装修非常合斯大林的口味。墙上装着橡木板，完全跟斯大林别墅里的一样。其他东西也配备得很好。甚至还备有个卫生间。一个真正的军人绝不会想到，在野战的情况下还要使用这种卫生间。在此前后我从来未听说有这个指挥部，更不知是为谁准备的。

这次战役刚开始，斯大林格勒就遭到敌人一次最残酷的空袭。一批接一批的德国飞机轮番对该城轰炸。斯大林格勒一片火海。我们发现与伏尔加左岸的联系被切断，与左岸的通讯对我们指挥战斗可是至关重要的。叶廖缅科司令^①和我作出决定，继续呆在斯大林格勒是不明智的。

我们给总司令部发出特急电，要求允许我们把司令部转移到左岸，这样我们就能与另外几个军更好保持联系。一天过去了，没有回答。我们重复了这一要求，莫斯科仍未给我们只言片语。未经许可，我们可不敢移动指挥部。

后来，斯大林完全因为有其他事给我打来电话。我趁机对他说：“斯大林同志，我们已经不得不再次重复允许我们把指挥部转移到左岸的请求，但总部仍未给答复。时间是重要的，所以我请你现在就同意我们这样做。”

“不，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部队发现他们司令已经把司令部转移出了斯大林格勒，城市将会陷落。”

我尽最大努力向斯大林解释，他的担心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斯大林同志，我看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崔可夫^②指挥的第62军

^①A·F·叶廖缅科元帅是东南方面军的司令，赫鲁晓夫也属于这方面军。在这一阶段，东南方面军的防务包括斯大林格勒市，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则由城北的几个军组成。

^②V·I·崔可夫元帅接替洛帕京将军为第62军军长，该军长期抗击着德军的正面强攻。崔可夫后来率部直捣柏林。一段时间，他是驻德苏军司令，他不是待人和善的人，但却是个优秀的军人，是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头号大英雄。

已接管了斯大林格勒的防务。我们又任命古罗夫为军事委员会成员，指示他留在城里加强部队的领导。我们绝对保证，崔可夫和古罗夫将会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将拒敌于我们防线外，不让他们占领该城。”

“那么好吧，如果你能保证阵地可以固守，我们防线不会突破，我答应你把司令部移到左岸的请求。但你一定要在斯大林格勒留下一名前线司令部的代表，他能向你报告那儿战争进行情况。我要你保证，你在市内有人来证实崔可夫的报告。”

叶廖缅科和我准备转移司令部。我们叫参谋长扎哈罗夫帮助我们。^①（扎哈罗夫和叶廖缅科都遵照斯大林的“指示”，爱用拳头揍别人的鼻子）。我们决定把戈利科夫将军留在斯大林格勒，能让我们知道崔可夫是如何护守该城。戈利科夫是斯大林亲自派到我们方面军任第一司令的。^②我是在1938年我们占领利沃夫期间，他刚好在红军任人事部长时认识他的。当他出任红军情报机构首脑时，我常在斯大林那儿看到他，但直到这次任命前，我从未有机会来估价他的为人及考察他的共产党员品德。

我们把戈利科夫叫来，叶廖缅科告诉他，“戈利科夫同志，我们已被批准把我们的指挥部转移到河左岸，我们要你留在这儿的指挥部里，与崔可夫同志保持联系。

戈利科夫脸上出现了惧怕的表情，但他暂时还是控制住了自

^①M·V·扎哈罗夫将军，是叶廖缅科在斯大林格勒时的参谋长。他后来是一个方面军司令。

^②P·I·戈利科夫上将是个“政治”将军，较之战场上的事，他更适合于行政工作和略带点外交性质的任务，由于对1943年哈尔科夫反击战负有责任，勉强逃掉军事法庭的审判。战后，被提升为武装部队总政治部主任，他在斯大林格勒干了些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他在那儿肯定未呆多久。

己。当叶廖缅科离开房间后，戈利科夫就向我求情不要把他单独留在城里。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从未见到任何一个人处于这种状态，而不论是军人还是老百姓。他脸色苍白得象纸一样，哀求我不要把他抛弃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斯大林格勒毁灭了，不要把我留下！不要毁了我！让我跟你们走！”

“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敢说斯大林格勒毁灭了！你不看情况已经变了吗？我们不再后退了。我们的部队就停在这儿坚守。你怎么啦？镇定下来。你怎么敢出这种洋相？命令你留在城里，你就应该服从。”

几天后，我们从斯大林格勒一位军官那儿得到消息，说戈利科夫精神上完全垮了，行为举止就象个疯子。他留在部队对我们毫无益处，反而成了一个累赘。提出这一抱怨的军官，请求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我们解除了戈利科夫的职务，并把他调走了。

他后来在斯大林跟前抱怨我们。有次我返回莫斯科期间，斯大林生气地责备我用错误的方法对待我们的将军，没有给他们必要的支持。我问他，“准确地说，你脑海里指的是那位将军？”

“好，以戈利科夫为例，我们派他到下面去帮助你们，而你们是如何对待他的。”然后他说了很长一段攻击叶廖缅科的话，称他是个卑微的什么。我十分吃惊。在此以前我常听到斯大林热情赞扬叶廖缅科，简直把他说成是我们最优秀的野战将军等等。斯大林对叶廖缅科深感不满的部分原因，是德军仍在驱赶我们，并且已冲入斯大林格勒城里。市区不仅有小规模战斗，还不时发生激烈的对阵战。尽管斯大林不告诉我使他坐立不安的原因，却以叶廖缅科苛待戈利科夫为借口来咒骂撒气。

“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戈利科夫告诉你些什么，但如果他抱怨我们对他不公平，我没有其他选择，只好把那样对待他的理由告诉你。”然后，我把命令戈利科夫留在市内指挥部时他如何惊慌失措的事报告斯大林，从斯大林面部表情的变化，可以看得出

他以前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因此”，我结束时说：“我们解除戈利科夫的职务是有充分理由的。我真不明白你为何要如此责怪叶廖缅科和我。我愿为任何一个受到不公正惩罚的人辩护，但是戈利科夫确实是罪有应得。”

然后斯大林告诉我，他已决定撤消叶廖缅科在斯大林格勒指挥的职务。我告诉他，我想这将是严重错误。“我知道现在有人对叶廖缅科有些议论，”我说。“象任何人一样，他有他的对手及不尊重的人。但是，我以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来说，我与叶廖缅科度过了一个关键时期，以我之见，他是完全称职的，能担当得起当前赋予他的重任。我现在只是讲他作为司令员的优点，并不涉及他的其他品质。重要的是，他是个办事认真、经验丰富的人，在部队里是个好领导。”

起初，斯大林自然是固执己见，但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让步。最后说我可以飞回前线了。当我们道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很高兴召你回来磋商。如果不是你告诉我那些，我们就撤了叶廖缅科，我已下定决心这样做了。你的论据改变了我的想法。叶廖缅科可以继续留任。”

“你不会为此遗憾的，斯大林同志。你这样做是对的。”
与此同时，敌人继续紧紧压来，但我们军队使德国人每前进一寸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我们的口号是“决不后退一步！”，“与伏尔加阵地共存亡！”及“誓死战斗，决不放弃斯大林格勒！”好象每到局势危难严峻时，马林科夫就要与华西列夫斯基、沃罗诺夫、诺维科夫和总参谋部其他代表飞到斯大林格勒来。①坦率地讲，看到他们我就不高兴。除非他们给我们带来一

①M·N·沃罗诺夫元帅在这儿还是个新出现的名字。作为炮兵司令，他是苏联将领中最具天赋和智足多谋者之一。虽然赫鲁晓夫讲马林科夫、华西列夫斯基（总参谋长）、沃罗诺夫和诺维科夫（苏联空军司令）是同

机到斯大林格勒，而实际情况是，马林科夫作为斯大林的特别代表，在叶廖缅科司令部呆了好几次（赫鲁晓夫对此特别憎恶），而上面提到的其他一些人与朱可夫一道，则是斯大林格勒的常客。对总司令部来说，精确地知道斯大林格勒所发生的一切、怎样才能提供最好的后勤支援、守城部队在最低限度的增援下还能坚守多久，这都是事关全局的。而朱可夫正是在此基础上，坚定而又绝对保密地准备着他的大反攻计划。

些实实在在的援助，即增援部队、空中支援、步兵、炮兵部队。在我们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的来访对我们简直毫无益处。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又总是选在局里最糟的时刻来。他们出现在我们指挥部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司令部里挤得简直无法转身。

我经常感到在危难之际斯大林总是特别留心我举动，所以他才派马林科夫来监视我。我发现华西列夫斯基和马林科夫常在一起咬耳朵。马林科夫固然有责任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什么仗打得这么糟，实际上他是不想对这儿发生的事负责任。马林科夫与华西列夫斯基耳语，就意味着他准备告发某人了。我知道我是他们准备告发的最明显的对象。马林科夫对打仗一窍不通，但他搞起阴谋诡计来却十分精通。

终于，华西列夫斯基和马林科夫告诉我，他们接到了返回莫斯科的命令。他们离开后，指挥所就剩下叶廖缅科和我及少许作战参谋。就如一场风暴经过森林后常出现的那样，我们这儿顿时也出现了一种阴森可怕的寂静。

就在这次战役期间，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突然来到斯大林格勒，他问在前线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一些战斗场面。我指点他到什么地方去看，但告诫说那是最危险的地段。“那当然啦！”他就动身去了。①

①西蒙诺夫是个有威信的作家，对人民有强烈的感染力。他写的《等着我，我会回来的》这首诗，曾到处流传，它歌颂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他的长篇小说《受难者与英雄》用诗一般的语言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大撤退时出现的仓皇失措、慌慌张张、有可耻的叛变、也有英雄的抵抗。

随着战争的进展，我们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几个军绕到南边去对付曼施泰因的部队。①罗科索夫斯基和契斯佳科夫的几个军开始对德国人进行包抄。②这时我结识了契斯佳科夫的参谋长品科夫斯基将军，我非常喜欢他。他是个工作勤奋、精明能干的人，后来他对近卫第六军的战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品科夫斯基将军仍健在，我祝他长命百岁，幸福愉快。③

当我们开始在科捷尔尼科沃方面追击敌人时，一个司令部要指挥同时并存的几种完全不同的战役，显然是越来越困难了。方面军指挥部一方面要指挥我们几个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着保卢斯的部队，同时又要指挥着对罗斯托夫的进攻。因此，总参谋部提议我们方面军一分为二，把包围保卢斯的部队组成顿河方面军，而把攻击曼施泰因的部队组成南部方面军。我不明白这是斯大林

①这里说的就是那次完全歼灭保卢斯指挥的德军第6军的那次巨大而雄伟的战役。到1942年10月底，崔可夫和他的第62军仍咬紧牙关坚守在伏尔加河右岸和城里几处只有残墙破瓦孤立的空据点中。但朱可夫的部队正秘密地进入阵地，开始实行大包抄。11月9日，沃罗诺夫在北边进行了这次战役中最密集的炮轰，同时有3个军开到南边，4天后，对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形成，但还未坚固到能阻止敌人真正想冲出去或冲进来的程度。直到12月初，曼施泰因才竭尽全力想打破包围圈解救保卢斯，可为时晚矣。

②K·K·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I·M·契斯佳科夫将军。罗科索夫斯基是这次合围的大英雄。1937年军队大清洗时他是勉强逃脱厄运。战争后期，当华沙波兰人起义反对德国人时，他作为红军司令员却（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把他在维斯瓦河的部队往后撤，因此而臭名远扬。1956年，当波兰人起来反抗俄国人，他是波兰国防部长。契斯佳科夫指挥的第21军从克列茨卡亚桥头阵地向前挺进。该军后来改名为第6近卫军，在库尔斯克一带作战。

③品科夫斯基将军是奥列格·品科夫斯基的叔祖。奥列格·品科夫斯基上校在国家安全部任职，后来从苏联叛逃，成了西方一名特务。

的主意还是总参谋部其他人的意见。^①

随着困难越来越多，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一分为二还是有道理的。但对叶廖缅科和我说，在不得不与那些已经留名青史、现要归属新成立的顿河方面军管辖的部队分离，无论如何是有些难过的。这些部队中，有顶住了敌人的主攻、承担过保卢斯全力打击的第62军，有由舒米洛夫同志指挥的第64军，还有第57军和其他部队。我们已和所有这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我知道，把他们留下是为了包围斯大林格勒之敌这一目标，而我们将向南推进。当斯大林给我打电话时，我告诉他我对把方面军一分为二的决定，没有意见。

然后，斯大林又打电话给叶廖缅科。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但后来我发现叶廖缅科确实掉泪了。

“安德烈·伊凡诺维奇”，我说，“到底出了什么错？你认为我们必须把方面军分开吗？我们的部队已转向南方，现在的任务是打击高加索北边敌人的侧翼。斯大林格勒这儿将听其自然发展了，剩下的事就是包围敌人，封锁他们，然后让我们的同志静等他们粮绝弹尽。”

“赫鲁晓夫同志，你不明白，你是个文职人员，你不知道我们经过了多少困难。你忘了在战争初期我们是怎样想的，我们想

^①方面军的命名是杂乱无章的。方面军一词是指由若干个军组成的部队的称号，不是指一个固定的地方。9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为顿河方面军，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同时，东南方面军成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仍由叶廖缅科指挥，而在顿河的下游又组成一个新的方面军，称为西南方面军，归瓦杜丁指挥。这年12月底，为了协调发起最后反攻，最高统帅部决定把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统一由一个司令指挥，优先人选是罗科索夫斯基而不是叶廖缅科，叶廖缅科不得不交出他指挥的3个军，包括长期在斯大林格勒废墟上固守的第62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剩下的各军，现在又改为南方方面军，转向南方攻击罗斯托夫地区的德军。

我们倒霉了。斯大林曾如何询问我们是否可以再固守3天。我们都认为德国人会拿下斯大林格勒，我们将因失败而作替罪羊。但现在你瞧！我们开始反攻了，或许你没有料到会出现什么情况，但我料到了：新成立的顿河方面军将取得斯大林格勒胜利的全部荣誉，而我们新成立的南方方面军会就此被人遗忘。”他仍然痛哭流涕。

我竭力使他平静点，说，“当然，一个士兵或一个指挥员的个人满足是重要的，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人民的光荣，我们人民和事业的胜利。”我说不出其它安慰他的话，真为他遗憾。我明白他是如此战斗过来的。为确保我们的胜利，他是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叶廖缅科作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对我们事业作出的贡献，我在俄语里找不出恰当的词来充分表达对他的赞扬。

秋天我们包围了保卢斯的部队，在冬天就把它吃掉了。春初我们开进斯大林格勒时，眼前是一片凄惨景象。当然，战争期间，恐怖的事是难免的。我们军队正在收集德军的尸体。担心，春天已经到了，接着又是炎热的夏季，如果任其他他们暴尸野外，可能会出事。我们知道除非立即行动，否则他们就要腐烂，引起瘟疫。但这并非易事。大地仍然封冻，很难把他们挖出来。我们收集了数千具尸体，把他们一层枕木、一层尸体垛起来，垛成一个大火化堆，再点上火。我曾到那儿看了一次，但再也不想去看第二次。记得拿破仑还是谁曾说过，焚烧敌人尸体的气味很好闻。然而对我来说，却不赞成这一观点。那是一种使人恶心的气味，也是一个使人讨厌的场面。

在斯大林格勒周围，我们发现不少德军尸体被剥得半裸，常常不见裤子和鞋子。这不是野狼所为。我很遗憾地说，这是抢劫者干的。我想士兵和平民都可能参与了这种抢劫活动。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我们继续向前推进。我看见许多大堆大堆

被枪杀的德国士兵的尸体。我就此事曾问过沃尔斯基将军，^①
“这些人是被处决的吗？”

“不，他们都是在战场上被打死的！”

是的，当胜利的部队向前推进时，敌方总要蒙受巨大的损失。但我不排除我们战士违反我们不对俘虏使用武力的严格命令的可能性。除了道德方面的因素外，我们还不愿意给敌人宣传把柄，说前进中的苏联士兵枪杀俘虏。然而，我们某些人出于对德军的满腔仇恨，枪杀了落到他们手中的所有法西斯士兵，以报复德军在侵犯苏联时所犯的残暴罪行。这样做也是不难理解的。

第四节 马利诺夫斯基元帅

本节透露了一些有关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生涯的新情况。按他在军队里的地位顺次排列，最后成了赫鲁晓夫手下的国防部长。本节还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使人可以了解到一些斯大林宫廷里那种互相搞阴谋和猜疑的恶劣环境的情况，任何接触过这种有害环境的人，如果不被摧毁，也要受到窒息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拉林事件不是发生在战争初期那种混乱的不可逆料的头几个月，而是出现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取得巨大胜利之后。

战争头几年，我认识了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彼此都很合得来。在德军包围罗斯托夫后，他一度被打入冷宫，但他仍被看作是我们最能干的指挥官之一。他曾告诉我一些

^①T·V·沃尔斯基当时指挥第四机械化集团军。

有关他早年的传奇故事。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母亲没有结过婚，总之他从未知其父是谁，他由他姑母抚养成人。童年是在敖德萨度过。他对他母亲除了怨恨外，没有其他感情，可他常用亲切的语调谈起他姑母。他在敖德萨是个供差遣的僮仆。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逃难时被一个陆军团抓住，带到了前线。这就是他入伍的情况。战争结束时他在一支俄国分遣队里当机枪手，该分队是俄国派往法国远征队的一部分。

许多年后，当他出任苏联国防部长时，陪我访问巴黎去与3大强国首脑举行会谈，这次会议后来未开成，因刚好在会议开幕前，美国人派遣了他们一架U—2型间谍飞机侵犯我们领空，被我们打下来了——这是我们反对发动冷战的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史中一个里程碑。当时我们在巴黎，马利诺夫斯基建议：“让我们去访问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部队驻扎过的小村。我们曾在他房里住过的那个老农可能不在人世了，但他妻子是个年青的妇女，或许她还活着。”我们乘车顺着一条美丽的法国大道开去。马利诺夫斯基毫无困难地把我们引到那个小村。我们找到了他曾经住过的房子。那个妇人和他儿子——他现在自己也有儿子了，有礼貌地迎接我们。“我老伴死了很久了”，她告诉我说。

朋友们开始围过来，打开香槟酒，马利诺夫斯基开始缅怀往事，询问他曾熟识的人和地方。

“这儿附近不是有个农民们时常用来聚会的小沙龙吗？”

“你仍然记得？”

“是呀，我记得很清楚。”

“那么，你可能也记得那位叫某某的姑娘。”

“对，我当然记得。”

他们都开怀大笑起来，“他没忘！她是我们的美人儿！可她也去世很久了。”

还有其他一些法国人也来了，消息很快传开了，说来访的是

差不多50年前曾在该村驻扎过的一名俄国小兵。他现在升到苏联国防部长了。

“我们当然也记得起你！”他们都说。“你们部队里曾有一只俄国熊，是吗？”马利诺夫斯基笑着向我解释，他和他的同伴们在前往法国的路上拣到一只小熊，就一路带着它。十月革命爆发时，马利诺夫斯基还在法国，之后他才取道回国。我记得他曾把这段经历告诉过我。马利诺夫斯基说，革命爆发时，他仍在国外俄国的远征军里服役，对他来说这曾是个很沉重的精神负担。后来他克服重重险阻，从海参威回到俄国，再经过当时由高尔察克控制的西伯利亚，在路上他终于遇到了红军。我之所以讲述马利诺夫斯基这段经历，因为这对了解斯大林时期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多年来对马利诺夫斯基的怀疑就如悬挂在达摩克利斯头上的那把利剑，先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参加了沙皇派到法国的远征军，其次是因为他参加红军前在白军控制区里经过。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我们一起在南方方面军共事时，他再次受到斯大林本人的怀疑。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天，马利诺夫斯基突然闯进我在上察里津斯克的房里，他心烦意乱、泪流满面。

“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究竟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一件可怕的事，拉林自杀了！”

拉林是第二近卫军的军事委员，是个真正的战士，也是个优秀的将军。他和马利诺夫斯基是亲密朋友。当马利诺夫斯基第一次担任军团司令时，拉林是他的政委。从那以后，他曾多次提出让拉林做他政委的要求。

后来，拉林的副官告诉我他死的情况，这是件难以置信的事。很明显，他是想在前沿视察阵地时让自己被敌人打死。当德军开枪时，他没有隐藏在那堆干草后，而是照样在那儿昂首阔步，有意暴露自己，故意去送死。他受了伤但并不严重。子弹击

中了他的小腿，但骨头未伤着。当我到他房里看他时，他正坐在那里高兴地与一位亚美尼亚女大夫谈天。直到自杀前，他似乎精神很好。

我们知道拉林是如何自杀的，但不知道他为何要自杀。战争刚开始时，这还可以理解，当我们后撤时许多将军自杀了。但现在局势变了，我们转入进攻。我们包围了保卢斯，第二近卫军——拉林任该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对曼施泰因的战斗中打得十分出色。因此，他根本没有理由自杀，至少从我们对德作战方面来说是如此。

拉林死时留下个字条，这个字条也很奇怪。只是简单地说他活不下去了，他签的名字上面是句口号，“列宁万岁！”我们立即把拉林的遗书送到莫斯科，谢尔巴科夫接到了它。对死者不应该再说不慈善的话，因此对谢尔巴科夫，除了说一声他多年来是党的高级干部、战争期间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此事外，我不想对他再说些什么。但是，当拉林的遗书落到谢尔巴科夫手里后，他的本来面目就暴露无遗。他用它煽动起斯大林对马利诺夫斯基的怀疑，进而也牵连到我，因为我是发生这种事的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

在我们把拉林的遗书送出去不久，我被召回莫斯科。象通常一样，斯大林在家里举行了一次备有各种花色配菜，似乎没完没了的晚宴。席间，斯大林转向我问道，“马利诺夫斯基是个怎么样的人。”

“在过去我曾不止一次向你们报告过有关马利诺夫斯基的情况”，我回答。“他是个相当有名的将军，战争初期他指挥一个军，后来指挥一个集团军。现在他指挥南方方面军，他在那儿吃了几个败仗，正如你知道的那样。”在罗斯托夫陷落后，马利诺夫斯基曾被撤消指挥职务，派到后方工作，他在后方组建了第二近卫军。

然后谢尔巴科夫开始煽动斯大林的疑心，这样可以达到使斯大林反对马利诺夫斯基的目的——从而也间接反对我。“你知道，整个事件非常令人费解，”谢尔巴科夫说。“拉林写‘列宁万岁’，而没有写‘斯大林万岁’，或许这不是偶然的。你对他提的是列宁而不是斯大林看法如何？”

“我不知道，”我回答。“拉林自杀时明显是受了某种心理骚乱的影响。”

谢尔巴科夫是明显地试图让我谴责拉林和马利诺夫斯基，但我无意让他当枪使。

后来斯大林再次问我：“谁是这个马利诺夫斯基？”

“斯大林同志，自从战争一开始，我就认识马利诺夫斯基，我能给他最高的推荐，不管是作为一个将军也好，还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也好。”

我看得出马利诺夫斯基遇到麻烦了。他早期的生涯，在罗斯托夫的失败及现在拉林的自杀——所有这些事在斯大林脑子里纠缠在一起了。反对马利诺夫斯基的材料正在汇集，尽管我鼎力为他辩护。

“你返回前线后，”斯大林说“你要严密监视他。我也要你密切注意第二军司令部。对他所有的命令和决定都要检查。盯着他每一个行动。”

“好的，斯大林同志，我不会让马利诺夫斯基逃出我的视线。”

我回到前线后，不得不时时刻刻监视着马利诺夫斯基。甚至在他睡觉时也不得不看看他是否合眼真正睡了。我真不喜欢干这差事。

直到斯大林死后，有次马利诺夫斯基和我一道外出打猎，我才把斯大林对拉林自杀作出何种反应，我如何不得不把他的情况向总司令部报告的事告诉他。马利诺夫斯基对我说：他早就明白

为什么我始终跟着他，总是住在他隔壁。他说他理解我所处的尴尬局面，没有因此而反对我。他知道只要他诚实，尽力工作，我不会去打扰他的，我给斯大林汇报时会给他美言几句的。

我不知道已落入斯大林疯狂地动辄就清洗网里的马利诺夫斯基是如何幸存下来的。或许这是战时实际需要使斯大林控制了他的气愤和怀疑；或许是我为他做的某些调解使他幸免于难。毕竟，我对斯大林的有些影响不是无足轻重的。

第五节 乌布利希来苏联

本节我们可以首次看到一些有关瓦尔特·乌布利希的情况，乌布利希现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共产党东德的首脑。战争时期他与其他一些德国共产党员在苏联流亡，这等于为他未来要起的作用进行培训。在莫斯科，他是流亡的德国共产党的政治部主任。曾因对他自己一些有才能的同事提出过谴责，进一步提高了他自己的地位。1942年俄国人在莫斯科建立了自由德国委员会，任务是在德国战俘中挑选出一部分人搞政治训练，以便让他们到前线向德国士兵们进行宣传。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一些著名的德军军官被选到这个委员会。海因里希·冯·艾因西德尔所著的《斯大林的阴影》一书对这类活动曾作过很好的叙述。

一次，瓦尔特·乌布利希与其他几位德国共产党员来到上察里津斯克，用电子扬声器向敌人搞广播宣传。^①他们敦促德国士

^①此事想必是发生在1942年12月中旬，当俄国人正阻击着曼施泰因因为解救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保卢斯的第六军所进行的猛烈进攻。

兵放下武器。此项工作通常是在夜间进行。当乌布利希从前沿返回后，我经常与他共进晚餐。我曾多次对他开玩笑：“好啊，乌布利希同志，似乎今天你还没有赚回你的晚饭钱。没有德国人来投降。”

然而有一天，我得到报告说，有个德国兵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把他带来，”我说。“我们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听听他对他的同伴的士气说些什么。”

他们把这个人带到我跟前。“你是谁？”我问道。“哪国人？”

“我是个波兰人。”

“你怎么参加德国军队的？”

“我来自波兰德占区。是被征召入伍的。”

我对这个人感到有些不舒服。“我们准备组建一个波兰军去解放你们国家，”我告诉他。“你认为怎样？”

“我很高兴。我当然希望波兰能解放。”

“那么，你报名参加波兰军吗？”

“不。”

“那波兰如何才能解放呢？”

“俄国人将会解放波兰的。”

我不喜欢他这样油腔滑调。就转向乌布利希同志说：“这就是你进行宣传的结果。他根本不是个德国人，而是从德国人那儿逃出来的波兰人。他甚至不愿为解放他自己祖国出力。”

后来，也有几个纯种德国人叛逃过来，作了我们的俘虏。当时正值圣诞节，我命令在司令部里款待他们——也就是在马利诺夫斯基的司令部里。但我曾先命令带他们去洗澡，清除身上的虱子，给他们好好洗一下，换上新衣服。然后再把他们带到我们的住所，给他们每人100克伏特加，和一些其他吃的。乌布利希也在场。在这次讲话中，一个德国俘虏告诉我们他是反对纳粹，反

对希特勒，也反对战争的。他显然是这几个中最好的。乌布利希问他，“你是否愿意我们把你送回到你们那边防线为我们工作？”

“我愿意，”那位德国人说。“让我们一个一个地走，我们就对我们长官说，是从你们这儿逃出来的。”

他的话在俘虏中引起了一场争论。另一个德国人说，“如果我们返回我们自己防线，我们会被枪毙。没人会相信我们是逃跑出来的。也没人相信你编造的任何情节。”

“我们的”那个德国人激动地反驳说，“你们这些胆小鬼！我去！让他们杀我吧！为了这个事业我不怕死！”

乌布利希同志和我完全同意，认为可以把这些德国叛逃者送回他们自己的阵地，然而托尔布欣知道了我们的计划。^①他来见我说，“赫鲁晓夫同志，请别执行你这个计划。这些德国俘虏知道我们司令部位置，如果让他们回去，泄露给德国人，我们可能遭到袭击。”

“没有危险，”我说。“他们来司令部和离开时都蒙上了眼睛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具体位置的。”

“不管怎样说，我不能冒险，至少在我有机会把司令部移到新址前不要放他们回去。”

我看坚持下去也没用，我明白如果托尔布欣越过我直接向上

^①这儿提及的各种指挥部有些混乱。上察里津斯克当时是N·I·特鲁法诺夫少将指挥的第51军的司令部。该军与F·I·托尔布欣将军指挥的第57军部署在一起。尽管有人反对，马利诺夫斯基当时指挥的第二近卫军还是于12月15日从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转移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被迅速调去阻止曼施泰因的反攻（这次反攻于12月21日被粉碎）。12月12日，曼施泰因的反攻正在势头上时，赫鲁晓夫肯定是同苏联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呆在第51军司令部。

报告，斯大林不会支持我。我没有把托尔布欣的反对意见告诉乌布利希。我只说，“乌布利希同志，看来我们最好把此计划搁在一边，因为有些危险，如果我们放他们回去，这些德国人可能暴露我们司令部的位置。”

“行呀，”他耸了耸肩说，“我想此事就这样吧！”他就继续向德国阵地做他的广播宣传工作去了。

第六节 库尔斯克坦克大战

库尔斯克凸角战役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大会战。斯大林格勒战役虽是形势的转折点，但是，在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的外边，朱可夫才把德军的“心脏”掏出来撕碎，决定了它最后覆灭的命运。调集的60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在开阔的大草原上角逐厮杀，军队的调动部署是如此绝对自由，就如在进行一场大海战。这样的战斗在陆地上还是史无前例的。这次战役不象斯大林格勒战役那样引起西方国家的普遍注意。但它却是一次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器的威力、事先经过精心策划的在大规模范围内进行的战斗。在这次会战中，不仅让对整个战役运筹帷幄的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而且让中央方面军的指挥罗科索夫斯基和刚得到加强的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指挥瓦杜丁，都有机会让他们最充分地显示出自己的战争技能、雄才大略和对敌人的冷酷无情。他们跟最有经验的德国坦克兵团作战，阻止了他们前进并全部摧毁之。在这极不寻常的时刻，赫鲁晓夫担任着N·F·瓦杜丁中将的政治顾问，瓦杜丁当时已成为双方最有才干的将军之一，他聪明过人，同时又精力充沛。可他在1944年2月被叛乱的乌

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所杀。关于库尔斯克战役甚至整个苏德战争，艾伦·克拉克著的《巴尔巴罗萨》一书作了清楚的描述，可供参考。

诬蔑我们的人总说，我们之所以能在斯大林格勒打败保卢斯的精锐部队，唯一的理由是俄国的冬天帮了我们的忙。他们对1941年我们在莫斯科郊外粉碎德军的进攻也是这么议论。自从俄国人打败拿破仑的入侵以来，人们就说冬天是我们的主要助手。然而，德国人可不能再这一闲话为借口来解释他们1943年在库尔斯克凸出阵地的战役所遭到的失败。这次是他们开的第一枪；他们选择的时间、地点和作战方式。所有的牌都在希特勒和他的帮凶手里。战役开始时正值盛夏。你可以用几个美丽的词句来形容：千里草原、生机盎然、百花盛开、香珠欲滴。

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方面军准备在7月20日独自发动反攻。我们确信反攻定能成功，有把握粉碎敌人，把他们往西赶到第聂伯河。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是——打破敌人防线，解放哈尔科夫。

突然，大约在预定行动前的15或16天，我们收到第六军打来的电话，司令员告诉我们说，有个德国兵从一个党卫师守卫的防线上逃过来，带来了某些重要情报：“他说德军明日凌晨3点将发起攻击。”我们命令立即将俘虏带过来，瓦杜丁和我审问了他。

“你凭什么知道他们将要发动攻击？”我问。

“我确实没有看见进攻的命令，”他回答，“但从部队的情况可以判断，可能要出什么事了。此外，还有比这直观感觉更具体的，第一，我们发了3天的干粮；第二，坦克都开到前沿道路上了；第三，已下命令把炮弹运到重炮和野炮旁边，以便一旦开火时不再浪费运送炮弹时间。”

“但你怎么确信将是明天早上3点开始攻击呢？”我问。

“啊，你自己可以判断得出来，现在这个时候3点钟天刚破晓，那正是德国指挥员喜欢发动进攻的时候。”

这位逃兵是个年青的小伙子，长得很帅，温文尔雅——明显不是劳动人民出身。他来自党卫军中3个最著名装甲师之一。这3个师即：“阿道夫·希特勒”、“德意志帝国”和“死神之首”。所有这3个师都部署在我们正面，我曾对瓦杜丁说，不论我到前沿什么地方查看，都发现对面部署的是“死神之首”的部队。

我问这个德国人是不是纳粹党员。

“不，我反对纳粹，所以我跑到你们这边来。”

“但你是属于党卫军的部队，这个部队的人都是纳粹党徒。”

“情况已经变了。战争头一两年是这样，但现在他们也吸收他们能征集到的任何人。他们要我是因为我身材高大和外表漂亮。不管怎样，我甚至与纳粹的德国人也不一样。我父母是阿尔萨斯人，他们把我当法国人养大的，我父母反对希特勒，因此，他们也是这样教育我的。我不愿意为希特勒送死。所以我才逃跑。打败和消灭希特勒是德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审问完俘虏，我们的情报员把他带走了。我们立即给莫斯科打电话，报告最高司令部，德国人即将发起进攻。

过了不久，斯大林给我来电话。我不知道他是否已和瓦杜丁通了话。每次我说斯大林给我打电话时，我不是说他同时没有给司令员打过电话。我不想让人说，“那就是赫鲁晓夫，又在树自己了，老是说‘我一我一我’”不，我尊敬的朋友，我不想树自己。我仅想告诉你，当时据我看发生了什么事。我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斯大林了解我也信任我。使他有时因自己的过错把我当成替罪羊，有时把他受到的挫折和苦闷撒到我头上，他对我仍然非常信任。他常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在斯大

林格勒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都是这样，我在库尔斯克凸出地这儿也是这样。

斯大林耐心地听我阐述局势，没有象过去经常出现的那种粗暴或不耐烦。这使我很高兴。我弄不明白这次他为何如此冷静，如此控制得住自己。要是在别的情况下他早发火了。斯大林的脾气就如魔鬼在他的中枢神经上系了条绳子，没人知道什么时候魔鬼猛拉一下绳子，会使他勃然大怒。斯大林的火暴脾气和他的自我控制能力都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总之，他有一个压倒一切的个性。

我简单地向斯大林报告完局势后，他问我，“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办？”

“司令员和我已交换了意见，我们非常乐观，我们巴不得德国人明天发起进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防御阵地固若金汤，如果敌人想突破它，就得付出血的代价。虽然我们也等待增援，但我们能守得住阵地。防守比进攻需要的兵员总要少点。我们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已学会这点了。”

敌人也信心十足。后来我看到一份从被歼灭的德军装甲部队那儿缴获的命令，其中有份告全体德军官兵书，里面有这样的话：“你们现在用以进攻的坦克，远比俄国人的T-34型坦克优越。直到现在，T-34型坦克虽是最棒的坦克，甚至比我们的还好。但你们现在有了新的虎式坦克，它们是无匹敌的。你们德国陆军武士们用这样的武器武装起来，在打击敌人时一定大获全胜。”

他们的新坦克的确是很有威力的，但我们的战士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对付它。我们在库尔斯克赢得的这一仗，使战争力量的天平倾斜到我们这一边。依我看，库尔斯克凸出阵地战役是伟大的

卫国战争的转折点，它对彻底打败希特勒德国，对我们苏维埃红军，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我们共产党的最后胜利，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七节 胜 利

赫鲁晓夫于1943年11月21日进入基辅，他当时已是陆军中将，经过两年多的戎马生活，自然感到已与军人打成了一片。他随军直抵新的波兰边界，但他的军旅生涯也就从此告终，不得不返回基辅，担负着重建乌克兰党政机构的任务。

德军在库尔斯克遭到惨败后，在我军的打击下开始蹒跚西溃。我作为前线的军事委员会成员，参加了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进行的大会战，心情十分高兴，也就难免流露出包括骄傲在内的弱点。

库尔斯克会战后，我先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工作，继而转到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我们拚命地逼向基辅。当我们抵达第聂伯河西岸时，这真是个凯旋的时刻。我们正在为解放乌克兰首府，即俄罗斯城市之母而战。人人都心情激动，喜泪盈眶。自从1941年来，我们一路后撤，直撤到斯大林格勒。而现在，明天或许后天，我们就能重返基辅了。

当我们仍在城郊时，朱可夫从总司令部来到这儿。①他和我

①库尔斯克战役后，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瓦杜丁担任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司令。赫鲁晓夫就与他呆在一起。1944年瓦杜丁重伤后，朱可夫曾一度接替他，这是自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后，朱可夫首次担任方面军指挥任务。

同睡在一个地窖里。头天我们还整天只呆在里面说笑话、讨论局势，第二或第三天，我们甚至就讨厌使用这个地下掩蔽部。德国人已被赶进森林，我们的部队在城外与德军进行小规模战斗。我们在城西桥头堡作战，以便阻止敌人沿日托米尔——基辅公路窜逃。

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副司令是格列奇科。^①我们曾派他到麦日戈拉组建一个野战司令部，帮助组织那儿的军队。我记得格列奇科到达我们在郊外的司令部时，太阳快下山了。这是个暖和的傍晚，虽然秋天早就来了。我们肩披外套（一种高加索披肩），在户外散步。格列奇科驱车前来向我报告情况。我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也非常尊重他，因此我常拿他那魁梧的身材开玩笑：“将军同志，请后退点，好让我看看你。”他哈哈大笑。我确实不记得他报告了些什么，但要点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敌人被粉碎了。

过后不久，突然传来一声爆炸，城里冒出一股浓烟。我对基辅了如指掌，就说，德国人正在城西的“布尔什维克”工厂搞爆炸。如果他们炸毁建筑物，那必定是他们会要逃跑了。攻击开始前，我曾要求派出几支特遣小分队，在我军突入基辅时，就直奔中央委员会大厦、基辅军区司令部、部长会议大楼、科学院和其他重要场所。他们的任务就是不让德军有时间纵火和放置爆炸物，驱赶德军工兵队，拆掉装了导火线的爆炸物。

当爆炸开始时，我吩咐炮兵司令，“瓦连佐夫同志，下命令对准基辅零零星打几发炮弹。”他惊奇地盯着我，他知道我是个忠于基辅，深爱基辅的人。我怎么突然命令他向基辅开火呢？”

^①A·A·格列奇科上将，现在是元帅兼国防部长，他于1960年出任华沙条约国家部队总司令。战后，他立即被任命为基辅军区司令，因而与赫鲁晓夫密切共事多年。正是这个格列奇科，在1968年策划、准备和领导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

瓦连佐夫同志，如果你向城里开火，”我解释道，“这将使德军陷入混乱，更急着逃命。他们对城市的破坏也就少些。而对于零星炮弹造成的损失，我们修复起来总容易些。”

我们部队在（1943年）11月6日进入基辅，那正值伟大的十月革命周年纪念前夕，所以这天特别值得庆贺。好像我们特意把解放基辅安排在这一天，作为庆祝节日的礼物，但实际上仅是一次愉快的巧合。

11月6日一早，我就派我的司机茹拉夫列夫同志到基辅城里查看道路如何。他报告说道路畅通无阻。一些乌克兰领导人和我驱车入城，当我一路奔向基辅时，我完全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这条路我是老相识了，战前，我们从别墅进城时总是取道这条路。我们越过城郊，经过克列夏季克大街（基辅的主要街道），直奔部长会议大楼查看建筑物是否完好，大楼外表没有损坏，中央委员会大厦也仍挺立在那里。科学院和其他剧院也安然无恙，但“布尔什维克”和“克列夏季克”两座工厂遭到了破坏。

城里有点凄凉可怕。战前曾那么热闹、活跃、朝气蓬勃的城府，而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几乎见不到人。当我们沿着克列夏季克林荫道走去，转到列宁街，只有我们单调的脚步声在空旷的马路上回荡。不久，市民开始从隐藏地爬出来，他们的出现有点象从地里突然冒出来一般。

我们沿着列宁大街方向朝前走，一边交谈一边比较，突然听到一阵歇斯底里的尖叫声，一个年青人向我们跑来。他不停地喊道：“我是唯一幸存的犹太人！我是基辅城里活着的最后一个犹太人！”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可以看得出他处于一种非常兴奋的状态，我担心他可能发疯了。就问他是怎样死里逃生的。“我有个乌克兰妻子，”他说，“她把我藏在屋顶搁楼里。她供给食物并照料我。如果我在城里露面，我早就和其他犹太人一样被杀

了。”①

后来，我遇见一个携带着午餐袋的灰胡子老人，那种午餐袋就象我过去携带着去尤素夫卡工厂工作时携带的一样。老人伏在我肩上，吻我双颊。我非常感动。一摄影记者抢拍了这一镜头，许多报刊杂志后来都刊登过这张照片。

我平生首次看见美国人是在基辅附近，时间是1944年的春末夏初。这是个晴朗、温暖的日子。突然，我们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声。大家凝视远处天空，看见一大群飞机正向我们飞来。以前我从未见过这种飞机。我猜这必定是美国飞机，因为它一点儿也不象我们自己的飞机。我当然希望它们是美国飞机。要不然它们就是德国人的了。我后来才知道这种飞机叫B-17“飞行堡垒”，根据我们与罗斯福总统的有关协定，它们的基地就设在波尔塔瓦郊外。这些飞机在德国完成轰炸任务后，在我们的基地上补充弹药和燃料。我们经常看见它们在夜间飞越我们头顶，飞向德国目标，然后在拂晓前返航。也不知怎么搞的，有次德国人竟然尾随返回到波尔塔瓦的美国轰炸机，偷袭了这一基地。我得到报告说，许多飞机被摧毁，很多人牺牲，多数是我们的同胞，他们是我们给机场提供的地面维修人员。②

①这儿说到的是指发生在基辅城外一个叫巴比·亚尔的山谷里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两天中共有33771名犹太人遇难——这些犹太人被排列在大坑前，用机枪扫射。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时期也跟斯大林时期一样——拒绝承认在纳粹占领时期苏联的犹太人遭到的苦难远比苏联其他公民要多。巴比·亚尔山谷现在成了娱乐场。直到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写了他著名的题为“巴比·亚尔”的诗，并因此引出麻烦以前，多数俄国人甚至都不知在此有屠杀一事。

②除了战争初期英国皇家空军在摩尔曼斯克外空军基地驻有一个战斗机中队外，让美国在波尔塔瓦建立轰炸机基地是斯大林对他的西方盟国为寻求从苏联领土上进行军事飞行的努力作出的唯一让步。赫鲁晓夫在这儿提到的德国搞的报复性轰炸发生在1944年6月21日至22日晚上。这次轰炸使50架美国飞机被毁，30个俄国人及两名美国士兵死亡。尽管人们对德国进行“穿梭轰炸”一事寄予热情希望和精心规划，甚至送给一个形象的代号，称为“狂乱”，但从未认真执行过，先后仅进行过18次飞行任务。“穿梭轰炸”经常受阻，完全是苏联的政治怀疑及官僚主义造成的低效率所致。

当我们继续把德国人往西赶时，又碰上了一个宿敌——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我们从在乌克兰坚持游击战的司令贝格马同志处得知，班杰拉分子^①正在组建他们自己的游击队分遣队。他们以罗夫诺周围的大森林为基地，他们的领导人叫塔拉斯·布尔巴，这是取名于果戈理小说中的一个英雄名字。我们指示贝格马搞清班杰拉游击队行动计划的细节。然后我告诉他，我们给布尔巴一个与我们联合对德的机会。布尔巴拒绝这样干。我们立即认识到，班杰拉分子是想养精蓄锐，增加实力，以便在我们把德国人驱逐出乌克兰后，他们在我们后方开展游击战反对我们。

1944年冬，我亲自前往罗夫诺，与贝格马及收复该城并继续在解放这一地区的司令共商对策。我想这位司令是莫斯卡连科。^②白雪覆盖着大地，严寒刺骨。我决定等在师司令部举行的会议一结束即刻动身回基辅。但司令员劝我在那儿过夜，我坚持马上返回。我的车沿着原来的苏波边界一路北进，在一个后勤供应站歇下，我发现有相当多的一群人在这附近游荡。我纳闷他们中间定有许多是伪装的班杰拉分子。他们吃我们的粮，在我们炉火前取暖，而搞我们的情报。我曾得到过警告，说这一地区云集了不少班杰拉分子，我决定不在这个补给基地过夜，宁愿赶紧驱车沿着原苏波边界到了一个小村庄歇脚。

在我们军队推进到波兰以后，我真希望能有更多机会访问前线司令部，我特别想去看看我们军队把德国人追进东欧的现场情景。但我在基辅的工作很忙，要负责重建乌克兰的经济和恢复该地党组织的工作。

当把敌人驱出国土后，全军上下，喜气洋洋。在战争最后一

^①他们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叛乱分子斯捷潘·班杰拉的追随者。

^②K·S·莫斯卡连科元帅当时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一个集团军司令。他与赫鲁晓夫关系密切。1960年他出任苏联导弹部队总司令，后来，又担任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

年，近卫军部队表现特别出色。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到柏林去！从斯大林格勒直捣柏林！”互相开玩笑或祝酒时最爱说的时髦话是：祝某某在我们最终占领德国首都后成为柏林卫戍司令。每个人都想得到这一职位。任何亲眼目睹过或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给我们国家带来的灾难的人，都尽了全力要德国为他们所犯的罪行付出代价。

我记得有一天在基辅接到朱可夫打来的电话。他显得特别高兴，“我很快就要把希特勒这个讨厌的畜牲锁到笼子里面去了，”他说。“当我把他运往莫斯科时，我要让他顺便经过一下基辅，这样你可以看看他。”我祝朱可夫万事如意。我知道，有他在前线指挥，我们的进攻就稳操左券。不久，德国投降后，朱可夫再次给我打来电话说，“我毕竟是不能实践我的诺言了。希特勒这条毒蛇死了。他自杀了。他们把他的尸体也烧了。我们发现了他的烧焦了的尸骨。”^①

我们抗击希特勒侵略者的人民战争的伟大史诗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很高兴摧毁了敌人，对这一胜利，我们精神上得到极大满足。这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诗句在我们耳边回响：“向我们飞舞宝剑的人必成刀下之鬼。”^②

我本来应该知道给斯大林打电话会有什么结果，但我还是决定给他打个电话，就德国人投降一事向他表示祝贺。当他接电话时，我说，“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就我们军队和人民打败德军取得胜利一事向你表示祝贺。”而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粗暴地搁断电话，说我在浪费他的时间。我被惊得目瞪口呆。我后悔自己多此一举。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应该估计到会出现什么

①当然，斯大林长期坚持说希特勒根本就设死。

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这位传奇性的尚武英雄，并不是第一个表达这一观点的人。

事。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他是个出色的演员。他现在假装出的样子是：既然战争已经过去了，他已在考虑其它更重要的事情了；正在深思熟虑，规划明天的事时，我却去浪费他的时间，还跟他扯昨天的事。他表演得好象对我们的胜利丝毫都没感到吃惊似的。他要我相信，他始终知道战争将如何收场。然而我知道他的底细。我曾在那生死存亡之时观察过他。我知道，在战争期间，他比他周围任何人更担心和害怕。

第八节 斯大林和盟友

在这一节，人家首次发现了苏联的政治家承认“租借方案”及美英对苏军援助所起的巨大作用。可惜的是，赫鲁晓夫在位期间就不再提及这些问题了。苏联人民从未被告知援助总额达多少；同时整个援助事件被各种各样的宣传搞得如此模糊，以致许多西方人也从未弄明白盟国提供援助的确切数字和重要性。赫鲁晓夫仅是透了一点儿信息，但他至少坦率地开了个头。文中其余部分，还是唠叨那个烦人的第二战场的老问题。他们怀疑盟国的动机，根本不理解盟国为强渡英吉利海峡，海军所必须进行的艰巨的准备工作——在俄国看来，英吉利海峡这一障碍实在不值得一提。本节也进一步说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策划的某些重要行动根本就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里。在当时，无论从那方面说，他不仅是乌克兰的首脑，还是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的老资格委员；然而正如事情发展的那样，制定外交政策时从未找他磋商过。关于斯大林的某些打算，斯大林与丘吉尔、罗斯福的谈判，赫鲁晓夫除了偶然在斯大林饭桌旁，大家闲聊时拾点牙慧

以外，从未有人正式告诉过他。值得注意的是，在下节里赫鲁晓夫还要提到，直到他1950年终于调到莫斯科之前，他甚至得不到莫斯科同僚们传阅的文件。这对一个即将成为苏联政策的主要设计者来说，实在这一种不可思议的锻炼方式。这使得赫鲁晓夫执政后及他在制定政策时，还要了解一些基本问题，提高一些基本能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他为何失败了。

预定1945年6月24日在红场举行胜利大游行，我趁这个机会返回莫斯科。我要在祖国的首都与我们的人民一道检阅我们军队，共同庆祝胜利。艾森豪威尔也来到莫斯科。他与我们一起站在列宁墓上检阅游行队伍。这是我首次见到艾森豪威尔。斯大林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我们所有军界领导全都出席，艾森豪威尔当然也去了。我记不清英国司令蒙哥马利是否也在场。斯大林与艾森豪威尔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与罗斯福的关系则更好，但斯大林与丘吉尔的关系不好，与蒙哥马利的关系则更糟。

战后，在我从乌克兰调往莫斯科之前（1949年底），我经常听到斯大林跟他的政治小圈子里的人讲话时提到艾森豪威尔的崇高品德。斯大林赞扬艾森豪威尔在与盟国打交道时处事得体、宽宏大量和有骑士气概。斯大林说，如果不是艾森豪威尔帮忙，我们就不会成功地夺取柏林。美国人是完全有可能抢先一步到达。当时德国一边集中兵力反对我们，而同时则准备向美英投降。斯大林给艾森豪威尔去信请他停兵缓进。斯大林对艾森豪威尔说，根据他与罗斯福达成的协议，鉴于我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我们的军队应该在西方盟国军队前进入柏林。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接受这点，那在我军抵达柏林前他们早把柏林占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德国问题就可能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自己的地位也可能出现很不利的后果。这正是艾森豪

威尔表现出的骑士式的慷慨大义。他没有违背罗斯福的诺言。

然而在这时，杜鲁门是总统。斯大林根本不尊重杜鲁门。他认为杜鲁门是无关紧要的。确实如此。杜鲁门根本不值得尊重。那也是事实。

就在战争结束时，斯大林非常担心美国人跨过西郊边界。他怀疑美国人是否遵守罗斯福以前在德黑兰曾答应过给我们土地的诺言。美国人可能会说，他们军队抵达的那条线，就是划分占领区的新边界。但美国人把军队后撤了，部署在德黑兰会议上确定的边界线上。这也说明艾森豪威尔的正派。

德国人在我军的重压下已丧失抵抗力。我们以为他们将放下武器向我们投降了，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宁愿跑到西边向美国人投降。斯大林再次给艾森豪威尔致信，说苏联军队拚死拚活粉碎了德国人的防线，现在被我们打垮了的德国人却向美国人投降。斯大林抱怨说这是不公平的。这是指奥地利战线，马利诺夫斯基在那儿指挥部队向前进攻，于是艾森豪威尔命令德军司令向打败他们的俄国军队投降。

斯大林也对丘吉尔提出过类似的要求。罗科索夫斯基追击下的德国人逃到蒙哥马利占领的英国人那儿投降。斯大林要求英国人不要接受这些战俘，而应把他们赶过来向我军投降。“但没有出现这种事！”斯大林生气地说：“蒙哥马利全收容了他们，并把他们缴了械。这样，我们打败德国人的胜利果实，竟被蒙哥马利坐享其成。

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都属同一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然而他们在决定这一问题时态度却如此不同，他们对合伙、协议和荣誉等原则的解释也各有差异。在后来，每当我与艾森豪威尔打交道时，我总是记着他在战争年代的所作所为，一直记着斯大林对他的评价。绝不能指责斯大林随心所欲地喜爱某人，特别是对一位阶级敌人。在阶级问题上，他是毫不动摇、势不两立的，

这是他最坚强的品质之一，为此他受到人民极大的尊敬。①

斯大林邀请艾森豪威尔参加我们的胜利大游行，把我们最高级勋章——胜利勋章授予他，以表彰他的功劳。当然，同样的勋章也授予了蒙哥马利元帅，但那仅是我们作为一个盟国履行的礼节上的义务，因为英国人也给我们的军队领导人授过勋。这纯粹是来而不往非礼也。

关于斯大林在处理战时盟国相互间的关系特别是与罗斯福和丘吉尔打交道时的作法，给了我些什么印象呢？正如斯大林自己所说，我认为斯大林与罗斯福相处比与丘吉尔相处更和谐，因为罗斯福似乎相当理解我们的处境。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讨厌君主制度及体制。他有次曾给我说了这么一段轶事。当他们在德黑兰共进午餐时，罗斯福举杯提议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加里宁先生干一杯，这杯酒所有的人都喝了。过了一会儿，丘吉尔举杯提议为英王也干一杯，罗斯福说他不能喝这杯酒。这下丘吉尔可火了，但罗斯福仍固执己见，“不，”他说，“我不喝。我不能为英王祝酒。我绝不忘记我父亲说过的话。”斯大林解释说，当罗斯福父亲离开英格兰或爱尔兰前往美国时，他在船上对年青的罗斯福说，“国王是我们的敌人。”罗斯福从未忘记他父亲对英格兰国王的轻蔑态度，尽管席间礼节要求如此，他还是没有举杯。②

①斯大林对艾森豪威尔在制止盟国向德国挺进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克制态度完全出乎斯大林意料之外，此事完全可信。而蒙哥马利收容了苏军追击下的德国溃兵，斯大林对他当然大光其火。斯大林告诉赫鲁晓夫，他与罗斯福相处比丘吉尔要好，事实完全正确。罗斯福对大英帝国深存疑虑，而相信能与斯大林可以达成个人谅解。

②弄清楚斯大林是否真的谈论过罗斯福拒绝为英王干杯一事，倒是很有趣的。如果赫鲁晓夫真的相信罗斯福总统的父亲是从爱尔兰或英格兰移居美国的，他就完全听错了。看来可能是赫鲁晓夫张冠李戴，他把斯大林谈及的罗斯福与邱吉尔在德黑兰关系不热乎的奇闻与他头脑里模糊记得的关于对肯尼迪总统祖宗移居美国的传奇故事，混为一谈了。

在德黑兰工作会议期间出现分歧时，斯大林发现罗斯福经常与他站在一起对付丘吉尔。因此，斯大林对罗斯福确实怀有明显的个人好感。当然他也非常尊敬丘吉尔。因为丘吉尔不仅是个伟大的英国国务活动家，而且在处理世界政治事务活动时他占据主要的一席。当盟国在阿登遭到失败，危及到他们登陆的滩头阵地安全。丘吉尔请斯大林把德国兵力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这就意味着需要我们发动一场当时并未列入计划的反攻，而这一攻势至少要过相当一段时期才能进行。然而这一攻势竟收到了我们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斯大林在我们盟国正需要的时候，对他们表示了我們良好的愿望。

丘吉尔在战争中的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懂得威胁正逼近英国，那就是他为何尽其所能诱导德国进攻苏联——也就是把苏联拖进抗击德国人的战争中。当希特勒进攻我们时，丘吉尔立即宣布，英国认为与我们签订一个联合两国武装力量共同对付德国的条约是十分必要的。斯大林在这儿也做对了，他接受了丘吉尔的提议，与英国签订了条约。过了一阵子，美国也参战，于是3个大国的联盟实现了。

很难判断西方盟国在战争快结束时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我不排除以下可能：他们希望苏联人民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流更多的血。或许正如他们自己解释的那样：他们对登陆作战仍未做好准备。他们的军火生产还没有很好发展。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等等。两种解释可能是真的，但我们认为他们最主要的动机在于希望我们拼得精疲力尽时，他们在最后阶段才参加进来，最终决定世界的命运。他们要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不仅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德国，还要强加给他们的盟国——苏联身上。很容易看出来，这一想法在他们考虑事情时占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也可以从阶级立场来观察这个问题，尽管我们国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但西方盟国认为战时与苏联结盟仍符合

他们的利益。我们必须联合力量对付共同的敌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取胜。但是当我们运用盟国的集体势力反对共同的敌人时，我们各自仍站在各自的阶级立场上，西方盟国对我们日益强大当然不感兴趣。英国和美国从他们的阶级立场出发，认为他们还必须给我们一定的帮助，但他们也想看到苏联在战后被相当削弱，以便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我们。

对我们来说，我们也知道，在战争结束时我们变得相对强大是非常有用的，在解决国际问题时我们的发言就更有份量。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德国问题就不会按波茨坦会议的那种方式来解决。波茨坦决议是根据战争结束时盟国之间力量对比而作出的一种妥协。这在有关柏林和维尔纳的条款上，决议的片面性反映得特别明显，这些城市都在苏占区，似乎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占领区的一部分。然而，盟国并没因此把它们给我们，柏林和维尔纳都被划分为4个部分。我们只得其中一个区，而西方诸国——英国、美国、法国——得到其余三个地区。这或多或少可以说明战后是根据国力来划分势力范围的。

当我们开始向西推进，日益接近德国边境时，迫使盟国加快行动，发动了登陆战。他们担心我们可能越过雅尔塔协议划分的界线向更远的纵深推进。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赞扬西方盟国在打败希特勒德国的共同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为了避免过分骄傲，我们应该适当地让苏联人民和共产党知道西方盟国和苏联自己在这共同事业中分别作出的贡献。如果不客观分析过去，那么将来的事业就只能建在幻想和简单的爱国主义基础上，而不是向大家提供事实。不幸的是，我们关于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已经让人们产生幻想，这些著作是在一种虚伪的自尊心支配下写出来的，写作时不敢把西方盟国所作的贡献和盘托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斯大林本人所坚持的不正确不现实立场。他知道事情真象，但他只在私

下里承认，他认为公开承认，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太丢脸太不光彩了。

但是，公布历史真相未必就丢脸了，承认盟国在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并没减少我们的功绩。相反，进行客观的评论会使我们在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丝毫不损我们的尊严，也不损害我们为胜利做出的重要贡献。但在这一点上，要斯大林实事求是那是绝不可能的。他竭力掩盖我们的缺点。他想，这样才显得我们比敌人更强大，别人也就更惧怕我们。这是荒唐可笑的。他应该知道敌人是愚弄不了的。敌人总能自己亲眼看到并根据他们自己的情况进行分析。还有一种可能，斯大林担心把战时历史公开对他自己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我们仍然认为，对战时发生的那些事应公开承认而不应有意掩盖。为了有助于我们的国家和事业，我们不应隐瞒我们的错误，应把它公开暴露给人民，而不管它会引起多大痛苦。人民会理解和支持我们。如果必要，他们会原谅我们犯过的错误。当我把战争中处理不当而造成的失误揭露出来时，人民可能说，“赫鲁晓夫在这儿批评斯大林了，但他是以斯大林为镜子在进行建设性的分析。”那是千真万确的。对那些不久将来就要接替我国现任领导人的新一代人来说，客观地向他们说明战争时期发生的一切，我看还为时不晚。我们必须研究过去，为的就是让我们自己不犯历史上憎恨过的错误。我们必须防止现在或将来，重犯这些错误。

承认在战争年代从我们现在的对手那儿接收过物质援助与当今局势毫无关系。我们不要吹嘘说，战胜德国全靠我们自己，而盟国的加入仅是为了分享战果。那就是为何我要把自己关于盟国在战争中的作用的看法说出来，我希望我的看法能被对1941年到1945年的形势发展进行客观调查的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所证实。英国人曾顽强地、自己冒着巨大的危险来帮助我们，他们把物资运到

摩尔曼斯克，为此受到巨大损失。沿途都有德国潜艇出没。德国人侵占了挪威，直逼摩尔曼斯克对面。

正象米高扬访问美国回来后证实的那样，我们从美国那儿得到的军事装备、船只和许多供应品，这些物资在战争中大大地援助了我们。斯大林死后，好象我们所有的大炮都还装在美国的卡车上。记得我曾提议。“把我们正在生产的所有的自动车辆全部移交给军方，这样我们检阅时用的牵引炮车就全是苏联自己造的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乎所有大炮（东德）都在美国斯蒂倍克工厂制造的卡车上。我说，“这完全是不应该的，这多么可耻。看看战争结束多少年了，我们仍然到处开着美国卡车！”我讲这些，仅是想强调一下我们在战时从美国得到多少汽车和卡车。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怎么能从斯大林格勒前进到柏林！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机动灵活的运输工具，我们受到的损失会更大。^①

此外，我们还收到了我们用于制造大炮、飞机等用的铜和铝。我们自己的工业被敌人摧毁了，部分又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还得到大量食品。我无法透露这方面的数字，因为它们从未公开过，只是全部锁在米高扬的脑海里。盟国提供的一些罐头吃起来味道虽然鲜美，但军旅中还是流传过许多关于美国猪肉罐头的笑话，有些笑话还相当下流。没有这些猪肉罐头，我们很可能供应不起我们的军队。我们丧失了最肥沃的土地——乌克兰和高加索。

我重申，盟国给我们这些帮助既不是出于对我们人民的怜

^①苏联坦克在世界上是最好的，但直到斯大林格勒会战时，苏军实际上还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正是装备了美国、英国的卡车；他们才能迅速前进，完成对斯大林格勒周围德军的包围，继而快速越过平川，在库尔斯克把德国装甲部队打得落花流水——终于向柏林维尔纳前进。

悯，亦非尊重我们的政治制度，更不是希望社会主义获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高奏凯歌。西方盟国帮助我们完全是形势所迫，他们自己正面临着生死存亡之问题。他们援助我们，为的是不让我们苏联军队在希特勒德国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为此，他们向我们提供武器，以便我们用它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也削弱了我们自己。他们要等到苏联拚得精疲力尽，不可能在解决边界问题时占据一个起决定作用的位置时，才积极参加反对德国的战斗。

第七章 乌克兰闹饥荒

1946年至1947年：乌克兰发生了大饥荒：西方国家对这事几乎全然不知。直到1947年12月，日丹诺夫在他最后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中，有一次才涉及到这一事件。他宣称这是由于乌克兰出现了历史上最罕见的干旱造成的，其程度甚至比1890年的大旱还严重。然而，这次饥荒比起推行农业集体化年代时出现的饥荒，情况稍好一些。虽然时至今日苏联官方还未公开承认搞集体化时出现过饥荒。饥荒固然是由于干旱，但应该说，已荒废了的农业又促使干旱更严重。赫鲁晓夫提到某些农庄缺少劳力（战后初期，不仅是乌克兰，差不多整个苏联，几乎没有一个集体农庄能看见一个健壮的男人，农田都是由妇女、儿童和老人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在耕种）。战争造成的破坏如此严重，以致乌克兰、白俄罗斯的许多居民生活在地下掩体里——挖掘的地窖，上面只简单地遮盖点东西。而这就是赫鲁晓夫重返乌克兰任总管时所面临的情况。他关于饥荒和人吃人的描述，并非夸夸其谈，相反，他远远没有把当时的实际情况公布于众。但是，有个与饥荒休戚相关的事，赫鲁晓夫可未提及：在德国占领期间，集体化已经瓦解，而把它重新搞起来那正是党的任务之一。然而阻力很大，不仅农民不愿意，就是农庄干部也不积极，有些干部听任农民私自占据集体土地，作为交换他们却从农民那儿获得小利，这类事情举不胜举。这就是赫鲁晓夫必须应付的局面，他未能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很明显，这使他当时处境不

妙，莫斯科派来了卡冈诺维奇当他的顶头上司，准备采用各种残酷手段强行实行集体化。在这章里，我们可以看见赫鲁晓夫如何同他自己那帮乌克兰人与他称之谓国家（即莫斯科政府，事实上他也是这个政府中的一员）进行对抗，这足以充分地说明当时的情况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三十年代农业集化过程的重演，为了供应城市，农民几乎饿死——但这次赫鲁晓夫处于两面夹攻的困境，一方面他有责任保持乌克兰的繁荣和一定福利，而同时他的工作就是贯彻斯大林的命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命令是如何泡制出来的，同时也给我们一个近距离观察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最亲密的同事之间是如何勾心斗角。他们关于种春小麦还是冬小麦，是搞浅翻还是搞深耕所爆发的激烈争吵，本来都是为了个人争权夺利。

他们常常抓住任何一个技术问题，作为旁敲侧击的武器，再利用斯大林的偏见，煽起他来反对他们各自的对手。在所有这些争吵中，马林科夫最为活跃（赫鲁晓夫没有提到，在德国人刚被驱逐去时，马林科夫曾被派到乌克兰负责重建工作，而那时赫鲁晓夫还是在前线司令部里）。

1944年乌克兰刚从希特勒侵略者手里解放出来时，我为重建党组织和恢复经济建设在努力工作。当时所有身体健康的男人都应征入伍了。随着战争继续发展，红军在被占领过的土地上也征募兵员以补充自己。从刚解放出来的地区征募来的人懂得他们应尽的责任，不需要什么动员就参加了红军去与希特勒德国战斗。

乌克兰人民经济的重建工作，特别是农业，就由红军向前开进时留在后方的那些人承担；他们是老弱病残者，不适应担任军事工作的人，特别是妇女。某些工程技术人员，矿工和产业工人可免服兵役。包括许多姑娘在内；被动员投入到工业战线行列

了，大家也都乐意到工业战线去。他们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是，爱国主义吸引了他们中许多人投身于我们的事业。因为党的鼓动宣传运动强调指出，恢复工业生产是解救经济灾难的唯一方法，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手段。其次，工业正在恢复的地方的供应状况远比集体农庄要好，在城里得到的食品比农村多。

在顿巴斯，采煤、炼钢、金属加工和地方工业都恢复了生产。重建工作飞速发展。看看人民是如何拚命工作，是如何正确理解必须全力以赴地把工农业搞上去，看到这一切不由得令人从心底发出赞叹。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制定的英明、高瞻远瞩的各项政策使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民族对抗情绪得到缓和。当然，还存在不少问题，要根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怨恨还需几十年时间。但是基本目标已经实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知道，只有同心协力，我们才能强盛壮大，才能实现提高物质和文化水平的目标。战争使我们永远团结起来了，使敌人妄想我们成为他们分裂活动的牺牲品的幻想遭到破灭。战争结束后，人民欢欣庆祝的情绪日趋平静，人们返回到工厂、车间、矿山、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重建工作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但是，1946年出现严重干旱，乌克兰农业遭到严重损失。减产已成定局，恶劣的天气再加上粗劣的机械设施，减产完全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缺少拖拉机、马匹和耕牛。此外，我们劳动力的组织工作仍然非常无力。战后男人陆续返回家园准备就业，但都适应不了原来的工作。长期外出，许多人已不能胜任农场里的技术活，而其他一些人就从来没有做过这类工作。^①

为了使国家得到足够的谷物，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可以

^①由于以下因素，这种局面日益严重：战争损失骇人听闻，约2000万人丧生，主要是健康的男人；工厂里搞重建和工作所需要的男人严重短缺，斯大林有意执行让复员军人到远离他们家乡的地方去工作的政策，唯恐他们与村里人谈起他们见过的西方较高生活水平，可能引起村民们的不满。斯大林认为那些远离家乡的复员兵对陌生人不可能多谈他们所见所闻

说，乌克兰集体农庄的庄员们知道他们担负的责任。他们尽力给国家和其他地方提供粮食。当他们自己国家被德国人占领时，自己挨过饿，所以懂得提供足够的粮食的重要意义。他们知道没有粮食，我们的重工业就无法恢复。对矿山、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情况也是如此。此外，走集体化的农民对党无限信任。因为打败德国的胜利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乌克兰集体农庄的庄员普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愿意向国家提供必要的农产品，对国家其他部分的安全作出贡献。

我们的供应原则应该先国家后自己。1946年我们粮食总产计划要求达到4亿普特（720万吨）左右，这一定额是武断臆想的，虽然报纸上发表时声称这一数字是有科学数据为根据的。依我看，核定出这一数字不是以我们真正能生产出多少粮食为依据，而是根据国家打算从我们这儿榨得出多少为根据。这种定额制定是一种地道的敲榨勒索。我预感到这一年的灾祸就要临头了，结局如何谁也说不清。我不断收到集体农庄庄员和农庄主席来信，这都是些让人心肝碎裂的信。我想起有封信特别典型，它是一个集体农庄主席写来的，信中说，“好啊，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已经按下达的定额交给国家了，我们把什么东西都交出去了，而自己一无所有了，我们相信国家和党不会忘记我们，会给我们援助的。”他们一定认为他们的命运就取决于我了。因为我是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设想，既然我是乌克兰政府的首脑，我定能帮助他。殊不知，这是自欺欺人。一旦粮食进了国家收购站，我也毫无办法，也就无权支配了。为获得粮食以供应我们自己地区的人民，我不得不向国家提出特别申请。^①

^①早在1938年，赫鲁晓夫就曾作为斯大林忠诚而又十分残忍的钦差大臣去过乌克兰，他在战争时期的经历，再加上他对人民遭受的苦难耳闻目见，这些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在这里，他俨然以一个反对国家的人民斗士出现，然而他又是这个国家的代表。

我已经预见到4亿普特这个产量计划是完成不了的。我指派了一个由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由斯塔尔钦科同志领导，现实地估算一下我们真正能生产出的粮食数字。他们推断出的数字是1亿普特至2亿普特之间，这个数是非常低的。战前，乌克兰年产曾多达5亿普特，而国家已给我们规定1946年的产量计划是4亿普特。我感到我们最好还是现实地对待这个问题。我希望，假如我把情况坦率地向斯大林汇报，并以事实和数字为根据，他可能会相信我。我要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一切可能，让斯大林了解我们的处境。

过去，有几个问题我也曾成功地突破过莫斯科官僚政治机构的阻碍，直接向斯大林呼吁过。有时，如果我能提出仔细收集的、合乎逻辑的材料，事实本身将会不说自明，这时斯大林就会支持我。

我希望这次也能证明我是正确的，斯大林能理解我的请求不是有意“破坏”，这个词是经常被拿来作为从集体农庄那里敲榨勒索农产品的借口。而这一次，我要设法让斯大林相信，我们无法提供我们自己缺少而又需要的农产品。我们自己国家需要粮食，而斯大林还要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运送食品，特别是给波兰和德国，他们如没有我们的帮助就不能生存。斯大林已经在组建一个同盟，并自封是这个同盟里未来军事方面的领导。如果他听到乌克兰不仅完不成国家规定交售粮食的定额，而且还要国家拨出粮食来供给那儿的人民，他肯定大光其火。

然而，我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向他陈述事实：饥荒即将发生，必须采取某种措施。我命令准备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递交一份报告，请求国家发给我们一定数量的粮食定量配给卡，以便让我们向农庄的人提供一定质量的农产品，组织起来救济饥民。我很怀疑此事会成功。我甚至犹豫是否要把此报告送交给莫斯科，因为我了解斯大林，他的残忍和暴躁的脾气。

但我的同志劝服了我。他们说，“我们已经作了安排，因此，你尽管把此件往斯大林那儿送行了。绝不会落到斯大林手里。他绝对看不到它。我们已与柯西金讲妥了，他同意调给我们所需要的粮食定量分配卡。”柯西金当时负责处理这些事。^①

我踌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签署了这个报告。当报告送到莫斯科时，正值斯大林不在莫斯科，他在索契休假。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利用这个报告煽起斯大林对我的不信任。尽管他们自己能轻而易举地以斯大林的名义对报告作出决定，他们不这样干，而是把它递呈给斯大林。所有呈送给政府的正式报告都写着斯大林亲启，但多数报告他从不过目，正如政府以他名义发布许多法令一样，有些他从未看过。也幸亏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我的这份申请报告，直接送给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

作为回答，斯大林发给我一个用最粗鲁的口吻、使用最侮辱性语言的电报。他说我是个令人怀疑的人物；说我写的备忘录证明乌克兰已自身难保；我提出为救济人民，请求拨出一定数量的粮食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无法表达这个电报对我的打击是多么沉重，我清楚地看到了整个悲剧，它不仅压在我个人头上，而且正袭向全休乌克兰人民。他们遭受饥荒现在是在劫难逃，斯大林的回答使我们避免饥荒的最后一线希望成了泡影。

斯大林从索契回到莫斯科后，我即刻从基辅动身去见他。我准备被骂得狗血淋头。在如此情况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或许立刻被列入人民的敌人名单中了结一生，转眼间你也可能被投进卢卜卡（设在莫斯科中心的秘密警察总部及监狱）。我告诉斯大林，我在备忘录中竭尽全力向他精确地反映乌克兰的现状；并

^①A·N·柯西金，现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战时大部分时间里，他负责协调各种食品工业及其他一些轻工业的生产。

坚持说乌克兰真的需要帮助。我的争辩使他更加怒不可遏。他断然拒绝了我们关于发给粮食定量分配卡的请求。

不出我料，此刻饥荒已经发生。不久，我接连收到关于饿死人的信件和官方报告。接着，发生了人吃人的惨状。我得到一个报告说，在基辅郊外瓦西尔科沃镇附近一座小桥下发现了一个人头和一双脚丫了。显然，尸体被吃掉了。还有许多类似情况。当时的敖得萨州委员会书记基里钦科^①告诉我说他曾去一个集体农庄查看那儿的人们是如何熬过冬天的。他被邀请去看看在那儿工作的一个妇女。这就是他描述的惨景：“我看到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场面。那个妇女把她亲生小孩的尸体放在桌子上宰割，她边割边喃喃自语，‘我们已经吃掉玛涅奇卡（小玛丽）。现在我们要把瓦涅奇卡（小伊凡）腌制储藏起来，他能让我们活一阵子了。’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可怕景象？这个妇女是饿疯了，以致虐杀了自己的孩子！当我重述他所说的这件事，我的心又回到了那个时代，头脑里又清楚地出现那种恐怖景象。我无能为力，只得把所有的一切都报告斯大林，结果使他的肝火更旺。他说，“你真是菩萨心肠！他们在骗你。他们报告这类事，是指望煽起你的柔情。他们企图迫使你把所有的贮备粮都拨给他们。”显然，斯大林有绕过我获得情报的渠道，比起我送上的报告，他更相信那些情报。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我在乌克兰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向乌克兰地方势力集团屈服了，而我自己也已逐步滑向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一边。有人说我不应该完全受到充分信任，斯大

^①A·I基里钦科，战前就在乌克兰党组织里任职，是赫鲁晓夫下属之一战时在前线各军事委员会供职，领少将衔。1949年底他接替赫鲁晓夫出任乌克兰第一书记。1957年他作为赫鲁晓夫的心腹被召往莫斯科并协助赫鲁晓夫粉碎了所谓的反党集团。1960年他突然失宠，原因迄今秘而不宣。

林已开始用将通常具有的小心谨慎的态度来审视我给他的一切报告。但斯大林是从何处得到这种情报的呢？当然是从契卡们那儿。这些人常在全国各地转悠，再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报告，有些情报直接捅给斯大林本人。人们通常不敢直接给斯大林递送消息，因为他们担心这些使人沮丧的消息会惹他不悦，从而危及他们自己。斯大林喜欢遐想这个国家正日益兴旺发达。他喜欢的事情，就如塔拉斯·谢夫钦科（19世纪乌克兰的诗人）曾说过的一样，“从摩尔达维亚人的家园到芬兰人的国土，所有臣民都默默无声，因为日子都好过。”唯一不同的是，谢夫钦科所写的诗，是描写尼古拉一世统治时的情况，而现在我们，则是在约瑟夫一世的治理下。

斯大林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农业问题。我记不清自上次中央全会后已隔了多久没开这种会了。30年代后期，曾开过好几次中央全会，先是讨论与人民的敌人作斗争的问题，继而又讨论在与人民的敌人作斗争期间出现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当时，斯大林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时扮演了慈善家的角色，而扩大化正是他自己搞起来的。但不管怎样，斯大林现在还是提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讨论如何提高我们农业产量的问题。

然而冒出一个指定谁来作总报告的问题。斯大林当着大家面，边说边仔细推敲，“谁来作总报告呢？”他问。“马林科夫？他主管农业，但他能作什么样的报告呢？他对农业一窍不通，他甚至连农业上的一些专有名词都弄不懂。”斯大林当着马林科夫的面这么说。他说的绝对正确，但也更加使人感到不可思议。既然斯大林早就知道马林科夫对这方面的工作完全外行，为何要指定他来主管农业？这种前后矛盾的事实在有趣，对此我无法解释。然而，对斯大林来说，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出现。

斯大林突然转向我说，“你去作总报告吧。”

我简直被他这个指令吓了一跳，说：“斯大林同志，请别指

定我去作报告。”

“为什么不？”

“我可以就乌克兰的问题作一个报告，我在乌克兰工作多年了，那儿的局面怎样，我或多或少知道一点。但我对俄罗斯联邦的农业却全然不知，对西伯利亚我就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我从未涉足过中亚细亚。甚至从未见过棉花，我不知道它是怎样长出来的。事实上，去乌克兰工作前，我几乎从未与农业打过交道。我是个工业家，我一直在搞工业和城市行政管理工作。”

但斯大林还是坚持：“那没关系，这个报告，无论如何要你作了。”

我说，“不，斯大林同志，我请你收回命令吧，我不愿意让中央委员会发生误解，我也不想就一个我完全陌生的题目作报告，转而使自己陷入一个尴尬局面。”

他琢磨了一会，然后说，“那么，行呀。我们指定安德烈耶夫去作报告。”安德烈耶夫享有党内农业问题专家的盛誉。与政治局其他成员相比，就农业而言，他知道得不少。虽然就我个人来说，他那点东西给我印象不深。他是个相当枯燥无味，拘泥呆板的人。我知道他的总报告只能是从其他农业专家们写的论文上寻章摘句，再东拼西凑而成。但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了，我很欣慰免喝这杯苦酒。

A·A·安德烈耶夫在斯大林上升到权力顶峰及以后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他高级副官之一。安德烈耶夫从1914年起就是个布尔什维克，1932年进了政治局。他个性倔强，却无创新，只知服从组织命令，他的手伸到各行各业，代表斯大林的意志办事时残酷无情。1943年他被指派负责农业工作。1950年引起斯大林不满后失宠，表面上是农业政策上的一个技术问题。在马林科夫的保护下，他幸存下来并一度想东山再起。直到1950年赫鲁晓夫才以苏联农业问题发言人面目出现。

于是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就被定下作为给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报告人。中央全会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召开。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的报告正象他通常作的报告那样，首尾连贯一致，结构合乎逻辑，我坐在斯大林旁边，看到他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中途休息时，我们来到专供政治局委员用茶点的休息厅，大家坐在桌边，喝着茶，斯大林问道，“你对安德烈耶夫的报告怎么看？”

我说，“它肯定使大家对所有主要问题有个新的认识。”

“但是，我看你坐在那儿，对他的报告似乎心不在焉。”

“如果要我坦率地说，我要告诉你，我想他提的问题应该用稍微不同的方式提出来，报告虽然是面面俱到，但还是陈规旧习老一套。”

斯大林生气了。“当初你自己拒绝作这个报告，而现在你又挑剔他。”我可不想对这个报告提出批评，特别是因为起初我曾推卸过去作报告。然而我仍老老实实地告诉斯大林，我认为安德烈耶夫的报告仅能达到第二流水平。那时，看得出斯大林对我确实是非常不高兴。

休息后，我们开始讨论报告。许多人发了言，包括我在内，我谈的是关于乌克兰经济重建问题。我说我认为农业机械化和种子的储备是关键问题。在这次中央全会前，曾颁布过一项法令，给集体农庄庄员规定的首条纪律就是：庄员的首要义务是完成国家下达的产量定额并把规定上交的数额如实交送给国家。然后他才可以将种子和其它农产品供给集体农庄的劳动者。我认为这条根据斯大林意见给农庄庄员提出的首条纪律应该撤消，农庄在给国家交售粮食前，应首先留出种子，以备明年播种。很久以前，有个农夫宁愿饿死也不肯吃掉他留下的种子，因为种子就是他的未来，是他农田的命根，我们怎能把农民的种子收走呢？至于说为了播种，国家再向农庄提供新种子，那也有些困难，因为农民

无法得知他们得到的是些什么品种，这些种子是从那里调来的。这实际上是政府要农民在他们的土地上，播种他们不知底细的种子，而这些种子也可能不适应在他们这一地区耕种。这决不是管理农业的办法。

我在讨论安德烈耶夫报告时的发言使斯大林更加恼火。在马尔采夫发言后，我感到一团更黑的乌云笼罩在我头上。马尔采夫是个经验丰富的农民，他管理乌拉尔的农业很有成绩。^①他在发言中说，乌拉尔的农业一切顺利，今年春小麦丰收在望。马尔采夫一提到春小麦，我就认识到我陷入比以前更深的麻烦之中。我知道斯大林不会静下来认真研究事情细微末节，而要抓住春小麦问题攻击我。我曾经宣称过我反对用硬性、强迫性的命令推广春小麦。春小麦在乌克兰、特别是在乌克兰南部产量很低，但在某些集体农庄里，它的收成还满可以。因此，我认为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如果自愿，是可以播种春小麦的，但是不应该不顾客观条件由莫斯科发出一项统一命令，强迫每个集体农庄都要播种一定数目的春小麦。在某些地方，春小麦的产量还不如播下去的种子多。斯大林不知道这些，也不愿意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战前，我曾把我们播种春小麦的问题向他汇报过。当时他曾同意我的意见，批准我们提出的不在乌克兰集体农庄强行推广耕种春小麦的决定。

会议再次休息，当我们走进休息厅，斯大林又用威胁性的口吻对我说，“你听了马尔采夫关于春小麦的发言吗？”

“是的，但是斯大林同志，他讲的是乌拉尔。在乌克兰，我们的高产作物是冬小麦。在乌拉尔他们根本就不种冬小麦，只种

^①T·S·马尔采夫是个在党内有一定势力的才华出众、精力充沛的农学家，很长一段时间，为了提高农业生产，他站在农业实验最前线，他进行的实验有的成功，也有失败的。

春小麦。他们研究过春小麦，知道如何耕种和怎样才能获得高产。”

“那无关紧要，如果他们能使春小麦在乌拉尔获得如此丰收，而我们”——他拍了拍自己的肚皮——“有如此肥沃的黑土层，我们理所当然应获得更好的收成。我们应该按这个意思作出一个决议。”

我说，“如果你要就此作出决议，你尽管作好了，你也可以记下我是持反对意见的。大家都知道我是反对播种春小麦的。如果你要这么干，那就也请给北高加索和罗斯托夫地区也发个决议。”

“不，这一决议将直接适用于你。”当时，斯大林的意思是，我必须在播种春小麦问题上带个头，这样，其他谷物产区再效法我。①

后来建立一个以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为主席的委员会，我也被指定参加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全会结束后，我必须返回乌克兰。可委员会的工作尚未了结，就留下了马林科夫和安德烈耶维奇拟订出斯大林希望制定的决议。临行前，我建议该委员会应该向中央提议取消给集体农庄庄员规定的首条纪律。我提议，集体农庄在向国家交售谷物时，应该在同时按一定比例给他们留些种子。这是我作出的一个让步。但我认为这样做总比以前一成不变要好。因为当时，国家没有给集体农庄留下任何东西，如按我的建议办，集体农庄在上交一定比例的谷物给国家，他们也可以同时获得一定比例的谷物作为自己的种子贮备。

①关于春小麦与冬小麦的戏剧性争论是斯大林对他一窍不通的技术性问题强行干预的典型例证。他根本没能领会，适合于乌拉尔的春小麦，在乌克兰就不一定合适。说来也奇怪，后来赫鲁晓夫也几乎犯了斯大林这一同样的错误，他坚持大规模种植玉米，而不管各地的客观条件如何。

然后我回到基辅，几天后马林科夫打电话给我说，“决议草案拟好了，但没有把你的关于让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贮存种子的意见包括进去。我们现在就要去向斯大林汇报了，你是否要我们把你的建议单独汇报？要么干脆甬提它？”

这显然是一个挑衅。大家都知道，斯大林也明白，在委员会多次会议上我曾为此建议拚命力争。假若我叫马林科夫不要跟斯大林提及我的意见，看来我就是个懦夫，因此我答道，“不，马林科夫同志，请继续下去，把我的意见报告给斯大林同志好了。”

“那好吧。”他说。于是他们向斯大林报告了。不久之后，马林科夫再次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建议使斯大林生气了。他当即拒绝了。

发生的另一件事是，斯大林突然提出我在乌克兰需要何种帮助的问题。^①这表明他在密切注意着我了。”显然，我们最好加强一下赫鲁晓夫在基辅的领导地位。”他说。“乌克兰正在瓦解，对我们全国来说，这可能是场灾难。”他明显在打我什么主意了，但没法肯定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接着他说，“我考虑我们最好派卡冈诺维奇去帮助你。你对此有何想法？”

“好，”我说，“卡冈诺维奇一度曾任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他非常了解乌克兰。当然，乌克兰既是如此辽阔广大的共和国，就是派去几十或几百个人去，都有足够的工作可干，别说只去一两个。”

斯大林接着说，“我们还是派帕托利切夫去助你一臂之力。”

我回答，“当然可以。那将是好事情。”事情就这样敲定并

^①当斯大林建议，他的下级需要何种“帮助”之时，可以理解成这位下级要被别人取而代之了。

公布了。斯大林建议，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与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要分开，由两人担任。数年前，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这两个职位由一人兼任时，我曾企图说服他，这不是个好主意。现在斯大林说，“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卡冈诺维奇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帕托利切夫担任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①

“非常好，”我说。我们召开了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会，认可了斯大林的决定。然后各就各位，各尽其责。我告诉卡冈诺维奇和帕托利切夫，“我们必须准备开展一个播种运动。人民在挨饿，已经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假如我们不组织起来减少饥荒，那就谈不上什么播种运动。”

我们担心，要确保1947年有个好收成，从而为1948年贮藏点粮食，现在采取措施可能已经晚了点。我们请斯大林帮助，于是从莫斯科得到了一定数量的种子及食品配给。时期早春2月了，南方某些地方已开始播种。到3月时，乌克兰大多数集体农庄都将要播种。到4月份，基辅州必须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播种运动来完成任务。

我对卡冈诺维奇说，“对那些马上要做的，我们应该下决心开始了。”

他回答说，“我们应该先到乌克兰各地去巡视调查一番。”

“那也好，但现在那还不是最重要的事。你离开乌克兰很久

^①对赫鲁晓夫来说，这是次最严重的挫折，它只意味着一件事：他正在靠边站。至于新调来的帕托利切夫，他是马林科夫的门徒，虽然赫鲁晓夫未提及这点。从赫鲁晓夫的观点看，任命帕托利切夫任此职更是不祥之兆。附带说一下，这个帕托利切夫正是第四章里提到过的那个雅罗斯拉夫尔轮胎厂的头头。他被指派到乌克兰工作后，有一阵子他曾失宠，但在1950年他东山再起，出任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1957年马林科夫倒楣时他也平安无事，1958年他坐上了对外贸易部部长的交椅。

了，因此你有必要在这个共和国巡视一下。我还是坐镇基辅的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少数集体农庄露面，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现在最紧迫的事情是通过铁路迅速把种子分发下去，送到那些等种下播的农庄。播种运动的成败在此一举。”于是卡冈诺维奇离开了。我留在基辅，象个电话调度员一样，竭力促运种子、燃料和其它播种运动所必须的重要物资。我们没有想过调运化肥，因为我们一点都没有。

卡冈诺维奇巡视到了波尔塔瓦州，他在那儿所见所闻使他确信，担任第一书记这一职务虽然受人尊敬，但却是责任重大。他看见了集体农庄的群众奄奄一息，濒临绝境，他们无法劳动，许多人快要饿死了。他返回基辅后，就一个给他印象最深的集体农庄谈了他的感想。他给我描述了名叫莫基尔钦科的农庄主席，”我从来未见过象他这样的人，”卡冈诺维奇说，“他是那样不屈不挠，那样顽强，我看他可能会取得一个好收成。”

我问，“那是怎么回事？”

“当我到达莫基尔钦科集体农庄时，我看见他们在地里用浅耕方法耕地。”你只有了解了卡冈诺维奇平时的脾气，才可能想象得出，他是如何向这个集体农庄主席吼叫的——“你见鬼了，为何只耕这么浅？”

莫基尔钦科是个农业好手，就说：“我耕了我应该耕的那么深。”

卡冈诺维奇接着反骂道：“如果你耕这么浅，到头来你非向国家讨饭不可。”

“我不会的，卡冈诺维奇同志，我绝不会那样。”莫基尔钦科骄傲地回答。“他从来没有向国家申讨粮食。我只是向国家提供。另外，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党的第一书记，不管你說什麼，我还照样这么耕。我们按自己的方法在这些土地上播种，而且我们会有好收成，你会看到这个事实的。”一年后，我特地专程拜访

了这个莫基尔钦科。他的集体农庄是乌克兰最繁荣的农庄之一。他们至少提前半年就完成了上交国家下达的粮食定额，所有这些使卡冈诺维奇迷惑不解，那就是他为什么要对我说的，“我看这个莫基尔钦科用浅耕的方法或许真的可以取得一个好收成。”

应该顺便提一下，卡冈诺维奇之所以不相信莫基尔钦科的浅耕法，还有与他个人利益攸关的因素在里面；他参加了反对那些提倡浅耕法的人的斗争。使用浅耕法的人竟然被送去审判，有时甚至处以死刑。搞浅耕曾被称为“违法行为”。浅耕操作理论是某位教授在萨拉托夫这个地方研究推广起来的，这位教授后来受到惩罚，我估计他们把他投进监狱或许他受到更坏的处罚。^①

自从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开展活动以来，就寻找一切出人投地的机会并滥用权势，他特别希望做到的是；一定要使乌克兰超额完成工业生产计划，特别是地方工业。

记得有一年，我以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身份向乌克兰政治局传达国家计委向我们下达的任务指标。卡冈诺维奇非常勉强地同意了计划，他认为这些数字定得太高，肯定完不成。而他是不同意接受一个完成不了的计划的。他只想要个能超额完成的计划。计划数字低，完成起来就容易，然后向外大吹大擂他如何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计划。很不幸，在我们国家，这种做法当时十分普遍，时至今日仍相当流行。

大约在这时，我遇上倒楣的事，初是感冒，后来发展成肺炎。好长一段时间不得不依靠氧气袋维持，好不容易才熬过来。当我生病期间，卡冈诺维奇有机会为所欲为，因为我不在他身边碍手碍脚。他欺压帕托利切夫太甚，以至帕在我刚刚脱离危险期还躺在病榻之时就来找我抱怨诉苦，“我再也忍受不了卡冈诺维奇

^①这个微不足道的例子也可以说明，就是在农业操作上执不同意见者也可能招致大祸临头。

对我的支配摆布了，”他说，“我不知道如何办才好。”我看得出他也是被卡冈诺维奇逼得走投无路才来的。后来他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解除他的职务，因为他没法与卡冈诺维奇共事。帕托利切夫被免去他在基辅的工作，调往罗斯托夫。

不久，我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出来工作前我还卧床休息了两个月。健康完全恢复重新出来视事后，我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已越来越紧张。他简直让人无法容忍。在两个方面他的活动特别厉害：反对所谓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犹太人的斗争。本人就是犹太人的卡冈诺维奇竟也反犹！他的反犹活动主要是指向那些碰巧跟我要好的几位犹太人。例如，基辅有个名叫特拉斯库诺夫的报纸编辑。卡冈诺维奇撵走了他，用很恶劣的态度对待他，对他嘲笑挖苦、奚落辱骂。特拉斯库诺夫是个诚实的人。战时，他曾在一家在前线出版的办得最好的报纸作过编辑。我与他在尤索夫卡工人联合企业上结识，当时他在那儿主编一家报纸。我对他申请入党是赞成的。卡冈诺维奇惩罚特拉斯库诺夫，仅仅是因为特拉斯库诺夫与我关系密切。

卡冈诺维奇始终不断地对在他眼前活动的所有人，都泡制理由提出政治性控告。我是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有关这类事可得听任党的书记处去处理。卡冈诺维奇对许多党员提出的政治控告，通过机关内部渠道以人事报道形式，送到斯大林那里。一天，斯大林在电话里对我说，“在卡冈诺维奇送来的备忘录里，怎么没有你的签名？”

“斯大林同志，这些备忘录不关政府部门的事，他们是党务工作，因此不需要我签名。”

“不能这样。我已告诉卡冈诺维奇，除非这些备忘录由你与他共同签署，否则我将概不接受。”

我刚挂断电话，铃又响了，这是卡冈诺维奇打来的。

“斯大林给你打过电话了吗？”他问。

“是的。”

“他告诉你了吗？”他甚至毋庸说穿，因为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

“是的，他告诉说以后所有备忘录都应由我们两人合签。”

由卡冈诺维奇搞起来的那条向党员群众提出控告的渠道，很快断流了。因为他知道他绝对得不到我的签名。这无疑是个值得欢迎的进展，但这件事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它表明斯大林对我的信任已经恢复。我把斯大林给我的电话，看作一个我已恢复了一个政治局委员应有地位的信号，我的精神极为兴奋。^①

我们终于完成了粮食生产定额，上交了大约4亿普特谷物——与战前水平相比，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若与战后我们的起点相比，这毕竟是个丰收年。

这年秋天，斯大林把卡冈诺维奇调回莫斯科。

^①1947年3月，赫鲁晓夫把乌克兰第一书记之职让给了卡冈诺维奇。一周后，他把乌克兰农业欠收公然怪罪于他手下的农业部长身上。10天后，他丢失了基辅州委书记的乌纱帽。6月，他没有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面。他似乎从此消声匿迹。至于他仍然担任的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及莫斯科政治局委员，那只是徒有其名，丝毫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斯大林屡次暂时“在花名册”上保留其高级副手的职务，而事实上他们早就给甩掉了。赫鲁晓夫现在告诉我们他在这段时间湮没无闻是因为生病，情况可能如此。只是到了最近，苏联政府官员生病才不作最高机密论处。1947年12月，卡冈诺维奇调回莫斯科，赫鲁晓夫才非常突然重新露面，持撑乌克兰的所有大权。

1949年是我呆在乌克兰最后一年，也是我最为得意的一年。在各加盟国之间的竞赛中，我们超过白俄罗斯和联盟所有其他地区。这些地区也跟我们一样，正在恢复德国占领时所造成的破坏。从全国范围来看，我们农业上的成就使乌克兰的地位和乌克兰领导的威望都提高了。我总用激动的心情回顾那段经历。斯大林多次指示我就农业问题作些专题报告，如乌克兰的牲畜饲养等等。根据他的指示，我的报告在《真理报》上刊登发表，成为他人模仿的示范。但我并非把所有这一切功劳归于我自己。我自己是个俄罗斯人，决没有轻蔑俄罗斯人的思想。但我必须把乌克兰农业的恢复和乌克兰工业重建的功劳归功于乌克兰人民自己。

第八章 斯大林的晚年

第一节 列宁格勒案件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所谓列宁格勒事件在苏联从未公开提到过。外界所知道的是，列宁格勒党的首脑，曾一度很有希望继承斯大林的安德烈·日丹诺夫1948年突然死去后，在列宁格勒机构和日丹诺夫在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友持者中进行了一次凶恶的、大规模的清洗。中央委员会书记，曾长期在日丹诺夫手下任列宁格勒第二把手的战时英雄A·A·库兹涅佐夫被枪决了。遭到同样命运的有、所有列宁格勒市和地区的党的书记们，俄罗斯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M·I·罗吉昂诺夫以及其他许多人。年轻有为的，似乎是不可一世的国家计委主任N·A·沃兹涅先斯基也在这个时候被处决了。另一位列宁格勒人、现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只是被暂时降职而幸免于难。这次血腥清洗主要的、直接受害者是马林科夫。他竞争对手日丹诺夫之死倒对他有利。马林科夫的人马上到列宁格勒成了头面人物，还担任了莫斯科的某些职位。赫鲁晓夫的说法几乎肯定是对的。他说1949年底斯大林将他由基辅调回莫斯科是为了抗衡势力过于强大的马林科夫。然而，斯大林是否计划让库兹涅佐夫接替马林科夫，这倒值得怀疑。很有可能是，日丹诺夫一死，马林科夫在贝利亚的支持下决定进入日丹诺夫的

势力范围，并成功地唆使斯大林反对至少是他潜在对手的列宁格勒人。总之，马林科夫的地位暂时得到了加强。他日后的主要竞争对手将是赫鲁晓夫。

1949年底，我由乌克兰调回莫斯科，其部分原因是斯大林晚年病魔缠身。

一天，我正在一所林学院主持学生会议时——作家加兰就在这所学院被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谋杀，突然接到马林科夫的电话，说是斯大林叫我回莫斯科。

“很急吗？”我问道。

“是的，明天一早坐飞机来。”

我将一切料理停当，以便应付一切意想不到的事。回到乌克兰后我的情况会怎样，我一无所知，就连我是否能回来，都心中无数。然而我的担心被证实是毫无根据的。我抵达莫斯科时，受到了斯大林的热烈欢迎。

“告诉我，”他说，“你不觉得在乌克兰呆的时间够长了吗？你正在成为一名合格的农学家。是你回莫斯科工作的时候了。我们想让你重新担任莫斯科市和地区党委第一书记，”

我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并告诉他，我也认为在乌克兰工作了12年，任期是够长的了：“大家一直对我很好，我感谢所有协助我管理乌克兰事务的人。当然我很高兴返回莫斯科。”

“很好。我们这儿需要你。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阴谋已经暴露。你负责莫斯科的组织，这样中央委员会就一定会得到地方党组织的支持，以便同阴谋家们作斗争。目前我们已在列宁格勒破获了一起阴谋。莫斯科也充斥着反党分子。而我们要让这座城市成为党中央的堡垒。”

“我将尽力去做。”

“好，这是一封落入我们手中的重要信件。你先熟悉一下它

的内容。等你搬来之后我们再讨论这件事。”他说完递给我一份冗长的文件。文件末尾是一排署名，可读起来却象是匿名报告。上面说莫斯科有些人正密谋反对中央委员会，领头的是莫斯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波波夫^①其成员有区委员会的书记们，一些厂长和工程师。我马上意识到这些指控背后一定有位疯子或无赖。不管他是谁，其用心显然是恶毒的。我将文件锁入保险柜内，并决定不再提及此事，除非斯大林自己再提起。我觉得将此事搁得越长越好。

我返回基辅处理调职事宜。回到家，旺达·利沃夫娜加考涅楚克^②就来住所看我。我将调职的事告诉了她们。旺达·利沃夫娜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

她哭着说：“你怎么能走？怎么能离开乌克兰呀？”这位波兰妇女在为一个俄罗斯人离开乌克兰而痛哭。

我在基辅召开了一次全会，会上选出了乌克兰新的领导人。会后我急忙赶回莫斯科，因为斯大林曾让我务必在1949年12月21日他70寿辰前赶回。

我正式就任莫斯科第一书记不久^③，斯大林就提起了他让我看的那封信的事。

“我给你的那份文件你看了吗？”他凝视着问我。

“我认真看过了。”

“怎么样？”他说这话时一直眯着眼盯着我。接着把鼻子翘得老高，发出哼哼之声，——这是他得意时癖性之一。

“这封信一定是一群无赖或疯子拼凑起来的，”我说。

^①G. M. 波波夫。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就接替她担任莫斯科党的首脑。

^②A·考涅楚克是深受党宠爱的乌克兰著名作家和政治家。

^③赫鲁晓夫1949年底返回莫斯科时，当然他的职位高于莫斯科党委第一书记，仍是政治局成员，现在又被提升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什么！”他从来就不喜欢人们对检举告发阴谋的信件，表示怀疑。

“斯大林同志，我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些指控与事实完全不符。其中许多被指控为阴谋家的人，我还认识。他们都是些诚实人，忠实的人。我肯定波波夫不是阴谋家。无疑他只是个人处世和工作不怎么精明而已，但他绝不可能参与任何谋反。我对他毫不怀疑，这封信也丝毫没改变我对他的看法。”

我的肯定语气一定对斯大林产生了某种影响。他仔细打量着我，说，“你是说不要把这封信看得太重？”

“是的，斯大林同志。当然，我也不能肯定，但我估计是挑拨分子干的。”

他生气地咒骂着，不过还是将此事搁了下来。显然，只需支持信中捏造的指控，我很容易就会赢得斯大林的信任并提高自己的地位。我只需说：“是的，斯大林同志，这事看来很严重。我们最好调查一下。”这就是斯大林为下令逮捕波波夫和其他一些人所需要的鼓励。当然，他们是会坦白的，接着是我们在莫斯科开始对他们以谋反罪加以审判，其可耻程度不会亚于列宁格勒的审判。而我会由于警惕性高，使他们被一网打尽而倍受赏识。

尽管波波夫性命暂时保住了，但我知道斯大林是不会放过他的，他还是不把波波夫除掉决不会罢休的。我建议将波波夫调出莫斯科。我们让他在古比雪夫担任一家大工厂的厂长。

斯大林还是不时地想起那封信里的检举材料，常以威胁的口吻问我们“那个波波夫现在何处？”

我们总是回答：“在古比雪夫。”

斯大林这才平静下来，但他一定常在思量：“也许赫鲁晓夫错了，也许波波夫正在密谋反对我。”我后来听说波波夫在我们将他调离莫斯科后曾尖刻地诅咒我。可他哪知道，要不是我，他早死了。正是我冒着极大的风险才挽救了他的性命。这个风险就

是如果斯大林不信任我，他就会认为我跟波波夫一起参与了谋反。波波夫也真是，他对这些视而不见，反将真正的朋友视为仇敌。

到莫斯科任职后，我看出我的到来是挡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路。我甚至猜想斯大林召我回莫斯科的原因之一是想改变集体领导中的均势以遏止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有时斯大林也好像害怕贝利亚，想除掉他，可又不知如何下手。自然他从未向我提及此事，不过我能感觉到。^①斯大林好像信任我、器重我。尽管他也常批评我，但当需要时，他就支持我。对此，我很感激。我常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唱反调。战后马林科夫成了政治局成员。从本质上讲，他是个典型的文书和文牍主义者。这类人一旦有了权力将会成为最危险的人物。他们将会阻止和扼杀一切越出规定范围的生灵。

与此同时，列宁格勒的搜捕还在继续。我不清楚斯大林对列宁格勒事件到底怎么看。除我调离乌克兰时他曾提及“莫斯科阴谋家”一事外，以后从未与我提及此事。在莫斯科遭逮捕的人大多是日丹诺夫由高尔基地区党组织提升到莫斯科的党务工作者。^②

我开始行使中央委员会书记职责，负责莫斯科党组织的工作。此时A·A库兹涅佐夫——我们常称他列宁格勒的库兹涅佐夫已遭逮捕，列宁格勒党组织正处于瘫痪状态。这场运动主要针对“三套马车”即3位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柯西金。我多少算是认识库兹涅佐夫、可与沃兹涅先斯基更熟。我到莫斯科时，他还未遭逮捕，但已被解除了一切职务，

①大量证据表明斯大林此时已反对贝利亚。

②安德列·日丹诺夫调往列宁格勒接替被害的基洛夫之前一直是高尔基地区（下诺夫戈罗德）党的书记。他将自己的一些部下也带到了列宁格勒并将其他一些人在莫斯科安排了好的职位。

闲呆在家，期待着有一天他们来请他重新上任。

沃兹涅先斯基被冷落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仍是斯大林家中的常客。然而他变了，与我早些时候看到的那个乐观、自信和意志坚强的沃兹涅先斯基完全两样。事实上也正是他的这些长处使他倒了霉。他还是国家计委主任时就敢于和贝利亚争吵。他坚持对国家经济资源进行更为公平的再分配，而这意味着断了某些受贝利亚宠爱的人民委员部的财源。贝利亚手下有许多人民委员部，他总要求让他们多获得一些资金。贝利亚因与斯大林关系密切，权力极大。你一定看到过贝利亚的阴险狡诈。他善于抓住时机利用斯大林对某人的好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沃兹涅先斯基敢于顶撞他。然而贝利亚除掉他之前，他已不是过去的沃兹涅先斯基了。^①

我记得在此期间斯大林不止一次询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考虑如何处理沃兹涅先斯基期间，不给他找份差事是否是个浪费？”

“是的。这事我们可以研究研究，”他们总是这样说。

事过不久，斯大林又提起此事：“或许我们应该让他去负责国家银行。他通晓财政金融业务，在这方面他倒是个奇才。”

没人反对，可事情还是搁了下来了。沃兹涅先斯基仍然被“挂在那儿。”

显然斯大林对沃兹涅先斯基还有那么点重视。列宁格勒事件开始前，斯大林对3个前途光明的青年人组成的“3套马车”抱有很大希望，实际上，在“阴谋集团”被揭露前他已有计划地在提拔他们。库兹涅佐夫曾被认为可能接替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

^①过去人们一直将处决N·A·沃兹涅先斯基（年轻一代中出类拔萃的人）与列宁格勒事件联系在一起。但这次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出了对此事可信的解释。

基也曾担任斯大林的第一副手，经常委以重任主持部长会议。柯西金曾受权负责商业和财政工作。我认为他们三人最终倒台是基于以下事实：斯大林一直打算让他们接替克里姆林宫老一代领导人，也就是说首先贝利亚，其次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已不再被斯大林所信任。^①我很难说清老一辈领导人是如何暗中策划使斯大林失去了对这些年轻人的信任，用句粗鲁的话说，斯大林是如何象狗一样被他们唆使着扑向这些年轻人。我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观察以及无意中听到的马林科夫与贝利亚之间的谈话得出这些结论。

我能清楚地看到每当提到这3位年轻人时，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是如何在斯大林面前表现的。很快我有了这么个印象：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尽力破坏这3个人的名誉。我已说过，暗中破坏斯大林对别人的信任，贝利亚是个行家里手，加之又有个帮手马林科夫。马林科夫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能接触所有呈送给斯大林的情报，从而他能巧妙地利用这些情报，设法激怒斯大林，诱发斯大林的猜疑心。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策划反对列宁格勒这3位年轻人还牵涉到另一份更早的案件，即沙胡林案件。当列宁格勒的这些人被监禁时，沙胡林已关进监狱。战时沙胡林曾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当他受中央委员会指派负责第三十飞机制造厂时，我就与他很熟。我在乌克兰时，他因被指控在战时听任制造质量低劣的飞机而遭逮捕。马林科夫后来告诉我，当时任飞行员的瓦夏（瓦西里）·

^①这种说法也走得太远了。看来这也许是赫鲁晓夫正期待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对于库兹涅佐夫、波波夫以及沃兹涅先斯基的晋升感到不快并成功地密谋捣掉了他们，这倒是完全可能的。上头的人万无一失地被除掉，接着轮到了他们所有的助手以及部下，就如同白天过去是黑夜一样（根据由来已久的苏联惯例）。

斯大林向他父亲告发沙胡林。斯大林这才下令调查。^①马林科夫与沙胡林一案也有间接的牵连。他战时的部分工作是分管航空工业，因而对沙胡林这位人民委员所干的事负有责任。当然，当时出现这种情况也有其原因，战时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总之，沙胡林被逮捕入狱，而马林科夫也被解除了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被调往中亚细亚某地——我想是去了塔公干。贝利亚利用其影响说服斯大林将沙胡林又调回莫斯科。自此，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两人就再也离不开了。

列宁格勒事件之初，空军元帅A·A·诺维科夫也已入狱。^②战后他因接受质量低劣的飞机而被捕。据说也是因为瓦夏·斯大林的告发。我对诺维科夫很了解，战时大部分时间里是他指挥着红军的空军部队。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曾访问过我们的指挥部。他也有缺点。他饮酒过度。但是，他是一位忠诚的、诚实的和受人尊敬的人。

就在他们被捕之后，斯大林甚至对他们还怀有那么点好感。吃饭时，他常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沙胡林和诺维科夫还在狱中吗？”

^①斯大林的儿子以他傲慢、报复成性而出名。他还是个酒鬼。他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的出身。他晋升为空军中将完全是靠了他老子。斯大林去世前不久，不得不解除了他莫斯科军区空军领导职务。斯维特拉娜·阿里露也娃在《给朋友的十二封信》一书中证实瓦西里对苏联空军元帅A·A·诺维科夫失宠与下狱一事负有责任。斯大林死后，瓦西里因此事和其他一些罪行被军事法庭判处8年徒刑。后因“待他象父亲的”赫鲁晓夫的怜悯，刑期未滿获释，并恢复了他的军衔、党籍以及养老金。不久他又被投入监狱，后又获释。1962年酗酒身亡。

^②诺维科夫是位一流指挥官，也是位杰出的飞行员，一位招人喜爱的人。他和沙胡林因这种阴谋而倒台并被投入监狱这件事，很好地说明了斯大林时期的俄国生活。

“是的”。

“把他们放了，你们看怎么样？”但斯大林是在问自己。他只是在大声地自言自语。没人说什么，事情也就这么挂了起来直至他以后某个时刻再提起它。一次，他甚至更进一步地说：“你们应该认真考虑释放沙胡林和诺维科夫。关在监狱里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还可以工作吗。”他常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说这些，因为他俩负责此案。

在斯大林家吃完饭，我们常集中在宽敞的浴室洗手。会议前后——我们趁与斯大林共商量“开会”，我们常站在里面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以及会议会有什么结果。有一次在浴室里我无意中见贝利亚对马林科夫说：“斯大林又提起那两个飞行员的事。你知道，如果把他们放了，可能波及到许多其他人。”

“波及到其他人。”贝利亚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其他人”指谁？贝利亚一定很担心，如果放了沙胡林和诺维科夫，斯大林可能会再提到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他可能会考虑在他们受审前好将他们释放。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担心，如果被认为是列宁格勒阴谋集团的头目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获释，他们反对整个列宁格勒组织的运动就可能破产。所以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要尽力使沙胡林和诺维科夫继续呆在监狱里。最终他们还是获胜了，沙胡林和诺维科夫一直未获释放。

我从未看过列宁格勒案件的起诉书，但我想——也是根据我无意中听到的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间的谈话——指控库兹涅佐夫集团的罪状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反对中央委员会。接着由斯大林亲自指挥的审查开始了。如果说斯大林是乐队指挥，贝利亚就是第一提琴手。我这么说是因为实际主管审重的〔V·S〕阿巴库莫夫是贝利亚的人。未与贝利亚核实前，他从不向任何人通报审查情况，甚至不向斯大林汇报。

我本从未真正参与此案的审查工作，但是我承认可能在判决

书上签过名。在当时，一个案件结束——如果斯大林认为必要——他就会在政治局会议上签署判定令，然后传给在座的人——签名，而我们甚至看也不看就签上自己的名。这就是所谓的“集体判决。”

与斯大林通常处理人民的敌人的方法比较，列宁格勒案件还算是一个公正的典范。它给人以表面印象：此案的办理是按正常司法程序来的。审查人负责审理，起诉人起诉。最后是法庭审判。被告人被传到法庭接受讯问，列宁格勒组织的积极分子也应邀旁听，宣读判决书之前，被告人也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几句。

后来有人将沃兹涅先斯基被宣判处决前说的话告诉斯大林，当时我也在场。沃兹涅先斯基当时站起来发泄对列宁格勒的不满。他诅咒从顿巴斯来列宁格勒学习的那一天，说列宁格勒在他到来前就已卷入了阴谋事件，它早已受各类反革命势力支配，从比伦^①到季诺维也夫。显然，沃兹涅先斯基已失去理智。将比伦和季诺维也夫混为一谈真是瞎扯。在如何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与斯大林的相抵触。你可以赞成或反对他。而我始终是站在斯大林一边，因此我也反对季诺维也夫及其追随者。可是比伦，那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

我不清楚库兹涅佐夫和其他几个人最后说了些什么。但是，不管他们说什么，对他们的命运都毫无影响。早在判决被正式通过，审讯开始之前，他们就被定罪判刑了。事实上，他们一遭逮捕，就由斯大林本人判决了。

许多人在列宁格勒被杀，还有许多由列宁格勒调往其他地区

^①比伦就是臭名昭著的冯比伦伯爵，后来的考兰特公爵。他是个出身相当微贱的日耳曼人。安娜·伊凡诺芙女皇登基前，他是她的情人和秘书。比伦后来成为俄国历史上最令人憎恶的暴君之一。后因作恶多端，玩弄权术过甚，被流放西伯利亚20年。

工作的人，也遭同样命运。

至于柯西金，他的性命也危如累卵。幸而在列宁格勒被捕定罪的人在他们的口供中对他的指控荒唐可笑。证词中尽是一些各类荒诞不经的话。因他与库兹涅佐夫有姻亲关系，起初性命危在旦夕。尽管他曾与斯大林关系密切，但是他还是突然被解除了一切职务，被调往某个部工作。对他的指控犹如一道阴影，以致我简直无法解释他是如何保住了性命。就象他们说的，柯西金一定抽到了一张吉利的彩票，这才使那只不祥之杯脱手〔这是赫鲁晓夫最喜欢用的词〕。^①

在那些日子里，任何事都可能落到我们某个人身上。一切都取决于斯大林扫视你时他碰巧在想什么。有时他会盯着你说：“你今天怎么了？怎么老要避开我的眼神？”或是说些类似的蠢话。他随时都可能事先不给你警告就将矛头指向你。一个有理智的审问者对待一个顽固的罪犯，也不会象斯大林这样对待应邀与他共餐的朋友。

布尔加宁曾经很好地描绘过那些日子我们都曾遇到过的事情。一天晚上吃完饭，我们离开斯大林家时，他说：“你是以朋友的身份来斯大林家的，但你从不知道是自己回家去呢，还是被人用车送——去监狱！”当时，布尔加宁酒已过量，但是他却准确地道出了我们当时日复一日的危险处境。

^①对于柯西金如何幸免于难迷惑不解的不仅仅是赫鲁晓夫一人。其原因很可能是柯西金设法置身于党内阴谋之外而专心志力于行政和经济工作。尽管他在列宁格勒党组织中是个突出人物。1952年苏共十九大之后，斯大林召回他，让他担任扩大了的主席团候补委员。

第二节 斯大林的反犹太主义的斗争

这章叙述中最为有趣的部份之一是赫鲁晓夫竟也谴责起反犹太主义。有罪感一定在这里起了某种作用。目前还没证据表明赫鲁晓夫本人曾积极参与反犹太主义政策的泡制，但是却有证据表明他不时发表毁谤犹太人的言论，并坚持认为犹太人就应守规矩。赫鲁晓夫童年时代也许曾因帝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毛骨悚然过。但是，他并不喜欢犹太人。担任乌克兰首脑时，他对纳粹的大屠杀（包括在基辅郊外巴比亚尔的屠杀）都保持沉默。按照斯大林的政策（后来他也把它当作自己的），他拒不承认在苏联国土上犹太人遭受的苦难比非犹太人深。他对斯大林战后将犹太人由乌克兰放逐到西伯利亚腹地，也一定视而不见。他关于个别犹太人在此期间的命运的话倒还是真的。不过，他本应多说些。关于米赫尔斯被害得到官方证实以及可怜的洛佐夫斯基命运的侧面消息也还是有趣的。顺便提一句，“秘密报告”中对这些都未提及，关于莫洛托夫的妻子被捕监禁的事在那个报告中也未提及。另一方面，“秘密报告”提到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消灭大批少数民族（鞑靼人、彻岑人、印古什人等等）以作为对他们与德国人相“勾结”的惩罚，这要比本章提到的多。同前面关于大清洗的章节中提到的一样，赫鲁晓夫对于暴力和暴政的猛烈态度也在本章中出现。他说：“我完全同意抓人，”但又补充说，抓人要以适当的方式。

我们正在将德国人赶出乌克兰时，一个叫作苏维埃情报局下

属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组织出现了。该组织的活动是收集有关我国的资料和苏联军队反对共同敌人希特勒德国的资料——自然是些正面资料，并把这些资料发给两方新闻界，主要是美国，在那里有一个规模大、有影响的犹太人社团。该组织的成员都是在苏联有地位的犹太人。在中央委员会委员，前国际工会主席洛佐夫斯基的领导下，还有依地语剧院最著名的演员米赫尔斯，以及莫洛托夫的妻子捷姆丘任娜同志为委员会成员。我想最初这个组织是莫洛托夫建议成立的，尽管也可能是斯大林的意见。苏维埃情报局以及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认为对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利益以及我们的政策都是必不可少的。^①

每当我到莫斯科，洛佐夫斯基都要与我联系，有时打电话向我索取反希特勒法西斯的宣传材料。我下令准备这些有各类作者签名的材料。然后他们将这些材料寄往美国，在那里被用来广泛宣传红军的胜利或揭露德国人在乌克兰的暴行。总的来说，洛佐夫斯基的工作是很值得的。他精力充沛，有时他几乎固执得让人讨厌。实际上，他常向我强索材料：“就这么点？给我多一些，多些！”当时我们正忙于重建经济的工作，没有很多时间来应付。

^①洛佐夫斯基作为苏联官方发言人是西方新闻记者们很熟悉并深受他们尊敬。1948年人们就再也看不到他了并深深怀念着他。不久人们才知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突然解散后，他和一些犹太作家一起被处决了。赫鲁晓夫是在1956年会见一个加拿大共产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到“克里米亚事件”的。著名的犹太演员米赫尔斯也是在此时销声匿迹的，不久人们就知道他也被处决了，虽说未被证实。他的哥哥是被诬告参与投毒的克里姆林宫医生之一，米赫尔基本人也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入这所谓的阴谋集团。莫洛托夫夫人（捷姆丘任娜）也算是个重要人物。她曾负责国家化妆品托拉斯（该托拉斯向苏联青年提供香水和唇膏）。冷战初期，莫洛托夫对西方采取了强硬态度。在这个时候，对他妻子的被捕和被流放，他不得不袖手旁观，忍受着痛苦而毫无怨言。

这类事情。可他就是不放过我：“你一定知道将我们敌人的嘴脸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他们的暴行以及宣传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正在进行的重建经济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乌克兰一解放，洛佐夫斯基委员会的成员们就起草了一份文件送到了斯大林处。文件中建议：赶走克里米亚鞑靼人之后，克里米亚应成为一个苏联管辖的犹太苏维埃共和国。斯大林认为这背后有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苏维埃情报局在插手。他断言，该委员会的成员们是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试图建立一个犹太国以便从苏联手中夺取克里米亚，为美国在我们的海岸建立一个前哨基地，从而直接威胁苏联的安全。斯大林任凭自己的想像胡乱发展并产生了疯狂报复的念头。洛佐夫斯基和米赫尔斯遭逮捕。不久捷姆丘任娜也被捕。对这批人的调查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最终以悲剧收场。洛佐夫斯基被处决，捷姆丘任娜被流放。起初我还以为她被处决了，因为除了斯大林，任何其他人都得不到消息。处决谁，饶恕谁全由斯大林自己决定。

我记得莫洛托夫曾来向我征求对这整个事件的意见。他插手此事显然是因为捷姆丘任娜。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逮捕捷姆丘任娜的必要性上，意见从来就有分歧。当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免去她在中央委员会里的职务时，其他人都投了赞成票。莫洛托夫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而是弃权。斯大林对此很生气。这件事改变了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态度。他开始怀有恶意地找莫洛托夫的麻烦。卡冈诺维奇的敌意就是莫洛托夫处境危险的特别灵敏的晴雨计。受斯大林的煽动，卡冈诺维奇扮演一条恶狗的角色。一旦他感觉到某个政治局委员遭到斯大林的冷落，他便会向他扑过去撕碎他的肢体。这次卡冈诺维奇被放出来扑向莫洛托夫。

斯大林去世后，莫洛托夫告诉我说捷姆丘任娜正在流放中，我才知道她还活着。我们一致同意释放她。贝利亚将她释放，并一本正经地将她交给了莫洛托夫。贝利亚常向人描绘莫洛托夫是

如何在内务部他的办公室与他妻子团聚。莫洛托夫因妻子还活着而欣喜若狂地扑进她怀里。贝利亚当时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同情，但又提醒他们是因为他的积极努力才使得她获释。他的话里流露出一丝讥讽。

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在俄罗斯共和国或乌克兰境内是否有必要再建立一个犹太国或自治区？我认为没有必要。一个犹太人自治区已经建立，它名义上仍存在，因而没有必要在克里米亚再建立一个^①但这一问题基本上没讨论过，因我们已习惯于接受斯大林的推理，屈从于他的绝对权威。他争辩说，如果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那么，流行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会在我国获得一个立足点。这就是实质所在。他已决心要专横地，不顾任何法律准则逮捕所有和此事有关的人，而不顾他们在战时帮助揭露德国人暴行中所起的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他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而现在却变得毫无价值了。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丧失了生命。我认为整个事件是个耻辱。斯大林本可以只拒绝他们的建议并指责他们。但不，他必须消灭所有积极支持这一建议的人。只是由于某种奇迹捷姆丘任娜才保全了性命而被长期地流放。其中较典型的例子是对依地语剧院最伟大的演员米赫尔斯一个文化人的残酷惩罚。他们象野兽一样将他杀害，还是秘密的。而凶手们却得到奖赏，受害者得到了厚葬。真不可思议！后来说米赫尔斯是死于车祸。实际上他是被人推入车底的。这件事干得很巧妙。是谁干的呢？斯大林干的，或者至少是受他的旨意。斯大林去世后，我们打开国家安全部的档案室并审讯了贝利亚的人，发现他们也曾计划以同样方式谋杀李维诺夫（莫洛托夫的前任外交部长）。他们计划在李维诺夫由莫斯科前往乡间邸宅

^①这是指的是划归为苏联犹太人居住的西伯利亚比罗比江自治共和国。实际上它名存实亡，因而可以理解只有少量的犹太人前往该地定居。

的路上伏击他的车，将其杀害^①。

后来，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的一批犹太人被送上了法庭。斯大林也认为他们的背后有美帝国主义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插手。当然，这纯属胡说。这类事情的发生完全是斯大林的专横统治以及他那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威所致。

现在我似乎还是难以相信这种事竟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我完全赞成抓人，但对被告人应给予公正的审判。只有通过正当方法证明他们确是刑事犯或政治犯之后才可以对其判流放或监禁。起诉和审判都应按法律准则进行。审判应公开进行。这样，才会使人们相信被告确是犯了罪。人们就不会出来为受到惩罚的人辩护，公众舆论也会真诚地支持办案机关。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让人们在法庭上扯着嗓门，拍着胸脯发誓自己指控的真实性并断定被告就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全都不真正了解所发生的事。一个证人往往不真正了解所谓犯罪经过，更不了解被指控罪犯扮的角色就举手赞成消灭被告。总之，这都不是真正的审判，而是由3套马车支配的秘密审判。这3套马车是谁呢？他们就是包办逮捕、指控和审判被告的3个人。斯大林时期大部分丢掉性命的人就是这种法庭审判的。

我曾试图给斯大林以应有的评价和承认他的功绩。但对他性格上最主要的缺点——对犹太人的敌视态度——，我打心里是决不会原谅的。作为一个领导人和理论家，他处处留心绝不让自己的反犹太主义在自己的著作和讲话中流露出。更何况上帝禁止任何人公开斯大林私人谈话中流露出的尖锐反犹主义。当斯大林偶然谈到犹太人时，他经常以人们熟知的，夸张的语调模仿犹太人

^①苏联外长M·M·李维诺夫的职位在1939年他的“集体安全”运动失败后由莫洛托夫接替。这里第一次提到了有关谋杀他的计划。他最后是病死的。

的谈话方式。这一语调也是那些当嘲笑犹太人消极性格时轻视犹太人谈话的愚昧落后的人常使用的。斯大林也喜欢这种语调，而且还很会模仿。

我记得在莫斯科工作时，第三十飞机制造厂出了一些麻烦，报告通过党的渠道由国家安全部门送到了斯大林处。一次跟斯大林一起开会时，我们正交换意见，斯大林转向我说：“应该将棍棒发给工厂里表现好的工人，这样下班时他们就可以将那些犹太人狠揍一顿。”斯大林说这些话时，在场的不是只有我一人，还有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也在场（然而卡冈诺维奇不在场。他在场时，斯大林不发表反犹言论）。我当时在思索，“他在说什么呀？他怎么能这么说？”

我们会后离开时，贝利亚讥讽地问我：“怎么，你手上有了令箭了？”

“是有了，我父亲不识字，但他从未参与帝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种屠杀是可耻的。可现在我这个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却收到了这样的命令。”

尽管斯大林向我发出了直接命令，我知道，如果斯大林建议的事发生了，如果公众知道了这件事，无疑会设立一个委员会，罪犯也将受到严惩。斯大林会不顾一切地公开惩罚反犹主义。不管有无命令，他会绞死任何破坏他名誉的人，尤其在不可原谅的，可耻的反犹主义这个问题上。

我由乌克兰调到莫斯科后，接替我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职务的麦尔尼科夫以及科罗特钦科和我在一起都在莫斯科^①。斯大林邀请我们去附近别墅吃饭。斯大林向他们灌酒，并达到了目的。

^①科罗特钦科是个实权人物，在乌克兰仅次于赫鲁晓夫，1947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45年任乌克兰主席，一度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麦尔尼科夫接替了赫鲁晓夫乌克兰第一书记的职务。

麦尔尼科夫和科罗特钦科是第一次上斯大林家。他们拚命喝。他们将斯大林的款待视为一种荣誉。我比他们更了解斯大林。他喜欢让别人喝醉，而好客并不是他脑子里想的主要事情。他喜欢使人们进入一种舌头不听使唤的状态，从而让他们说出某些事。如果他们头脑清醒，对这些事，会认真考虑。这一切正在进行时，我心情紧张地坐在那儿。我必须对麦尔尼科夫负责，因为是我把他叫来莫斯科的。对于科罗特钦科，我没过多的话说。我知道他诚实但缺乏创见。当时斯大林似乎无法隐瞒自己的反犹主义。他开始发表反犹言论。麦尔尼科夫本人对此事的态度使他很容易接受这些言论。对斯大林开始说的这些事，他是有准备的。他和科罗特钦科一言不发地听着斯大林。饭后，我们离开了。麦尔尼科夫和科罗特钦科回乌克兰。

我调到莫斯科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指定我兼管乌克兰共产党的活动。这样，我就收到乌克兰所有的报纸。主要的报张由我自己查阅，其他的交给我的助手们去看，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消息，再由他们向我报告。那次在斯大林别墅吃饭后不久，我的助手舒伊斯基交给我一份乌克兰报纸，并指给我看一篇批评某些错误的社论。这篇社论指名批评了16个人，而且是犹太人。我看后很气愤。怎么能允许发生这类事呢？我立即明白了风向。麦尔尼科夫和科罗特钦科都是典型的乌克兰人。他们认为斯大林正在发起一场批评犹太人的运动。于是他们就开始自己行动，还以为是在效法斯大林。我打电话给麦尔尼科夫，说：“我看过你们的社论。你们应感到羞耻。你们怎么敢让这种事出现在报纸上！什么，这是在召唤反犹主义！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误解了斯大林的意思。记住，如果斯大林看到这篇社论——嗯，我知道作为乌克兰第一书记的你会发生什么事。这是乌克兰党的中央机构在鼓吹反犹主义！你怎么会就看不到这是在向我们的敌人提供反对我们的炮弹？我们的敌人会利

用这一丑闻说：乌克兰举起了反犹太人的旗帜、反犹太主义的旗帜！”^①

麦尔尼科夫开始为自己辩护，接着就是抽噎。我并没有就此放过他：“如果这种丑闻继续发展下去，我将亲自向斯大林汇报。”当然，我这是在冒险，因为我不能肯定我们的谈话没被监听，我也不能肯定麦尔尼科夫不会亲自给斯大林写信，说：赫鲁晓夫给他的命令与他在斯大林处得到的相抵触。斯大林是决不会容忍我那样做的。

不久，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夫夫人）收到一封寄自基辅的信，告诉我另一件麦尔尼科夫与反犹太主义有关的事。在基辅，有一个儿童骨结核病诊所。诊所负责人是弗鲁米娜教授。在我调到莫斯科之前，我们住在基辅的日子里，弗鲁米娜教授经常到我们家来。我儿子谢廖沙（谢尔盖的爱称）患结核病时，她为他治好了病。谢尔盖现在完全复原，再也没有这疾病的迹象。这主要归功于弗鲁米娜。另一位骨结核病专家、列宁格勒的一位院士曾告诉尼娜·彼得罗夫娜，治疗这种病没有比弗鲁米娜更好的专家。后来我们搬到莫斯科，弗鲁米娜给尼娜·彼得罗夫娜来过一封信，告诉我们她在诊所的工作被辞退了。其理由据说是她缺乏必要的资格。我很气愤，又给麦尔尼科夫挂电话：“你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这又怎么可能——以这样的借口开除一位深得人心的人？你怎么能说她不够资格。列宁格勒的那位院士说在骨结核病方面没有比她更在行的了？谁能对她作出不同的评价并说她不够格？”麦尔尼科夫开始为自己辩解。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有许多人出来向你保证一切事情都办得合情合理。我说：“你这简直是在给共产主义抹黑！”据我回忆，弗鲁米娜是恢复了原职，

^①说到麦尔尼科夫的反犹活动，赫鲁晓夫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战后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任职期间，乌克兰就有一大批犹太人被放逐。

但是，反犹太主义的暴行还在继续。

为什么这种可耻现象会不断出现？部分原因是反犹主义在过去的日子一直很盛行，难以消除。老一辈的人一定记得那无数次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一定记得杜马〔沙皇议会〕^①内“黑帮”的主要代表人物弗拉基米尔·普里什凯维奇。

我童年时期在顿巴斯曾亲眼目睹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从我父亲工作的矿场到学校有4俄里路（二又三分之二英里）。一天我由学校往家走。这是个晴朗的秋天，蜘蛛丝象雪花样在空中飘荡。我们那天是赤着脚（从春天到深秋我们总是那样）。每个村民都梦想能有一双靴子。我们这些孩子们如能有双靴就算幸运了。我们用衣服袖子擦鼻子，用一根绳子当裤腰带。这天天气的确美，我们大家的心情也愉快。路上我和同学们遇到一位驾马车的人。他一看见我们就停下马车哭了起来。“孩子们，如果你们知道他们正在尤索夫卡干些什么就高兴不起来了！”我们加快了步子。一到家，我就扔下书包就往尤索夫卡跑。到了镇上，我看见一大批人排队站在铁路边成堆的铁矿石上。这些矿石是由克里沃依罗格运来准备炼铁炉冬天用的。红色铁矿石堆边上留下了矿工们来往于尤索夫卡市场踏出的小道。我看见哥萨克们已在那里。响起了军号声。我以前从未见过士兵。在尤索夫卡也没有驻军。因而现在这些对我们倒是件令人兴奋的新鲜事。军号吹响时，我周围工人中的老兵解释说，这是准备射击的信号，很快就会听到第一排枪响。人们涌向坡的南边。士兵们将工人们挡在镇外。第一排枪响了。有人在喊他们是朝天放的枪，另外一些人叫喊说他们放的是空枪，只有一两个士兵是实弹，只想吓唬吓唬犹

^①所谓“黑帮”是一个极端反动的组织、其经费由沙皇秘密警察提供。该组织对改良主义者、革命运动的支持者以及犹太人采取恐怖行动。这类组织中对犹太人进行最残暴屠杀，最可恶要算“俄罗斯人同盟”。

太人。对正在发生的事，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直至天色很晚了，人们才散去。第二天我们矿场的工人们开始夸耀自己拾到了多少靴子和其他一些战利品。一个人说他得到了10双靴子。有些矿工谈论着“意第人”（对犹太人的蔑称——译者注）是如何手拿小旗，肩扛“他们的意第”，高呼咒骂俄罗斯人的口号游行等场面。俄罗斯人用棍棒向他们进攻时，他们躲进一家皮革厂。俄罗斯人放火烧了这家工厂，那个“意第沙皇”也就活活被烧死在里面。

这场屠杀开始后第二天，我直接由学校奔尤索夫卡去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量抢劫活动还在继续。我看见钟表修理店已遭抢劫。抢劫者们拆开垫子，将羽毛从犹太人家的窗口向外抖，弄得羽毛沿街飞舞。

接着有谣言说是有命令，3天之内对犹太人可以为所欲为，任你抢劫。3天之后，与“黑帮”一道利用工人的落后思想挑起这场屠杀，警方开始插手恢复秩序。但是对所有这些抢劫和暴行不作任何处理。下令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人遵守了他们许下的诺言：3天完全交给“黑帮”，所有抢劫和谋杀不受任何限制。我听说许多遭毒打的犹太人在工厂的医务室，于是我决定和我的一位朋友，还有一个小男孩一起去那儿看看。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情景。被打死的犹太人尸体一排排地躺在地上。

后来，工人们醒悟过来了。他们认识到这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沙皇警察为反对所有人民而策划的阴谋。当工人们看到工厂罢工的许多领导人是犹太人，政治集会上很吸引工人的主要发言者也是犹太人时，他们意识到犹太人不是他们的敌人。

深秋季节，我父亲的兄弟马丁带我到乡下去。父母让我和他去乡下是因为他们想让我更接近土地。我父亲来矿场工作前是个雇农。那时我们家很穷，现在仍然是。母亲靠给人洗衣服赚点额外收入。放学后和星期六，我常给人刷洗锅炉赚几个戈比。我父

母，尤其是我母亲，一直渴望有一天回到乡下，能有间小屋，一匹马，一小块自己的地。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和父亲住在矿上，有时又和祖父住在库尔斯克乡下。顿巴斯罢工开始时，我动身去了乡下。当时红旗到处飘扬，到处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我由乡下回到镇上听说了发生的一切，听说了罢工的组织和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绝大部分是犹太人。这些演说家深受人们赞扬。工人们都热情地谈论着他们。他们认识到自己受骗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并因没有抵制“黑帮”和警察对犹太人的迫害，而深感羞愧。

数年后，斯大林掌了权。他不但不作根除反犹太主义的榜样，反而顺其发展。反犹太主义就象斯大林自己脑袋里的一个肿瘤在不断发展。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在阻止它的继续发展方面作了一点工作，但仅仅是一点点。不幸地是，我们这个体制中仍存在着反犹太主义的病毒。显然，对它没有作出有效地抵制。我的卫士们并不是坏人，但甚至同我谈话时，也会冒出一些反犹太主义的言论。

第三节 斯大林的理论著作

赫鲁晓夫在这里提到了斯大林周围的人都无法理解的一个方面。斯大林希望在共产主义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他毕竟是很高文化的，还是神学院的学生）。他觉得有必要为他的某些活动创立理论根据。斯大林在语言学方面的活动（赫鲁晓夫对此一窍不通）对于了解斯大林的思想是很重要的，然而这些却很少引起西方的注意。此篇提到的格鲁吉亚学者一定是语言学教授N·Y·马尔的门徒。

1950年天，多年没有公开发表讲话的斯大林（除偶尔回答特许记者的提问外）突然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批判马尔理论的长篇的、难解的文章（《真理报》读者中几乎很难找出听说过马尔的人）——接着又发表了他的“答记者问”，详尽阐述了他的观点。《真理报》的读者们给弄涂了。但问题的本质是：马尔曾在官方的同意下用马克思的一些术语争辩说，语言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即：在适当的时候，随着全球共产主义的发展，语言的差异将会消亡。到时只会存在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斯大林决定，这是制止这种不鲜明的国际主义的时候了。未来的语言将是俄语。所以，有必要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证明语言是社会不变基础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它的上层建筑。斯大林在语言学方面的这一反击的收获不小，如赫鲁晓夫所说，斯大林必定从这场大规模理论演习中得到了极大满足。

赫鲁晓夫在这里提到的斯大林理论工作的第二例子是苏共十九大前夕发表的题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最后发表前必定分发给大会发言者以及代表们去领会其精神。然而大家对它并不十分理解。这是篇冗长而又沉闷乏味的论争性文章。但是就在这篇文章里却包含着对将来有着重要思想。1952年10月以前，斯大林在任何场合都接受列宁有关世界革命必须通过战争的这的论点——战争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解体的重要因素。原子弹的出现使得这一理论变得毫无价值，即使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仍死守这一信仰，然而，在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他终于宣布，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苏联现在如此之强大，加上运气好，又决策好，它可以置身于未来战争之外，而让资本主义列强们在争夺日益缩小的世界市场的斗争中去自己毁灭自己。

苏共十九（1952）之际，斯大林就已经是伟大的思想家并写出了许多理论著作。这一切开始于十九大前几年，当时他被卷入一场有关语言学的论争。这是场很奇怪的争论，无论如何对他是毫无用处。他邀请一位朋友——一位格鲁吉亚学者——吃饭，由于某种原因，他们谈起语言学。后来斯大林开始写有关语言学的文章，攻击他的这位格鲁吉亚朋友。斯大林晚年就是这样开始理论工作的。

斯大林在经济上也一显身手。他组织公开辩论并发表自己的理论。他逝世前曾口述并分期发表他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要求每个人认真学习研究。要求全党坐下来仔细研究他的小册子。斯大林甚至建议，十九大上发言者都要论述他提出的理论问题。马林科夫在向大会作的总结报告中，对斯大林的理论大加赞扬。除我之外，所有其他人都这样做了。这倒不是因为我有胆量或是聪明，或是因为对斯大林的著作持批评态度，因而在我的发言中只字未提他的理论。不，这是因为十九大上我还不是正式的发言者。大会要我作有关党章的发言，而党章中又没有迫使我去提到斯大林有关语言学和经济学著作的东西。再者，马林科夫在他的总结报告中，已经谈得够多的了。

一个美好的夏日，我们都聚集到斯大林的别墅，共进典型的斯大林式的晚餐，既长久而又痛苦的晚餐。突然伏罗希洛夫开始发表最为奇怪的长篇议论。“柯巴”他说——他常叫斯大林的这个绰号——“你看过某某学者到处散发的那篇文章吗？”接着伏罗希洛夫开始用各种脏话骂那位学者。“看，他就是这样一块废物，这样一个恶棍。他如此如此地写……你不记得了？你没看过吗？”

斯大林说：“不，没有看过。”

伏罗希洛夫看看我们大家。我们都说没看过他谈到的东西。

马林科夫说他倒知道某位经济学专家曾写过一本书，并要求科学院组织一个研讨会，专门讨论他的理论。我记不起这位学者的名字了，但听起来象是乌克兰人。他一时冲动给中央委员会写信，要求我们进行干预，以使他的著作得到应有的重视。马林科夫继续说，这位学者把他的书也寄到了中央委员会。伏罗希洛夫听到这里又是一连串地辱骂那位学者：“应该逮捕这个骗子，逮捕他。”

斯大林支持伏罗希洛夫：“这头猪！逮捕他。”

过了一会儿，斯大林狠狠训斥我们在挑选工作人员时太粗心。他抱怨说秘密文件正是通过我们的秘书泄露出去的。他说要调查看谁是个罪犯。我们全迷惑不解地看着他，心想他这回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突然，斯大林对我说：“是你，赫鲁晓夫！就是通过你的秘书处泄露出去的。”

我说：“斯大林同志。我可以肯定没有这回事。我的助手们都是可信赖的。我很信任他们。他们是忠诚的党员，所以他们中完全不可能会有人泄密。”

“那又怎么样？秘密还是通过你秘书处的某人泄露出去了。”接着斯大林告讲我们他的经济学著作中阐述的某些观点与伏罗希洛夫大骂的那位学者的观点几乎字字句句一样。“他是怎么弄到我的著作的？”他问。“他怎么会知道我写了些什么？他不可能偷听。这就是说他得到了我口述并发给你们们的材料。现在他倒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发表了。”

斯大林越说越生气。这时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至少明白了他为什么责备我。那位学者有一个乌克兰人的名字，而斯大林知道在我的秘书处里有一些乌克兰人，其中就有我的助手舒伊斯基，一个无可指责的老实人。就这样舒伊斯基和我手下其他的乌克兰人都受到了怀疑。斯大林认为他们是泄密者。我意识到他在试图使我不知所措而承认。这是他的一贯伎俩。他会盯着你的眼

睛，就某件事指责你，看你眼睛眨不眨。

第二天早上，我去莫斯科委员会办公室叫来了舒伊斯基。

“你认识这位某某学者吗？”我平静地问他。

“不，我不认识他。”

“你也从未听说过他吗？”

“不。我听说过这个人。”

“他是你熟人吗？”

“不，我从未见过他。”

“好了。把他的档案拿来。”

舒伊斯基将这位学者的档案拿给我。我认真看了档案，发现他尽管有个乌克兰人的名字，但他实际上是个西伯利亚人。他祖父早已由乌克兰的波尔塔瓦搬到西伯利亚。这位学者本人自1918年或是1919年以来就是党员，他曾经历过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即在国内战争期间作为一名党的战士，参加了反对白卫军哥萨克人的斗争。

第二天我就告诉斯大林：“斯大林同志，你问过我有关这位学者的事。我看过了他的档案。你知道，他根本不是来自乌克兰，甚至并不是出生在乌克兰。他祖父早已离开了乌克兰，他是西伯利亚人。”我试图证明我的秘书处并没卷入这场“泄露机密”事件。

斯大林凶狠地盯着我咆哮道：“见鬼！”他因错怪了我而表示歉意时常这么说。接着他语气缓和地说：“那么，他是西伯利亚人，是吗？”

“是的，他是西伯利亚人。在那儿你也找得到有乌克兰名字的人。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有许多人在远东，在加拿大以及我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我就这样成功地将这对我的攻击挡了回去。但斯大林并未就此罢休。他仍然耿耿于怀，就因为他的理论与这位被他称为“半

瓶子醋”学者的理论相吻合。别人是不允许提出与他相同的观点的。只有他斯大林才是天才。任何新的东西都必须由他来说，别人只能重复他说的，并将他发现和公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法则加以传播。现在可好，西伯利亚的某个默默无闻的傻子，竟然出来写与斯大林相同的东西。

如果斯大林是客观的，如果他不是那样自私，如果他能持自我批评的态度去分析自己的理论，那么就不难看出，早在他开始写和出版自己的著作前，那位“半瓶子醋的党的理论家”就已写出了这本书。实际上，正是这位西伯利亚学者可以对斯大林说：

“你剽窃了我的理论，因为你已得到了我的论文。”毕竟，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人有重大发现的事是常有的。任何一位伟人在成为伟人之前都是普通的人。但斯大林从不承认这种可能性。只要他还活着，只要他还是伟大的领袖，在理论问题上他就必须有绝对的决定权。

这件事的结果是这位西伯利亚学者被开除党，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受辱、被捕入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这人就是写了篇论文。也许这篇论文不好，甚至也许具有危害性。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直接把它送给中央委员会的！这是他自己的观点。他是位老党员，是位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战士。可现在人们反将他污为罪犯。他犯了何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而只知道他写了篇令斯大林不快的经济论文。如果伏罗希洛夫当时没提起这件事，这位学者也许还坚持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官僚，而此事也就此了结了。可如今，他被捕入狱。

斯大林去世后，我们释放了他。他向莫斯科委员会就他的遭遇提出控诉，并将他的愤慨矛头直接指向我。当然，他对我在这件事上的作用一无所知。他批评我没有出面干预，没有赏识他的著作。也许他的著作值得重视。但无论怎么说，它从没带来任何影响。那些在这件事上追随斯大林，吹捧斯大林著作并攻击这位

西伯利亚学者的所谓学者们，在斯大林去世后，无意改变他们的观点。或许这个人从未得到过他应有的赏识，但这不由我去判断。经济学是门高度专业化的科目。就让经济学家们去研究他的论文，去评价，去分析，并将它放到书架上它应放的地方吧。

斯大林经济学著作“泄密”事件并没因这位西伯利亚学者的逮捕而结束。我使斯大林相信此事与我的秘书处无关之后，他得出结论，这件事一定是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泄露出去的。这真令人震惊，因为波斯克列贝舍夫为斯大林工作了多年，他是斯大林的一条忠实走狗。谁能相信他会泄露官方机密呢？他不可能与任何人有什么阴险的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大家都怕他，躲避着他。他并不傻，他手中积聚了极大权力以致他也摆起了架子。他为人傲慢，蔑视任何失去斯大林宠爱的主席团成员。例如，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失宠的时候，就常遭到他粗暴的对待。波斯克列贝舍夫能令人难以忍受地攻击别人。因为他接近斯大林，所以他能在所有我们这些人之前，就知道谁受到了斯大林的怀疑或使斯大林不满。任何遭到波斯克列贝舍夫攻击的人，就可能是下一个牺牲品。

可如今他本人倒突然受到了斯大林的怀疑。自然，他波斯克列贝舍夫能接触所有有关文件。其中许多就是斯大林口述，他写下来的。斯大林在口述时常踱来踱去。他无法坐着思考，而是一边走着一边口述。他从不用速记员，而总是向波斯克列贝舍夫口述，然后再由波斯克列贝舍夫向他重读一遍。如果波斯克列贝舍夫将某些观点记错了，如果斯大林想起了更准确的词句，再由波斯克列贝舍夫对手稿作些修改。在这里我想给予斯大林应有的评价。直到他去世前，他都能清楚和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的阐述短、但容易理解并切中要害。这是斯大林伟大天赋之一。斯大林在这方面具有既不能否认又不能贬低的巨大力量。任何了解斯大林的人都钦佩他的这一才华。正因为此我们为能和他在一起

工作而感到骄傲。

斯大林撤换了波斯克列贝舍夫。波斯克列贝舍夫被打入冷宫。我相信如果斯大林再活更长时间，无疑，波斯克列贝舍夫会遭逮捕并以叛徒罪名而被除掉。斯大林对此事的最后定论是“我抓到了泄露机密材料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别人是不可能干出这事的。机密文件是通过他泄露出去的。就是他泄露了机密。”某些机密！斯大林所说的那些已泄露出去的东西，实际上已经公开发表，那还谈得上算是机密？

第四节 苏共十九大

斯大林1952年10月主持第九次党代会时已是一个仅有不到5个月寿命的年老病人。有关斯大林当时的情绪，赫鲁晓夫在这一章中也提到了。正如他在“秘密报告”中说的一样，他在这里的暗示，斯大林正着手开始另一场新的大清洗，消灭他的一些最亲近的同事——旧政治局的成员。但是赫鲁晓夫只满足于暗示。他不谈斯大林一系列行动的真正意义。他根本不提他本人与马林科夫（与贝利亚结盟）日益激烈的权势之争。当然，这次大会是由斯大林支配的。尽管他在会上只作了仅仅7分钟的发言。两位主要演员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作了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赫鲁晓夫作了同样重要的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两位竞争对手的地位就这样超过所有资历比他们深的人。看来很可能当时斯大林正打算提拔他们作联合继承人，而同时又在他们之间进行挑拨离间。赫鲁晓夫此间没有提到的是他们在各自讲话中恶毒地诽谤中伤对方——马林科夫攻击赫鲁晓夫流产的农业改革，

尽管没有指名道姓；赫鲁晓夫也就党内腐化和混乱对马林科夫进行攻击。

1952年，斯大林将我们召集到一起，建议说我们应该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他用不着说服我们。我们都认为13年没开一次党代会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就连中央全会也有很久没开了。中央委员会作为决策和协商机构多年未开会。^①总之，党，尤其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在集体领导中未起任何作用。斯大林绕过中央委员会自己决定一切，他把政治只是当作一块小小橡皮图章来使用。斯大林很少向政治局成员征求对某项措施的意见。他只作出决定，颁布命令。

最后我们决定在1952年10月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有一段时间，斯大林闭口不提大会议程以及他想让谁在会上发言。我们试图猜测斯大林是否想自己作总结报告或是让别人作。如果让别人，这人又是谁呢？我们估计如果他不自己作，那意味着是他体力不支，无法在主席台上站立那么长时间。当然他可以将他的发言分发给代表，而不必自己宣读。

斯大林最后决定了大会议程并宣布总结报告由马林科夫作。他又继续说：“党章的报告由赫鲁晓夫作，五年计划的报告由萨布罗夫作。”萨布罗夫当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任。^②斯大林的命令被立刻记录下来。我们无声地听着并接受了给我们的指

^① 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3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任务是选举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然后从该委员会中选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以及其他领导机构的成员。斯大林自1939年以来不召开代表大会，无视中央委员会，自己任命政治局成员等等。

^② M·Z·萨布罗夫是个工程师。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任职。他1947年就是副总理，但直到1952年才进入中央委员会。之后，他的地位迅速上升。1957年他因支持对赫鲁晓夫的“反党集团”而陷入极严重的困境。

示。第十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就是这样决定和被接受的。

我承认在受命准备党章报告时，我很紧张。当然，这项任务对我是个极大的荣誉，但同时我知道，就这样一个特殊的题目准备一份需集体通过的报告是困难的。我也知道在我提交报告草稿时，可能会遭到某些人的攻击——尤其是贝利亚，他还会拉上马林科夫一道攻击这个报告。事情还真这样发生了。斯大林从未看过我的报告。他指示马林科夫、贝利亚以及我本人审阅所有的报告。贝利亚坚持认为我的报告太长，应该缩短。最后大量东西被删去了，以至后来我的报告只花了近一小时就读完了。我认为报告中的实质性东西，并未因缩短而受到影响。删去的只是些为说明某些陈述而加上的例子。为充实我的报告，我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日丹诺夫的作法，在报告时加进些例子。日丹诺夫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上（1939）年曾在他的党章报告中用许多例子。我不知道这些例子有多大必要，但我考虑既然这种报告的特定格式已被认可，那么我照办就是了。^①

你们也许会问斯大林为何不让莫洛托夫或米高扬作总结报告呢？他俩在党内的地位要比马林科夫高，而且又是党内著名人物。我们这些在战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中，就有人认为莫洛托夫是我们未来的领袖，最有可能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但是战后，我们的这种想法消失了。十九大前后，斯大林在每次会议上都要攻击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他们两人失宠了，连生命都难保。

大会召开了，报告也作了，接着是开始讨论。讨论的时间很短。当时党内的气氛很难有助于对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进行辩论。会议接近尾声时，我们讨论了萨布罗夫的五年计划报告。这是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最糟的五年计划。此项计划制订得很差，陈述得也差。斯大林去世后，我们被迫承担起完成此项计划

^① 赫鲁晓夫关于他处理讲话稿的方式的叙述是很有吸引力的。当时他的生涯正处于关键时刻，读起来确是像他说的那样。

的责任。因为这个计划是无法实现的。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而只好对它做些修改。按理说，一个文件一旦被党代会通过再加以修改是不可想像的。但这是个特殊的例子。我们都清楚，这项计划是行不通的。据我回忆，为寻求某种修改这个计划的民主方式，使它提出的目标符合现实，我们甚至将修改建议分发给代表们。总之，我们采用了这个我们唯一能使用的方式。

斯大林在大会结束时发表了自己的讲话。他的讲话只有六至七分钟。但大家都热烈鼓掌，欢呼他是个天才，等等，等等。斯大林离开主席台后，大会休会。我们聚集到主席团休息室。斯大林说：“瞧！我还能作报告。”他还能作报告，怪啦！他还能在主席台上讲上六至七分钟。他认为这是个伟大的胜利！作六到七分钟的讲话对他来说，是难以想像的困难。他认为自己身体还行，能继续工作。

党的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并建议成立25人的主席团。他从口袋里拿出几份文件，宣读了新的主席团人选名单。他的建议和人选名单未经讨论就获通过。我们也都习惯了这不民主的程序。对于斯大林的建议是不会有疑问或评论的。他的“建议”就是上帝给的命令。对上帝发出的命令你是不会讨价还价的，而只是表示谢意和服从。斯大林念名单时，我们都低着头在座位上辗转不安。25个人！这样大的一个集体无疑是难以工作的，决定某些事也是困难的。

会议结束时，我们都交换了下眼色。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名单是谁定的？斯大林对多数他刚任命的人不可能全熟悉。这份名单也不可能是斯大林亲自订的。我承认，起初我以为马林科夫是幕后人，而瞒着我们大家。后来我以友好的方式试探他：“喂，我想你插手了此事。可我也觉察到其他人在这儿也起了作用。斯大林一定作了些调整，是吗？”

马林科夫答道：“我发誓与这份名单无关。斯大林甚至没有

要我帮忙，我也未对主席团的组成提过任何建议。”马林科夫的否认使这件事更神秘了。我不能想像贝利亚会与此事有关，因为名单上有些人贝利亚从未向斯大林推荐过。但我还是问过他这件事：“拉甫连季，这名单是你向斯大林推举的吗？”

“不是。起先我还以为是马林科夫。可他发誓与此事无关。”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与此事当然无关。布尔加宁对此事也一无所知。我们一直在盘算谁是幕后人。它的作者自然是斯大林本人了。可又是谁协助他的呢？波斯克列贝舍夫负责斯大林的私人秘书处，可是他不用马林科夫控制的机构，是不可能制订出这份名单的。如果用了，马林科夫也会知道的。马林科夫班子里有许多为他工作了多年的人，即使接到斯大林的密令，他们也会向马林科夫报告的。所以我们都给弄糊涂了。这份名单仍然是个谜。现在我根据某种迹象猜测，斯大林全然越过马林科夫而使用了卡冈诺维奇的协助。有些人在党内鲜为人知，斯大林也一定不知道他们是谁。但卡冈诺维奇知道他们。他也许向斯大林介绍过这些人，所以他们才出现在这份名单上。

你看到了我们有什么样的领导。斯大林看来是控制着代表大会，他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新的主席团。但事实上，他却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我记得曾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交换过会意的眼神。新的主席团人数太多，无法一起工作。其成员又太杂。选出的25人都是不同类型，具有不同程度的功绩。他们都得到了党的信任，无疑都是可尊敬的人。但是，他们中许多人对重要的工作毫无准备。^①

^① 任命25人主席团取代人数少政治局使所有不知情的人大吃一惊。但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和我们一样不知内情吗？有趣的是，这些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由马林科夫的人（专家治国论者）和赫鲁晓夫的人担任，分配极为平均。用斯大林常爱用的一句话说，这显然决不是巧合。值得注意的是候补委员中包括阿·尼·柯西金和列·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在列宁格勒事件后曾遭到冷遇后又重新起用。勃列日涅夫当时完全是赫鲁晓夫的门徒，这次是首次出现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斯大林显然是想扩大党的最高机构，以掩盖计划中的清除党内资历深的成员。

斯大林念主席团新的组成人员名单时，我认真地听着并猜想莫洛托夫、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会不会在里面？我对此有怀疑。因为他们都遭到了斯大林的冷遇。间谍和人民的敌人等罪名随时会降临他们的头上。但是却没有，他们也在名单之列。我认为这是个好兆头。

斯大林念完名单后，说因为这样一个大的主席团太不方便，所以我们还得从主席团选出一个局。^①这个建议是毫无法律根据的。党的十九大上我们刚通过了新的党章，还没有对主席团局作出什么规定。我们已经在违反党章了！斯大林说该局的成员与主席团相比，要更经常碰头开会决定所有提出的问题。他建议该局由9人组成并直接任命其成员：斯大林本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别尔乌辛^②以及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莫洛托夫被排斥在该局之外，但伏罗希洛夫却入选了。他的入选是奇怪的，因为早在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失宠前斯大林就对他产生了怀疑。我十分遗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未能进入该局。我认为他们应该进入。在全体会议上，斯大林讲了话，就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不应得到党的信任，作了令人十分吃惊和混乱的解释。他说他们看来象是某些西方国家的代理人。当然，这是毫无逻辑根据的。如果他们是外国代理人并不应得到我们的信任，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被留在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内呢？不管怎样，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事实上还是被排除在政府领导圈子之外。但我还是很高兴地看到伏罗希洛夫进入了该局。我想斯大林最后终于意识到把伏罗希洛夫当作英国间谍是个错误，天知道还

^① 当时人们设想应该有个由斯大林宠爱的部下组成的小的内阁或局。它的确切组成人员至今不为世人所知。

^② 米·格·别尔乌辛是主张专家政治论的部长之一（象萨布罗布），他们以搞工业而出名。在斯大林的晚年，他们迅速上升到最高领导阶层。别尔乌辛本人在反党集团失败后也遇到了麻烦。

有什么。今天或明天谁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完全取决于斯大林的丰富想像力。

党的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建立了庞大的主席团以及全体会议上又选出新的主席团局。这以后我们的工作仍按所有这些所谓变化和改进行前的模式进行。斯大林从这9人局中又选出5人成立一个核心小组，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和善慈。应邀与斯大林会面是个很大的荣誉。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被邀请一次而没有第二次，那又被认为是个不祥之兆。这通常的5人核心小组成员是：斯大林本人、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斯大林很少邀请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他从未邀请过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事实上，主席团从未召开过会议。所有问题都由主席团局决定。该局通常指的是5人核心小组。所有决定都是按斯大林1939年以来实施的方式作出的。十八大之前，政治局多少还保留着一些民主方法。但渐渐地民主让位于专制。自从消灭了七大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成员之后，斯大林就常怒气冲冲地发布命令，压制辩论。这些我们称作为“老人们”的基本成员自十月革命以前一直为建立我们的党而斗争。

当时就是这样的集体领导。

第五节 医生的阴谋

1953年1月，克里姆林宫医生们以毒死安德烈·日丹诺夫和其他苏联要人的罪名而遭逮捕，拉开了斯大林最后一次大清洗的序幕。这次清洗旨在消灭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首先是贝利亚，是也可能是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赫鲁晓夫在这里就所谓医生阴谋谈到了一件新鲜事：这个案件在1952年

10月十九大前的某些时候就已开始在编造了。否则，赫鲁晓夫也不会知道大会期间给他看病的医生将要被指控。如果他不是把时间搞错了。他说的这点留下了极难闻的气味。的确，赫鲁晓夫在这个罪恶阴谋中所扮的角色是可疑的。非常接近赫鲁晓夫的谢·杰·伊格纳捷夫当时已取代贝利亚的支持者阿巴库莫夫，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1952年他在安全部门积极参与残酷清洗贝利亚的人。不管有无心脏病，他的任务就是捏造证据陷害医生（正如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提到的，那封所谓雷季娅、季马舒克的信显然是个骗局），对他们严刑逼供。斯大林死后对这件事进行重新审查时，正是贝利亚本人公开谴责这个骗局，并断言伊格纳捷夫应对此事负责。不久，罗利亚连同他的主要助手们包括阿巴库莫夫，被捕处决。据赫鲁晓夫说，伊格纳捷夫1932年曾一度危在旦夕，后又复出成为赫鲁晓夫书记处的成员。赫鲁晓夫对此事简短的叙述转移了人们对这个事件更广泛含意的注意力以及对这个事件细节上仍隐匿的事实注意力。赫鲁晓夫将这件事只看作是斯大林攻击象医生这样的无辜者的卑鄙行为的一例。这些不幸的医生（大多是犹太人）只不过成了这场主要针对某些赫鲁晓夫同事的行动中的抵押品。这个行动也是想使苏联犹太民族陷入一场大屠杀之中。

一天斯大林将我们召到克里姆林宫，给我们念了一封一位名叫季马舒克的女医生的来信。她断言，日丹诺夫之死是因为负责给他看病的医生有意使用不适当的治疗方法，其目的就是想致他于死地。自然，如果这是事实，那将是最残暴的犯罪行为。医生去毁灭生命而不是去拯救生命，是最可恶的罪行。

如果斯大林是个正常人，他就不会认真对待季马舒克的信。那些精神不正常或是阴谋策划消灭自己敌人的人，常会写类似的

信。但斯大林却容易相信这类作品。事实上，我相信这个季马舒克本人就是斯大林政策的产物。斯大林一直向我们脑子里灌输猜疑心，认为我们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应设法找出暗藏的叛徒或破坏分子。斯大林称这为“警惕性”并常说如果一份报告有百分之十的真实性，那么我们就应将这整个报告视为事实。可是我们又如何在季马舒克这封信里找到百分之十的真实性呢？

斯大林的“警惕性”使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了一座疯人院，在这里人人都被怂恿去搜寻别人身上并不存在的事实。儿子反对老子，老子反对儿子，同志反对同志。这被称为是“阶级斗争的态度。”我认识到这类阶级斗争只能无情地分裂家庭、分裂同志。它决定了家庭每个成员的地位。我赞成阶级斗争的无情斗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美好的未来，它是必要的。我知道阶级间的战争不是节日的欢乐游行，而是残酷的、曲折的斗争。我本人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国内战争期间，我参加了红军反对马赫诺夫、格里戈里耶夫、安东诺夫等残余匪帮以及仍逍遥法外的白匪残余分子的战斗，那时我开始懂得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北高加索当时确是遍地土匪。我本人也参加了组织人们反对这些匪帮的会议。一次，我们一些人与政治部主任福尔曼诺夫一起照像。事后我的一位在陆军政治部工作的战友薇拉·舒茨基娜给我送来这次拍的照片，她现在是养老金领取者。我很高兴她还活着，生活得也好。我不知道当斯大林的屠杀正在进行时，她是如何保全了性命的。甚至早在反对哥萨克白匪的斗争还在北高加索进行时，列宁以他的远见就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人道。他尽一切力量避免伤害无辜的人。即使他看到某人有罪，他也会尽力使他改正而不是去惩罚他。如果某个人犯过错，列宁就会努力去支持他重新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首先是消除此人的消极因素，然后渐渐使其回到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积极斗争中来。但是列宁时代已过去，我们进入了斯大林时代。一个病人的不合理的政策使我们大家都感到

恐怖。

说到季马舒克的信，我应该指出克里姆林宫医生是为日丹诺夫看过病。这些人都只会是医术最高，最受信任的人。只有那些在苏联医学界著名的，受到很大尊敬的医生才会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工作。可是他们却像普遍罪犯一样被捕入狱。

日丹诺夫去世前，有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好。我不知道他患了什么病。但是，他的病之一是丧失了意志，一喝起酒来就无法克制。他样子很可怜。我记得在他临死前的一个时期里，斯大林常冲着他大声叫着让他不要喝酒。这倒是件令人惊奇的事，因为斯大林通常是怂恿别人喝，一直喝到醉。强迫日丹诺夫喝水果汁而我们其余的人却喝葡萄酒或较烈性的其他东西。很容易想像，如果斯大林这样阻止他，回到家日丹诺夫就会完全失控。这种恶习也曾使谢尔巴科夫送命，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日丹诺夫的死亡。

我决不是将谢尔巴科夫和日丹诺夫相提并论。斯大林去世后，我意识到我们的知识界同日丹诺夫在关闭列宁格勒一些报刊杂志中起的作用，而对他怀有很深的怨恨。但也应记住，日丹诺夫只是在执行斯大林的命令。我认为斯大林的文化政策，尤其是通过日丹诺夫对列宁格勒施行的文化政策，是残酷的，毫无意义的。^① 你不能用棍棒和粗暴地发布命令来规定文学、艺术和文化的发展。你不能为艺术家规定条条框框，让他们不能越雷池一步。如果对艺术家控制太严，那就不会出现对立的观点，结果是没有批评和没有事实，只有沉闷的无用的老一套。这老一套不能使人民

^① 这里提到的是日丹诺夫对艺术进行的被称为日丹诺夫的大清洗。它是1947—1948年的一大丑闻。杂志被停刊，著名的作家遭到批判，著名作曲家不得不被迫承认过去所谓的错误，并保证为大众创作。事实上，这是一次文化恐怖。

获益于艺术，反而会毒害人们，扼杀人民与艺术的关系。

总而言之，与日丹诺夫事件有关的医生都遭逮捕。其中包括V·N·维诺格拉多夫。他曾给斯大林看过病。这倒是个少有的荣誉，因为斯大林几乎从不让医生给他看病。但斯大林还是没放过他，将他逮捕并对他进行毒打。我是在他获释后才认识他的。他曾多次被叫来商量我的健康问题。受人尊敬的医生和教授V·K·瓦西连科也遭逮捕。我本人并不十分熟悉他，但我却从很尊敬的斯特拉热斯基那里听说过许多有关他的好话。我在基辅就认识斯特拉热斯基。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享有盛名。战后他让我将瓦西连科调出陆军，让他去他指导的诊所工作。“瓦西连科是我的学生，”斯特拉热斯基说。“我想让他接替我以便让诊所落在可靠的人手里。”斯特拉热斯基的诊所是他十月革命前创建的并享有很高声誉。当开始逮捕时，瓦西连科正在中国。他被召回国，一踏入苏联国境就被投入监狱。

我记得党的十九大上，我作过党章报告后就病倒了。大会讨论我的报告时，我在家不能出席。我在家躺了数天，一位年纪大的医生来给我看病。他听了我的心脏，又将耳朵贴在我的胸上。我深为他的认真态度而感动。当时我很难过，倒不是因为我的病，而是因为我已看过指控他的证词。可就是这位医生对我健康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斯大林也不会放过他。

维诺格拉多夫和瓦西连科等人被捕后，斯大林印发了有他自己批语的季马舒克的信。在他的批语里，他力图激起人们对这些医生害死日丹诺夫的“犯罪行为”的愤慨。随后，一下涌出更多这样指责这些医生是卖国贼的信件。这些信反映了人民的意见。他们相信如果斯大林发表这份文件，也就是说，医生们罪行已得到证实。他们对发生这样的事很气愤。

当时身体有病的科涅夫^①也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断言有人也曾用毒死日丹诺夫的药毒害他。科涅夫的信正好符合了对这些医生们的诬告。显然主席团内所有成员都意识到他的指控缺乏证据。但我们从未公开讨论过这件事，因为一旦斯大林下决心处理某一件事，别人是无法阻止的。我们聚在一起私下交换意见时也承认，我们对科涅夫的信很气愤：既然被指控毒死日丹诺夫的凶手是在幕后，那么这封信就会扩大可疑对象的范围并激起斯大林对所有医生的不信任。

审查开始了。我亲耳听到过斯大林对当时的国家安全部长谢·杰·伊格纳捷夫说的话。我认识伊格纳捷夫，也知道他身患重病（几乎致命的心脏病）。他性情温和、体贴人，很受大家喜爱。我们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斯大林常在我们在场时在电话里粗暴地训斥、威胁他，要求他将医生们关进监狱，将他们绞成肉酱，磨成粉末。可以想像，几乎所有医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是不足为奇的。我不能责备他们自我诽谤。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各种各样的人，诚实的人，卖国贼、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一辈，以及破坏分子都和这些医生一样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以麦列茨科夫为例。他的生命已接近尾声，走道都是一跛一跛的。他就承认自己是英国间谍。克里姆林宫的医生的处境也一样，他们也坦白了。^②

^① 伊·斯·科涅夫元帅是二次大战中的著名将领。后来他也倾向于玩政治阴谋。他先后担任过苏军地面部队总司令（1947年朱可夫离职后的继任者），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华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据说另两位元帅、一位将军和一位海军上将也曾遭到这些不幸的医生的毒害（非致命）。

^② 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立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并撤销了对医生们的指控。但是已有两名医生死于审查中。

所谓医生谋杀案就是这样出笼的。这是件可耻的事。二次大战后，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成长了起来，并达到了世界水平。可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或至少包括这些医生，突然成了斯大林怀疑的对象。所谓医生案是个卑鄙可耻的诬蔑案。

早在1902年，马克耶夫卡（顿巴斯的一个城镇）就曾因为霍乱而发生骚乱。骚乱中这一地区的医生遭到毒打。我记得在我年轻时（大约是1910年），顿巴斯霍乱流行。在我和父亲工作的矿场有许多矿工危在旦夕。病倒的矿工被送到霍乱病患者收容所，凡是送去的人就再没有回来过。于是矿工内谣言四起，说是医生们正在毒死病人。接着有证人出来说他们曾看见有人往水井里投毒。这种荒唐的说法我听得多了。如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同样的黑暗势力又重新抬头，又公开迫害知识分子和医生。

第六节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卡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女儿、她与她父亲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的印象，可以与斯维特拉娜·阿里露也娃写的两本书（《给一位朋友的二十封信》和《只不过一天》）相对照。尽管有些小的出入，但总的来说，斯维特拉娜进一步证实了赫鲁赫夫的陈述。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叙述中将自己说成完美无缺，而将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叙述的年代常常不清，但斯维特拉娜在书里证实了赫鲁晓夫说的有米高扬插手替她说话以及赫鲁晓夫的仁慈态度的事。不幸地是，就在斯维特拉娜和布雷杰什·辛格认为最关键的时候，赫鲁晓夫被罢了官。现在该是柯西金和苏斯洛夫禁止他们结婚，后又禁止她将布雷杰什·辛格带回印度去死。布雷杰什·辛格真的死去

后，斯维特拉娜才被允许将他的骨灰带回印度，而当局却力图让她马上回国。当时的苏联驻印度大使别涅季克托夫（赫鲁晓夫说他是过分严谨的人）着实吓了一跳。别涅季克托夫曾是农业部长，后被赫鲁晓夫降了级。当他们被召回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对苏联公民们期望什么的评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斯大林性格残忍、脾气暴躁。但是他的残忍并不总是意味着他对那些他粗暴对待的人怀有恶意。他的残忍是一种天生的残忍。他对任何人都是粗暴无礼。我本人就体验过他的粗暴。斯大林还是喜欢我的。如果他不喜欢我，如果他对我哪怕有一点怀疑，他随时就会用除掉许多他讨厌的人的方法来除掉我。不止一次，他粗暴对待我之后又会向我表示好意。可是上帝是禁止任何种类的道歉的！不，道歉是不符合他本性的。有一件事例可以说明他是如何听任自己去侮辱和谩骂那些与自己最亲近的人。

事情发生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一次斯大林邀请我们去他附近的别墅庆祝新年。我们情绪都十分高。新年啊！我们又可以因一年的成就而提高我们声望！桌上放满了各类小吃。我们吃了一顿很丰盛的饭，喝了大量的酒。斯大林当时情绪很高，因而也喝了很多酒，并要其他人也效仿他。那天大量的酒喝光了。

斯大林又走向唱机，放上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民间音乐唱片。我们听着并随着唱片唱了起来。接着他又换上舞曲唱片，我们开始跳舞。我们之中有位公认的舞蹈家，这就是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他所有的舞步都是根据“莱兹琴卡”（一种高加索民间舞蹈）。接着伏罗希洛夫开始跳舞，我们也都跟着跳了起来。我跳舞时不移动双脚，就像站在冰上的母牛。但我还是加入了跳舞的行列。卡冈诺维奇也跳起了舞。他跳舞并不比我高明多少。显然，布尔加宁年轻时就开始跳舞。他试着跳某些隐约有

着俄罗斯节奏的舞。斯大林也张开双臂拖着步子跳了起来。虽然他以前是从未跳过的。遗憾的是那次莫洛托夫没在场。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还是个大大学生时，他就参加过许多学生舞会，也会跳学生们常跳的舞。他喜爱音乐，还会拉小提琴。总的来说，他是位很有音乐细胞的人。我在这方面可是个外行。事实上，我也是位很不称职的评判员。但在我眼里，莫洛托夫是位一流的舞蹈家。

我想指出的是当时的聚会总的气氛很好。后来斯维特兰卡（斯维特拉娜的爱称）出现了。我不知道她是应召而来还是自己来的。说得婉转些，她发现自己处于一群比自己年长的人当中。这位未喝醉的少妇一到，斯大林就让她跳舞。我可以看出她当时很疲乏。跳舞时她几乎不动步子。她跳了一个就想停下不跳了。但她父亲仍坚持让她跳。她走过去站在唱机旁，将肩斜靠在墙上。斯大林走向她，我也跟了过去与他们一道站在那里。斯大林徘徊着说：“喂，继续跳啊。斯维特兰卡，跳吧，你可是女主人啊！”

她说：“爸爸，我已跳了，现在我很累。”斯大林一听这话就一把抓住她的额发将她拉起来。我可以看到她脸一下变红，眼里积满了泪水。我很可怜斯维特兰卡。斯大林死命将她拉到舞池。

这就是你看到的父亲对子女的慈爱。毫无疑问，斯大林是很爱斯维特兰卡。他也爱瓦夏。但他却对瓦夏的酗酒和不守纪律很不满意。斯维特兰卡可不同，她是个好学生，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品行就很好。我从未听过有关她的坏话。斯大林很爱她并以她为荣。可他就是这样表示父爱的！他如此粗暴不是因为他想使斯维特兰卡痛苦。不是的，他这样对待她是一种爱的表示，只不过是特有的不正当的、粗暴的方式。

正如我说过的，我对斯维特兰卡的母亲，娜杰日达·阿里露也娃怀有很高的敬意。她和斯大林完全不一样。我一直喜欢她的

虚心。瓦夏（瓦西里）是个好孩子，人很聪明但很任性。很小时他就开始大量饮酒。他是个不守纪律的学生，很使斯大林伤心。我想斯大林一定常鞭打他并让契卡监督他。

斯维特兰卡则不同。她还是小孩子时，我们每次去斯大林家，她都在房里来回转着。斯大林总是称她是“女主人”。我们也这也称呼她。她总先打扮得很漂亮，穿一条乌克兰的小裙子和一件绣花衫，就象个经过打扮的玩具娃娃。但同时她有着和她母亲一样的金棕色头发和雀斑。“女主人”是在我们眼皮底下长大的。我记得我们每次去，斯大林就会对她说：“女主人，招待客人吧。”她就会跑进厨房。斯大林解释说：“每次她生我的气，她总会说，‘我要去厨房向厨师告你。’我总是恳求她，‘饶了我吧。如果你告诉厨师，我可完了！’”于是斯维特兰卡就会坚决地说，如他再做错事，她就去告发她爸爸。

斯大林的大儿子雅沙（雅可夫）是他第一位妻子（一位格鲁吉亚妇女）所生。雅沙是位工程师，我从未结识他。我去斯大林家，雅沙也很少在场。他与他妻子和女儿住在别处。偶尔上斯大林家吃饭，他也是一个人，从不带上他的妻子和女儿。

后来娜佳（娜杰日达的爱称）自杀了。她死得很神秘。然而她死是因为斯大林做了某些事的原因。斯维特兰卡一定知道其原因。甚至有谣言说是斯大林开枪打死了她。据另一种我认为更有道理的说法，娜佳自杀是因为她作为妇女的尊严受到了侮辱。斯维特兰卡肯定是知道些有关母亲死的事，所以她才这样痛苦。

娜佳死后，我们每次去斯大林家，瓦夏和斯维特兰卡都好。我也习惯于见到斯特维兰卡。我很喜爱她，对她就象父亲。我对她有一种人类共有的怜悯心，就象对一个孤儿一样。斯大林是粗暴无情的，他从不表示任何父亲的慈爱。有时斯大林对她也不是很粗暴，但他一直是冷淡无情。斯大林每到一处总要在他与别人的关系上留下不愉快的痕迹。他具有恶霸的个性。斯维特兰卡与

她父亲的关系是复杂的。斯大林爱他女儿，但他常用粗暴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爱，就像一只猫对一只老鼠。他首先使一个小孩子，尔后是一位少妇，接着是一位有了孩子的母亲的心破碎了。这一切渐渐地造成了斯维特兰卡心灵的崩溃。斯大林总是独自去度假，他从不带上孩子们。即使动物也想得到母亲在阳光下的抚爱。所有生物都需要慈爱。一个人如被剥夺了这种爱，精神上就会受到打击而忧郁成疾。而这种事恰恰就发生在斯维特兰卡身上。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将斯维特兰卡带大的。我记得曾看见过一位年轻漂亮的格鲁吉亚妇女和她在一起。有人说她是斯维特兰卡的家庭教师。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教师或从哪儿来的。有谣言说她是贝利亚安插的，是为贝利亚效劳，而不是斯维特兰卡。后来有一天她突然消失了。

斯维特兰卡与一位叫莫罗佐夫的结了婚。他的名字倒是俄罗斯人的，但他是个犹太人。他们一块生活了一段时间。斯大林容不下他。任何场合我都没看到斯大林邀请过他。就在斯维特兰卡生下第一个儿子后，我想斯大林也从未见过他。这件事也使斯维特兰卡很痛苦。战后，斯大林突然被一股反犹主义浪潮所支配。就这样，斯维特兰卡与莫罗佐夫离了婚。他是位聪明的人。我听说他现在是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和经济学方面的一个学位。简言之，他是位优秀的、诚实的苏联公民。

斯大林叫斯维特兰卡与她丈夫离婚前显然同马林科夫就此事说了些什么。马林科夫的女儿沃利娅（一位很好的姑娘）嫁给了在马林科夫班子里工作了多年的一位朋友香伯格的儿子。后来有一天马林科夫的妻子瓦列里亚·阿列克赛叶夫娜·马林科娃（一位我很尊敬的妇女）告诉我沃利娅和小香伯格离了婚又嫁给了一位建筑师。我不打算去比较这两个人。那是沃利娅的事。我想她的第二位丈夫也是个好人。但我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甩掉她父亲的朋友香伯格的儿子。当时我对此事很迷惑不解。马林科夫不

是一位反犹主义者，他也从未肯定地告诉过我，斯大林不赞成他女儿嫁给一个犹太人。但我肯定即使斯大林没有直接与马林科夫说，马林科夫也会从别人那儿听到斯大林命令斯维特兰卡与她的犹太丈夫离婚的事。毫无疑问，马林科夫也意识到他最好也让他女儿这么做。这段插曲是我已谈到过的可耻的反犹主义的另一表现。我倒不是将这种情绪归于马林科夫。就他来说，这只不过是对主人的屈从而已。斯大林让她女儿与一个犹太人离了婚，马林科夫也这样做了。总的来说，我认为马林科夫是位正常的，健康的人。他倒未受到这可耻的弊病的毒害。

后来斯维特兰卡第二次结婚。斯大林让她嫁给了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雷。他现在是罗斯托夫大学的校长。我一直很喜欢他，现在仍然是。他人很聪明，受过良好教育，又通晓事理。斯大林也喜欢他，可斯维特兰卡却不喜欢他。斯大林死后他们就离了婚。我为这整个事感到遗憾。我从不喜欢听人们议论斯维特兰卡的坏话和她对丈夫的不忠诚。她独自生活了很久。这样议论她是不近人情的。她有两个孩子，一个和第一个丈夫生的儿子，一个和小日丹诺夫生的女儿。揭露她父亲滥用职权的事，对她又是一次严重打击。

后来米高扬告诉我，斯维特兰卡曾向他征求过意见。她想嫁给一位印度记者（布雷杰什·辛格）。她告诉米高扬她爱这个人。他岁数比她大，但她认识他很久了。他是个正派的人，一个共产党员。米高扬说：“她叫我去了解他的态度。我很吃奇，她会来征求我的意见。就我而言，这是她自己的事。”我对米高扬说：“如果她认为他是个好人，就让她嫁给他。这由她决定吧！无论她怎么决定，我们也不要干涉。如果她的确爱他，他不是苏联公民这件事，也不应成为什么障碍。”所以她和他结了婚。我对此是满意的。我只是想让她能够自己生活。

可是这最后使人难以忍受的一击落下来了——她第三位丈夫

的去世和葬礼。

我谈了这么多有关斯维特兰卡的事，其部分原因是她现在很不幸。当我得知她回她丈夫家乡埋葬他并再不回来时，我还想这是那些资本主义记者们最近编造的谎言。有好几天我拒绝相信这件事。我不明白她是怎样走这一步的。她抛弃了自己的祖国和孩子。她给了敌人议论苏联生活方式的材料。她让社会主义的敌人利用她斯大林女儿名字来损害我们的国家。一个苏联公民竟做出这样的事是不能原谅的。尽管这样，我仍为她难过。每当想到她和她的不幸，我就想起涅克拉索夫的几句诗：^①

林中空旷地的景象使她两眼涌出泪珠，
她记得这里曾长着一片茂密的桦树林。

一想到斯维特兰卡，我就会落泪。她的结局使我悲伤。从她一生下来，她的命运就很复杂，从来就是不顺利。但这些都成为原谅她干下的事的理由。如今每当我想起她，这些事仍使我悲伤甚于愤怒。

我没有看过她的书，但从收音机里我听到过它的摘要。西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广播了这些段落。也许我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不能代表全书。但广播里听到的起码听起来是奇怪的。听起来作者象是在精神或感情崩溃情况下写的。例如，她在书中写道，她常在胸前划十字并说她笃信宗教。我认为她从未真正信过什么宗教。她的书有着某种奇怪和病态的东西。我无法相信它。一个在我们这个社会长大的苏联公民，怎么会写出这类东西呢？

她跑到西方去是个严重的错误。这是绝不能开脱的。但是这件事还有它另外的一面。斯维特兰卡做了些蠢事，可她同时又是被愚蠢地对待了——愚蠢而粗暴地。显然，在她丈夫的葬礼之

^①尼·阿·涅克拉索夫是十九世纪红诗人，上述诗句摘自他的《萨沙》一诗。

后，她去了我们驻新德里的大使馆。别涅季克托夫是我们在那儿的大使。我了解他，他只是个过分严厉的人。斯维特兰卡说她想印度待几个月。但别涅季克托夫劝她马上回苏联去。他这样做是愚蠢的。一个苏联大使劝一位苏联公民立刻回国，就会使这个人起疑心。斯维特兰卡很熟悉我们这方面的习惯。她知道这意味着是对她的不信任。这倒不是指生活上，而是意味着不信任——政治上的不信任——意味着她有个不祥的结局。这是个无礼的、侮辱人的战术。它甚至会使意志坚强的人心发慌。斯维特兰卡不是这样的人。从她的书里就可清楚地看出她是不坚强的。她彻底垮下去了并求助于国外势力。她的背叛，部分是因为我们的一些人使用警察手段而不是对一个苏联公民表示尊重。

我认为这事应该怎么办呢？我相信，如果不采用那种方法去对待她，这件不幸的事就不会发生了。斯维特兰卡到大使馆说她想印度再待两三个月的时候，他们应对她说，“斯维特拉娜·依奥西福夫娜，为什么就二、三个月呢？去办一个一年、二年或者三年的签证。你可以拿到签证并住在这里。然后，你无论何时准备回苏联，就可以回去。”如果她有选择的自由，她的道义感就会上升。他们应该让她知道她是受到信任的。我相信如果他们以那种方式对待她，即使她已写完那本书，她要么根本不发表它或是重写。可是他们却用这种表示，她受到怀疑的方式对待她。她是位聪明的妇女，她懂这个，这样，她才去美国大使那里。她就这样到了瑞士，再由瑞士到了美国。她永远切断与她祖国的关系。她与她的儿子和女儿以及朋友们就这么分开了。她失去了她熟悉的一切，就这样她结束了苏联公民的一生。这是很可悲的。我很为斯维特兰卡难过。我仍不自觉地这样称呼她，尽管她已是斯维特拉娜·依奥西福夫娜多年了，而不是斯维特兰卡。

假如我们采用我认为我们应该采用的方式，斯维特兰卡仍然从印度回来，那又该怎样呢？那也将是很遗憾的事，不过要比现

在发生了的事要好。正如事情的发展那样，即使在现行的颁发签证的制度下，她也没回来。斯维特兰卡身上发生的事使我很悲伤，但我仍然认为不是一切都完了，她仍可以回来。她想回到孩子们身边的想法会越来越强烈。应该再给她一次机会。她应该知道，如果她回来还是会受到欢迎的，不会因当时她离开去美国时表现出的软弱而受到指责。当然，我不是原谅了她所做的事，也不是原谅那些促使她采用这一不正当、不合理的方式使自己陷入逃亡生活的泥沼中去的人们——他们不是去帮助她寻找正当的途径。

第七节 跟斯大林一起欢宴度假

在这一章里，没多少需要说的。它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衰老中的独裁者的逼真的和可怕的图像——也包括赫鲁晓夫及其他斯大林部下谄媚、自私自利的两面派画像。应该记住，赫鲁晓夫此时正与马林科夫进行着一场生死搏斗，并力争讨好斯大林以求获得极大的效果。任何对这基本真实性有怀疑的人应该读一下南斯拉夫的反叛者密洛凡·德热拉斯写的《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在这本书里，德热拉斯描绘了斯大林早在1947年与他的元帅们和“最亲密同事”在一起的情景：

“一个笨拙的侏儒似的人穿过一间间金碧辉煌的大理石大厅。人们为他让出一条道。喜悦的、赞美的目光跟着他。谄媚者们竖起耳朵聆听着他的每句话。而对自己和自己事业充满了自信的他显然并没注意到这一切。他的国家正处于崩溃、饥荒和精疲力竭之中。而他的军队和他的那因肥胖的因

胜利而沉醉于伏特加酒的元帅们已将半个欧洲踩在脚下。他相信下一回他们就会踏上另外一半欧洲。他知道自己是最残暴，最专制的人物。可他对此并不在乎，因为他相信是他正在实现历史的意愿。”

德热拉斯对斯大林处理事务的方式的描写与赫鲁晓夫的描写正好吻合。1947年的斯大林仍然很强壮并有坚定的自信心。赫鲁晓夫也描绘了晚年的斯大林——这个侵入罗马帝国的匈奴王式的人物已成为一个衰弱的、偏执狂的老人。他正策划想要在被消灭之前消灭他最亲密的同事们。他害怕自己厨房的食物。就这样，他仍然使他身边的人们感到恐怖。他的同事，其中也包括赫鲁晓夫，都认为在这种不公正的时刻，最合情合理的就是老实坐着，不要大发议论。

在斯大林晚年的岁月里，我们和他在一起是很难受的。政府机构实际上已停止运转。斯大林挑选了一小批人，让他们总是呆在身边，而总还有另一批人却很少接到邀请，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惩罚。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常会发现今天是属于这批人，可第二天就是另一批人。十九大以后，斯大林在新的主席团成员中又设立了一些涉及面较广的委员会来调查各种事情。事实上这些委员会因其放任自流而变得毫无用处。没有来自上面的指导，又没有指定给它们任务，因而这些委员会都是自行决定其任务，就像个没有指挥的乐队，各人都自行其是。

我们常以下述方式聚在一起举行常委会会议：没有正式会议这么一说。斯大林从他当时住的附近别墅进城就通过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将我们召集到一起。我们要么到他的克里姆林宫书房，要么最多地是到克里姆林宫电影院碰头，我们一面看电影，一面在换片的间隙谈论各类事情。斯大林在晚上七、八点钟睡过觉后就驱车来克里姆林宫。我们就在那里与他见面。他常是自己挑选

片子。这些片子通常是些人们称为战利品，许多都是美国片。斯大林尤其喜欢西部片。他常骂这些片子，对它们作出恰当的意识形态上的评价。但接着他又要新片子。这些影片没有字幕，因此电影部长I·I·鲍尔沙科夫就大声给我们当翻译。各种语言他都翻。可实际上这些语言他全然不懂。事先他让人告诉他情节，他再死命记下来，然后再“翻译”。我们常常取笑他的译文，尤其是贝利亚。鲍尔沙科夫常把许多情节搞错了或者翻译些大家都能看懂的东西。“他现在离开房间了，现在他正在穿过街道。”贝利亚这时就会插话帮他的忙：“看！他要开始跑了，他现在正在跑！”

斯大林除了上克里姆林宫电影院看电影，别的电影院他从来不去。这里装的放映机当时也算是过时的了。这座大厅现在已不再用作电影院了。我们常在那里看各种电影——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影片库是巨大的，各类电影都有。总的来说，我们不是很喜欢这些影片。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看了部阴郁的，令人不愉快的历史片。故事发生在英国。有些财宝必须要从印度运往伦敦。一路上有西班牙海盗袭击英国船只，杀死船员。开始装船运财宝时，英国人发现一个盗海船长曾在英国的一个监狱里坐过牢。他是个很狡猾的海盗，一个恶棍，一个胆大妄为的人。英国人问他是否愿意为他们干这件事。他说他愿意，但要允许他自己从与他一同坐过牢的海盗中挑选船员。英国人同意了。他们给了他一条船，于是他就驾着船驶向印度，在那里他将财宝装上了船。回来的路上，他开始一个一个干掉他的海盗船员。他的办法是：在船舱里，他把下一个要干掉的朋友的照片挂起来以提醒自己。干掉那个人并将他扬到海里后，他又将下一个目标的照片挂起来。我想这个海盗头子最后自己也被人干掉了。他们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看到电影里的这个海盗背信弃义，不禁想起在斯大林身边工作人常常失踪的

事，我们老在想，“人民的敌人也是被用这方法杀死的吗？”

每次电影结束，斯大林照例会建议：“走吧，让我们去吃点什么吧。为什么不去呢？”我们都不饿。这常常是在凌晨一、二点钟，是睡觉的时间。第二天我们还得工作。斯大林早上是不工作的，可他又不想想我们。尽管这样，大家还是都说是饿了。这种饿的谎话就像一种反射。我们都会坐进自己的车，驶向斯大林在近郊的别墅。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通常坐斯大林的车。其余的人都分散坐进各自选择的车辆。我常和布尔加宁同坐一车。从克里姆林宫到莫斯科河，我们的车队常是绕道进入些小路。我常问与斯大林同车的人：“为什么绕道而不走大街呢？”

他们回答：“别问我们。我们不决定路线，行车路线由斯大林亲自决定。”显然，斯大林有份莫斯科街道图，所以才能每次挑选不同的路线。他甚至事先都不告诉他的卫兵要走那条路。你很容易就能猜到他这是在采取措施，以欺骗那些对他生命打主意的敌人。说到克里姆林宫，那些日子没有人能随便就进去。电影院所在的那栋楼，除了对与斯大林一起来的人开放外，禁止任何人进入。

每次去斯大林别墅，我们都窃窃私语怎么门上比以前多了几把锁。门上安装了各种各样的插销，甚至还按上了路障。此外，别墅四周还筑起了两道围墙，围墙之间又有看门狗。整个别墅还安有一套电子警报系统以及其他一些安全装置。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切都是很正当的。就其地位，斯大林确是苏维埃政权敌人进攻的目标。这里没什么可开玩笑的，他采取的防范措施看来也有其道理——尽管我们如果有人想模仿他的做法是危险的。

我们一到斯大林别墅，“会议”就继续进行，如果你能称它为会议的话；这种工作制度，如果你能称之为工作的话，从战后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政治局或是主席团常委会都没有正常工作过。但斯大林内部小圈子却定期开

会，就像钟表报时一样准。如果他有两三天没有召见我们，我们就会认为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即：生病了。

他深受孤独的折磨。他需要有人一直在身边陪着。早上他一醒来就会马上召见我们，不是邀请我们吃饭，就是要和我们谈话。这些谈话本来只需要两分钟，可他总是把谈话拖得很长，为的是让我们和他多待一些时间。对我们来说，这是种无聊的消遣。的确，在这些谈话中，也决定某些国家和党的大事，但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很少。我们主要是帮斯大林消磨时光，以便让他不受孤独之苦。孤独使他忧愁。他害怕孤独。

他有一种更深的恐惧，其程度超过孤独和在去别墅的路上遭到敌人的伏击。我们每次与他一起共餐。在别人吃之前，他不动菜、点心或酒。他紧张到了这种程度。他甚至不信任服侍他多年而且无疑对他是忠诚的服务人员。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我们去斯大林家总会吃到他最喜欢的菜。厨师们做得也很好。这些菜很可口。但我们必须按以下的程序用餐：

斯大林想吃什么，在他吃之前，别人也都先分上一份尝尝。

“看啦，这是鸡杂。尼基塔，你尝过了吗？”

“喔，我倒忘了。”我可以看出他想吃可又害怕。只有我先吃了后他才会吃。

接着他又会说：“看啦，这是鲱鱼！”他很爱吃鲱鱼而且是不加盐，而我们却要放盐。我要先尝尝他的，他才会开始吃，每道菜都是这样。每道菜都有指定的试味员检查是否菜里有毒。

贝利亚是我们中间唯一不必在斯大林家当试味员的人。他除非是因为他从不与我们吃同样的菜。即使和斯大林一起吃饭，贝利亚也总是自己从家带来的菜。斯大林的老侍从马特雷奥娜·彼得罗夫娜常为贝利亚端。并用很重的鼻音声调说：“贝利亚同志，这是你的草。”我们常为此而大笑一顿。贝利亚的确爱吃绿菜，就像他在中亚细亚时一样。有时他就用手指把菜往嘴里塞。

当然他有时也用叉子，但他一般是用手指。

这些晚餐很令人讨厌。我们每次吃完回家正好是第二天早饭时间。过后，我们还得工作。白天每到中饭的时候，我都要设法小睡一下。如果不睡，斯大林邀请你吃晚饭时，你就会在餐桌旁打瞌睡。在斯大林餐桌旁打瞌睡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在斯大林家，还常常有酗酒比赛。我记得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曾不得不让女服务员往他们的杯里倒有颜色的水，以代替酒，因为他们喝酒不是斯大林的对手。

斯大林餐桌上酗酒早在战前就有的。谢尔巴科夫和日丹诺夫两人生前就是这一可耻活动的最积极的参加者——这两个也是这一活动的首批遭殃者。一次，谢尔巴科夫竟当众揭穿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让服务员用水代替酒的事。斯大林知道自己受骗很生气，大闹了一番。我们都很厌恶谢尔巴科夫。当然，我们对这件事并没有说什么。谢尔巴科夫最终饮酒过量而死——他倒不是爱酒而酗酒，而是因为斯大林身边的人喝醉能取乐于斯大林。用句简单的话说，我认为斯大林觉得让他周围的人处于一尴尬、丢脸的境地是件很好玩的事。出于某种原因，他以别人丢脸为乐。我记得有一次斯大林让我在一些党的高级官员面前跳“戈帕克”舞（一种乌克兰民间舞）。我不得不蹲坐下，抬起脚后跟，老实说，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可我还是做到了，脸上还尽量流露出愉快的表情。正如我后来对阿纳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所说的：“斯大林说跳舞，聪明人就跳。”

在这些冗长、令人烦恼的晚宴上，斯大林常说些故事来款待我们。我一直记得他是如果讲述他的第一次被流放。这段故事有助于说明他为什么喝那么多酒。当时他被送到沃洛格达省某地。许多政治犯和刑事犯当时都被送往那里。斯大林常说：“我第一次流放期间曾碰到过一些不错的刑事犯。我常与刑事犯在一起。我记得我们常去镇上的酒店。我们只要有一两个卢布，就把钱递

到窗口买些东西。然后喝光我们的每一个戈比。今天我付钱，明天他付钱，大家就这样轮流。这些刑事犯都是好人、高尚的人。可政治犯中却有许多变节者。他们曾组织了一个同志法庭，审问我同刑事犯喝酒一事。他们把这当作一种罪过来控告我。”

我不知道这个同志法庭对斯大林是怎么判决的。也没有人敢问他。我们只是互相交换着眼色。只是事后我们才交换这样的看法：“你看，他甚至年轻时就酗酒。也许这是遗传吧。”斯大林也给我们讲了他父亲的事。他说他父亲是个穷鞋匠，酒也喝得很多。他常说他父亲酒喝得太多，以至不得不卖掉腰带换几个酒钱。要知道，一个格鲁吉亚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卖掉腰带的。“我父亲曾好几次卖掉他的腰带，”斯大林说，“我还躺在摇篮里时，他就常用手指蘸着酒让我吮。他教我喝酒。”

我不知道在斯大林传记中对他的父亲写了些什么。可在我早年，曾听到有关他父亲的谣传，说他父亲根本不是工人或穷鞋匠，而是个有至少雇有10个人的作坊。这在当时也算是个大企业了。大清洗时，如这种事被揭露出来（除斯大林外），那么这个人就会受到使他难以忍受的审查。十月革命后，人们非常注重你的出身。你就会被看作是个二等公民。这是可以理解的。工人阶级是社会最革命、最坚定的阶级。它在整个历史进程中肩负着所有其他阶级的重担。所以人民对无产阶级之外的任何其他阶级，都抱有批评警惕的态度。

这里是斯大林常讲的另一个故事：

“有一年冬天，外出打猎，我带上猎枪，坐着雪橇穿过叶尼塞河。走了大约12俄里（8英里），看见树上有些鹧鸪。说实话，起初我并不知道是鹧鸪。我以前也打过鹧鸪，可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在田野里的草丛中。总之，人活着就要学习。我从近处，向它们开始射击。我只有12发子弹，可他们却有24只。我打死了12只，其余的还仍在树上。我决定拿子弹再来打。”我们已准备

好听他往下说。“回来后我发现他们还在那儿。”

我插话问：“你说什么？它们还停在树上？”

“是的，”他说，“它们还在那儿。”贝利亚催他继续说。

“我打死了其余的十二只鹧鸪。我用一根绳子拴住它们，挂在我们的腰带上，就拖着它们回家了。”

饭后，我们离去前在浴室里洗手，对他的故事不屑一顾地议论开来。他冬天走了12俄里，打死了12只鹧鸪，尔后回去拿子弹再走12俄里回来又打死12只，回家又走12俄里——总共坐雪撬走了48俄里！贝利亚说：“听听，一个高加索人从未有很多机会坐雪撬，他怎么可能走那么远的路？他在撒谎！”

当然他是在撒谎。我们对此都毫无疑问。很难说斯大林为什么感到要撒谎。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做的。他一定内心里有某种冲动。这个故事倒是个有趣的谎话，它对任何事都无伤害。但是他在一些较严肃的谈话中也常说谎。说到他自吹的枪法，我亲眼看到过他根本不会打枪，更不用能用24发子弹打死24只鹧鸪。有一次，我们在他的近郊别墅吃饭时，他拿起一支枪出去赶麻雀。他所能做的竟是误伤了警卫、他的“契卡”人员。还有一次他玩弄枪，枪走火了，几乎打死米高扬。斯大林当时坐在米高扬旁边。子弹打进地里，将砾石溅得满桌、溅满米高扬全身。大家都吓坏了，但没说一句话。

如果有什么比同斯大林共餐更糟，这就是同他一起度假。当然，能与他共餐或外出度假是个很大的荣誉，但又是件肉体上遭受高度紧张的事。如果人们意识到这是个什么样的考验，为保持关系，你要忍受多少不愉快的事啊！最友好的关系，你必须表现出来，这是你必须作出的牺牲。当然，经受这样考验也会给你带来报酬和利益。你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经常进行的谈话，并从中得出对你有用的结论。

我在莫斯科开始工作后，斯大林常邀请我和他一起去高加索

度假。这些频繁的邀请是他害怕孤独所致。斯大林一定特别喜欢我。每次他外出度假前，他常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一起去南方吧。你也需要休假。”

“好吧，”我总是说，“我很高兴与你同行”。显然，我是宁愿不去的。但要这么直说了，也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我总是和他一块去了，但也为此吃尽了苦头。有一次我整整一个月都和他在一起度假。他让我住在隔壁。这简直是受罪。我不得不将所有时间花在无休止地与他一同吃饭上。每当要求我作出这样的牺牲时，贝利亚常安慰我：“你这样看吧：总有人要受罪的，也可能是你。”

斯大林常在索契度假。他因旧日的友情常让伏罗希洛夫来索契度假。过去伏罗希洛夫得宠并担任国防人民委员时，他曾仿照利瓦季阿宫（在雅尔塔）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巨大豪华的别墅。

有一次我在索契度假。米高扬也在某地度假——我想是在苏呼米。斯大林从他的博尔若米疗养地给我们打电话。我想这是他第一次在那儿度假。他将所有在高加索度假的人，包括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贝利亚，都召到他那儿。我们就这样集到了博尔若米。住的房子倒很大，但装饰十分简陋。这房子原是个博物馆，因而没有卧室。我们常挤在一起睡觉，简直太可怕了！我们用的一切全由斯大林提供。我们的作息时间表完全不同于斯大林的。我们早上起床就去散步，可斯大林仍在睡觉。他起床，一天的工作才正式开始。

一天，斯大林召见我们，说：“拉科西（匈牙利的独裁者）已来高加索休假。他来电话，请求我的同意。”这又怎么样？这又不是拉科西第一次来高加索休假。但我们都没说什么。“最好有人给拉科西打个电话，让他上这儿来。”有人给拉科西打电话。斯大林接着说：“我每次到高加索，他怎么会知道？显然有某种情报网在给他通风报信，应该劝阻他别这么干了。”就这

样，拉科西被列入了嫌疑对象的名单。他成了某种代理人。实际上，他是如何知道斯大林到了高加索已不是什么机密。他只需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挂个电话，就会知道斯大林在高加索度假。这就是他要做的，也许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拉科西到斯大林家就和我们一块吃饭，参加我们的酒会。有一次他多喝了点，说：“喂，这儿到底怎么了？看你们这些醉鬼！”拉科西倒是直言不讳。我们都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我们还是找各种理由替自己的行为辩护。我们中没有一人愿这样生活。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对拉科西的话感到很生气。

贝利亚告诉斯大林说拉科西称我们是一群醉鬼。斯大林说：“好吧，看我们怎么对付他。”就在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时，斯大林就开始给拉科西灌酒，给他灌了两到三瓶香槟。我不知道还灌了多少葡萄酒。我担心拉科西会吃不消，因此而死去。可没有，他还是挺过来了。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了。斯大林那一整天情绪很好，开玩笑说：“你们看见我把他灌成什么样子了吗？”

斯大林在那儿待了一些时候，我和米高扬也被他多留了一阵以便和他作伴。最后我们终于得以逃脱，回到各自休假地。

斯大林到高加索常常要邀请些格鲁吉亚家乡客人，他们大多是斯大林童年时就认识的老人。我记得有位铁路工人斯大林特别喜欢。当然，他是个好人、诚实的人，还是个共产党员。他对斯大林讲了些格鲁吉亚年轻人不好的事。他说这些年轻人受过教育后在格鲁吉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他们又不愿离开。他们只是到处游荡或搞投机买卖。任何与格鲁吉亚有关的人都知道这些。可这对斯大林来说却是新闻——坏消息。斯大林后来对我说：“你知道在格鲁吉亚正在发生的事吗？年轻人不是游荡就是投机买卖。真讨厌！”

贝利亚是格鲁吉亚的头，任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书记已有多年了。我是唯一向斯大林通报斯大林出生地的情况的人。贝利亚

有效地向斯大林封锁了格鲁吉亚的真实情况。可是现在事情还是透露出来并激起了斯大林的愤怒。的确，在格鲁吉亚有些必须引起注意的不足之处。但我绝不是将这些不足之处说成是格鲁吉亚民族的过错。不，不是的。这些完全是格鲁吉亚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格鲁吉亚是苏联天堂的一个角落。它有着适合种柑橘和葡萄的温暖气候。自然，一个没有什么靠山的人，是很难离开的。再者，这里又有许多诱惑你搞投机的因素。格鲁吉亚这些不稳定因素中的恶习，在其他处于类似生活条件下的民族里也会出现。我甚至听到我的警卫人员抱怨说：“到处都是格鲁吉亚人，到处都能看到他们搞投机买卖。”我总是跟他们说，要是俄罗斯人住到格鲁吉亚，他们也会这么干的。

我记得我担任领导职务数年后，格鲁吉亚人开始搞月桂树叶的投机买卖。我告诉瓦·帕·姆日阿瓦纳泽（赫鲁晓夫派往格鲁吉亚党的头头）和克里米亚的领导人，让他们采取措施保证只在国营农场种植月桂树。他们告诉我说，现在完全杜绝了月桂树叶投机买卖。

自然，想搞点额外收入的诱惑力总是有的。这就是搞投机买卖的根本原因。这不是个民族问题，而是生活的现实。如果格鲁吉亚人搞蔬菜投机买卖，那么国家就应该在暖房和温室里种蔬菜。这样，投机商们从格鲁吉亚将这些产品运往莫斯科转销就会无利可图了。这些产品由国营企业生产，价格会便宜一些。一旦非法贸易活动被制止，整个格鲁吉亚民族就会变得崇高起来。在莫斯科的格鲁吉亚人也会甩掉投机分子的臭名。但是，斯大林从未考虑过这个合理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解决格鲁吉亚投机活动就是说要抓人和流放人。

第八节 核心圈子里的内幕

赫鲁晓夫在这里更进一步地提到了斯大林的偏执狂和报复性，其中有些可追溯到战争年代。当时他从各方面都显得是个表情严肃、沉着的最髙统帅。不过，在这里以及整篇叙述中（除偶尔的只言片语外）都没进一步谈到某些斯大林的才能。这些才能使得他意志坚强，使他能同丘吉尔和罗斯福进行认真的、有见识的争论。也许只有莫洛托夫在这方面才最有发言权。在这里还透露了斯大林“最亲密的同事们”之间一直在暗中进行的阴谋活动，尤其是贝利亚。而有关格鲁吉亚厨师的那段轶事只是个好笑的调节剂。

我记得斯大林在阿方度假时曾发生过一件惊人的事件。那一定是在1951年，因为1952年斯大林没去过任何地方度假。他不去休假，我们也不去。斯大林在阿方时把我从索契召了去，同时还把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从苏呼米召了去。一天，我和米高扬正在散步，斯大林出来站在门廊里。他似乎没注意到我和米高扬。“我完了，”他象似在自言自语的，“我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也不相信我自己。”

这可真是个惊人的自白。这种对别人的不信任，我们已看得够多了。可现在他自己也承认了，而且还是如此明确。你能想像此话是出自一个决定着这个国家命运和世界命运的人吗？不信任别人，那是一回事。即使他对别人的极端不信任表明他有严重的精神病，那也是他的权利。但是，一个人受某种驱使去干掉任何他不信任的人，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们这些斯大林周围的人都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只要他在一定程度上信任我们，我们就被允许继续生存和工作。一旦他不信任你了，他就会开始仔细审察你，直到对你的不信任达到极点。接着就轮到你去追随那些已不存在的人了。这就是所有那些为了党的利益同他一起工作、并肩奋斗的人们的处境。许多这些曾是斯大林战友的人被消灭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不知道十月革命后初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列宁临终前在他的遗嘱中说托洛茨基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斯大林却有着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所必要的品质。^①但列宁也说，斯大林是偏狭的和具有报复性的。斯大林1951年在阿方的自白让我们看到了幕后隐藏着的东西，以及他领导党和国家的年代里发生的悲剧的原因。他的统治时间很长、非常长。许多完全忠实的、无辜的人在他统治时期丢掉了脑袋。

斯大林去世前的一些日子里，我们常是一起去看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我。布尔加宁不是每次都出席核心圈子的晚餐会。斯大林的智力和体力的衰退一年比一年明显。尤其是他的智力和记忆力明显下降。当他身体还行，神志尚清醒时，他仍是令人生畏的领导人。不过他衰老得很快。我记得有一次，他转向布尔加宁，想说什么可又记不起他的名字。他盯着他问：“是你呀。你叫什么？”

“布尔加宁。”

“当然，布尔加宁。那正是我要说的。”每当这种事发生时，斯大林就变得烦恼不安。他不希望别人注意到这类事。可这

^①托洛茨基当然在加入布尔什维克之前早就是孟什维克了。作为一个前孟什维克，在列宁眼里，他不够资格当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后来又补充了一点。赫鲁晓夫这里提到的列宁遗嘱里，列宁并未说托洛茨基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些记忆力衰退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发生。这类现象常使他发疯。

卡冈诺维奇出席我们核心圈子会议的次数，甚至比布尔加宁还少。伏罗希洛夫几乎从未被邀请过。偶尔，伏罗希洛夫也会没有邀请就闯入我们的会场。有时他也会事先来电话说他要来。总之，他是几乎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的。斯大林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已有10年，这可是最愚蠢的事。^① 我不懂一个对别人的不信任竟会到这种程度。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肩并肩工作，战斗了多年。在党和工人阶级眼里，伏罗希洛夫的忠诚是不能遭到怀疑的。在他还是国防人民委员时，对他作出评价却又是一码事，工作不胜任，粗心和懒惰。可是他肯定是忠诚和老实的。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开会时，斯大林突然发起火来，问：“伏罗希洛是怎么钻进常委会的？”

我们回答说：“他不是钻进来的，而是你自己任命的。”后来，我和贝利亚、马林科夫谈到此事时，心里也很纳闷，斯大林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卡冈诺维奇比伏罗希洛夫更不讨人喜欢。但就勤勉而论，卡冈诺维奇倒是个干劲十足、工作勤奋的人。他无情地驱使自己去工作，从不计较时间。他把全部时间献给了党。他是个野心家。但那是另一回事。我现在只是在谈他的工作作风。

我记得有一次，斯大林当着我的面表示了他对莫洛托夫的怀疑。我们当时是在南方——我想是阿方——当时斯大林突然产生了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想法。这种指责的根据是什么呢？似乎是因为莫洛托夫在美国时曾坐火车从华盛顿到纽约。斯大林由此推理如果莫洛托夫是坐火车、那么他一定有自己的私

^① 尽管斯大林晚年可能会相信他的这位密友是间谍，但早在1943年他就认为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这似乎不大可能的。

人车厢。如果他有私人车厢，那么他哪儿来的钱呢？所以，莫洛托夫一定将自己出卖给了美国人。我们向斯大林解释说莫洛托夫在国外不可能有自己的私人车厢。在美国，所有车厢都属于私营铁路公司。尽管这样斯大林还是给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维辛斯基（三十年代公开审讯的首席检察官）发了电报，让他尽可能查清莫洛托夫在那儿的活动，以及莫洛托夫在美国是否有私人车厢？当然维辛斯基很快就回话说莫洛托夫没有私人车厢，也不可能有。我在这儿提到这件事是想说明斯大林晚年脑子糊涂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以及当时的领导阶层处于什么样的气氛之中。

正如我已说过的，由于斯大林的怀疑，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党的十九大以后就遭到冷遇被打入冷宫。我们都因他们的命运而感到吃惊。我们也知道，斯大林没让他们进常委会，他就一定想好了反对他们的计划。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采取了隔离政策。我本人对他们俩被排除在核心以外深感同情。我尊敬他们。我认为，莫洛托夫是位经验丰富的人，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他经常跟我谈起有关外交政策的事。他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总很有见识，合乎逻辑而且很有力。所以，我担心他被排除在核心之外会影响领导工作的质量。我也喜欢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我赞美他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尤其在外贸方面。

十九大之后，米高扬和莫洛托夫还是继续象以前一样与我们一道去见斯大林。他们不是先给斯大林打电话征得同意，而是先弄清斯大林是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他自己的别墅，然后径自而来。当然，他们总是获许进来。不过，斯大林显然见了他们并不是很高兴，而他们却尽力去接近斯大林，因为他们想拯救自己——不仅仅是拯救他们在党和领导阶层中的地位。他们想活下去。他们试图重新获得斯大林的信任。我意识到他们的处境危险并完全站在他们一边。

有一天，斯大林说：“我再也不想让这两人来了。”他命令自己的工作人人员不要告诉他俩他在哪里。后来，米高扬和莫洛托夫与贝利亚、马林科夫和我谈了一次话。我们同意尽力去软化斯大林对他俩的态度。我们也同意当斯大林到近郊别墅或去克里姆林宫电影院时就通知他们，以便让他们去那儿找我们。有一段时间，每当我们同斯大林一道去电影院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会出现在那儿。斯大林查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他说，他们是按他的命令行事，从未将他的行踪告诉过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后来斯大林注意到了我们的作法，并断定我们是他俩的代理人。一天，他突然发起了火，并没有指名道姓地骂我们，但他却盯着马林科夫，恼怒地说：“你们以为我不知道？每次去电影院你们就告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所以他们也到了那儿。不要来这一套。不要告诉他们我在哪儿。我决不容忍这种事！”

我们知道坚持是没用的。这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没有任何好处，也可能会危及我们自己在斯大林眼中的地位。没有人会愿意发生这种事。斯大林一发火，你与他的关系就可能突然恶化。所以，我们再也没提这件事，并决定静候其自然发展。我相信，如果斯大林再活更长时间，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将会有个悲惨的结局。

我还想谈一点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前一段时间内与斯大林的关系。战时，贝利亚比以往更厚颜无耻。当斯大林在我们退却的那段时间里失去自我控制，甚至失去意志时，贝利亚成了党内令人恐惧的人物。我清楚地看到贝利亚在斯大林身边人物中的势力日益增强。战时，我由前线回到莫斯科，发现斯大林为格鲁吉亚人所包围。一位为斯大林做烤肉的厨师当上了陆军少将。我每次到莫斯科，都看到这位厨师胸前的绶带和勋章越来越多，显然是因为他做烤肉的技术高超而奖给他的。有一次斯大林发现我在注视这位厨师的绶带和勋章，就很生气地瞪眼看着我。他知道我在

想什么，我也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我们俩人都没说出来。大家都觉得，让这样一个身上挂勋章的厨师在身边实在是令人讨厌，但我们从未提到此事，因为那不会有什么好处。除这位少将厨师外，还有一个负责斯大林厨房采购酒、烤肉和其他食品的格鲁吉亚人。战时，他当上了陆军中将。我每次从前线回来，都看到他也在我不在时得了一至两枚勋章。我想别人都会与我一样对这种做法感到恶心。我记得有一次，斯大林当着这位负责食品的陆军中将的面训斥我。这位中将与我们一样都喝醉了。无论怎么说，这个人不适合与我们在一起。让他给我们提供喝的和吃的，这是一回事，但是让他坐下与我们一起吃喝，那又是另一回事。没有人认识他，可要我们在他在场时亲密而又随便地谈话。我想，斯大林的脑子在战时已不是很管用了。

战后贝利亚成了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对贝利亚日益增强的权势表示担心。更有甚者，斯大林开始害怕贝利亚。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害怕的根源。后来贝利亚消灭其他人的整个机器被揭露后，一切都大白于天下。斯大林为达到自己目的一切手段都掌握在贝利亚手中。他意识到既然贝利亚能消灭任何一位斯大林指定的人，那么，贝利亚也会消灭某个他为自己利益而选中的人。斯大林担心他会成为贝利亚选择的第一个目标。自然，斯大林从未同任何人说起此事。但尽管这样，我还是能感觉到。我第一次看到斯大林这种强烈的担心是在战后的某一天，当时我在斯大林家吃晚饭。席间，斯大林突然环视伺候他的人们，生气地问：“为什么我周围都是格鲁吉亚人？”

贝利亚立刻警觉起来，说：“斯大林同志，这些人都是你的忠实仆人，他们都是忠于你的。”

斯大林很生气地说：“这就是说俄罗斯人不忠实，不忠于我啦？”

贝利亚回答道：“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挑选到这儿来的

人都是忠实的仆人。”

斯大林叫道：“我不需要他们的忠诚！把这些人都从这里给清除出去！”这些格鲁吉亚人——包括那个做烤肉的厨师和那个伙食官——立即被带走了。贝利亚像被痛打了一顿一样拖着步子走出房间。

弄走所有格鲁吉亚籍的服务人员并换上俄罗斯人后，斯大林或许相信他已切断了贝利亚通过自己侍从插手厨房的事。然而，斯大林毕竟年老糊涂了，他并未意识到贝利亚权力有多大。例如，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只是在贝利亚亲自向斯大林报告并得到指示后，才向斯大林报告。正象我说的那样，斯大林老了，他并不知道所发生一切。他还以为阿巴库莫夫是位认真执行自己命令的聪明的年轻人。而实际上，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报告的只是些贝利亚告诉他斯大林爱听的事。甚至在那些格鲁吉亚工勤人员被赶走后，贝利亚仍控制着斯大林身边的侍从们。贝利亚长期在契卡工作，他知道所有契卡人员。他们都想博得贝利亚的欢心，因而贝利亚很容易为了自己的目的去利用这些人。因此，斯大林甚至对他的俄罗斯侍从们，包括他的契卡卫兵，都无法信任。

斯大林害怕贝利亚。当斯大林编造明格列尔事件时，我的这一感觉得到了证实。我完全可以肯定，“谋反”指控是为了除掉贝利亚而捏造出来的，因为贝利亚就是个明格列尔人。斯大林颁布法令说，明格列尔人与土耳其人有联系，他们当中有些人政治上倾向土耳其。当然，这都是胡说啦。因为斯大林年老又患重病，所以他并没有执行自己的这一计划。贝利亚使整个形势对自己有利并机灵地暗示自己是斯大林的心腹。我们其他人没一人敢插手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有关的事。贝利亚亲自去格鲁吉亚实行对想像出的敌人明格列尔人的惩罚。那些可怜的人就像羊一样被屠

杀^①这一切在我们嘴里留下了可怕的味道。它使我相信一个领导只有在公众的监督下，才能保证不出现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和危害我们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事情。

贝利亚的骄横日益增长。他能——使我吃惊的是斯大林居然容忍它——在我们一起吃饭时提出某个意见，如果斯大林拒绝了，他又会粗暴地阻止其他人在同一餐桌上提出这同一意见。

“我已跟你说过了，没必要提出这问题，”贝利亚会说。斯大林对此一言不发，尽管他知道正是贝利亚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

贝利亚对什么都是蛮横无理。没有他，什么事也不能决定下来。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你甚至都不能向斯大林报告。如果你当着他的面向斯大林报告，可又没事先得到他的同意，他就一定会提出各种问题和反驳，使你的报告在斯大林眼里一文不值。贝利亚一直在巩固加强自己的势力。

战后，马林科夫也开始加强自己的势力，虽然他的处境有时会恶化。斯大林曾一度将马林科夫调离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把他派往中亚细亚。贝利亚向他伸出援帮之手并为他调回莫斯科作了安排。从那时起，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成了不可分割的朋友。斯大林常在吃饭时开玩笑说他们是“那两个无赖”。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着这两个无赖之间的友谊向前发展。我看得出，贝利亚既不喜欢，又不尊敬马林科夫，而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利用他。贝利亚曾对我说过如下的话：

“听我说说这个没有骨气的马林科夫。他只不过是只公山羊。你不拴紧，他就会跑掉。但他是个俄罗斯人。迟早是用得上

^①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暗示，明格列尔事件——镇压格鲁吉亚一次所谓民族主义反叛阴谋——是贝利亚操纵的。事实上，正如他所暗示的，这是针对贝利亚本人的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是赫鲁晓夫盟友谢·杰·伊格纳捷夫为斯大林编造出来的。伊格纳捷夫也策划了医生案件。

他的。”就这“用得上他的”正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友谊的关键。^①

从战前我在莫斯科党组织工作开始，我和马林科夫就已是朋友了。我们常一起外出度假，就连我们两个在乡下的别墅也靠得很近。所以，尽管战时，尤其是斯大林对我表示不满时，马林科夫曾对我有那么点降低身分俯就的态度。我们也从未争吵过。

有一次，我和马林科夫一起在斯大林的索契休养地。我是从基辅来，马林科夫是由莫斯科来。和他在一起散步时，我说：“我很吃惊你居然没看出贝利亚对你是什么态度。你就没有看出吗？我想他是在嘲弄你。”

最后，马林科夫答道：“是的，我当然看到了。可我又能怎样呢？”

“你又能怎样？我只是希望你知道。的确，现在你不能怎么样。但时机总会有的。”

我自己的担忧正在增长。斯大林的年迈使我们其余人处境困难。我决不是期望他的死，而且害怕他死。我害怕他死后的后果。国家会怎么样呢？虽然我对那场反对人民敌人的运动有怀疑，但我仍信任斯大林。我想也许有些过火作为，但每件事基本上是处理恰当的。我不仅没有指责斯大林，相反我赞扬他有勇气纯洁党，因此使其成为一体。四十年代后期我已相信，斯大林死后，我们必须尽力阻止贝利亚在党内占据领导职位。否则，党就完了。我甚至认为，贝利亚的成功就意味着十月革命的失败。它

^① 赫鲁晓夫在通篇叙述中如此成功地将马林科夫写成是个平凡的阴谋家，以致人们要费点劲才可回想起1957年正是这同一个“公山羊”差点罢了他赫鲁晓夫的官。他的确是个阴谋家，但他也是位很能干、无情和粗暴的人。此外，他受过良好教育，很有教养，也许还有一点看不起赫鲁晓夫。

将意味着丧失了十月革命的成果。我早就认为，贝利亚会将国家的发展由社会主义引上资本主义道路。

斯大林晚年，贝利亚常常越来越大胆地表现出对斯大林的不敬。他与马林科夫谈起起来往往比与我谈更坦率。但他常当着我的面无礼地、甚至用侮辱的口吻谈论斯大林。这总是使我很生气并使我保持警惕，特别使我保持警惕。我是这么看的，贝利亚对斯大林明显的不尊敬也许是想拉我发表同样的意见，或是同意他说的，然后，他就可以到斯大林那里，抨击我是个反斯大林分子、人民的敌人。然而，我很熟悉贝利亚的手腕，所以我只是听着不说话。我从不捂住耳朵，但又从不开口。尽管这样，贝利亚还是劲头很大地继续他的老一套，虽然我小心地不去鼓励他。他相信没什么可以威胁到他。他知道我不可能充当告发者。我也知道他远远比我更接近斯大林而不需要更加谨慎。贝利亚与斯大林相争时，贝利亚总能装成是一对情人间的争吵。两个格鲁吉亚相争，只是逗乐而已。最后他们总会和好。

贝利亚的挑拨手段就讲到这里吧。他搞这行是个老手。凡是肮脏和奸诈的勾当，他干起来很熟练。所以我对他总是保持着警惕。我知道他是在寻找机会抨击我、消灭我。他对布尔加宁也使用了同样的诡计。不过，布尔加宁和我一样，也知道他用心何在。然而，我肯定贝利亚从来不当着卡冈诺维奇的面说任何反对斯大林的话。贝利亚不仅不信任卡冈诺维奇，而且恨透了他。

这就是斯大林去世前夕的大概情况。

第九节 斯大林逝世

1953年3月4日早上，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宣布斯大林

在其莫斯科寓所患了脑溢血症。实际上，正如赫鲁晓夫证实的那样，斯大林不是在莫斯科而是自己的乡间别墅。同公报一起发表的有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致苏联人民的文告，呼吁他们“在这些困难日子里，要加强团结、发扬坚忍不拔的精神并保持警惕。”俄罗斯正教大主教和犹太教大经师下令举行特别祈祷。两天后，大约是早上四点钟，以一阵哀乐为前奏，发表了公告，“列宁的战友，列宁天才的和事业的继承者和旗手、共产党和苏联的英明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死时的可怖情境的叙述大都是正确的，而且斯维特拉娜·阿里露也娃在她的《给一位朋友的二十封信》中也基本上证实了这点。两者各有其对方没有的细节。有趣的是，这两本书关于贝利亚在灵床前几乎难以令人相信的行为的说法是一致的。赫鲁晓夫非常担心贝利亚会占据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职位。其原因是，尽管贝利亚多年来一直控制着秘密警察，但自1946年以来，他就没有担任过其正式职务。贝利亚作为政治委员，控制着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MVD和MGB）。这两个部（前身是两个人民委员部）1951年前由贝利亚的门徒掌管，后来国家安全部由赫鲁晓夫的朋友S·D·伊格纳捷夫负责。赫鲁晓夫的担心是贝利亚有一大批追随者在安全部门工作，这样他就能挤走伊格纳捷夫，重新控制国家安全部。这件事，实际上是发生了，但并没持续很长时间。

斯大林是1953年2月病倒的。当时是个星期六的晚上，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我在克里姆林宫看完电影后，和斯大林一起到了他的别墅。同往常一样，晚饭一直吃到早上5—6点钟。斯大林已很有醉意，不过兴致极高。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会

病倒。我们离开时，他走到前厅送我们。他象以往情绪好时一样，大声开着玩笑，用手指捅我肚皮，学着乌克兰腔叫我“尼基塔。”所以，这次特别聚会后，我们都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因为席间没出什么岔子。斯大林家中的筵席，并不总是这样高兴而散的。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肯定斯大林会召集我们去开会。星期日晚上，我推迟了家里的晚饭，因为斯大林随时会来电话。后来我实在等不了了，就吃了点东西。晚饭后，斯大林还是没有来电话。我无法相信，这个周末斯大林会不召见我们就这样过去了。但没有，斯大林没有来电话。我上床睡觉时已经晚了。

突然电话响了，是马林科夫打来的。他说：“听着，契卡人员刚从斯大林别墅来电话。他们认为斯大林出了什么事。我们最好去那儿一趟。我已通知了贝利亚和布尔加宁。你最好马上动身。”

我马上叫来自己的车。我在别墅有辆车。我赶紧穿好衣服就驱车前往斯大林住处。我在路上花了15分钟。大家到齐时，在门口先见了值日官。然后进入斯大林卧室。他们向我们解释了他们担心的原因：“斯大林同志11点钟几乎总是要叫我们送些茶或其他什么吃的东西。但今晚他没叫。”契卡们说，他们曾让马特雷奥娜·彼得罗夫娜去查看。马特雷奥娜·彼得罗夫娜是位年老的女仆，她为斯大林工作了多年。她人倒不怎么聪明，但对斯大林可是忠心耿耿。马特雷奥娜·彼得罗夫娜查看回来告诉契卡人员，斯大林躺在他常睡觉的那间房间的地板上。显然，斯大林起床后又跌倒了。契卡们将他扶起放在隔壁小餐厅的沙发上。

我们得知这一切后，都觉得斯大林处于这种难堪的境地，让他知道我们在场是不合适的。于是我们分手各自回家。后来那天晚上，马林科夫又来电话，说：“他们又从斯大林处打来电话，他一定出了什么事。马特雷奥娜·彼得罗夫娜说，我们让她再去

查看斯大林，她发现他睡得很熟。但睡得很不正常。我们最好再去一下。”

我们安排让马林科夫通知其他常委会成员，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他们俩人头天晚上未与我们一块吃饭。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我第一次去查看时，他们也不在场。我们还找来了医生。我记得其中有卢科姆斯基教授。我们在值日官办公室碰头后，就走进卧室。斯大林当时正睡在沙发上。我们让医生作必要的检查，看看斯大林到底怎么了。卢科姆斯基小心翼翼地走向斯大林。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手发抖地去碰斯大林的手，像是碰到烧红的铁。贝利亚粗暴地说：“你是医生，不是吗？好好捏着手查呀。”

卢科姆斯基教授说，斯大林的右臂不能动了。他的左腿也瘫痪了。他甚至不能讲话。他的情况很严重。他们脱下斯大林的衣服，将他抬回大房间他常睡的沙发上，因为那里空气好些。

医生们轮流看护斯大林。我们在主席团常委会成员中也安排了24小时值班表。分配情况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一组、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和我。显然这是由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决定的。他们白天值班，晚班让我和布尔加宁值。我承认我当时心烦意乱。我为要失去斯大林而难过万分。

斯大林病情很不好。医生们说，患了这种病，再也不可能工作了。他也许能活下去，但不能重新工作。他们还说，这种病一般不会拖很久，结局是致命的。

我们尽一切想使斯大林站起来。我们看出他已失去知觉，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可后来医生搞小便取样时，我注意到斯大林想把身体挡起来。他一定感到不舒服。有一次，他一度恢复了知觉。尽管他还不能讲话，但面部已开始有了表情。他们用匙子给他喂汤和甜茶。他抬起左手指了指下墙上的什么东西，嘴唇像是露出一丝微笑。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想让我们注意什么。我向大

家解释斯大林为什么指着墙。墙上有幅从《星火》画报上剪下的画。这幅画是某个艺术家的复制品，画的是一个小女孩用兽角在喂小羊羔。当时斯大林正在被人用匙子喂食物，他想说：“我就象那只羊羔。你们现在也在用匙子给我喂东西。”

接着，他与我们一一握手。我将手伸了过去。他是用左手握的，因为他右手不能动。他用握手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斯大林一病倒，贝利亚就开始来回走着，说斯大林的坏话，嘲笑斯大林。听贝利亚说这些真让人无法忍受。但有趣的是，只要斯大林脸上有任何表明可能恢复的迹象时，贝利亚就会跪下，抓住斯大林的手吻。当斯大林又失去知觉，闭上眼睛时，贝利亚就站起吐唾沫。这就是贝利亚的真面目——甚至对他颂扬和崇拜的斯大林也来这手。

一天，布尔加宁和我去守夜。当然，我仍在白天大部分时间也在那儿。我们必须在医生在时注意他们，晚上又必须来值班。我与布尔加宁谈话要比其他人坦率，甚至内心的想法也和他谈。我对他说：“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大林的病是好不了啦，医生已说过他说不了话了。斯大林去世后，你知道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吗？你知道贝利亚想攫取什么职位吗？”

“什么职位？”

“他想自己当国家安全部长。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干。如果他当上安全部长，那就是我们末日的开始。他是为消灭我们才想担任这个职务的。即使我们让他担任这个职务，他也会这样做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得逞，绝对不能。”

布尔加宁说他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们开始商量该怎么办。我说：“我去和马林科夫谈谈。我想他也会这么看的。他一定明白，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了。如果不，不马上说的话，我们党将会面临一场灾难。这不仅仅涉及到我们个人，尽管我们当然不想让贝利亚在我们背后捅一刀。如果贝利亚得逞的话，他会将时钟拨回

到1937—1938年——他甚至能干出更坏的事。”

我已说过，对贝利亚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早有怀疑。我甚至认为他是钻进党内的坏分子。我想起格里沙·卡明斯基曾说过的话。他说贝利亚在十月革命初期就是英国反谍报机关在巴库的特务。贝利亚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他骗取了斯大林的信任，并靠欺骗和奸诈得到了高位。

布尔加宁同意我说的一切。我们值班结束后我就回到了家。我很想睡一觉，因为有很长时间没有睡了。我吃了片安眠药就上床了。可我刚躺下，电话铃就响了。电话是马林科夫打来的，他说：“快上这儿来，斯大林病情恶化了。马上来这儿。”我立刻叫上我的车。到了斯大林别墅，我发现斯大林病情确实十分严重。其他人也都陆续到了。我们都能看出，斯大林快死了。医生们也这么说。我们正目睹着他死亡前的痛苦。突然，他停止了呼吸。这时来了个彪形大汉，开始为斯大林作人工呼吸，为他按摩，想使他恢复呼吸。我必须承认我很为斯大林难受，这个人居然这样折磨他。看到这个人压在斯大林身上，我很痛苦。我说：

“喂，请住手吧！你难道看不到这人已死了？你想干什么？你不可能使他起死回生了。”于是他们放弃了想救活他的念头。是的——斯大林的确是死了。

斯大林刚咽气，贝利亚就坐上自己的车走了。

第九章 为争当接班人勾心斗角

第一节 策划打倒贝利亚

就赫鲁晓夫所知，这一密谋早在他本人、他的同事们、还有斯维特拉娜·阿里露也娃守在斯大林的遗体旁边时就开始了。阿里露也娃和赫鲁晓夫对贝利亚所表现出的反常神态的看法不谋而合。他们吃惊地发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一传来，贝利亚的脸上马上显示出得意的神色；他急忙叫来自己的小车，扬长而去。显然，他匆忙离开昆采沃是为了去控制安全部队，使自己处于最有利、最强有力的地位。（也许可提一笔，当时及事后，阿里露也娃对赫鲁晓夫给予她的同情曾再三表示感激之情。）一切迹象都表明：贝利亚已下定决心，要争取国家最高的权力。马林科夫对这一权力也紧抓不放。斯大林逝世以后，马林科夫暂时作为斯大林的接班人，继任了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贝利亚则是第二号人物，仅仅排列在马林科夫之后。他们俩人结成了暂时的联盟，都自以为可以利用对方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赫鲁晓夫眼光更高，也更有远见。对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联盟他表现了暂时的屈从，但是10天之后，林马科夫虽然保住了部长会议主席的乌纱帽，但却辞去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6个月之后便正式接任此职。在促使贝利亚倒台的密谋中，赫鲁晓夫显然起了非常主要的作用。虽然他在这个问

题上的暗示不是十分明显，但事实的真相竟是这样，只不过事件发生的具体细节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除了赫鲁晓夫之外，其他的高级官员对贝利亚的野心也已经有所察觉，并感到他大权在握是多么危险。这些高级官员，除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些成员以外，还包括几乎所有的苏联军队最高指挥部的高级将领。这一点非常重要。将领们早就发现，还在卫国战争时期，马林科夫就帮助斯大林对军队将领进行了不可告人的监视。许多高级将领，包括一些苏联元帅，都与赫鲁晓夫一起共过事，私人感情较好。在反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密谋中，他们所起的积极作用显然要超过本文的记述。除了本文中所记述的在苏呼来建造别墅行动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情况与问题没有记述。而且这个密谋本身也不仅仅就是，对那些胆怯迟疑的官员进行说服的过程，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赫鲁晓夫在本文中，对逮捕贝利亚的回忆，与他对来访的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的叙述有着很大的出入。尽管如此，他的回忆仍是非常权威的。关于对贝利亚及其同伙进行审判和处理的官方公告，在罗伯特·康奎斯特所著的《苏联的权力与政策》的一书中有所收集。除此之外，康奎斯特还对1945年至1960年间，克里姆林宫里所发生的政府角斗进行了充分、详细的记述。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这些内幕涉及得很少。

斯大林去世了。当时他的逝世就象是一场大灾难。然而我担心是更棘手的事情迟早总会发生。斯大林的去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意义。他的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说心里话，打击很大并不是完全因为他曾给我以很大的庇护，事实上他也确实曾给过我很大的庇护。他早就年事已高，死亡很久以来就与他只有一步之遥。不管怎样，死亡总是必然的。无论是谁有生就有

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斯大林的去世确实使我非常不安，但是更使我担心的却是苏维埃主席团的人事安排问题。斯大林生前使贝利亚窃取了主席团的高位。这就酿成了以后一系列的错综复杂的形势。我甚至认为是一系列的灾难性的后果。

斯大林刚一去世，贝利亚就欣喜若狂。他是那样的得意，那样的精神焕发。甚至当斯大林的遗体还没有装入棺木之前，他就大摆宴席庆祝乔迁之喜。

贝利亚以为他久已等待的时机终于来临。这个地球上再也没有谁能够阻挡他的意志的实现。一切都不在话下，他尽可以从此为所欲为。他的这些如意算盘就刻在他的脸上。当他匆忙叫来自己的小车，匆忙离去的时候。我就看得一清二楚。

我知道马林科夫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地位，也没有什么影响，他只不过就是一个走卒。斯大林在内部圈子里的谈话中曾经给他以非常恰当的形容：“这个马林科夫真是一个好职员。让他起草文件，绝对不会误事。他非常善于完成任务，但却无能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开拓。”^①马林科夫一直认为紧跟贝利亚是有利可图的，尽管他也知道贝利亚不过是想把他用来当枪使，而且还经常嘲笑他。然而马林科夫的算盘打得并不错——紧跟贝利亚的确使他获益非浅。尽管斯大林对他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评价不高，他却始终受到斯大林的重用。这一点正是主要得益于他对贝利亚的紧跟。现在斯大林已经去世，马林科夫显然一定会成为贝利亚实现自己野心的“得力助手，”因为贝利亚本人就曾亲口对我这样说过。

当我去“近郊别墅”守在斯大林遗体旁边的时候，就是这些忧虑萦绕在我的心头。

^① 1952年10月，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态，给马林科夫以少有的殊荣，让他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党的工作报告。

贝利亚坐车匆忙离去之后，我们剩下的一些人决定马上召集政治局和主席团的所有成员开会。在等待委员到来之前，马林科夫紧张得走来走去。当时我感到有必要与他谈一谈，便走上前去对他说到：“叶戈尔（格奥尔基），我想与你谈谈。”

“谈什么呢？”他冷冷地问我。

“斯大林同志去世了，我们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有什么可商量的呢？我们马上就要开会，那时就全商量了。正是为了商量我们才开会的。”这个回答听起来似乎非常民主，但是我却有着不同的理解。我认为马林科夫的这个回答恰好说明了他与贝利亚已经商谈过了。一切都已经计划好了。

“那么，好吧。”我说道。“咱们以后再谈吧。”

委员们在“近郊别墅”聚齐了，大家都见到了斯大林的遗体。后来斯维特兰卡赶到了。我向她迎上去。她非常悲痛，放声大哭了起来。我无法控制自己，眼泪也滚了下来。对斯大林的逝世，我真诚地感到痛心。

我不仅仅为了斯大林的逝世而感到痛心，为了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我更感到痛心疾首。我已经感到贝利亚马上就会对所有人滥施淫威，而那将意味着党和国家末日的开始。

我早就有一个感觉，贝利亚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为了个人野心可以不择手段的残忍的投机分子；从思想意识来讲，他完全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尚情操，他嗜杀成性，凶残无比。

会议开始了，新的权力分配也就随之展开。贝利亚迫不及待地提议：由马林科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当场也提议，由贝利亚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除此之外，他还提议把国家安全部与内务部合并，名称还是叫内务部，由贝利亚兼任这个部

的部长职务。从表面上看，这种安排对贝利亚来说并不过分。^①我保持沉默，一言未发。我以为布尔加宁会起来反对这种不正常的程序，可是布尔加宁也是沉默不语。我可以感到其他委员们的心绪。如果布尔加宁和我都起来反对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主持会议的那种方式，我们就有可能被斥责为：在斯大林遗体的体温还没有冷却之前，我们就在党内争权夺利、引起事端、制造混乱。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令我忧虑。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与贝利亚一起被分别任命为部长会议的第一付主席。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接替了什维尔尼克的职务。^②

贝利亚在会议上对什维尔尼克的评价非常恶劣。他说什维尔尼克在全国几乎没有有什么知名度，因此不适于在国家领导层中担任重要的职务。

我心里明白，这次会议的权力再分配正好迎合了贝利亚的意愿。比如说，贝利亚把伏罗希洛夫提拔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是打算在他开始新一轮政治迫害的时候，能够得到伏罗希洛夫的支持。贝利亚还提出免除我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职务，理由是我可以更集中精力做好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会议还通过了其他的一些提议和任免事项。然后我们讨论决定了葬礼的安排事项，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最好的方式把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告诉我们的人民。^③

^① 事实上不是这样。赫鲁晓夫曾经说过，这种安排使他非常担心。贝利亚还同时兼任着部长会议第一付主席，也就是内阁的第一付总理。

^② 尼·米·什维尔尼克是斯大林最忠诚的元老之一。他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苏联工会的最高领导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也就是苏联的国家主席，只不过是一种荣誉职务。除了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以外，布尔加宁也被任命为部长会议的第一付主席。赫鲁晓夫在部长会议里设有职务。他是埃苏维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③ 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宣布之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向人民发出呼吁，要“保持镇静和良好的秩序。”

就这样我们失去了斯大林，并开始自己管理我们的国家。

在葬礼期间，以及葬礼之后，贝利亚一反常态的对我非常关心和尊敬。他一方面继续与马林科夫来往密切，一方面又积极与我建立尊重、平等的友好关系。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经常把我招来与他们一起去克里姆林宫里活动和散步。尽管我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拒绝，但我对贝利亚的看法自然没有改变，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这反而使我对他的看法更加根深蒂固。我知道他对我的这种友善，完全是他的一种伎俩，正象我们经常所形容的那样：贝利亚又玩起了低等的亚洲人的小聪明。我们所说的“亚洲人的小聪明”指的是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嘴上说的又是另一回事的口是心非的做法。贝利亚对我采取的就是这种虚伪的策略。他对我欲擒故纵，先给我一颗定心丸吃，而暗地里却在时刻窥测着时机，要拿我首先开刀。

按照程序安排，马林科夫和我负责起草苏维埃主席团常务会议的日程安排。马林科夫负责主持会议，由我协助他按照日程安排开展工作。

每一天过去之后，贝利亚的势力就增长一分；他那不可一世的神态也与日俱增。他那内奸般的阴险和狡诈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终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与主席团其他成员之间爆发了第一场冲突。那时候主席团的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动。斯大林在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中央全体会议上建立的那个主席团、小政治局的班子已经受到清洗。这帮人马只剩下了一个11人的小圈子。在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贝利亚提出了下列建议：

“鉴于许多被囚禁或被流放的罪犯刑期将满，他们可能返回家园，我提议我们研究通过一个决议，没有内务部的特别批准，任何罪犯都不能随便返回。他们必须留住在内务部可以控制的地域。”

所谓内务部的控制就等于是贝利亚自己的控制。他的这个提议，恰好反映了他那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

我非常气愤，便发言表示反对。我说道：“你所提议的那种专制的手段，我坚决不能同意。过去，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发生得还不够吗？现在，我们既已经开始批判地重新反省对于过去的评价，我们又怎么能将这种假冒法律实为践踏法律的东西继续强加于我们的人民呢？你刚才所提到的那些被囚禁、被流放的罪犯，就曾经被逮捕、被审讯，被过堂、被宣判，而这一切竟都是出自于国家安全部的三驾马车。^①这些囚犯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证人、法官；他们只是一阵风似的被逮捕，被囚禁，甚至被处死。现在他们，由内务部所定的刑期将满，你却仍要继续剥夺他们的权利，他们甚至连选择自己居住地点的权利都没有。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

其他的主席团成员也对我表示支持，贝利亚机敏地收回了自己的提议。马林科夫做记录，这一事件，根本就没有写进会议记录。后来贝利亚又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提议。按照过去的规定，国家安全部的三驾马车有逮捕权、审判权，并可以宣判20年以下的刑期。贝利亚提出建议，可以把20年的最高上限下降到10年。这个提议虽然表面上减少了极权的迫害，但是我非常清楚贝利亚是何居心。

我说道：“对这个提议我还是表示坚决的反对。我之所以表示反对，是因为我们应该对这套逮捕和审判的制度从根本上进行彻底的反省，而不应该仅仅作一些细则上的改良。你刚才的提议仍然还是为了维持那种专制的统治。无论最高刑期是20年还是10年，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你可以先判一个人10年，然后再判

^①三驾马车是俄国的一个俗语，本意是一辆车套着三匹马。这里指的是集逮捕和审判为一身的极权机构。

他10年；如果有必要，如果你高兴，你就可以一个10年、一个10年的判下去，直到把他判进棺材里为止。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刑期的长短，而在于从根本上改变在斯大林生前所泛滥的那种随意逮捕人、随意宣判人的政治迫害。你所有的这些提议，其用心无非是想把这种政治迫害合法化，使其从斯大林生前一直延续到斯大林身后。我们应该对过去的文件进行整理，看看那些政治迫害是怎样肆虐猖狂的，我们的党又由此受到了怎样的破坏。”

贝利亚又收回了他的建议。我已经两次发言，对他进行尖锐的反驳。无疑，对于我的立场，他已经完全明了，他就会采取下一步行动。贝利亚从来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的意志的挑战。逆他者亡。

那么贝利亚下一步的行动又是什么呢？这个丑闻是这样的。一天，贝利亚、马林科夫和我正在一起散步，贝利亚突然忽发奇想，对我说：“人们常说，人的命运都攥在上帝的手心里。我们都老了，任何不幸都可能发生，我们将被迫告别我们的家人而离去。我们应该多为我们的残年和我们的家人着想。所以我想向中央提议，给每一个国家领导人修建一座私人别墅。”这种提议只有贝利亚才想得出来；这种非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正是贝利亚其人的典型特征。我感到修建别墅的后面一定有一个更大的阴谋，他有可能会利用此事挑起新的争斗。我不置可否，只是静静的听着。他接着说道：“我打算去苏呼米（黑海海滨）修建这些别墅，而不是在莫斯科的郊区。别墅也不能修建在苏呼米郊区，而应该修建在市中心。我们可以在市中心单独辟出一块地来，把那里建成一个大花园，再种上桃树。”然后他大谈特谈苏呼米市将变成一个多么迷人的城市，还有美丽的桃树和碧绿的葡萄。他似乎早已经计划好了，需要多少人力，需要多少物资，他都已经胸有成竹。他对马林科夫说“内务部将负责这项工程的实施。首先我们先给您叶戈尔（马林科夫）建一幢别墅，然后给尼基塔（赫

鲁晓夫)，再以后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以及其他领导人。”

我一直听他把话讲完，一句也没有同他争执。自始至终都是他口若悬河，我仅仅随声附和：“是的，是的，我们将予以考虑。”就好象我对他的计划表示同意似的。

谈话结束之后，贝利亚、马林科夫和我便起程返回我们各自在乡间的别墅。我们3人乘坐同一辆车一直到鲁勃列夫公路口才分手，马林科夫和我向左转弯，贝利亚向前一直开去。

马林科夫和我走下贝利亚的轿车之后，又一起坐进了另一辆车。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便对马林科夫说：“马林科夫同志，你对贝利亚刚才的计划怎么看？我认为他这是在公开进行陷害。”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我知道贝利亚的险恶用心，他之所以要建造这些别墅，完全是为了制造事端，进行陷害。我们先不要表示反对，让他自以为得计。他总是以为他总比别人高明。”

就这样，贝利亚开始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他首先命令将建造这些别墅的图纸设计出来，然后把我们请去，把画好的图纸拿给我们征求意见。修改得更加完善之后，他就下令马上开工。一个著名的建筑师为这项工程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个同志当时正负责原子能发电厂的建设工程。贝利亚认为他非常可靠，因为他总是贝利亚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在征求意见的会议上贝利亚说，建造马林科夫别墅的地点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马林科夫住在那里将可以站在别墅的窗前眺望迷人的黑海。贝利亚半开玩笑地说到：“叶戈尔，你还能看见黑海岸边的土耳其。那真是美极了。怎么样，我给你造的这个地点还满意吧？”

散会之后，我故意留下来等着马林科夫。我告诉他：“贝利亚别墅计划的中心就是要把你的别墅建造在呼苏米最美丽的地

方。这项计划将使当地的许多居民被迫迁走。建筑部的同志告诉我，别墅工程将意味着大批家庭的搬迁。这对于那些家庭来讲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他们曾在那块美丽的土地上世代居住，突然之间就必须统统搬走，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难道还不明白贝利亚的险恶用心吗？他是想以别墅工程为借口，将老百姓赶出家园，然后再拆掉他们的屋子，而把你的宫殿建在那里。你的别墅以及周围要修建的大花园都将被围墙圈起来。整个城市都会产生不满，甚至怨声载道。老百姓们会问：“他们建造这些豪华的别墅干什么？谁要来住在这里呢？”别墅建好之后，你一来住，老百姓就会看见你。他们就会明白，原来这些豪华别墅以及这么多老百姓的大搬迁都是为了你这个部长会议主席。这个丑闻不仅会传遍苏呼米的大街小巷，而且会传遍全国。这就是贝利亚的险恶用心。他就是要你背上这个丑闻，陷入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然后被迫辞职下台。你还记得吗？贝利亚声称他的那个别墅由他自己设计，实际上，他自己根本就不会干。他主要是给你建别墅，然后利用这种事，把你在全国搞臭。”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件事的前前后后，贝利亚都与我商量过的。”

无论怎样，我们的这次谈话毕竟使马林科夫进一步去深思。后来贝利亚又把为我设计的别墅图纸拿给我看，他操着他那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对我说：“这些小房子设计得多漂亮啊！怎么样，您还满意吗？”

“是的，很满意。”我随声附和着。“这个设计真是巧夺天工。”

“那您为什么不把图纸带回家去呢？”

我还真把图纸带回家来，但却不知道把图纸放在哪里合适。尼娜·彼得罗夫娜走过来问我：“这是什么？”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她。她非常气愤地说：“真是无耻！”

我没有对她进行详细的解释，我说：“咱们还是先把这些东西放起来，以后再看看怎么处理。”^①

贝利亚虽然极力抓紧在苏呼米的别墅建筑工程，但是在他被捕之前并没有真正开工。我们把他逮捕之后就整个工程取消了。我把设计别墅的那些图纸一直保存到现在。

在别墅事件进行的同时，事态发生了新的变化。贝利亚试图对党的工作进行干扰，特别是契卡的工作。（契卡指的是全俄肃清反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贝利亚对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党的工作伪造了一份文件。他要首先拿乌克兰的党的领导班子开刀。我对此早有准备，因为我当时对乌克兰还负着主要的责任。贝利亚是千方百计的要把我牵连进去。

贝利亚先开始通过乌克兰内务部的地方委员收集证据。当时内务部在乌克兰利沃夫地区的负责人是斯特罗卡奇。^②他已经去世。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伟大的战士。卫国战争爆发之前他是乌克兰边境部队的一位上校；卫国战争期间，他负责乌克兰卫戍部队司令部的工作，所以关于敌占区的形势变化总是他负责向我报告。我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诚实而正派的人。战争以后，他开始负责内务部在利沃夫地区的工作。

我们后来才知道，贝利亚的亲信——内务部乌克兰地方委员会主席曾经找到斯特罗卡奇，让他收集地方党组织的黑材料。斯特罗卡奇说他对人事问题并不负责，他请他们去找党的地方委员会。后来贝利亚亲自给斯特罗卡奇打了电话，威胁他说，如果他拒不执行命令的话，就要把他关进集中营。

①这件事情从一个侧面生动反映了赫鲁晓夫的家庭生活，也反映了他有着一个出色的妻子。

②T. A. S斯特罗卡奇是克格勃的少将，1955—1956年任乌克兰内务部地方委员会主席。

直到我们把贝利亚抓起来以后，我们才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真相。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乌克兰党组织的工作竟然已经受到内务部地方委员会的控制。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开始讨论乌克兰领导班子的民族构成问题。这是贝利亚提交的一份备忘录。贝利亚认为：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应该由乌克兰族人自己来管理，这样更便于工作，乌克兰族的官员也不宜到莫斯科的最高苏维埃来工作。

由于这份备忘录的结果，麦尔尼科夫被免去乌克兰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基里钦科（乌克兰族人）接替他。贝利亚还提议把考涅楚克提拔到乌克兰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主席团工作。这些变动决定之后，乌克兰举行了党的全体会议。考涅楚克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提升正好是贝利亚反党阴谋的一部分，所以他在会议上发言，对贝利亚本人以及他提出的备忘录都大加赞赏。

以后，又有两个关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备忘录被通过。两个提议都强调，要从当地人中选拔多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苏维埃主席作出决定：今后每一个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都要由当地人担任，莫斯科不再委派任何俄罗斯人。^①

贝利亚在民族问题上的这个提议从实际上讲还是正确的，他的提议也与全苏中央委员会的看法非常巧合。尽管如此，贝利亚还是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不过是想对这一问题加以利用，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当时在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里俄罗斯人确实控制了大部分的领导权，贝利亚借此大做文章，强调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大家都知道贝利亚所讲的问题确实存在，解决这个问题也

^①贝利亚为什么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机构的组成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贝利亚精心策划的长期的篡党阴谋在他被捕、被处决之前并没有真相大白于天下。赫鲁晓夫对这个迷团的解释也许是有道理的。阿·伊·基里钦科事实上是赫鲁晓夫的亲信。赫鲁晓夫上台后被提拔到高位，1960年又突然被解职。但原因不明。

符合党的路线。但是一开始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贝利亚之所以推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加剧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紧张，扩大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与各加盟共和国地方委员会之间的矛盾。

在这个时候，我把马林科夫叫到一边，轻声对他说道：“你都听见了，马林科夫同志。你还看不出这背后的阴谋吗？这样下去会闯出乱子的。贝利亚正在磨刀霍霍。”

马林科夫问我：“那么，我们又怎么办呢？我也感到这有些不对头，可是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反击的时候到了。首先你必须明白，贝利亚的所作所为是有着反党企图的。我们不能容忍他这么搞下去。我们必须反击。”

“你是说让我一个人去反击他吗？我是不会干的。”

“你难道认为反击贝利亚你是孤立的吗？我们两人一起干，至少已经有我们两个人了。我相信布尔加宁也会站在我们一边。我已经不止一次的与他交换过意见。我还相信，如果我们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对贝利亚发起反击，其他的同志也会站在我们一边。问题是，在以往的主席团会议上，你总是不给许多同志发言的机会。每当贝利亚提出一个提议的时候，你总是马上对他表示支持，你总是说：“贝利亚同志，你这个意见非好，我赞成。有什么同志反对吗？”然后你就要求马上进行投票。下一次会议，如果你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你就会什么都明白了。要沉住气，不要匆忙表态。当你感到不对头的时候，让大家畅所欲言，你就会发现你不是孤立的。我相信对贝利亚有反感的人很多，就看我们如何行动了。你和我应该把议事日程再研究一下，要安排对贝利亚的错误提案的讨论。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揭露他。我坚信我们可以把主席团的其他成员都发动起来，一起反击贝利亚的反党阴谋。我们不会是孤立的。我们就试一次吧。”

马林科夫最后还是同意了。我感到既惊奇又兴奋。我们共同研究了下一次主席团会议的日程安排。

在会上我们组织了讨论，许多同志支持我们，贝利亚碰了钉子。

在后来的几次会议上，这样的情形又出现了几次，马林科夫的勇气增强了。他也明白我们可以用党的集体的力量来否决贝利亚的那些危害党、危害国家的阴谋提案。

贝利亚碰了几次钉子以后，发现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开始与他过不去了，便加快了阴谋的步伐。他利用各种机会大出风头，充分地、公开地炫耀他的才能。我们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我感到时间不能再拖了，必须采取有力的手段才能扭转局势。

我对马林科夫讲，我们必须把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争取过来。但是在主席团会议上，当着贝利亚的面这个问题是很难办的。我们必须与他们一个一个的私下交谈，才能判明他们对贝利亚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的。最后马林科夫同意了，并说道：“是的，我们必须行动了。”

我知道伏罗希洛夫是以党的利益为重的，他也非常清楚贝利亚对党所构成的巨大危害。所以我与马林科夫商量之后，决定先找伏罗希洛夫同志谈一谈。伏罗希洛夫与我当时还在一个委员会里共事。我觉得可以借此为幌子到他家去看望他。

我给伏罗希洛夫挂了电话，告诉他我想与他谈一谈那个委员会的工作。没想到伏罗希洛夫却对我说，他希望在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与我谈论这个问题。“不！”我说道。“请让我到你家里去谈吧。”他说他可以到中央委员会去找我谈，最后，他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

马林科夫请我在回家的路上转到他家里去吃饭，一起商量一下与伏罗希洛夫的谈话问题。我与马林科夫谈到很晚，便在他家住下。

后来我去看望伏罗希洛夫的时候，并没有达到我的目的。我刚刚走进他的门，他就唱起了贝利亚的赞歌。“赫鲁晓夫同志，贝利亚同志是一个多么出色的领导人啊！真是太出色了！”

我回答说：“也许是吧。也许您有点过奖了吧。”见到伏罗希洛夫以这种方式迎接我。我也就无法与他坦率地评论贝利亚了。依我看来，伏罗希洛夫之所以对我讲话使用那样的口吻也许是因为他对我还有怀疑，他把我看成是贝利亚的耳目。另一方面，他认为我是贝利亚的同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贝利亚、马林科夫和我经常在一起散步。无论怎么讲，我对贝利亚的看法与伏罗希洛夫所唱的赞歌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如果我坦率地直抒胸臆，那就会使伏罗希洛夫处于非常尴尬、进退两难的境地。至少他出于自己的面子也不能完全同意我对贝利亚的评价，而且我刚一进门他就大唱贝利亚的赞歌，他就更不可能与我进行坦率的交谈了。无论我与伏罗希洛夫的谈话结果如何，我要扫除贝利亚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就这样我与伏罗希洛夫仅仅交谈了几句，便匆忙离去。我已经与马林科夫约好一起吃饭。我告诉他，与伏罗希洛夫的谈话毫无结果；甚至我与他根本没有可能进行坦率的交心。

马林科夫和我一致同意，我应该再找莫洛托夫同志谈一谈。他当时是外交部长，而且曾给我打过电话，约我在中央委员会见面商谈一下外交部的人事安排问题。我以他的电话为名，可以光明正大的与他个别谈话。所以我给他回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你不是有事要与我商谈吗？你什么时候来找我都可以。如果方便的话，你最好马上就来。我对外交部的人事安排确实有些看法。”

过了一会儿他就到了，我对他说：“我们来谈谈人事问题，但不是外交部的人事问题。”我与他的谈话非常坦率。我全都告诉了他。我认为贝利亚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如果我们不粉碎他

篡党夺权的阴谋，我们党将受到什么样的危害。在前几次的主席团会议上，我已经与他谈过贝利亚企图加剧民族紧张的险恶用心。那时候我就对他更了解了。

莫洛托夫陷入了沉思。这是必然的，他不能够再不认真地想一想了，因为他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斯大林生前所有政治风云的变幻。那时候在斯大林还完全信任他的情况下，我就常听到他对贝利亚的一些作法表示强烈的义愤，只不过他不当着斯大林的面讲。莫洛托夫也曾是贝利亚两面三刀、残酷迫害的受害者。我还不止一次的见到他当面斥责贝利亚卑鄙的行径。因此，当我与他彻底谈开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他是完全支持我的。

“是的，”他说道。“我与你深有同感，但是我有一事非常担心。马林科夫对这些怎么看呢？”

“我今天就是代表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来与你谈话的。对于贝利亚的问题我们已经交换过意见了。”

莫洛托夫又说：“你们与我谈起这个问题真是太好了。我完全支持你们。但是请坦率告诉我，你们要采取什么对策呢？后果又将会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要解除贝利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内务部部长的职务。”

莫洛托夫说那还不够。“贝利亚是一个十分凶残的人。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非常的手段。”

“你是不是说我们应该把他扣押起来进行调查呢？”我强调的是“扣押”而不是“逮捕”，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贝利亚犯法的证据。我当然相信卡明斯基所说的话，贝利亚是一个米沙瓦特派的特务，但是卡明斯基的指控还一直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对于贝利亚古巴库所干的那些勾当还从来没有进行过调查。如果说我们曾经发现贝利亚企图利用别墅问题制造骚乱的问题的话，那也仅仅是我们的直觉。我们不能仅凭直觉就可以逮捕他。

所以我使用了“扣押”这个字眼。莫洛托夫同意我们的计划，我们马上分手。随后，我把与莫洛托夫的谈话经过，向马林科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进行了汇报。

我们决定要加快步伐，以免夜长梦多，被贝利亚的耳目所发现。万一走露了风声，贝利亚马上就会知道，而且他有能力把我们一个个全都逮捕。

我们经过商量之后，又决定由我去找萨布罗夫谈话。他也是主席团的成员之一。在我们谈话当中，萨布罗夫态度非常明朗。他爽快地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接着他也问我：“马林科夫的态度如何？”每一个与我谈话的人都会提出这个问题。

当时，卡冈诺维奇不在莫斯科，他到外地视察木材基地去了。等他回来之后，我马上叫他到中央委员会来一下。他是晚上到的，我们坐下一直谈到深夜。他对我详细地谈到了西伯利亚以及其他木材基地的情况。我并没有打断他，虽然我当时心事重重，关于木材基地的情况根本没有听进去。等他讲完之后，我对他说：“你刚才讲的这些情况都很好。现在让我来给你讲讲，你走之后这里发生的新情况。”我告诉了他莫斯科中央委员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我们准备采取的对策。

卡冈诺维奇马上警觉地问道：“你说的‘我们’是谁？”他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对这场斗争进行力量对比。我坦率地告诉他，我们的力量有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萨布罗夫和我，而且我们的意见非常统一。我还告诉他，即使没有他们支持，我们也是大多数。卡冈诺维奇马上表示：“我也与你们站在一边。我当然与你们站在一边。我刚才只不过是了解一下情况。”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他也知道我心里想的什么。他又问我：

“伏罗希洛夫是什么意见呢？”我向他讲述了我与伏罗希洛夫的那次尴尬的会谈，也复述了伏罗希洛夫对贝利亚所唱的赞歌。卡冈诺维奇吃惊地问道：“他真是那么说的吗？”他似乎不太相

信。

“是的，他确实是那么说的。我刚一走进他的门，他就对贝利亚大加赞赏。”我说道。

卡冈诺维奇把伏罗希洛夫大骂了一顿，倒不象是故意装出来的。“这个狡猾的老东西！老王八旦！他在对你撒谎。他曾亲口告诉我，他对贝利亚简直不能忍受。他还说，贝利亚是个危险分子，很有可能把我们全毁了。”

“也许伏罗希洛夫对我留了一手。但是他对我说的关于贝利亚的那些话，确实是真的。”

“那不是他的心里话。”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再找他谈一次。也许这一次马林科夫会去找他。既然我已经去他那里碰了钉子，所以我还是最好不再与他谈论贝利亚的问题了。我不愿意使他为难。”

卡冈诺维奇对此表示同意。

卡冈诺维奇又问道：“米高扬的态度怎样？”

“我还没有与米高扬谈过。他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所有的人都知道米高扬与贝利亚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总是在一起，同出同坐、形影不离。在一定的時候我们是要找他谈话，但那只能是在最后的关头。

我向马林科夫汇报了我与卡冈诺维奇的谈话，马林科夫也认为，还是由他去找伏罗希洛夫谈话更为合适。这样算起来，就只剩下别尔乌辛了。马林科夫突然说道：“我想亲自找别尔乌辛谈一谈。”

“那当然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但是别尔乌辛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我知道他。”

“我也知道他。”

“那么好吧。就由你去找他谈。”

马林科夫把别尔乌辛叫去见他，谈完之后又找我说：“我把

别尔乌辛叫来谈过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别尔乌辛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他看来有可能靠不住。我看你最好能亲自把他稳住，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天晓得会发生什么意外。他还要考虑、考虑，那太危险了。”

我给别尔乌辛同志挂了电话，约他来见我，他马上就来了。我非常坦率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说：“如果马林科夫早就象你讲的这么清楚，我的心里也就不会有什么疑虑了。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我们没有退路可走。”我不知道马林科夫与别尔乌辛是怎么谈的，现在总算疑虑消除了。

就这样，除了伏罗希洛夫与米高扬之外，我们把所有的主席团成员都争取过来了。随后，我们又决定，由我去找米高扬谈，由马林科夫去找伏罗希洛夫再谈一次。在我去找米高扬之前，我先找到马林科夫询问他与伏罗希洛夫的谈话情况。我焦急地问他：“怎么样？谈的怎么样？他还是那样大唱贝利亚的赞歌吗？”

马林科夫说道：“我刚把咱们的计划告诉他，他就紧紧地拥抱了我，而且还双泪长流。”我不知道情况是否真是这样，但是马林科夫同志是没有必要说假话的。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旦我们正式宣布解除贝利亚的所有职务，又由谁来扣押他呢？主席团的卫队都是服从他的。每次开会他都把契卡的卫队带上，就守在隔壁的房间里。贝利亚可以很容易地向他们发出命令，把我们全部逮捕并关押起来。由于克里姆林宫的卫队人多势众，我们几个人完全不是对手。

最后，我们决定：动用军队。

首先，我们把扣押贝利亚的重任交给了防空部队司令莫斯卡连科同志，以及其他的五位将军同志。^①这是我的主意。后来，

^① K·S 莫斯卡连科将军在逮捕贝利亚的时候任莫斯科防空部队司令，后来升为苏联元帅。

在召开会议的前夕，马林科夫又把我们的阵营扩大了。朱可夫元帅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也参加了我们的计划。这样算起来我们总共就有了11位元帅和将军。

那时候，所有军方人士在进入克里姆林宫的时候，都必须接受检查并把武器留下；只有经过布尔加宁的特别批准，元帅和将军们才能允许配带武器进入克里姆林宫。

我们计划在召开会议之前，莫斯卡连科与其他元帅、将军和军官们隐蔽在附近的一间屋子里，听候我们的信号。会议开始后，由马林科夫既负责讲话，也负责发出信号。接到信号后，莫斯卡连科将军就率人冲进会场，把贝利亚扣押起来。

按照计划，我们决定召开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同时邀请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列席。马林科夫应在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是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而不仅仅是部长会议的会议。这样我们才可以合法地讨论党的事务。伏罗希洛夫同志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可以受到特别邀请。

会议一开始，马林科夫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今天的会议要讨论党内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非常重大而紧急的。”按照预先的计划，我向马林科夫同志请求发言，然后提议我们应讨论一下贝利亚的问题。可是马林科夫还没有讲完，坐在我右边的贝利亚就已经觉察到了某种意外。他抓住我的右臂，惊慌不安地问道：“厄基塔，什么事这么紧急？”

我说：“注意听。你马上就会明白的。”然后我便上台发言。我回顾了1939年2月所召开的中央全会。在那次会议上格里沙·卡明斯基同志曾揭发贝利亚担任巴库市党委书记期间曾秘密地为朱沙瓦特派间谍组织活动，也就是参与了英国间谍组织的秘密活动。可是在那次会议之后，格里沙·卡明斯基马上就象石沉大海一样失踪了。我说：“我一直在心里反复回味着卡明斯基同志的那席话，可是为什么就没有人敢于探寻事情的真相呢？”

接着，我又回顾了斯大林逝世之后，贝利亚在党内外所干的一些活动，其中包括贝利亚对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党的组织工作的插手和干涉。我揭露了贝利亚，象所有共产主义的敌人所干的那样，企图挑起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党中央的民族敌对情绪，分裂苏维埃的神圣联盟。我还提到了他在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对被囚禁、被流放的同志们所要采取的卑鄙的迫害阴谋。我明确地指出，贝利亚的险恶用心是妄图把这种残酷的政府迫害合法化、制度化。最后我又强调说：“根据我对贝利亚所作所为的观察，我认为他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投机钻营的野心家。他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任何真正的共产党人都不会象他那样在党内横行霸道。”

在我发言之后，布尔加宁也要求上台发言。他也对贝利亚的卑鄙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紧接着就是其他同志的轮流发言。莫洛托夫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良好的党的立场。

每一个发言的同志都对贝利亚表示了谴责，只有米高扬一人除外。米高扬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他在会上还是重复了我们在会议之前个别谈话时的态度。他认为，贝利亚会虚心接受我们的批评，並能够坚决改正；贝利亚並不是不可挽救的，他在党的集体领导下还是能够有所作为，努力为党工作的。”

大家都发言之后，马林科夫作为会议主席本应该进行总结，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可是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他却紧张得不知所措。米高扬发言之后，会议出现了冷场，大家一片沉默。我感到有可能出事，便向马林科夫要求发言。按照我们事先的计划，应由马林科夫对大家的发言进行总结，然后由我向会议提出一个建议：撤消贝利亚部长会议付主席、内务部部长、以及他在政府中的其他一切所有职务。

我上台提出那个建议之后，马林科夫自然处于惊慌之中，乱了方寸。他甚至忘了要求对我的建议付诸表决，就按下电钮向隐

蔽在隔壁房间的将军们发出信号。朱可夫第一个冲了进来，随后莫斯卡连科和其他军官也冲了进来。马林科夫用微弱的声音向朱可夫同志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命令你把贝利亚扣押起来，听候调查和处理。”

“举起手来！”朱可夫对贝利亚厉声地喊道。

莫斯卡连科和其他军官也都把手枪抽了出来，以防贝利亚可能进行任何挣扎。贝利亚企图伸手去拿放在身后窗台上的公文包，我一把把他的臂抓住了。过后我们对他进行了搜查，无论是在公文包里还是在他身上都没有搜到什么武器。他突然伸手去拿公文包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

贝利亚马上被武装看押在部长会议大楼马林科夫办公室的隔壁房间。这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贝利亚已经被扣押，可是我们把他关在哪里更安全呢？我们不能把他交给已经与内务部合并的国家安全机关，因为那里大部分都是他的人。贝利亚的副手是克鲁格洛夫^①和谢罗夫。

我不太了解克鲁格洛夫，但却非常了解谢罗夫，而且对他非常信任。我当时认为，现在也一直认为，谢罗夫是一个正直的人。即使他有一些令人怀疑的举止，就象所有契卡的秘密人员一样，那只是斯大林大搞政治迫害的结果。一开始我提出建议，由谢罗夫把贝利亚看押起来，其他同志表示反对。最后我们决定：把贝利亚交给莫斯卡里连科，由他带人把贝利亚秘密转押在防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地下室里。

^① S·N·克鲁格洛夫是国家安全部队的上将。他曾担任过斯麦尔（“消灭间谍和别动队”的简称）付主任。在雅尔塔和德黑兰会议期间，他曾负责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安全警卫工作。甚至在卫戍部队内部他都以残忍凶悍而著名。与他的同事不同的是个人是勇敢的他后来接替贝利亚担任了内务部部长的职务。1957年被解职。那时的国家安全部头目不是谢罗夫。而是赫鲁晓夫的亲信谢·杰·伊格纳捷夫。

把这件事情安排完毕，马林科夫把我叫到一边说道：“我的侍卫长有一个情况向你反映。”那个同志走过来告诉我：“我刚刚听说贝利亚已经给抓起来了。我有个情况向您报告，贝利亚曾经强奸了我的继女儿，她是一个七年级学生。这事发生在一年以前。那时候我女儿的奶奶刚刚去世，我妻子不得不去医院，只有女儿一人在家。一天晚上她出去到贝利亚住所附近买面包。路过贝利亚的住宅，她发现一个老头紧紧地用眼睛盯着他，心里十分害怕。不一会儿就来了一个人，把她带到贝利亚的家里。贝利亚让她坐下一起吃饭，拿酒把她灌醉，然后便把她强奸了。”

我告诉那个同志：“在对贝利亚的罪行进行调查的时候，我要求你把刚才所讲的情况一定要如实地告诉调查人员。”后来，我们从调查人员那里了解到，被贝利亚糟蹋的姑娘和妇女竟达100余人。他作恶的手段基本都是一样：先请受害者吃饭，然后在酒里放上安眠药把她们麻醉。

贝利亚被关押起来之后，提出需要笔和纸。我们进行了商量，虽然有些同志对此存有疑虑，我们还是决定可以给他，也许他会写出一些交待，更便于我们调查。

然而贝利亚却写了一些纸条。第一个就写给马林科夫：“叶戈尔，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我们不是知心朋友吗？你怎么相信赫鲁晓夫呢？一定是他让你这么干的，对吗？”等等、等等。他给我写过二、三张条子，对天发誓他是一个正直而清白的人，等等、等等。

我们不相信当时的检察长能够对贝利亚的调查秉公办理，所以把他撤掉了，由鲁金科同志接替。^①当鲁金科开始审讯贝利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所面对的家伙简直是一只野兽，一只毫

^① R·A·鲁全科是乌克兰人，曾经担任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苏联首席检察长。1953年起担任了苏联总检察长。

无人性的野兽。当我们打开他地下室的大门，把贝利亚提出来进行审讯的时候，看着他那狡诈的神情，我们想象得到，贝利亚曾经使用怎样的手段来达到他卑鄙的目的。他不仅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而且毫无羞耻之心。

贝利亚被逮捕之后，又出现了怎样处理麦尔库洛夫的问题，他当时是国家监察部的部长。^①我承认我对他的印象不错，认为他是一个好党员。他无疑受过良好的教育，总的来讲我还是非常欣赏他的。所以我对其他同志说：“他是贝利亚在格鲁吉亚的副手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贝利亚在那里进行阴谋罪恶的帮凶。也许他是无辜的。我们不能把所有为贝利亚工作过的同志都视为他的帮凶。我们还是把麦尔库洛夫叫来，跟他好好谈谈，也许他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许多关于贝利亚的疑团。”

经过其他同志同意，我把麦尔库洛夫召到了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告诉他，贝利亚已经被逮捕，我们正在抓紧进行调查。我对他说：“你曾帮助贝利亚工作了许多年，麦尔库洛夫同志。所以我们认为，你可以帮助中央对贝利亚的问题进行调查。”

“我愿意尽力而为。”

“那么，就请你写一份报告上来。”

几天以后，麦尔库洛夫交来了一份长篇报告，简直是无懈可击。报告读起来就象是一部小说。这个麦尔库洛夫简直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他本人就曾写过剧本和小说。我把这份报告送到调查办公室以后，鲁金科给我打来电话，要求与我面谈。他一走进我的办公室，就直言地告诉我，如果不把麦尔库洛夫也逮捕起来，对贝利亚问题的调查将会受到阻力。

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对麦尔库洛夫的逮捕。我个人非常遗憾，

^① VN·麦尔库洛夫虽然是贝利亚的同党，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秘密警察。1946年阿巴库莫夫接替他担任了克格勃的最高领导，但是很快他又被任命为国家监察部的部长。他与贝利亚一起受审，和被处决。

因为我还是对他很有好感。经过调查，麦尔库洛夫确实参与了贝利亚的一些罪恶活动，而且是首恶分子之一。在法庭对他宣判之后，他在自己的遗言里曾诅咒他第一次认识贝利亚的那一天、那个时辰。他痛悔是贝利亚给他带来了末日。所以，在调查的最后日子里，麦尔库洛夫承认了他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并对贝利亚进行了揭发。

贝利亚下台以后，空气一直非常沉闷。这时出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物。他就是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多夫仁科，一个杰出的电影导演。他在卫国战争期间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贝利亚被逮捕之后不久，他给我打来电话要求见面。我把他请到办公室里来，他向我讲述了下面的一个故事。

一天，曾经拍摄过《柏林的末日》的导演齐阿乌列里叫多夫仁科去看他。齐阿乌列里的影片《柏林的末日》是完全仗着斯大林的恩赐所拍摄出来的。在影片中，完全不是巧合，斯大林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一个空旷的大厅里构思着伟大的军事计划；在他的周围排着一圈椅子，上面一个人也没有；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仅仅坐着一个人，那是波斯克列贝舍夫将军。斯大林去世以后，贝利亚也被抓起来了，我们把齐阿乌列里送到了乌拉尔山区，生活很不得志。我不知道他在世界电影艺术界的地位如何，也不知道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他从对他的批评中是否得到了什么教训。不管怎样，齐阿乌列里把多夫仁科叫去了，并对他说：“多夫仁科同志，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去见一见贝利亚同志。他是知道你的，对你也很有好感。他有一个问题想要与你谈谈。如果你去的话，对你没有坏处，只有好处。”多夫仁科不明白，为什么齐阿乌列里希望他去朝拜贝利亚？他与堂堂的内务部长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后，他决定还是不去为好。

我对多夫仁科解释说：“依我看来，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齐阿乌列里是想拉拢你为贝利亚效劳。他心里非常清楚，你

是一个很知名的人士，所以你对贝利亚实现他的阴谋会有帮助。贝利亚希望把你拉拢过去，一旦他们血腥的屠杀开始，他会需要你来为他唱颂歌的。贝利亚要与你谈的问题一定也是血淋淋的，因为他脑子里除了他的罪恶阴谋以外没有别的。”

我认为多科仁科是一个正直、真诚、坦荡的公民。他有时所讲的一些心里话，对于领导者来说是不大顺耳的，但从坦率的朋友那里听到的批评总是比从敌人那里听到的恭维要有益处的多。如果一个正直的人确实错了，领导者指出之后，他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他对了，领导者也能够吸取有益的意见。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去世以后，我曾敦促乌克兰人将基辅电影制片厂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他们也这样做了。

多夫仁科所叙述关于贝利亚妄图拉他下水的事，只不过是贝利亚逮捕后所揭发的第一批材料中的一例，但这不是最为惊人的一例。

第二节 苏共二十大

贝利亚被捕于1953年6月。就苏联国内政治形势而言，真正的危机转折点还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次会议之后，一切都变得无声无息。

从1953年6月至1956年2月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一个政治上成功或死亡的关键时期。1953年9月，他担任了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这一职务在斯大林去世后曾由马林科夫接任，但过10天之后，他就被迫辞去了这一职务。从那以后，虽然马林科夫还一直保留着党籍，但是党的第一书记却一直是个空缺。赫鲁晓夫填补了这一空缺之后，曾经千方百计要维持的集体领

导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1955年2月马林科夫又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由布尔加宁接替。布尔加宁也仅仅是一个辅助和过渡的角色。马林科夫在政治局自然有着很大的影响；莫洛托夫、米高扬、以及其他的苏联高级领导人也显然对他们所推选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监督。

尽管如此，众多的迹象表明，赫鲁晓夫为了获得最高而绝对的领导权曾进行了公开的争斗。他把工业和农业都翻了个底朝天，特别是他的土改运动更是搞得轰轰烈烈。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虽然人们知道有一些高级领导人强烈反对他所推行的一些政策，人们却都知道赫鲁晓夫是苏联的真正的实权人物。比如说；米高扬反对他的土改运动；莫洛托夫也由于与他意见分歧而遭到他公开的羞辱。赫鲁晓夫还大搞个人崇拜。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斯大林的某些观点。他和斯大林都认为，世界如果发生核战争，苏联自然是战无不胜的；他和斯大林一样，都大搞重工业而忽视人民生活最需要的消费品的生产。（马林科夫曾经宣布，如果爆发核战争，苏联将会同地球一道毁灭；马林科夫曾经开始实施一个计划，把宝贵的人力和财力从重工业上削减一部分，用于消费品的生产。）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赫鲁晓夫已经在党内取得了强有力的地位和影响，但是还不是绝对的最高权力。1957年六月，所谓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反党集团被粉碎。从那以后，赫鲁晓夫才夺取了绝对的权力。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与斯大林还是不一样的。如果他的亲密战友们一致反对他的某些作法时，他并不是一意孤行。下文中所记述的1964年10月所发生的事件就是一个明证。

关心苏联问题的读者会发现赫鲁晓夫关于“秘密报告”的回忆非常精彩。这篇报告就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勇敢揭露的

历史上著名的“秘密报告”。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意见分歧很大，赫鲁晓夫显然处于分歧的中心位置。一些人认为：斯大林已经去世，国家有了新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工作就应该执行新的路线。另一些人认为：推行新的政策是不必要的。赫鲁晓夫的冒险行动一定会使他倒霉。

苏共二十大会议的前期，赫鲁晓夫在正式的工作报告中丝毫没有露出任何迹象，他要对已故的导师斯大林进行谴责。可是后来他便采取了突然的行动。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爆炸，但是他的赌博还是值得的。

国家和党内都出现了一种非常矛盾的情形。斯大林已经去世，而且已被埋葬，但是直到贝利亚被捕的时候，斯大林所奉行的政策却依然如故。一切照旧。那些被打成人民的敌人的同志们有些已被入土，有些仍被囚禁，被流放，没有人想着为他们平反申冤。他们就这样一直背着历史强加给他们的耻辱一直到了党的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斯大林死后长达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仍然留在历史的阴影中，没有勇气，也没有决心揭开历史的黑幕，让阳光现出那些在斯大林时代见不得天日的秘密逮捕、审讯、残杀以及一切罪恶行径的原形。就好象在斯大林时代我们被套上了锁链；在他去世之后，我们却找不到钥匙打开这些锁链。直到1956年我们才终于挣脱了公民肃清反革命的歇斯底里的恐惧。

由于斯大林的影响，我们一直错误地认为：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与他们决战。斯大林把这种歇斯底里不仅落实在行动上，而且还搞出了一整套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我们全力进行阶级斗争，全力保卫革命的果实。我们当然不能说，所有的死刑判决都是违法的犯罪。但惨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却是铁的事

实！斯大林是有罪的，他犯了法律所要严惩的故意杀人罪，他的罪行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会受到严惩；只有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国家里，这种暴行才可以肆虐无忌。^①

随着贝利亚的被逮捕，我们对他的罪行进行了最大的调查。调查结果揭出了许多我们简直无法想像的暴行。我们被秘密机关对人民所施行的残暴震惊了。

我清楚地记得，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克德罗夫被打成人民的敌人而被处决的内幕。克德罗夫是北方的第一任总司令。他负责领导了抵御英军保卫祖国领土的那场战斗。

虽然通过对贝利亚的审判，我们大开了眼界，但是我们仍然不敢承认斯大林本人就是贝利亚许多暴行的后台。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对全体党员和人民进行了错误的解释，把一切罪过都说成是贝利亚干的。实际上，他仅仅是一个得力的帮凶。当时我们千方百计地为斯大林遮遮盖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们是在包庇一个罪犯、一个凶手、甚至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我要重申的是：直到1956年，我们才终于摆脱了这种历史的愚弄。

我第一次感到我们是在自欺欺人的时候，是我1955年访问南斯拉夫的与铁托的那次谈话。当时我们谈到了政治迫害的问题，我认为斯大林时代的那些暴行都是贝利亚的主谋，然而南斯拉夫的同志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了许多尖锐讽刺的挖苦。我们被激怒了，极力为斯大林进行辩护。现在我已经完全明白，我们的确是在自欺欺人。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需要揭露丑恶，找出元凶，我们还必须采取措施以保证斯大林的悲剧，永远不再在我们的党内重演。

^① 把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这是赫鲁晓夫，也是苏联任何政治家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斯大林是一个非凡的、强有力的领导者。为此，对于他的逝世我还是感到悲痛的。当时我以为：虽然他靠专制巩固了他的权力，而且时常滥用职权，但是总的来讲，斯大林的权力还多是以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为出发点的；他的方法是错误的、甚至是野蛮的，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对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进行过真正深入的彻底的评价。

历史终归是无情的。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我无法得出现成答案的问题。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开始忧思：为什么所有被囚禁的人没有一个被释放？所有被处决的人没有一个被平反？我自己问自己：难道从法律的角度讲，所有这些逮捕和处决都是合法的吗？然而斯大林毕竟还是斯大林。即使在他死后，他仍然拥有着不可冒犯的权威。因此，尽管当时我心里产生过怀疑和忧虑，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斯大林会滥用职权。

也许是因为受到对贝利亚调查结果的震惊，我产生了一种欲望，要把历史的黑幕掀开更大一点，要彻底查清都有哪些人被逮捕，对他们的审讯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逮捕他们最初的证据和起因又都是些什么。

在一次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建议进行了一个彻底的调查，以便我们对斯大林时期贝利亚之流所犯下的严重罪行，能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考虑到党的二十大不久就要召开，我的心情就更加急迫和焦虑。^①

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显然对我的提议没有热情。我记得，米高扬虽然没有积极表示支持，但却没有反对我的提议。我对那些反对这个提议的同志解释说，二十大将是斯大林

^① 事实上，一个正式的调查委员会是在贝利亚被处决以后，于1954年经过苏共中央的批准才成立的。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宣布：根据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查证，7379人被平反。

去世后的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我们应该向全党证明，对于党和国家的领导我们是承担全部责任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做到对斯大林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斯大林在位时，我们国家发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那么多人被逮捕、被处决。对这一切，我们怎么能胡里胡涂呢？！如果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话，人们肯定会问我们：为什么那么多人仍然关在监狱里面？对于他们今后又怎么处理呢？总之，我们必须回答：斯大林生前，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在他死后，他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什么。

后来，我们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并决定由波斯别洛夫具体负责。^①调查委员会所取得的证据，对某些领导人来说是完全出乎意外的。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布尔加宁、别尔马辛、萨布罗夫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我认为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对于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是非常知情的，所以对于调查结果他们一定不会感到太惊奇。米高扬也比我们几个知道得多，他对于调查可能出现的结果也比我们更有思想准备。我不能肯定，他知道事实的全部真相，但是他与斯大林交结甚密也是事实。许多在米高扬身边工作的同志，包括他曾经非常信任的同志，都被一个个抓了起来。由于我了解米高扬其人，了解他的精明、了解他对形势高度的洞察力，所以我认为他是知道事实真相的。

至于卡冈诺维奇，我认为他是不会知道多少真相的。斯大林不会非常信任他的。卡冈诺维奇生性唯唯诺诺，如果斯大林闭一

^① 彼尼波斯别洛夫（真名叫普格尔逊）。他是苏共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1940—1949年，他任《真理报》总编辑，1949—1952年，担任马恩、列、斯学院的院长。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者，曾与苏斯洛夫一起工作。以前外界并不知道，那份“秘密报告”中的证据是由他负责收集的。

下眼睛，告诉他为了革命的利益，他就会把他的亲爹都扼死。这样的人谁一吓唬都会破胆的。

下面谈一谈马林科夫。在大清洗开始的时候，他负责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掌管着所有的人事档案，所以在整个大清洗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曾经提拔了一些人，目的只是为了以后将他们治罪。我并不是说，他在大清洗中是主动出谋划策的。但是铁的事实证明，凡是斯大林把马林科夫派去进行整顿的地区，成百上千的人被清洗、被治罪。①

转眼间到了党的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夕。我本人并不愿意由我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因为我想到，既然我们在大会上要强调集体领导，那么再由党的第一书记作工作报告就是不适当的了。在二十大召开前夕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我曾提议，大家最好讨论一下由谁来作这个工作报告更合适一些。从资历来讲，莫洛托夫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他本人以及其他同志都一致认为还是应该由我来作这个报告。我感到他们完全是出于真诚，而不是虚情假意。他们的理由之一是：由第一书记来作工作报告，可以减少磨擦，而如果要选出另一个报告人的话，候选人这么多，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斯大林去世以后，没有哪一个人被公认为是苏联的领袖。虽然许多人有这个野心，但却没有一个明确而公认的绝对权威。②因此，我作为党的第一书记便被指定作党代

① 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对于斯大林的大清洗是积极支持的。但是赫鲁晓夫负责的马克兰也有不少人被清洗。

② 为了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地位，确实有很多“野心家。”但主要还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苏共二十大以前的一年里，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赫鲁晓夫都千方百计地以“权威”的面貌出现。他的支持者，特别是马克兰和哈萨克的支持者不断受到提升。新的个人崇拜又在苏联掀起。马林科夫自然没有放弃争夺。所以赫鲁晓夫，一个从来不承认失败的人，是不会愿意由别人来作党的工作报告的。

会上最重要的工作报告。

我先拟了一个初稿，然后提交中央讨论和批准。那个工作报告是集体创作的成果。在准备这个报告的时候，中央还征求了理论界以及其他一些团体的广泛意见。

二十大终于开幕。我作了工作报告，然后全体进行讨论。我们在面临一个真正的考验。每一个人都在问：斯大林逝世后这次中央全会将会是什么样子？我可以这样说，这次大会非常顺利。一个接一个发言者，都对中央的路线表示赞同和支持。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①

尽管大会进展顺利，我的报告也受到一致好评，但是我是不满意的。我的心里自然非常焦虑：“大会终归是要散去；决议虽然都被通过，但那只是形式上的。那么散会以后呢？成百上千屈死的人们会使我们的良心不得安宁。我简直不能使自己平静。1934年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都遭了难，而且大部分已经被处死。总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最后我鼓足了勇气，抓住一次机会，当只有主席团的成员在场的时候，我把问题彻底揭开。

“同志们，波斯别洛夫同志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呢？对于那些被逮捕、被处决的同志们我们又怎么办呢？大会很快就要结束，而我们对于斯大林滥用职权所犯下的罪行却只字不提，我们难道就这么结束了吗？我们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所有在肃反和大清洗中受难的同志都是无辜的。我们还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们是正直而忠诚的男人和妇女；他们不仅不是人民的敌人，而是赤胆忠心的战士。他们忠于党、忠于十月革命，忠于列宁主义。他们是为了苏联的社会

^① 难以令人相信。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仅仅3年，难道就清理了所有反对派吗？

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蒙受不白之冤的。我们再也不能把他们继续关在监狱里和流放地。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把他们解救出来。”^①

我的话音未落，许多人便开始对我进行攻击。伏罗希洛夫大声地叫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能这么讲话呢？你以为你在中央全会上讲这番话，你能有好日子过吗？你所说的又对党和国家的声誉有什么好处呢？在这种场合讲这些事情，是根本不可能保住秘密的。传出去以后，人们就会知道斯大林都干了些什么，人们还会指着我们的鼻子质问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又都是干什么吃的。”

卡冈诺维奇也对我进行了类似的指责。不过他对我的指责完全没有什么深刻的理性分析。他完全是作贼心虚。他是想逃避责任。即使要揭露罪恶的话，他讲别人的可以，一旦触到他自己，他就怕得要命。

我非常冷静地对这些攻击给予了有力的回答：“即使从你个人的利益来考虑，要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受冤屈的同志早晚会走出监狱和流放地，他们会回到我们中间，来找我们控诉。他们会告诉亲戚、朋友、同志，以及他们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那些年斯大林和他的同谋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全国乃至全党都会要问，这些老同志为什么在监狱里被关了10年、15年？为什么？为了清白和无辜！对他们的一切指控都是瞎编的！对他们的判决也全是非法的！我希望同志们能好好想一想，这次大会是斯大林死后的第一次最重大的会议。对于那些白色恐怖的、黑白颠倒的年代我们能不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吗？我们身为党的高级

^① 赫鲁晓夫没有提到，在这次会议上米高扬曾对斯大林提出过非常严厉的批评。其他的委员也对个人崇拜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赫鲁晓夫自己倒是斯大林坚决地粉碎“人民的敌人”进行了很高的赞扬，尽管11天以后，在他的“秘密报告”里他又极力谴责这个可恶的名称。

领导人，在斯大林所制造的混乱之后，有责任把问题讲清楚，包括我们自己的问题。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他所犯下的罪行，我们都是有责任，我们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了。”

我接着十分诚恳地说：“同志们，我恳求你们能够支持我。大会就要结束，代表们马上就要走向全国，而且许多被冤屈同志的刑期已满，他们也马上会走出监狱。他们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人们进行诉说。人们，包括这次会议的代表会问道：“这怎么可能？党的最高领导为什么对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点没有注意到？还是他们知道了不说？”人们的疑问是有道理的，我们确实在装聋作哑。如果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那简直是在向人民撒谎。波斯别洛夫同志所进行调查的结果现在就在我的手里。我们对一切都已经查明。人们都知道我们党内虽进行过血腥的大清洗，我们必须把真相告诉人民。”

底下又是一片吵嚷。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又是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在自找麻烦！对于斯大林所干的一切，全党都会认为我们都是帮凶。即使我们根本不知道斯大林的秘密活动，那么“不知道”也是不能原谅的。我们必然要付出代价。”

我回答说：“你们都知道我们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所以我们，作为党的高级领导，没有理由不知道下面都发生了什么乱子。我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许多事情都不知道，那是完全因为我们的制度有问题。在专制的制度下，一个人只能服从命令，而没有民主可言。所以过去，我们太专制了！太无知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过去都是无知的。有些人完全知道真相，甚至还亲手干过。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责任大小各有不同，但是我个人，作为七大以来历届的中央委员，是甘愿在全党面前承担严重的责任的。”

这时候莫洛托夫发言了：“你想到这么做的严重后果了

吗？”

伏罗希洛夫自然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不断地喊道：“谁要求我们这么做了？谁又要求我们必须在大会上公开地讲这些事情？”

“没有人要求。”我回答说。但是罪行已经犯下了，是不是？我们自己至少可以承认那是犯罪吧？既然是犯罪，人民不可能永远不知道。我们可以暂时装聋作哑，但是等人民知道以后，他们就会对我们更加气愤。我可不愿那么做，我宁愿好汉做事好汉当。

吵到这种地步，我们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我心里明白，在我们内部，如果没有达到意见的一致，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提到党代会上去的。我决定试一试其他的途径。

我说：“党代会在顺利进行，但是过去一贯的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领导的党的纪律已经不适用了。既然党的工作报告已经作完，我提醒大家注意，主席团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利在大会上进行个人发言，发表不同意见，哪怕这种意见与工作报告中所制定的党的路线是不一致的。”

我不用明确告诉他们，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个人就准备采用这种方式在大会上进行个人发言，对大清洗、大迫害发表我个人的看法。我还说：“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犯了罪，他总还有一个进行忏悔的机会；在他表示忏悔的时候，虽然他不能因此而就变得清白，但至少他可以得到宽恕。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对于斯大林时期所犯下的错误能够坦白地承认，那么我们也会得到人民的宽恕。这个坦白的机会已经到了，这就是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果等到党的二十一大，那就太晚了；即使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逃脱自己的责任，那也是太晚、太晚了。”

这时候有一个人主动发言，他说：“既然这样，那么好吧。最好还是有一人把斯大林的错误在会上讲一讲。”就这样，大

家最后还是勉强同意，由一个同志在会上发言。我记得，布尔加宁、别尔马辛、萨布罗夫，可能还有马林科夫对我还是支持的。下一个问题就是由谁站起来在会上进行这个发言。由我进行这个发言，我个人是不同意的，因为我已经在会上做过工作报告，对于波斯别洛夫的调查结果只字未提，现在我又怎么能根据调查结果再做一次新的报告呢？可是其他的同志却坚持认为：‘如果由波斯别洛夫在会上发言，虽然他也是党中央的一个书记，但是会使代表们产生疑问，‘为什么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对这件事一字不提？为什么波斯别洛夫又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个问题？赫鲁晓夫难道以前不知道吗？或者他知道的话，他为什么不加以重视呢？’所以如果你不做这个发言，就有可能造成领导集团内部分歧很大的印象。”

同志们提出的这些理由很值得考虑，最后我还是接受了。按照当时的决定：由我在会上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发言，而波斯别洛夫则负责将调查报告改成一个发言稿。^①在大会闭幕前夕，我们安排了一次特别会议，我在会上做了发言。

代表们全都静静地听着，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可以想像我们对那些暴行的揭露使代表们完全震惊了。这些暴行是许多代表、许多党员，包括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和新成长起来的年青党员所亲身经历过的。这些暴行的卑鄙和残忍是大多数代表在党的历史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悲剧，一个由于斯大林

^① 秘密报告的问世比赫鲁晓夫在这里的回忆显然要复杂得多。这篇讲话长达2万余字，内容翔实，显然在会议开会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赫鲁晓夫早有计划对斯大林进行谴责的话，那么他就会象米高扬那样在工作报告中对自己的观点有所表现。所以最大的可能是，赫鲁晓夫是受到压力而发表的，这个压力就是对他树立个人崇拜的阻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便抓住机会表现自己，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实话。

畸形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列宁曾经对此警告过我们，斯大林在对米高扬和我的谈话中也自己证明他性格的缺陷——“我不信任任何人，甚至连我自己也不信任。”

就这样，党的二十大关于斯大林严重问题的报告问世了。这个报告本应该属于秘密的范围，但事实上它被完全泄露出去了。为了便于让兄弟共产党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允许他们传阅一些复印件。波兰共产党也是这样收到了一份。然而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波兰共产党总书记贝鲁特同志逝世了。他的去世在国内造成了很大的动乱，我们的文件也因此落入了一些对苏联怀有敌意的领导人手中。他们别有用心地利用了我的讲话，到处散发复印件。我听说街上卖得很便宜。这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前夕所做的发言，被认为是没有多大价值！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间谍都可以在市场上轻易地买到一份。

这就是那份文件为什么得以公开出售的原因。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对此进行过肯定。我记得，每当记者问我：“您是否可以谈谈以您的名字出版的那篇讲话呢？”我总是对他们说，这事我一点都不知道。这样，他们就只好去问杜勒斯了，也就是美国的间谍机关。^①

回顾过去，我认为我并没有做错，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上宣读这份报告，更是非常正确的。

事情也完全可以另外是一个样子。我们刚刚摆脱了恶梦。许多人仍被关在监狱和流放地里，我们不知道怎样对他们进行解释；在他们被释放以后，也不知道怎样来安排他们。我们完全可以把斯大林的严重问题全推在贝利亚的身上，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贝利亚被宣判之后，我们为了党的长远事业，揭露了斯大林

^① 这里要注意的是，关于秘密报告的真相，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

的罪行，这是非常正确的。可是直到今天，却仍然有不少人还是认为斯大林是“人民的父亲和朋友”，而真正的元凶是贝利亚。他们认为，斯大林没有罪，只是他的助手们不好；贝利亚把斯大林骗了；人民之所以遭难并不是斯大林的本意，而是贝利亚利用了斯大林的权威。

不久以前在我收听收音机的时候，我听到了肖洛霍夫的广播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通过两个渔民的对话，试图说明在斯大林时代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个渔民问：“你对斯大林同志怎么看？人们说对于那些无耻的行径他忽略了。那么多正直、忠诚的人们被逮捕，被处决。斯大林同志怎么能不管呢？”

另一个渔民答道：“是的，真是不可思议。”

第一个渔民又问：“贝利亚难道不是真正的元凶吗？不是他负责向斯大林报告的吗？”

“是的，都是那个可恶的贝利亚干的。”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固然是一个聪明人，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但是他却没能正确地看待斯大林对我们党所造成的危害。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加以明确：不是贝利亚造就了斯大林，而是斯大林造就了贝利亚。而且在贝利亚之前斯大林还造就了叶若夫。“黑莓”和“装甲拳头”就是斯大林给叶若夫起的外号。在叶若夫之前，斯大林还造就了雅格达。他们就这样一个个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斯大林所培养的这些演员往往是短命的，不断更新的，这正是斯大林的性格逻辑的一大特色。他总是利用自己的心腹去迫害那些无辜的人。当他的打手把别人打下去之后，他便可以高高在上；当那帮刽子手声名狼籍的时候，他又把他们打下去，再换上一批新的。就这样历史曾经出现过3个梯队的恶棍：首先是雅格达，其次是叶若夫，然后是贝利亚。这根链条直到斯大林死去才被打断。

在党的二十次召开以前，我虽召见过最高检察长鲁金科同志。他曾经参与了三十年代大清洗的许多案件。我问他：“鲁金科同志，我对公开审判很感兴趣。告诉我，对布哈林、李可夫、西尔佐夫、洛米纳泽、克列斯廷斯基以及其他许多、许多中央委员、组织部和中央政治局中的有名人物的指控，究竟有多少材料是属实的？”

鲁金科同志回答说，从司法的惯例来讲，宣判这些同志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什么证据也没有。对他们治罪的理由只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坦白”，而那些“坦白”完全是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极度摧残的情况下被逼出来的。这是完全非法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这些事情还是不讲为好。所提出的理由是非常荒唐的。我们认在，在审判李可夫、布哈林以及其他人民的领袖的时候，有许多兄弟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这些代表回国之后，便向各自的共产党宣传这些判决是如何如何的正确。为了不让参加公开审判的兄弟党的代表蒙受冤屈，我们便决定无限期的推迟对布哈林等人的平反。现在看来我们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如果早些揭出事实真相，情况就会好得多。谎言永远都是不能持久的。

但是尽管有了上面的错误，第二十次党代会还是成绩斐然的。这次会议最伟大的功绩就是，在全党掀起了肃清斯大林主义的浪潮，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曾经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列宁主义的原则，又开始在全党恢复起来。

第二部
在国外的活动



第十章 出访兄弟国家

1945年赫鲁晓夫出使华沙所起的作用远比他本人暗示的要重要得多。他是计划重建这座遭到惊人的破坏的城市的委员会的主席。当时，华沙市中心看上去只不过是一大片的烟火熏黑了的碎瓦石堆。确实，修复华沙和他的乌克兰境内成了废墟的村镇和城市面临巨大困难。乌克兰的城镇被炸得只剩下一排排不规则的从积雪中露出来的烟囱，令人感觉像一片可怕的墓地。此外，人们简直看不出有城镇的痕迹。赫鲁晓夫对这些困难持蔑视态度，是值得赞扬的。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关于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关系的叙述是如此不着边际以至于除去令人感兴趣的只在于表现他的心理状态。他在平淡无奇地谈论莫斯科对由傀儡政府统治着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态度时，表示：“…我们审慎地避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他指的这些国家是世界上由斯大林的代理人在苏军实力的支持下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统治的那一部分，后来，俄国人在这些国家煽动并策划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审讯和不公正的处决（匈牙利的拉伊克，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以及其他多得数不清的人）。这些事件把中欧和东欧的共产党变成了由本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塑造成的苏联共产党的忠实的复制品。

1945年1月，斯大林打电话到乌克兰问我，“你能立即到莫

斯科来吗？我们这儿急切地需要你。”我从基辅乘飞机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兴致勃勃地接见了。他说，“波兰同志请求我们帮助他们恢复市政公共设施，尤其是供水和排污设施。我们虽然解放了华沙，但华沙人现在却处在孤立无助的境地。他们说华沙成了废墟，他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或者说从哪儿开始做起。你在迅速恢复城市基本设施方面有相当的经验，所以我们打算派你去华沙监督那里的修复工作。”

“很好，”我回答说。“我很愿意去。但我想带一些市政管理人員和机电工程師去。第一件事是使波兰人的发电厂恢复生产，然后是他们的供水和排污工厂。”我要求斯特拉緬托夫同志随行前往。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和电机管理方面的内行。我还要了数名在修建发电厂、供水和排污工程有特长的工程師。我們一起乘飞机到了华沙。

当时被称作“委员会”的波兰政府位于华沙市郊维斯瓦河右岸的普腊加。总理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贝鲁特同志是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①斯彼哈尔斯基将军是华沙市长。我以前见过贝鲁特，但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斯彼哈尔斯基。他们俩人我都喜欢。斯彼哈尔斯基年轻，精力充沛而且工作勤勉。他是一个职业建筑师。至于贝鲁特，我认为他是一个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诚实的共产主义者。他有一个弱点：过于温和，性情和善，容易轻信。他的这些弱点在他的波兰同事们欺骗他时导致了一些复杂的内部纠纷。

我们的工程師和波兰工程師分成三组。一组被派去尽快恢复

^①这些人都是臭名昭著的“卢布林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是俄国人在共产主义波兰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府。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是第一任总管（1944—47年）。他后来被降职，最后在1949年的清洗中蒙受耻辱。贝鲁特很快就成了第一任总统。哥穆尔卡实际上在1945年就担任了党的总书记的职务。

电力供应。第二组负责供水，第三组修理排污设施。波兰人自己负责城市的清理工作。这方面波兰人不需要我们的帮助。我让斯特拉缅托夫负责全面的工作，这样一来，他手下既有波兰专家，也有俄国专家。他负责处理所有的具体问题，然后把总体情况报告给我和其他波兰同志。

我们的人很快就送来了一些好消息。实际上，发电厂只是外部遭到了破坏，厂内的设备依然运转良好。波兰人以为发电厂彻底毁掉了。贯通市区的抽水机械也尚可使用。排污系统也是明显地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听到这些消息我很高兴。在对发电厂的机械和叶轮机的情况作了几天全面调查之后，我对贝鲁特开玩笑说：“为什么你们不把我们即将在华沙修复的电力的一半分给我们，作为我们这次旅行和咨询的报酬呢？我们在基辅肯定能用上它。”我提到的是基辅当时损失惨重的状况。德国人已经把那里的发电站夷为平地了。

华沙又有了电和水。贝鲁特喜气洋洋。他十分慷慨地感谢了我们，并请我们转达对斯大林同志的谢意。很明显，他拼得十分诚恳。在我们离开波兰之前，贝鲁特同志向我建议说：“我们这儿有一个波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一个名叫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的同志。我很愿意邀请你们去他的寓所看看他。他病得很重，出不了门。”

“好吧，”我说，“我很高兴去。”他们安排了一个人陪我去看哥穆尔卡同志。我记得被带进了一个阴暗乌黑的单房间寓所。我们到的时候，哥穆尔卡的妻子正在洗衣服。哥穆尔卡坐在一把椅子上，脖子上高高地围着一块像黑手帕似的东西。

哥穆尔卡同志的俄语不怎么好，但有翻译帮忙，我们还是能够明白各自的意思。哥穆尔卡向我谈了他对波兰事务的总的状况的评价，并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组织党的工作的。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看来知道如何组织党和政府的活动。总之，我看出

他是一位称职的政治领袖和国务活动家。“我眼下病着”他说，“但我不久就会起床走动。”

我向斯大林同志报告我这次旅行的情况时，我跟他提起了哥穆尔卡。我不知道斯大林以前是否听说过他。我们中间其余的人都没听说过他，我怀疑斯大林也不知道。我向斯大林高度地评价了他。^①

斯大林很满意我关于波兰的汇报。我们能够帮助波兰人他感到高兴，他明白，这种援助将会给波兰人民，尤其是华沙的居民留下一个好印象。1939年的条约（即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深深地伤害了波兰人，而且至今创伤依然如新。斯大林想尽可能做一切事情来尽快医治它。当然，他没有坦率地对我这样说，但我能觉察出他在想什么。

战争结束之际，我们有军队驻扎在匈牙利和波兰。斯大林本人对这两个国家^②，另外还有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事务有浓厚的兴趣。我们领导层中的其他人都小心翼翼地不把鼻子伸向东欧，除非斯大林亲自要求我们过问那里的事情。他充满妒忌心理地把持着总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我们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专有职权。斯大林从不重视其

^①当哥穆尔卡的同事们在莫斯科遭到暗杀时，他能在斯大林对波兰共产党进行的蓄意破坏中幸免于难，唯一的原因是他正幸运地待在波兰的监狱里。差不多是在与赫鲁晓夫相遇之后，他立刻得到了再生，成了波兰党的总书记，直到他在1949年因被指控为铁托主义而再一次锒铛入狱。

（这次是由斯大林干的。）他很幸运没遭枪决。后来，赫鲁晓夫在1956年秋哥穆尔卡领导了波兰起义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又一次见到了他。他同乘飞机来华沙威胁波兰人的高级权力人士（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莫洛托夫）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发生了正面冲突，并拒绝了苏联代表团提出的要求。

^②可以想像这是本书中最没有充分表达实情的陈述。

他人的意见，战后尤其是这样。我们其余的人只是听差，斯大林会对逾越这一常规的任何人，发出恐吓般咆哮。

斯大林缠住东欧不放的原因之一，是冷战已拉开帷幕。邱吉尔已在富尔敦作了著名的演讲，督促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力量动员起来反对苏联。我们同曾经一度合作摧毁希特勒德国的英国、法国、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是被彻底地破坏了。

美国正在通过均衡各国的力量来实施它对外政策。美国人有原子弹他们知道我们没有。我们的敌人拥有原子弹这一点就足够糟糕了。更糟糕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是杜鲁门。他既无一点政治家的才能，又没有灵活的头脑，而且还敌视苏联。我想像不出人们何以认为杜鲁门配得上副总统的职位，更不用说总统了。全世界都从报纸上了解到杜鲁门掴了批评他女儿是一个蹩脚的歌唱家的记者一个耳光^①。仅这一件事就多少告诉我们杜鲁门作为政治家的品质如何，更不用提他是否适合美国总统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了。在当时，美国空军以其战斗机的质量和数量而言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国的“飞行的堡垒”和“超级空中堡垒”在赢得反击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世界上的其它飞机现在仍然无法与之媲美。我甚至可以说美国是战无不胜的，美国人自己又炫耀了这一事实，他们派飞机到整个欧洲，侵扰各国边界线，甚至还在苏联的领空飞行过，更不用提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了。美国战斗机没有一天不侵犯捷克斯洛伐克领空。苏联人民感到十分惊恐，认为美国可能会把它的部队派往捷克斯洛伐克，企图恢复在1948年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推翻的资产阶级政府。

美国插手的危险是斯大林之所以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尤其是

^①事实上，杜鲁门根本没有打那个人。但他确实给华盛顿一位音乐评论家写过一封带有粗鲁辱骂语言的书信，这个人曾发表过一篇有关他女儿玛格丽特的演唱的否定性评论。

捷克斯洛伐克怀有如此直接和充满妒忌的利益的另一个原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欧洲政党之中是最优秀的。它有良好的无产阶级领导并享有很高的威望。哥特瓦尔德是主席。^①这些年来我听到过许多有关哥特瓦尔德的赞美之辞，而且我知道斯大林对他评价很高。我自己在1948年见过哥特瓦尔德，那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战胜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一天，我接到了斯大林打来的电话。他情绪很好，邀请我去他正在度假的克里米亚半岛。他告诉我哥特瓦尔德和他的夫人也在克里米亚度假。“到这儿来吧，”他说，“哥特瓦尔德说没有你他再也活不下去了。”我第二天就乘飞机去了克里米亚。

斯大林当时正住在雅尔塔一座沙皇时代的宫殿里，这儿是战时他与罗斯福和邱吉尔会晤的地点。哥特瓦尔德也住在同一宫殿里。我们进行了多次长谈，一般都是在就餐的时候。这是一些随意性的交谈，丝毫算不上正式的或官方的谈话，但我们谈论的是严肃的话题——也就是，农业和经济。

有一段时间，斯大林总是怀疑地问我，“哥特瓦尔德说捷克斯洛伐克人甜菜的产量达563到675磅，而战前乌克兰的甜菜产量只达大约366磅，这是真的吗？”

“斯大林同志，这是真的。”我回答说。哥特瓦尔德逸透的情况对斯大林来说是陌生的，他问怎么可能是这样。我派农学家对此作了调查。他们报告说，这首先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没有遭到那种吞噬乌克兰甜菜的象鼻虫的侵害，另外，捷克斯洛伐克夏

^①克利门德·哥特瓦尔德在1946—48年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从1948年共产党接管直到他1953年去世，他一直是主席。鲁道夫斯兰斯基从1945年到1951年十一月被捕一直担任着党的书记的职务。斯兰斯基被捕后，哥特瓦尔德没有接过官衔，就继任了他的党的书记的职务。

季的降雨量比我们种甜菜的乌克兰地区要多^①。

这一点使斯大林明显地不高兴了。他想要我们的农业和集体农庄制度优于哥特瓦尔德的制度。他想要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在农业上、工业都应是最好的。因为当时我们乌克兰的农业生产最好，他就把我叫到克里米亚，为的是我能在他同哥特瓦尔德辩论谁的农业更先进时为他的结论提供依据。但是，我在讨论刚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把产量记录摊了出来。没有什么可辩论的：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达到了比我们的乌克兰更高的水平。

几年以后，当哥特瓦尔德率领捷克代表团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时，我又见到了他。哥特瓦尔德在莫斯科患了重病，不得已被送回布拉格。他不久就死去了。

当时任我们的国防部长的布尔加宁被指派代表苏联参加哥特瓦尔德的葬礼。他回到莫斯科后汇报说，布拉格的局势变幻不定，难以预料哥特瓦尔德的后继人会是什么样子。纵使我们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相当好，但哥特瓦尔德之死引起了我们的忧虑，因为我们同他之间的密切关系，一直是连接我们两党和两国的主要纽带。

位于哥特瓦尔德之下的萨波托斯基总理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主席。斯兰斯基总书记死后，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他被捕（和被处死刑）之后，诺沃提尼成了党的领袖。^②我不太了解那

^①当然，在欧洲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同的国家一样先进而且比大多数国家先进。这主要归于技术和化肥作的用而不是因此设有象鼻虫。

^②哥特瓦尔德在斯大林逝世后不久也于1953年去世，从1948年以来一直任总理的萨波托斯基继任主席。诺沃提尼成为党的书记。1957年萨波托斯基死后诺沃提尼接任主席，他同时还担任着党的书记的职务，所以说，他实际上是捷克的独裁者。在茅特豪森纳粹集中营度过的4年里诺沃提尼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坏名声：他以出卖更不幸的犯人为代价很快为自己换来

了可信赖的人的称号，为他本人和他的朋友赢得了特权，并利用他的特殊位置制服他的敌人。战后，诺沃提尼之所以能快速升级主要是因为他帮助揭露了被指称为斯兰斯基和其他人的阴谋。他的揭露致使斯兰斯基等人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导致他们受审判、被处死刑，这些活动都是以三十年代苏联审判叛国罪犯的方式进行的。诺沃提尼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就开始用斯大林的方式统治捷克斯洛伐克，反对变革，直到1968年春天他才被一切宣泄民愤的伟大的改革运动的浪潮所倾覆。这场由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的改革由于苏联的入侵，而遭到了十分悲惨的结局。

些促成诺沃提尼走上支配地位的事件。我所能谈的只是我出访捷克斯洛伐克那段时间，即在诺沃提尼已经成为中委委员会的书记之后发生的事情。

当我们听到诺沃提尼被提升的消息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何人。这是他第一次进入国际舞台。但是，我们了解到他一直是布拉格市委委员会的书记，这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强有力的党组织，我们还了解到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享有广泛的声誉。但这只不过是谣传而已。

当我第一次见到诺沃提尼时，我很喜欢他。我依然认为他是一个好的诚实的共产主义者，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阶级的事业。我从未对此产生过疑问。当我看到他们行动之时，我意识到他是一个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人。总之，我和他关系很好。

我还见到了诺沃提尼的内务部长。^①他是苏联忠诚而热情的朋友。但他后来被捕了并且遭到了审判等等。我承认我为此感到

^①1962年，诺沃提尼派人逮捕了鲁道夫·巴拉克，并判了他15年徒刑。他用这种方式干掉了他唯一的有危险的对手，同时把巴拉克当成了他自己没能满足赫鲁晓夫关于加快在捷克斯洛伐克减少斯大林化的相当苛刻的要求的替罪羊。

非常难过，但是我丝毫也替他说不上话，因为已经有了无可辩驳的证明他有罪的证据。

另外，我们当时谨慎地避免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我们认为，每个共产党都应该而且愿意自己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因此，当我们获悉我们不赞成的信息时，我们有时阐明我们的观点和疑虑，但一般说来我们让兄弟党自己做决定。这种实践依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情况来看是适用的。

但是，我确实记得一个小插曲，有一段时间我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之间关系有些紧张。我当时是准备去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在我们动身前开的会议上，我告诉我的同志们说，我非常想去拜访一下斯沃博达将军，并给他带去一些典型的俄国纪念品，作为我个人的敬意和苏联人民对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的感谢之意的象征。

1943年，我和瓦图京领导了一支编在我们的军队里的由斯沃博达上校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支队。这支队伍在哈尔科夫城外建立了战功。后来他手下的人组成了一支一流的队伍时，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记得捷克共产主义者告诉我说，他在战斗中既是一位活跃的政治领袖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依据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宪法，军队中不允许成立政治基层组织，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军中的共产主义组织实质上是非法的。但是，这也没能阻挡他把党组织的领导叫来，告诉他需要做哪些政治工作。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我们肩并肩地战斗在乌克兰第一线。我是军委员会的成员，斯沃博达是我的部属之一。我们的部队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我又有一次机会见到斯沃博达和别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从基辅回到了布拉格，我在基辅接待过他们。苏联授予斯沃博达一枚列宁勋章。他的经历和我同他的联系，意味着我去捷克斯洛伐克而不单独拜访他，简直是说不过去。

但是，当我最后有机会同我们的代表团一道去捷克斯洛伐克时，斯沃博达却已蒙受了耻辱。从我们得到的情报看，他正在一个集体农庄上当图书管理员。这几乎是没有道理。他没有做过任何事足以使他遭到如此羞辱。我告诉我的同志们，我认为应把斯沃博达放在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上，并提供给他一个配得上他作为唯一一个同我们并肩抗击德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军官所做的重要贡献的职位。我们必须做些事情以传播他的声誉，使他重新回到活跃的政治生活中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同志同意我的看法。

当我向捷克斯洛伐克朋友谈起希望见一见斯沃博达将军时，我努力给他留下一种印象，我对他们说我认为他是一个好战士，一个诚实的同志。所以，我不能轻易忘掉他，就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我问他们是否反对我和他会面，我能看出来他们对我的要求不太高兴，但他们知道我不会接受否定的答复。我不能说他们同意了，但他们没有做任何阻拦我的事情。他们说如果我要见他，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决心在捷克斯洛伐克旅行期间看看他去。①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对苏联有一种深厚的兄弟情谊，但我总是发现保加利亚人民对我们的友谊尤为炽烈。他们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保加利亚战场上曾布满了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保加

①1968年诺沃提尼垮台之后，斯沃博达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主席，他对苏联的威吓进行了勇敢的反抗。在此之前很久，他是贝奈斯手下一个支持共产党的国防部长，他在推翻捷克斯洛伐克的议会民主的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他在1948年才真正加入共产党。斯大林对他极端怀疑并在1950年降低了他的职位。1951年，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在监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被释放后，他在一个养蜂合作社当了一名会计。他在消声匿迹之后返回现实完全是由于赫鲁晓夫，这一点是十分正确的。他到如此无人知晓的地步以至于诺沃提尼的僚属们花了好长时间才把他找到。

利亚从土耳其人统治上获得独立的苏联战士的尸骨，从那时到今天，流逝的岁月还不算很长。

第十一章 苏联和朝鲜战争

这一章造成了这种印象：斯大林表现出在处理某些问题是近乎随便和缺乏经验的。这些问题亦不是像他所想象的那样会直接影响到苏联的安全。他的外交部向他报告了关于朝鲜局势的详细情况，但他似乎是没有经过严肃的思考就鼓动北朝鲜人采取了行动。本章暴露出重要一点是：赫鲁晓夫毫不怀疑北朝鲜对战争负有责任：他没有伪称是南朝鲜犯有侵略罪，或者是挑衅罪。事实正如赫鲁晓夫描述的那样，整个事件是一次由于斯大林作出的极端错误的估计而造成的北朝鲜发动的侵略活动。然而，另一点也是很清楚的：斯大林早于赫鲁晓夫发现了他自己所犯的错误。赫鲁晓夫不理解为什么他的上司在对北朝鲜人来说很容易得到胜利的事件发展到一场大的战争之时，撤走了所有的苏联顾问；而且，除了一场宣传攻势之外，袖手旁观。难怪斯大林轻视赫鲁晓夫的意见。这个意见是由一个对世界各国力量的实际情况仍然一无所知的人提出的。这个竟然不知道与美国性质完全不同的联合国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大约在1949年底我从乌克兰调到莫斯科的时候，金日成率领他的代表团来到苏联同斯大林进行磋商。北朝鲜人想用刺刀尖刺南朝鲜。金日成说仅“第一刀”就将在南朝鲜引起一场内部爆炸。人民的力量——即统治北朝鲜的力量——将取得胜利。当时，斯大林没有反对这个想法。这对于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

信仰来说明更有吸引力，因为这场斗争将是一个朝鲜人自己解决的内部事件，北朝鲜人想对他们遭到李承晚践踏的同胞们伸出援救之手。斯大林劝告金日成考虑一下，做些仔细的分析，然后带一个具体的计划来。金返回国内，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又来到了莫斯科。他告诉斯大林他对成功有绝对的把握。斯大林存有疑虑，他担心美国人会插手，但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战争能迅速结束——金日成确信能够——那么，美国的干涉就能够避免了。

不过，斯大林决定征求一下毛泽东对金日成计划的看法。我必须强调一下，这场战争不是斯大林的主意，而是金日成的，金是发起者。当然，斯大林没有试图劝阻过他。依我看来，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会劝阻金日成放弃他的南朝鲜从李承晚和反动的美国势力下解放出来的令人激赏的愿望。这将与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相背离。我并不因为斯大林鼓励了金就谴责他。相反，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的。

毛泽东也做了肯定的答复。他赞成金日成的想法，并指出：美国不会进行干涉，因为战争将是一件由朝鲜人民自己决定的内部事务。

我记得在斯大林的乡间别墅里举行了一次情绪盎然的晚宴。金日成对我们讲了朝鲜的生活状况。他着重谈了南朝鲜许多有吸引的东西——优质土壤，种植稻米的完美气候，繁荣的捕渔业，等等。他说，南北朝鲜统一之后，朝鲜双方作为一个整体都会收益。南方将能从北方得到足够的原料以满足工业需求，南方兴旺的捕渔业产品、稻米和其它农业产品也将满足供养它的人民生存的食品需要。我们祝愿金日成获得全面的成功，并为全体北朝鲜领导人干杯，盼望着他们取得胜利的那一天。

我们向北朝鲜提供武器已经有一段时间。很明显他们愿意接受大量必不可少的坦克、大炮、步枪、机关枪、工程设备和高射武器。我们的空军战斗机用来保卫平壤，因此被安置在北朝鲜。

预定的时刻到了，战争开始了。进攻发动的很成功。北朝鲜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向南方。但是金日成的预言——第一枪发射后南朝鲜内部起义、李承晚被推翻——不幸没有变成现实。当时推测随着北朝鲜部队的南下，李承晚和他的统治集团就会被消灭。最初看来金日成是正确的。南朝鲜当局统治不稳，无力自卫，反抗软弱无力。确实，李承晚在南朝鲜内没有得到多少支持；但是，那儿的内部力量尚不足以举行一次共产主义暴动。显而易见，党的准备、组织工作是不够充分的。金日成原以为党组织遍布南朝鲜，一旦发出信号，那里的人民就会起义反抗。但这从没发生过。

北朝鲜人占领了汉城。我们都很高兴，再一次祝愿金日成一切顺利，因为这是一场民族解放的战争。这不是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战争，而是一场阶级斗争。北朝鲜劳动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当时，并且在今天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他们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中团结一致。这一点本身就是一个进步的发展。

但是，当金日成的部队刚刚抵达釜山时，已成强弩之末。釜山是南方最后一个港口城市，占领了釜山，朝鲜就将成为统一的国家，一个不再处于分裂状况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资源丰富、工农业发达。

但胜利没有实现。敌人利用了李承晚在釜山组织的反抗，并且准备让他们的部队在仁川登陆。这一企图成功了；情形对北朝鲜人十分危险。这次登陆切断了已入南方的北朝鲜部队的退路，他们的武器也全部落入李承晚的手中。北朝鲜面临灭亡的威胁。

斯大林对北朝鲜人所处的危险境遇负有部分责任。正当金日成准备进攻的时候，斯大林把我们在北朝鲜部队里的所有顾问都撤了回来。斯大林为什么这样做，我毫不理解。我向斯大林询问过此事，他对我厉声说道：“那里太危险，不能让我们的顾问们

住在那儿，他们可能成为俘虏。我们不能留下能指控我们参与此事的证据。那是金日成的事。”我们的顾问都被召回了苏联，这导致了北朝鲜军队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仁川登陆之后的恶战，使我对金日成所处的悲惨境遇十分担忧。我替金日成感到难过，有一次我甚至向斯大林建议说：

“斯大林同志，给金日成更多的有效的帮助不是更好吗？他想为他的人民而战，使整个朝鲜获得自由独立，但他并不是一个军事天才，而且他面临的确是一流的美国军队。我们驻朝鲜大使仅仅是战时被授予陆军中将衔的前列宁格勒州州委的第二书记，并不是职业军人，甚至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他的建议不会象一个受过军事训练的优秀军人一样中用。为什么不换个人呢？比如马利诺夫斯基（后成为赫鲁晓夫政府中的国防部长——原註），他指挥着远东军区。为什么我们不派他去北朝鲜作大使，以便秘密地帮助金日成进行这场更有意义的战争？”

斯大林对我的话根本不睬，这使我感到震惊。斯大林没有赞同过金日成吗？我们没有给金日成提供过武器吗？我们不是站在金日成一边吗？没有我们的援助，他是没有希望的。但如果这种援助不只限于武器，而且是向他援助合格的人才去指挥作战，北朝鲜无疑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我认为，如果金日成能得到哪怕是一个苏军坦克军团，最多两个，他就会加速向南进军，占领釜山，战争就结束了。美国报纸后来这样报导，如果釜山被占领，美国就无法用武力进行干涉。①

注①：赫鲁晓夫此处记忆有误。紧接北朝鲜的进攻，美国空军以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驻扎陆军就进行了“干涉”。战争初期，美军伤亡惨重，一个少将被俘，但仍留下了足够的力量。他们用极少的部队就可以牢牢地抓住朝鲜半岛的南端和釜山登陆场。没有美国人的参与，釜山早就被占领了。同时，麦克阿瑟将军正准备在仁川发动毁灭性的两栖进攻，这次进攻暂时使南朝鲜人占了优势，消灭了北朝鲜的有生力量。1950年秋中国人的参战，扭转了这一局面。——

事实上，美国军队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发动登陆进攻。他们重新攻占汉城，并向此移穿过了三八线——日本投降后的和平条约约定下的分界线。局势才对北朝鲜和金日成变得十分危险。

北朝鲜的空军使用的是我们提供的米格—15型战斗机，这是我们最新、最好、最灵活的喷气式战斗机。战争期间，美国人重新武装了他们的空军，并引进了一种新的比我们的更快更有威力的战斗机，我们的米格—15型战斗机远远不能与之相比。我们的空中优势开始瓦解。美国人可以穿越我们的空中防线安然地轰炸北朝鲜，我们失去了从空中保护城市和电站的能力。

正当这种悲惨的局面在北朝鲜进一步加剧，我们对金日成和北朝鲜人民感到最难过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出现了。他同斯大林会谈时我不在场，斯大林当时正在南方的索契，周乘飞机直接到那里见他。后来，斯大林回到莫斯科说，周是受毛泽东的指派来看他的。当时，北朝鲜军几乎已被消灭殆尽。周询问斯大林，中国军队是否应该进入北朝鲜领土以遏阻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逼。起初，斯大林和周恩来似乎认为中国的干涉不会有成果。但在周恩来回国之前，他们之间有一个人——或是受毛泽东派遣的周恩来，或是斯大林本人——提出对此事重新讨论。这次，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应给北朝鲜以积极的支援。中国部队已经驻扎在中朝边境线上。斯大林和周恩来相信这些部队完全可以控制局势。他们将打败美军和南朝鲜部队，挽救北朝鲜。

周恩来飞回了北京。周是对毛泽东最有影响的顾问，他非常有才华，斯大林很尊重他。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灵活的当代人物，同他能进行切合实际的交谈。

中国没有宣战，而是直接地把志愿军派到了朝鲜。部队的统帅是最受毛泽东尊重的彭德怀。毛过去常说，彭是中国军界最亮的一颗星。

战争重新开始。中国人成功地阻挡了美国 and 南朝鲜部队的前

进。多次发生激战。在档案馆的文件里你会找到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战况的文件。彭德怀用长篇的电报解释他反击美国人的复杂的战斗计划。他明确地宣称过，他的部队将包围敌人并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些彭德怀打给毛泽东，毛又转给斯大林的作战文件中，美军多次被粉碎，战役多次胜利结束。

不幸的是：战争根本没有迅速结束，中国人多次遭到失败。我们收到一条消息说，毛泽东的儿子，一个将军，在一次美军对作战指挥部的空袭中被炸死了。即是说毛泽东自己的儿子在朝鲜被杀害了！因为技术和装备远不及美军，中国人损失惨重。无论从攻势还是守势上来说，中国人的战术主要依赖于单纯的人力。

战争开始拖延，因为双方都挖壕困守。战斗变得越来越残酷，战线看来趋向稳定。当北朝鲜人开始给南朝鲜人施加压力时，美军占领了平壤，把北朝鲜人逼到了三八线上。

我对朝鲜战争的记忆是不完全的，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份讨论给北朝鲜人以军事——技术援助的文件，但我基本了解我们的政策。我阅读了全部由我们的驻朝大使提供的所有文件。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已搬到莫斯科居住，名字也列到政府发送文件的名单上。在乌克兰工作的时候，除了一些与乌克兰和我个人的事情相关的信件外，我没有收到过别的政治局的文件。我调到莫斯科之后，斯大林说保密文件可以发给我了。这样，我开始看到了政府的内部信件，包括彭德怀发给毛泽东到毛又转送给斯大林的战争报告，得以熟悉朝鲜半岛正在发展的局势。

第十二章 跟铁托握手言和

1955年夏天赫鲁晓夫南斯拉夫之行的目的，是消除1948年斯大林与铁托关系闹僵所造成的不良后果。这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随他同行的有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米高扬和新的外交部长谢皮洛夫。访南期间，布尔加宁装成一个和蔼可亲、嗜酒成性的唯命是从的人，赫鲁晓夫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米高扬留在幕后，赫鲁晓夫失去控制高谈阔论时，他就发出警告的信号——因为，赫鲁晓夫在这个时期仍酗酒成性，并且时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赫鲁晓夫屡次铸错，从他在机场的演讲开始。他托辞说苏联那样对待南斯拉夫是贝利亚的错误，而不是斯大林的，这番话激怒了铁托；但是，他再也没有犯下同样的错误，并显示出他很快就能汲取教训，具有不可置疑的节制个人权力的能力。应该回忆一下的是，斯大林在1949年采用除了战争之外的所有手段——往边界调动部队、经济封锁、积极颠覆、猛烈而恶毒的宣传——以求把铁托赶下台。

斯大林逝世的时候，我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斯科市和州两个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斯大林死后，我被免除了莫斯科党委会的职务，但仍兼着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根本没有党的第一书记。后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布尔加宁提出恢复第一书记的职位，他提名我作这一项

工作。我就是这样经过主席团的批准成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1955年，我以这个身份率领代表团到南斯拉夫，恢复与铁托同志的良好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铁托在共产国际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物，也颇受爱戴。在南斯拉夫人民反击希特勒入侵的伟大斗争期间，铁托作为一个游击队领导人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各国反抗纳粹占领的最感人的斗争，是由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的民族游击队运动进行的。如果我这样说我想没有人会感到被冒犯了。法国、意大利以及其它欧洲国家也开展了伟大的运动，但南斯拉夫人的斗争时间早，且规模最大。

我第一次见到铁托是在战后，他同卡德尔和德热拉斯一道来看斯大林的时候。当时南斯拉夫同志回国时乘坐的是火车，路过基辅。他们想看看苏联的一些地方，说哪怕通过列车车窗看也行。斯大林给我打来电话说，“组织一个好的招待会，他们在基辅停留期间，要好好地照顾他们。让铁托感到我们的国家对南斯拉夫怀有深厚的友情，注意让整个乌克兰为招待他们行动起来。”

“很好，”我说。“一切都会按您说的办。我们很高兴见到铁托同志。”

他们到来之后，我们举办了一个规格与他们身份相当的招待会，准备了好客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所能提供的一切美味佳肴。我们还很贫穷，但是尚有能力和款待我们的客人。应铁托的要求，我组织他们参观了一个集体农庄。尽管我们的经济仍然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我们的农业也没什么可炫耀的，可是，铁托说他去过的地方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喜欢铁托。他的个性富有生气，为人直率。我也喜欢卡德尔。我是第一次见到德热拉斯，他敏锐、机智给我留下了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我不否认我现在对他有相当不一样的看法，但这与本题无关。我记得一天晚上（在基辅）观看歌剧休息

之际，德热拉斯给我们讲了好几个他自己编的寓言故事。其中有一个寓言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愿意在这儿讲讲它：

从前，南斯拉夫某处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一只狗、一头牛和一匹驴。村里的日子每况愈下，最后，狗、牛和驴决定躲到山里去。它们在山间漫游着，直到它们觉得肚子饿了并开始想家。它们决定派狗回村看看那儿的情况是否有了改变。不久，那只狗就以它最快的速度跑了回来。“村子里的生活还是太苦，没法活下去，”狗报告说。“他们不允许吠叫，如果一只狗被禁止吠叫，它该怎么活呀？”所以，它们三个又接着在山间闲逛了一会儿。随后，它们决定派牛去侦察。“因为你不吠叫，”狗和驴对牛说，“他们不允许吠叫对你没什么影响。”于是，牛出发走了。过了一会儿那头牛回来了，很明显她非常伤心。“这没法活，”她说，“简直是没法活，我告诉你们！我一到村里，人们就开始向我进攻。他们抓住我的乳头，开始用力吸，使劲拉！我逃了出来，他们差不多把我的乳头拽下来了！我只是勉强逃了出来！”于是，他们又继续住在山里。最后，它们决定最后试一次，那匹驴同意回村看看。不一会儿，那匹驴飞跑着回来了。“不可能，在村里住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喊叫着。“为什么？”狗和牛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唉，”驴叹息道，“我刚一进村，他们就试图提名我担任官职。他们正在选举，他们想选我进议会。我勉强逃了出来！”

铁托严厉地看着德热拉斯说道，“你是想用你的寓言告诉我的，我们选举驴进议会吗？但是，铁托只是在开玩笑。他笑了，德热拉斯笑了，我们都笑了。

后来，我向斯大林讲了南斯拉夫夫人来访期间友好而随意的气氛。我们能够招待好铁托，南斯拉夫夫人对他们在乌克兰的短暂逗留感到愉快，这使斯大林很高兴。那个时期，斯大林希望我们并且也确信我们将能够同南斯拉夫建立最好的最有兄弟情谊的关

系。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是科学院院士、哲学家帕·费·尤金（尤金后来是驻北京的大使）向斯大林汇报说，南斯拉夫人在某个党的会议上已经开始对苏联作出各种各样的讥讽的、无礼的甚至是侮辱性的评论，尤其是对那些应铁托要求被派去帮助重建南斯拉夫的苏联军事和技术顾问。尤金对这个会议作了详尽的描述，斯大林把他的报告的复印件分发给了政治局的成员。我在基辅也收到了一份。

接着，南斯拉夫领导层开始找碴儿，企图寻找机会同我们打仗。我们的许多南斯拉夫朋友因为不同意他们的政府采取的新的反苏政策而身陷囹圄，有些人甚至牺牲了性命。他们惨遭惩罚，不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而是因为他们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当苏联撤走所有帮助南斯拉夫重建工业、科学、经济和军队的顾问之时，苏南两国的紧张关系发展到了严重关头。^①

斯大林死后，我们领导层中开始交换意见，讨论与南斯拉夫重建外交关系，清除由斯大林造成的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的敌意的可能性。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人们反驳说，

^①不清楚赫鲁晓夫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暗示南斯拉夫人应该为这场争吵受到谴责。他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明确地责备了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我将挥动一下我的小手——铁托将不再存在。他将垮台。”赫鲁晓夫评论说：“斯大林在此扮演了一个可耻的角色”。爱德华·卡德尔和Milovan Djilas密洛凡·德热拉斯两人都是铁托将军的亲密同事。铁托的总理卡德尔还是一位年长的政治家。热情而聪明的白山人德纳拉斯——后来蒙受耻辱，两度被他的老上司打入监狱，原因是他反对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他在他的《新阶级》一书中攻击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果可能的话，他的《与斯大林谈话录》触怒了更多的人。很明显，这次出访使他开始不再对斯大林和共产主义抱有任何幻想。——

当他们已经滑到资本主义泥坑里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与他们恢复关系呢？他们的经济已让美国的垄断资本吞并了；私有财产恢复了；私人银行开业了。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尤其顽固地反对缓和我们与南斯拉夫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想法。他坚持说南斯拉夫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认为导致所有这些可笑的断言的原因是我们同南斯拉夫太疏远了，我们自己编造了过多的指控他们的言辞以致于我们开始相信我们自己讲给自己的东西。这很像一个关于毛拉（一个穆斯林教的牧师）的古老故事。毛拉从一个村庄的广场上路过，他告诉那儿的人们他刚来的那个地方免费赠送羊和稻米。毛拉的话很快传遍整个村庄，每个人都开始朝他指的那个方向跑去。当毛拉看到每个人都在跑动时，他拉住一个人问到，“出什么事了？”

“那儿正免费赠送羊肉和稻米！”毛拉于是撩起他的长袍，随着人群一起跑去拿免费食品，尽管这完全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这同南斯拉夫一事正好是一样的。我们编造故事说南斯拉夫正在做着很糟糕的事情，我们听到的次数太多，以至于我们自己都开始相信它是真的了。

有些人拒绝改变他们已有的立场，这种立场是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为了对付这些顽固的人们，很清楚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论点来反驳他们的论点。简单地否定南斯拉夫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会取得任何效果的，我们必须证明它不是。于是我建议为什么我们不客观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由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对一切有关因素作出分析，来断定南斯拉夫真正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我们应该仔细研究所有证据，一点一点地研究。

谢皮洛夫和其他同志被任命到些个委员会，经过全面的调查，他们写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现存在中央委员会的档案馆里。他们的结论是，人们没有理由说南斯拉夫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在那里，财产实行了转让，农民在私有制条件下生活，可以自由地使用他们的土地；但集体和国营农场依然存在。国家掌握着银行、商业和生产手段；国家的权力在人民手中；国家由工人阶级专政。因此，南斯拉夫是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自己从未对此发生过怀疑，但这一点需要一个有权威的委员会来向别的人做出证明。

南斯拉夫再次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确立了良好的地位，斯大林引起的冲突的基础不复存在，反对和解的辩论也就像用纸牌搭起的房子一样塌落了。我们决定在苏南两党之间重新建立联系，恢复良好的关系。但是，在我们与南斯拉夫发生冲突时，其它党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也受到了影响，我们不得不在接近铁托之前先征得其它党的同意。我们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其它西方共产党发出了征求意见的信件。他们都同意我们这样做。

当用什么样的最佳方式接近铁托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时，有人提议我们应该让南斯拉夫人来苏联谈判。我说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我怀疑他们能否接受这个要求，那样看起来他们就像是手中拿帽子来这儿要饭似的。其次，是我们首先跟他们断绝了外交关系；我们在他们攻击我们之前，先对他们进行了公开的攻击。因此，我们应该率先努力消除敌意。再者，我们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党，在共产主义世界的舞台上享有很大的权威和很高的声望。如果南斯拉夫领导人在我们领土上同我们会面，他们将要冒很大风险，况且我们对此并没有达成协议。

所以，我们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贝尔格莱德。代表团由我率领，成员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谢皮洛夫。当时，我们在南斯拉夫的使馆只靠寥寥几人管理着。我们与南斯拉夫同志通信谈了我们的建议，他们同意接待我们的代表团并与我们交换看法。我们在南斯拉夫着陆后，得到了一个外国代表团所能享受的一切礼遇。

但是，觉察不到兄弟般的情谊。那里的领导人和普通百姓看起来都很拘谨、小心。他们递给我一个麦克风让我发表讲话。我的演讲稿是由领导层集体起草的。所以，我演讲的内容与其说是我个人的观点倒不如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观点。我讲完之后，铁托说：“这个，因为在场的每个人都懂俄语，因此我们就不必把你的讲话翻译过来了，”我认为他这是在极力地渲染我们已觉察到的拘谨气氛。不管怎样，我懂乌克兰语，但当一个人用乌克兰语快速地讲话时，我却只听懂了一部分，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相比，乌克兰语更接近于俄语。

我必须承认，我对在机场受到的冷淡接待感到有点失望，因为我知道这可能加深我们领导层中反对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良好关系的人们的反对情绪^①

讨论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建议说我们双方应该求同存异。我说，我绝对相信我们能够达成某些谅解。我承认我们的态度仍然存在不妥之处。南斯拉夫人恰当地责备了造成我们两党分裂的斯大林。他们没有指责我们本人，而是把矛头对准了斯大林。我们也以斯大林导致了这场冲突的假设为根据，开始了我们自己的行动。但当我们实际上正准备使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努力避免提谁应受到谴责的问题。我们才刚刚开始认识到斯大林滥用职权到何种程度，以及他在扼杀我们党的精华时所造成的大屠杀的恶劣影响。正如我以前所说（见原著英文版343—344页），我们这次与南斯拉夫人会谈是没有心理准备的。我们尚从对斯大林的奴隶般的依赖中摆脱出来。但是，南斯拉夫人

^①在机场受到铁托的怠慢使赫鲁晓夫感到的远不只是失望，他明显地发怒了。值得一提的是，赫鲁晓夫早些时候为他的不适宜的演讲承担了责任。他说，他责备贝利亚是因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同僚们都尚未认识到斯大林的邪恶。

认为我们双方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看来他们接纳我们的意图。

南斯拉夫领导人为我们组织了一项走遍全国的参观。我们在各城镇受到的接待也是十分拘谨的。一眼就可以看出那些排在街道两旁的人们不是自动出来迎接我们的。他们都是有组织的党员。不能说他们敌视我们，可我也不能说他们是十分友好的。他们多半重复地喊唱着，“铁托万岁，铁托，铁托！”^①

然而，在参观期间，我们很高兴看到南斯拉夫人民对那些为把南斯拉夫从希特勒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而牺牲了的苏联士兵予以了应有的尊敬。^②。我们已经倒下的战士们的坟墓保存得很好，坟墓的饰板上刻着他们的名字。

当然，南斯拉夫十分贫穷。战前，它就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希特勒又长期侵占它并进行了残酷的统治。我们看到农民使用着相当原始的农具，多数没有拖拉机。他们的落后状态很可以理解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孤立而惨遭蹂躏的国家，尽管资本主义国家正假装着给它提供帮助。^③

我记得跟伏克曼诺维奇一太波谈过话。他的真诚、坦率和自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他敢大胆地说强烈地反对我们，可我还是喜欢他。我觉得他不应该让自己这样失去自制力。他给我们讲了他去美国商谈一笔信用贷款的事。“我们正面临着最严

^①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人民的态度的看法是十分正确的。他们充满了礼貌的敌意。

^②虽然南斯拉夫人民的命运绝对取决于同盟国在其它战场上的胜利，但是他们靠自己把自己从德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铁托拒绝接受斯大林命令的原因之一。

^③资本主义西方因为怀疑铁托和斯大林的冲突程度而在一段时间内极端不愿意援助铁托。这种援助不是像赫鲁晓夫说的吞噬了南斯拉夫而是及时地帮了大忙，确保了它独立地存在于苏维埃阵营之外。

峻的困难，”他解释说，“我们的庄稼欠收，饥饿正威胁着我们。我国和你们苏联的紧张关系发展到了极点。美国人知道我们多么绝望并企图利用这一点；他们试图强加给我们单方面的束缚人的条件以换取信用贷款。他们以为我们除了接受以外别无选择。他们的条件很明显是属于政治性质的，意在把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轨道上拉下来，迫使我们朝资本主义迈进。我告诉他们，我们宁可死也不接受那样的条件。我走了出去，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我又停留了几天，给美国人一个重新协商的机会。他们被迫作了一些妥协，因为他们害怕把我们推得太远。他们知道，如果我们生着气回国，他们将失去所有使南斯拉夫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希望。他们最终的目标是阻拦我们同苏联和解——或者就像他们自己说的，保护我们以免我们不得不向斯大林作出有条件的投降。他们想鼓励社会主义世界的分裂活动，加强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阵营。”

我愿意意见一个有资质表达如此强烈的阶级恨的人，但当伏克曼诺维奇一太波尖刻地对我说话时，我确实又恨有这样的资质的人。我在一次会上说，“如果你们再想恶化你们与某个国家的紧张关系，适合于干这个工作的人是太波同志。”铁托瞥了我一眼，而后大笑起来。我后来同伏克曼诺维奇·太波相处得很好。我十分尊重他。他的易怒的脾气源自他对工人阶级的敌人的仇恨。这就是为什么他允许自己用一些放纵的言语跟我们谈话。不管如何，用一种较温和的话来说，当南斯拉夫面临着最严重的艰难困苦的时刻，我们没有表示出多少同情心。①

①协商的气氛极为紧张，并且经常闹到不得不休会的地步。赫鲁晓夫决心重建苏联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的亲密关系——就是说，重新收编南斯拉夫入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集团。铁托不愿与这个集团有任何关系。他希望与苏联重建一种独立国家间的政府级的关系。后来的结果正是如此。伏克曼诺维奇·太波长期是南斯拉夫工会组织的主席，一位老游击队员，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极端诚实和坦率的人。赫鲁晓夫访南之际，他用非外交辞令表达了其他人正在思考着的问题。

我们在即将结束首次对南斯拉夫的访问的时候，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它只不过是宣告了苏南两国关系的新发展。铁托坚持要我们信奉对其它国家、政党的内部事务完全不加干涉的原则，要我们赞成每个国家不受外部压力坚持它们自己的意愿的权力。我们同意了这一点，就像我们实际上做的那样，真诚地相信关系必须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这个联合公报引起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但它消除了大部分令人难受的阴影。当然，这个协议只是一个开头。经过如此长期的敌视阶段之后，要恢复关系尚有许多事情要做，那不是坐在桌边一起喝杯酒所能解决的。

我们一回到莫斯科，就报告了我们同南斯拉夫人会谈的情况。我们说，南斯拉夫看来是一个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和政党看来是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为了向南斯拉夫人妥协，为今后进一步的经济合作打下基础，我们在莫斯科决定注销他们欠我们的大笔债务。接着，南斯拉夫向我们要求信用贷款。我忘记了具体的数目，但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他们要这笔贷款是想建一个钢厂。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他们所要求的贷款，条件是，我们可以用给修建、装备钢厂提供机械的方式进行贷款。

铁托一直是一个好的共产主义者，一个讲原则的人；但在我们同他的关系改善之前，南斯拉夫多数时候都是同美国、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公司做生意以换取信用贷款。甚至有谣言传说有一个条约禁止南斯拉夫同苏联进行贸易交往。事实上，这是苏联许多对南斯拉夫存心不良的人们编造并传播的假话。南斯拉夫没有同西方签署过这样的条约。但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者赠送给南斯拉夫礼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他们的长相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企图用诱惑人的贸易协定把兄弟国家一个挨一个哄出社会主义阵营的作法，对当时和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都是相当有利可图的。关于这一点，我记得我曾同哥穆尔卡同志进行过一项友好的私人谈话。他要求我们卖粮食给波兰。我看出了他这个要求

的真正动机，坦率地对他说，“哥穆尔卡同志，我感到你想从我们这儿买粮食是出于某种别的原因，而不是为了满足你们自己内部的需求。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间，当然除了苏联，波兰的农业是最发达的。你们当然有足够的粮食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我认为你一定是另有打算。”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看到我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笑着说道：“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说得很对。我们当然不需要作食物产品的粮食。我们要用它作饲料。我们想从你那儿买粮食喂猪，给我们的咸猪肉工业提供肉源。”波兰人加工的咸猪肉味道极香，在美国市场上卖很好的价钱。美国人在封锁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咸猪肉出口时，却为波兰的咸猪肉出口开了绿灯。

与此相似的是，西方总是同南斯拉夫做着特殊的交易。南斯拉夫同西方的大量贸易交往很自然地引起了许多苏联人的不满。这种忿恨是出于忌妒，而不是出于思想方面的问题。从美国购买机器设备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可美国人不愿卖给我们。他们卖给了南斯拉夫人，但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应该把对美国人的愤恨，发泄到南斯拉夫人身上去，他们只不过是在利用一种我们自己也喜欢得到的机会。因此，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对南斯拉夫人感到恼怒。

在对外政策上，南斯拉夫采取的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独立立场，它在对付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敌对力量时，尤其是如此。南斯拉夫总是注意不与任何集团发生关系。他们的外交政策不总是同我们自己的外交政策一致，我们之间也时有磨擦。南斯拉夫拒绝加入华沙条约，因为他们与西方有特殊的商务关系。那次拒绝给即使在1955年已经开始改善关系的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也设置了除不掉的隔膜。当然，南斯拉夫拒绝签署华沙条约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与保加利亚有边界分歧。

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我们的关系又变得紧张起来，我们放弃了一些为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而采取的措施。例如，我们中止了关于信用贷款的协议。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再同南斯拉夫发生分裂，所以，铁托和我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一次会晤，缓解了当时的紧张关系。

关于这一点，再看一下南斯拉夫在1957年和1960年召开的两次莫斯科会议上所采取的态度。南斯拉夫代表团仅仅以观察员的资格出席了这两次会议。他们参加了一些讨论，但并没有在会议上签字。我不否认他们这种态度在当时使我极为恼怒。^①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做，

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很清楚，南斯拉夫同志不想承担在决议书上签字所意味着任何国与国之间的约束力。我认为他们拒绝表态是一个错误，但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那样做。正如铁托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讲到的，“如果我们想保持不与任何集团结盟，我们不在会议决议书上签字的做法，这样你肯定会同意。”南斯拉夫人希望充当新兴国家的代言人，这些国家刚从殖民统治下获得了解放，并且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南斯拉夫人过去有资格，今天仍然完全有资格采取这种立场，尽管他的拒绝更密切地与我们联合，我们也应该保护我们与他们的关系。然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过去这些年中贯彻的远离政策对苏南关系的发展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绊脚石。

我们在1955年访问南斯拉夫之后，邀请了由铁托同志率领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来苏联访问。铁托多次访问过苏联，所以十分熟悉我们的国家。我曾邀请他去克里米亚打猎、度假。当然，几个

^①用恼怒一词来表达铁托拒绝积极参加1957年和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两次所有共产党参加的会议所导致的赫鲁晓夫对他的不满过于温和。他当时曾勃然大怒，结果是他对南斯拉夫施加了沉重的压力。

世纪以来，不同国家的领导人总是利用打猎的机会聚合，讨论重要的、与彼此利益有关的问题。打猎期间，我和铁托讨论问题时的气氛，是热情而友好的。

南斯拉夫人邀请我们回访他们的国家。我去了数次。这些出访使我有机会亲眼看到南斯拉夫在经济工作中进行的许多新的极为不平常的尝试。

正像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样，南斯拉夫声称它发现了加速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型管理办法和经济步骤。他们声称这些新的组织形式更加民主，因为他们允许更多的工人、机关人员和科学家参加管理国民经济。起初，我们是反对这些想象出来的改革的。然而，当我参观南斯拉夫的工厂时，我却很有兴趣观看这些改革得到贯彻执行。我想弄清楚在苏联我们自己的环境中，这些新步骤能适用到什么程度。

我记得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曾带我参观过贝尔格莱德郊外的一拖拉机厂。工程师、厂长、车间主任、工会代表和党的组织者都向我解释他们的生产计划是如何由民主的办法制定的。我永远不能真正弄懂他们的有关财产和所有制的新概念的意思。他们关于参与所有制的所有谈话在我看来非常像橱窗里的摆设。不管他们说什么，在我看来政府仍然在为他们制定产量计划，并严格控制着实施的工作。我非常坦率地向南斯拉夫的同志讲了我的疑虑，他们好像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他们仍然努力使我相信他们的制度跟我们苏联的是有不同之处的，他们的更加民主，更加有利于人民参与完成生产指标。^①

^①这里赫鲁晓夫具体指的是南斯拉夫建立的代表会议，建立这个机构的意图是想通过使工厂、银行、企业和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实现自治以创建一种新的没有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南斯拉夫时，嘲笑了这个想法。

尽管我有疑问，但他们的推理无疑是值得注意一下的。在我生活、工作并担任政府领导期间，我们的经济一直是集中管理的，我认为在我的时代，中央集权制是最好的、最有效的制度。但最近我开始感到，在统一管理仍为必须的时期，给指定的企业的工人比以前更多的权力来决定他们的生产指标和条件，也同样是重要的。尽管产量计划总是必须由最上层机构制定出来，由上边监督执行，但我认为，将来必须让工人更多地参加制定计划、指标和决定如何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的工作。换句话说，我认为南斯拉夫引进的新的组织形式，至少还有一点道理，至少对我们的经济管理作出了一点有用的贡献。否认这一点毫无意义。

南斯拉夫人声称，他们在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但他们也有他的问题。一次，在我访问期间，铁托向我坦白说：“我们正在努力应付这儿发生的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我认为我们的人民中间一些管理国营企业的，人在国外的资本家的银行里开着帐户。换句话说，他们在盗窃我们的东西。”这个，依我之见，这类盗窃现象是铁托经济政策的必然而且不可避免的后果。现在，南斯拉夫可能已经解决了这类问题，或者是制定了某些控制措施。

一个社会在试验一种新的制度时总要发生贪污和挥霍现象，南斯拉夫的尝试没有获得全面的成功也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不能立即全面地否定南斯拉夫的试验。我们应该不带偏见地分析一下那儿的情况，决定南斯拉夫制度有哪些特色可以适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并有利可图。我承认，我们检查这些问题的时候并不总是平心静气、公正客观的。有时，双方相互反诉、指责、都声称发现了唯一的真理。我从未感到哪一方是完全正确的。伪称对真理拥有专利永远是错误的。顽固不化地坚持说你的办法是做某件事的唯一办法是不对的，这样做是愚蠢的。

看来，南斯拉夫在一个方面的发展是对头的，这就是农业。有一次我和铁托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当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之后，”他说“我们想确保人们不把我们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背叛者，因此，我们采取了行政措施以把集体化进行到底。从严格的数量方面来说，我们的集体化应该会进行得很好，但在满足城市人口和工人阶级的粮食需求方面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也只是在完成了集体化之后才开始了由集体农场到国营农场的过渡。”他引用了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来表示为小麦、蔬菜生产、乳制品业、家禽和养牛而建立的国营农业企业所用地的百分比。国家正在从农民手中买来农场，并用同我们自己的苏维埃国营农场很相似的方式将其变为国营农场。

铁托同志的合作国营农业政策非但不与我们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概念相矛盾，而且它反倒是值得我们仔细注意的。列宁自己过去经常说，农民合作社和国营农场代表了农业发展的最先进的阶段。我认为，当南斯拉夫人开始用国营农场替代集体农场时，他们这一步是走对了。^①

我们在试图把集体农庄的农民安置到处女地去的时候，也曾试图大规模地改进我们的农业体制。你可以想象迁往处女地的运动会给一个家庭带来多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收拾家什、整理行

^①在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发生争吵以前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南斯拉夫的经济、工业和农业多是僵硬地仿照苏联的方式经营的。工业方面，中央控制让路于“自我管理”，农业上，集体农庄不顾农民的敌意而遭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农民的被督促参加的政府赞同的农民合作社，多数农民确实参加了。但事实上，赫鲁晓夫永远珍视的国营农场（由国家所有的非常大的，由雇用官员管理、挣薪金的工人干活）在南斯拉夫并未得到普遍推广。已有的国营农场主要是为特殊用途修建的，例如饲养牲畜。集体农庄理论上由一个村庄或由几个小村庄为一组的单位所有，他们为了公共利益管理这些农庄。

装，从住了几代人的住处搬出去。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相当艰苦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使许多这样的家庭——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俄罗斯族人——到离他们的祖籍几千公里之外的新地方安居。这次重新安居运动物质消耗极大。在其它方面，我们还得给处女地建筑居民住宅的年轻人提供信用贷款和财政补助。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不应该在那里建立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一个人造组织，这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团体，把人们重新安置在集体农庄将会是一件太昂贵的事情。我们因此选择了国营农场作为替代物。我担任领导期间，我们最便宜的面包，就是由处女地上的国营农场生产出来的。①

我很高兴看到铁托在认识到合作社农场的好处多于集体化的同时，还理解了中央计划的重要性。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履行的中央计划的职能对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来说是基本的。没有统一计划，供应和需求的市场经济规律——资本主义国家的要素——就将损害并迅速取代真正的个人与企业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南斯拉夫在铁托同志的领导下认识到了统一计划对维护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对此感到高兴。

在我多次访问南斯拉夫和与铁托交谈期间，他作为一位有想象力和魄力的领导人的才干赢得了我极大的尊敬和信任。一次，当我去南斯拉夫同他一起参观时，我看到那里的情况比我们的代

①赫鲁晓夫这儿指的处女地运动是一个巨大的行动计划，其目的是开垦主要是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境内的广阔的无树木的大草原以生产粮食。最初于1954年耕种的土地不少于九千万亩——比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三国的耕地加在一起还要多。多达50万人的“志愿者”从欧洲部分的俄罗斯罗搬到空旷的大草原，在那儿他们被安排到庞大的国营农场工作，生活在原始条件下。在获得最初（但是代价很高）的成功之后，这次试验不得不大幅度地缩减规模：正如许多人已经预料的，那片土地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垃圾盆地。

代表团1955年第一次来访时有了很大改善，人民生活好多了，到处矗立着工厂。我记得参观了一个塑料纤维工厂的建筑工地。工厂的设备是从美国购进的。那里的设备很有意思，这个工厂建成后可望能给南斯拉夫人民带来很大的福利。

铁托同志告诉我，南斯拉夫在1963年从旅游者手中赚取了约7,000万美元的收入。这个数字对意大利、瑞士、瑞典和其它西方国家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包括苏联在内，这都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数目。铁托告诉我，南斯拉夫正在建造宾馆饭店，修筑新的公路以吸引更多的游人。旅游业给对外贸易带来必需的外汇。我甚至可以说我们，苏联，对南斯拉夫在吸引游人方面取得的成功，感到有那么一点忌妒。

我开始四处询问南斯拉夫是如何发展了这样一个如此兴旺的旅游业。他们告诉我。良好的公路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体面的饭店、餐馆。他们解释说，为了确保南斯拉夫的饭店为游人提供优良的服务，他们派人去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如何接待游客，如何制做食品，如何经营好饭店。我参观了一些旅游饭店，他们干净卫生，配有新式设备，光彩照人，服务优良。

当然，南斯拉夫有相当便利的自然条件。它是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最美丽的国家之一。参观南斯拉夫之前，我曾认为我们自己的克里米亚和高加索海岸是世界风景的代表作，它们无疑是激动人心的。但当我看过南斯拉夫的杜布罗夫尼克和其它风景区时，我顿然觉得谦卑了许多。我意识到我们不是唯一的以可声称有如此自然魅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气候，海岸风光，丰富的古迹甚至可能超过了我们自己的国家的美丽程度。

当然，游人有时会引起一些问题，有一次我问铁托同志，“告诉我，你们是怎么检查开小轿车来南斯拉夫的西方游客的？”在苏联，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专门在游人途中设置众多的路

障。

他笑了，说道，“你知道，我们很简单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受欢迎的游客、间谍等等有各种办法进入我们的国家。边境检查也无法确保阻拦住他们。但可采用其它方式同渗透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国家的边界卫兵把对游人的正式检查简化到了最少的程度。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来去都是如此。一般不进行身份检查。一个人只要说出他要去哪儿，路障就会升起，他就可以开车进来。这适用于从其它国家到南斯拉夫的人，南斯拉夫公民也可以自由地去国外。例如，我们每年有许多矿工离开南斯拉夫到西德工作一段时间。他们只需简单地告诉卫兵说，‘我去赚钱好买一辆小汽车，’卫兵就会马上放他们出境。”

这一整套处理边界控制问题的方法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回到国内后，向负责旅游部门的同志讲了这种做法，并让他们对此加以考虑。我们还开始了一个大的兴建饭店和开发利用我们自己的旅游资源的计划。

另外一次同铁托同志谈话时，我问他，“你能允许我们派人到这儿来学习你们如何管理庞大的旅游业的重要经验吗？”

“当然可以，”铁托说道。“我们将很高兴为你们作示范并告诉你们任何你们感兴趣的事情。当然，一般来说，这儿的游人并不富，他不是一个大资本家，很可能是一个从西德或意大利来的工人。他有中等的收入，开自己的车。我们的游人不带大笔的钱四处乱花，但他们资助我们的服务并用外汇付款。”

我还询问铁托同志，他们是否有这样的问题，即赶时髦的青年男女追随外国游人，试图从他们那儿买五花八门的小玩意，尤其是在饭店周围。“在我们的国家，”我说，“看见我们自己的人从外国人那儿买东西，以物易物和乞讨，我们感到很丢脸。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实际上我们这里并没有那类问题，”铁托说道，“我这就

告诉你为什么。当有时东西在我们的青年人中间开始时髦起来时，我们就为工厂购买必要的设备，开始自己生产那些东西。当然，消费者的口味总是在变化，但是，你所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动脑筋，确保你们的工业赶上形势并适应变化着的消费需求。”

我向我们的同志建议效仿铁托的榜样，这样，我们的青年人就再也不干追着游人买东西的丢人的事儿了。

我不知道我的建议究竟有多少被付诸实施了，但我认为我们确实派了一些人去南斯拉夫学习旅游业管理。我从报纸上看到众多的饭店在苏联大地上矗立起来。

与铁托同志的交往告诉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有不同的途径。没有单独哪一个模式或模子适应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认为有这样一种模式存在的人无疑是愚蠢的。每个政党都懂得如何最好地确保其内部的团结。应更耐心地对待那些正在尝试用稍有不同的方法处理人民的基本问题的政党。每个劳动阶级都应该能够在当地历史和经济环境的基础上——当然，在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下，即生产手段和银行属于人民，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选择他们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不同政党与国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中，我们应该容忍他人，避免吹毛求疵，尤其是公开地这样做。然而，不幸的是，有时要约束我们自己却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准备举例子，所有头脑健全的人，都很清楚我指的是谁。

第十三章 出席日内瓦首脑会议

在远离他自己的根据地的贝尔格莱德，赫鲁晓夫第一次同一个外国首脑进行了会晤，并受到了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士的仔细观察。一两个月之后，他在日内瓦首次与帝国主义列强的领导人——艾森豪威尔总统、艾登先生和富尔先生，当然还有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对赫鲁晓夫显然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一个转折点。这位来自加里诺夫卡村的农民，这位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经过努力成长起来的党的头脑，以地位相等的身份与西方世界中被选举出来的有着西点军校、伊顿公学、牛津大学、法国公立大学预科和巴黎大学的教育背景的首脑人物举行了会晤。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穿的仍然穿他们去南斯拉夫时穿的衣服——宽松的淡紫色上衣，肥大摇摆的裤子；布尔加宁身穿淡米色夏季大衣走下飞机，他的打扮使他看起来像1914年前的汽车驾驶员（日内瓦会议后，苏联领导人才开始对别致的服装剪裁发生兴趣）。赫鲁晓夫相当生动地概括了他必然地经历到的紧张感、陌生感和深深的自卑感。他们从莫斯科来这里时所乘坐的双引擎伊尔式飞机，给他带来的窘迫感，令人玩味不已。

斯大林直到逝世之前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将会看到，我死之后帝国主义大国会像拧鸡脖子一样收拾你们。”我们从未打算向他保证我们能够对付它们，我们明白那样做没有任何益处。另

外，我们自己也对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存有疑虑。举个例说，他过分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结果是他过多地把信心寄托在我们的武装力量上。他生活在敌人随时会袭来的恐惧之中。在他看来，外交政策意味着让高射炮兵团在莫斯科城周围，一天24小时处于警戒状态。

斯大林死后，试图亲自同外国打交道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趣的挑战。1955年，我们几次出访与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表会谈，试探他们对各种问题的态度。那一年我们的日内瓦之行也给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人提供了察看我们的机会。日内瓦会议对我们是一次关键的考验：我们能胜任地代表我们的国家吗？我们能不带不现实的希望严肃地看待这次会议并抵制对方的威胁吗？全面地考虑，我可以说我们通过了那次考验。

关于日内瓦会议的背景：

自从丘吉尔在富尔敦发表演讲，号召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苏联以后，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就紧张起来。^①斯大林死后，西方国家开始并很快地开辟了和新的苏联政府的通讯线路，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丘吉尔的主意。丘吉尔认为，西方能够利用新的苏联政府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更易遭受压力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的报纸突然间填满了要求四大强国会晤的文章。我们也赞成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经过如此残酷的战争，我们苏联领导阶层感觉到我们能够和西方达成协议，并就和平共处、不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的合理原则方面取得一致意见。

开会的地点和日期通过外交渠道确定在日内瓦，1955年夏天。在那个时候，布尔加宁已经是部长会议主席。我认为，我们

^①在这儿发现赫鲁晓夫使用“包围”一词很有意思。他指的是中、东欧洲的大部分实现苏维埃化后美国采取的遏制政策。从苏联一侧的高地看，防御性的遏制看来无疑象是潜在的包围攻势。

之所以能够同意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原因之一，是当时马林科夫已被免除了主席的职务。正如每个了解马林科夫的人将会告诉你的，他在斯大林死后变得没有一点首创精神，并且完全无法预言他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他的易变状况到了危险的程度，因为他太容易受别人压力的驱使和影响。过去他陷入贝利亚的控制之下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贝利亚可能不比马林科夫聪明多少，但他精明得多，而且意志坚定。

尽管布尔加宁不精通外交政策并且也不善于外交谈判，但他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必须率领我们的代表团去日内瓦。因为其它三个政府——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将陪同他们的首相前往日内瓦，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定也派我们的外交事务部长莫洛托夫随同前往。正是在那个时候人们才建议我也应该参加代表团。我告诫他们说别的代表团可能难以理解我为什么在场，因为我没有担任任何部长职务；我只代表党（作为第一书记）。莫洛托夫回答道：“决定派谁去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另外，你还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主席团是苏联的最高统治机构。我认为你应该去。”

我仍然不敢肯定我出席日内瓦会议是否合适，但现在为时已太晚来不及担心那些事情。我不否认，我非常渴望得到一个机会会晤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参与解决国际问题。

苏联当时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和平共处。然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却另有打算。他们想同我们就近东的政治局势达成协议，可他们想根据他们的主张来做这件事。他们无意考虑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或愿望。当然，他们的目标还包括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军队解放了的国家里恢复资本主义，他们尤其想要把波兰提出社会主义阵营。但是我们知道，英、美、法在日内瓦追求的头号目标将是他们叫做“德国的统一”的问题，这实际上意味着将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社会主义力量驱除出去。

换句话说，就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取消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无疑会成为北约组织成员的单一的资本主义德国。至于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我们只想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以确认两个德国的存在，并保证每个国家获准按它自己的人民认为合适的方式发展。

日内瓦会议期间，我感到需要做的主要的事情是维护和平，但西方国家仍不愿意采取创造一个牢固的和平环境的基础所需的哪怕是最基本的措施。因此，日内瓦会议可能在开始之前就注定了要失败的。但这次会议从几个重要的方面来讲还是有益的。举例说，它给四个大国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以互相接近、互相观察，非正式地交换看法，这一般都是在正式会议后就餐时进行的。

不幸的是，我们的代表团从我们在日内瓦机场着陆那一时刻起就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其它三个代表团的领导人都是乘坐四引擎飞机来的，我们乘坐的却是一架一般的双引擎伊尔-14飞机。他们的飞机肯定给人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像，这一比较，多少有点令人窘迫。

瑞士政府在机场为四国代表团举行了欢迎仪式，在向每个代表团团长发出阅兵的邀请之后，军队开始列队行进。仪式进行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作为我们代表团的团长，布尔加宁应该在军队列队行进之后前去检阅仪仗队。^①可就在他这样做之前，一个瑞士礼宾司官员突然跨到我面前，转身背朝我站在了那里。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想把他推到一边去。后来，我意识到他是受瑞士政府指示才那样做的。他接到命令，要确保我不能同布尔加宁一起出去阅兵。我未获允许参加这一部分仪式，因为，

^①赫鲁晓夫仍旧喜欢假装他不主管苏联代表团。他甚至装出了遵从布尔加宁的样子。但是他的统帅地位在任何人看来都是非常明显的。

瑞士政府就十分无礼地派那个人站在了我面前！

在我们乘车去我们住处时，我注意到艾森豪威尔的保镖跑着紧紧跟在他的车后，这使我们感到十分奇怪。让一个人跟着开着的小轿车不是什么卑鄙手段，一辆轿车要同一个步行的人保持同样的速度也不是一件易事。4年以后，我又目睹了同样的事情，那是在我开始访问美国、艾森豪威尔去华盛顿机场迎接我的时候。当他和我乘车去市内时，他的那些忠诚的私人保镖又一次跑步跟在车后。

我在日内瓦会议上与艾森豪威尔相遇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战后1945年6月24日他来莫斯科在列宁陵墓的检阅台上观看胜利大游行时，我就见到过他。但那时，我们都处在各自的事业的早期，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将军，我是乌克兰党和加盟共和国的负责人。1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作为各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又一次相遇了。以前，我们曾肩并肩地一起在一个检阅台上站立过；今天我们却面面相觑地分坐在谈判桌的两侧。

如果要我把同我打过交道的两个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作一比较的话，其结果对艾森豪威尔将是不利的。我们的专门研究艾森豪威尔的人告诉我说，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平庸的军事领导人，一个软弱的总统。他是个好人，但他不够坚强，他的意志较薄弱。就像我在日内瓦发现的，他过分依赖于他的顾问。我总是明显地感到当美国总统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尽管我们双方实质上都有改变对所面临的任何问题的态度，但我们同美国代表团的会谈总的来说富有建设性的并对双方都有益处。在那些日子里，美国因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仍然健在而拒绝做出哪怕是最合理的让步。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是他而不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我可以通过描述一下我在日内瓦一次全体会议上看到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4个代表团的团长轮流主持会议，当轮到艾森豪威尔时，杜勒斯就坐在他的右边。我坐在布尔加宁的

左边，正好挨着杜勒斯，或者可能我的中间还坐着一个翻译。不管怎样，我看到杜勒斯用铅笔在便笺簿上写着什么，然后把它们撕下来，叠在一块，偷偷地把纸条放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手下面。然后，艾森豪威尔就会把纸条拿起来，打开，并在对讨论的任何问题做出决定之前，当众读出纸条上写的话。他认真地遵循着这种常规做法，就像一个小学生顺从地接受他的老师的提示一样。我们难以想像，一国之首脑何以能允许他自己在外国代表团面前做如此丢脸的事情。看来艾森豪威尔肯定是在让杜勒斯替他做思考工作。

关于杜勒斯。

几年以后我率领苏联代表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尼赫鲁先生跟我提起了杜勒斯。顺便说一下，尼赫鲁是一个极富有魅力的人。他总是在笑，脸上的表情总是那样温和。“告诉我，赫鲁晓夫先生，”他说，“在日内瓦谈判期间你同杜勒斯先生相处得怎样？”他的提问没有使我感到惊讶；尼赫鲁知道，杜勒斯的政策是同我们的政策顽固地对立的。我回答说，在日内瓦我确实有过一次机会同杜勒斯在餐桌边进行正式交谈，我发现他是一个极其枯燥乏味的人；我们除了谈各自最喜欢吃什么菜之外，别的什么也没谈。

杜勒斯经常说，美国的目标是把欧洲的社会主义推回到苏联的边界上去，而且，看来包围苏联的想法使他着了迷。他把美国对苏联实行的经济封锁扩展到包括联合抵制文化交流。就连苏联旅游者和棋手也不准参观美国。我还记得，美国主办过一次有几分象是国际厨师大会的活动，我们的代表团也没有被允许参加那次会议。

但是，我要替杜勒斯说一句话：他明白他能够把我们推出多远，而且，他从未把我们推得太远。例如，在1958年叙利亚和黎巴嫩发生的事件期间我们两个国家的军队在近东地区遭遇时，杜

勒斯从战争的边缘上退了下来。美国和英国的反动势力撤回了他们的军队，这部分是由于世界舆论的压力所致，但部分地是杜勒斯慎重的结果苏联的威望于是在世界上所有进步国家里得到提高。

杜勒斯去世的时候，我对我的朋友说，尽管他一生仇恨共产主义并蔑视进步活动，但他从未越过那个他在讲话中总要谈论的“边缘”，只为这一点我们也应该为他的离世感到悲痛。

因为艾森豪威尔1955年要把他的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带到日内瓦，我们因此也坚持把我们自己的国防部长朱可夫将军算做代表团的成员。朱可夫是艾森豪威尔战争年代的一个朋友。我们认为，他们的相识或许可以作为将导致我们的两国紧张关系缓和的会晤的基础。我们希望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能够有一次单独会谈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就和平共处的必要性问题交换看法。但是，那个恶毒而卑怯的家伙杜勒斯总是跟在艾森豪威尔身边，如果艾森豪威尔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情他就对他厉声呵斥。杜勒斯不能容忍与苏联和平共处的想法。然而，艾森豪威尔确实给了朱可夫一个自旋卷筒礼物，并给朱可夫的夫人和女儿捎去了他个人的问候；但除了这样的打趣的话以外，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毫无结果。

日内瓦会晤开始之后，艾森豪威尔建议，每次全体会议之后我们到一起喝喝饮料，愉快地送走每一天。他的意思是，如果当天的全体会议的内容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反感或者使他们的关系趋向紧张，我们可以用马丁尼鸡尾酒将它们冲洗干净。我记得在这样的一次非正式聚会上，艾森豪威尔向我介绍了纳尔逊·洛克菲勒。他是以前顾问的身分陪同美国代表团来的。就我所看，他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在穿着打扮上民主党派味十足，他是那种不太重视影响的人。^①当我见到他时，我说，“这么说，这就是洛

^①关于纳尔逊·洛克菲勒穿着打扮“民主党派味十足”的说法是一把钥匙，大大有助于人们理解苏联对西方的印象。

克菲喽先生本人喽！”我开玩笑地用拳头轻轻碰了他一下。他把这当作一个玩笑，也回敬了我一拳。

我们很感兴趣同洛克菲勒谈谈从美国弄到大约是60亿美元的信用贷款的可能性问题。但是，美国人已经在催促我们偿还欠他们的由租借法批准的那一笔钱。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提供给我们60亿美元的贷款的话，我们愿意偿还按租借法借来的一部分钱，但不是全部。我们讨论过这件事，但结果是一无所成。

在日内瓦，我们同法国人的关系相处得最好。被我们绰称作埃加·菲奥多罗维奇的埃·加·富尔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人，他向我们表示了出格的友好和热情。但是，法国政府在那些日子里更换频繁，因此，对参加日内瓦会晤的法国代表团予以严肃的关注是毫无意义的。^①

我们同英国代表团的关系不像同法国代表团的关系那样友好，但是，我们从与艾登会谈时的气氛可以肯定地说是热情的。他自然而然地像美国人一样遵循着同样的总方针，但他看起来更灵活，更容易接受合理的辩论。艾登在一次晚宴上问我们，“如果你们被邀请去英国进行正式访问，你们会怎么想？你们不认为这样一次旅行，对我们两国政府都有用吗？”我们说，那将确实会有用，而且我们将愉快地接受这样的邀请。我们差不多是在当时当地就把这件事定了下来。英国将向我们发出正式邀请，我们将应邀。

日内瓦会议即将结束之时，我们拟定了一个联合声明以阐述四国代表团的主张。这个声明拟定的方式给每个代表提供了用自己的方式解释它的可能性。文件的措词是经过能使我们都签字的

^①尽管赫鲁晓夫喜欢富尔，但他因为法国政府各部门不断变更就对认真看待富尔的必要性就不予考虑这一点，是对苏联政府思想的局限性 的一个有趣的注脚。

各种各样的妥协的结果。我们不想在没有留下任何表示我们开过会的东西的情况下就散会。另一方面，我们也都不想在声明中有任何可以被解释为一方在原则或政策上对另一方的让步的条款。

回国的路上，我们在西柏林停留了一下。在那儿我们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并发表了另外一个联合声明。在柏林的德国人用十分的敬意迎接了我们。成群结队的人们出来向我们欢呼。我以前去过德国，但这是我头一次以官员的身分到那儿。我原来猜想那儿会有一些敌视我们的举动，可事实上一点都没有。有些人面带愠怒之色，但为数不多。总的来说，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我们在柏林受到的热情招待使我们进一步确信，德国已厌倦战争，他们现在想和我们建立牢固而友好的关系。

我们带着清楚的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的心情回到了莫斯科。但我们现在因为认识到了我们的敌人可能同我们害怕他们一样害怕我们而受到了鼓舞。他们因为害怕我们才以战争相威胁并试图迫使我们同他们达成对他们有利可图的协议。现在，我们在日内瓦的表现已使我们的敌人认识到，我们能够顶住他们的压力，看穿他们的阴谋。他们现在知道，他们必须诚实而公平地跟我们打交道，他们必须尊重我们的边界和我们的权力，他们不能用武力或敲诈勒索的方式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认识到，如果他们真的需要和平的话，他们就必须把同我们的关系建立在新的设想和期望之上。对我们来说，日内瓦会议是我们在外交战线上的一次重要突破。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已经树立了胜利者的形像。艾登邀请我们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事，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成功。

第十四章 访问伦敦

赫鲁晓夫在1956年春天，和布尔加宁访问伦敦之前，已经在1954年去过北京，在1955年完成了他的众所周知的印度之行，对贝尔格莱德的朝圣和日内瓦之行。他正在变成一个阅历丰富的旅游家。在1956年之后，他召开了党的“二十大”，作了“秘密报告”，虽然布尔加宁是部长会议主席，但是这时谁是真正的统帅已一清二楚——尽管直到1957年夏天赫鲁晓夫才粉粹反对派，最后制服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人。在早些时候，已经不再是部长会议主席但仍然是党的主席团的成员的马林科夫曾为了替后来的赫氏之行作准备而对英国进行了相当成功的访问。赫鲁晓夫在本文中并没有提及这一事实。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访问被谢罗夫将军弄糟了，因为他们派他这个臭名昭著的警察头目先行到英国总管这次伟大的访问的安全工作。英国报界竭力抗议，谢罗夫不得不返回苏联。赫鲁晓夫永远不会理解英国人为何非难谢罗夫。

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对苏联极不友好，我们想同英国发展良好的贸易关系的努力收益不大。斯大林死后，工党代表来苏联参观并与我们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时，我们同大英帝国的关系才只是得到了稍许的改善。随后，保守党人取代工党执政，艾登成为首相。^①我们认为，艾登作为一个保守党人相对来说是进步的，我们仍不无感激地记得，战前他在外交部任职的时候曾赞成联合

英国和苏联的军队抗击希特勒德国的条约。张伯伦开始他意在煽动希特勒反对我们的苛刻的反苏政策时，艾登已经辞职。^②因此，艾登的再度执政给了我们能够同大不列颠改善关系的希望。

在日内瓦我们同艾登就对英国进行符合两国愿望的国事访问达成一致意见后，我们通过交换外交照会安排好了一切事情，我们的代表团计划在1956年4月动身去伦敦。当时的时间肯定是在4月下旬，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在去英国的路上庆祝过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4月17日。

布尔加宁此时仍然是部长会议主席，因此也是我们代表团的正式团长。^③我被吸收进代表团是因为我在日内瓦已经同艾登建立了最好的工作关系。他跟我谈话的次数比任何人都多，并且我代表我们的代表团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我们还带了科学院院士库尔恰托夫去伦敦，因为我们想同英国科学界建立联系。^④库尔恰托夫是一个富有魅力和机智的人，一位有才华的科学家。

我们乘战斗巡洋舰到了英国。我们坐船的目的是想到英国本土后坐火车去伦敦。那样我们就能多看看英国的山水景色，城市风光。我们出发之前，莫斯科的英国使馆询问我们是否能让他们的一个海军武官陪我们旅行。我们同意了。当然，有些人担心那个英国武官会窥探我们的军事秘密和巡洋舰上的技术装备。如此愚蠢的想法是斯大林时期沿续下来的。那个英国海军武官原来是

①保守党重新执政丘吉尔任首相。艾登后来继任了他的职位。

②内维尔·张伯伦为了把墨索里尼从德国分离出来而对他采取的姑息政策是安东尼·艾登辞去外长职务的主要原因。张伯伦没有做任何事情去“煽动希特勒”反对俄罗斯：希特勒不需要煽动。张伯伦的政策是通过允许希特勒攻克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以达到姑息他的目的。当此政策未能奏效时，他确实曾半心半意地试图与俄罗斯达成一种勉强称得上得上的联盟。

③正如以前提到的，实际上处于首脑地位的是赫鲁晓夫。

④库尔恰托夫，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是俄国原子弹之父。

一个很有礼貌而令人愉快的人。4月17日，我的生日，我们决定邀请他同我们的代表团一起吃饭。很自然，我们准备了一些饮料；可以看出，那个英国人酒量不小，并且对酒有很高鉴赏力。实际上，他喝得是那样多，以致于险些没能回到他的船舱中去，更没有能力在船上四处窥探军事秘密了。后来，我就这件事跟艾登开过玩笑。他问，“喂，赫鲁晓夫先生，我们的武官在你们的船上规矩吗？”

“他确实很规矩。他很认真地代表了大不列颠。”

“你是说他没有监视你们？他没有满船爬，检查所有的东西吗？”

“噢，对，他只是干不了！他把自己挤进臭虫都钻不进去的角落里。他看到了那里的所有的东西。”艾登笑了。我不知道人们是否已跟他说过这个武官醉到什么程度。不管怎样，艾登喜欢拿他跟布尔加宁和我开玩笑。

船到了英国的港口时，我们被致以最高的军礼并受到正式的欢迎。我们乘上了开往伦敦的火车。我们看到的景致远比我们在瑞士看到的多得多。不算日内瓦在内，我以前从未到过西欧。英国给我的第一和最持久的印象是那一排排小红砖房子。它们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因为它们使我想起了我在童年时代在顿巴斯看见过的小房子。我的父亲在曾经属于威尔士人约翁·休斯的尤索夫卡金属工厂附近的一个矿上做工。^①休斯给他的技术和管理人员盖起了跟我去英国旅游时看到的一样的小红砖房。我记得，在顿巴斯的夏天，人们只能看见这些房子的窗子，因为其余部分都爬满了长青藤。

我们在英国住的饭店好极了。服务是超一流的。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以前我们跟外国人联系不多。我认为我

^①尤索夫卡——或者叫休斯—索夫卡是以约翁·休斯的名字而命名的。

们给当地的人们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从车上下来往饭店走去时，伦敦人马上开始向我们围拢过来。留着胡子的院士库尔恰托夫尤其使他们着迷。男孩子们用手指着他，笑着，激动地跳跃着，就像普天下的男孩子们经常做的那样。

我们住下来之后，就开始同英国政府领导人会谈。英方出席会议的以艾登和劳埃德为首。我想麦克米兰也参加了这些会谈。我们的会谈实质上没有给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上所取得的成果添加些新内容。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关于德国、裁军以及和平共处。我们已经看到，西方国家尚未做好严肃对待这些重要问题的准备。他们还在企图哄骗我们去迁就他们的条件。

我记得有一件事奠定了我们在伦敦会谈的基调。布尔加宁、劳埃德和我同乘一辆车去参观某个教育机构。劳埃德举止很适度、友好。在一个地方他把头转向我说，“你知道，一天有一只小鸟停落在我的肩膀上，噉噉喳喳地对我说你们在卖武器给也门。”

我说，“嗯，很明显这些天四处飞动着各种各样的小鸟，噉噉喳喳地讲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事情，因为也有一只小鸟在我的肩上停歇过，告诉我说你们在卖武器给埃及和伊拉克。这只小鸟告诉我，你们试图把武器卖给任何想从你们这儿买武器的人，有时甚至想卖给那些不想在你们这儿买武器的人。”

“我猜想这是真的：什么样的鸟都有。有时在对着你们的耳朵噉噉喳喳地讲话，有的在对着我们的耳朵讲。”

“对，”我说，“但是，如果所有的小鸟都开始对你们和我们讲同样的事情——讲我们应该接受一个相互制约的不卖武器给任何人的要求——不是很好吗？那么所有的鸟不都将对共同的和平事业作出贡献吗？”^①

^①只有塞尔温·劳埃德先生能够说出是否这次无意义的谈话在此得到了精确的记载。

当然，这种谈话只不过是开开玩笑。它不应被用来说明我们不想认真同英国人会谈。首要的是，这些会晤给我们提供了阐明我们的立场的机会。西方国家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才有兴趣同我们会谈。再有，我认为英国对阻止尤其是在近东的军事冲突有特殊的兴趣。他们想要我们同意不卖武器给埃及。我们原则上愿意这样做，但我们告诉他们，只有在这个协议能约束他们不卖武器给近东的国家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同意签字。

一个星期天，艾登邀请布尔加宁和我到他的乡间邸宅去，我们称它为他的“夏季别墅。”他对我们解释说，某个富有的大资本家把这个乡间邸宅交给了政府，供当上首相的人私用，不管他属于什么党派。晚饭前，我和布尔加宁沿着别墅旁的一条小路散步。那里的景致使我们想起了我们自己的奥廖尔和库尔斯克州内的乡村。

艾登的别墅叫契克斯，周围种满了各种花草。室内靠烧无烟煤的铁炉子供热。凭我自己在顿巴斯的经验，我知道无烟煤含有大量的硫磺，这就是为什么房内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而且所有的东西上都有一层粘乎乎的烟尘。

麦克米伦、劳埃德和一些有影响的保守党政治家同我们一起用餐。艾登的妻子当主人。我们的使馆已经告诉我们她是丘吉尔的侄女，而且在喝酒上明显地继承了丘吉尔的一些品质。喔，酒端上桌之后，她肯定没有拒绝陪我们一起喝几口，但是，就我们所能理解的而言，我不认为她滥用了这个独特的丘吉尔传统。

席间艾登夫人问我们，“告诉我，你们有什么样的导弹？它们飞得很远吗？”

“是的，”我说，“它们的射程很远。它们可以轻易地飞到你们的岛上来，而且还可以更远些。”她咬了咬舌头。我那样回答她有些不礼貌。她可能把这当成了某种威胁。我们绝对没想威胁任何人。我们只是想提醒其它国家，我们是强大的，应该受到

尊敬，我们的能容忍别人用最后通牒式的语言跟我们谈话。

艾登邀请布尔加宁和我当天晚上住在他的名叫契克斯的别墅。我们被带到楼上的两个房间。早上，我起得很早，走到过道里找布尔加宁的房间以便能把他叫起来。我敲响了一扇门，以为那是布尔加宁的房间。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出来，很明显她感到受惊和害怕了。我意识到我差点闯进了艾登妻子的房间。我没有道歉或说出我是谁，就转身匆匆地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间。布尔加宁和我就此大笑了一阵，但我们决定不向我们的主人提这件事情。

第二天，我们约好去拜访伊丽莎白女王。我们不必穿特殊的衣服。我们事先对艾登说过，如果女王不在乎我的穿日常的工作西装去见她，那就好。如果她反对，那么这就太糟糕了。我们对这类仪式有一些先入之见。我们不打算违背我们的习惯，穿上燕尾服，戴上大礼帽，或者任何其它的他们坚持要我们拜会女王时应穿的东西。我记得我们在莫斯科看过一部纪录片电影，片中展示出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官方使者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打扮一新。他一出现我们就哄堂大笑起来。他看起来确实像一个旧时的欧洲绅士。我可以说，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具有外交官们要求大使所应有的装腔作势。

我们在一个温暖而怡人的日子里来到了女王的王宫。据艾登讲，4月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降雨最少。王宫的庭院中集结了成群的观光的游人。艾登告诉我们，我们会发现女王是一位简朴、聪明而使人愉快的女性。我们进入王宫时，女王接见了我们。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也在场。我们被介绍给她。女王穿着朴素的白色衣服，看起来像是人们在温暖的夏天的下午沿高尔基大街散步时很可能遇到的那种年轻妇女。

她派人带我们参观了王宫，然后邀请我们跟她一起喝茶^①。

^①俄国人喝茶用玻璃杯。

我们坐下来喝茶，随便谈了谈。女王的丈夫表示出对列宁格勒有浓厚的兴趣。他说他从未去过那儿，梦想着有一天能去看看。我们告诉他那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城市，并说我们因为有它而颇感自豪。我们还告诉他，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使他的梦变成现实。我们提出可在他愿意的任何时候邀请他去列宁格勒，并说他可以以他希望的任何身分——作为一个政府代表或者是军队的指挥官——来我们这儿参观。他向我们表示感谢，说他有机会的时候，他将接受我们的善意邀请。

女王对我们的图—104型飞机尤其感兴趣。我们在英国的时候，我们的邮件就是由这种飞机从国内带给我们的。实际上，我们让图—104型飞向那里的部分原因，是想向英国人展示我们有良好的喷气式客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喷气式客机之一，我们想要我们的主人了解它。女王曾在图—104着陆飞行路过她的宫殿上空时看到过它。我们对她表示感谢，同意说，对，它是一架极好的飞机——上等的新式飞机，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

女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声音温柔平静。她一点不装模作样，完全没有人们认为出身皇族的人所有的那种傲慢。她可以是英国的女王，但在我们的眼里，她首先是她丈夫的妻子，她孩子们的母亲。我记得后来在英国观光时我遇到过一位英国妇女，她说，“这么说，‘这么说，你看到了女王，你认为她怎么样？’”我回答说，我们十分喜爱她。那位妇女悲哀地摇了摇头说，“我很替她难过。她没有宁静的生活。”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问。

“唉，她是一个年轻女性。她可能喜欢过她那个年令的妇女所享有的正常生活，但是她却不能那样做，因为她是女王。她生活在鱼缸之中。她总是被展览着，她必须时刻确保她自己具有与她的皇家的地位相宜的仪表。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使她的生活变得艰难。这就是为甚么我十分同情她甚至替她难过。”我喜

欢这位妇女。她针对女王说的一番话，是一种非常通人情的女性的看法。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十九世纪诗人)在他的《在俄国谁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诗篇中说，就连沙皇也没有安宁的生活。他可能是对的。这种描述同样适用于女王伊丽沙白二世。

布尔加宁是我们国家的法律上的首脑，我们代表团的团长，我只是代表团的一个成员。但结果是，我不得不处理每次与英国协商结束时的情况。我绝对没有自己打算这样做，可是，布尔加宁不断地要求我替他做这些事情。有时，我方需要作出某种阐述，我就等着布尔加宁说些什么；常常是一阵难堪的停顿，而后他就转向我说：“你去回答。”当然，如果我们打算避免尴尬的局面，我就得自己说上几句，此外别无选择。

例如，英国海军大臣为我们举办了一次非正式招待会。各方面的人士都在场，多数是海军官员。当我们必须决定如何回答大臣的讲话时，布尔加宁说，“你去讲吧！”我决定做一次给英国人以沉重打击而相当直率的演讲，并向英国人发起进攻。我说，“先生们，你们已经来了，大不列颠的代表们，整个世界都知道英国曾一度叱咤世界风云。但是，那个时代已经彻底地变成了历史，我们必须现实地看待问题。一切都已发生改变。你们的专家已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羡慕我们来时乘坐的战斗巡洋舰。那么，我将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如果你们真的想要的话，我们将很高兴把这艘巡洋舰卖给你们，因为它已是过时的东西。新式武器已经出现，舰上的武器已经过时。另外，像我们这样的巡洋舰也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炸弹也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现在，统治海洋的是潜水艇，支配空间的是导弹——从极远的距离之外就能击中它们的目标的导弹。”^①在我讲过话之后的问答时间里，我们坦率

^①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当时的看法。但是，正像人们所了解的，俄罗斯人从那时起已经改变了主意，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上舰队。赫鲁晓夫还在执政时，这项建设工程就开始了。

地交换了看法，双方都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任何苛求的立场上。没有人作出威胁或好战的表示。英国人提出的问题，带有一种冷嘲的意味。这不是一次正式协商，只不过是喝着威士忌酒进行的一次闲谈。

第二天我们见到艾登时，他笑着问到，“喂，你们同我们的水手相处得怎么样？”

“你有很好的水手。他们闻名于世。可是我从你的微笑中看出，你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讨论的事情。”

“是的，”他说，“我知道了。他们向我报告了。还有你的评论。”

“你怎么看我的评论？”

“噢，你知道，我很同意你的看法。但我是首相，我不能用你能用的方式跟我们的海军官员讲话；我不能一清二楚地对他们说他们的船和武器已经过时了。除了一些炸弹之外，我们所拥有的毕竟只有水上舰队。我不能损害他们对他们仅有的武器的信念，现在我能吗？”

在一片大叫大嚷声中，我向海军大臣讲的话在美国报界刊登出来了。美国人猛烈地抛出各种各样的辩词，来反驳我关于水上战船和炸弹已经过时的看法。但是，事实已证明了我的看法，现在美国人已承认炸弹已不再适用，应该被导弹取代。

艾登为我们游览英国制订了一个令人筋疲力竭的计划。从清晨到晚上我们奔波于汽车和飞机之间。行进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忍受，我开始流露出一不满意的神色来。就在我们按计划应乘飞机去英国的某个城市然后继续飞向苏格兰之前，我终于出面表示坚决反对。我把艾登拉到一边，说，“艾登先生，我一步也走不动了。明天我将开始罢工，我不打算再出饭店的门了。”

他笑了。“赫鲁晓夫先生，请，我恳求你。我们将略过今天计划要参观的城市，但请前往参观苏格兰。我们将直接飞向那

儿。你没有听说过苏格兰人吗？他们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不给我片刻的安宁。如果你不去苏格兰，他们就会造反，从英联邦脱离出来。我求求你，请劳一次驾。”

布尔加宁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尽管我们都认为这次旅行不值得但还是同意去。实际上，苏格兰十分有趣，但我们只是在路过的时候飞奔地看了看它，可以这么说。除了那些安排好的我们要接见的官员之外，不让我们与当地居民有任何接触。我们在大不列颠停留期间情况，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我们到达苏格兰的时候，一支仪仗队为我们进行了表演并演奏了乐曲。我们在一个遮挡不大但冰冷的细雨的遮篷下面检阅。人们事先跟我们说过苏格兰总是在下雨。我以前听人说起过苏格兰的军装，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在柏林和维也纳也见过几次。他们的军装十分别致——青灰色的裙子——，他们的音乐也十分离奇，是用特殊的苏格兰乐器演奏的。①

英国人告诉我们女王下令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晚宴以示对我们的款待。这么说她也是苏格兰的女王！我们了解到，举办宴会的那座房子曾是玛丽·斯图尔特的宫殿。我们的主人们都十分尊敬地谈论着这个女王和他们祖国的过去。我的儿子谢廖沙（谢尔盖）这次随我一块旅行。他和两位年长的妇人同坐一桌。其中一位妇人是翻译。她不断地试图让谢廖沙记住坐在他们那张桌上的另一个女人是一个公主一类的人物。当她看到这样做没给他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时，她就十分强调地说，跟他们一块吃饭的人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公主。谢廖沙后来跟我讲了这些事情，我们对此大加嘲笑了一番。我不认为他的翻译是在装假；我认为她是真的为能够同公主坐在同一张桌上而感到激动不已，然而，这个年轻的俄国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荣誉的意义颇使她有些恼

①苏格兰人将会对通过俄国人的眼睛来看他们自己感到兴趣。

怒。当我们从苏格兰回到伦敦时，艾登在政府大楼设宴招待我们。宴会开始前，我们路过艾登办公室时，我看到室内墙上挂着一幅肖像，起初以为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我看到肖像上的那个人长得跟我们以前的沙皇惊人的相象。艾登解释说，那是尼古拉的堂兄弟（乔治五世国王）。我马上转了话题，因为如果我使他们想起肖像里的那个人的表兄弟，已在1918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被杀害，那样会使他们感到不愉快。^①

我们进入宴会厅之前，艾登预先通知我们丘吉尔也要来。我的座位正好挨着丘吉尔。他已老态龙钟，身体肥胖，步履蹒跚。我们坐在那儿偶尔说上只言片语，实际上互相并没有谈出什么。后来，牡蛎端了上来。丘吉尔问我，“你吃过牡蛎吗？”

“没有，丘吉尔先生。”

“那好，看着我怎么吃它们。我喜欢吃牡蛎。”

“好吧，我看着你，学学怎么吃。”他开始吃，我一边啜饮着我的汤，一边看。他吞下了他的牡蛎，我也吃完了我那一份。

“怎么样，”他问道，“你喜欢吃吗？”

“坦率地说，不怎么喜欢。”

“噢，那是因为你你不习惯。”这可能是真的，但我仍旧不喜欢牡蛎。

我和丘吉尔就只谈了这些。他曾提起关于斯大林的话题：“你知道，战时我最尊重他。”丘吉尔明显地是在努力避开事务性谈话。他已不是政府的首脑，把严肃的事情留给艾登去谈。

我第二次见到丘吉尔是在应邀去议会旁听一次会议的时候。

^①英国的乔治王世国王与最后一个沙皇很相象。实际上，沙皇和他的妻子、孩子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当时叫叶卡德罗堡）的一个地下室里遭到暗杀的。

一个年轻的能讲一口漂亮的俄语的保守党党员到我们的代表团来做导游和翻译。他精通俄语，甚至能用卡车司机使用的普通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不仅尽力想用他掌握的俄语给我们留下印象，而且同时还在努力地显示他是一个普通人，但我们假装对他不感兴趣，不注意他在我们面前的炫耀。当下面的议会辩论正在进行时，这个小伙子突然对我们自语道，“看，丘吉尔来了！”丘吉尔进了议会大厅，走到了他的座位上。“他坐不到五或十分钟就会睡着，”我们的导游说。我们看着，果然，丘吉尔一会就把他的头靠在座椅背上，睡着了。

一次，我们去游览伦敦市容，参观了伦敦塔。我们看到了那个过去的国王和女王的经常命令手下的人处死人的地方。我们观看了换岗仪式。好一个如此有声有色的仪式！我能够明白它为什么对游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总的来说，我愿意看英国人如何歌颂他们的过去以及如何用露天表演的形式，例如卫兵换岗来重新再现他们的历史。然而，有一种传统做法令我感到荒谬可笑。我们参观上院的时候，上院议会议长穿着一整套滑稽无比的外套出来迎接我们。他穿着红色长袍，外加一件红色的罩袍，头上顶着一个大大的缎头套。他指给我们看了他主持上院会议时坐的座位。那只不过是一袋子羊毛罢了！严肃的人们竟然穿着如此愚蠢的服装，召开由如此多的欺骗成分包围着的严肃的会议，使我感到震惊。当我观看这个稀奇古怪的戏剧场面时，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倒霉的是，在我们即将结束对英国的访问时，发生了两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件。

一件事发生在我们的战斗巡洋舰停靠的港口。我们已经告诉舰长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突然间，我们得到一份报告说，我们的海员发现有人在我们的巡洋舰周围潜水游泳，但显然他在我们的人能够采取对策前就溜掉了，以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我们向我们的主人作了报告。我忘记了他们做出了什么解释。尽管我们

没有忽略有人会试图在我们的巡洋舰壳上安放磁性水雷的可能性，我们没有再谈这个问题。我们的一些军人认为所发生的一切可以用来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后来，英国发现了一个名叫克雷布少校情报官员的尸体。我们自己的情报机构认为，那个英国人可能想弄到有关我们的战舰的螺旋桨和舰壳的情报。不管怎样，我们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对我们的海军武官乘我们的船从苏联来感到不满意，另外，他们一直在企图监视他们的客人。为了这一事件，当然不完全如此，我们决定不再在英国停留，立即回国^①

我们在伦敦时，英国人安排我们同反对派工党进行了一次会晤。工党党员提出让我们和他们共进晚餐。尽管我们认为这次会晤将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还是同意了。我们已经发现工党和保守党更加敌视我们。我认为我能够解释这一表面上似是而非的现象。我们和保守党处于完全对立的两极。他们代表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我们代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我们知道他们的立场，他们也知道我们的立场。他们不装假，我们也没有对他们抱有幻想或过高的期望。因此，我们能够在一个彻底的有政治家风度的基础上打交道。工党党员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认为自己是劳动人民的代表，他们相信他们的政策就是工人阶级的政策。一句话，他们做出了五花八门的我们既不接受也不承认的宣言。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

工党招待我们的宴会是在议会大厦里一个餐馆举行的。当时工党的领袖之一被看作是我们的朋友的威尔逊。尽管他十分保守，但他声称，如果他执政，他对我们的政策将会比艾登政府的

^①克雷布少校事件在当时制造了一个极大的丑闻，对于公众来说，那件事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是俄国人杀了他，还是他自己淹死了？他在苏联巡洋舰下游泳的目的究竟何在？

政策友好。但是，看看现在他已经掌权多少年了，他对我们的政策同他之前的保守党政府的政策竟如出一辙！

当我们入坐准备就餐时，英国威士忌照例端上桌来。就像在一个公众宴会上例行的那样，第一杯为女王干杯。我们也举杯为女王干杯。然后，我们两个代表团互相敬酒。

盖茨克尔在宴会后发表的讲话至少表现出了一定的圆滑，但突然间，乔治·布朗插了进来开始发言。当时，布朗奢望爬上工党领袖的交椅，对我们极端敌视。他发表了纯属是诽谤性的令人完全不能接受的讲话。我们是他的客人，他竟夸夸其谈地训斥起我们的政策来！我直言不讳地回驳了他的攻击。我说，“布朗先生，我将准确地告诉你，我对你的讲话的看法。我们是你们的客人，希望能得到相应的礼遇。如果你坚持侮辱我们，那么，我想我们除了对你们的邀请表示感谢外，就只好退场了。”说罢，我们示威般地退了场，宴会就这样结束了。^①

过了一两天，英国人在上议院为我们举办了一次招待会。布朗也在场。他走了过来，向我伸出了手。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布朗先生，在那天晚上的事之后，我不能再同你握手了。”

“你是说你不愿意握我的手吗？”他把手伸出来，又第二次收了回去。

我没有动，说，“是的，我不愿意。”

他把手放回身边，我们各自走开了。其他人看了我断然地拒绝同布朗握手，跟我打招呼时也十分谨慎；他们试探性地把手伸

^①发生在下院的工党议会事件是当时一大新闻。盖茨克尔当时是英国工党的领袖。盖茨克尔把一个已经失踪了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治家的名单递给了赫鲁晓夫，请他查明他们的下落（当然，他们都被枪杀了），这激怒了赫鲁晓夫。乔治·布朗先生发起脾气，向赫鲁晓夫大喊起来，赫鲁晓夫极为生气。鉴于赫鲁晓夫提到的原因，苏联共产主义者对欧洲社会主义者的极端仇恨远远超过了他们痛恨保守派的程度。

出来，就好像要断定我是否愿意接受他们的手一样。我和他们挨个握了手。我们互相打趣着，虽然布朗仍然使我感到心烦意乱，我把我的心情告诉了他们。后来，由3个工党党员组成的代表团就布朗的粗鲁举止向我道歉，并向我们保证他只是代表他个人讲话的。布朗被认为相当反苏。他决定利用我们访问的机会来毒害我们两国之关的关系，他成功了。①

我在与布朗的事发生之后看到艾登时，可以这样说，他正在暗自发笑，“喂，你们和工党举行的晚会怎样？”很自然地，他十分清楚已经发生了什么事。

我对他笑了笑，说，“噢，你知道发生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我告诉过你，最好要跟保守党往来。那些工党党员就是非常讨厌。”艾登不想丢掉他从政治上充分利用我们同工党发生冲突这个机会。我们第一次同工党领袖的接触结界很糟，保守党感到很高兴。

我们开玩笑地跟艾登说，我们正在考虑决定参加哪一个党。他笑了，说，“我强烈要求你们选择保守党。”

“我们考虑一下。我们可能会按你建议的那样做。”

在伦敦会谈期间，我们邀请艾登访问苏联以回报他对我们的款待。他向我们表示感谢，并接受了邀请。然而，他从未能作过这次旅行。我们从伦敦回来之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以及最重要的英、法、以对埃及的进攻。我们站在埃及一边，并采取了坚决的外交手段给侵略者施加压力以停止战争。战争在我们参战22小时后。结束了。但西方报刊上对苏联的攻击已到狂热程度，因此，艾登访问苏联已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①关于毒害关系的话颇令人玩味。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其他任何苏联领导人，都不会理解一个人可能出于诚实而深沉的感情，而别无其它用心地站出来反对共产党的压制。

第十五章 帮匈牙利恢复秩序

赫鲁晓夫对1956年匈牙利人起义所做的辩护性十足的叙述与一般公认的事实大相径庭，要引证一点一点地反驳他的说法，说出发生事件的真正的先后次序，恐怕得要写一本小册子才能讲清楚。但有几点应该说明一下。纳吉·伊姆雷对这次起义没有责任。一场民众反抗把他暂时地推上了权力的宝座，但他永远也没有能力驾驶这个政权。在1956年7月召开的由米高扬主持的一次匈牙利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主义者党的书记拉科西·马加斯被罢免官职。（米高扬从莫斯科到这儿来的原因是，苏联驻布达佩斯的大使报告说，如果不罢免拉科西的职务，就会发生一场革命。）格罗接替了拉科西第一书记的职务，但继续采取了镇压措施。纳吉当时已被逮捕。不少共产党员很快就加入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行列，要求更多的自由。10月23日，当20多万示威者横穿布达佩斯市区游行示威要求自由和释放纳吉·伊姆雷时，起义爆发。这是一次流血事件。格罗出动了军队和普通警察，可他们却把武器交给了学生，有时甚至加入学生的游行行列。纳吉·伊姆雷本人没有主动响应。为了答复民众的要求，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才迟迟把他放了出来，寄希望于他能重新振奋党的精神，控制这次反抗活动。即使到此时，纳吉仍被求助于苏联军队的斯大林主义者的余党扣在党总部。结果是匈牙利军队的绝大多数转身反对俄国人。匈牙利共产党实际上已不再存在。全体匈牙利人都支持要求俄国人把军队撤出去的

纳吉。俄国人在多次的犹豫不定之后才撤走他们的部队，但是他们不久又带着强大兵力回来了。在所有的反抗被凶暴地粉碎之后，在俄国人那儿避难的卡达尔·亚诺什，在苏联的保护下站出来，建立了持续到今天的政权。

1956年，布达佩斯爆发了一场血腥的斗争。纳吉·伊姆雷采取欺骗和威胁手段迫使人民反叛，进行互相残杀的战斗。他把有声望的公民猛推到麦克风前面，逼迫他们赞同他的领导，谴责拉科西政权。一些人因恐怖，向纳吉妥协了；一些人是因为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真相。大街小巷里，党员积极分子、尤其是契卡工作人员正在遭到穷追不舍的搜捕。党的委员会和契卡的组织遭到破坏。人们遭到暗杀、被吊死在路灯柱子上，脚朝上，头朝下——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暴行。最初，反革命活动主要是由男青年进行的。他们有良好的武器装备，因为他们抢劫了军用仓库。随后武装分遣队加入进来，巷战在布达佩斯开始。有些分遣队缴获了大炮，多数是高射炮，他们把大炮对准了城市。匈牙利流亡者开始返回布达佩斯，这些来自维也纳的人多数是反动分子。他们是在粉碎希特勒、社会主义政府成立之后被迫逃亡的。北约国家已经在暗暗地参与这一事件。他们在给内战的火焰上浇油，希望那里的革命政府被推翻，革命的成果遭到清算，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得到恢复。

纳吉·伊姆雷提出一个要求，让我们把所有苏联部队撤出匈牙利。根据华沙条约给我们规定的义务，我们只有在一个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我们撤走我们的部队时才能这样做。我们绝对无意做一个暴动领导人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依我们看来，一个小集团利用拉科西政权犯下的严重错误推翻了匈牙利的合法政府。从严格的法律角度讲，纳吉的要求没有议会的支持，因而没有法律的效力。虽然纳吉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已不再是匈牙利共产党

的代言人。他讲的话只代表他自己和一小撮从国外返回来帮助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流亡者。

我们很快确定，这次反叛和纳吉政府没有得到整个国家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授权。工人阶级拒绝支持反革命，而且，尽管纳吉呼吁集体农庄的农民加入他的队伍，但农民们却在观望，不让自己受纳吉欺骗。许多集体农庄继续井井有条地工作着，不理不睬布达佩斯广播传来的反集体农庄的口号。^①

我们决定把我们的部队撤出布达佩斯，让他们驻扎在城外的机场，这与纳吉·伊姆雷的要求完全无关。但是，纵使我们的部队不在布达佩斯了，我们仍然通过留在城内的使馆人员了解那里的情况。

我们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讨论了这次暴动，并作出结论认为，如果我们保持中立，不帮助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匈牙利工人阶级，那样对我们来说将是不可宽恕的。对此，我们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们在布达佩斯。他们白天进城，夜间返回我们的部队驻扎的机场。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抉择：我们把部队重新调入城内粉碎那次反叛呢，还是等一等，看匈牙利内部力量是否能够解放他们自己，并挫败反革命？如果我们决定选择后一种做法，那总会有反革命可能暂时取胜的危险，那将意味着无产阶级要流出大量的鲜血。再则，如果反革命确实获得成功，北约组织在社会主义国家扎下根，那将对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产生严重威胁，更不用说对苏联本身的威胁了。

^①此处唯一真实的地方就是许多农民确实没有参加战斗。他们继续在田里干活，任凭工人、学生和部分匈牙利军队在各个城市交战。

不管我们选择哪条道路，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民族主义的目标，而是兄弟般的无产阶级团结的国际主义目标。为了确保所有的国家在这一方面正确地理解我们，我们决定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磋商——首先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磋商。

我们请求毛泽东派一个代表来和我们就匈牙利事件进行磋商。中国方面很快就作出了反应。一个由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飞抵苏联。刘有丰富经验和崇高威望，我们十分尊敬他。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委派我代表我们一方参加协商。波诺马廖夫也是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我们和中国人的磋商在利帕基进行，利帕基以前是斯大林的一个夏季别墅，现在是个休养所。我们谈了一个通宵，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衡量我们是否应该出兵匈牙利。最初，刘少奇说没有必要；他说我们应该撤出匈牙利，让那里的工人阶级自己逐渐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力量，由他们自己去对付反革命分子。我们同意了。

但是，后来在达成协议之后，我们又重新开始讨论起匈牙利的局势，有人警告说存在着工人阶级可能会喜欢上反革命派的危险。匈牙利的年青人尤其容易受到影响。

我不知道我们前后改了多少次主意。每次当我们认为我们将下决心做什么事的时候，刘少奇总要同毛泽东商量。刘通过电话跟他联系不成问题，因为它像一只猫头鹰，他通宵都在工作。不管刘提出什么建议，毛总是表示赞同。我们这次通宵会议的最后决定是不对匈牙利出兵。一达成这个协议，我就回家了。刘和他的代表团仍留在别墅。

那天清晨我上床准备睡觉时，发现我仍对整个匈牙利问题心事重重，无法休息。它就像我脑中的一颗钉子，使我不能入睡。

上午，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开会，听取我关于同中国代表团讨

论的情况报告。我告诉他们我们怎样几次改变态度，又怎样最后决定不对匈牙利使用军事力量。然而，我接着对主席团指出，如果我们不赶在反革命分子把人们紧密团结起来之前对匈牙利的工人阶级伸出援助之手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后果。

经过深思熟虑，主席团决定如果我们袖手旁观，拒绝援助我们的匈牙利同志的话，那将是不可原谅的，绝对不可原谅。我们问华沙条约部队的总司令科涅夫元帅，“如果我们指示你去匈牙利恢复秩序、挫败反革命力量，需要多长时间？”

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3天，不会再多了。”

“那么，开始准备。到了开始出兵的时候我们将通知你。”

于是就这样决定了。但是，按计划刘少奇要在同一天晚上飞回北京，他仍以为我们同意不在匈牙利使用军事力量。我们认为应该告诉他我们又重新考虑了我们的态度。所以，我们安排在伏努科夫机场同他再作商量。我们让他早一点出发以便能在机场见到他；那样可以不延误他的起飞时间。

主席团的全体成员都去了机场。刘和他的同志们到了，我们举行了会谈。会上根本没有辩论。谈话在相当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中国方面表示出他们明显地分担着苏联人民的忧虑。我们都在考虑着匈牙利工人阶级的幸福和匈牙利人民的未来。刘同意我们最后关于派兵去匈牙利的决定是正确的。

“此刻我不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同意，”他说，“但我认为他会支持你们。我一到北京就把决定告诉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我们将向你们传达我们的正式决定。但你们可以假定你们已经得到了我们的支持。”

问题一解决，我们就送走了中国代表团。①

①中国人以前曾建议不要在波兰采取军事行动。经过多次犹豫不定之后，他们迫切要求在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后来，他们为此得到许多称赞。

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同波兰磋商。我们在匈牙利遇到的困难远比在波兰遇到的困难严重。波兰没有发生武装暴动，并且，我们所信任的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和其他同志已经创建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波兰政权。我们有理由相信波兰的局势正在稳定下来。^①考虑到波兰人民对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命运的关心，我们更有理由同波兰磋商；匈牙利事件的后果与他们利害攸关。在采取派兵到布达佩斯去这样一个决定性步骤之前，我们不仅想知道波兰同志的看法，还想得到波兰同志的肯定的答复。我们需要他们的支持。于是，我们安排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和其他同志去苏波接壤处苏联境内的一个地点和我们会面。主席团指定3个联系紧密的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代表我们一方。

同波兰人磋商之后，我和马林科夫飞到布加勒斯特。除了罗马尼亚的同志；由诺沃提尼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党代表团和日夫科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同志也在那里。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对匈牙利事态作出解释。我们用不着使任何人相信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必要性，因为这些同志已经通过他们在布达佩斯的大使将那里正在发展中的形势了解得一清二楚。另外，为了反抗纳吉·伊姆雷的反革命政府，匈牙利的一些边境地区已开始从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索要武器。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一致同意：我们必须行动，而且必须迅速行动。

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说，他们想跟我们联合起来为正在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匈牙利的革命工人提供军事援助。我们回答说，根据波茨坦协定，除了已经驻扎在匈牙利的苏联军队外，

^①看来赫鲁晓夫对苏联企图插手波兰没有任何意见。苏军在那里准备发起攻击，但是，当时任波兰国防部长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尽管他是一个苏军指挥官，却警告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说波兰军队充满敌意，拒绝接受哥穆尔卡的领导，并将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来同苏军作战。约·西伦凯维兹在1956年的大动荡之时任波兰总理。

这次行动没有必要再牵涉其它国家的部队。我们就罗马尼亚现在如此渴望投身到反革命的战斗中去一事跟罗马尼亚同志开了玩笑。1919年，罗马尼亚曾支持过挫败了库恩·贝洛的匈牙利革命的反革命分子。罗马尼亚的同志们笑了。接着，他们祝愿我们成功，要我们赶紧行动。

那天晚上，马林科夫和我动身去南斯拉夫同铁托同志商议。天气糟透了。我们不得不在猛烈的大雷雨之夜飞过许多山岭。我们周围全是闪电。我一夜没有合眼。我飞行过许多次，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可从没有在这样坏的条件下飞过。我们的驾驶员是很有经验的齐宾将军。在暴风雨中，我们与前面的护航侦察机失去了联系。我们飞往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岛。当地的机场设备很差。那是战争年代建造的老式的小型机场。但是，多亏齐宾同志的技术，我们飞到了。着陆之后，我们询问我们的另一架飞机是否已经到了。南斯拉夫人说他们对它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为另一架飞机的机组人员的命运十分担忧。

有一辆汽车在等着我们，把我们带往一处码头。我们登上了一艘汽艇，向铁托同志所在的布里俄尼岛驶去。马林科夫脸色苍白象死人一样，平时他在半路上都晕车。我们刚在一次人们所能想像得到的最艰险的飞行后着陆，现在又坐着小汽艇驶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马林科夫在船上躺下，闭着眼。我担心我们上岸时他将变成一副什么样子，但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正如俄国古谚说的：我们不能坐在海边等好天气。

我们到达岛上时，铁托正在等着我们。他热忱地欢迎了我们。我们相互拥抱、亲吻，虽然不久前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紧张的，而且由于匈牙利事态的发展，关系又变得越来越紧张了。我们在采取最适当的行动步骤上，意见有分歧。

我们向铁托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并告诉他我们将向布达佩斯派出军队的决定。我们征求他的意见。我原以为铁托将比波兰同志

更强烈反对我们。但是，他使我们高兴得出乎意外。铁托说我们完全正确，而且我们应当尽快地使军队行动起来。他说我们有帮助匈牙利镇压反革命的义务。他向我们保证他完全理解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我们本来准备他会反对。但相反，他给了我们全力的支持。我甚至可以这样说，他在要求迅速而果断地解决问题上，比我们还要急。

这件事情一定下来，我们说，“好吧，我们现在最好休息一下，我们清晨必须返回莫斯科。”

“不，”铁托说，“别走。你们为什么不在这儿呆一两天呢？”我们对铁托同志的好意表示感谢，但解释说我们没有时间了，因为我们必须立刻回莫斯科。“告诉我，”他问，“你们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在布达佩斯恢复秩序？”

我说我们尚未决定具体日期，但这必须很快定下来。铁托一定意识到了这不完全是真的，并且还意识到了我们已经指定了进攻的日期，但是，我不想告诉任何人我们的部队打算何时进入布达佩斯。南斯拉夫人不直接参与这件事，因此，他们没有必要知道。知道的人，包括我们的朋友，越少越好。如果我们何时开始行动的消息泄漏出去，那将使我们付出昂贵的代价。

我说，“我想我们现在该试着睡觉了。”

“听着，”他说，“为什么现在去睡觉？匆匆忙忙干什么？我们干吗不聊天来打发这一晚上？还有几个小时天才能亮，我很愿意和你们一起度过剩下的时光。”

“喔，好吧，”我说。“我们将在回莫斯科的路上在飞机里打个盹儿。”

我们对付着坐到了黎明。早晨，铁托说他要送送我们。他自己开车把我们送到了码头。我们像老朋友一样道别，互相在各自的双膝上亲吻。他祝愿我们旅途愉快并在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上

取得成功。①

傍晚时分，我们到了莫斯科。主席团的成员到机场迎接我们，我们直接去了克里姆林宫。

我们让科涅夫将他的部队开进了匈牙利，除了人们进行了极端顽固的抵抗的布达佩斯外，匈牙利各地的秩序差不多立刻得到了恢复。匈牙利军队的官员们参加了暴动，我们的部队必须组织起严密的防御工事。大炮甚至也被拉到了楼上用来扫射各个街道。但是，正如科涅夫元帅已预言的那样，布达佩斯的抵抗持续了不到3天。这次反抗还可能被挫败得更快些，但那样我们就必须采取更多的破坏性措施，且需要做出更多的牺牲。我们不会那样干的。

纳吉·伊姆雷和他的众多的骨干分子躲藏在南斯拉夫使馆内。这件事使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受到严峻考验。匈牙利同志要求南斯拉夫人把纳吉和他的人交出来以便把他们送交法院审判。南斯拉夫人顽固地反对这样做。由卡达尔和明尼赫领导的匈牙利临时革命政府只是等待着，直到南斯拉夫同志们没有能力再收留纳吉一伙。②南斯拉夫人放出纳吉的时候，坚持让匈牙利人就他的安全问题作出保证。匈牙利的同志们拒绝了这一要求，纳

①铁托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不够明朗。他曾力劝俄国人除掉拉科西，但是，匈牙利起义的暴力看来已使他感到惊恐，虽然他相当同情纳吉。

②当布达佩斯的纳吉政府看来好像是扎下了根时，俄国人却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立了所谓的匈牙利临时革命政府。这是一个由已经彻底瓦解了的匈牙利共产党的余党组成的傀儡组织。匈牙利目前的统治者卡达尔·亚诺什实际上参加了纳吉的政府，并且同当过几天纳吉的内务部长的明尼赫·费伦茨一道出面公开支持它。但是，11月2日，这两个人没有预先通知就突然失踪了，在危急关头抛弃了纳吉，而后在乌日哥罗德的苏联阵营出现了。两天之后，卡达尔据说在匈牙利东部发表了他的著名广播讲话，声称他已经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府，呼吁俄国人派军队来镇压匈牙利的反抗活动。

他和明尼赫一起紧随俄国部队之后回到了布达佩斯，在苏联坦克的支持下建立了新的政权，并一直执政到今天。身为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的明尼赫对为整顿匈牙利的秩序而采取的严厉镇压措施负有责任。他在1958年成为总理，卡达尔继续担任党的书记。自从明尼赫死去（因病死亡）之后，卡达尔在经过多次尝试之后，引进了一些改革，这样，多少使人们遗忘了他的背信弃义的做傀儡头子的历史。赫鲁晓夫对明尼赫的评价表明了他自己的性格和他作为一个严肃的苏联领导人对卫星国的态度。

吉刚被放回他的住所，就被捕了——他也应该被捕！^①接着卡达尔同志建议用飞机把纳吉送到布加勒斯特去，到匈牙利的秩序完全恢复、新的政府将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再让他回来。

秩序恢复后，匈牙利临时革命政府就从苏联马卡兰的乌日哥罗德搬到了匈牙利，并更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新的领导人开始聚集他们的力量，局势开始十分令人满意地趋于稳定。

一切平静下来之后，罗马尼亚的同志们把纳吉·伊姆雷交给了匈牙利。由于南斯拉夫在匈牙利事件期间采取的态度，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关系趋于紧张。因此，铁托同志建议我们见面谈一谈，以便恢复我们之间良好的关系。起初，他建议在位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接壤处的多瑙河上的一条船上秘密会谈。后来，就在我动身之前，他改变了主意，建议我们改在布加勒斯特公开会晤。斯大林死后，我们已经消除了与南斯拉夫的冲突，我们没有理由开始另一场冲突。我们谈到了如何改善我们的贸易关系。我说，就南斯拉夫而言，我们没有称过霸，我重申我们赞同不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的原则。

^①这一点不正确。匈牙利人确实向铁托保证如果纳吉离开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使馆，他的避难所，他们将不加害于他。纳吉被捕时铁托大发雷霆。赫鲁晓夫没有提到那个可鄙的事实，即纳吉后来被从监狱里带出来枪毙了。他也没有提及马卡特尔·帕尔将军带着通行证前去与俄国人会面协商时，遭到逮捕和枪决一事。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匈牙利的事情进展得不是很好。我们在主席团里研究了那儿的情况，并决定我们不能再任其发展下去。主席团指示我飞往布达佩斯与匈牙利领导人会谈。

我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明尼赫。我认为与卡达尔相比，我能更好地对付他。明尼赫是一个跟库恩·贝洛一起进行过匈牙利革命的狡诈而经受过风霜的老狼。他在苏联住了很长时间，我认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有准备处理匈牙利仍然面临的问题。

我在机场受到迎接，然后乘车到了市里。我在1946年去过布达佩斯，虽然现在这里有一些巷战的痕迹，如带弹痕的墙壁，甚至还有一些废墟，但她还是像我记忆中那样美丽。

匈牙利人在一个黑暗的大厅里为我举办了一次宴会。我不知道照明为何如此糟糕。在西方，我参加过烛光宴会，但那些宴会总是为庆祝胜利而设的。在布达佩斯，这会儿不是胜利的时刻，室内光线暗淡只是因为照明不好。所有的领导人都出席了宴会。匈牙利人端上了他们的美味可口的菜烙牛肉和上好的酒。

谈话很快就转到政治上来。明尼赫回答我的批评说，“你知道，拉科西执政期间我是我的国家驻莫斯科的大使，所以，不能认为我应对那时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我询问匈牙利新闻界的情况为何明显地仍然与现行政策不符，他说，“注意，赫鲁晓夫同志，我不负责监督报纸。那是其他同志的工作。”

总而言之，还有问题。一个国家和政党经历如此严峻的大动荡，总要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次叛乱的一个不健康的副作用就是匈牙利军队陷入了混乱。军队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参加反革命活动，但少数个别的军官都积极参加了。^①在粉碎反革命活动和纳吉·姆雷集团之后，军队官员中间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情绪。因此，卡达尔和明尼赫同志的新政府要求所有军官通过宣誓，表

^①事实上，匈牙利军队大部分士兵都参加了起义。

示他的将正直地为匈牙利人民服务、执行匈牙利政府的命令，以此给他们机会来表明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政治态度。有些军官不愿作这个宣誓。他们的动摇导致军队中的一场情况，那些拒绝接受在匈牙利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的人被清洗出了军队。结果是，军队人员数量减少了，但素质提高了。

任凭外国资产阶级报纸恶意地叫嚣、诽谤地宣传说苏联镇压了匈牙利的一场民众革命，这个国家的生活已经开始恢复正常。

卡达尔同志和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顾问帮助他们重新组织一片混乱的煤炭工业。应匈牙利政府和匈牙利中央委员会的要求，我在1957年到匈牙利去过若干次。

一次，我在夏天去那儿时，卡达尔说他们将在美国使馆前的广场上举行集会。这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因为（红衣主教）明曾蒂和美国使馆人员肯定会在阳台上观看。明曾蒂是匈牙利天主教的宗教领袖。他代表1956年在匈牙利抵抗匈牙利政府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力量的最反动的一翼。反革命活动被挫败以后，他躲藏在美国使馆内，他在那儿住了多年。

即使明曾蒂和美国人听不到广场上的演讲，他们肯定指派了代理人在人群中来回走动，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记录下来。

我还有另一个理由对这次集会感兴趣。当人们知道我已经来匈牙利的时候，美国记者开始宣传说赫鲁晓夫不敢公开露面，因为赫鲁晓夫知道如果他遵循平时的习惯到街上走动，他将遇到麻烦；匈牙利人永远不会原谅他使用军事力量粉碎了那次事件。我们知道美国新闻界会说这些废话！

卡达尔宣布开会。匈牙利同志要求我讲话，我难以拒绝。我在讲话中责备了匈牙利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允许在他们的国家发生反革命叛乱。

卡达尔在会上说，“抬头往右边看，你们将看到美国大使和

他的同事们一起站在那里。我还能看见明曾蒂。”

会议结束时，我说，“卡达尔同志，让我们离开讲台到人群中走走。”

他笑了，说，“那儿人很多，你知道。”

“那就更好。这样我们将让美国记者、美国大使和明曾蒂看看赫鲁晓夫不怕招惹麻烦。他仍然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给他们好好洗一次大脑，就像美国记者总要使用这一短语那样——那些对苏联和匈牙利不怀好意的美国人！”

我在匈牙利最大的机械工具工厂作了一次相似的演讲。卡达尔同志和我从那儿转到煤矿地区。战时，卡达尔是这儿的一个地下党领袖。因为我以前也是个矿工，我感到我可以对煤矿工人态度强硬一些。我说，我为兄弟矿工们没能大声疾呼或举起拳头抵制反革命活动感到羞耻。他们没有积极参加反叛，但他们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他们任凭他们自己变得士气低落、麻木不仁。我讲完话，矿工们说他们感到悔恨，后悔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他们保证说，他们将尽一切可能，阻止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

接着我们到多瑙河畔的一个炼钢厂参加集会，工厂的设备是我们用信用贷款的形式提供给匈牙利的。钢厂所在的镇过去叫斯大林瓦拉什，现在它已改了名字。一次，卡达尔同志问我，“如果我们同知识界的代表见见面，合适吗？我们将召集科学院和其它脑力劳动机构的工作者开一个会。”我表示同意，在会上我高兴地发现知识界也理解，认为已经采取的措施是必要的。

我在每次会议上都发表讲话揭露世界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在匈牙利重建资本主义的阴谋。至于匈牙利的同志们，他们以实例向资产阶级国家的新闻界表明，匈牙利人民非但没有对苏联怀有任何恶意，他们还感激我们和我们的军队通过帮助他们消灭了反革命叛乱完成了我们的国际义务。这也不是因为只有站

在我们一边的人才允许在这些会议上讲话。发言的每个人都表达了他的真实情感，在场的任何人都有绝对的自由说出他自己的心里话。这些会议洋溢着令人欢欣鼓舞和热烈的气氛。匈牙利人在表示赞成匈牙利党和政府新领导人所采取的措施。

我们同意匈牙利的新领导人的看法，即叛乱是由斯大林滥用职权引起的，不满的种子是由斯大林在匈牙利的代理人拉科西种下的。换言之，这种反革命活动是列宁在他的遗嘱里就警告我们注意的斯大林的病态性格的又一后果。^①

我记得当我们计划缩减苏联在东欧驻防的军队的规模时，我征求过匈牙利人的意见：“卡达尔同志，你对我们从匈牙利撤军的前景怎么看？这个计划可取吗？在这一点上我们相信你的判断。我们将按你的决定去做。”

“赫鲁晓夫同志，我认为你们最好自己决定这件事。我只能告诉你两点。第一，我们的国家绝对没有因为你的部队在我们的领土上而对你们有任何不满。我可以很坦率地这样说。第二，我认为只有一件事令匈牙利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担忧，这就是拉科西不要再回匈牙利来。”当时，拉科西住在苏联。很明显，匈牙利仍有同情他的势力‘对他的垮台感到遗憾，就像有些苏联人一样，甚至在我们从党的角度确定了斯大林有罪之后，他们还愿意投他赞成票。

现在，我认识到有些人可能会声张卡达尔政府是亲莫斯科的，说它是在我们的倡议和影响下创立的。那好，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质问就可以把球踢给对方。纳吉·伊姆雷政府是在谁的倡议下建立的？大批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反革命流亡者是坐谁的飞机飞回匈牙利的？答案是，纳吉政府是在世界帝国主义势力，

^①赫鲁晓夫曾宣称整个事件是由纳吉引起的，但他现在却说是由斯大林和拉科西引起的。

特别是美国的倡议下建立的，飞机也是他们出的。^①另外，卡达尔政府的成员，正是在由拉科西本人主持的一次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被选到他们原来的领导岗位上去的。

这样，我反驳了那些声称卡达尔和他的政府，用一句粗野的话说，是我们的走狗的人们的推理。

我想清楚地阐明我个人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我们，苏联，支持世界上的革命力量。我们这样做是出于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全心全意地参加工人阶级在写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字标语的红色旗帜下进行的斗争。我们反对输出革命，但我们也反对输出反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拒绝帮助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在我们看来将是不可想像和不可原谅的。

我们在匈牙利的目标是支持进步党人士，帮助人民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敌人有相反的目标：每当一个地方建立了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他们就想取消它，镇压工人阶级，恢复资本主义。通过帮助匈牙利人民粉碎反革命叛乱，我们阻止了敌人破坏在匈牙利事件期间受到严峻考验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我们清楚，通过帮助匈牙利镇压叛乱、迅速地消除叛乱的灾难后果，我们也帮助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其它的国家。我们给匈牙利人民在粉碎反革命的斗争中提供的帮助，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和世界上所有进步人士的一致赞同。

所以我说，对！我们确实在1956年帮助了匈牙利。正如我在党的一次集会上说的，我们向匈牙利偿还了1848年以来就挂在我们脖子上的债务。那一年，布达佩斯发生了一场成功的革命，但

^①讲不清赫鲁晓夫是否真的相信西方国家在匈牙利的反叛中起过有效作用。肯定有若干匈牙利流亡者在反叛刚出现高潮时回到了匈牙利。但是，西方国家正面临苏伊士运河问题，对匈牙利事件持冷淡的态度。

是，尼古拉一世把他的军团派了进来，挫败了那场革命，帮助在匈牙利恢复了奥地利君主统治。那是一个耻辱。当然，那个可恶的事件是由尼古拉一世和他手下的人干的；这个耻辱与以前的俄罗斯帝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无关。但我们的国家仍然欠匈牙利人民一笔历史债。1956年我们终于把它偿还了。现在我们平等了。①

①匈牙利人不这样看，1848年他们反抗奥地利的民族起义是被俄国人挫败的：1956年，俄国人又来了。

第十六章 纳赛尔、苏伊士运河 和阿斯旺水坝

赫鲁晓夫对克林姆林宫同东欧的关系的叙述相比，他对克林姆林宫与纳赛尔总统的关系的叙述显得更加全面、详尽、坦率，也更少保留。由美国人从阿斯旺水坝撤走促成苏联对中东的渗透以及后来发生的苏伊士运河的危机，是一个叙述得极其成功的故事；虽然赫鲁晓夫为了使苏联的作用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具有决定性、更可信而歪曲了某些事实，但是、他并没有有意隐瞒克林姆林宫的某行些为。暴露的最有意思的重要一点，是苏联对埃及在1956年将苏伊士运河收回国有之前的真实事态——以及后来伊拉克的事态——全知情。

我不否认，反苏分子在波兰和匈牙利挑起的危机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当我们处理那些问题时，伦敦和巴黎的职位稍低的英、法外交官同我们的使馆人员在聚会喝咖啡时表示：“看来你们好像在波兰和匈牙利遇到了麻烦，我们很理解那是怎么一种情况。我们自己在埃及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为此让我们达成一种默契吧，你们可以用你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手段解决你们的困难，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们不要干涉。”含意很明显，帝国主义者试图利用我们在波、匈遇到的困

难以便他们能够把他们的部队派到埃及重建殖民统治。①

我们很快解决了波兰的困难，挫败了匈牙利的叛乱，接着就面临着如何结束殖民主义者，对埃及纳赛尔总统正在进行的战争的任务。②

我们运用我们的国际影响阻止了1956年英、法和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这一行动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在那之前，苏联——和在此之前的帝俄——总是把近东当作是英法两国的。法鲁克国王曾请求斯大林给他提供武器，使他能够迫使大不列颠把她的部队从埃及撤走，但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斯大林曾看我的面说，近东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我们因此不能干涉埃及的事务。不是说斯大林不愿意派部队近东——他非常愿意——但是他现实的认识，力量对比于我们不利。英国不会允许我们进入。

在实行干预的几年间，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经济、军事力量、以及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都得到了迅速的增长，到了1956年，我们已经能插手帮助纳赛尔总统和阿拉伯人民。这不是说我们想取代英国作为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剥削者。我们不是为了自身自私的贸易利益。恰恰相反，我们只想帮助这里的人民摆脱他们身上的奴隶枷锁。我们在近东的使命是高尚的。我们在外交上执行了列宁的对外政策的原则，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收获我们对阿拉伯国家投资所带来的成果。

我们最初开始对埃及的事务产生积极的兴趣时，我们的态度是小心的，我们并不十分乐观。埃及革命之后纳赛尔开始执政的

①赫鲁赫夫关于西方外交官让俄国人在波兰和匈牙利自由地干的说法与他早些时候说的匈牙利的反叛至少是由“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和确认的说法是直接相矛盾的。

②“反叛”一词的使用令人玩味不已。匈牙利反抗最后在11月9日被挫败；苏伊士战争10月29日爆发。

时候^①，他为改革他的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而采取的政策不能令人信服。军事政变和纳赛尔上校出任国家首脑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无法确定这个军人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内对外政策。新的埃及领导集团成员多数来自埃及军队的上层，换句话说，来自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总体来讲，这些人具有特殊的背景和有产地位，尽管这个新政权的成员从社会地位上来看不尽相似。

我们倾向于认为：纳赛尔的政变只不过是我們已经相当习惯的，发生在南美的那些军事政变的一个翻版。我们没有期望它会有什么新结果。因而，我们除了等待。观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之外，别无选择。

我们不久很高兴地看到：埃及人开始执行一种相当有意义的政策。他们开始积极地给英国施加压力，让他们撤走军队。英国人无条件地照着埃及人的要求做了。

现在我们尊敬纳赛尔了，认识到他的政府不是那种推翻旧政府之后，又遵循旧政府政策的新政府中的一个。新的埃及政府把人民的民族利益放在心上。因而，它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和支持。我们想帮助纳赛尔将他同殖民者的斗争继续下去。

但是，确定埃及新政府的社会政治性质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个国家仍有大量的外国资本，而且政府没有触动私人银行。纳赛尔的政府明显的是民族主义的，但是它却在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不过，纳赛尔资产阶级领导集团值得我们支持，因为它要削弱英国殖民主义在近东的影响——这符合苏联的利益。^②

^①这几段中提到的事件被先后混在一起。纳吉布将军发起了埃及民族主义共和运动，然后被纳赛尔取代。

^②看来，赫鲁晓夫说不清俄国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作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才帮助埃及的，还是纯粹出于最高尚的利他主义动机。

纳赛尔同铁托同志的关系比他同我们的关系还要好。铁托去印度旅游时，纳赛尔乘船过苏伊运河也到了那里。南斯拉夫报界大肆吹捧埃及政府。当时，我们尚未改善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但不久以后，在铁托同志和我首次会晤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时，铁托略显恭维地谈到纳赛尔和他的政策。

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们指出，从纳赛尔的讲话中难以确定他是否打算建立一个进步的埃及政权。他尚未动资产阶级和银行一根毫毛。

铁托同志回答说，纳赛尔是一个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年轻人；他有好的意图，但他还没有找到他的权力的支点。铁托指出，如果我们假定纳赛尔是正直的，我们可以给他施加有利的影响，为了共产主义运动也为了埃及人民。在埃及，人民的利益是和社会主义利益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毕竟可以把它的成果提供给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因此，我们想影响埃及政府的道路的愿望，不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阴谋，它是我们想与另一个国家分享我们经验的愿望的自然成果。^①

政变以后不久，当埃及人决定试图把英国人驱逐出去的时候，纳赛尔的代表团来苏联要求我们提供军事援助。他们说他们需要自己的军队以便能向英国人施加压力。我们同意了。我们给了他们包括步枪和常规大炮的武器，就我能回忆起的，最初我们没有给他们飞机。后来，我们确实向他们提供了坦克和海军装备。纳赛尔说他特别需要鱼雷快艇。我认为我们是在贸易的基础上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的，只是价格降低了些。

从我们这几天买走了武器之后，纳赛尔——他现在与铁托关系十分密切——开始谈论在他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

^①这儿我可以看到苏联承担了过去被称作“白人的负担”的工作。试把它同同以前关于斯大林对苏联渗透中东的态度的评论作一比较。

是，他谈论社会主义的方式，让我们无法弄清他是否真的理解他正在说的东西。可能还有另一种原因，他支持社会主义或许有些别有用心。在现代，社会主义一词变得颇为时髦，使得这个词儿常被用得不确切。就连希特勒过去也常喋喋不休地大谈社会主义，并把这一词加到了他的党的名称之中——纳粹〔民族社会主义〕。全世界都知道希特勒想到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货色。因此，我们对采纳了“社会主义”一词，但多数看来是有意于从我们这儿得到军事援助的人十分谨慎。

埃及人民的最大的迷梦是利用强有力的尼罗河为他们的经济服务。从古代起，埃及人就使用尼罗河水灌溉两岸的农田。尼罗河水是他们农业的命根子，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未开发的水电资源。纳赛尔上台后，开始强有力地宣传修建一个水坝的想法；水坝将利用尼罗河带动发电机的叶轮机。他就这个问题与美国进行了磋商，最后与美国某个所谓的“国际”银行达成了协议，这家银行允诺给埃及提供信用贷款用来修水坝。埃及人听任受人欺骗，以为他们做了几个世纪的梦即将变成现实了。

但是，他们的幻想没有持续多久。由于埃及人拒绝遵循美国、英国和法国为它制定的发展道路，结果激怒了帝国主义者，已经答应修建水坝的信用贷款被突然宣布取消了。

纳赛尔总统勃然大怒，宣告说埃及将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个行动使国际政治局势的温度陡然上升。

帝国主义者向埃及进攻的时候，我与莫洛夫进行了商量。即使他不再十分活跃了，但他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外交部长，是我们最有经验的政治家。我打电话给他，征求他对我的一个主意的看法：“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依洛维奇，我认为我们应该向美国总统通报，建议对进攻埃及的侵略者采取联合行动。”

莫洛托夫，相当正确地指出：“艾森豪威尔永远不会同意与我们的军事力量联合反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当然他不

会。但是，通过使他处于不得不拒绝的地位，我们将能够揭露他们谴责攻击埃及公开声明的虚伪性。我们将使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如果他真的反对侵略，那么，他就会接受苏联的建议，同我们联合起来维护埃及的独立。”

我告诉莫洛托夫说，我们应该立刻把这件事提交主席团。我召集了主席团成员到克林姆林宫开紧急会议。我们一起讨论了我的建议，起草了一份建议，由我们的新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寄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我们给艾森豪威尔的照会强调，我们应该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联合力量。我们还给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首相分别发了照会，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性进攻。

我们在把信送给艾森豪威尔不久，就在报纸上公布了信的内容。我们了解到，美国总统收到我们的照会时对记者说：“这是难以置信的！俄国人会是严肃的吗？想一想，我们会同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不可想像！”于是，我们的照会准确地达到了我们推断的结果；它揭穿了美国声称是和平、正义和反侵略战士的虚伪性。他们可能是口头上的战士，但在行动上却不是，我们揭露了他们。^①

1956年秋，当我们在伦敦与艾登、劳埃德、麦克米兰、巴特勒先生和其他英国政治家会谈时，我们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拥有各种射程的火箭。后来，以色列、英国和法国进攻埃及的时候，苏联在给英国首相的一封信中讲道：如果英国遭到拥有各种现代化破坏性武器的更强大的国家的进攻，她的态度将会如何？信中说、这样的国家甚至可以不派遣一支海军或一组机群就可以达到这种目的。苏联政府的这个声明明显地对英国人产生了影

^①看来，赫鲁晓夫不知道苏伊士作战的行动计划由于美国极大压力而被取消了这一事实。无法判断他是否是真的相信那次作战是与华盛顿无关；并且是在不顾美国的反对的情况下发起的。

响。以前，他们很显然以为我们公开说苏联拥有强有力的火箭时，我们只不过是吓唬人。但是这时他们认识到了我们真的有火箭。这一点起了作用。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我为了同铁托协商匈牙利的事件（见原文420—422页）到了南斯拉夫海岸之外的布里俄尼岛。铁托在这个岛上是因为他在生病，他的医生嘱咐他洗盐水浴。我记得问过他，“你不认为埃及在进行战争的时候在这个岛上有危险吗？飞机可以不费气力地投一个炸弹在这个岛上，你和你的别墅都将化为灰烬。没有人能够证实那不是意外事故。记着，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你同纳赛尔的关系，了解的一清二楚，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兰科维奇（南斯拉夫内务部长）说：对，我一直在告诉铁托同志在近东冲突期间回到贝尔格莱德去，可他不想回去。他说，为了他的健康他需要海水浴。纵使铁托同志不承认他有个人危险，我也可以看出他对近东的局势十分惊恐。他为南斯拉夫担忧，同样也为埃及与纳赛尔担忧。

我们在给3个领导侵略埃及的政府的照会中说：“你们已向埃及发动了进攻，明知道它远比你们虚弱。它没有像样的军队，没有许多武器；但是，还有别的国家可以保护埃及。”我们清楚地暗示苏联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准备干涉。我们警告说，我们不能保持中立，因为如果近东的冲突一旦扩展开来，那将威胁到我们自己的民族利益。英国和法国政府完全明白，艾森豪威尔的谴责他们侵略的讲话，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所作的一个姿态。而当我们向3个侵略国家发去了我们的严厉的警告时，他们明白了我们不是在同公众舆论做游戏。他们十分严肃地接受了我们的警告。有人告诉我说，居伊·摩勒接到我们的照会时，穿着睡衣就跑到电话机旁同艾登通话。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但他穿没穿裤子并不改变这一事实：我们的照会发出22

小时之后，侵略活动就停止了。我们只需要发一次警告——不像中国的种种警告，它们往往要重复1000遍才能有任何影响。^①

我认为我能为以色列为什么从它在法国和美国帮助下占领的领土上撤走作出解释。除了让联合国指责这次侵略外，我们还在报上宣布，我们正在征募志愿兵为埃及军队服务、充当坦克驾驶员、飞行员、炮手等等。换句话说，我们决定以派遣能够使用尖端武器的军人的方式，向埃及提供具体的援助。我们用很明确的措词向以色列讲了我们的条件：要么是以色列人撤走他们的部队，遵守联合国的决议，要么他们就将与埃及武装力量发生冲突——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或许可以发现，他们面临的是我们的志愿兵。

埃及人民和纳赛尔总统非常感激我们的政策。我们结束了这场危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这也是世界上的进步力量的一次伟大胜利。它不仅提高了苏联在埃及人民心中的威望，也提高了苏联在所有的最近摆脱了殖民奴隶地位的人民和那些还在为独立而斗争的人民心中的威望。

1956年我们为了埃及对它进行了干预之后，纳赛尔就我们的政策说了许多恭维然而却是准确的话。我们保卫埃及不附带任何条件。我们的行为是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而不是实利的考虑。这与贸易利益无关。实际上，我们不需要任何我们能从埃及弄到的东西。他们生产的东西我们差不多都有，我们还有许多他们不生产的东西。我们有自己的稻米和石油。我们是一个富裕得多的国家，我们可以依靠我们自己的财富。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某种东西，我们总是努力通过公平的贸易从别的国家取得。与殖民主义者不同，我们不需要诉诸战争或政治阴谋来得到我们缺少东

^①苏联的警告是在危险过去之后才发出的，虽然多数人在当时设有意识到这一点。

西。

即使在殖民主义侵略的威胁排除之后，埃及人处境也仍十分困难。1956年11月以前，管理苏伊士运河的服务人员和在运河导航船只的领航人员几乎都是法国人。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之后，所有这些人都会被召回国了。西方人以为而且希望：埃及人将证明自己管理不了这条运河。它将陷入财政和政治的困挠之中。纳赛尔政权将失去信誉。埃及政府开始转向我们寻求帮助，我们立即给他们派去了领航员和工程师。结果是埃及顺利地把运河接管过来，并很快在埃及政府领导下重新使用了。

这一情况引起了各大国在近东的白热化的磨擦。这次危机是杜勒斯高压政治的又一结果。然而归根到底，杜勒斯的政策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使我们和埃及的关系更紧密了。在某种程度上，杜勒斯通过向纳赛尔指明谁是他的真正朋友，谁是他的真正敌人而帮了他一个忙。纳赛尔很感激这一事实。1958年，他询问我们他什么时候可以访问苏联。经集体领导讨论过他的要求后，我们说我们随时准备接待他。我们领导层就埃及可能愿意讨论的所有问题交换了看法。我们确保我们自己态度一致。接着，我受指派同纳赛尔进行单独会晤。这是我首次与他结识。

纳赛尔是在南斯拉夫度假之后来看我们的。从我看到他那一刻起，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仍然是一个年轻人，有自制力，聪明，而且，他的嘴角总是不断闪现着笑意。如果问我个人对他的印象，我非常喜欢他。我们的会晤恰好是在新奥加列沃市郊外举行的。纳赛尔带了他的大使加利卜同他一起参加会晤。加利卜是一个聪明而特别有趣的人，他完全值得我们尊敬。他的俄话讲得很好，他给纳赛尔当翻译。

突然有消息传来，说巴格达发生了军事政变。我们自然欢迎这条新闻，因为它意味着世界早就该结束的最反动、最恐怖的政权之一终于垮台了。那个独裁者，一个狡猾的英帝国主义的老代

理人被杀死了。①这次政变可以称作一次革命的行动。我们可以看出新的领导人卡塞姆代表了伊拉克的进步力量。我们已经对卡塞姆有所了解。他同共产党有些联系，甚至你自己为共产主义者。我们能从纳赛尔在听到伊拉克已发生政变的反应看出，这一新闻使他十分惊奇。他显然颇为激动，说他必须立刻返回近东。伊拉克政变前不久，埃及和叙利亚组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怀抱着新的伊拉克政府会同埃及采取一致的政策私望。这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愿望。但纳赛尔的希望落空了。我们收到卡塞姆的情报也是极不确切，卡塞姆的政治倾向极不稳定。

但是这些都是以后的事了。当我们最初听到伊拉克政变的消息时，纳赛尔决意要返回南斯拉夫，然后从那儿同他的家人乘船回亚历山大。

我把这个问题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提出我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供他考虑。“总统先生，”我说，“我建议你不要乘船穿地中海回埃及。伊拉克政变已在那个地区造成了一种复杂易变的局势。美国、英国和其它国家正在调动他们的军队准备采取行动。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你并没有绝对得到西方国家的谅解，他们很可能把你的船沉入海底，任何人都将无法证明那种会发生的事。你，联合阿拉伯共和国的总统，将乘坐一条没有武器装备的游艇——一个“碰巧”在那个地区窥探情况的飞机或潜水艇极易击中的目标。我坚决地建议你从巴库（苏联阿塞拜疆境内）坐飞机到伊朗，然后去伊拉克，从那儿再到叙利亚，从大马士革回到开罗，这样你将不会遇到任何麻烦。”

纳赛尔想了想，同意了。那个时候，我们同伊朗关系还不错，但是他们——伊朗和埃及——不很好。因此在没有得到特别

①这里提及的是努里·帕夏被暗杀一事。俄国人看来一点都不了解伊拉克的局势。他们对纳塞姆的了解，也同任何人一样不甚了了。

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从不触及伊朗的领空。但我肯定伊朗国王不会拒绝。他访问苏联期间，我们已觉察到他很想改善同我们的关系。不用说，我们在要求获准飞越伊朗领空时，没有透露我们的乘客是联合阿拉伯共和国的总统。我们编了一道假话，伊朗差不多立刻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纳赛尔走后不久，我们就接到报告说他已经安全到达叙利亚。

定期到我们这儿访问的军事代表团一般由埃及陆军总司令阿密尔率领。^①我应该提一下这个阿密尔后来遭到悲惨的下场，埃及军队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于是，他自杀了。他承担了失败的责任。他大概应受到一点责备。我说不准。但是，自从我认识他之后，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诚实、正派的人，忠于埃及人民的事业。

阿密尔先同我们在开罗的使馆人员进行了联系，而后来到莫斯科建议我们修建阿斯旺水坝。开始我们没有同意。

当时，我认为这个主意是铁托灌输给埃及人的，他鼓动他们竭力对我们施加友好的压力，来说服我们为他们修建那个水坝。我过去这样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每当我和铁托见面时，他总是极力为纳赛尔辩护，把他捧上了天。他总说我们必须帮助埃及，他的话绝对没错，生活已经证实了它（赫鲁晓夫特别喜欢这样说）。而且，我们最后毕竟采纳了铁托的意见。当然，我们之间有分歧。我们的报纸有时发表批评埃及的文章，但在关键时刻，埃及人总是能够得到我们的支持。

埃及人不会接受我的关于阿斯旺水坝的否定答复。阿密尔知道如何穷追不舍而又不惹人恼怒。他每次到莫斯科总是提出要和我个人约会。他试图使我相信埃及要求我们建那个水坝是出于考

^①阿密尔是埃及军队代理最高统帅，他在1967年8月为时6天的战争之后被捕，1967年9月自杀。

虑我们相互的利益，水坝对埃及和我们都会有利可图。他强调说，水坝的建成将使埃及人的耕地增加三分之一，并说这对他的国家和任何愿意为它的未来投资的人将意味着极大的财富。

我告诉他，我们同意建，可我们无力支出修建水坝所需的巨大的投资。同他谈过之后，我们领导成员讨论了埃及人的要求，指示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仔细研究一下埃及人的建议。他们进行了研究，过了一段时间，交上了一份使我们的投资在经济、政治两方面都能有利可图的水坝建设方案。我们很想断定这是否是一次有利的事务交往。有机会支持我们的朋友的经济我们自然很高兴，这样做也能加强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但是，那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我们还必须确定我们不是简单地把我们的钱捐出去。我们必须确定埃及人能够定期把他们最好的长纤维棉花、大米和其它商品交付给我们作为报答。^①

然而，我不想给人们一种印象，即我们帮助他们是出于贸易动机。我一点也不想这样做。我们对政治比对经济更感兴趣。通过建水坝，我们将赢得埃及人民信任和感激的无价的报偿。不只是埃及人民的信任，而且还有所有阿拉伯人的信任。不只是所有阿拉伯人的信任，而且还有所有其它不发达国家人民的信任，尤其是非洲人民。我们对埃及人的援助将说明，全世界正在摆脱殖民统治的需要帮助的人民可以信赖苏联，并得到它的援助。还有，我们知道加强阿拉伯国家意味着削弱我们的敌人的阵营。

于是，我们就建造阿斯旺水坝同埃及签署了协议。

谈判期间，埃及人建议我们承包水坝工程。过去，我们反对同其它国家有这种关系，现在，我们也反对与埃及人有这种关系。我们拒绝把我们自己放在承包人的位置上，因为那将意味着

^①试同赫鲁晓夫以前的话作一比较：“我们真的不需要任何我们能从埃及弄到的东西。”

雇用埃及人力。那将在我们和埃及人民之间导致一种雇主——雇工的关系，他们将开始怨恨我们是剥削者。为了避免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我们已制定一条政策，永远不在我们提供信用贷款的国家充当承包人。

因此，我们告诉埃及人说，“我们将提供给你们需要的一切设备、计划、维修设施和技术监督；但是，我们的专家将把一切事情报告给你们，征得你们的同意。雇用劳动力问题由你们自己解决。”

阿斯旺水坝条约的签定是我们同埃及关系的又一转折点。它使埃及人准确而满怀希望地看到了我们对所有正在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国家的意图。

我们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开始首先研究由西方工程师设计的水坝蓝图。我们的人相信他们自己能够找到一个更先进、更有独创性和更能有效地利用尼罗河资源的修建水电站的办法。当我说我们的专家在建设水力发电厂方面是世界上最最有经验的专家时，我认为这是对事实的一种现实的估计，而不只是在吹牛。

工程即将动工的时候，埃及领导人建议我们派一个苏联代表团到阿斯旺现场熟悉一下苏联和埃及合作的情况。埃及人坚持邀请我率领苏联代表团。我明白原因何在：他们认为要促成更亲密的关系，最好是直接找到上层人物，同我个人会谈。

我不否认我非常想去埃及，亲眼看看那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以及它的古老的文化。我很愿意去阿斯旺水坝工地参加奠基仪式，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他们的邀请。

一段时间过去了。建造阿斯旺水坝和其它工程的工作进展迅速。我们修建了，或更确切地说资助了一个钢厂、一个制药厂、还有若干其它工厂。阿斯旺水坝的建设把我们和埃及人民、埃及政府连在了一起。我们的专家同他们的工程师和农民肩并肩地工作在同一台机器旁，一个基于相互信任和彼此尊敬的特大水库建

起来了。

在阿斯旺发电厂的建设接近尾声——关闭尼罗河河道、安装水轮机——的时刻，埃及人坚持要我去与埃及人民共庆愿望终于变成现实的胜利。纳赛尔要求我不只是来参加庆祝仪式，而且还要我逗留一段时间，在埃及度假。他说，那样我们将有机会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交谈，那对我们双方都会十分有益。为了刺激我来埃及，埃及人提醒我们说，埃及监狱里还拘留着几个共产党人，总理答应为了对我们来访有所表示，将把这些犯人释放。

我们同意访问埃及，于1964年5月启程。我由我们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副部长格列奇科陪同前往。我们让格列奇科参加代表团是因为我们打算让他负责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军方同志举行会谈。至于说葛罗米柯，他的广博的外交知识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刚到阿斯旺就感到好像是走进了火炉里。人们曾告诫我说，埃及热得火烧似的，而且每过几年才下一次雨。这种天气对一些疾病来说是最好的治疗气候，但对我们来说则难以忍耐。阳光灼人，谁也躲不了。幸好，我们的住处有空调设备，但是无法洗冷水浴。我所说的冷水只是在未经人工加热意义上的“冷”水。

我们受到了与我的高级职位和我们同埃及的良好关系相宜的欢迎。当大坝合拢的胜利时刻来到之时，纳赛尔总统在庆典上对我说，“这是我们的水坝，但事实上它是你们建造的，你们为它提供资金，你们的人民设计了它，没有你们，我们将永远不会动工修建。因此，我请求您同我一起推动即将把尼罗河从它的古河道改道的电闸。”啊！这当然是极大的荣誉。我要拒绝是没有道理的，于是，我向他表示感谢，高兴地同意了。总统和我一起推动了电闸。一声震天巨响，尼罗河水冲进了新道。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这次仪式。当尼罗河的强有力的水流开始转动即将给埃及带来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水轮机的时候，我看到每个人的脸

上都放出光彩，眼里闪耀着胜利的喜悦，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些多么动人的景象。后来，我听说有两个人被堵在隧道里被水冲走了。这个事故肯定是由某些人处事不够细心和考虑欠周到所造成的。

那天下午，在我们专家俱乐部里为我举行了招待会。他们邀请我跟他们见见面，并讲讲话。我高兴地接受了。专家们兴致勃勃。我给他们带来了有关国内形势的好消息。

那天晚上，大约在日落时分，埃及人组织了一次大会。纳赛尔总统计划在会上发表讲话，我们也接到了邀请。那次大会安排在晚上开，原因是白天人们不可能冒着烈日坐在露天听讲演。

我想那天晚上纳赛尔是第一次提到埃及将要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他说的是埃及人将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设他们的社会，我们喜欢把“科学社会主义”意指马克思主义。他没有提马克思或列宁的名字是出于以下几种原因。第一，他心中仍难以向马克思主义作出让步。第二，他不得不考虑他的一些敌人的态度。但最重要的是，他的一些盟友尚未能理解马克思主义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因此，他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短语是对所有这些因素和担心的让步，但它还是标致着前进了一大步。总之，他的讲话使我感到高兴。

我事先准备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接着发言的是本·贝拉（阿尔及利亚）。他是我在埃及见到的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的人之一。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他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所要牵涉到的问题。他的讲话极为精彩。

然后是阿里夫（伊拉克）讲话。他的演讲满篇都是阿拉伯人民这个，阿拉伯人民那个，阿拉伯人民的利益，等等。阿里夫讲话的时候，本·贝拉不断向我这边看。他在微笑，他知道我和他都不同意阿里夫的讲话。阿里夫讲完后，本·贝拉走到我身边，

试图说服我回击阿里夫的讲话。我说我已经讲过一次，我并没有准备再次讲话。此外，我作为一个客人把会议变成一场辩论会也不合适。我说，如果由我开始一场争论，纳赛尔将会感到很不愉快。但是，正在这时，纳赛尔自己插了进来，对我说，“我愿意请您前去答复阿里夫的讲话。您不会引起一场论战。您甚至用不着提阿里夫的名字。请到前面去发表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听一听，对阿里夫和我们其余的人都会有益处。”

于是我同意了。我发了言，下面是我发言的内容：

看来，阿里夫是在暗示所有的阿拉伯人有共同的利益，阿拉伯人不分阶级，阿拉伯领袖们对整个阿拉伯民族承担义务。噢，几年前，我和纳赛尔争论过这同一问题，但是现在，纳赛尔自己思想的发展已超过了那个阶段。显而易见，阿里夫尚需纠正对阿拉伯社会性质所持的一个很普遍的误解。我说，把阿拉伯民族看成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实体是绝对错误的。我解释说，同每个其它社会一样，阿拉伯社会也有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阿拉伯世界不是铁板一块。有阿拉伯奴隶和阿拉伯资本家；有阿拉伯农民和阿拉伯地主；有阿拉伯工人阶级和阿拉伯资产阶级。我说，一位阿拉伯领导人当他在谈论‘阿拉伯人民’和‘阿拉伯利益’时，我觉得可以问他到底在替谁说话，这是符合情理的。阿拉伯农民想耕种他自己的土地，可阿拉伯地主不想放弃他的土地，要剥削农民。阿拉伯工人要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可阿拉伯资本家和雇主却要他们工作更长的时间，拿更低的工资。“所以，你在替什么阿拉伯人说话？”我问道，“替阿拉伯工人还是阿拉伯资本家？”

每个人都十分清楚我是在同阿里夫辩论，但看来没人在这场辩论。我讲完之后，我为我说过的话感到高兴。我觉得我已经播下了如何正确地理解社会的阶级结构的种子。

然而，我又同意阿里夫之所以强调“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理

由。阿拉伯人民曾多年身处英国殖民者的枷锁之下，后来，他们又不得不同占领他们的领土的以色列人作斗争。对他们来说，

“阿拉伯社会主义”意味着阿拉伯联合反对共同的外部敌人。我明白，当阿里夫选择“阿拉伯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时，这并不是因为他反对纳赛尔。一点都不是。在阿里夫眼中，纳赛尔代表的是绝对权威。我认为阿里夫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是还没有达到足够的深度。他头脑中阶级觉悟尚未成熟，他还不能彻底地解决阶级斗争的问题。

我的讲话使本·贝拉和纳赛尔两人都十分高兴。一眼就能看出本·贝拉很是开心，因为他是第一个鼓励我讲话的。他后来走到我身边说，——我注意到他现在称我为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尽管你就阿里夫立场问题的批评很正确，我肯定你也理解我们仍然还要同他打交道。更进一步说，我们将支持他到底。阿里夫自始至终都跟我们站在一起，他永远不会偏离。就目前来讲，他支持他所理解的阿拉伯团结，但是，总有一天，他会理解你所说的道理。”

后来，我们懂阿拉伯语的同志告诉我说，我的讲话在与会的阿拉伯人中间受到特别的欢迎。我们的一个专家告诉我，他的阿拉伯司机对他说，我的讲话使他知道了^了道一个阿拉伯团结的全新的概念。“我以前从未意识到，”这个司机告诉我们的专家，“但当然，我们阿拉伯人中间有不同的阶级利益！”当然，这种认识对我们来说就同A、B、C一样是最基本的，但对阿拉伯人来说却是新的东西。以前没有人给他们讲过。部分原因是阿拉伯世界的共产党被迫只能维持地下活动，结果是它的要旨从来没有传到普通百姓中间。

我在埃及的逗留十分愉快。我们参观了尼罗河三角洲，游览了苏伊士运河的风光，在红海的一条船上小住了两三天。我们有些同志去游泳，我放过了那个机会。可我钓了几次鱼。钓鱼让我

感到心旷神怡。红海岸边的景致使我想起了我们自己的里海岸边的风光。这次乘船游览期间，我们进行了多次非正式但有益的会谈。举个例说，这里呼吸要比在阿斯旺周围的沙漠里容易得多。

我们参观了古代埃及王国的首都卢克苏尔，那儿有众多的历史古迹，后来，阿斯旺水坝引起洪水泛滥，我们不得不想方设法使它们不被淹没。^①

我们还参观了在我们的援助和合作之下建立的工厂，有的已经开工生产。我记得人们带我看了一家用我们提供的资金修建的制药厂。在过去，贫穷的埃及一直是用巨款从英国购买药物，现在，他们已能够自己生产便宜得多的药品。

我的地理知识足以使我认识到尼罗河河谷两边都是沙漠，但是，当我飞到那个地区的上空，从空中看到显示生命的绿色的边缘是如何同预示死亡的浩瀚的沙漠相衔接时，我仍然感到震惊。我没有能力同有想像天才的人相比，但我仍愿意谈谈我对埃及的个人印象。尽管那儿的闷热而令人无力的气候极难适应，它仍不失为一个富有和美丽的国家。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在教区学校学过经文，牧师经常给我们看图片，给我们讲天堂的故事。尼罗河河谷使我想起了我童年时想像的天堂所应有的样子。这个国家拥有一切虚构故事中提到的自然美，葱翠茂盛的绿叶，奇异的鸟类

一件有趣的事是，我的埃及主人们不喝任何酒。当然我以前听说过穆斯林教规禁止教徒喝酒，但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教徒都遵循先知的忠告。然而，在埃及的宴会上，我发现我的主人们只招待果汁饮料，别的什么也没有。这些果汁是用许多种不同的水果制成的，鲜美解渴。我的体会是，埃及果汁是解除难以忍受的

^①当然，抢救古代埃及遗址和雕刻品使其不受阿斯旺水坝引起的洪水永久地淹没的活动是一个特大规模的国际性行动。

炎热天气的最好办法，而且，我愿说明我感谢穆斯林教徒的先知在告诫他们不要喝酒时所显示出的智慧。

纳赛尔作为一位领袖在埃及人民中间所享有的巨大的威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每到一处，人们就热情地向他欢呼，重复高喊“纳赛尔！纳赛尔！纳赛尔！”但是，纳赛尔的健康状况有点让我感到吃惊。一次我同他一起游览的时候——我想是在亚历山大市郊——他突然晕倒了。他让汽车停下来，躺在后座上，直翻白眼。他向我们说了声“请原谅”，就用车送回了亚历山大。但他坚持要我们继续参观。阿密尔几乎总是陪伴着我们。他与纳赛尔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俩的公寓是挨着的，两家像一个家庭那样住在一起。他们的孩子在一块玩耍，等等。我很高兴看到两个如此明智而又有正确判断能力的好朋友肩并肩地在一起为使埃及由一个原始而贫穷的国家，变成一个经济繁荣的进步的社会而工作着。

纳赛尔和阿密尔带我去农村参观时，我看出农民在尽力地充分利用他们的小块农田，埃及政府也在努力为农村人口创造更人道的生存条件。但是我总的印象是，当时的农业改革并没有采纳很先进的组织原则。自然，我没有把这些看法讲出来。作为一个客人，我应该看、听，而不是提供未经请求的建议。然而，我禁不住拿埃及人正在遇到的麻烦与我们例如在中亚西亚的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塔吉克开展的农业运动中正在取得的突出的成功作比较。我一向赞成开垦新土地，很想把我思考的问题告诉纳赛尔。

几天后，纳赛尔和我在亚历山大他的别墅里单独共进晚餐。我十分谨慎地把那个问题提了出来。我忘了我是称他纳赛尔同志还是总统先生，但我记得我说的要点：“我想同你分享我的一些想法，虽然评论完全属于你们自己的事，我感有到所顾虑。”

“说吧。告诉我您在想什么。”

“我在考虑你们开始用水坝灌溉时你们将开垦的土地。”

“噢，它们怎么啦？我们计划通过平分土地给人民的方式来拓展我们的耕地面积。眼下我们的农民对土地的需求远远满足不了”

这对我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决定再往深里谈谈。“当然，你们在进行一项规模庞大的工程，我知道它将给你们带来巨大的效益。但请允许我发表一点意见。我先请你不要生气。我知道作为你们的客人对你这样放肆是不合适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对你无所谓有什么约束力。你可以只听。我把话说完，是否采纳，完全由你决定。”

“请说吧，”他说，“我在听着。”

“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就不会把土地分成块块，按份额配给农民个人。相反，我要建立国营农场——我们叫做苏联国家农业企业。在气候和土壤条件很可以同你们的状况作比较的中亚各盟国，我们在这个体制方面已取得了许多经验。我们在贫瘠的干旷的草原上，正建造庞大的土地发展工程。我们已决定不在那里成立集体农庄，而是要建设像城市一样的居民区，有学校，有理发店，有农民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这自然需要巨额资金和资本投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三、四个大丰收就足以偿还我们在一个国家农场上的投资。我保证，国家农场体制将给你们带来巨额收入。

“而且，我希望如果我告诉你一些别的事情你不会生气。在过去革命前我上学的日子里，我们经常看到埃及在拉米西斯一世时使用的灌溉系统的画片。从我已经观察到的来看，我可以说，在几千年之后的纳赛尔一世的政权之下的今天，埃及仍使用着完全相同的灌溉系统。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一个管理小块土地的人不可能有钱在他的井边安装水泵，同样，他也没钱买播种机或棉花打包机。像那样大型现代设备在一小块土地上甚至可能没有停放的地方。

“我想，如果你想把土地分出去，农民们会接受这种做法，

他们将因为你的进步和慷慨把你奉若神明。但是，你仍然不能引进作为改革农业的组成部分的新技术，因为现代耕种机械既不为小块农田所需而且也无法应用。请相信我的话，如果你把土地分成小块分配给农民个人，埃及农民就会像他们过去几个世纪一样，仍然是他们自己的土地的奴隶。”

纳赛尔认真地听我讲着，说，“恐怕你的建议对我们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建立一个国营农场系统所需的专家和管理人员。另外还有政府腐败的问题。我们没有能力制定有效的防止贪污和黑市交易的措施，那样，我们经营国营农场的代价将是重大的。”

“好吧，”我说，“那要由你决定。我已经跟你说了我的看法。你比我更了解你的人民，你比我更了解你们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和潜力。但是，关于控制腐败的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也曾一度不得不抵制某些偷窃活动，但是，我们已经设法刹住了这股歪风。现在，至于说专家，你可以从你的军官中挑选。把他们派到我们苏联去。让他们在我们的国营农场工作一年，学习一下那里的体制，我们在这儿把阿斯旺水坝最后建成，那样，当水坝峻工、新土地得到开垦之时，你们就可以不误时机地迅速而全面地开发土地的潜力。”

关于灌溉问题，我给他讲了我曾应戴高乐之邀参观过的一个靠近西班牙边界的法国农场。它的富饶程度使我感到惊奇。那里的灌溉系统的工作情况令我着迷。为避免漏水，水道是钢筋混凝土做成的。山坡的坡度是为控制水位仔细设计的，整个系统是机械化作业。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我就把我们的工程师派到法国去学习灌溉系统。^①我告诉纳赛尔，我认为法国的灌溉

^①赫鲁晓夫对比利牛斯山脉下面的法国灌溉系统的真诚的赞美和热心关注，显示了他最充满生气和最可爱的一面，但在本书中这一点却没有像可能那样经常出现。

方法在埃及也许会十分有效，而且易于引进。我看出他开始听得更加仔细，并提了一些问题。

几天后，我们乘车从我住的宫殿到纳赛尔的别墅去。他把脸转向我，笑着，“您知道，赫鲁晓夫同志，我一直在考虑那天我们的谈话。我跟阿密尔讲了。您提出的建议是十分诱人的，我现在看出采纳您的建议，将对我们非常有益。它可能对你们也是有益的。”

我回答说，“如果你们认为我提出的建议可以成为你们遵循的进步路线，那么，我这次旅行就可太值了。”我告诉他，为了完成革命，埃及领导成员应该接纳所有正在用原始工具和技术耕种他们自己的小块农田的农民，把他们合并成一个大的行政单位——换句话说，使他们集体化。我告诉纳赛尔，我完全明白这将是多么难以完成的任务。当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时，我们也遇到了不少麻烦——我说的“麻烦”是一种没有充分表达实情的陈述。但是，埃及人一旦把所有的土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一，他们可以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建立国营农场。从那儿开始，它们就能顺利而有效益地发展起来。后来我从报纸上看到，纳赛尔把他和我讨论过的想法贯彻到底了。确实有一个埃及代表团来到苏联学习国营农场体制。我很高兴看到，即使我从去埃及时担任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我的意见仍然有效。这证明，纳赛尔对我的意见表示有兴趣不只是因为我的职位；他一定真正认识到了我的劝告的价值。

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对埃及的政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而且，我们这项政策的目的是完全达到了。我仍然相信我个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尽管那些可鄙的、狭隘而可恶的人们不断发出抱怨的恶臭，企图中伤我们和埃及的关系。^①

^①这个不着边际、令人惊奇的苛刻的指责，明显是指我们一点都不了解的克里姆林宫中的内部冲突。

埃及今天处境极端困难。我还记得1964年我访问埃及时同纳赛尔总统的最后一次谈话。他告诉我，他在自己的国内和阿拉伯世界都面临着困难的局面。他说，以色列国家的建立给阿拉伯人民造成的创伤将永远不会愈合，因为阿拉伯人已被从他们的家园驱赶出去。这些阿拉伯人现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困难。我退休之前，经常发表讲话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政策。我无疑是同情纳赛尔的境况的。

在我看来，无疑是以色列在1967年开始了反埃及的战争，而且，我认为以色列说它准备同埃及进行直接谈判以协商解决冲突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宣传伎俩。事实上，从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就采取了比以往更富有侵略性的态度，并且正在寻求机会使用军事手段毁灭埃及武装力量，迫使埃及签订一个由以色列根据自己的主张制定的和平条约。

但是，我并不能理解发生在以色列进攻埃及之前的几件事。我完全不明白埃及为何要求吴丹把驻扎在埃以边界上的联合国军撤走。这些部队对以色列侵略者是一种制约力量。他们当时正在帮助解除边界冲突的威胁。我记得我们投票赞成派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到近东以阻止敌对的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爆发战争。我简直不理解埃及究竟为何要求撤走这些部队。

我也不理解埃及封闭苏伊士运河的目的何在。苏伊士运河是以色列使用的从地中海到红海的主要水道。

以色列利用了埃及采取的这些行动，占领了埃及人的领土，并加以利用，从而使埃及处境十分困难。

还有一件事：如果埃及有准备进行抵抗以色列的战争，那么，以色列在6天之内就挫败了埃及军队，原因是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使我困惑不解。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全然不知是因为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我已退休。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就是，在我们积极地关注中东局势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执行了符合

列宁主义精神的政策。我们的政策已经对我们苏联人民以及所有相信和平共处和民族自决的世界各国，产生了成果。

第十七章 柏林危机

这一章包括的是莫斯科对于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观点：赫鲁晓夫眼中的德国冲突，特别使人感兴趣的是对建柏林墙时苏美军队之间武装冲突的描述，他把柏林墙比作边界控制的建立。赫鲁晓夫详述了两次柏林危机：第一次是1958年11月，当时莫斯科限令西方列强6个月内撤离柏林。第二次是1961年，那一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总统在维也纳进行了会晤，会晤后赫鲁晓夫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他可以威吓美国新总统。

希特勒被粉碎后，东德和西德各自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东德愿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西德却走了资本主义道路。^①

当我们在斯大林死后开始面对西柏林问题时，我们发现关于取消1948年—1949年间对西柏林进行封锁的协议是不公平的。^②西方利用了封锁带来的紧张局势并向东德强加了比波茨坦公告更强制和片面的条件：整个欧洲的局势非常不稳。因此德意志民主

①：东德别无选择。它同西方的联系被苏军隔离开来，并由莫斯科训练的共产主义者（奥托·格罗提沃，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统治着。斯大林于1953年死后的3个月，一次人民起义被苏联坦克迅速镇压了下去。

②：被盟军的空运所打破的封锁是俄国人强加的，其目的是想切断一切通道来扼死西柏林。这里提到的紧张局势是斯大林制造的。

共和国（东德）国内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德国可以说是一个晴雨表。世界政治气压的微小波动，都自然地东西方力量针锋相对这一点上反映出来。

我们迫切需要解除在西柏林形成的危险的局势，而且我们知道唯一的办法是同西方缔结一项和平条约。但这存在着问题：我们能够到什么基础上同西方列强达成协议？现在来谈统一德国为时已晚，因为东德和西德都不愿意接受对方的社会与政治制度。这一点我们是了解和承认的。但我们仍真诚地希望能寻求某些可行的、对双方都有利的条件达成协议，以稳定局势、推动和平事业、维护各方利益。很明显，目前存在的形势很危险，而双方都想避免军事冲突。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应该制订出一项和平协议来巩固由波茨坦公告确定的德国现状，波茨坦公告被认为是同盟国与德国缔结和约以前的暂时的解决办法。我们的建议将使暂时的现状合法化、永久化。我们只是要求对方承认德国存在着两种不可调和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东德是社会主义，西德是资本主义；我们只是要求正式承认两个德国的存在，而且两国都愿意签署和约。根据我们的建议，西柏林将做为一个自由城市而享有特殊地位。①

很明显，波茨坦公告的某些条款已经过时。考虑到进入西柏林要经过东德领土，至少公告中的某些条款要做修改。要是严格履行国际法的话，西方应该在这一点上同我们达成协议。但事实上，在民主德国控制本国边境的权力问题上，西方正是利用了这一疏忽。②这就是为什么要签订一项永久和平条约的另一个原因。民主德国的合法权益正受到威胁，这一问题今天依然存在。

①：这指的是1958年的危机。俄国人要求的不只是正式承认对德国的分隔，他们要求盟军撤离西柏林。

②：波茨坦公告并没有预见到对德国的分隔，是强迫性的和永久性的。

在承认两个德国问题上，西方列强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作为答复，我们警告说我们不得不单方面提出和平条约。我们提出了日期，让所有愿意签订条约的国家在条约上签字，我们警告说：即使某些国家拒绝签字，我们和其它国家照样要和民主德国达成协议。我们将承担义务，在许多问题上履行新条约的规定，包括进入西柏林问题。

与此同时，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其他民主德国同志正面临由西柏林模棱两可的地位所引起的麻烦。柏林是一个开放城市，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人们从东柏林进入西柏林的问题。民主德国必须对付一个经济上十分强大的而对其公民有着巨大吸引力的敌人。对东德人来说，西德更具有吸引力，因为不存在语言问题。假如一个有一定专业特长的东德人迁居西德的话，他会毫无问题的找到一份工作。结果是，工人的外流给民主德国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因此民主德国正面临着体力劳动者短缺，更不用说专业劳动者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花了大量时间寻找解决办法。我们在民主德国运用物质刺激来抵消使东德青年出走西德的力量如何？物质刺激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能在民主德国创造条件，使国家能够调节劳动力的不断减少？^①

第二个问题是西柏林人很容易进入东柏林。西柏林居民可以自由进入东柏林，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公共服务设施，如理发馆等。由于东柏林的物价较低，西柏林人还买光了所有需求量很大的物品，如肉类、动物油以及其它食物，民主德国损失了成百万的马克。

^①：赫鲁晓夫现在谈的是1961年危机的形成。到7月份，从东德涌入西德的难民数字大得惊人（一个星期一万人），结果东德的经济形势变得十分紧张，难以对付。

当然，即使我们达成和约也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和约还会确认柏林做为自由城的地位，大门照样敞开着。

我同乌布利希同志以及华沙条约组织成员的党的领导人讨论这一形势。我强调说乌布利希肩上的担子特别重，其它成员国都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边界权利，可以根据本国人民的利益，自由确定对内对外政策。但民主德国既没有这些权力，也没有这种自由。

民主德国的经济问题在东、西柏林之间建立了边界控制之后得到了很大的缓解。①乌布利希同志亲口告诉我，边界控制建立后，民主德国的经济立刻开始改善。东柏林的食物需求量减少了，因为西柏林人无法在此采购，这意味着有限的消费品只对东柏林居民供应。

再者，柏林边界控制的建立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人民变得坚强，并使他们认识到建立社会主义的重要性，认识到这一任务是一项长久的挑战，从而抵制西德用于诱惑东德人加入资本主义所进行的宣传的影响。边界控制的建立在东德人的生活中恢复了秩序和纪律（德国人一向推崇纪律性）。看到政府对边界重新掌握了控制，国家得到巩固和加强，东德人增加了信心。

当然还有一些困难。一些东柏林人突然失掉了在西柏林的工作，但在东德绝没有失业问题。相反，大多数受影响的工人是东德大量需要的建筑工人，他们根据自己的特长都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也有企图投奔西方的非法越境者，边界事件时有发生，其中一些令人不快。这种不愉快是意料之中的。边防警卫不得不按照所授与的权限阻止对边界的侵犯。②这些事件被西方利用并完全

①：“建立了边界控制”指的是柏林墙，始建于1961年8月13日。

②：边防警卫在大多数国家里是用于防范不受欢迎者的进入，而不是阻止自己国家的公民出境。

被说走了样。

我知道有批评的人，特别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他们说：我们关闭边界维护民主德国主权是不顾东德公民的意愿。我知道有人声称东德人被囚禁在天堂里，社会主义天堂的大门由武装部队守卫着。我知道存在着缺陷，但我相信这缺陷是必要的，而且仅仅是暂时的。我们一直希望在民主德国建立公民所希望的环境。如果民主德国充分发掘了将来有一天能够工人阶级专政所掌握的精神和物质潜力的话，那么在东、西柏林之间就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穿行。但不幸的是，民主德国（不仅仅是民主德国）还需要发展到一定的精神和物质水平才能同西方竞争。原因很简单，西德具有更多的物质潜力，所以物品比民主德国更丰富。当然，我们有些聪明的共产主义者会抗议说：“不，你低估了我们的成绩！”等等。那么让我们从总体上冷静地考虑一下吧。假如我们有更多的物质潜力来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话，我们的人民就会感到满意，他们就不会大量地越过边界投奔西方，造成劳动力枯竭，对像民主德国这样的国家构成巨大威胁。^①

我的梦想是在民主德国创造条件，使其成为向西方世界展示令人羡慕的精神、政治和物质成就的橱窗。我们努力说服我们以前的盟友签订一项和平协定，从而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常化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发展贸易、文化交流和旅游。

但即使我们要能够在民主德国建立其公民所希望的环境，我们仍要保卫边界。只要物质条件允许，我们将实行尽可能多的自由。但是在工人阶级专政下，自然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至于那些大吹大擂自由的国家，只要我们认真地分析他们的社会，就会发现他们也没有绝对的自由。要能感觉到精神压抑、压迫或束缚

①：赫晓鲁夫承认这些的态度很诚恳，这在苏联政治家的言论中是少见的。

的话，一个人必须对人类的自由有着高度的认识和精确的理解。大多数人仍以一卢布能买多少肉和土豆或什么样的靴子来衡量他们是否享有自由。^①

当我们对民主德国实行控制时，我们主要依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驻扎在德国的武装部队。但即便在我们采取措施维护我们的德国同志的利益时，我们也没收回能使现存边界合法化并保证西柏林做为自由城市的中立和自主地位的建议。但西方又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并要求撤消我们已建立的边界。西方列强威胁要诉诸武力，他们说要用推土机推倒我们设置的路障，夷平障碍物，如果需要，他们将用武力做为后盾实行这些措施，他们将完全依靠他们自己来恢复东、西柏林之间的自由通道。

我们沿边界建起了我们认为坚固的结构，但曾有些卡车开足马力冲撞过去进入西柏林，为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在卡车撞破的地方建起了更坚固的结构。

假如西方列强真是这样希望的，他们会这么干，进行挑衅。但是他们这么干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幸运的是，美国报刊开始出现的至少有点见识的文章，指出企图运用军事手段改变现状所存在的危险。

我们推断西方不想发动战争，结果我们是正确的。在柏林发动战争将会是愚蠢的，没有理由这样做，我们在民主德国建立边界控制既没给西方权力，也没给西方借口通过战争解决我们的争端。

这时肯尼迪入主白宫。在柏林事端达到白热化前不久，我在维也纳会晤了他。肯尼迪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比艾森豪威尔更好的政治家，他对所有问题都有非常系统的看法(原文397页)。我跟他开玩笑，说我们在和那个狗娘养的理查德·尼克松竞选总

①：这些对自由的本质的哲学见解，同样是非同寻常的。

统获胜中投了决定性的一票，他问我指的是什么时候，我解释说：我们直到美国大选结束后才释放U—Z飞机驾驶员加里·鲍尔斯，使尼克松声称他能和俄国人打交道的说法破了产。我们的做法使肯尼迪得到了优势，至少多得了50万张选票。

实际上，我在两年前就已见过肯尼迪。在我访美时，在一次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我举行的招待会上，林登·约翰逊总统把年轻的参议员肯尼迪介绍给我。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非常喜欢他的那张脸，有时严肃，但常常露出善意的微笑。至于尼克松，我过去对他太熟悉了。尼克松一直是麦卡锡的傀儡，但到麦卡锡失势时，尼克松背叛了他。所以，他属于那种最危险的、没有原则立场的傀儡。我很高兴肯尼迪赢得大选，而且我对和他在维也纳的会晤也基本上满意，虽然我们没有达成具体协定，但我觉得他有兴趣谋求对世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和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我认为他知道他在柏林发动战争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肯尼迪要显示他的力量。他加强了美国驻军，并任命一个叫克莱的将军指挥在柏林的西方军队。肯尼迪好象把时钟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①

资产阶级报刊开始苦心经营对我们的宣传攻势。这时我们正准备开第二十一次党代会，我们决定接受肯尼迪发起的挑战。根据我们的情报，我们知道了西方采取什么步骤加强集结在柏林的部队。我们也针锋相对地加强了我们的驻军，我们任命科涅夫元帅为我军驻柏林的部队的司令。

我应该说明的是，我们任命科涅夫元帅为司令实际上只是一次行政任命，为的是向西方表明我们和他们一样对时局很重

①：卢修斯·克莱将军是柏林封锁时期的美军司令。时钟确实被倒拨，但是被谁拨的呢？

视。①我们在柏林的日常指挥官比科涅夫的军衔低。当科涅夫到莫斯科向我们汇报时，他负责指挥。科涅夫大多数时间都在莫斯科，证明我们不希望对抗发展成大规模军事行动。

科涅夫根据他从情报部门得到的情报汇报了西方列强将对我国采取行动的日期和时间。他们正在准备推土机，来推倒我们的边界设施，紧随推土机之后的是坦克和成批满载步兵的吉普车。这一行动的时间正好将是我们第十一次党代会开幕的时间。

我们开始磋商并事先制订出如何作出反应。我们在靠近边防检查站的街道部署了步兵，我们在夜间调动了坦克，部署在附近。于是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严阵以待，看西方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

这时科涅夫报告说美国的推土机、坦克和吉普车向我们的边防检查站开来了。我们的人沉着等待，一动不动。眼看推土机到了边界，我们的坦克突然从附近街道开出来，向美国坦克迎了上去。

美国的推土机和坦克停了下来，吉普车却从后面开上来，越过边界进入东柏林。我们没有试图阻止他们，因为根据波茨坦公告中的特殊规定，盟军的军用车辆可以从柏林的一个接管区进入另一个接管区，所以我们打开大门让美国吉普车穿过。他们驶过边防检查站不远后，发现我们的部队守卫在附近的街道里，而我们的坦克向他们迎面开来。美国人立即掉转吉普车，迅速驶回西柏林。

双方的坦克和部队在边界两侧一字排开对视着度过一个通宵。这时是10月下旬，天气寒冷。我们的坦克手坐在冰冷的铁盒子里过夜一定会感到精神振奋。第二天早晨科涅夫元帅问我们报

①：I·S科涅夫元帅最近交出了对华沙条约组织部队的指挥权。他的假（或者行政）任命是苏联式讹诈的有趣例子。

告，美国和我们的坦克手都爬出坦克轮流活动取暖，但坦克上的大炮都瞄着对面的边界。

听了科涅夫元帅的汇报后，我建议掉转我们的坦克，把他们从边界上撤下来，在附近的街道各就各位，然后看看这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向我的同志们保证，只要我们一撤回坦克，美国人也会撤回他们的。是他们首先把坦克开到边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强迫他们在我们的炮口下撤退的话，他们将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我们决定这次我们应该采取主动，给美国人一个机会，一旦我们坦克的威胁除掉，他们可以撤离边界。同志们同意我的意见。我说我认为我们撤回坦克20分钟后，美国坦克指挥官可以向他们的上级报告我们的行动，等待如何行动的命令。

科涅夫命令我们的坦克从边界撤了下来。他报告，正象我预料的，美国人20分钟后也撤了下去。

这样，西方用坦克大炮刺激我们，考验我们的反应，他们发现吓不倒我们。我认为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取得这次胜利没放一枪一炮。^①在西方的恐吓面前，我们拒绝让步，维护了民主德国控制自己领土和边界的权利。我们有理由庆贺这次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胜利，因为我们迫使西方承认了民主德国的现状。

^②：无论如何西方盟国在柏林墙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但他们的部队在西柏林驻扎了下来。

第十八章 毛泽东和中苏分裂

这章完全是关于赫鲁晓夫、斯大林与毛泽东个人关系的轶事性的叙述。它不但没有一处否定西方公认的关于中苏分裂的起源和发展的说法，反而有许多地方能证实西方的说法。赫鲁晓夫的叙述大多是添油加醋的，而略去了许多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他着重从个人方面叙述了这一分裂（不管是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还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带来的震动。无论如何，赫鲁晓夫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冲突的激烈程度的新的、有益的意见，更主要的是他对整个事件的感情态度。很明显，像大多数俄国人一样，赫鲁晓夫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中国人特别不可理解和令人厌恶。可以看出赫鲁晓夫竭力迫使自己把毛和他的支持者同中国人民（他明显缺乏信念地称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区别开来。这里我们重新领略了老迈的、喋喋不休的赫鲁晓夫由潜意识中的害怕所引起的对中国的蔑视。

政治是一场游戏。毛泽东以他亚州人的狡猾，并靠他那引诱、背叛、野蛮报复和欺骗的一套方式玩弄政治权术，他在我们识破他的把戏之前欺骗了我们若干年。塔雷兰德曾经说过，外交家的舌头是用来隐满他的思想的。这对于一个政治家也适用。毛泽东的确是一个隐满其真实思想和动机的能手。噢，我记得二十大党代会后，毛说：“赫鲁晓夫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为我们指明了

方向。他终于告诉了我们真理，我们要改革。”但我一直对他有所戒备，他在哄骗我们时，我能识别出来。

在我退休几年后，关于是我挑起的苏联和中国之争的说法流传起来。我不屑于驳斥这种诽谤。历史已使这种臆说，成为无稽之谈。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毛，我就知道并告诉我的同志们，毛绝不会顺从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比他的党在任何方面都强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假如斯大林再多活几年，我们同中国的冲突会更早地公开化，恐怕要到完全断绝关系的地步。^①

斯大林对毛泽东总是持极大的批评态度，他给毛起了个名字，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他准确地描述了毛。斯大林常说毛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

当毛的节节胜利的革命军队接近上海时，他停止了进军，不想夺取上海。斯大林问毛：“为什么你不占领上海？”

“那儿的人口有600万。”毛回答道，“假如我们占领了城市，那我们就得养活这些人。我们上哪去寻找食物呢？”

那么，我问你，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言吗？

毛泽东历来依靠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那就是他不占领上海的原因，他不想为工人的幸福承担责任。斯大林正确批评了毛的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但事实上，依靠农民而忽视了工人阶级的毛取得了胜利。并不能说他的胜利是某种奇迹，而只

①：这是个可疑的论点。斯大林和毛之间从来就毫无感情。斯大林曾支持蒋介石而侮辱了毛。他还在毛于1948年取得决定性胜利前不久对毛说：“在中国进行革命的任何想法，都是不成熟的。”但毛尊重他，而从没想到尊敬赫鲁晓夫。斯大林绝不会像赫鲁晓夫那样被感情上的愤怒所支配。斯大林要是再活几年的话，毛迟早要和他发生冲突，但那将是以后的事，而不会立刻发生。

能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歪曲，因为胜利的取得没有靠无产阶级。总之，毛泽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他关心的是异己，他一直视工人阶级为异己。

毛夺取政权后，在意识形态、贸易和工业合作问题上与斯大林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一件事是，斯大林同中国签定了联合开发新疆矿产资源的协定。对斯大林来说，这是一个错误。我甚至会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一直在剥削中国，而现在苏联插了进来。这种剥削是错误的，但并不是没有先例。斯大林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已建立了同样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取消了所有这些公司。

还有另一件类似的事。一天斯大林把我们都召集到一起，他问我们谁知道中国的金矿和钻石矿在哪儿。当然我们没人知道，我们不可能知道。后来，我们私下对此开玩笑，贝利亚说：“你们知道谁知道吗？塔雷兰德^①说：知道，他总是唱那首歌：‘你无法数尽钻石……’（选自比才的歌剧《捞珍珠的人》。”贝利亚喜欢唆使斯大林，他说在中国有巨大的财富，而毛泽东却把它们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不过只要我们给他一笔信用贷款，他会给我们一些东西做为报答。

后来有一天我们聚在斯大林那里，讨论寻找一些办法来满足我们橡胶工业的需求而不买资本家的天然橡胶。我建议用信贷和技术援助做为交换，设法使毛同意让我们在中国建一个橡胶种植园。我们用电报拍发了这计划的建议，中国方面答应让我们在海南岛建橡胶园，如果我们提供信贷的话。双方草拟了协定，但其结果是在海南划给我们的地方太小，无法建一个象样的橡胶种植

^①：I. S. 塔雷兰德：俄国大剧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在他的黄金时代，尽管在西方不著名，但他恐怕是少有的最伟大的男高音。

园，所以这一想法被放弃了。

斯大林又突然喜欢上了菠萝罐头，他立即给总在他身边的秘书马林科夫口授一份电报，并说：“给中国方面拍一份电报，说我让他们提供一块地方建菠萝罐头厂。”

我站出来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掌握政权。在中国已有许多外国工厂，而现在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要在中国建自己的工厂，这肯定会触怒毛泽东。”

斯大林怒气冲冲地打断我的话，我再也没说什么。电报发了，一、二天后我们收到了中国方面的回答，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厂感兴趣的话，那就给我们贷款，我们自己建罐头厂，我们用罐头厂的产品偿还你们的贷款。”斯大林怒气冲冲骂咒时，我一声不响。正如我怀疑的那样，斯大林惹怒了毛。

我没有签署类似建议开发中国的电文给毛，而且在我当政时期，我国政府也没签发过这种电报。我们竭力小心在中国人激怒我们之前不去惹他们。当他们真的开始那么做时，反正我又不是耶稣基督，用不着听任他们欺负。

当导致苏联和中国争论的责任者是我的恶意造谣流传起来时，我感到震惊、苦恼，又感到愤怒，因为尤金就是谣言散布者之一。他们说是我惹的毛，使他就为了现在的这种人。那么，假如尤金在此当面对我这么说的话，我可以向他证明：是他使我们同毛泽东的冲突变得尖锐起来。争论开始时，尤金是我们驻中国的大使。假如尤金逼我加入这令人厌恶的相互攻击的话，我恐怕会有理由说，只要他被派往哪个国家任大使，我们就会同哪个国家产生不和。尤金被派往南斯拉夫，我们就和铁托发生了争论（见376—377页）。尤金去了中国，我们又和毛争论了起来。这绝不是巧合。

有一点我是佩服尤金的。当初为什么派他去中国呢？事情是

这样的。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推荐一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中国编辑毛的著作。毛需要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在出版前把他的著作编辑得象点儿样，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找出错误。尤金被选中，并被派往中国。^①

就我同毛的私人关系而言，我总是作出让步，通情达理以表示友好。我不像斯大林那样从未想过利用毛。实际上正好相反，中国想利用我们。例如，1954年，当我们的国家在战后仍经受着饥饿和贫穷的困扰时，我们访问了北京，周恩来问我：“或许你们赠送给我们一所大学做为礼物？”

“你知道我们自己也很穷，”我说。“我们可能比你们富，但战争刚刚结束，我们还没从战乱中康复。”尽管我们自己有困难，我们已把旅顺港和大连还给中国，还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②

我们还建了从乌兰巴托通往北京的公路。毛在1957年提及此事时说：“乌兰巴托到这里的公路对我们没多大用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条从北京穿过群山通往哈萨克（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公路。”

①：P. F. 尤金一度是共产党和工人情报局（1947—1956）的《为了永久和平，为了人民民主报》的主编，该报在斯大林与铁托争论之前一直在贝尔格莱德出版。对官位在他之上者，他奴性十足，而对在他之下者，却态度傲慢。他似乎抱有某种错觉，即后者包括所有外国人，而外国人又不受和他工作过的南斯拉夫人、中国人的欢迎。在莫科他是契卡中最好的哲学家，而在哲学家中又是最好的契卡。他的哲学是用假马克思主义术语乔装打扮克里姆林宫路线的曲折。赫鲁晓夫对他的轻蔑是非常正确的。但直到中苏大争论之前，尤金仍被选中，从1953年起任苏联驻中国大使却主要是赫鲁晓夫的过错。

②：这里指的是1955年5月归还旅顺港和大连。在这之前，这一历史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并涉及到中国、日本和俄国。苏联的信贷只不过是满足了满足中国需要的沧海一粟。

我说：“你比我们更了解你的疆土，我们认为乌兰巴托到北京的公路对你们来说更便利，但我们也愿意通过哈萨克修一条中国的公路。你们为什么不能建你们国内的那一段，而我们建我们国内的一段，然后在边界联接呢？”

后来，周恩来又重提此事：“或许你们也能建我们国内的那一段？”我们查看了地图，发现这需要逢山开路，遇河架桥。

我们回答道：“不行，还是让我们按当初双方同意的各自建自己国内的那一段。”

我们开始了我们那一段建路任务。在建路过程中，中国人又来要求我们为他们建他们那一段路。当我们这一段路修到边界时，中国人却不见踪影。

我记得我在1954年从中国回来后对我的同志们说：“和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是根据毛的言论得出这一结论的。在我访问北京期间，气氛是典型的东方式的，每个人都令人难以置信的有礼貌、爱奉承讨好，但我看穿了他们的虚伪。我抵达后，和毛热情拥抱、互相亲吻对方的面颊。我们常在北京的游泳池游泳，然后在池边休息，像老朋友一样地聊着各种话题。一切都令人厌恶的甜蜜，气氛令人作呕。另外，毛说的有些使我警觉起来。我从不能肯定我听懂了他的意思，当时我想这一定是由于中国性格和思维方式中某些特性造成的。毛的有些见解过份简单化，而有些却过份复杂化。

例如，我记得有一次毛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认为我们的口号，‘百花齐放’怎么样？”^⑤

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简直弄不懂你的这句口号是

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在1957年提出这一具有明显宽容性的政策，但这一政策却是短命的。赫鲁晓夫当时和后来都为这句话所迷惑而感到恼怒。

什么意思。花有各种各样的，有美丽的鲜花，而有的花却令人厌恶，甚至有令人致命的花。”毛表示同意这对俄国人来说，可能不是一条好口号。我们有意不在我们的报刊上登载任何有关“百花齐放”的口号内容。

毛并不蠢，他感觉到我们的沉默意味着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当然，我实际上清楚地懂得“百花齐放”意味着什么。它的意思是在艺术和文化领域让各种不同倾向发展。但现在已很清楚这一口号只是一种挑拨，倡导它是为了让人们更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剪除那些具有异色异味的花，并把它们踩入泥土。

那时毛又提出了另一著名的口号“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简直无法相信毛竟把美帝国主义比作纸老虎，而实际上它却是危险的，是要吃人的。“纸老虎”这一口号刚提出时，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还不错，尽管它由我们的朋友、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提出来，却使我们有些为难。现在，中国人似乎暂时降低了“纸老虎”的口号的调门，并不像从前那样大声疾呼了。

记得有一次在北京，毛和我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讨论战争与和平，毛泽东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把帝国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力量作一下比较，你会发现我们比我们的敌人有着明显的优势。想一想，中国、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招募多少个师的兵力。”

我说：“毛泽东同志，那种想法已经过时，现在你不能以谁的人的多少来计算兵力。过去当纠纷发生时，可以用拳头和刺刀来解决，双方谁的人多、刺刀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有了机关枪，部队多的一方并不一定占有优势；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多少对真正的实力和战争的结局，并不起多大作用。部队越多的一方，越要挨炸弹。”

毛回答时试图使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听着，赫鲁晓夫同志。”他说。“你应该做的是挑逗美国人采取军事行

动，我会给你足够的师来粉碎他们，比如100个师、200个师或者1000个师。”我试图向他解释一两颗导弹会使中国所有的师化为灰烬。但他根本不听我的观点，而明显地认为我是懦夫。^①

毛在1957年却改变了调子，当时他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在一次亲切、坦率的谈话中，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的国防部长朱可夫说，如果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攻击，你们会立刻反击。那是错误的。”

我说：“毛泽东同志，朱可夫不是代表自己在说话。他是替中央委员会说话，发表我们集体的意见。我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不是在争吵，只是进行友好的讨论。

毛回答道：“我认为如果帝国主义要进攻中国的话，你们不应介入，我们自己可以同他们战斗。你们要做的就是活下来，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另外，如果你们受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不应反击。”

“那我们该做什么？”

“撤退。”

“撤到哪儿？”

“你们以前撤退过，你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直撤到斯大林格勒。如果你们再次受到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到乌拉尔山，坚持两、三年，有中国做你们的后盾。”

“毛泽东同志，如果现在爆发战争，你认为会持续多久？这可不像是上次战争，上次是飞机、坦克，这次已有导弹和原子弹。”

^①：在这篇关于共产主义世界两位领导人的珍贵短文里，在他们在北京的游泳池边用幼儿园里的语言讨论战争、和平和原子弹时，我们发现赫鲁晓夫与后来说的即使经过原子战争，中国仍会有3亿人活着的那个人的关系开始恶化。

你怎么会想到我们有两、三年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山呢？我们可能只有几天时间，几天后除了残墙断壁什么也没有了。如果我们告诉敌人我们不反击的话，那就是在邀请他们进攻。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警告是对他们的威慑的原因。”

很明显，在我们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分歧，但我们同中国的分裂比这更深。中国人知道在苏共二十大后他们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危险的地位；他们懂得二十大废除了个人崇拜、专制统治和所有反民主、反党活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斯大林枪毙了几十万人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受到了二十大的揭露和谴责。毛泽东正在步斯大林的后尘。

毛自己的个人崇拜是一个复杂现象，个人崇拜有点像宗教。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默诵着“主啊，给我仁慈！主啊，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吧！”那么，那些祈祷都受到保护了吗？当然没有。尽管事与愿违，人们还是一如既往信奉上帝。

即使在我们这里也有毛式个人崇拜的影响。大约在1962年，我发现军界在翻印毛论述战争的著作，我立即召见国防部长，对他说：“马林诺夫斯基同志，我听说国防部正在出版毛的著作，这很荒唐！苏联军队粉碎了德国的精锐部队，而毛泽东和他的对手花了20到25年的时间在背后相互捅刀子。而现在却在出版毛论述战争的著作！为了什么？为了在将来进行战争？你在做决定时是如何用脑子的？”马林诺夫斯基和军界其它同志都是聪明人，但出版毛泽东论战争的著作是愚蠢地浪费时间。我不知道对他们印好的那些书是怎么处理的，它们可能躺在某地的仓库里，或许已被烧掉。

我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是怎样在1958年断然想拒绝同我们进行军事合作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应该可以使用中国的机场做短暂停留，给飞机加油；还有当我们的远程潜水艇服役时，我们需要在中国建立一座无线电台用以保障潜艇同舰队之间的联

络。顺便提一句，中国人已提出要我们把潜艇设计技术转交给他们并教他们怎样建造潜艇，所以我们认为要求他们同意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建无线电台是正当的。他们回答说“不行”，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尤金的关于中国领导人反苏情绪的密码电报。

我对我的同志们说：“根据议定书，现在该是毛对我国做国事访问然后我们再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了。但是鉴于目前的形势，或许我们最好去找他们和他们谈，最好是秘密会谈，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同中国同志之间存在着哪些分歧。”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间是1959年。^①我们的讨论是友好的，但没有具体结果，我们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无线电台。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将给你们建电台的钱，对我们来说电台属于谁无所谓，只要我们能使用它同我们的潜艇保持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电台送给你们，但我们希望能尽快建台。我们的舰队在太平洋游弋，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毛泽东同志，我们能否达成一项协议使我们的潜艇能在你们的国家里有一个基地以保障加油、修理和船员上岸休假等等呢？”

“我最后再说一遍，不行。我不想再谈及此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互相合作、供应方面不存在着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不行！”

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愤怒。我最后试问了一句以显得通情达理：“如果你们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

①：这次会见是在赫鲁晓夫刚结束他第一次访美之后。他总是谈论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他热情赞扬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治家气质从而惹怒了毛。这次不幸的会见产生了敌意，导致苏联方面突然将监督建工厂的技术人员撤走，技术人员将工厂的蓝图带回了莫斯科，建厂中途停止。

港。”

“不行！我们一点都不想沾摩尔曼斯克港的边儿，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儿来。过去英国人和其它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我们始终没得到他的允许使用潜艇基地。①

当毛开始推行中国在5年之内赶超美国的计划时，他公开对我们采取攻势。正是在这时，他开始组织公社、建造高炉②。在毛的煽动下，中国人开始声称苏联关于物质分配，要根据所消耗的劳动量和质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的。中国竟出现了这样的说法：我们苏联已拜倒在资产阶级的裙下。因此，在我们将来的运动方向上存在着基本的原则问题。我们和中国已走到了三岔路口。

毛泽东还宣称和平共处是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观点，从那以后，中国不顾一切地诽谤苏联共产党的和平共处政策。但是，照我说，人们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在想什么。弄不懂中国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和平共处。我记得退休后从收音机听到毛接受了某个美国记者的采访，记者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真想向世界发动战争呢？”毛回答道：“不，中国人不希望战争，只有当我们的领土遭到进攻时，我们才参战。”在资产阶级记者的压力下，毛泽东多次重申中国拥护和平共处。根据我自己的感觉，所谓的毛泽东宣言实际上是周恩来起草的，从来不了解毛自己的立场。对这些中国人真是捉摸不透。

但关于毛，有一件事我很清楚。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在我认识他时，他常常流露出要统治世界的急切愿望，他的计划

①：在中国人方面，他们向苏联要原子技术，而俄国人拒绝了。

②：这里指的是著名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运动企图通过在农村炉子里造高炉、办农村钢铁厂、把劳力组织起来编成公社等方式把农民变成无产阶级。俄国人非常讨厌这种做法。

是先统治中国，然后亚洲，然后……哪里？有7亿人，在别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一半人口是华人。以下是毛和我在一次喝茶时同我进行的非常有趣的、天真的谈话，充分显示了毛自己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观点。

他问我：“有多少征服者侵略过中国？”他自己回答道：“中国遭受了无数次侵略，但所有的征服者都被同化了。”

他在展望未来。”想一想，”他说：“你们有2亿人，我们有7亿人。”

然后他开始谈论中国的与众不同，他举例说在中文中没有外来语。”世界各地都使用‘ELECTRICITY（英语电之意一译者注）’，”这个字，”他夸耀道：“他们从英语中借用了这个字，但是我们中国人使用自己的字！”他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傲慢态度，使我感到震颤。

后来中国报刊在毛的带动下开始声称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中国的领土；他们写到俄国人侵占了它。确实，历史上中国人曾经统治过那一带的江山，后来我们的沙皇又统治了此地。我们同意和中国人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他们给我们送了一张他们自己绘制的地图，我们看了看，发现令人无法接受，我们把它扔了。①

毛泽东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绝不是傻瓜。当中国开始进行自认为是平等主义的改革时，边界问题的言论越过边界在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广为流传。当我发现是怎么回事时，我告诉我的同志们：“这种现象必须立即停止。中国改革的口号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如果你们认为这些思想在我国找不到肥沃的土壤，那

①：这里指的是到目前为止时隐时现的边界冲突。19世纪，软弱的中国被迫向沙俄帝国割让了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和现在的苏联海洋州在内的大片领土。在中苏争论达到高潮时，毛坚持认为那些使领土割让为具体化的不平等条约，不再有效。边界问题变得悬而未决。

你们就错了。

我们不得不对毛作出实质性的回答。说得婉转些，是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实际上我对他早已不耐烦了。如果你读过我在二十二大上做的报告，你会发现我用了大量篇幅谈中国问题，尽管我没直接提中国。但就是在二十二大上，我们抛弃了毛的观点中的主要信条。^①

然而，我确实同意毛的平等主义改革中的一条，他取消了军队的肩章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同时，我认为我们恢复肩章和军阶条是错误的。到底是谁需要它们？我赢得了卫国战争，我那时已是政委，但我没有肩章和军阶条。士兵用不着看花哨的军阶条就知道谁是他们的政委和司令官。在那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没有肩章也能消灭敌人，现在我们的军队都打扮的像金丝雀。

在1960年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完全反对我们，而阿尔巴尼亚也表态反对我们，支持中国。^②恩维尔·霍查（毛泽东的代理人）的行为

①：在1961年10月的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第一次把争论公开化，他尖锐批评了中国不可靠的盟友阿尔巴尼亚，但没点中国的名。

②：赫鲁晓夫第一次攻击中国是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第三次党代会上，（就在流产的美苏巴黎首脑会晤之后，会晤停止从表面上看是由U—2飞机事件造成的。）在场的有所有外国党的领导人都感到震惊，但事情被保密了下来。第二次是在同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大会上。在这两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尽管不是粗暴地、也是强烈地攻击毛，言词激烈程度在这一章有所反映，尽管不是处处都有。中国人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反击。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做了最激烈的发言，他指责赫鲁晓夫讹诈阿尔巴尼亚。企图用饥饿来胁迫其就犯，背叛斯大林。但争论对外界是保密的。要想了解这些充满危机的会议情况和争论发展的大体情况，可以参阅爱德华·著的《新的冷战：莫斯科和北京的对抗》。

尤其无耻，他比中国人更恶毒地攻击我们。在他的发言结束后，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同志（一位老资格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忠诚战士）愤怒地站了起来，一针见血地说霍查像一条反咬主人的狗。

我们尽一切努力避免我们和阿尔巴尼亚的分裂，但都无济于事。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冲突不是突如其来的，我们慢慢地了解到阿尔巴尼亚人和中国人密谋一起反对我们。当一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中国路经莫斯科回国时，我觉察到了他们的背叛行为。代表团的成员，一个诚实的妇女，找到我们并告诉了我们所发生的情况。我觉得她后来被掐死了，可怜的女人。而她不是被盖世太保掐死的，不是，她是被自己的兄弟掐死的。我这么说因为她是共产党员，而他们也是。他们掐死她是因为她，做为一名共产党找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报告了阿尔巴尼亚同中国人的秘密会见。

我们是多么的天真啊！那时穆罕默德·谢胡在苏联住院接受治疗，当我们告诉他我们知道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正在会谈时，他从床上跳了起来并立即乘飞机回国了。

恩维尔·霍查、穆罕默德·谢胡和巴卢库是通过起义在阿尔巴尼亚掌握政权的，他们推翻了阿尔巴尼亚原党的第一书记，他是一位很好的同志，铁查对他的评价很高，而且大多数南斯拉夫人都支持他，他来自工人阶级，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缔造者。铁托告诉过我，穆罕默德·谢胡亲手掐死了他。这3个人——霍查、谢胡和巴卢库常常亲自审判一些人，不做任何记录，然后他们就找机会秘密地杀害那些受害者，他们的作法同斯大林和贝利亚使用的手段非常相似。^①

^①：恩维尔·霍查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他是做为阿尔巴尼亚战时抵抗组织的一员利用盟国和南斯拉夫提供的武器反对德国人和他国内的对手起家的。赫鲁晓夫指的显然是霍查在1949年将副总理和内政部长

科斯·霍赫塞杀害那件事。那是在斯大林和铁托绝望之后，霍赫塞是南斯拉夫的朋友。赫鲁晓夫忘了（但也有可能他从不知道）是斯大林唆使霍查干掉的霍赫塞。穆罕默德·谢胡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中最残酷的一位。他接替霍赫塞当了内政部长，他是无情的清洗者，他后来成了总理。贝库尔·巴卢库是阿尔巴尼亚的国防部长和政治局委员，曾在1952至1953期间在莫斯科军事学院就读过。赫鲁晓夫对这三个人政治上的所做所为十分接近事实。

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分裂主要是由于阿尔巴尼亚人惧怕民主化。尽管我有时想并没有损失什么，我现在认为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同阿尔巴尼亚人的最后决裂是在1960年7月的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在那次大会上我们就国际事务交换了意见，特别是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既然我们同阿尔巴尼亚完全决裂了，我更加坚信民主领导的原则，而阿尔巴尼亚人，绝不会接受这些原则。

民主确定是需要的，但要民主的话，一个领导人就得同其它人协商办事，否则他若想长久当权是很困难的。一个民主的领导人必须心地善良，能够听取不同的意见；他必须懂得他的领导地位是由人民的意志决定的，而不是由他自己的意志决定的；只要在位的领导人表现出他同党同呼吸共命运，人民才会承认他；一位领导人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贪欲和虚荣出发；一位领导人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谦逊，有能力同集体生活在一起。再重复一遍，他掌握领导权是由党的意志决定的。换句话说，他不是凌驾于党之上，而是党的仆人，只有他在受到党的信任和支持时，他才能保持他的地位。^①

在他们党的生活中，恩维尔·霍查、穆罕默德·谢胡和巴卡

^①：关于这些评论，假如赫鲁晓夫再生活一遍，会发生什么情况，是很有趣的。

库并没有遵循这些原则。毛泽东也没有。

然而，尽管毛泽东可能滥用职权把党引入歧途，但他不象某些人说的那样是个疯子。人们在形容毛泽东时，说他是癫狂者，说他完全丧失了理智。这种说法不对。毛非常的聪明、狡猾。我记得就在几年前人们预测毛绝不会赢得中国的权力之争，那时我就说：“”无稽之谈。毛当然会赢。”我是正确的。毛现在在中国似乎确实占了上风，但通过了什么途径呢？中国人不承认任何法律，只承认强权。如果你不服从，他们就砍掉你的头，而他们干这个很艺术：他们在广场中央当着几千人的面把你掐死。这是什么样的政治？你甚至不能称它为野蛮，他比野蛮更甚，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

尽管毛在中国获胜，刘少奇并没有罢休。他反对毛的政策，并正在和毛斗。刘少奇是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很多人支持他，但他们并没有任何实权。刘少奇仍活着是因为他的声望。毛可以毫不费力置刘于死地，但刘的死会激起民愤，毛知道这些，他反对刘少奇并不是把他作为一个人，而是把他作为特定政治制度的领袖来反对，也就是说毛通过政治孤立击败刘。^①

当然，我们谈论毛泽东是一回事，谈论整个中国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辱骂中国人民，那我们就混淆了客观分析和民族偏见的界限。如果我们相信一个民族比其它民族有特权和优越感，那我们就是民族主义的。纳粹就是那样起家的。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假如中国青年袭击我们住北京的使馆，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恨所有中国人。一个国家的青年不是整个民族，而且青年也

①：刘少奇是温和派，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毛的接班人。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1960年莫斯科会议，但座在强硬派彭真的后面。在这次和毛的冲突中，刘幸免于难。

是各种各样的，且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用石头砸我们的使馆，也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高呼口号支持毛泽东的政策。想一想会有多少中国人在为他们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叹息。在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斗争，人们正在互相残杀。

我认为我们的所有努力都应一方面用于解决苏联共产党和其它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用于解决同中国共产党的冲突，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确保共产主义运动再度团结，坚如磐石。这一目标一定要达到！它符合苏联人民的利益，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为和平而奋斗万岁！和平共处万岁！

第十九章 胡志明和越南战争

老一辈政治家赫鲁晓夫回顾越南悲剧时，并没有着眼于战争的野蛮，他这么做为观察这场冲突提供了新的角度，他的观点被我们这边许多人接受，至少部分被接受。

当美国侵略者被迫停止轰炸越南北方领土时，他们遭受了致命的失败。现在从报上看，美国明显地没有严格按照停止轰炸时做出的承诺行动，但停止轰炸本身证明了越南人民的英勇抵抗，他们的抵抗是在他们已故主席、超群的胡志明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见过许多人，但胡志明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信仰宗教者常谈论圣徒，那么，从他的生活方式和给我留下的印象中看，胡志明就是那圣徒之一。他是革命的信徒。

我绝不会忘记他的眼神，不会忘记他那特别闪现着真诚和纯洁的凝视。

那是一种无法玷污的共产主义者的真诚；那是一种在原则上和实践中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者的纯洁。他可以用他的坦率和共产主义事业对越南人民乃至全人类都有益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赢得任何人的心。他的每句话似乎都在强调他的信念，即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兄弟，因此在互相交往中必须真诚、坦率。胡志明确实是共产主义事业中的圣人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斯大林还活着。胡志明从越南的丛林中来到莫斯科，他告诉我们是怎样步行数日穿越丛林到达中国边境，

然后从那里来苏联的。

在我们的谈话中，胡志明不停地用他那不寻常的眼睛注视着斯大林，我敢说他的注视几乎带着儿童般的天真。我记得有一次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本苏联杂志，好像是《苏联建设》，请斯大林签名。在法国、人们喜欢签名，胡志明也养成了这一癖好。他觉得回到越南后可以向人们展示斯大林的签名。这主意很不错。斯大林为胡签了名，但不久又派人把杂志偷了回来，因为他担心胡会利用他的签名。

胡志明给我们讲述了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法斗争，他请我们给他提供援助，特别是武器弹药。离开莫斯科后，胡志明写信问我们要奎宁，因为越南正流行疟疾。我们医药工业正生产了大量的奎宁，因此斯大林这次慷慨解囊，说：“给他半吨。”

以后我和胡志明多次见面。我记得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我们一起工作。^①那时我们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还很好。日内瓦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开了预备会议，中国由周恩来出席，越南由胡志明主席和范文同总理出席。我们根据越南的形势确定了我们将在日内瓦采取的立场。越南的形势很严峻，越南的抵抗运动濒于崩溃，游击队指望日内瓦会议能达到停火协议，以使他们能保住在反法斗争中赢得的土地。河内在法国人手中。如果你看一下标有我们停火要求的地图，就会发现越南北方有许多法国占领的区地。

^①：这次1954年春和夏初期间的会议具有历史意义。会议7月20日结束了法国同越南共产主义者的战斗，以北纬十七度线划分了越南南北两方。5月4日奠边府失陷，看来已无法阻止共产主义者占领越南全境了。美国有人建议利用航空母舰上的空中力量进行干涉，但艾森豪威尔反对这么做。赫鲁晓夫没有参加日内瓦会议，参加谈判者是英国的安东尼·艾登（后来成为埃房公爵）、法国的孟戴斯·弗朗斯、中国的周恩来和胡志明本人。

在克里姆林宫卡德琳娜大厅的一次会议后，周恩来留我长谈并把我叫到一个角落说：“胡志明同志告诉我越南的形势没希望了，如不赶快停火，越南抗法就坚持不住了。因此，他们已决定如果必要就撤到中国边境。并请我们做好准备，就象出兵北朝鲜那样出兵去越南。换句话说，越南人要我们帮助他们赶走法国人。我们根本不能同意胡志明的请求。我们在朝鲜已牺牲了許多人，那场战争我们的代价太大，目前我们没有条件再介入另一场战争。”^①

我向周恩来请求说：“一场关键的斗争正在进行，越南人打得不错，法国人损失沉重。你们没理由对胡志明说，如果在法国人的打击下胡志明的部队撤到中越边界，你们不去帮助他。为什么不撒个谎？让越南人相信，如必要，你们会帮助他们，这将鼓励越南游击队坚持抗法。”周恩来同意不对胡志明同志说，中国不会进入越南领土抗击法国。

后来奇迹出现了。当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参加会议时，越南游击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夺取了奠边府。在第一次会议上，法国国家元首孟戴斯·弗朗斯建议把法国的军事力量限制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我承认我们得到这个从日内瓦传来的消息时，我们又惊又喜。我们从来都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提出的最大要求也不过是北纬十七度线。我们指示我方在日内瓦的代表要求分界线再向南移至十五度线，但这只是为了更好地讨价还价。经过简短的争论，我们接受了孟戴斯·弗朗斯的建议，签署了条约，我们取得了胜利，巩固了越南共产主义者的胜利果实。^②

我要借此机会称赞孟戴斯·弗朗斯，他清醒地、准确地估计

①：西方没有人知道越南的形势如此紧张。

②：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就十七度线达成的协议很满意，设想到胡志明和赫鲁晓夫也满意。但杜勒斯先生不满意。

了形势。应当承认越南游击队有困难，但法国军队困难更大。孟戴斯·弗朗斯结束法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是唯一正确的一步。法国退出了战争，撤走了部队。

如果大家都遵守日内瓦协议一切都好办。两年后就会举行大选，毫无疑问胡志明，代表越南的共产主义者及进步力量，会取得胜利。但是，凶恶的杜勒斯和美国插了进来，把长期的流血战争强加给了越南人民，这场战争仍在继续。

我不谈这场战争了，因为全过程报刊已报道得很详细了。但我要谈一谈中苏冲突给越南带来的难处。

在1964年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的最后阶段，^①大家都同意签署大会宣言，只有中国人不同意。他们坚决拒绝接受文件中的一条。这一条很重要，对我们来说宣言包括这一条是个原则问题，因此我们不向中国妥协。

胡志明找到我说：“赫鲁晓夫同志，在这一点上你应该向中国人让步。”

“我们怎么能让步呢？”我回答说：“这是个原则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中国是个大国，它有一个大党，你不能让这一运动出现分裂。你必须让中国人和我们一起签署宣言，只有一致通过，宣言才真正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

“胡志明同志，我们代表团正在尽一切努力维护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别以为我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和力量。我们正尽一切努力使中国留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怀抱中。但你肯定知道我们不会拿原则作妥协，我们如果就这一条向中国让步就是拿原则妥协。他们的立场同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观相抵触。你说中国是一

^①：这就是前一章提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共八十一个）。中国最终作了让步，签署了条约，挽回了面子，从而使全世界认为在以后一段时间里，共产主义运动将坚如磐石。

个大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你肯定也同意我们也不是小国、小党。但这并不重要，所有共产党都是平等的，享有同等权力和机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所有愿望，都必须服从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

胡志明同意我的观点，但他说：“对我们来说，困难就更大了。别忘了，中国是我们的邻居。”同我谈话后，他肯定去和中国人谈了。最终，经过我方代表同中国人磋商的长时间努力，双方找到了都能接受的方式。中国同意签署宣言。

中国最终同我们断绝政治关系使我很伤心。当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公开以后，中国开始牵着越南劳动党的鼻子。越南人口的很大部分，当然了还有党员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华人。中国开始利用这一巨大影响挑起越南和苏联的争论，唆使越南反对我们。越南党领导中的一些重要位置现在被亲中国的同志占据着，当我们在尽一切努力帮助越南时，越南的亲华分子也正尽全力取悦中国。换句话说，他们这么做不仅是反对我们，而且是违背越南自己的利益的。这真是太遗憾了。

我们在真诚地、不遗余力地援助越南，但越南亲华分子对我们的敌意真是难咽的苦果。为什么我现在还提这事？我提这事关系到我们所能指望得到的，既然现在胡志明已经去世了。

根据我在报刊上读到的报道看，苏越关系的发展似乎是一切顺利。越南代表团在访问苏联，我们的记者们去越南报道越南人民的斗争。报道经常在报刊、电视以及纪录片中出现。

但根据我所得到的情报，一切并不象报纸上的文章和电视报道中声称的那么顺利。据我所知越南人对苏联政府和党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克制态度，这肯定意味着在越南政府和越南劳动党中仍存在着亲华力量。从外表看，越南和苏联之间似乎存在着友好关系和相互了解，但这可能仅仅是越南领导人施放的烟幕，甚至有可能是中国授意的，目的是不失去苏联和其它兄弟共产党的

援助。我真诚希望不是这么回事，虽然我仍认为有这种可能。我愿意相信越南真的希望同苏联搞好关系，但我认为中国不会对越南撒手，而越南的亲华力量还会很强大，他们会迫使越南靠中国的施舍过日子。

现在胡志明去世了，亲华势力的影响会比以前变得更为有害。如果这样的话，那将太遗憾了，那将是对胡志明同志的拙劣的纪念，因为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加强越南同苏联的友谊中去了。

自胡志明同志去世后，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发表了许多种言论文章，都想回答使人们担心的问题：越南同苏联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同观点不同于毛泽东的其它共产党的关系？越南同中国党的领导的关系将如何发展？越南的政策将出现什么变化？我现在愿意就我所读到的、听到的谈谈我自己的印象，并就苏越关系发展的前景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当然没人能够预测将会出现什么情况。虽然有些迹象，但我们预测时应该谨慎，因为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一切在动荡之中，随时有可能发生变化。比如，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一度是完美的；苏联领导同毛泽东的关系也曾是友好的，但现在一切都变了。同越南也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况，我们的关系原来很好，但如果以后恶化了，那将不是苏联共产党的过错，相反我认为那都将是毛泽东自己和他对越南的影响造成的。

使我能够预测，或至少是猜测越南将来发展的是所谓的胡志明的遗嘱和黎笋^①的著名演讲。这两份文件我读了两遍，我迫使我自己仔细阅读以便能正确理解。

胡志明的遗嘱只字没提苏联给予越南的巨大的、无私的援助。我们的援助是关键，因为没有苏联的物质援助，越南不可

①：黎笋是胡去世后北越领导中的重要成员。

能在现代战争中生存，不可能抵抗象美国这么富裕和强大的侵略者。为了获得足够的武器装备，越南只只有依靠苏联；为了取得胜利，越南必须有足够的武器，而这些武器只有从苏联那里才能得到。中国无法满足越南的需要。世界舆论包括共产主义的敌人，都承认如果不是靠苏联提供经济上、物质上的援助，越南根本无法抵御美国侵略的军事行动。比如说北越解放军用火箭袭击了美国空军基地，自然那些火箭不是在越南的丛林中制造的，它们是苏联工厂制造的。苏联丝毫不从获利角度出发致力于援助所有为独立而战，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自由而战，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的所有力量和人民。

近来，越南的亲华分子甚至开始认识与苏联保持友谊的必要。胡志明的传统得到了一定恢复。越南人重新调整了他们的政策是很明智的，我说“重新调整”是因为他们没有根本改变政策，他们只是重新调整了政策，考虑到将来继续进行战争的必要，而且认识到只有苏联，不是中国，能够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今天残酷的斗争仍在继续，胜利还远没有到来。但越南战胜美帝国主义的希望已经依稀可见。因此我们的努力不能放松，必须调动一切确保越南人民的斗争取得胜利。战争中受到考验的不仅仅是越南人民的将来。越南人民正在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流血牺牲。胡志明的继承者们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会显示出充分的智慧吗？只有时间能作出检验。

第二十章 卡斯特罗和加勒比危机

在整个叙述中，赫鲁晓夫对古巴危机的描绘也许可以说是最为开诚布公，前后一致而且实话实说的一段公案了。在这个广为人知的事件之中，他略去某些细节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大多数明白事理来龙去脉的观察家们说来，他们早已对赫鲁晓夫在本节中有关古巴事件起始动机多少还算准确的描述了如指掌。在西方，人们由于他被迫撤出导弹而遭受屈辱一事渲染过分（虽然这并非肯尼迪总统的所为。）中国以及他在自己苏联国内的对头们对此事件却极尽落石下井之能事。但是，从事件一开始，他打算达到的目的地却事实俱在，只是在方式方法上未能尽如人意而已；他从持续不断的入侵威胁之下，将卡斯特罗的古巴据为己有。而且他与肯尼迪总统达成一项谅解，对他来说肯尼迪的被刺身亡，无疑是一桩后果严重，涉及他个人人身的不幸事件。

我要说明一下发生在1962年10月的加勒比海危机是怎么回事。它是如此这般开头引发起来的。

当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他的革命走向胜利并带领他的军队进入哈瓦那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政权会遵循什么样的政治路线还不甚了了。我们只是知道有个别共产党人参加了他领导的革命运动，但古巴共产党与他井水不犯河水。古巴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甚至辞职不干了，为的是跟着他上山打游击。当卡斯特罗的部队打进哈瓦那的时候，我们只能完全依靠古巴国内或其他国家的报

纸与广播报道得知发生的一切。整个局势模糊不清。被任命为总统的卡斯特罗我们是闻所未闻。而且古巴并没有承认我们的政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与新政权没有外交关系。

但是，我们之中有些人因处理拉丁美洲的事务或在那个地区旅行而认识某些古巴领导人。他们对劳尔·卡斯特罗尤为知晓。当然这纯属偶然。我们有位同志与劳尔·卡斯特罗同船去墨西哥。这位同志告诉我他与劳尔相见并交谈，而且以后就在我们这位同志眼皮底下，劳尔·卡斯特罗在墨西哥被捕。通过不同渠道得来的情况使我们得知劳尔·卡斯特罗是一位好的共产党员。然而看起来他并没有把他的真实信仰告诉过他的哥哥菲德尔。切·格瓦拉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其他某些人也是——也许只是我们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与任何一位古巴的新领导人都没有官方接触，所以除了小道消息之外，什么也没有。

事情却开始飞迅发展起来。

我们决定让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去美国到我们的驻美大使阿那托里·多勃雷宁那儿作客。米高扬的使命是与美国实业界头面人物建立非官方关系。我们想瞧一瞧与美国开展贸易的前景如何。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是从事这一使命合乎逻辑的人选。他在战前在美国呆过，而且仍然有些老朋友。我们相信只要他在华盛顿一露面，实业界就会有人前来找他探寻跟我们做买卖的机会。不管怎么样，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会得到一个风儿正在向哪方吹的印象。

当米高扬在美国时，菲德尔邀请他访问古巴。米高扬接受了。他在古巴转了一圈，把那里的情况察看一番还与当地人聊了一聊。我们依然与古巴没有外交关系，而卡斯特罗正对我们执行一个十分谨慎的政策。这儿有一个正好说明当时古巴的形势及菲德尔·卡斯特罗所起作用的故事：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全都升了天堂；圣彼得作为上帝的正式代表前来迎接他们并命令他们排好队。

然后他说，“所有的共产党员，向前3步走！”格瓦拉走向前；劳尔走向前；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走向前。但是包括菲德尔在内的其他所有人站立在队列之中不动。圣彼得瞪了菲德尔一眼，冲他喊道，“嗨！我说你呐，你这个满咀胡子拉碴的大个子！你这是怎么啦，没有听见我的话？所有的共产党员向前3步走！”

这个故事说的是，当圣彼得与其他人全都认为菲德尔是个共产党时，而菲德尔自己不这么想。他认为圣彼得的命令与他不相干。

米高扬的访问结束不久，我们就与古巴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把一个代表团派到那儿。美国人断绝了对古巴人的石油供应。这是他们主要的能源。于是古巴人转向我们寻求帮助。古巴岛上的正常生活有走向停顿的危险。非常紧迫的是我们得组织船队将大量石油运往古巴。但是说起来总是要比干容易得多。我们的油船船队并没有足够的远洋货轮。我们要提供古巴急需的石油制品，从而给我们自己的海运系统造成了极重的负担，迫使我们向意大利订购额外的油船。为意大利同意卖给我们必不可少的油轮时，它又与美国闹起了矛盾。美国人指责意大利违反了与它们资本主义夥伴们团结一致的精神。整个事件的教训是，如果某一资本主义国家察觉到与一个共产党国家贸易可以有机会赚上一笔钱时，那它不能不顾及在经济上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团结一致。

一旦我们与古巴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就派了一位资深的外交官去哈瓦那当大使。我们还派遣了新闻记者阿列克谢耶夫去那儿，因为它认识菲德尔，更与劳尔有交情。每当古巴的领导人要向我们索要什么东西，他们往往通过阿列克谢耶夫而不是由我们的大使告诉我们。阿列克谢耶夫就会立刻与莫斯科联系，告诉我们古巴的要求。我们让阿列克谢耶夫驻留在那里看来是作对了，因为我们的大使后来表明他在一个刚刚经历了一场革命之后建立的国家里是不适宜于大使这个差使的。他的一个问题是深深陷入了

官僚主义的泥坑。另一个问题是当局势紧张到白热化程度，并开始出现枪击时，他竟要求古巴人给他弄个贴身保镖。由于古巴领导人全都是才从山上下来的游击队战士，对这个要求他们是又惊奇又生气。就在向革命的敌人提供着更为瞩目显眼的人身攻击目标时，他们独来独往，根本不要什么个人警卫，而来自我们国家的这位共产党的贵族老爷公然为了防止一些可能发生的不愉快事件索取某种特殊的“保命措施”！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大使只能作些有损于，而不是有助于，我们与古巴的关系的事之后，我们将他召回并由阿列克谢耶夫代替他当大使。古巴人已经熟习并且信任阿列克谢耶夫，而他本人也表明自己是个绝佳的人选；他正是干这种专门与他们打交道的外交官的材料。

与此同时，生米也煮成了熟饭。卡斯特罗不再骑墙观望，他开始像一位羽毛丰满，成熟老练的共产党人那样敢作敢为，尽管他还不是这样称呼他自己。他这时正把共产党人吸收进他的政府。

但是，卡斯特罗所作所为使他树敌甚多。在他一上台时由他任命的总统叛逃到了美国，而他的许多部下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之中曾与他并肩作战，如今却转向他方。原因是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反对社会主义改革。他们对巴蒂斯塔早就厌倦了，并急于要推翻腐朽的政权，但他们反对卡斯特罗对所有实业进行国有化的政策，反对他对土地占有者的限制性措施，以及没收富有的美国人的财产。

正在这时，美国人严密地监视着卡斯特罗。起初，他们以为古巴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基础会保存完好。所以当卡斯特罗宣布他要把古巴领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时，美国人要想单纯施加自己的影响。而能在古巴有所作为的良机已经失去；古巴已经不再存在什么政治力量可以组织起来为了美国的利益去战斗。唯一可行的替代办法只有一个——入侵！

古巴人向我们要武器。我们给他们坦克大炮并派去了教他们使用这些武器的人。此外，我们给他们送去了高射炮和一些战斗机。由于我们的援助，古巴扎扎实实地武装起来了。古巴军队主要是缺少经验。他们从没使用过坦克；他们通常只使用轻武器战斗——自动步枪手榴弹和手枪。但是我们派去的教官很快教会他们使用我们提供的武器。

我们首先从无线电听到已经开始对古巴发动反革命武装入侵。^①我们当时不知道入侵者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古巴的密谋者还是美国人？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打着谁的旗号，入侵已经进行，而且它是得到美国人支持的。

菲德尔的军队立即投入战斗，并迅速消灭了入侵者。美国人对这些密谋者寄予过多的厚望。他们以为，只要有美国人在背后支持入侵，古巴人就会与这些密谋者联合起来，由他们将卡斯特罗打倒。

卡斯特罗对反革命份子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我们加强了对古巴的军事援助。古巴军队能使用多少武器我们就给他们多少。但是真正的问题仍然不在武器的质与量，而在于得到那些会使用现代武器装备的技术人员。

在入侵的武装力量还没有完全粉碎之前，卡斯特罗公开宣布古巴将走向一条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我们不太理解发表这个声明的时机选择。卡斯特的宣言具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就是扩大了他自己与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们之间的分歧，并缩小了那些他可以指望支持他反对入侵的人的圈子。仅从卡斯特罗本人的勇气而言，他的坚定立场是值得称赞的，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斗争策略的观点上来看，那就很难讲得通了。^②

^①这是指1961年4月猪湾入侵的大失败。

^②卡斯特罗在斗争的这一阶段所公开发表的社会主义诸原则的宣言，是违背列宁有关革命策略的教导的。列宁的教导十分强调欺骗的重要性。

但是，卡斯特罗毕竟是胜利了。他打败了反革命分子还抓了不少俘虏。我们当然欢迎卡斯特罗的胜利；但与此同时让我们关切的是“猪湾”的入侵只是个开始，美国人对古巴是不会认输罢休的。美国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古巴在美的移民身上，它以后还会如此。移民中的密谋分子已经从惨败之中学乖了一些，然而他们不会就此放弃再一次入侵的机会。

古巴的地理位置使它往往易于受到敌人的攻击。古巴海岸与美国海岸相隔不过数英里，而它像一根香肠那样摆在那里，这个架势极易受敌攻袭，而守卫该岛则令人难以置信地困难。对入侵者来说，机会可以说是数不清的多，尤其是入侵得到舰载火力与空军的支援。

我们断定美国人决不会与卡斯特罗的古巴言归于好。他们害怕，正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会像一块磁铁将其他拉丁美洲的国家吸向社会主义。只要有在美国在加勒比海持续不断的干涉威胁，我们自己会有什么对策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不止一次与主席团的其他成员探讨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同意这个结论：除非我们作些什么事，否则美国人是不会擅自放下屠刀的。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使用我们手中任何一个手段，保卫古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同时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作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榜样。我非常清楚的是：如果我们在保卫古巴时，没有采取什么决定性的步骤，那么我们将会轻而易举地失去古巴。

甚至当我在莫斯科从事繁忙的国事活动或是在其他友好国家旅行时，我一直全神贯注于古巴的命运以及维护苏联在世界那一面的威望。比如在我对保加利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我的大脑一直在研究着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失去了古巴，那就会发生什么事呢？我知道这就会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惨重打击。这会严重影响我们在全世界的形象，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如果古巴垮了，其他

拉丁美洲国家就会抛弃我们，指责我们。即使使尽了全身解数，除了向联合国提出空洞的抗议之外，也不能为古巴作点什么。我们得想些点子，除了咀皮子之外，还能作些什么与美国对抗。我们得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一个看得见，摸的着而且行之有效的威慑力量来对付美国的干涉。但是具体地讲，这是什么东西呢？合乎逻辑的回答是导弹。美国已经用它自己的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包围了苏联。我们知道那些布署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美国导弹，是对准我们的，更不要说那些布署在西德的了。我们性命攸关的工业中心，直接受到装载原子弹的飞机和带有核弹头的导弹的威胁。作为（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我发现自己处于困境，因为我得作出决定采取一个行动，既能对付美国的威胁，又能避免战争。任何一个混蛋都能挑起一场战争，而且战争一经挑起，就在人们之中最聪慧的人也无法再阻止它——特别是当这是一场核战争的时候。

正当我出访保加利亚的时候，我想起了这个念头，将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布置在古巴，而且要在美国知道自己已无能为力时，才察觉这一行动。我知道首先得与卡斯特罗会谈，向他说明我们的战略思想以征求古巴政府的同意。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秘密地装置了导弹，以后美国在那儿发现了这些导弹已经安装好准备发射，美国人在使用军事手段试图摧毁我们的装置之前就得三思而后行了。我知道美国能将我们一些导弹打掉，但不会全部消灭。如果我们的导弹有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保存了下来——甚而至于只有一支或两支大个头导弹安然无恙——我们仍然可以袭击纽约，那么纽约就会所存无几。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纽约的每一个人都会被杀死——当然不是每一个人，但是有非常大的一部分人全得完蛋。我说不清到底是多少人，这是我们的科学家与军事专家要干的事儿了。他们的专业是核战争并且知道如何去计算要是一颗导弹击中了像纽约那样大的城市会造成的后果。

但是，这些还全不是最重要的。主要的是我们将导弹布置在古巴，我想，就会抑制美国对卡斯特罗政府搞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除了保卫古巴，我们的导弹还将会造成西方津津乐道的“武装力量的平衡。”美国人已经在我国周围布署了军事基地，并用核武器来威胁我们，现在倒叫他们尝尝要是敌人的导弹对准着你是何滋味；我们作的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现在正是时候了。美国在它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人民遭到威胁时，是何感觉。我们俄罗斯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之中已经打了3次仗：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至少在过去的50年里，还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打过仗。它曾在两次世界大战里派出军队打仗——结果是大发横财。在美国只淌了几滴血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各国人民血流成河，而美却从中赚取了不计其数的钱。

当我在保加利亚的时候，所有这些想法一直在我脑海里翻滚。我走来走去，深思熟虑怎么办才好。我并没有将我的想法告诉任何人。我只把自己精神上的重负留给我自己。但是把火箭布置在古巴的想法在我脑中成熟了。从保加利亚回到莫斯科之后，我继续思索着这想法是否行得通。最后我们召开了一个会议，在会上我说我对古巴问题有些想法，并把上述的思考和盘托出。我把我的主意与卡斯特罗刚刚抗击取胜的猪湾入侵事件放在一起考虑。我说谁要是指望第二次入侵就像第一次那样糟糕的策划与执行，他就真是一个大傻瓜。我警告说要是再对古巴再次发动入侵，卡斯特罗就可能垮台，并说只有我们才能防止这一灾难发生。

在政府内部的讨论进行之中，我们决定把中程导弹，发射装备和伊尔—28轰炸机布署在古巴。尽管这些轰炸机已经是老掉牙了，让他们来对付敌人的登陆部队还是有用的。伊尔—28飞的太慢，在敌人领空很容易被击落，但是适用在海岸防卫上。伊尔—28是我们第一批喷气轰炸机。在它那个时代曾经是天上的霸王。

但是在我们用军事装备援助古巴时，伊尔-28已经不再生产了。

在我们开始将火箭运往古巴不久，美国人就起了疑心。他们的情报机构告诉他们，我们开往古巴的船只的数量突然大量增多，而且船一到达古巴港口，只由我们自己人卸货。我们不让古巴人插手干任何有关卸下或组装火箭的工作。当时美国人并没有获得有关我们卸下什么东西的直接情报，只是知道不管我们是在干什么，反正我们是自己亲手干的。不久他们通过间谍飞机拍下的照片得知我们正在装置火箭。他们也得知我们的伊尔-28轰炸机已经抵达古巴。

美国人吓坏了。我们则加紧把东西运送过去。当危机到达高潮时，我们几乎把一切必要的东西都运了过去。

有人发表过一通马后炮式的议论，争辩说当时应在弹道火箭之前先把防空导弹装置好。这纯属无稽之谈。你知道在这个像一条香肠一样的岛国到底能布署多少地对空导弹？在古巴这样的弹丸之国火箭布署的数量是有限的。于是，在你把你的所有火箭全部发射完毕之后，剩下你自己两手空空只有等着挨打。而且防空导弹射程极短。防空导弹的发射架，很容易让来自天空与海上的对方力量予以摧毁。

我要明白无误地表明一件事：尽管我们把弹道火箭运进了古巴，我们无意去发动一场战争。相反，我的主要目的是威慑美国使它不敢发动战争。我们充分意识到对古巴发动的战争很快就会酿成一场世界大战。任何一个白痴也能在美国与古巴之间挑起一场战争。古巴离我们足有1.1万公里之遥。只有傻瓜才能想像我们要从古巴侵入美国大陆。我们的目标恰恰相反：我们要防止美国人入侵古巴。为此，我们要用火箭与他们对峙，从而使他们不敢轻易下手——这就不得不承受一段充满危险的形势紧张时期。

当美国察觉出我们向古巴运去了什么之后，他们掀起了一个来势凶猛的新闻浪潮来反对我们，声称我们正在威胁着美国安全

等等。总之，敌意开始树立起来，而美国新闻界就在其中煽风点火。于是10月有这么一天，肯尼迪总统公开发表声明，警告说为了清除他所谓的在古巴的俄国导弹“威胁，”美国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美国人开始作出显示力量的好战姿态。他们聚集军力反对古巴，用海军船只完全封锁了这个岛国。事情变得沸沸扬扬就像开了锅一样。我们估计美国人试图吓唬我们，但他们并不是比我们更不怕原子战争。那时我们还没有足够时间把全部装备运往古巴，但是我们已经布署好了足够的火箭，准备好击毁纽约、芝加哥和其他美国的工业大城市，更不用说像华盛顿那样穷乡僻壤的小村落了。我从没想到美国曾经面对着像那个时刻所面对的真实在在的毁灭性威胁。

与此同时，我们照样干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不能让他们吓住。我们的船载着运往古巴剩下的装备径直穿过美国海军的庞大船队。但是美国人并没有试图阻拦我们，甚至都没有进行检查。我们打定主意只要美国停留在作出一个气势汹汹的姿态而在实际上并没有碰我们一根毫毛，我们就能假装对这一切骚扰动作视而不见不予理睬。不管怎么说，美国在道义上或是法理上都没有理由跟我们顶牛。我们并没有给予古巴任何比美国人正在给予它的盟国更多的东西。我们与美国人一样享有相等的权利与机会。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和美国人一样按着同一个规则行事。

我们差不多已经把我们的装备完全运过去了。因之危机到达了顶点，西方报纸因狂怒与惊慌像炸了锅一样乱作一团。我们照样回敬它们，只是没有像它们那样歇斯底里而已。我们的人民充分了解正在形成的危险局势，并通过我们小心翼翼地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从而在人民之中并没有引起惊慌失措。

我记得有这么六、七天，危机是特别地尖锐。我想给这个形势多少降降温，于是就对政府其他成员提议：“同志们，今晚让咱们一块儿去莫斯科大剧院看戏去吧。不论是我国人民还是外国

观察家都会注意到，那就会让他们安心一点儿。他们会对自己说，‘要是赫鲁晓夫和我们的其他领导人，在这个时候还有闲心去看戏，至少今晚我们能睡个太平觉。’”我们当时正在想方设法掩盖我们心中万分焦虑的心情。①

以后双方开始交换照会。我口述电文并在照会交换中代表我方。我在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办公室里渡过了最危急的一夜。我睡在我的办公室中一条长沙发上——没有脱衣裳，和衣而卧。我不愿意我自己表现得就像西方某个大国首相那样，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之中，据说让人瞅见，急的就没有穿上裤子，而且在危机完全过去之前穿着短裤在张罗一切。〔原文436页〕。我已经作好准备在任何时刻接到报警的消息，我要作好准备立刻应付突发事变。

肯尼迪总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我们把导弹与轰炸机运出古巴。我对那天记得十分清晰。我与肯尼迪总统交换信息的情形我记的特别清楚，因为这是我主动提出来的，而且在通讯中是我方举措的中心人物。是当危机处于最关键，最危急的关头，总统与我开始直接接触，这一事态发展是由我负其全责的。

危机高潮过去五或六天之后，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我们在华盛顿的大使报告说，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曾对他进行一次私人访问。多勃雷宁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罗伯特·肯尼迪看起来筋疲力尽。从他的眼睛就可看出来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据他自己说他已经整整6天6夜没有回家了。‘总统的情况也很严重，’罗伯特·肯尼迪说。‘而且

①每当克里姆林宫的头头脑脑们个个春风满面笑容可掬地全体出现在大剧院之时，十拿九稳——虽不能说是万无一失——意味着某种危机迫在眉睫。最好例子发生在贝利亚被捕的前一天晚上。不用说，贝利亚本人那一天也是出席那个盛会的一员。

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困境。我们全都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之中。实际上我们一直受着军方的压力要我们对古巴动武。也许在这个时刻总统正坐在办公室里给赫鲁晓夫主席草拟一个电文。我请求你，多勃雷宁先生，通过非官方渠道，将肯尼迪总统的信息转交给赫鲁晓夫主席。肯尼迪总统请求赫鲁晓夫主席接受他的请求并考虑到美国制的特点。尽管总统本人强烈反对向古巴开战，但是一系列无法逆转的事件，可能在违背他本人意愿的形势下发生。这正是总统直接向赫鲁晓夫主席呼吁，请求帮助平息这一争执的原因。如果当前紧张形势持续下去，总统无法保证军方不会把他推翻并夺权。美国军队可能会失去控制。”^①

我没有忽视这一可能性。我们知道肯尼迪是位年轻的总统。而美国的安全，确实受到了威胁。有时我们觉得，确实有总统无法控制他的军队的危险，而现在他本人已经向我们承认这一点了。肯尼迪的信息紧迫地重复了美国的要求，将导弹与轰炸机撤出古巴。我们可以从来函的语气中觉察出，在美国这个紧张的局势确实已经达到了关键时刻了。

我们给肯尼迪回了电，告诉他我们在古巴布署导弹是为了保卫古巴，而且除了防止对古巴的入侵之外，决无其他企图。我们只愿保证能让古巴沿着一条它自己人民决定的道路前进，而不愿看到第三者硬要插手进来。

当我们通过官方的外交渠道互相通气时，从总统的弟弟转来了更多的密信。他把自己的电话数码交给了多勃雷宁，并请求他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打电话给他。有一次，当罗伯特·肯尼迪与多勃雷宁交谈时，他几乎要放声大哭。“现在我已经有好些天没有看见我的孩子们啦，”罗伯特·肯尼迪说，“而且总统也没有看

^①非常明显，这是赫鲁晓夫对提交给他的报告内容所提供的他自己的说法。设有证据表明总统是出于害怕军方夺权而采取行动的。

到他的孩子了。我们一天到晚呆在白宫里；我不知道我们还能顶得住我们的将军多长时间。”

我们看出来我们得赶紧改变立场。“同志们，”我说，“我们得找个体面的方法从僵局中脱身。当然，我们同时必须担保不损害古巴。”我们交给美国人一个照会，说明我们同意撤出我们的导弹与轰炸机，条件是总统向我们保证美国军队或其他人不再侵入古巴。最后肯尼迪让步了，同意发表一个声明，作出这样一个保证。

我们应指出我方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集体领导作出的。仅仅是经过了两三次长时间的讨论之后我们才决定将导弹布署在古巴本来就是值得一试的冒险。我的感觉是不管起初的决定还是以后的决定都不应强人所难。我曾设法保证让整个集体领导有时间使其每个成员都能对此问题深思熟虑。我当时要我的同志们在接受并支持这个决定时要扪心无愧，而且充分了解把导弹运往古巴可能产生的后果——即是说要与美国开战。我们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是由我们集体领导小心谨慎思考之后作出的。

就在我们公开宣布打算从古巴撤出导弹之后，美国人立刻趾高气扬起来，坚持要把一个核查队伍派往古巴岛。我们的回答是他们要那么干就得取得古巴政府的许可。接着中国和美国报纸开始大吵大闹说什么赫鲁晓夫吓破了胆，要打退堂鼓了。我不否认为了和平的利益我们是被迫作出了一些巨大的让步。我们甚至同意检查我们的船支——但只能从空中进行。我们决不允许美国人踏上我们的甲板，虽然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真的撤走了导弹。

正当撤退开始之时，在我们脑子里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是否真会把他们那些包围古巴的海军舰支撤走。我们的担心是一旦我们撤走，美国人可能马上转入进攻。但是没有发生，还是良知占了上风。他们的船支驶离了古巴的领海，只是飞机还

是绕着古巴岛转悠。卡斯特罗下令开火，于是古巴人打下一架美国的U-2侦察机。就像加里·鲍尔斯一样，又有一个美国飞贼让我们的导弹给打了下来。^①这一事件轰动一时。起先我们担心肯尼迪总统会忍不下这口气。但是，幸好是除了在他们的宣传之中美国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们尽其所能诋毁我们，并给肯尼迪涂脂抹粉尽量美化。但是只要他们把地面部队和空军撤回，其他小动作也就无关宏旨了。

局势走向安定。差不多就在总统与我在危机高潮交换照会之时，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开始恢复正常。在另一方面，我们与古巴的关系却突然恶化。卡斯特罗甚至拒绝接受我们的大使。在古巴人看来，我们撤出导弹似乎是我们在道义上的一个失败。我们在古巴人心目中的份量不是增大而在减少。

我们决定派遣米高扬去古巴。“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我们找不到比米高扬更好的外交家了，”我说。“他将会平心静气与古巴人讨论这个局势。”并不是每一个人明白米高扬在谈判中说的话，但是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多年来，在发展我国外贸方面他起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他在谈判桌上还是个能手。

于是卡斯特罗提出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四五个条件。我们全力支持他的要求要美国人放弃在关塔那摩湾的海军基地。直到今天我们仍支持他这个要求，只是美国人还是赖在那儿，谁也不知道到了哪个猴年马月他们才会撤走。

在危机之中我们与美国人谈判。总的说来，他们，特别是罗伯特·肯尼迪，对我们还是开诚布公直言相告的。美国人知道要是俄国人在古巴流了血，那美国人一定也得在德国流血。美国政府急于避免出现这一事态发展。至少可以说那是一个有趣的，但

^①这架U-2飞机的驾驶员小鲁道夫·安德森上校实际上在他的飞机于1962年10月27日被击落时身亡。

是能引起争议的局势。当代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彼此已经扳成平局，摆开架势把手指放在发射核导弹的按钮上。你也许会想大战的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双方的表现却是只要希望避免战争的愿望足够强烈，就是再咄咄逼人的争端也可以妥协解决。而在古巴危机中，妥协是找到了。这一事件是以常识的胜利作为结局的。我将永远怀着深深的敬意想起已故的总统，因为归根结蒂，他在避免战争方面是清醒而又坚定的。他既没有让他自己吓的不知所措，也没有不顾后果胡作非为。他没有过高地估计美国的国力而给自己留出了一个摆脱危机的后路。当他拒绝美国右翼势力的煽动试图要他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时，他表现了真正的睿智和政治家才能。然而我们能够迫使肯尼迪允诺不管美国还是它的盟国都不得侵入古巴，这是我们的一个伟大胜利。

但是卡斯特罗可不是这么想。我们撤出导弹他很不高兴。中国人自始至终一直公开地喧嚣还不停地在卡斯特罗的耳旁嘁嘁喳喳：“千万要记住，你们决不能相信帝国主义分子会信守他们的诺言！”换句话说，中国人要在这个事件上大作文章，竭力在古巴人面前往我们脸上抹黑。

在与从哈瓦那归来的米高扬商讨之后，我决定给卡斯特罗写信，坦率地表达我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想法。“加勒比海危机的最重要的一点，”我写道，“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的生存得到了保证。要是古巴没有经历这么一个劫难，非常可能的是美国人已经组织了一场入侵，消灭了古巴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现在危机的高潮已经成了过去，而且我们与美国政府已经交换了承诺，因此美国人要再干涉古巴就很困难了。要是现在美国敢入侵（古巴），苏联就有权打它。这样我们至少在肯尼迪入主白宫的剩下的两年里，给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争得了生存权。我们还有理由相信肯尼迪可以竞选连任。所以，他可能再当6年。在当代的情况下，争取整整6年时间可不是件小事。而在今后的6年之

中世界力量的平衡可以会发生变化——转向有利于我们，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给卡斯特罗的信件总结了世界历史中的一个插曲。这个插曲曾经把世界拖向了原子战争的边缘，使我们赢得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对我个人来说，这个事件使我深感宽慰。因为我们行动无可指责。由于美帝国主义没能把我们吓住，我们为革命事业荣立功勋。加勒比海危机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胜利，作为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在我整个国务活动家的生涯之中，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胜利。我要说，我们没有动用一抢一弹就获得了一次惊人的成功。

许多年已经过去了，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政府巍然屹立、不断发展壮大。直到今天，美国恪守自己的承诺，自己也没有让其他人干涉插手古巴的事务。

我还记得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进行的最后一次交谈。我们是在皮聪达（高加索的一个休养地，那里有政府别墅。）讨论的是古巴的甘蔗收成。从卡斯特罗的目光中不难看出他迫切希望尽快着手改革古巴的农业。他知道提高古巴经济的唯一切实途径是增加糖的产量。为此他需要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现代化的炼糖厂。他告诉我他的目标是主宰糖的国际市场。我向他指出尽管眼前世界糖价因对古巴食糖实行封锁禁运而造成急剧上涨，糖价无疑还会回弹超于正常，因为其他国家会增加自己的食糖生产来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此后事情的发展证明我是对的：如果过渡时期的市场形势持续更长久一些，高涨的糖价会使古巴大赚一笔。但是糖价很快回跌到正常水平。

然而与以往一样，古巴干得非常漂亮。我从报纸上得知古巴1970年订出计划要生产1000万吨甘蔗。这一年对所有进步人类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因为适逢伟大的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古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竟走得这么远，我真为他们高兴。

今天的古巴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雄峙在侵略成性的美国帝国主义的血盆大口之下。古巴的存在对其他拉丁美洲的国家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鼓舞它们仿效和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已经开始认识到采取什么步骤来把自己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可望古巴的辉煌范例，会继续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

至于肯尼迪，他的横死是个极大的损失。正像全世界从所谓的古巴危机中所领教到的那样，他的天赋才能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国际冲突。尽管他很年轻，他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如果肯尼迪还活着，我相信苏美关系会比现在好得多。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肯尼迪决不会让他的国家在越南陷得这么深。

肯尼迪总统死后，他的继任林登、约翰逊向我们保证他将恪守肯尼迪的承诺，不再入侵古巴，至今美国人没有违背这个诺言。如果他们不这么干，我们依然有必要的手段实现我们自己对卡斯特罗的承诺，保卫古巴。

第二十一章 捍卫社会主义天堂

这一章提供的是一幅不同寻常的鲜明画面，揭露了作为一名政治家，赫鲁晓夫的局限性以及他那决非平庸无能的品德。一开始，这一章就呈现出国际风云中的一个场面，其中除个别人物的思想境界暧昧不明之外，整个场面皆为共产党人的偏见所左右。但是在这一章里也不时地出现在形形色色的政客身上罕见的浩瀚无边的判断力和深谋远虑的洞察力。一直到他政治生涯的尽头，他始终背着屡犯错误的黑锅。与此同时，赫鲁晓夫的独特之处是这也未能阻止他飞黄腾达。这位来自卡里诺夫卡的乡巴佬，粗野无礼，盛气凌人。性格暴烈，有时简直是睚眦必报，他不言惭，而且充满了壮稼汉的诡诈狡猾。从公认的意思上看，他是相当地不学无术，他的思维从来没有受到过充分的调教。然而在他的大脑里具有某些独特的个性的想像力或许甚而至于谦卑的品质。这些品质足以使他他的同事之中脱颖而出并雄踞于他们之上。他从来也没跳出他自己已经历过的生活圈子，以及克服他秉赋之中的缺点。但是在本章的情节之中，就像他在自己最后几年政治活动中越来越清楚地表现那样，以他一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不时闪现出老谋深算的睿智。如果是别人也许会成为深受世人普遍爱戴崇敬的誉满全球的杰出人物了。

我们竟然能活到这一天，从经济实力上来看苏联已成为世界

上第一号强国。这决不是一件等闲小事。麦克米伦有次对我说，“今天的英国算个什么玩艺儿了呢？英国不再是往日那个称霸海上，在世界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强国了。今天美国和你们苏联说了算。”法国总统戴高乐几乎使用了同样的语言向我述说了同样的事实。“哦，赫鲁晓夫先生，”这位头脑清醒的人说，“今天的美国和苏联是两个伟大强国。法兰西不再享有她那往日的盛况与影响了。”所以你们不难明白，不管是麦克米伦或是戴高乐都已经不约而同地承认了世界舞台上我们的重要性。

多年来，在所有的争取和平、进步和从殖民地统治之下争取解放的人民心目中，苏联已经获得了崇高的威望。我国对外政策的目的是并不是牺牲他国利益而利己自肥。我们从不赞成人剥削人，国家剥削国家。正相反，不论是我们公开宣布的政策，还是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旨在鼓励各国享用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帮助这些国家不仅通过我们的忠告和我们树立的榜样，而且无偿地赠与他们物质援助或削价售给他们货物与装备。我国外交政策基于我们的一个信念，这就是列宁给我们指出的通往未来的道路，这条路不但是属于苏联的、也是属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人民的。

比如我们的对于阿富汗的政策。在我们1955年出访印度回国途中，我和我们代表团团长布尔加宁一起到了那儿。应阿富汗国王之邀，我们在喀布尔停留。与国王及其大臣之间的讨论使我们对经济落后国家阿富汗有了一个相当清晰的印象。我们可以意识到阿富汗人正在找寻解决问题的途径。

很清楚的是那时美国也在讨好阿富汗。为了用军事基地圈来包围我们，美国对阿富汗那样的国家大献殷勤，装着要给那个国家经援，而在实际上更感兴趣的是捞取政治实惠。美国人自己掏钱搞各式各样的建设项目——修路架桥、发放信贷等等无所不包。但是他们并非出自以富济贫那样慈善恻隐之心。不，美国的

所谓援外项目实际上是乘人之危，利用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遭到严重的经济困难谋取私利。而美国人甚至不屑于隐瞒他们的真实目的；他们犯不上操心在他们那自私自利、军国主义的动机之上放块遮羞布。我们早已看出来，当美国的资本家、帝国主义分子、垄断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分子——整整一大帮——蜂拥而来把他们的鼻子伸进亚洲各国的事务之中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会提出各种经援，然后要你在东南亚条约组织上签字。巴基斯坦参加了这个组织，而美国人还试图把印度也给拉进去。但由于尼赫鲁的进步领导，印度拒绝了。从此印度坚定地屹立着，独立于所有的军事集团之外。

当我们在阿富汗访问时，我们很清楚美国人正在渗透进阿富汗，其明显的目地是要建立一个军事基地。

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在阿富汗建成了一个面包厂、一条铁路、一所教育设施，并着手建造百里长的公路。这条公路由于通过阿富汗——伊朗边境，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经济意义。

我们强烈感觉到，我们在阿富汗的投资决不是白白浪费。我们已经赢得了阿富汗的信任与友谊，而阿富汗没有陷入美国人的圈套；并没有让美元制成的诱饵给钓上了钩。

毫无疑问，要阿富汗人不跟我们交朋友，美国人就会想方设法用他们自己称之为“人道主义援助”来巴结阿富汗人。我们对阿富汗进行无偿援助之中所花的钱与我们为对抗美国在阿富汗军事基地的开销相比不啻沧海一粟。想一想为了沿阿富汗边境我方一侧我们为部署军事实力得花多少钱，而这笔花销会吸干我们人民的血汗而不会给生产力增添一丝一毫。

我想我国外交政策应该部分地遵循一个古老的民俗。这个民俗从童年起我就牢记在心头了。要是有一位农妇上邻村问访亲友，她不会不带上一摞糕点——或者在我们库尔斯克州则是十几个鸡蛋——作为家常礼物送给她的亲友。我想应该在国家与国家

之间交往时也采取这个传统。我要提起注意的是：这个习俗要进行得合乎情理，适可而止。要是为了得到一个好心眼儿大叔的名声，给亲友送礼而撒手花钱，以致连自己家去杂货铺买东西的钱都没留下，那就是不费什么心思或技巧的做法。很明显这是一个理应避免出现的极端例子。向别的国家赠送“家常礼物”的作法必须既明智而又适度，使我们的宽宏大量能够经常在经济与政治方面得到报偿。^①

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的敌人一直在窥探方向反对我们，寻找机会企图钻我们的空子。这是场在全世界进行的决定谁战胜谁负的战斗：是工人阶级胜利呢还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相信资产阶级已经黔驴技穷，而资产阶级则以为它的统治是铁打的江山。任何一位思路正常的人都可清楚看到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只能是一个主义战胜另一个主义。

我们共产党人，马列主义者相信进步是在我们一边的，而胜利必将最后属于我们。然而资产阶级决不退让一步，仍要恶战到底。所以我们怎么能侈谈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搞和平共处呢？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可能和平共处的，但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不能和平共处。要是相信以马列主义为一方与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一方之间能够和平共处，那就是对我们党的基本原则的背叛。

我们经常谈及这一点。在那些年主要由我来给我国的政策掌舵的时候，我在新闻发布会上阐明这个问题，我经常说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意识形态上的和平共处。我往往强调我们要战斗到底，而且我们有信心：我们必胜。

所以有时我使用这种说法“我们将要埋葬革命的敌人。”当

^①即使是赫鲁晓夫在此所述的议论，也无法看出来苏联的援外动机与他以为的美国对世界上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援助的动机，有何了不起的差别。

然，我是指美国。敌人的宣传机器拣起了这个口号，把它夸张歪曲得面目全非——“赫鲁晓夫说苏联人民要埋葬美国人民！”我从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敌人曲解并利用我这句早已抛到一边的话。后来我在记者招待会上仔细说明并澄清了我的真正含意：我们苏联并不要埋葬任何人；美国的工人阶级会埋葬它的资产阶级敌人的。我的原话是指将由每个国家自己决定的内部问题：也就是说，通过什么道路或使用什么方法，该国的工人阶级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呢？

当我在纽约时，我对资本主义西方所看到的主要弊端是在这个高尔基曾称之为黄色魔鬼的城市里不是人而是金钱在主宰一切。每个人想到的就是如何弄钱。利润，对资本的追逐而不是人民，成了那里人们关注的焦点。

美国的统治阶层把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描绘为“自由世界”的典范。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那是剥削的自由，抢劫的自由，商品过剩卖不出去而被饿死的自由，当生产设备闲置却无活可干的自由。美国的自由是垄断资本压迫劳动人民的自由，是利用两党制愚弄人民的自由，是美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己军事集团伙伴的自由。这样一种社会只能产生国与国之间打仗的基础，因为对内走向反动，对外扩张侵略，是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特征。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个关键问题。在工人阶级、农民和全体劳动知识分子阶层取得胜利之后，在任何国家都不再存在爆发战争的社会的、民族的或其他方面的根源。但这只能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在整个世界取得完全的支配地位之后，人类从此联合成为一个由彼此平等的各国组成的真正的国际大家庭。这是马列主义的创始人，在很久之前就已指出并给予了科学的证明。

斗争的关键是在每个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之间的斗

争。这一事实与苏联为了保卫它的领土和兄弟社会主义邻邦的领土而建立的常备军规模如何有关。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多年来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斯大林死后不久，有一次我在罗马尼亚与罗马尼亚国防部长波德那拉希同志交谈^①他是苏联的一位好朋友，一个在罗马尼亚监狱里呆了好几年的老布尔什维克，得到我们绝对的信任与尊敬。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是把你们的军队撤出罗马尼亚，你觉得如何？”

我必须承认我对他的建议初步反应是不明智的。我甚至于可以说发了火。“你说的是什么呢？你怎么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是这样，”他解释说，“罗马尼亚只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接壤，除了土耳其人，没有人会从我们这儿跨越黑海。”

“土耳其人过来怎么办？”我问道。

“哦，我们正好与你们是邻居。要是必要的话，你们随时可以来支援我们。”

“我想到的不光是土耳其人。他们控制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所以敌人随时可以指挥登陆部队进入黑海侵犯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人互换了眼色。很明显他们之间事先已经商量过此事了。“那么好吧，”他们说，“要是你是这么想的，那我们撤回这个问题。我们只是不希望你以为我们坚定地与苏联站在一边

^①埃·波德那拉希一开始是罗马尼亚军队中一名炮兵中尉；他加入共产党并于1932年逃入苏联。经过一番折腾，他取得苏联国籍并在莫斯科接受秘密警察的训练。战后回国后，他帮助罗共在苏联武力支持下粉碎所有其他非共产党势力的斗争中非常积极活跃。1947年12月他当上了政治上同路人格罗查政府的国防部长，这就使得罗马尼亚在变成人民共和国时，军队置于共产党人的控制之下。此后他炙手可热，权势越来越大。

是因为有苏军驻扎在我们的领土上。我们立场坚定是因为我们信仰建设中的社会主义，遵照马列主义政策行事，而且因为我们的人民承认我们是他们的领袖，全心全意地支持我们。”他们对提议苏军撤出他们领土的理由作出的解释使我太满意了。我相信罗马尼亚的同志们重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献身精神是真心实意的。

几年之后我们确实削减了苏军，砍去的几乎是斯大林在世时的一半。我们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之间交换意见，并得出结论，我们能从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撤出部队。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没有任何驻军。^①我们只在德国驻有军队。每个人都非常清楚，除非我们过去的盟友——他们组成了北大西洋联盟——同意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我们的军队就得呆在东德。

我们有好几个理由决定把我们的军队撤出兄弟国家。其中一个政治性的。我们不愿任何人以为我们不相信波兰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因为这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苏军驻扎在他们中间。马列主义的国际主义已经成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主要吸引力和凝聚力量。你没有办法把人民哄赶进社会主义乐园，然后派士兵守卫着大门。人民应按他们自己的意愿选择一个更好的生活，他们愿意，就得给他们机会。所以我们要从敌人宣传对手的手中夺走一张王牌。我们要戳穿敌人含沙射影的谎言，似乎是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人民是在苏军枪尖逼迫之下，被驱赶着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当然，要把我军从兄弟国家中撤回来还有一个经济和一个政治理由。在国外维持一个师的军队，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

^①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苏军确实大量削减。斯大林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在捷克斯洛伐克驻军：这是留给勃列日涅夫去修补这个缺口的。但是那时仍有苏联军队驻留在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

土上，其花费两倍于在国内维持一个师的部队。我们得节约在国内和国外常备军的费用。所以我们大刀阔斧地削减军费，特别是在用于人员方面的费用。在我退休不再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之后，我听到有人把在苏军中削减薪金的决定归罪于我的不满反映。我不否认是在我当政时军人工资降低了，但在实际上那是朱可夫元帅的主意。我当然支持他因为非常明显当时确有许多理应节制的过度开支。这些事情是在朱可夫当国防部长，以后是马利诺夫斯基当国防部长时干的。在这里我得给朱可夫说几句公道话。他认识到了在军队中减少开支的必要性，而且他主动从指挥部参谋军官中易于补充的人员中着手下令对某些类别的军官降低工资。

现在，我想你们能找到一些人——特别是从军队之中——，会告诉你们削减苏联军队是一个错误。他们会告诉你们帝国主义陈营多年来一直梦想有机会消灭苏联，而唯一能遏制住侵略者的是我们的武装实力。然而，这样说的人是错误的。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一个国家有多少军队，有多少支步枪，有多少把刺刀，是重要的。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时代。军队、枪支和刺刀的数量已不再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了。现在重要的是我们核导弹武器库的质量与数量。我们的国防以及威慑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依赖于我们的核能力以及热核能力。^①

即使善良的人们他们不愿使用原子弹和氢弹也无法迴避这样的问题：世界大战要是爆发了，我们手头能有多少这样的武器。这正是为何我们必须现实地决定军费拨款的轻重缓急的次序。

当我是党和政府的首脑时，我决定我们必须在住房建设上，公共设施的建造上，甚至在农业的发展上大力节省资金以便给国

^①赫鲁晓夫确实因为贬低常规武器，赞成依赖核威慑而受到极为猛烈的攻击。这也是导致他在1964年10月倒台的幕后推波助澜的因素之一。

防建设让路。我甚至取消了在基辅、巴库和第比利斯的地铁建设，将那些资金转用来加强我们的国防与攻击力量。我们少盖了一些体育场，游泳池和文化设施。我认为我将所有的开销，除了那些在其他部门之中必不可少的全都作为牺牲，集中全力用于军费开支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们没把我们的军事需要给予如此优先的考虑，我们早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我将我的全部精力奉献给苏联的武器更新。这是我们生活之中富于挑战性而且又非常重要的阶段。现在我在过去的记忆中生活，很少再依靠其他东西了。我经常回想起那个时期，当创造性的浪潮汹涌向前时，我们重新武装了苏军。我感到骄傲的是把管着向最新武器系统过渡的重任，竟荣幸地落在我这个部长会议主席和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身上。

我们潜在的敌人——我们主要的，最强大的而且是最危险的敌人——离开我们是如此之遥远，我们的空军竟然够不着它。只有建立一支核导弹部队我们才能阻止敌人对我们发动一场战争。正像生活已经证实的那样，我们要是给了西方一次机会，在杜勒斯还在世的时候，大战就会打了起来。但是我们是第一个把火箭发射到外层空间的，我们爆炸了威力最大的核装置，我们首先完成了这些壮举，抢先赶在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前头。我们的成就与我们明显的军事实力对于美国、英国、法国，当然还有波恩政府内部的侵略势力具有清醒大脑的作用。他们明白已经失去了攻击我们而不受惩罚的机会。

正是由于我们的核导弹武器库的规模大小而不是我们常规军备的数量顶用算数，我认为我们的军队应减少到最小。毫无疑问在我的大脑里我认为我们已经确实到达了那可能到达的阶段。当我领导政府并有权最后决定我们的军费拨款时，我们的科学家计算出我们具有的核能力足以把我们的敌人碾成齑粉，并从那时起我们的核能力已经极大地强化了。在我的领导之下，我们蓄积的

武器足以摧毁美国的主要城市，更不要说我们在欧洲的潜在敌人了。

我记得肯尼迪总统曾经在首次演讲中或是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到美国具有足以消灭苏联两次的核能力，而苏联具有的核导弹只能消灭美国一次。当记者要我回答肯尼迪这一言论时，我开玩笑说：“是的，我知道肯尼迪说了些什么，他说的完全正确。但是我没有怨言，只要总统能明白这一点，这就是尽管他有本事消灭我们两次，我们仍有能力消灭美国，虽然只有一次。我要感谢总统竟能承认这些。我们不是嗜杀成性的人。我们能一下子就把美国消灭已经足够了。一次已经足够。要是能消灭一个国家两次又有什么好处呢？”我的这些话往往引起笑声。

在这方面，我必须给我那已故敌人阿登纳的清醒头脑记上大功一次。每当记者攻击他，指控西德是潜在的侵略者，妄图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时，阿登纳老是装模作样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会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德就会成为第一个被灭亡的国家。”我听到此话十分高兴，而且阿登纳说的十分正确。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如此声明，是我们的一个伟大成就。我们不仅能使我们的头号敌人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但阿登纳还能帮助我们使其他敌人也不敢胡说乱动。

我一向反对战争，但同时，我充分认识到一个国家领导人对核武器的恐惧能够使一个国家的防务陷入瘫痪。而国家防务瘫痪，那么战争就会是不可避免的了：敌人肯定会觉察出你的恐惧并试图利用它来谋利。我经常使用这样一个原则：我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但是决不怕它。有时退却是必要的，但退却也可能成为你的抵抗开始的开始。当敌人监视着你的每一个行动，甚至死亡，也得勇敢地对待。如果敌人对你开战，那么你的责任就是利用一切可能得以在这个战争中活下来，最终取得胜利。

我们永远不能降低我们的防卫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我们的核导弹力量低于必要的水平。还有其他武器在任何突发事件中派上用场，也就是化学武器与细菌武器。幸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使用它们，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要是我们的敌人使用化学或细菌武器对付我们，而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武器，那么我军的处境一定不妙。只要两个对抗的社会制度并存，我们就有义务存贮所有的从事战争的手段。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要使我对提高警惕的重要性，和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威慑力的信念，广为人知，不被他人误解。

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在心，不要忘记所有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者它们的本性就是喜欢从国际紧张局势之中大发横财。我们必须确认我们不会让自己参与在军费开支上与西方进行无谓的竞争。如果我们试图与美国在除了最重要领域之外进行扩军备战的竞争，我们就将作出了两件有害的事情。一是我们就会进一步增加美国富有的、侵略成性的资产阶级阶层的财富，因为他们会把我们的军备集结作为藉口，大量增加他们自己国家的军事预算。二是我们会耗尽我们的物质资源而未能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军队的人数较少，我们就越有更多的人去从事其他生产性的工作。这个认识可以作为世界进步力量在争取和平共处的争斗之时一个很好的共同出发点。如果一方在削减军事手段那么另一方就会很容易地也这么干。我们必须作好准备打退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也得问自己：“这种不断加剧的竞争如何才是尽头？”

我从经验上得知在进行军费拨款时，军队领导人坚持争得他们的份额。每一位司令员都有各式各样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他应该比别人得到更多的钱。不幸的是在带兵的人们中间有一种贪婪和追求私利的倾向。他们动不动就冲着你劈头盖脸地喊道：“今天你要为国防少花钱，明天战争一爆发你就得付出更多的鲜

血。”我不否认这些人具有强烈责任感，我也无法指责他们的道德品质。但是明摆着的事实是国民的生活水平受到损害，因为国家预算让那些非生产性消费部门的拨款压垮了。正因为如此我想军方领导人不要过多地让人提醒，只有政府它必须给钱，而是只有政府才能有权决定军队应该花多少钱。

很明显，控制军费开支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戴维营总统别墅作客时，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了一次交谈。我们在一起散步，无拘无束地聊得很有意思。有一次，他问我，“赫鲁晓夫先生，请告诉我，您是如何决定军费开支问题的？”在我还未来得及张嘴，他就接着说，“也许首先由我来告诉你，我们是怎么作的。”

他微笑了，我对他报以微笑。我能预感出他要说什么。“就是这么回事。我们的将军们找我并说道‘总统先生，我们为了某某战略计划方案需要多少多少钱。’我说，‘对不起，我们没那么多的钱。’他们说，‘据我们得到可靠情报，苏联已经拨款着手在搞这样的项目了。所以要是我们得不到这笔款子，我们就要落在苏联后面啦。’于是我只得听他们的。就是这样他们把钱从我手里榨出来，他们胃口更大了，我也只得给他们。请现在告诉我，您是怎样干的？”

跟您完全一样。我们军事部门一些头头找我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瞧瞧这个！美国人正在发展某个武器系统。我们也能发展同样的系统，得花多少多少钱。’我告诉他们没有钱，款子全都拨光了。于是他们就说，‘要是我们得不到我们需要的钱，要是一打仗，那时敌人就会占我们的上风。’所以我们还得讨论，结果是我把他们要的钱给他们了。”

“是的，”他说，“这正是我想过的。你知道，为了结束这种毫无结果，实际上又浪费的对峙，我们确实得达成某种协议。”

“我很愿这样作。我来此的部分原因就是想看看我们通过会谈与讨论，可否签订某种协议。”

但我们过去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如今也没成。我不明白。也许我们根本就不能意见一致。根据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可以有把握地说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即使苏美双方裁减军费开支的协议告吹，我就恢复我原先的主意，就是说我们要走在前头，单方面地大刀阔斧地削减我们自己的军费。要是我们的敌人要跑在前头增加他的军事预算，把他自己的钱到处花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毫无意义的用场上，那么他一定会降低他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干他就会在自己国内加强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地位，使他们能更为强有力地反对垄断资本的反动势力。

这样你就能明白了。这是我的观点的本质，我想这个观点还不是一无是处。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是什么也干不了了，只有和那些愿意听我的人分享我的经验并且希望有的人不会掉以轻心。现在对我来说再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为时已晚。我作为一个退休的人，作出了这些考察。但是作为一个领取养老金的人，我不能不注意到由我们开始推行起来的节省潮流看起来已经反转潮流，现在有些钱正浪费在不必要的地方，而且这种军费过度开支已经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对某些更为重要但依然得不到足够财政支持的领域造成了拮据的状况。

我当政府首脑时，年青的钢琴家阿什肯纳兹与一位住在我们某个音乐学院学习的英国姑娘结了婚。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并到英国去拜访他妻子的父母。不久以后葛米罗柯向我报告我们在伦敦的大使打电报诉说了这样一件事：阿什肯纳兹来到我们的伦敦大使馆说他老婆不愿回苏联。他很爱她，问我们大使馆该怎么办。我要指出过去我曾听过他的演奏。当他在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中获头奖时，我亲自向他表示过庆贺。他是一位非常好的钢琴家，并在收音机里经常听到他的演奏。我与同志们商讨并提议，“让

我们准许阿什肯纳兹在英国居留，他爱呆多长时间就呆多长时间。那么着他就能经常回到苏联。我们确实别无良策。要是我们坚持要他与他的妻子离异并回国，他就会拒绝。他并不反苏，但是我们把他置于这样的窘境：要么选择与他妻子呆在一起，要么服从政府的命令，那就能把他变化成个反苏份子。他马上就会落进白俄移民的手心，而其他反动分子也会对他大作文章，把各种反苏的念头灌进他的脑袋里。我们不愿发生那样的事。要是他生活在伦敦同时又保持他的苏联国籍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他可以随时回到莫斯科举行音乐会。毕竟他是一位音乐家，而那是一种自由职业者。”

大家都同意了，并接受了我的提议。

这些天来，我常常收听收音机，当我出去散步，收听机成了我的经常伴侣。从它那儿得到信息和乐趣。我爱民间音乐和民歌。我也喜欢一些现代音乐。但是我得承认象我这样年龄的人更倾向于喜爱他年青时代的东西。大多数广播节目非常好，但是污染空气的糟粕也有相当数量。每当我打开收音机听到宣布阿什肯纳兹来莫斯科举行音乐会的消息就特别高兴。我高兴的是我们维护了他作为苏联一位伟大的钢琴家的好名声，并在此过程中挽救了他的家庭生活。也许有一天阿什肯纳兹和他的妻子愿意回来，永远在莫斯科定居下来。也许他们就在伦敦住下了。我无法排除这个可能性。可这又有什么关系。让他想住在哪儿就住在哪儿。我想有这么一天每个苏联公民都可以这样自由选择。如果他要离开我国，想在其他地方呆几年，行呀；我们应该给他这个机会。如果苏维埃政权在它出世50年以后，还要把这个地上天堂锁得严严实实的，对我来说，那可是太难以置信了。①

①在1969年8月，苏联外交官把阿什肯纳兹当作苏联艺术家可以自由出入苏联国境的例证。阿什肯纳兹把这个论断称之为虚假的。他说，“当苏联官方发言人说我在俄国和西方之间可以按我的意愿自由去留时，这是对事实真相巨大而不公正的歪曲。”

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资本主义是劳动人民在其中惨遭奴役的地方。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成功。在未来我们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我们的生活方式无疑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再一次使用圣经里的语言，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的地上乐园。这不是在这种意义上的乐园，在那里遍地流淌着乳汁与蜂蜜，你只要把嘴张开天上就会掉下馅饼。不，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乐园，——至少现在还不如如此。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一天我们会成为那样的乐园。但是如人们说的那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拿我们与资本主义相比，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我们已经作成了许多事情，而且已经创造了条件去获得更为伟大的成功。

所以，我们干吗要跟自己过意不去呢？为什么在我们为了人民建设了幸福生活之后，又用7把锁把边境紧急地锁上呢？有时我们苏联公民自我嘲讽说：“于是，你就用根大棒把我们全都赶进了乐园，是不是？”当强制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其他政治运动蓬勃开展之时，人民就惯于这样抱怨。我认为现在是向全世界表示我们的人民是自由的时候了，他们自觉自愿地劳动工作，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完全出自他们内心的信念而不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别无选择。

我毫不怀疑开放我们的边界不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切实可行的。要是连这个都不行，那我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确实，我知道有人会争辩说，“你瞧，我们有个具有阶级结构的社会，因此我们不能让无产阶级的敌人随便地自由来去。”对那些善于思考的人来说，那时是我们为求生存而奋斗的异常时期。50年以前我们消灭了敌对阶级，而在（今日的）苏联任何提出阶级敌人的幽灵还存在的争论，只有傻瓜才相信。

在我任职期间有另一件事，我想它可以说明我们如何来清除关闭边境这一不体面的传统。它好似锁在苏维埃国家良心的一条

铁链。我们最棒的芭蕾舞女演员是玛雅·普利谢茨卡娅——她不仅是苏联，也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每当莫斯科大剧院出国演出，她总是排除在外。有人向我报告说她不保险，出去就回不来了。是的，我本人并不认识她。我甚至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我不清楚她的态度如何。毫无疑问的是，要是谁具有普利谢茨卡娅那样显赫的声誉突然脱离苏联，这肯定是很不令人愉快的事件。她的叛逃对西方的反苏宣传是很有用的，而我们都会被深深地刺痛。

于是有一天，某个芭蕾舞团准备好出国演出。玛雅·普利谢茨卡娅给我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我这个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信写的很长，直言不讳。她写道她是个爱国者，对她表示不信任伤害了她，也侮辱了她。我把她的信复印了交给主席团其他成员传阅。我提出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由我推荐允许她出国演出。有人怀疑她可能出去就不再回来。“有可能”，我回答道。“这是可能发生的事。即使我对她并不了解，但我信任她。不相信人民是活不下去的。如果她写这封信存心不良，如果她只是想要骗我们好让她得以出走…好，那当然是我们的一个巨大损失，而且让我们十分难堪。但是我们能活下去。”

玛雅·普利谢茨卡娅出国演出去了。给我的报答是她在国外一次又一次的辉煌表演。她给苏联芭蕾舞和苏联文化增添了荣誉。然而她回来了。这是在建设一个普列谢茨卡娅作为公民引以为荣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为它贡献的劳动所获得的报偿。

如果我们还是在搞我们那个“不得出国”的政策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继续把玛雅·普利谢茨卡娅牢牢靠靠地关起来，又会怎样呢？也许我们已经把她变成一个跛拐的残疾人，同时又是反苏意识很强的人了。人类心理是件非常脆弱的东西。对它必须极为尊重地对待。一个鲁莽大意的动作就足以使它致命地丧失平衡。我为决定让玛雅·普利谢茨卡娅出国演出而感到骄傲，我

还为她能十分得当地理解了我们对她信任的表示而感到欣慰。

如果我们开放我们的边界，是否有可能个别人会背叛我们对他们的信心与信任？当然是有可能的。在2.4亿人口中你一定可以找出几个不纯分子。就象质轻的、不坚实的东西在溶液里会浮上来一样，这些不纯分子也漂浮到水面上来。所以让那些社会垃圾、残渣余孽、糟粕全都浮上水面，让滚滚波涛把它们带到远离我们的彼岸去吧。我在这里所说的完全符合列宁在革命最初那几年的政策，当时我往往将苏联的敌人放逐到国外去。所有那些愿意离开的人不会有人去拦他们。“你们要走吗？”我们告诉他们。“好吧：背起你的铺盖卷，滚出去吧！”于是他们走了。

现在50年过去了，我们已经不再在人们中找寻叛徒了。我们不再为我们国家里保存那些渣滓和污垢来制定我们的边境政策。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应被称作糟粕的人们——这些人可能对自己的信心有过暂时的动摇，或是要去尝一尝资本主义地狱的滋味。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仍然看起来对我们某些不够坚定的分子是具有吸引力的。我们不把这些入圈起来。我们得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瞧一瞧那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儿。

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改变我们的立场，我恐怕作为我们苏联生活方式基础的马列主义理想，就会被我们弄的名誉扫地了。

——译于1988年8月30日

附录一：

赫鲁晓夫生平年表

- | | | |
|---------|-------------------------------------|--|
| 1894 | 4月17日出生于靠近乌克兰边境库尔斯克州的加利诺夫卡 | 沙皇尼古拉二世登位 |
| 1903 | | 列宁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党代表会上把该党分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 |
| 1904-5 | | 日俄战争 |
| 1905 | | 1905年革命 |
| 1906 | | 召开第一届杜马（议会） |
| 1909 | 移居到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尤索夫卡（现在叫顿涅茨克），父亲在那儿煤矿工作 | |
| 1909-12 | 在尤索夫卡一家鲍谢工厂学机械装配工 | |
| 1912-18 | 在法国人开办的鲁钦科夫和帕斯图霍夫煤矿的发电厂当机械装配工 | |
| 1914 |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
| 1915 | 成了《真理报》的热心读者 | |

- 1917 参加矿工的政治会议和群众集会，与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相识 爆发二月革命；沙皇退位；组成临时政府
十月革命；列宁领导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 1918 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组织
- 1919 加入红学
- 1919-21 在属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的第九步兵师服役和做党的工作；参加了向黑海边进攻的战斗
- 1921 第一个妻子饿死 发生饥荒，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
- 1922 从前线返回尤索夫卡；被尤索夫卡党组织任命担任鲁钦科夫矿上的副经理
经批准去尤索夫卡矿工专科学校学习。
- 1923 在尤索夫卡工人专科学校学习时担任了学校政治领导人
- 1924 在尤索夫卡党组织里身兼数职 列宁逝世
与尼娜·彼得罗夫娜结婚（第二个妻子）
- 1925 任斯大林诺州（原名叫尤索夫卡）的罗夫斯科—马林斯区委书记出席卡冈诺

- 维奇主持的乌克兰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列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四次全苏党代表大会（无选举权），首次见到斯大林
- 1926 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乌克兰党代表大会的公开发言首次被记录下来
- 1927 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五次全苏党代表大会由斯大林诺一个区的领导提拔到州级机关工作
- 1928 被卡冈诺维奇召到哈尔科夫出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组织部第一副部长
被卡冈诺维奇提升为基辅党组织的组织部长
- 1929 35岁，申请去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学习冶金专业
- 1929-30 斯大林工业学院的政治工作者和学生；在学院未能选上出席第十六次党代会代表；失去基层党组织核心成员资格
在学院里领导开展“维护党的路线、反对右派分子、寄生虫和‘遗老’的
- 斯大林发起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运动
-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打败
- 实行第一个5年计划，推行农业集体化
- 卡冈诺维奇调到莫斯科
- 托洛茨基被放逐

斗争

在学院与斯大林妻子党组织工作人员娜杰日达·阿里露也娃交上了朋友

派往萨马拉州视察斯大林集体农庄，首次目睹了集体化情况，被麦赫利斯看中，选为学院亲斯大林势力的领导人，主持会议，取消了参加鲍曼区党代会的“右派分子”的代表资格；率领新的代表出席会议

1931 当选鲍曼区第一书记；半年后，提升为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第一书记

1932 没有毕业就离开了斯大林工业学院，提升为卡冈诺维奇领导下的莫斯科市党委的第二书记

与在莫斯科市政府工作的列宁遗孀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交上了朋友

1933 任莫斯科州党委第二书记；在卡冈诺维奇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了莫斯科的市政建设和地铁建设

1934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里露也娃去世

基洛夫被暗杀

- (“胜利者”的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 1935 接替卡冈诺维奇出任莫斯科市和州的第一书记
- 1936 血腥清洗、极端恐怖、公开审判的年代开始了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审并被处死(8月)
叶若夫接替雅格达出任秘密警察头目(9月)
- 1937 奥尔忠尼启则去世(2月)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一批将军被处死(6月)
- 1938 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布哈林及李可夫受审(3月)
贝利亚取代叶佐夫(12月)
- 1939 出席中央委员会2月全会，卡明斯基在会上谴责贝利亚；卡明斯基随即失踪
当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3月)
- 以乌克兰第一书记、基辅军事委员会文职成员身份，进入西乌克兰(被占领的波兰)
- 1939-40 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签字(8月)
冬季对芬作战(1939年11月—1940年3月)

- | | | |
|---------|------------------------------------|---|
| 1940 | 在西乌克兰领导建立苏维埃政权 | |
| 1941-43 | 战时作为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代表，以中将衔身份出任好几个方面军的政委 | 德国人入侵俄国（1941年6月）；开始“巴巴罗萨”入侵计划
基辅陷落（1941年9月）
莫斯科战役（1941-42年冬天）
哈尔科夫惨败（1942年5月）
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7月至1943年冬天）（实际是1943年春—译者注）
库尔斯克战役（1943年夏） |
| | 开始重建乌克兰经济和党组织 | 基辅解放（1943年11月）
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 |
| 1944 | 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同时保留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 | 苏军向柏林进攻（春天）
盟国在法国登陆（6月） |
| 1945 | 在莫斯科见艾森豪威尔

率领专家委员会帮助波兰重建华沙 | 苏军占领柏林（5月）
莫斯科举行游行庆祝胜利（6月） |
| 1946-47 | 暂时失宠并降级；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被卡冈诺维 | 乌克兰闹饥荒 |

- 奇取代；差点死于肺炎
- 1948 再次独揽乌克兰大权 斯大林与铁托闹翻
- 1949 被斯大林召到莫斯科，出任莫斯科党组织第一把手（12月） 列宁格勒案件
- 1950 主管全国农业；集体农庄合并及推行农村城镇化计划 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关于语言问题的信件
朝鲜战争爆发
- 1952 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0月） 斯大林让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会上作总结报告
- 1953 医生阴谋案（1—2月）
名列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之后 斯大林去世；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和中央第一书记（3月）
取代马林科夫出任第一书记（9月）
- 1953 带领布尔加宁访问北京
开始推行垦荒运动
- 1955 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讲和）；出访阿富汗、印度（“我们将埋葬你们！”） 布尔加宁取代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
- 1956 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2月）
访问伦敦（4月） 波兰的挑战（6月）
苏伊士运河危机（10—11月）

- 1957 工业管理开始权利下放
(5月)
粉碎了“反党集团”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谢皮洛夫等人——的反抗
(7月)
解除朱可夫元帅国防部长职务(10月)
- 匈牙利造反(10月)
- 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0月)
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前往参加(11月)
- 1958 接管布尔加宁的部长会议主席工作(3月)
- 中东危机(7月—8月11日)
柏林第一次危机(8月)
- 1959 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武器资料(夏天)；首次访美，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多次磋商(9月)
- 1960 宣布击落U-2侦察机并俘获飞行员加利、鲍尔斯(5月)
破坏了巴黎首脑会议(5月)
在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党代会(6月)及世界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上“关起

- 1961 门来”攻击中国（10月）
- 加加林少校首次太空游行（4月）
- 与肯尼迪总统在维也纳会晤
- 第二次柏林危机（6月）
- 在第二十二次党代会上以攻击阿尔巴利亚为名，行攻击中国之实
- 把斯大林的遗体从陵墓中移出
- 1962 向古巴运送导弹，几乎濒临战争边缘——然后又退了回去（10月）
- 1963 对作家和艺术家采取严厉措施
- 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8月）
- 农业严重歉收
- 1964 准备在预定于12月召开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与中国公开摊牌，辞去一切职务；第一书记由勃列日涅夫继任，部长会议主席由柯西金担任（10月）

附录二：

秘密报告

（根据1956年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译文）

同志们！在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在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的发言中，以及在过去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对个人崇拜及其有害的后果，已经讲了很多。

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便开始执行一项开导性的政策，就是要简明扼要地和彻底地阐明：吹捧某一个人，把他当成具有神人般超凡出众特性的超人，是不允许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这种人往往被想象为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的人思考，会办好任何事情，他的行为没有一点错误。

许多年来，我们对一个人的信念，具体地说，对斯大林的信念，便是这样被培植起来的。

这个报告的目的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作全面的评价。斯大林的功绩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有足够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著作讲过了。斯大林在准备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每个人对此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此刻要谈的问题，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即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如何逐步发展起来的。这种个人崇拜到某一特殊阶段竟成为一系列极其严重地违反党的原则、违反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个人独揽大权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所以，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把与这个问题有关材料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知道是绝对必要的。

首先请允许我提醒大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是怎样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的。马克思在致德国工人政治家威廉·布洛斯的一封信中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①

后来恩格斯写道：“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人举行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除非这样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②

革命的天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极为谦虚是闻名的。列宁总是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具有创造力的机体的指导和组织作用，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工人阶级的领袖在指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肯定群众领袖和组织者的作用有极大重要意义的同时，无情地痛斥了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毫不宽容地反对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关于“英雄”与“群氓”的观点，反对把“英雄”同群众和人民对立起来的一切努力。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9页。

②同上书，第22卷第309页。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靠的是与群众牢不可破的团结，靠的是有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紧跟着党这一事实。列宁说：“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①

列宁曾自豪地说，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要求把一切最重要的问题提请有见识的工人提意见，提请他们的党提意见；他说：“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作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②

列宁坚决反对旨在缩小和削弱党在苏维埃国家组织中的指导作用的各种企图。他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指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强调党实行领导的指导原则是党的集体性。早在革命后的年代里，列宁就把党中央委员会称为一个领导者的集体，称为党的原则的捍卫者和解释者。列宁指出：“在两届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中央委员会捍卫和解释党的原则。”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及其权威的时候指出：“我们中央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高度集中和拥有高度权威的集团……”

列宁在世时，党中央委员会真正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列宁是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都从未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他的共事者。他力图说服人，耐心地向别人解释自己的看法。列宁总是孜孜不倦地注意党的生活准则的实现，党的章程的执行，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定期举行。

弗·伊·列宁除了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对我们党的胜利，对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运用到生活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第273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5卷第251页。

外，他的敏锐的头脑还表现在他及时地觉察到斯大林身上那些后来造成严重后果的消极的品质。弗·伊·列宁在担心党和苏维埃国家未来的命运时，对斯大林的品质作了完全正确的说明，指出必须考虑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上调开的问题，因为斯大林太粗暴，对待同志没有正确的态度，他任性和滥用权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22年12月致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①

这封信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政治文件，在党的历史上以列宁的“遗嘱”著称，已经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中间散发。你们都读过了，而且无疑会不止一次地读过它。你们也许考虑过列宁这些直率的话语，这番话体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对未来党的政策方向的担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②

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知道列宁的这份文件，并讨论了把斯大林调开总书记职位的问题。代表们宣布他们赞成保留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希望他能注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批评，并能够克服那些引起列宁严重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党代表大会应该知道两份新的文件，这两份文件证实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其“遗嘱”中已经勾划出的斯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6卷第617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6卷第618页。

大林的品质。这两份文件一份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致当时的政治局首脑加米涅夫的信，另一份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致斯大林的亲笔信。

现在，我念一下这两份文件：

列甫·波利索维奇：

由于我记录了米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大发雷霆。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没有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鲁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事业，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同伊里奇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更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这无论如何也比斯大林清楚。我要求助于弗·伊的更为亲密的同志你和格里哥里，请求你们保护我，不要让人粗暴地干涉我的私人生活，不受无端的辱骂和威胁。斯大林以为可以用监察委员会来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将作出意见一致的决定，但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无谓的纠纷。我是一个活人，我们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娜·克鲁普斯卡娅^①

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是在1922年12月23日写这封信的。二个半月以后，1923年3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寄给了斯大林下面这封信：

弗·伊·列宁致斯大林同志的信（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①参见《列宁文稿》第10卷第610页。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鲁地要求我的妻子接电话，并且辱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过的话，但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儿知道了这件事。我无意就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您仔细斟酌。〔大厅内一片骚动〕

致敬

列宁

1923年3月5日^①

同志们！我不想评论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问题。既然列宁在世时，斯大林竟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够这样地对待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这位党十分了解并且评价很高的、列宁的忠实朋友和我党创建时起就为其事业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我们便不难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人的。他的这些不良品质有增无已，而近几年来已具有绝对不能容忍的性质。

后来的事件证明，列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注意他的〔列宁的〕忠告，但是后来就开始无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严重告诫了。

当我们分析斯大林指导党和国家的实践的时候，当我们冷静下来考虑斯大林的一切所作所为的时候，我们必定确信，列宁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在世时还只是一点苗头，但在最近几年已经发展到严重滥用职权的地步，这给我们党造成了难以形容的损害。

^①参见《列宁文稿》第10卷第314页。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正确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我们可以杜绝以任何形式重演斯大林生前发生过的事情的可能性。斯大林是绝对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的，因为他总是以粗暴蛮横的态度对待一切不顺从他的事情，对待不迁就他任性和专断的脾气而与他观点相反的意见。

斯大林的作风不是通过说服、解释而耐心地与人协作，而是把他的观点强加于人，要求绝对服从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的观点，或者试图辩明自己的观点和证明自己的立场正确的人，都注定要被调离领导班子，并随即在精神和肉体上被消灭掉。这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内有尤为确凿的事实，当时有许多忠心耿耿地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制主义的牺牲品。

我们必须肯定，党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斗争，从而在思想上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这场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结果使党变得力量巩固，并受到了锻炼。斯大林在这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领导了一场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反对自己队伍里那些抛出反列宁主义提纲、提出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为敌的政治路线的人。这是一场顽强而艰巨却又十分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要引向复辟资本主义和投降世界资产阶级。我们想一想，假若1928—1929年右倾的政治路线在我们当中得势，或者把方针转向“棉衣工业化”或转向富农等等，那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就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解除了武装而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软弱无力。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党领导了一场不屈不挠的意识形态斗争并且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说明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提出反列宁主义建议的危害性和危险性。这一解释党的路线的伟大工作取得了成果，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被孤立了，绝大多数党员支持列宁主义路线，使党得以唤醒和组织工人群众运用党的列宁主义去建设社会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进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人的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进程中，也没有对他们采取极端的镇压措施。这场斗争是在意识形态范围内进行的。但是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在我国基本上建成，剥削阶级大体上被消灭，苏联的社会结构已根本改变，仇视党的政治运动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削弱，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对者在政治上早已破产的时候，却开始了对他们的镇压。

正是在这一时期（1935—1937—1938年）出现了通过政治机关实行的大规模镇压，起初反对的是列宁主义的敌人，即早已在政治上被党击败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随后便转为反对许许多多忠实的共产党员，甚至反对这样一些党的干部，他们原都是在内战中，在工业化和集体化初期最艰难的岁月里勇挑重担的人，都是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过积极斗争而捍卫了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人。

斯大林创造了“人民的敌人”这一概念。有了这个词，一个人或一些人在争论时的意识形态上的错误就自动地无需再证实了；有了这个词，就有可能违反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而使用最残酷的镇压，来反对在任何方面与斯大林持不同意见的任何人，反对那些仅被怀疑有敌对意图的人，反对那些具有坏名声的人。

“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实际上消除了进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排除了使得一个人在这个或那问题甚至一些实质性问题上表明自己观点的可能性。实际上采用的、与现行法学一切准则相违背的、唯一的主要罪证就是被告者本人的“供词”，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供词”往往是通过对被告的肉体上的镇压

获得的。

这就导致了公然地践踏革命法制，而使很多过去捍卫过党的路线的完全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我们必须断言，对待那些当年反对过党的路线的人，也常常没有足够重要的理由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人民的敌人”这种公式化的提法，是专为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而提出的。

事实上，后来很多被当作党和人民的敌人而消灭的人，都是列宁生前的共事者。其中一些人在列宁在世时犯了一些错误，但尽管这样，列宁还是得力于他们的工作，因而他纠正了他们的错误，尽可能做到把他们留在党的队伍里，劝说他们跟他走。

在这方面应该让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知道弗·伊·列宁1920年10月给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项没有发表的手谕。列宁在概述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写道，监察委员会应该成为一个真正“党的和无产阶级良心的机关”。

作为监察委员会的特别任务是对待所谓反对派的代表要关怀和有区别，甚至时常象真正治病那样对待他们；他们由于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心理上的恐慌。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就此向中央组织局提出建议和指示等等。^①

每个人都知道，列宁是怎样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与背离党的正确路线的人势不两立的。但是同时，从已提供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列宁在指导党的实践中，要求党同那些犹豫不定或者和党的路线暂时不一致、但仍有可能回到党的道路上来

^①《列宁文稿》第3卷第275页。

的人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列宁告诫说，对这种人应该进行耐心教育，不要使用极端的办法。

列宁待人的智慧明显地表现在他与干部的工作中。

斯大林在与人的关系上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列宁的特点是：对人进行耐心的工作，顽强而费尽苦心地教育他们；有能耐不使用强迫手段而宁肯通过集体对他们进行思想影响的方式，来诱导他们跟他走，而这些都是斯大林完全没有的。他〔斯大林〕丢掉了列宁主义说服和教育的方法；他抛弃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方法，而采用了行政暴力、大规模镇压和恐怖的方法。他愈来愈大规模地和更加固执地通过惩罚机关行事，同时常常违反一切现行道德规范和苏维埃法律准则。

一个人的任意行事便助长和容许了另一些人的为所欲为。大规模逮捕和成千上万人被放逐，以及不经审讯和正规调查而加以处决，使人处于不安全、恐惧、甚至绝望的境地。

这当然无助于党的队伍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反而使一些忠实的、但斯大林觉得碍手碍脚的工作人员被消灭和被开除出党。

我们党曾为完成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而斗争过。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只要我们在这一斗争过程中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只要我们善于把党对原则的忠诚与对人的热情关怀结合起来，而这些人既没有被排斥和干掉又都吸收到我们这方面来了，那么我们就决不至于出现这种粗暴的、违反革命法制的情况，成千上万的人就不会沦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我们就只是对那些确实犯了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罪行的人诉诸非常手段。

让我们来回忆一些历史事实吧。

在十月革命前的日子里，布尔什维克党的两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宣称他们反对列宁提出的武装起义计划。加上10月18日他们在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上发表一

则声明，宣称布尔什维克正在准备起义，他们认为这是冒险行动。这样，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把中央委员会举行起义的决定，以及不久即将组织起义的情况泄露给了敌人。

这是一种反党和反对革命的通敌行为。弗·伊·列宁曾就此事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泄露了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①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的问题。

但是众所周知，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仍然给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领导地位。列宁把他们安排在执行最负责的党的任务和积极参加党和苏维埃领导机关工作的职位上。众所周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列宁在世时还犯有许多其他严重错误。列宁在其“遗嘱”中告诫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②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他们，更没有提出枪毙他们的问题。

或者让我们举托洛茨基作例子吧。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后，现在我们可以完全平心静气地谈论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并且可以充分客观地来分析这个问题了。托洛茨基周围有一批人，他们的出身无论如何毕竟不能追溯到资产阶级社会中去。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属于党的知识分子，一部分人则是从工人当中吸收来的。现在还能叫出很多当时加入托洛茨基一伙的人的名字；但是，就是这些人在革命前、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期间以及巩固这一最伟大革命胜利时，积极地参加了工人运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与托洛茨基主义决裂了，回到了列宁主义的立场。难道有必要消灭这种人吗？我们深信，只要列宁还活着，就决不会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第205页。

②同上书，第36卷第617页。

这只是几个历史事实而已。难道能说，列宁在确属必要时也没有对革命的敌人果断使用最严厉的手段吗？不能，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对革命的和工人阶级的敌人采取决不调和的态度，必要时毫不留情地诉诸这种手段。大家只消回忆一下弗·伊列宁与组织反苏维埃暴动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以及1913年反革命富农和其他人的斗争，当时列宁毫不犹豫地对敌人采取了最极端的措施。但是，列宁只是对真正的阶级敌人，而不是对那些犯有大小错误、能够通过思想影响对诱导、甚至能够保留领导职位的人采取这种措施。

列宁只是在最必要的情况下，在剥削阶级还存在而且激烈反对革命、生存斗争决定性地采取最尖锐的形式，甚至是一场内战的时候，才使用严厉的手段。

反之，斯大林是在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苏维埃国家增强了实力，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关系已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确立起来，我们党已在政治上得到巩固并在人数上和思想上得到加强的时候，使用了极端手段和大规模镇压的。很明显，斯大林在一整串的事件上都表现出他的偏执、他的残忍和滥用职权。他不是政治上以身作则、动员群众，而是经常采取镇压和从肉体上消灭的方法，既对付那些真正的敌人，也对付那些对党和苏维埃政府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人。我们从中看到的不是智慧，而是已经让弗·伊·列宁十分警惕的横蛮暴力的表现。

后来，尤其是在揭露了贝利亚一伙以后，中央委员会审查了一系列由这一伙捏造的事情，从而揭示出与斯大林错误行为有关的胡作非为的非常恶劣的情景。事实证明，斯大林利用他不受限制的权力，得以大肆滥用其职权，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行事，而既不征求中央委员的意见，甚至也不征求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意见；他经常不把与党和政府关系非常重大的事情的个人决定告诉他们。

我们在考虑个人崇拜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向大家说明这给我们党的利益造成了什么危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总是强调党在指导社会主义工农政府中的作用和重要性；他认为这是在我国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列宁在指出作为苏维埃国家的执政党布尔什维克的重大的时候，要求一丝不苟地遵守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要求在指导党和国家时实现集体性原则。

领导的集体性是随着我党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的性质而来的。列宁说过：“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来处理；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是必须向党员作工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①

众所周知，列宁亲自树立了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原则的榜样。任何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都是无不征求过大多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和同意而从未擅自决定的。

在我们党和国家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列宁认为必须定期召开代表大会、党的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把所有最重要的问题交给这些会议讨论，把领导集体仔细制定的决议提交这些会议通过。

例如，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918年，那时代我国已受到帝国主义干涉者进攻的威胁。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就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以便讨论一个生死攸关而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和平问题。1919年，当内战正在进行的时候，召开了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决定了以下这些重要问题：与农民群众的关系、红军的组织、党在各级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改正党的社会成分，以及其他问题。1920年，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制定了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1卷第418页。

党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工作的指导原则。1921年，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称为“关于党的统一”的历史性决议。

列宁在世的时候，党的代表大会是定期召开的；每当党和国家的发展发生根本转折的时候，列宁总是认为有绝对必要让党详细地讨论国内外政策方面所有的基本问题，以及对党和政府的发展有影响的问题。

十分典型的做法是，列宁把党代表大会当作党的最高机关，向它呈递自己最近的文章、信件和评论。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内，作为最有权威的领导集体行使权力的中央委员会，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守党的原则，执行党的政策。

列宁在世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以后，我党的神圣的列宁主义原则遵守了吗？

在列宁逝世以后的头几年中，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是比较定期举行的。但后来，在斯大林开始愈来愈滥用职权的时候，就粗暴地违反了这些原则。这一点在斯大林在世的最后15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之间竟间隔13年之久，可是这一期间我们党和国家经历了许多重要的事件，而这些事件绝对要求党必须通过关于在卫国战争期间保卫祖国和战后和平时期搞建设的种种决议，但甚至在战争结束7年以后仍没有召开代表大会，这种情况难道是正常的吗？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几乎没有召开过。只消指出一个例子就够了，即在卫国战争的整个时期内，没有举行过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确，在1941年10月曾试图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当时已经把全国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都召集到莫斯科来了。他们等待召开全体会议却白等了两天。斯大林甚至不想会见中央委

员会委员和与他们谈话。这一事实表明斯大林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是多么灰心丧气，对中央委员会委员多么傲慢和蔑视。

斯大林在实践上无视党的生活准则，践踏了列宁主义关于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斯大林对待党和党中央委员会的任性胡为，在1934年举行的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中央委员会在掌握了大量表明对待党的干部恣意妄为的材料后，建立了一个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控制的党的特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调查何以造成对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原因。

这个特设委员会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其他文件，证实了对共产党员进行陷害和诬告的案件，以及粗暴地滥用社会主义法制的许多事实——其结果是无辜者的死亡。事实很明显，很多1937至1938年被诬蔑为“敌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经济活动家，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而始终是忠实的共产党员；他们只是而且常常是无法忍受野蛮的刑讯的时候才接受这样的诬蔑，他们（奉检察官——伪造者之命）自认犯有各种莫须有的严重罪行。这个特设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了有关大规模镇压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详尽的文件材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研究了这些材料。

已经确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逮捕和枪决（大部分于1937至1938年）。〔大厅内群情激愤〕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的成分如何呢？众所周知，当选参加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人，80%是在革命前的秘密工作年代里和在内战期间参加党的；这就是说，是在1921年以前参加党的。根据社会出身来看，代表大会代表的基本群众是工人（占当选成员的

60%)。

因此，要说这样组成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其大多数成员竟被证明是党的敌人，那是不可思议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70%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被诬蔑为党和人民的敌人的唯一理由是：忠实的共产党员遭到了诽谤，对他们的控告是捏造的，革命法制被严重地破坏了。

遭到同样命运的不仅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有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在有选举权和咨询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绝大多数，都以反革命罪名被捕了。这一事实本身表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对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犯有反革命罪的指控是多么荒唐、野蛮和违反常识。〔大厅内有愤慨之声〕

我们应当回忆起，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在历史上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著称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当中很多人在革命前的秘密工作年代里和在内战前线历经了千辛万苦，为党的利益而奋斗；他们与敌人英勇战斗，常常面对死亡而泰然自若。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这种人可以肯定为“两面派”，会在政治上消灭了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以后的时代去参加社会主义敌人的阵营呢？

这是斯大林滥用职权，开始对党的干部使用大规模恐怖手段而造成的结果。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日益增加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当时斯大林把自己置于党、置于国家之上，以致他既不再考虑中央委员会，也不再考虑党。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前，他还能考虑集体的意见，但在政治上完全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以后，在这一斗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使党臻于统一的时候，斯大林就越来越不再

考虑党中央委员会，甚至政治局委员了。斯大林认为，现在他可以单独一个人决定一切，他唯一需要的就是统计学家；他对待其他一切人的方式就是只要求听从他和赞扬他。

在谢·朱·基洛夫被罪恶地谋杀以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和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行为。1934年12月1日晚上，根据斯大林的倡议（这是在没有征得政治局同意的情况下——政治局在两天以后非正式地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叶努启则签发了下面的指令：

1. 指示调查人员迅速审查那些被控告为准备或实行恐怖活动的人的案件。

2. 指示司法机关不要停止对犯死罪的人执行死刑来考虑可否赦免，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不可能考虑接受这种申请。

3. 指示内务人民委员机关对上述罪犯一经判决后立即执行死刑。

这一指令成了大规模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动的依据。在很多被捏造的庭审案件中，被告者被控告为“准备”恐怖行动；这就使这些人丧失了对他们的案件进行复查的任何可能性，即使他们向法院声明他们的“供词”是逼出来的，或者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驳斥了对他们的控告也无济于事。

必须断言，与基洛夫被暗杀事件有关的情况背后，至今还掩盖着很多令人不解的神秘的事情，需要经过最仔细的调查。有理由怀疑，暗杀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也夫是有人作帮手的，这个人就是负责保卫基洛夫人身安全的人中的一个。暗杀前一个半月，尼古拉也夫曾以有可疑行为而被捕，但是甚至未经调查便释放了他。一个很不寻常的可疑之处是：当1934年12月2日传讯被指派保护基洛夫的那名契卡人员时，他在一次车“祸”中被弄死了，而车上的其他人却无一人受伤。在基洛夫被暗杀以后，对列

宁格勒内部的高级官员们判刑很轻，但在1937年他们都被枪决了。我们可以设想，枪决他们是为了掩盖暗杀基洛夫的组织者的踪迹。〔大厅内出现燥动〕

大规模镇压是在斯大林和日丹诺夫1936年9月25日从索契打电报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政治局其他委员以后，从1936年底骇人听闻地发展起来的。这封电报内容如下：

“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职务是绝对必要和不容迟延的。雅哥达已显然没有能力揭发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落后了4年。所有党的工作人员和大多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严格地说，我们应该着重指出斯大林决不会会见党的工作人员，因此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意见。

所谓在实行大规模镇压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落后了4年”和必须“赶快弥补”被忽视了的工作这一斯大林主义的论断，直接推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走上了实行大规模逮捕和处决的道路。

我们应该说明，这一论断还强加给了1937年2、3月间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决议认可这一论断，根据的是叶若夫的报告《从日本和德国托派特务的危害活动、离间和间谍活动中汲取教训》决议说：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在对反苏托洛斯基分子中心及其各省追随者一事进行调查期间暴露出来的所有事实表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试图揭发这些最顽固的人民的敌人方面至少落后了4年。

大规模镇压当时是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口号下进行的。那时托洛茨基分子是否确实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构成了这种危险呢？我们应当回忆一下，1927年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夕，只有4000人投票赞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而有72.4万人投

票赞成党的路线。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和2.3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间的10年期间，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彻底破产了；很多以前的托洛茨基分子已经改变了他们先前的观点，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部门中工作。很清楚，在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的形势下，国内没有实行大恐怖的事实根据。

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就带有从理论上为大恐怖政策辩护的企图，其借口是当我们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候，据说阶级斗争必定会尖锐化。斯大林断言，这是历史和列宁教导他的。

列宁实际上教导说，由于剥削阶级的反抗，使用革命的暴力是必要的，而这指的是剥削阶级还存在并且很强大的时代。当全国政治形势好转而于1920年1月红军攻克罗斯托夫从而赢得对邓尼金的最重要胜利时，列宁就立即指示捷尔任斯基停止实行大规模恐怖并废除死刑。列宁在1920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用下面的方式说明了苏维埃国家采取这一重要政治行动是正确的：

协约国的恐怖主义迫使我们实行了恐怖。因为称霸世界的大国不择手段，用大批军队压到我们头上。假使我们对军官们和白卫军的这些企图不予以无情的回击，那我们连两天都不能支持，这也就叫做恐怖，但是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强加于我们的。

在刚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在收复罗斯托夫以后，我们立刻取消了死刑，从而表明了我们履行了实现自己的纲领的诺言。我们说，使用暴力是为了要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这个任务一解决，我们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手段。我们用事实证明了一点。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0卷第296页。

斯大林违背了列宁这些简单明了的教导。斯大林是在剥削阶级已经在我们被消灭，因而没有严谨的理由使用非常的大规模恐怖的时候，唆使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大规模恐怖的。

这种大规模恐怖实际上不是针对战败了的剥削阶级的残余，而是针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忠实的工作人员；对他们使用了“两面派”、“间谍”、“破坏活动”、策划虚构的“阴谋”等等不实的、诽谤性的、荒谬绝伦的控告。

在1937年2.3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很多委员实际上对以反对“两面派”为借口的大规模镇压的既定方针的正确性表示了怀疑。

波斯蒂谢夫同志巧妙地表达了这种怀疑。他说：

我寻思，斗争的严峻岁月已经过去；丧失骨气的共产党员已经颓废潦倒或者参加了敌人的阵营；健康的分子始终为党而斗争。这些就是工业化和集体化年代的情况。所以我决不相信，在这种严峻的时代过去以后，卡尔波夫以及象他这样的人竟有可能置身于敌人的阵营。（卡尔波夫曾是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波斯蒂谢夫很了解他。）而现在根据证词看来，似乎卡尔波夫在1934年被托洛斯基分子拉过去了。我个人是不相信1934年时，一个为了党和社会主义而在对敌人无情斗争的漫长道路上走过来的忠实党员，现在会是敌对阵营中的人。我实在是不相信……我不能设想，一个在艰难岁月里跟党一起走过的人，后来怎么可能在1934年竟加入了托洛斯基分子的行列。这是一件十分离奇的事。〔大厅内情绪动荡〕

混入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于是同无耻的野心家一起，利用斯大林所谓愈接近社会主义我们的敌人就愈多的论断，也利用2.3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叶若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开始以党的名义为他们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干部以及普通苏联公民施加

的大规模恐怖打掩护。只要说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即以指控为反革命罪而被捕的人数在1936和1937年间增加了10倍。

众所周知，粗暴而任意胡为的矛头所指，实际上是党的领导工作人员。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是以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表达的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党章规定，若要使用极端手段，例如把某个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或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开除出党，“必需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邀请全体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出席。”^①只有在这种党内负责领导人全体会议的2/3的成员认为有必要时，才能把某个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开除出党。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出而在1937至1938年被捕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是通过粗暴地践踏党章非法地开除出党的，因为开除他们的问题从未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研究过。

现在，在审查一些所谓“间谍”和“破坏分子”的案件时发现，所有他们的案件都是捏造的。很多被捕和被指控为有敌对活动的人承认有罪的供词，都是借助于惨无人道的严刑拷问获得的。

同时，正如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们告诉我们的那样，很多受到指控的政治活动家都在军事法庭上作了收回自己的供词和请求客观地审查他们的案件的声明，而斯大林却没有给他们过目。当时有很多这样的申诉，斯大林无疑是知道的。

中央委员会现在认为，把许多这样强加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头上的捏造“案件”告知代表大会，是绝对必要的。

^①《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中文版第408页。

前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和苏维埃政府最杰出的工作人员之一、1905年就入党的埃伊赫同志的案件，就是无耻挑拨、恶意捏造和罪恶地践踏革命法制的例证之一。〔大厅内骚动〕

埃伊赫同志是根据诬陷的材料，于1938年4月29日未经苏联检查官的批准而逮捕的，而批准逮捕则在执行逮捕后15个月才最终获得。

对埃伊赫案件的调查是在最粗暴地践踏苏维埃法制的情况下，以肆意捏造的方式进行的。

埃伊赫在酷刑下被迫签署了由检察官事先准备好的他的供词的记录，在这份记录中，他和其他几位杰出的党的工作人员被栽上反苏活动的罪名。

1939年10月1日，埃伊赫呈递给斯大林一份申诉书，他在这份申诉中断然否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请求审查他的案件。他在这份申诉书写道：

没有比蹲进一个我曾始终为之奋斗的政府的监狱里更为痛苦的事了。

埃伊赫的第二份申诉书已被保存下来，那是他在1939年10月27日呈递给斯大林的。在这份申诉书中，他列举了许多很有说服力的事实，驳回了对他的诬告，说这种挑拨性的控告一方面是出于真正托洛茨基分子之手，因为他担任西西伯利亚边区党委第一书记时曾批准逮捕他们，所以力图对他进行报复；另一方面则是检察官卑鄙地捏造材料的结果。

埃伊赫在申诉书中说：

……今年10月25日，我得到通知说，对我的案件的调查

已告结束，并让我看了这次调查的材料。假使我犯了被控告的罪行中的1%的罪行，我也不敢向你呈递这份处决前的申诉书；但是，我并没有犯过被控告罪行中的哪怕是任何一件，我的内心是清白无瑕的，连一点卑鄙的影子都没有。我一生中从未向你讲过一句虚假的话，现在当我发现两只脚踏进坟墓中的时候，我也决不说谎。我的整个案件就是对我挑拨和诽谤以及从根本上破坏革命法制基础的典型例证……

……构成我的一部分档案的供词不仅是荒谬绝伦的，而且包含着对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某种诽谤，因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那些正确的决定，并不是根据我的倡议而且是在我未参与的情况下作出的，却被说成是由我建议的反革命组织的敌对行动……

现在，我指出我一生中最不光彩的地方和我对党、对你犯下的真正的严重罪行。这就是我对反革命活动的招认……情况如下：由于无法忍受乌沙科夫和尼古拉耶夫对我的酷刑拷打，尤其是前者的拷打——他知道我被折断的肋骨没有彻底愈合，便利用这一点使我遭受极大的痛苦——我被迫控告了自己和别的一些人。

我的大部分供词是由乌沙科夫的提示或口授笔录的，其余部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从西西伯利亚弄来的材料由我重写的，对那些材料我承担了一切责任。只要乌沙科夫捏造让我签认的罪行有某些不完全一致之处，我就被迫签署另作修改的文本。对卢希莫维奇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他起初被定为后备网的成员，后来他的名字被去掉了，却根本不让我知道。对被假定为布哈林于1935年创立的后备网的领导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起初，我填上了我的名字，后来又指示我把麦日拉乌克添进去。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事情。

……我要求并恳请你重新审查我的案件，其目的不是为

了饶恕我，而是为了揭发无耻的挑拨行为，它象毒蛇一样缠住了许多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我的卑鄙和罪恶的诬告。我从没有背叛过你和党。我知道，这是由于党和人民的敌人对我搞挑拨离间的卑鄙无耻的勾当。才把我毁了的。

看来，这样一份重要的申诉书是值得中央委员会审查的。但是并没有这样做，而在继续粗暴地对待政治局候补委员埃伊赫同志的同时，这份申诉书却转到了贝利亚手里。

1940年2月2日，埃伊赫被带上法庭。他在法庭上没有招认任何罪行，并作了如下申诉：

在我的全部所谓供词中，除了强迫我在各个记录上签的字之外，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写的。我的供词是在检察官的压力下招认的，他从逮捕我的时候起就折磨我。打那以后，我才开始写所有那些荒诞无稽的东西……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告诉法庭，告诉党和斯大林，我是无罪的。我仍将怀着我整个一生中都对党的政策的正确性的信念而死去

2月4日，埃伊赫被枪决了。[大厅内出现愤懑]现在可以明确认定，埃伊赫的案件是捏造的；他已在死后恢复了名誉。

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同志，自1905年起就是党员，曾在沙皇的苦役里度过了10个年头，也在法庭上全部收回了强迫他招认的供词。在最高军事法庭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有鲁祖塔克的如下抗诉：

……他在法庭上的唯一抗辩是：请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报告，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有一个至今尚未清除的中心，这个中心正在狡猾地捏造案件，强迫无罪的人认罪，而且不让

人有机会来证明自己并未参加被各种各样的人提供的证词所证明的那些罪行。调查的办法是这样的：他们强迫他说谎，不仅诬告那些已经被控告的人，还诽谤一些完全无辜的人。他请求法庭允许他用书面把这一切报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他向法庭保证，他个人从未对我们党的政策打过任何坏主意，因为他始终赞成党在经济和文化活动的所有一切领域中的政策。

鲁祖塔克的这一申诉却被置若罔闻，尽管他当时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首脑，而中央监察委员会是根据列宁旨在为党的团结作斗争的想法而设置的……这个有高度权威的党机关的首脑竟落到了这样的下场，成了粗暴的任性胡为的牺牲品：他甚至没有被召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来，因为斯大林不想和他讲话。对他的判决宣读了20分钟，他就被枪决了。〔大厅内众怒难平〕

1955年，在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仔细审查以后确定，对鲁祖塔克的控告是伪造的，是以诽谤的材料为根据的。鲁祖塔克在死后恢复了名誉。

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借助挑拨离间的手段捏造各种虚构的“反苏中心”和“集团”的手法，可以从罗森布吕姆同志的供词中看到。他从1906年起就是党员，1937年被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

1955年，在审查科马罗夫案件期间，罗森布吕姆揭发了下列事实：同时命令他供认有关他自己和其他人的伪造材料。然后，他被带到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扎科夫斯基答应给他恢复自由，条件是必须在法庭上作一份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于1937年捏造的关于“列宁格勒恐怖中心的破坏，刺探和牵制活动”的供词。〔大厅内骚动不安〕扎科夫斯基竟以使人难以置信的满不在乎的态度，把巧妙地捏造“反苏阴谋”的罪恶“手法”给合盘托出来

了。

罗森布吕姆说：

为了对我说明其做法，扎科夫斯基给基了几份捏造这个恐怖中心及其分支机构的可供选用的方案。扎科夫斯基向我说明了这一捏造的细节以后便对我说，内务人民委员部要制定这个中心的案件，并说审讯将公开进行。

这个中心的4、5成员：丘多夫、乌加罗夫、斯莫罗丁、波捷尔恩、沙波什尼科娃（丘多夫的妻子）等人，以及这个中心的分支机构的2、3个成员要带上法庭……

……必须把列宁格勒中心的这个案子定死，因此就必须有证人，而证人的社会出身（当然是过去的）和党内地位将起不小的作用。

扎科夫斯基说：

你本人不必捏造任何情况。内务人民委员部会替你准备一份这个中心每个分支机构的现成的提要；你必须仔细地研究这个提要，牢牢记住法庭可能询问的所有问题和答案。这一案件要在4到5个月、也许半年内准备完毕。在整个这段期间，你要自己作好准备，以便使调查和你本人都不致露出马脚。你的前途就要看审讯进行得如何，以及审讯的结果怎样。如果你打算乱说或证明得不对，那就怪你自己了。只要你能经住这一关，你就可以保住你的脑袋，我们将用政府的费用来供你吃、穿，直到你死。

这就是当时所做的丑事的一种。〔大厅内躁动起来〕

地方上伪造案件的事更为普遍。斯维尔德洛夫州内务人民委

员部总部“发现了”所谓的“乌拉尔暴动总部”——一个由右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教会领袖组成的集团的机关——据说为首的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党委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卡巴科夫。他从1914年起就是党员。当时的调查材料表明，几乎在所有的边区、州和共和国里，据说都有“右派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和牵制破坏的组织和中心”，而这些组织的首脑照例——却不知何故——是州委第一书记，或是共和国共产党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大厅内又躁动不安〕

成千上万忠实无辜的共产党员由于这种荒唐捏造的“案件”，由于承认各种各样诽谤性的“供词”，由于被迫对自己和对别人进行控诉而含冤死去。强加于党和国家卓越的工作人员——柯秀尔、丘巴尔、波斯蒂谢夫、科萨列夫和其他人——的“案件”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捏造出来的。

在这些年里，采取大规模镇压完全不是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的，结果使党造成了重大的干部损失。

因为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准备的名单，名单上的人的案件是由军事委员会审理的，而且这些人的判决是事先准备好的，这种罪恶的做法便未加追究。叶若夫会亲自把这些名单送给斯大林，让他批准拟定的刑罚。在1937—1938年间，这种列有成千上万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队和经济工作人员名字的383份名单送给了斯大林。他都批准了这些名单。

现在复查了这些案件中的大部分，其中大多数已撤销了，因为它们都是没有根据的和捏造的。只要说出这一事实就够了，即从1954年到现在，最高法庭军事委员会已经恢复了7679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是在死后恢复名誉的。

大规模逮捕党、苏维埃、经济 and 军事工作人员使我们国家，使社会主义的发展事业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大规模镇压对党的精神政治状况发生了消极的影响，造成了

人心惶惶的局面，散播了不健康的怀疑情绪，并在共产党员中，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形形色色的诽谤者和野心家活跃起来了。

1938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月全体会议的决议，给党组织带来了某种改进的措施。但是，普遍镇压在1938年依然存在。

只是由于我们党掌握了强大的道德政治力量，才使其自身得以从1937—1938年的那些艰危的事件中幸存下来，并教育了新的干部。但是毫无疑问，如果不是1937—1938年无端伪造的大规模镇压使得干部遭到极大的损失，我们向社会主义的进军和充实国防的准备一定会更为成功。

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指责叶若夫在1937年的倒行逆施。但是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叶若夫没有斯大林的应承，能够逮捕柯秀尔吗？对这事交换过意见或者经政治局作出决定吗？没有，同其他这类案件一样地没有。叶若夫岂能决定关系党的卓越人物命运的如此重大问题呢？不能，认为这是叶若夫一个人干的，那是一种天真的表现。显然，这些事都是斯大林决定的，没有他的命令和认可，叶若夫是无法做出这种事的。

我们审查了这些案件，恢复了柯秀尔、鲁祖塔克、波斯蒂谢夫，科萨列夫和其他人的名誉。逮捕和判决他们的理由何在？复查的证据表明，没有这样做的理由。他们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是在检察官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逮捕的。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不需要任何批准，只有斯大林决定一切，还谈得上什么批准。斯大林就是这些案件的首席检察官，他不仅同意，而且根据自己的倡议签发逮捕令。我们必须说明这一点，以便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能够明确地接受和亲自评价这个问题，并作出适当的结论。

事实证明，很多恶劣的做法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而没有考虑到任何党的准则和苏维埃法制行事的。斯大林是一个疑心特重的人，他病态似地胡乱猜疑；我们是从同他共事中知道这一点的。斯大林能够盯住一个人问：“你今天的眼神为什么这样躲躲

闪闪？”或者“你今天什么老绕弯子又不敢正眼看我？”这种病态似的猜疑使得他甚至对他多年深知的党的卓越工作人员也普遍不信任起来。他处处事事都看到“敌人”、“两面派”和“间谍”。

他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任意把一个人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于是造成了一种人们不能表达自己意志的局面。

只要斯大林说某人应该逮捕，就必须盲目地相信那个人是“人民的敌人”。这时，掌握了国家保安机关的贝利亚一伙就尽最大努力来证明被捕者有罪，证明他们伪造的材料是真实的。提出的证据是什么呢？是被捕者的供词，而检察官也就认定这些“供词”。一个人怎么可能承认他没有犯的罪呢？只有一个办法——对使他用肉体上的压迫手段，施以酷刑，使他失去知觉，剥夺他的判断力，夺去他的人的尊严。供词就是用这种办法获得的。

当大规模逮捕的浪潮在1939年开始减弱，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人开始谴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对被捕者使用肉体镇压手段的时候，斯大林在1939年1月20日向各州和边区委员会书记、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内务人民委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级组织的首脑拍发了一份密码电报。电报说：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阐明，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从1937年起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中使用肉体镇压手段是容许的……众所周知，所有资产阶级的情报机关都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使用肉体影响的方法，并且是以最丑恶的方式使用它们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的情报机关为什么就该更仁慈地对待资产阶级的疯狂的代理人，对待工人阶级和集体农庄工人的死敌呢？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施加肉体上的压力，作为可用以对付知名的和顽固的人民的

敌人的一种例外，作为既合法又适当的方法，仍然必须加以使用。

这样，斯大林就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批准了对社会主义法制的最粗暴的践踏，以及酷刑和镇压，从而导致我们看到的那种对无辜者的诽谤和自我控告。

不久前——就在本次代表大会的前几天——我们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审问了当时调查和审讯柯秀尔、丘巴尔和科萨列夫的检察官罗多斯。他是一个卑鄙的人，头脑简单，道德败坏。然而，就是这个人曾决定着党的卓越的工作人员的命运，并且由他对这些事件中的政治方面作出判断，因为他在确定他们的“罪行”时，也就相应地提供了可以从中引出重要政治线索的材料。

问题在于，具有这种才智的人是否能够单独以某种方式进行调查，来证明象柯秀尔等人那样的人有罪。不，没有得到正面的指示，他是做不出这种事情来的。他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对我们说：“我被告知，柯秀尔和丘巴尔都是人民的敌人，由于这个原因，我作为一个检察官，必须使他们承认他们是敌人。”

〔大厅内有愤慨声〕

他只有得到贝利亚详细的指示后，通过长时间的拷问，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说的是，他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满不在乎地宣称：“我认为我是在执行党的命令。”斯大林关于对被捕者使用肉体镇压手段的命令，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执行的。

这些情况和其他许多事实表明，党的正确解决问题的一切准则都不起作用了，任何事情全都取决于一个人的为所欲为。

权力集中在斯大林一人手里，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我们只要看一看我们的许多小说，电影和历史“科学研究”，就显示出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是完全不可信的。斯大林预见到了一切。苏联军队根据斯大林早已制定的战略计划，采取了所谓“积极防御”的战术，正如我们知道的，就是让德国人逼进了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据说，苏联军队只是由于斯大林的天才，运用了这种战术，才转入反攻，征服了敌人。在这类小说、电影和“科学研究”中，把依靠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力量、依靠英雄的人民取得的史诗般的胜利，完全归功于斯大林的战略天才了。

我们必须仔细地分析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而且尤其从政治的、教育的和实践的观点来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

在战前，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所有政治教育工作的特征是，都具有自我吹嘘的调子：如果敌人胆敢侵犯苏联的神圣国土，我们就将对敌人的每一个打击给以三倍的还击，我们将在敌人的国土上与敌人战斗，我们将自己不遭受损失而赢得胜利。但是，这些肯定的说法，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以切实保证我国边界不受侵犯的具体事实为依据的。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斯大林提出了这样一种论点，即我国在战争的前一段时间里遭受的灾难，是由于德国人对苏联进行“突然”袭击造成的。但是同志们，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希特勒在德国刚一掌权，就给自己定下了消灭共产主义的任务。法西斯分子是公开这样说的；他们没有隐瞒自己的计划。为了达到这一侵略目的，搞了各种各样的公约和集团，例如著名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战前时期的很多事实清楚地表明，希特勒正在竭尽全力，准备发动一场反苏维埃国家的战争，他在苏联边界附近集结了大量的武装部队并配有装甲部队。

现在已经发表的文件证明，1941年4月3日，丘吉尔通过他的驻苏联大使克里普斯亲自警告斯大林说，德国人已开始重新集结他们的武装部队，企图进攻苏联。不言而喻，丘吉尔这样做，决不是因为他对苏维埃国家怀有友好的感情。他对此怀有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使德国和苏联进行一场血战，从而加强大英帝国的地位。同样，丘吉尔在他的著作中断言，他竭力“警告斯大林，叫他注意威胁他的危险。”丘吉尔在4月18日和以后几天的电报中反复强调这件事。但是，斯大林无视这些警告。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为了避免挑起军事行动，竟下令不要相信这种情报。

我们必须断言，我们还从自己的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来源，得到了苏联领土受德国武装入侵威胁的情报，但是由于领导对这种情报有所限制，发回来的数据资料都是经过小心处理作了有保留的估计的。

例如，苏联武官沃龙佐夫上尉1941年5月6日从柏林发回的情报说：“苏联公民鲍泽尔……通知海军副武官，据希特勒统帅部某个德国军官说，德国准备在5月14日从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拉脱维亚进攻苏联。与此同时，将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实行猛烈空袭，并派伞兵在边界城市实行空降……”

驻柏林副武官赫罗波夫在1941年5月22日的报告中通知说：“德军的进攻据说预定在6月15日，但也有可能在6月的头几天开始……”

我驻伦敦使馆1941年5月18日发回的电报说：“到目前为止，克里普斯深信德苏之间的武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将不迟于6月中旬爆发。据克里普斯说，目前德国人沿着苏联边界已集聚了147个师（包括空军和后勤部队）……”

尽管有这些特别严重的警告，但仍未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适当地作好国家的防御准备，以免遭受突然袭击。

我们有时间、有能力进行这种准备吗？有，我们有时间，有

能力。我们的工业已经发展得足以充分供应苏联军队所需要的一切。这有下述事实可以证明，即在战争期间，由于敌人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我国的其他西部地区，使我们虽然失去了几乎一半的工业和重要的工业基地与粮食生产基地，但是苏联人民仍然能够在我国东部地区组织军备生产，在那里安装了从西部工业基地撤退来的设备，来供给我国武装力量消灭敌人所需要的一切。

假若我们把工业适时地动员起来，并及时地供给军队所需要的物资，那么我们战时的损失就肯定会小得多。但是，这种动员工作却没有及时地开始。战争的最初几天已很明显，我们的军队装备很差，没有足够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来击退敌人。

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战前生产了出色的坦克和大炮的样品。但是，这些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却没有组织起来，事实上我们只是在战争前夕才开始使我们的军事装备现代化。结果，在敌人入侵苏联国土时，我们既没有足够数量的、不再用来生产武器的陈旧机器，也没有足够数量的、我们计划用于武器生产的新式机器。高射炮的情况尤为糟糕；我们也没有组织生产防坦克弹药。很多防御地带证明是一攻即破的，因为在那里陈旧的武器已被撤掉了，而新式的武器还无从得到。

哎！这还不只是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情况。战争爆发时，我们甚至没有足够数量的步枪来武装动员起来的人力。我回想起在这些日子里，我从基辅打电话给马林科夫同志，告诉他：“人民都志愿参加新的军队，因而需要武器，你必须给我们送武器来。”

马林科夫回答我说：“我们不能送给你们武器，我们正在把全部步枪送往列宁格勒，你们必须自己武装起来。”〔大厅内躁动起来〕

这就是军事装备的情况。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忘记例如下面这个事实。在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前不久，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基尔波诺斯（他后来在前线牺牲了）给斯大林写道，德国军队已在布格河^①一带，正准备进攻，而且最近很可能要发动攻势。对此，基尔波诺斯建议组织强有力的防御，把30万人民撤离边境，在那里组织几个强大的据点：防坦克壕、堑壕等等。

莫斯科用下面这样的断言回答了这个建议：这将是一种挑衅，不要在边界上进行任何备战性的防御工作，不要给德国人以任何向我发起军事行动的借口。因此，我们的边界对抵抗敌人准备不足。

在法西斯军队实际上已经入侵苏联领土，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的时候，莫斯科发布命令说，不要对德国的开火进行还击。为什么？这是因为斯大林无视明显的事实，认为战争还没有开始，这只是德军几股没有纪律的小队的挑衅行动，我们进行还击势必给德国人以发动战争的理由。

下面的事实也是众所周知的。在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领土前夕，有一个德国公民越过我国边界说：德军已经接到命令，在6月22日凌晨3点向苏联发起进攻。这一情况立即告知了斯大林，但是就连这一警告也被他忽视了。

我们看到，一切都被忽视了：一些军队指挥员的警告，敌军逃兵的陈述，甚至敌人公开的敌对行动。这难道可以作为党和国家的首脑在这一特别重要的历史时刻具有警惕性的例子吗？

这种高枕无忧的态度，对分明的事实置若罔闻，造成了什么结果吗？结果是，早在头几个钟头和头几天内，敌人就在我们的边界地区摧毁了我们大部分的空军、炮兵和其他军事设备；消灭了我们大量的军事干部，瓦解了我们的军事领导，因而我们无法

^①在华沙东北面略呈东西流向。——译注

阻止敌人向我国纵深前进。

由于斯大林的多疑善妒，再加上诽谤性的控告，在1937至1941年间干掉了很多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在这些年中，对一部分军事干部的镇压简直是从连、营级指挥员开始，一直扩大到较高级的军事核心的。在这一期间，那些已经在西班牙和远东取得了军事经验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消灭了。

对军事干部实行大规模镇压的政策也使军纪遭到了破坏，因为几年来在党和共青团支部里，各级军官甚至士兵都被教唆“揭发”自己的上级是隐藏敌人〔大厅内骚动不安〕很自然，这在战争初期给军纪状况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你们都知道，战前我们拥有毫无疑问地忠于党、忠于祖国的优秀军事干部。不消多说，那些虽然在监狱中遭到严刑拷打而幸存下来的人，从战争初期起就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志士，并为祖国的荣誉而英勇战斗；我在这里还记得这些同志，例如罗科索夫斯基（你们都知道，他曾被监禁）、戈尔巴托夫、麦列茨科夫（他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波德拉斯（他是在前线牺牲的一名优秀指挥员），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同志。但是，象这样的指挥员很多都在集中营里死了，军队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战争初期使我们祖国面临着巨大威胁的局面。

在前线到最初的灾难和失败之后，斯大林认为这就是末日了。如果忘记这一点，那是错误的。他在这些日子里的一次谈话中，曾说过“列宁所缔造的一切，我们永远丧失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没有指导军事行动，没有做任何事情。只是在政治局的几位委员跑到他面前并对他说，需要立即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前线的状况时，他才重新恢复主动的领导。

因此，战争初期祖国陷入危在旦夕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斯大林本人领导国家和党的错误方法造成的。

但问题不仅在于战争开始时，使我们的军队严重地瓦解了，并使我们遭到惨重的损失。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后，斯大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神经质和歇斯底里，在干预实际的军事行动时也使我们的军队遭到严重的损失。

斯大林非常不了解前线正在发展的真正的形势。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他从未去过前线任何一段或任何一个解放的城市，只是在前线形势稳定的时候，在莫扎伊斯克公路上乘车走了一小段路。这件事，很多充满各种的文学作品和很多绘画都着力描写过。同时，斯大林不考虑前线具体地段的实际情况就干预战役并发布命令，这于事无补而只能造成人员的大量损失。

在这方面，让我来举出一个能够说明斯大林是如何指挥前线战役的典型事实。在这里出席代表大会的，曾担任西南方面军作战部长的巴格拉米扬元帅可以证实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

1942年，当哈尔科夫地区形成对我军异常不利的形势时，我们正确地决定停止旨在包围哈尔科夫的战役。因为如果这次战役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当时的实际形势就会使我军面临致命的后果的威胁。

我们告诉了斯大林这一情况，说形势要求我们改变作战计划，以防止敌人消灭我军相当集中的兵力。

斯大林竟违反一般常识，不顾当时集中大量兵力本身实际上会受到围歼威胁的这一事实，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并发布了继续进行旨在包围哈尔科夫战役的命令。

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并请求他道：“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请你带着地图（华西列夫斯基现在在场），向斯大林同志说明已经发展了的形势。”我们应当指出，斯大林是靠地球仪

搞作战计划的。〔大厅内活跃起来〕是的，同志们，他常常用地球仪，在上面绘出前线所在。我对华西列夫斯基同志说：“请你在地图上给他指明形势；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继续进行原来计划的战役。为了对事业有利，必须改变过去的决定。”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斯大林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为这件事，他华西列夫斯基不想再去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不想听到对这次战役问题的任何议论。

我和华西列夫斯基通完话以后，就打电话到斯大林的别墅里找他。但是，斯大林没有来接电话，接电话的是马林科夫。我告诉马林科夫同志说，我从前线打电话来，是想亲自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让马林科夫告诉我，只能和马林科夫谈话。我再次声明，我想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前线已经出现的严重局势。但是斯大林认为拿起电话不方便，并再次指示我应该通过马林科夫和他谈话，虽然他离电话只有几步路。

斯大林以这样的方式“听了”我们的请求后说：“一切照旧吧！”

其结果如何呢？是我们所预料到的那样糟。德国人包围了我们聚集的部队，因而我们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士兵。这就是斯大林的军事“天才”，这就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大厅内情绪激动〕

战后有一次，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在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碰头时提到，赫鲁晓夫当时打电话谈哈尔科夫的战役本来是正确的，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你们必定看到了斯大林大发雷霆吧！他斯大林，怎么能够承认有过不是！他毕竟是个“天才”嘛，而天才是不可能不正确的！人人都可能犯错误，但是斯大林认为，他是从来不犯错误的，他是一贯正确的。他从未向任何人承认他犯过错误，不管是大的错误还是小的错误，也完全不顾他在理论问题上和实践活动中犯过不少错误这一事实。这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或许必须重

新评价战时的许多军事行动，还其本来面目。

斯大林不了解进行战斗行动的实质而坚持其战术，使我们付出了大量血的代价，直到我们终于阻止了敌人并转入反攻时为止。

军方知道，已经到了1941年底，斯大林还在要求不停地正面攻击，接连夺取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而不是采取攻敌侧翼和深入敌后的大规模机动作战。因此我们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直到我们肩负着全副战争重担的将军们终于改变了局势，转入了灵活的机动作战，才立即给前线带来了有利于我们的重要变化。

更为可耻的是，当我们以重大代价取得了对敌人的伟大胜利以后，斯大林开始贬低曾为取得对敌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很多指挥员，因为斯大林要排除一切把前线的战绩归功于别人而不是他自己的可能性。

斯大林对朱可夫同志作为军事领导人的评价非常注意。他常常问我对朱可夫的意见。我当时告诉他：“我认识朱可夫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是一个优秀的将军和优秀的军事领导人。”

战后，斯大林便开始说出有关朱可夫的各种无聊的话，例如说：“你赞扬过朱可夫，但他不值得赞扬。据说，在前线每次作战之前，朱可夫常常故作姿态：他总是抓起一把土，闻一闻说：

‘我们能够发起进攻了’，或者相反：‘计划好的作战行动不能实现了’。”我当时说：“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这是谁编造的，但决不是真事。”

很可能是斯大林本人为了把朱可夫元帅的作用和军事才干贬抑到最低限度而捏造这些情况。

在这方面，斯大林却竭力要表现自己是伟大的领袖，千方百计地向人民反复灌输伟大卫国战争中苏维埃国家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应归功于斯大林的英勇、大胆和天才，而不应归功于其他任何人。他正象库兹玛·克留奇科夫〔一位立下反对德国人的英勇功

绩的著名哥萨克人]一样，一枪挑死7个人。〔大厅内气氛活跃〕

我们还可以举出我们的历史影片和军事影片以及一些文学创作为例，它们同样的格调使我们感到恶心。它们的主题全是赞扬斯大林的军事天才，从而达到宣传的目的。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攻克柏林》这部影片。在这部影片里只有斯大林的戏：他在大厅里发号施令，而大厅里除了很多空着的椅子外，只有一个人走到他跟前，向他报告情况——那就是他的忠实贴身保镖波斯克列贝舍夫。〔大厅内发出笑声〕

军事指挥部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同什么打交道？在这部影片中没有他们的任何情况；斯大林代替了每一个人在起作用；他不和任何人商量，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一切都是以这种虚假的模样向全国展现。为什么呢？为的是让斯大林满身荣誉，竟至违反事实，歪曲历史真象。

于是问题就来了：肩负着战争重担的军人在哪里？在这部影片中看不到他们；有斯大林在，就没有他们的地位。

不是斯大林，而是全党，是苏维埃政府，是我们英雄的军队以及它的有才能的领导人 and 勇敢的士兵，是整个苏维埃国家——正是他们保证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中央委员会委员、部长、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苏维埃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地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的指导者、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保证对敌人的胜利，慷慨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和知识。

表现出卓越的英雄主义应饱享荣誉的我们的坚强核心，是我们全体工人阶级，我们的集体农庄农民，苏维埃知识分子，他们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克服了难以形容的困难，忍受了战争的困苦，为保卫祖国的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们的苏维埃妇女在战争期间立下了伟大的、英勇的功绩，她们负担起了工厂、集体农庄和各个经济、文化部门的生产劳动的重担；很多妇女直接投身于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前线；我们英勇的青年在前线和后方，都为保卫苏维埃祖国和消灭敌人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苏维埃士兵，我们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功绩是不朽的。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在损失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以后，他们毫不气馁而得以在战斗中重振旗鼓，并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创建和锻造出一支顽强而英勇善战的军队，不仅顶住了强大而狡诈的敌人的压力，而且粉碎了敌人。

东部和西部的亿万人民在抗击压在我们头上的法西斯征服的威胁中表现出的壮烈、英勇的事迹，将千秋万代铭记在感恩的人类记忆中。〔暴风雨般的掌声〕

胜利结束这场战争的主要作用和主要荣誉应当属于我们共产党，属于苏联的武装力量，属于党培养出来的数亿苏联人民。〔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让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别的事实。苏联被公正地认为是多民族的国家的模范，因为我们切实保证了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各个民族的平等和友谊。

然而最为荒谬的是斯大林所搞的那些粗暴地践踏苏维埃国家民族政策的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行动。我们指的是把整个民族连同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毫无例外地大规模赶出他们的故土；这种强迫迁居的行动并不是出于任何军事上的考虑而采取的。

例如，1943年底，当伟大卫国战争前线已经发生有利于苏联的持久性突破的时候，采取并执行了把全部卡拉恰伊人驱逐出他们原住地的决定。在同一时期，即1943年12月底，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44年3月，全部车臣

——印古什人被驱逐，并取消了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4月，全部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境驱逐到遥远的地方，该共和国则改名为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乌克兰人有幸免遭这种命运，只是因为他们的口太多，无处可以驱赶。否则，他也要驱逐他们的。〔大厅内发出笑声，气氛活跃〕

不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法理解，就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不能理解，怎能让整个民族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来对敌对行为负责，怎能对他们实行大规模镇压，怎能因为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敌对行动，而把他们全都置于不幸和痛苦之中。

卫国战争结束以后，苏维埃国家自豪地强调了用巨大牺牲和艰巨努力换来的辉煌胜利。全国经历了政治上热气腾腾的时期。党经过战争的考验变得更加团结；党的干部在战争的烈火中经受了锻炼而变得更加坚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也不会认为在党内有某种密谋的可能性。

恰恰在这时，所谓的“列宁格勒事件”发生了。现在我们查明，这个案件是捏造的。无辜牺牲性命的有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吉昂诺夫、波朴科夫和其他人。

众所周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都是有才能的和卓越的领导人。他们都和斯大林亲密相处过。不用多说，斯大林曾任命沃兹涅先斯基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库兹涅佐夫也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把监督国家保安机关交给库兹涅佐夫，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他所受到的信任。

这些人被诬蔑为人民的敌人并被消灭，是怎么发生的呢？

事实证明，“列宁格勒事件”也是斯大林对待党的干部暴戾恣睢的结果。

只要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中存在正常的局

面，这种性质的事件就会根据党的实际情况在这里得到审查，一切有关的事实就会得到确定；结果，这样的事件和其他事件就决不会发生。

我们必须说明，战后的情况甚至更加复杂了。斯大林甚至更加任性、易怒和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越来越大。他的迫害狂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很多工作人员在他的眼里都成了敌人。在战后，斯大林甚至更加脱离集体。一切事情都由他独自决定，从不为任何人和任何事着想。

这种难以令人置信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内奸和无耻的敌人贝利亚巧妙地乘机利用了。他曾杀过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忠实的苏联人民，而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提升使贝利亚惊慌失措。我们现在已经证明，恰恰是贝利亚和他的亲信捏造的，包括申诉书匿名信以及各种谣传和流言蜚语之类的材料，“检举”给斯大林的。

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这个所谓的“列宁格勒事件”；无辜牺牲的人现在都恢复了名誉，也给光荣的列宁格勒党组织恢复了荣誉。捏造这一事件的阿巴库莫夫和其他人已被带到法庭，他们在列宁格勒受到审讯，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只是现在才看到这个事件的真相？为什么我们不在以前，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做一些事情，来防止无辜生命的损失呢？这是因为斯大林亲自处理了“列宁格勒事件”，而大多政治局委员当时都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所有情况，因而无法过问。

斯大林在接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的某些材料的时候，没有审查这些诽谤性的材料就下令调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事件”。他们的命运就是由此决定的。在格鲁吉亚据说出现明格列尔民族主义组织一案，也具有同样的教训。众所周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这一案件的决定是在1951年11月和1952年

3日作出的。这些决定都没有事先经政治局讨论。斯大林亲自口述这些决定，对很多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上了严重的罪名。根据一些捏造的文件，便证明在格鲁吉亚据说有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其目的是要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消灭该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

因此，在格鲁吉亚逮捕了很多党和苏维埃可信赖的工作人员。后来证明，这是对格鲁吉亚党组织的诽谤。

我们知道，格鲁吉亚也和其他几个共和国一样，有时也有地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问题在于：在作出上面提到的决定期间，民族主义倾向是否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格鲁吉亚有脱离苏联，归并土耳其的危险呢？〔大厅内活跃，有笑声〕

这当然是胡说八道。这样的臆断如何进入了一个人的头脑，真是无法想象。每个人都知道，格鲁吉亚在苏维埃制度下，经济和文化是如何发展的。

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工业生产比革命前增长了27倍。格鲁吉亚很多革命前没有的新型工业：炼钢、石油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等等，现在在当地建立起来了。文盲早已被消灭；格鲁吉亚在革命前，文盲占其人口的78%。

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情况与土耳其劳动群众的困苦境况对比之下，难道格鲁吉亚人会渴望并入土耳其吗？1955年，格鲁吉亚人均钢铁产量是土耳其的18倍。格鲁吉亚人均发电量是土耳其的9倍。根据可以到手的1950年人口调查材料，土耳其总人口的65%没有受过教育，在妇女中则占80%。而格鲁吉亚有19所高等学校，约有3.9000名大学生，这比土耳其多8倍（以每1000居民计算）。格鲁吉亚在苏维埃制度下，劳动人民已大大地繁荣昌盛起来。

事实很清楚，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随着格鲁吉亚劳动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吸取力量的源泉就枯竭了。

事实已很明显，在格鲁吉亚没有民族主义组织。数以千计的无辜者成了任意胡为和目无法纪的牺牲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格鲁吉亚人总爱叫他“格鲁吉亚民族的伟大儿子”——的“天才”领导下发生的。〔大厅内气氛活跃〕

斯大林不仅在决定有关国内生活的问题上，而且在决定苏联的国际关系问题上，都表现出他是随心所欲的。

中央委员会7月全体会议详细地研究了与南斯拉夫冲突发展的原因。斯大林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一个可耻的角色。“南斯拉夫事件”并不包含经过两党同志间的讨论解决不了的问题。“事件”的发展并无任何重要根据；完全可以避免与这个国家发生关系破裂。但这并不是说，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没有犯过错误或没有缺点。可是，这些错误和缺点被斯大林骇人听闻地夸大了，结果导致与一个友好国家的关系破裂。

我回忆起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开始被人为地扩大的最初几天的情况。有一次，我从基辅来到莫斯科，应邀去见斯大林，他指着一封不久前送交铁托的信的抄件问我：“你看过这封信吗？”他还没有等我回答，就自己答道：“我只要动一动我的小手指头，就再不会有铁托了。他就会垮台。”

为“动一动小手指头”，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说这样的话，反映了斯大林的自大狂，而他却偏生这样：“我只要动一动我的小手指头——就不会有柯秀尔了”；“我只要动一动我的小手指头，就不会再有波斯蒂谢和丘巴尔了”；“我只要再动一动我的小手指头——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其他许多人就会消灭掉”。

但是，这却轮不到铁托头上。不管斯大林摇多摇少，不光摇动他的小手指头，而且摇动他所能摇的任何东西，铁托并没有垮台。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在与南斯拉夫同志反目的事件中，铁托的背后有一个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战中经受过严格锻炼的国家和

人民，有支持其领导人的人民。

你们都注意一下斯大林的自大狂到了何种程度吧。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他不仅在苏联国内的人际关系上，而且在同整个党际和国际关系上，都表现出他的多疑善妒和目空一切。

我们仔细考察了南斯拉夫问题，并且找到了适当的解决办法，从而受到苏联和南斯拉夫人民以及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群众和整个进步人类的好评。同南斯拉夫不正常关系的了结，是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有利于加强世界和平的。

现在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医生谋杀事件”。〔大厅内活跃起来〕实际上除了女医生季马诺克的申诉以外，没有发生任何“事件”。她可能受某人的影响或指使（她毕竟是国家保安机关的一名非正式的合作者）才写信给斯大林，告发医生们据说在使用错误的药物治疗方法。

这样一封信只要一到斯大林手里，就足以供他马上作出苏联有医生搞暗害活动的结论。他下了逮捕一批苏联著名医学专家的命令，并亲自指示如何进行调查，如何审问被捕者。他说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应当戴上镣铐，另一个人应当拷打。出席本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前国家保安部长伊格纳蒂耶夫同志。斯大林曾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你弄不到医生们的口供，我们就要削掉你的脑袋。”〔大厅内一阵骚动〕

斯大林亲自召见检察官，给他下达训令，告诉他们应该使用哪种调查方法；这些方法很简单——拷打，拷打，再拷打。

医生们被捕不久，我们政治局的委员们就接到了医生们供认罪行的记录。散发这些记录以后，斯大林告诉我们：“你们都象猫崽子一样目光科豆，没有我会发生什么啊？国家就要死亡，因为你们不知道如何识别敌人。

这个案件是在没有人能核实调查所依据的各项事实的情况下

提出来的，因为要想同那些招认有罪的人接触，来核实这些事实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感到，这个逮捕医生的案件可能有问题，因为我们亲自了解其中的某些人，他们曾给我们看过病。斯大林逝世后，我们审查这个“案件”时发现，它从头到尾都是捏造的。

这个卑鄙无耻的“案件”由斯大林亲手立案，但是他并没有时间把它进行到底（达到他所设想的结局），只由于这个原因，医生们才仍然活着，现在全都恢复了名誉；他们正在他们一直工作过的老地方工作，也给包括政府成员在内的高级领导人看病；我们充分信任他们，他们也都一如既往地，忠实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在炮制各种卑鄙无耻的案件中，我们党的疯狂敌人、外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贝利亚——他骗取了斯大林的信任——扮演了一个十分卑鄙的角色。这个内奸是用什么方面取得党和国家的这个职位，担任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呢？现在可以确定，这个恶棍是以无数具尸体作为其登上政府职业的进身阶梯的。

有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贝利亚是党的敌人呢？有的。早在1937年，前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在中央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到贝利亚曾为木沙瓦特^①情报机关工作过。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几乎尚未结束，卡明斯基便被逮捕，接着就被枪决了。斯大林审查过卡明斯基的发言吗？没有，因为斯大林信任贝利亚，对他来说这就够了。而在斯大林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时候，那就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任何与他相反的意见。敢于表示反对意见的任何人，都将遭到与卡明斯基相同的命运。

^①木沙瓦特是阿塞拜疆反革命资产阶级——地主的民族主义政党，曾于1918至1920年在土耳其和英国武装干涉者支持下夺取阿塞拜疆的政权。

——译注

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迹象。斯涅戈夫同志在党中央委员会作的申诉是很值得注意的。（附带说一下，他也是在罪犯集中营里关了17年以后，于不久前恢复名誉的）。斯涅戈夫在申诉中说：

由于建议恢复前中央委员卡尔特维利什维利一拉夫连捷夫的名誉，我受委托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一份关于贝利亚在处理卡尔特维利什维利案中的作用和关于导致贝利亚的罪恶动机的详细证明材料。

我认为，必须回忆一下与这一案件有关的一个重要事实，并把它报告中央委员会。因为我认为，把这一事实归入调查文件是不适当的。

1931年10月3日，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书记卡尔特维利什维利，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边区委员会全体执行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在他们当中我是唯一活着的。在这次会议期间，斯大林在其发言结束时就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书记处的组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书记：卡尔特维利什维利；第二书记：贝利亚。（贝利亚被提名为党内职位的候选人，这在党的历史上当时还是第一次。）卡尔特维利什维利回答，他很了解贝利亚其人，因此他明确地拒绝了和他共事。当时斯大林建议这件事暂不作决定，让它在工作过程中自行解决。两天以后，这个问题的决定下达了，贝利亚得到党的职位，而卡尔特维利什维利则被调离北高加索。

出席那次会议的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同志，可以证明这一事实。

卡尔特维利什维利和贝利亚之间长期不友好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在北高加

索活动的时期；卡尔特维利什维利是谢尔哥最亲密的助手。这种不友好关系促使贝利亚捏造反对卡尔特维利什维利的“案件”。

在这一“案件”中，卡尔特维利什维利被指控对贝利亚进行恐怖行动，这是一桩典型的事例。

在就贝利亚案件提出起诉中，有对他罪行的讨论。但是有些情况必须回忆一下，尤其是因为有可能并非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都看过这份文件。我希望回忆一下贝利亚对凯德罗夫、戈卢别耶夫和戈卢别耶夫的养母巴图里娜等案件的残酷处理——这些人都曾想报告中央委员会关于贝利亚的背叛活动。他们都未经任何审讯便枪决了，而判决是在事后，即处决后宣布的。

下面是老共产党员凯德罗夫同志经由安德列耶夫同志转给中央委员会的信：（安德列耶夫同志是当时的中央委员会书记）

现在我正从莱福托斯基监狱的黑暗牢房里向你呼救。但愿我恐惧的哭喊声能传到你的耳里；请不要充耳不闻，把我置于你的保护之下吧；请帮我去掉这恶梦般的审讯，表明它完全是错误的。

我受折磨是无辜的。谁相信我。时间会证明这个真理。我不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我不是间谍；我不是告发中所指控的反苏组织的成员。我也没有犯其他任何反党反政府的罪行。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从无任何污点；我在党的队伍中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忠实地奋斗了差不多40年……

……如今，我，一个62岁的老人，还在遭受检察官更加严酷、更加残忍和卑鄙的肉体镇压手段的威胁。他们〔法官们〕已完全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不可能承认他们对我的案件的处理是非法的、不能容许的。他们试图把我描绘成一个顽固不化的疯狂的敌人，并要求加以镇压；以此来证明他们的做法是正当的。但是请党相信，我是无罪的，任何情

况都不可能使一个党的忠实的儿子变成敌人，即使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但是，我无以自拔。我摆脱不掉这种急促逼近的、新的强大打击。

不过凡事都有它的限度。对我的酷刑已经达到了极点。我的健康被毁掉了，我的力量 and 神力在衰退，死亡即将到来。被诬蔑为祖国卑鄙的叛徒在苏联监狱中死去——对一个忠实的人来说，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而这一切是多么骇人听闻啊！无比的悲哀和痛苦在啮蚀我的心。不，不！这不会发生；这是不可能的——我哭喊着。无论是党或苏联政府，或是人民委员拉·巴·贝利亚，都不会容许这种残酷得无法挽救的非正义行为。我坚信，只要不血口喷人、粗声晋骂和不施酷刑，而是平心静气地、客观地进行审查，就会很容易证明这些控告是没有根据的。我深信，真理和正义必将胜利。我相信，我相信。

军事委员发现老布尔什维克凯德罗夫同志是无罪的。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根据贝利亚的指令被枪决了。〔大厅内群情激愤〕

贝利亚还残暴地处理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一家。为什么呢！因为奥尔忠尼启则曾试图阻止贝利亚实现其无耻的计划。贝利亚清除了自己道路上一切可能妨碍他的人。奥尔忠尼启则始终是贝利亚的反对者，这一点他曾告诉过斯大林。斯大林没有审查这一事件和采取适当的措施，就允许除掉了奥尔忠尼启则的兄弟，从而使奥尔忠尼泽本人逼上了不得不开枪自杀的境地。〔大厅内愤怒难平〕这就是贝利亚的为人。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党中央委员会揭发了贝利亚。经过特别详细的法律程序，终于确定贝利亚犯下了滔天罪行，于是他被枪决了。

问题在于：贝利亚杀死了成千上万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没有被揭发出来呢？贝利亚之所以没有更早地被揭发，是因为他十分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的弱点，助长他的猜忌心，事事奉承斯大林，而讨得斯大林对他的胡作非为的支持。

同志们！个人崇拜之所以达到这种可怕的程度，主要是因为斯大林自己利用一切办法支持对他个人的吹捧。无数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一书就是斯大林自我标榜和缺乏哪怕是起码的谦逊的最典型例证之一。

这本书是最放肆的阿谀奉承的表现，是把个人神化、把他捧成一贯正确的圣人、“最伟大的领袖”、“绝代和旷世的卓越战略家”的样板。最终找不到别的字眼来把斯大林捧上天了。

我们无需在这里列举充斥该书的令人恶心的溜须拍马的例子。我们只需补充说，这一切都是斯大林亲自同意和亲手编排的，其中一部分是他亲笔添加的该书的初稿。

是斯大林考虑把什么紧要之处添进这本书吗？是不是他想使编写他的《传略》的马屁精们的殷勤冷一冷呢？都不是。他恰恰是着墨于他认为对他的功绩颂扬不足的地方。

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明斯大林所做的手脚，这些都是他亲笔加进去的：

在反对缺乏信心者和投降主义者，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反对哈林分子和加米涅夫分子的这个斗争中，也就最终造成了在列宁去世后负责领导我们党的核心……这种领导核心保持住了伟大列宁旗帜，把党团结到了列宁遗训周围，并把苏联人民引上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大道，斯大林同志是这个核心的主导力量，是党和国家的领导。①

①《斯大林传略》中文版第86页。

斯大林就是这样亲自动笔！接着他加进：

斯大林巧妙地执行着他身为全党和民众领袖的任务，博得苏联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但他在自己的工作中，丝毫也没有表现过自满自骄自夸的心理。①

何时何地一个领袖能够如此颂扬自己呢？这难道与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领袖相称吗？不，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坚决反对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也始终尖锐地谴责这一点。

在该书的初稿中有下面这句话：“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这句话在斯大林看来是太不够了，因此他亲笔把这句话改为：“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或如我们党内常说的那样，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①你们看，这说得多么动听，但这不是全党，而是斯大林本人说的。

还能够举出斯大林亲笔写进该书初稿中的很多这类自我吹嘘的溢美之辞。尤其是他对自己的军事天才和战略才能进行了大量自我吹嘘。

我还要引证一段斯大林插进去的有关其军事天才的论点。他写道：

斯大林同志更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规定了关于经常因素能决定战争命运的原理，关于积极防御与反攻进攻法则，现代战争中各个兵种与作战技术配合动作，大量坦克飞机在现代战争中作用怎样，炮兵是最强大兵种等原理。在战争各个阶段上，斯大林凭靠他的天才，始终能策划出充分顾到战局特点的正确方法“。①”。

〔大厅内冲动起来〕

斯大林进一步写道：

①《斯大林传略》中文版第196页。

①《斯大林传略》中文版第190页。

斯大林的军事艺术，无论在防御战或是进攻战中，都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斯大林同志凭靠他的天才洞察能力，始终都能识破敌人计谋、并击破之。斯大林同志领导苏联军队进行了两次战斗，都表现出作战艺术的卓越模范。^①

斯大林就以这样的方式被颂扬为一个战略家。这是谁干的呢？是斯大林本人干的，他不是作为战略家，而是作为他自我吹嘘的传记的作者和编者，即主要创作者之一这样干的。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这是可耻的事实。

同样，在斯大林的《传略》中还有另外一个事实。众所周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是党中央委员会特设委员会编写的。

顺便说一下，这本书也渗透了个人崇拜，是由一个指定的写作班子编写的。这一事实反映在其《传略》的校样上的下述说法中：

在斯大林同志的指导下，并在最积极地亲自参加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特设委员会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

但是，甚至这种措词还不能使斯大林满意，《传略》的定稿本用下面的话代替了上述说法：

1938年，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经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了。^②

还能有谁再多说什么呢？〔大厅内情绪波动〕

大家都看到，把本来由一个写作班子创作的这部著作变成一本斯大林写的书，这是多么令人惊奇啊。这种怪事如何和为什么

①同上。

②《斯大林传略》中文版第135页。

发生，已没有必要加以说明。

由此我们想起了一个问题：如果斯大林是这本书的作者，那么他为什么需要如此大量地颂扬其本人呢？为什么把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后的整个历史时期，仅仅写进“斯大林天才”的活动呢？

这本书是否恰当地反映了党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国家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反映了坚定不移地走列宁所指道路的党采取的其他步骤呢？这本书主要是讲斯大林，讲他的谈话和报告。一切都毫无例外地与他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斯大林自亲断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是他亲笔编写的时候，这至少叫人感到惊奇。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难道能够这样写自己，把自己捧上天吗？

或者，让我们拿斯大林奖金问题来说吧。〔大厅内情绪冲动〕甚至沙皇们都没有以自己的名字来设立奖金。

对共产党一字不提的苏联国歌的歌词，斯大林认为是最好的；但是，国歌中却有下列对斯大林前所未有的颂扬：

斯大林教导我们忠于人民，
鼓励我们吃苦耐劳建功勋。

在国歌的这两行歌词中，把伟大列宁主义的党的全部教育、指导和鼓舞活动都归于斯大林了。这当然是显然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公然贬低和轻视党的作用。我们要向大家补充说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已经通过了填写国歌新歌词的决议。新的歌词将反映人民的作用，反映党的作用。〔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难道斯大林不知道有很多最大的企业和城镇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吗？难道他不知道在全国都建立了斯大林纪念碑——这些“为活人树立的纪念碑”吗？事实是，斯大林于1951年7月2日

亲自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伏尔加河—顿河运河上建立一座给人印象深刻的斯大林纪念碑的决定，同年9月4日，他发布了一项供建造这座给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使用的33吨铜的命令。凡是访问过斯大林格勒地区的人都一定看到过建立在那里的巨大塑像，而立像的地方通常几乎是人迹罕临的。花费巨款建造这座纪念碑时，该地区的人民依然住在从战争以来就一直居住的简陋小屋里。请想一想，斯大林在他的传说中说：“他……丝毫也没有表现过自满自骄自夸的心理”，这说得对吗？

同时，斯大林倒表现出他对纪念列宁缺乏重视。建立苏维埃宫作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纪念馆的决定，尽管是30年前就已通过的，却一直没有建立。它的建造始终被拖下来，连这个项目也被取消，这决不是偶然的。

我们总忘不了去回忆一下苏联政府1925年8月14日通过的关于“建立列宁教育工作奖金”的决定。这个决定曾在报刊上发表，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列宁奖金。这也应当纠正。〔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斯大林在世时，凭借我提到的那些人所共知的方法，再加上我从《斯大林传略》中摘引的那类事实，使得一切事情被解释为似乎列宁仅仅起了次要的作用，甚至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也是如此。在很多电影和文学作品中，列宁的形象被不正确地表现出来，而且被不可宽恕地贬低了。

斯大林爱看《难忘的一九一九年》这部影片，片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装甲车的踏板上，俨然是亲自仗军刀杀败敌人。让我们亲爱的朋友克里门特·叶弗列莫维奇拿出必要的勇气来写斯大林的真相吧，他毕竟了解斯大林是如何战斗的。承担这一工作，伏罗希洛夫同志会有困难，但是只要他去做就一定做得好。每个人，包括人民和党，都赞成这件事。甚至他的子孙们也会感激他。〔经久不息的掌声〕

谈起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的事情，给人的印象是斯大林总起主要的作用，仿佛随时随地都是斯大林建议列宁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但这是对列宁的诽谤。〔经久不息的掌声〕

如果我说，在座的99%的人在1924年以前都很少听到和知道斯大林，而列宁却是尽人皆知，全党、全国，从儿童一直到白发老人都知道他；我这样说也许不会犯违背真实的过错吧。〔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一切都必须彻底纠正，让历史、文学和艺术都恰当地反映弗·伊·列宁的作用，反映我们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具有创造性的人民的伟大功绩。〔鼓掌欢呼〕

同志们！个人崇拜在党的工作和经济活动中造成了滥用一些错误的原则，导致了粗暴地破坏党和苏维埃的内部民主和毫无成效的管理，助长了各种歪风邪气、文过饰非和粉饰现实。我们国家产生了很多拍马谄媚者，以及盲目乐观和弄虚作假的专家。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由于大量逮捕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很多工作人员开始在工作中迟疑观望，谨小慎微，害怕一切新事物，瞻前顾后，做事缺少主动性。

例如，就以党和苏维埃的决定来说吧。这些决定常常是不考虑具体情况而以例行公事的方式作出的。这种情况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党的工作人员甚至在最小型的会议上也捧着自已的发言稿。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党和苏维埃工作形式化和整个机关官僚主义化的危险。

斯大林不考虑生活的现实，不了解各省的真实情况，这一事实可以由他指导农业的情况来说明。

一切哪怕只是略微关心全国情况的人都知道农业的困难局面，但是斯大林却从不予以注意。我们向斯大林讲过这方面的情况吗？是的，我们向他们讲过，但是他不支持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从不去任何地方，不接见城市和集体农庄的工人；不

了解各省的实际情况。

他只是从电影里了解农村和农业状况。而这些电影却粉饰和美化了农村的当时情况。

很多电影是这样拍摄集体农庄生活的：桌案甚至被火鸡和鹅的重量压弯了。斯大林显然认为事实确是如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观察生活则不同。他总是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常常接见农民代表，经常在工厂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也常去农村和农民交谈。

斯大林脱离了人民，从不去任何地方。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十年之久。他最后一次去农村是在1928年1月，当时他是为交纳粮食问题去西伯利亚的。那么他怎能够知道各省的情况呢？

当他在一次讨论中听说土地情况很困难，牲畜饲养和肉类生产尤为糟糕的时候，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决定，称为“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牲畜饲养的措施”。这个方案我们制定出来了。

当然，我们当时的建议并没有包括一切可行之策，但是我们搞了一个增加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牲畜饲养的特许办法。我们当时建议提高这类产品的价格，以便给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工人在发展牲畜饲养方面造成物质刺激。但是我们的方案没有被接受，而在1953年2月完全被搁置起来了。

更重要的是，在复审这个方案的时候，斯大林建议把各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工人缴纳的税收增加400亿卢布。他认为农民们生活很富裕，一个集体农庄工人只需要多卖一只小鸡就能全部付清他的税款。

试想一下，这意味着什么。400亿卢布这笔金额无疑是集体农庄工人用他们向政府出售的所有产品无法兑现的。以1952年为例，各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工人用他们向政府交纳和出售的所有产品获得了262.8亿卢布。

斯大林的主张有哪一种以数据资料为依据吗？当然没有。

在这种事情上，他是不注重事实和数字的。只要斯大林发了话，事情就得如此——他毕竟是个“天才”；而天才是不需要盘算的，他只消看一看就能立即告诉你必须如何如何。在他表明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人人都必须重复他的意见并钦佩他的才智。

但是，在增加400亿农业税收的建议中包含了多少才智呢？没有，绝对没有。因为这个建议不是以实际估计形势为根据的，而是以脱离现实的人的幻想为基础的。目前我们正在开始慢慢地摆脱农业的困难局面。一些代表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欣慰，我们高兴的是很多代表发言说，有条件不是在5年期间，而是在两到3年内完成畜牧业第六个五年计划。我们确信，新的五年计划的任务一定能胜利完成。〔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今天既然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在世时如此盛行的个人崇拜，我们既然谈论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所引起的很多消极现象，那么各种各样的人都会问，怎么会这样呢？斯大林担任了30年党和国家的领导，很多胜利都是在他的生前取得的。难道我们能加以否认吗？据我看，这种方式提问的人只能是盲目地、不可救药地被个人崇拜迷惑住的人，只能是不理解革命和苏维埃国家实质的人，只能是不用列宁主义方法去理解党和国家在发展苏维埃社会中的作用的人。

社会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和得到中农部分支持的贫农完成的，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人民完成的。列宁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建立了一个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党，它是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无产阶级用以战胜资本主义的科学武装起来的，他在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严重考验中锻炼了党。在这一斗争中，党坚决地捍卫了人民的利益，成了人民的经验丰富的领袖，领导劳动群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们都清楚地记得列宁的这句至理名言：苏维埃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群众认识到历史是由千百万人民创造的。

我们的历史性胜利是靠党的组织工作，靠许多省的组织和我们伟大民族奋不顾身地工作才取得的。这些胜利是整个国家和党共同大力驱策和积极从事的结果，而决不是象个人崇拜时期所描绘的情况那样，说成是斯大林领导的成果。

我们只要象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那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毫不含糊地说，斯大林在世最后几年中盛行的领导作风，成了苏维埃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斯大林常常几个月都不处理一些事关党和国家命运而急待解决的异常重要的问题。在斯大林领导期间，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和平关系常常受到威胁，因为一个人的决定可能引起而且往往确实引起极大的纠纷。

在最近几年里，我们设法摆脱了个人崇拜的有害做法，并在国内外政策方面采取了若干适当的措施，大家便都亲眼看到积极性如何增长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创造积极性如何提高了，而这一切对发展经济和文化起了何等有益的作用。〔掌声〕

一部分同志也许会问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委员们干什么去啦？他们为什么不及时出面反对个人崇拜？为什么只是现在才来反对？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即政治局委员们对这些问题在不同时期是有不同看法的。起初，他们有许多人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的逻辑、他的力量和他的意志大大地影响了干部和党的工作。

众所周知，在列宁逝世以后，特别是在最初那几年里，斯大林为了捍卫列宁主义，向列宁主义理论的敌人和偏离列宁主义理论的人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党及其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以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出发点，开始了大规模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

体化和文化革命的工作。那时，斯大林赢得了众多的爱戴、同情和支持。党不得不对企图引导国家离开列宁主义正确道路的人进行斗争，不得不对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斗争。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后来斯大林越来越滥用自己的职权，开始反对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并且用恐怖手段对付诚实的苏联人民。我们已经指出，斯大林就用这种手段对待过柯秀尔、鲁祖塔克、埃伊赫、波斯蒂谢夫等卓越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不少反对无根据的猜疑和控告的尝试，都以反对者成了镇压的牺牲品而告终。波斯蒂谢夫同志触了霉头，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斯大林在他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了他对波斯蒂谢夫的不满，并且问他：“你到底是什么人？”

波斯蒂谢夫明确地回答：“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一个布尔什维克。”

这种声明起初被认为是对斯大林的不谨重；后来被认为是造成危害的行为，其结果是波斯蒂谢夫被干掉，并且毫无理由地被谴责为“人民的敌人”。

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我经常同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布尔加宁交谈。有一次，我们俩坐在一辆小汽车里，他说：“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作为朋友被邀请到斯大林那里去，当他同斯大林坐在一起时，他不知道下一步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是送回家呢，还是送进监狱”。

显然，这种状况使得政治局的每个成员处境非常困难。当时我们也考虑到最后几年里没有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政治局会议也只是偶尔或有时召开这一事实，但那时我们就会懂得要政治局的任何一个委员采取反对这种或那种不公正的行为和不正当的程序，反对领导作风上的严重错误和缺点的立场是多么困难。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决定都是由一个人单独或者在避开集体讨论的方式下作出的。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的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同志的悲惨命运已为众所周知。那是一件典型的事情：把他开除出政治局的决定从未讨论过，而是间接地传出来的。把库兹涅佐夫和罗吉昂诺夫从其职位上撤下来的决定，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作出的。

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重要性减小了，其工作由于政治局内各种委员会——所谓“5人小组”、“6人小组”、“7人小组”、“9人小组”的成立而瓦解了。例如，下面是1946年10月3日政治局的一项决定。

一、政治局外交事务委员会（“6人小组”）在将来除了要关心外交事务之外：还要关心国内建设和国内政策。

二、6人小组要把苏联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增补进花名册，并称为7人小组。

中央委员会书记约·斯大林（签字）

好一派玩牌人的术语！〔大厅内发出笑声〕很清楚，政治局内设立这类委员会——“5人小组”、“6人小组”、“7人小组”、“9人小组”，是反对集体领导原则的。其结果是，一些政治局委员就以这种方式，不能参与最重要的国事。

我们党最老的党员之一克里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曾处于一种几乎无法忍受的局面。几年来，他实际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会议的权利。斯大林禁止他出席政治局会议和得到文件。当政治局在开会而伏罗希洛夫同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每次都打电话问是否允许他出席。有时斯大林允许了，却总是显出不高兴的样子。由于斯大林特别爱疑神疑鬼，他也就拿这种荒谬绝伦的胡乱猜疑闹着玩，说什么伏罗希洛夫是英国特务。〔大

厅里一片笑声〕而且是真的当作英国特务。在他家里装了特别的搭线窃听装置，偷听电话里讲些什么。〔大厅内群情激愤〕

斯大林还以片面的决定使另一个人——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脱离政治局的工作。这是任意胡为的最放肆行为之一。

让我们来看一看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吧。当时斯大林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描绘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依洛维奇·莫洛托夫和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的特征，从而暗示我党的这些老的工作者犯有某些无端指控的罪行。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只要斯大林再当几个月的领导，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也许就不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了。

斯大林显然有一些搞掉老政治局委员的计划。他常常宣称，政治局委员应当由新的委员来代替。

他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提出选25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建议，目的就是要撤掉老的政治局委员，增加没有经验的人，而这些人势必会以各种方式来吹捧他。

我们可以设想，这也是将来消灭老的政治局委员的一种计划，并以这种方法来遮盖斯大林的一切无耻的行为，也就是我们此刻正在加以思考的行为。

同志们！为了不重犯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已经坚决表示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斯大林被赞扬得过分了。但是，斯大林过去无疑地对党、对工人阶级、对国际工人运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这个问题是有复杂的，因为我们刚才讨论过的这些事情都是斯大林在世时，在他领导下和他的同意下做出的。斯大林深信，这样做对于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敌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是必要的。他看问题也是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

的利益，以及为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立场出发的。我们不能说这些都是浑头脑的暴君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工人群众的利益和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所必须做的。整个悲剧就就这里！

同志们！列宁经常强调谦虚是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列宁本人就是最大谦虚的活化身。我们不能说，我们在各个方面都遵从了这个列宁主义的典范。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即很多城镇、工厂和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苏维埃机关和文化设施，都被我们以某些仍在活动和身体健康的党政领导人的名字——或者恕我这样说：当作私有财产来命名。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参与了用自己名字命名各个城镇、地区、企业集体农庄的行动。我们必须加以纠正。〔掌声〕

但是，这一工作必须沉着冷静地慢慢来。中央委员会将讨论和仔细考虑这个问题，以防止错误和过火行为。我还记得乌克兰人是如何知道柯秀尔被捕的。基辅广播电台往常是这样开始其节目的：“柯秀尔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一朝开始播送节目时不提柯秀尔的名字，人人心里都会明白，柯秀尔出事了，他很可能已被逮捕。

因此如果今天我们开始在各地消除这些标志和改换名称，人们就会认为，某些企业、集体农庄或城市曾荣膺其名讳的那些同志也遭到了某种不幸的命运，他们也被逮捕了。〔大厅内活跃起来〕

如何来判断某个领导人的威望和地位呢？是根据有多少城镇、工业企业和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难道现在不是我们消除这种“私有财产”和使工厂、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国有化”的时候了吗？〔笑声，掌声，喊声：“完全正确。”〕这将有利于我们的事业。个人崇拜毕竟也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我们必须严肃地考虑个人崇拜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捅到党外去，尤其是不能捅到报刊上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掌握限度，决不能向敌人提供弹药，决不能在敌人面前谈论我们的家丑。我相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会理解所有这些建议，并予以适当的评价。〔暴风雨般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必须坚决地、一劳永逸地消灭个人崇拜。我们必须在思想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两方面作出适当的结论。

为此必须：

首先，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谴责和根绝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不符合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的，同时对企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恢复这种做法的一切尝试作无情的斗争。

在我们的一切思想工作中，恢复和切实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下述最重要的科学论点，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为此，我们不得不做大量工作，以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批判地识别和纠正在历史、哲学、经济和其他学科领域以及文学和美术中广泛传播的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错误观点。尤其必要的是，在最近编写一部符合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的关于我党历史的严肃的教科书，此外写一部苏联社会史的教科书，以及有关内战和伟大卫国战争史实的著作。

其次，把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几年中所做的工作有系统地坚持下去，在工作中要随时注意突出各级党组织自下而上地执行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原则，尤其是集体领导的主要原则，突出我们的党章中所列举的党的生活准则，以及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三，完全恢复苏联宪法中表明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列宁主义原则，对个人滥用职权的任意胡为作斗争，彻底纠正由于个人崇拜消极影响而长期积累下来的肆意践踏社会主义革命法制的恶劣行为。

同志们，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已经以新的力量表明了我们党的不可动摇的统一，表明了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明了党完成建设共产主义伟大任务的坚定意志。〔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一丝不苟地提出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个人崇拜的基本问题，以及消灭它的严重后果的问题，这一事实正是我们党具有伟大的道德—政治力量的证明。〔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们绝对确信，我们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历史性决议武装起来的党必将领导苏联人民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去争取新的成就，走向新的胜利。〔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们党的胜利旗帜——列宁主义万岁！〔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最后转为欢呼。全体起立〕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
作关于斯大林罪行的报告全文